第四卷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第四卷

(1949—1952)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1949) ………………………… 1
例言……………………………………………………………… 1
一、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
二、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 11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 20
四、国家与政治 ………………………………………………… 25
五、社会的思想意识 …………………………………………… 33
学社会发展史的方法
——在华北军区直属队的报告(1949) …………………… 42
一、为什么要学社会发展史 …………………………………… 42
二、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 ………………………………… 43
三、学社会发展史应着重了解的问题 ………………………… 45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1949.7) ………… 52
学习社会发展史应明确掌握的五个基本观点(1949.8) …… 57
从头学起
——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1949.9) ………………… 61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1949.10)……… 68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9.11)…………………… 77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1949.11)………………………… 80
反驳唯心论

——对天津干部的讲演（1949.12）…………………………… 89
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1949.12） ……………………… 102
关于几个哲学问题（1950.1）…………………………………… 108
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1950.3）……………………… 118
前进一步（1950.10） …………………………………………… 126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1950.2、11）……………… 136
第一讲 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137
一、劳动创造人………………………………………………… 141
二、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143
三、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146
第二讲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151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51
二、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154
三、阶级斗争问题……………………………………………… 166
第三讲 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172
一、什么叫做革命……………………………………………… 173
二、关于资本主义……………………………………………… 175
三、社会主义革命……………………………………………… 181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 184
第四讲 政治与国家………………………………………… 193
一、什么是政治………………………………………………… 193
二、什么是国家………………………………………………… 199
三、两种国家…………………………………………………… 201
四、关于政体问题……………………………………………… 209
第五讲 社会思想意识……………………………………… 213

一、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213
二、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 221
三、社会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225
四、关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 230
附录一：第一讲问题解答…………………………… 233
一、学习方法………………………………………… 233
二、从猿到人………………………………………… 237
三、宗教迷信问题…………………………………… 238
附录二：关于理论学习总结………………………… 239
一、对总结的一般估计……………………………… 239
二、学习理论课的主要成绩………………………… 241
三、几点经验………………………………………… 245
四、目前存在的几个思想问题……………………… 249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1950.4、11）………………… 257
引言——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 257
第一章　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267
第一题　劳动创造人…………………………… 267
第二题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274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282
第二章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292
第一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292
第二题　五种生产方式（上）…………………… 300
第三题　五种生产方式（下）…………………… 309
第四题　阶级斗争……………………………… 316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325
第一题　什么叫做革命…………………………… 325

第二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333
第三题 社会主义革命………………………………… 341
第四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 350
第四章 政治和国家……………………………………… 359
第一题 什么是政治…………………………………… 359
第二题 什么是国家（上）…………………………… 367
第三题 什么是国家（下）…………………………… 375
第四题 什么是政体…………………………………… 385
第五章 社会思想意识…………………………………… 394
第一题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 394
第二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上）……………………………………… 403
第三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下）……………………………………… 413
第四题 关于思想改造的问题………………………… 422
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序）…………………………… 431
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1950.11） ……… 433
论思想改造问题（1951.1）……………………………… 445
一、“存在决定意识”和“思想改造”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445
二、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的问题………………………… 450
三、关于思想改造的某些方式的问题……………………… 463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1951.3）…………………… 466
一、真理的问题是对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 466

二、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 468
三、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 473
四、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476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1951.6）………………… 483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关于“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问题
的讨论总结（1951.6）……………………………… 500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1.9）……………… 511
一、《实践论》解决了什么问题…………………………… 511
二、对于过去哲学学说如何估计…………………………… 514
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旧唯物论的认识论…………… 521
四、知行难易的问题与《实践论》………………………… 530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51.9）………………… 538
关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
——在安徽宿县第四届文教行政扩大
会议上的讲话（1952.1）…………………………… 555
《大众哲学》（修改本）（1950—1953）…………………… 561
第一章　绪论…………………………………………………… 561
一、哲学并不神秘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561
二、果树林里找桃树
——哲学是什么………………………………………… 570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578
三、两军对战
——哲学的两大类别…………………………………… 578

四、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590
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599
六、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
——辩证唯物论…………………… 609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622
七、用照相作比喻
——反映论…………………… 622
八、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631
九、原来是一家人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641
一〇、由胡桃说起
——认识和实践…………………… 652
一一、是朋友还是豺狼
——真理论…………………… 664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675
一二、天晓得
——立场、观点和方法…………………… 675
一三、无风不起浪
——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 684
一四、不是变戏法
——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 693
一五、追论雷峰塔的倒塌
——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702

一六、岳飞是怎样死的
——对立统一的规律……………………………… 712
一七、没有了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724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 735
一八、七十二变
——现象和本质……………………………………… 735
一九、“谈虎色变”
——形式和内容……………………………………… 747
二〇、规规矩矩
——规律与因果……………………………………… 758
二一、“在劫者难逃”
——偶然、必然与自由…………………………… 768
二二、“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779
附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
（1938、1951 译） ……………………………………… 793
一、马克思给安能科夫
——1846 年 12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 ……………… 793
二、马克思给魏德迈耶
——1852 年 3 月 5 日于伦敦 ……………………… 807
三、马克思给恩格斯
——1856 年 4 月 16 日于伦敦……………………… 808
四、马克思给恩格斯
——1857 年 9 月 25 日于伦敦……………………… 810

五、马克思给恩格斯
——1866 年 7 月 7 日 …… 812
六 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5 年 2 月 23 日于伦敦 …… 813
七、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6 年 10 月 9 日于伦敦 …… 819
八、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8 年 7 月 11 日于伦敦 …… 821
九、马克思给库格曼
——1871 年 4 月 12 日于伦敦 …… 824
十、马克思给库格曼
——1871 年 4 月 17 日于伦敦 …… 826
十一、马克思给波尔特
——1871 年 11 月 23 日于伦敦 …… 828
十二、恩格斯给库诺
——1872 年 1 月 24 日于伦敦 …… 832
十三、恩格斯给倍倍尔
——1873 年 6 月 20 日于伦敦 …… 840
十四、恩格斯给左尔格
——1874 年 9 月 12 至 17 日于伦敦 …… 845
十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克等人的通告
——1879 年 9 月 17 至 18 日于伦敦 …… 847
十六、恩格斯给史密特
——1890 年 8 月 5 日于伦敦 …… 856
十七、恩格斯给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 859
十八、恩格斯给史密特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 862
十九、恩格斯给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 870
二十、恩格斯给丹尼尔逊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 876
二十一、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 879

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

〔订正本〕

(1949)

例 言

一、本提纲是以社会发展史为骨干，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主要论点，故又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短期讲授提纲。

二、讲授本课程时，除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论点之外，必须着重发挥“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首先是劳动者的历史，是生产者本身的历史”的思想，以及“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思想。这两点思想，应贯彻在全部课程的讲授中。

三、讲授本课程时，应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必须指示听众认真研读参考书中所举毛泽东及刘少奇等同志的著作。反对作死板的、抽象的以及仅仅字面的条文解释。

四、讲授本课程时，要联系听众的思想情况，首先研究听众在思想上有哪些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然后针对这些问题，着重发挥有关这些思想的某些论点。

五、讲授本课程时，必须启发听众，把自己的旧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作一比较，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学习，使听众不仅仅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一般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能够收到改造思想的效果。

一、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 在讲社会发展史之先，先要提一下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我们各人对于社会、历史，对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看法，有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反映着各种不同阶级的人对于社会、历史或人类生活的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人生如梦，这就反映着一种（不是一切）剥削寄生阶级的人的看法，每天靠劳动生活的工人农民，就不会认为人生如梦，而是把生活看做实实在在的东西。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观呢？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社会、历史或人类生活的看法，要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符合。什么叫做人生观有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看法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有矛盾，不符合。就是说我们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剥削者，寄生者，脱离实际、脱离社会斗争的知识分子常常会有各种空想。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就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改变我们的看法，使之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由互相矛盾变为互相符合，并由此得到正确的人生观。我们所学习的社会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只有学习这种科学理论，才能使我们正确了解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也就是使我们了解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从而了解如何去改造社会，使我们在今天的革命时代，找到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指导今天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学习社会发展史，要时时反省我们自己原来所有的对于社会、历史或人类生活的看法，要把后者和前者互相对照，要用正确的

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来批判不正确的人生观，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改造思想的方法来进行学习。

2. 用什么方法来看人类社会才是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是用唯物辩证法来看世界，认为世界是在永久变化发展之中的物质，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永远如此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并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在世界上，并不是从来就是这个样，它也是处在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以前的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社会本身，又是世界物质发展的结果。据科学研究的估计，世界上有人类发生，不过是大约五六十万年以来的事情，在此以前的悠久年岁中，是没有任何人类社会的。人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是从一种最高等的动物、一种类人猿发展而成。因此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就要首先研究猿如何变成人的历史。

猿为什么变成人？人之能成为人而有别于猿和其他禽兽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

人和一切动物植物一样，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地从周围世界取得生活资料。就这一点来说，好像人类和其他动物植物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有的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为人类只是为着谋取生存资料而死，和动物一样。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对。因为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和动植物有根本的区别。

动植物以及一切其他生物取得生活资料，是依赖他们天然的器官，因此他们取得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受着天然器官的限制，受着天然器官所能适应的环境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动植物的天然器官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情况，在环境变化的情形下又能改变自己的器官以适应这变化，它就容易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取得生活资料，那么这种动植物就能生存发展，否则就要死亡。生物科学

的研究告诉我们，过去若干万年中间，有无数种类的动植物，就因为不能使自己的器官适应环境，而完全消灭了。只有适于生存的种类才留到现在。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中心思想。一切人类以外的生物的生活，都受着进化规律的支配，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不能超出自己的天然器官和环境条件所限制的范围之外。他们只能适应自然，而不能改变自然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获取生活资料主要不是依赖天然的器官，而是依赖人为的工具。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以进行劳动生产，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为了取得生活资料，不论动物和人类，都必须做一定的劳动，但动物的劳动和人的劳动有根本的分别，“人的劳动只是在制造工具的时候才开始”，高等动物也能利用天然物作为工具，但任何动物也不能制造工具。“不论哪一种猿的手，都不能制造任何东西，即使是最粗劣的石刀”，从猿到人的转变，就是以开始制造工具的时候为分界线的。在没有学会制造工具以前，猿始终是猿，始终是兽类，“当我们的祖先的两手，经过长期的改进与练习，而学会了制造石刀和类似极简单的工具的时候，猿转化为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便完成了”（以上见恩格斯著《从猿到人》）。

所以，要问猿怎样转变为人的，只要研究猿怎样学会制造工具的，就可以得到答复了。猿学会制造工具是它们的两手经过了长期劳动训练的结果。劳动的训练使手和脑同时发展起来，以至于能够制造工具，这样劳动就创造了人类。猿学会制造工具并转变为人类，这并不是任何情形之下都会发生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只在离现在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的时候存在过。那是什么条件呢？那时候地球上的生物已达到高度的发展，在无数的生物种类中已出现了最高等的一种兽类，即猿类，而猿类中

又有一种更高等的猿人，它们已有较发达的头脑，它们长期在树上过攀援生活，因此使得手和脚的作用已有了多少的分化，这就有了转变为人的初步基础（别的动物以及其他猿类绝没有这些条件，因此也就没有转变为人的基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正处在地球气候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叫做冰河时期。以前天气很热，这时渐渐变冷了，地球上的生物，都受到了历史的考验，有许多生物种类不能抵御寒冷，都灭亡了，我们的祖先也不能不努力来适应这新的环境，首先是由于树木的凋谢，树上生活发生困难，不能不到地面来寻找食物，不能不经常用两手来使用武器和工具（现成的棍棒和石块，没有经过制造）以便保卫自己和寻找食物，这样就被迫着使手脚的分工固定化起来，使手受到专门的劳动训练，以至能够由使用现成的石块棍棒过渡到学会制造工具，而开始了人的生活。猿一开始转变为人，在求取生活资料的时候，就能超出自己的天然器官的限制和一定环境条件（如树林环境）的限制，就能够不仅是适应自然，而是能够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生活需要，也就是说能够把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出来，而不只是寻取现成的资料。从此在自然的世界之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人工生产出来的世界，或劳动创造出来的世界。人和禽兽的不同就是能够生产，人的劳动是使用工具的生产劳动，而不是一般动物的劳动。

中国过去把人类看做天生的万物之灵。其实人类并不是天生如此的，而是经过劳动的锻炼由猿变成的。说猿变成为人，就等于说由一个兽类，变为一个能制造工具的劳动者。人为万物之灵，首先是灵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人不仅只适应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就在于人能制造工具来进行生产，就在于人是世界上惟一生产的劳动者。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没有劳动生产的发展，就

没有人类的历史。人类中出现一小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剥削者，在人类历史发展全过程中虽然是一定阶段上必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也仅是一个短时期的现象。剥削阶级的历史思想，常常把剥削者的存在看做永久不变的天经地义，这是违反了科学真理的。

3. 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和禽兽不同的第一个根本的分界线，就在于劳动，就在于生产。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劳动者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就在有剥削阶级存在的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仍然是生产劳动者的群众活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条件，要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必须首先研究生产如何发展。

研究生产的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生产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生产力。生产的发展首先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人类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就扩大了自己的天然器官的作用，提高了自己取得生活资料的能力，为任何动物所不能及。就天然的器官的能力来说，人是动物中极软弱的，但一使用工具，人就能战胜任何最猛烈的动物。工具与天然器官的不同，就在于它可以继续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也就可以继续不断地增大取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动植物因受天然器官的限制，因此每种动植物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都有一定的限制，只有人类，由于能够制造工具和改进工具，就有可能无限制地增进自己取得生活资料的能力，这就是说人不但能生产，而且能继续不断地发展生产力。铁的手工工具的生产力，比石头工具就增大到多倍，机器的生产力，更是手工工具所不能比拟。人类使用一定种类的工具以进行一定种类的劳动，就获得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工具愈改进，劳动技术水平愈提高，则生产力也愈更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生产的一个必要

因素，要了解人类生产发展的情况，首先就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何，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生产关系。生产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是表示人在生产过程中与一定的自然物所发生的关系，但是，人类在进行生产的时候，不仅要与一定的自然物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在人与人之间也要结合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都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进行的，个人的孤立的生产活动是不可能的，只有中国的神话里才有超离尘世的生活，但那是没有任何现实性的，外国的鲁宾逊的传说也不是事实。一切人类的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结合成的这种社会关系，叫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中，生产关系有过种种的变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是以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的所有权为基础形成的。“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利、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社会全体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斯大林）人类在任何时候进行生产，都必须面对一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问题，并且不能不按照一定的所有权的形式而结合为一定的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关系也是人类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一个不可少的方面，其必要性是和生产力一样的。要了解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必须一方面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同时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情况。

这样，生产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

和一定种类的生产关系之统一，就叫做生产方式。例如：一方面生产力的状况，是使用手工工具的个体劳动者的小规模经营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状况是，主要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为地主所有，而地主阶级利用土地的支配权来剥削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这两者的统一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又例如：一方面，生产力的状况是机械的大规模的工业，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状况是，一切生产资料都为资产阶级所有，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劳动者要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的剥削，这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一切政治、文化现象，都是建立在这经济基础之上，并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生产方式就决定着社会的性质、面貌，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不断发展，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准相适应的，在石器工具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有剩余生产物，也就不可能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在粗劣的手工工业的小规模经营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又起着重大的作用。适应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时，就成为不适于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合的生产关系。例如：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巩固地支配着社会生产时，就不适于发展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力，而要发展工业生产力就必须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适合于工业发展的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

者是如在中国的情形，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合，它就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就发生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打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向前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革命的任务，由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为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就是要使旧的政治、文化也跟随着转变为新的政治、文化，就是由旧的社会，发展成为新的更进步的社会。

所以，社会发展史，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史，要了解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必须研究生产、生产方式如何发展，研究生产力如何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如何改变。

不论生产力的发展或生产关系的改变，都是要通过千百万生产者的努力，经过劳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的。一种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发明如果没有成为千百万劳动者所掌握的工具和技术，就不可能实现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从事革命运动的人，如果不动员起千百万的劳动群众来共同斗争，那么，它的任务不论是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任务，都不可能彻底完成。旧的历史观，把社会发展史仅仅看做英雄伟人、领袖人物的历史，强调“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强调帝王将相的个人事业活动。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而绝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生产者的群众活动创造时势，而绝不是英雄个人直接创造时势，是劳动创造世界，而绝不是领袖人物的心血来潮创造世界。领袖人物可以成为劳动群众创造和改变世界的活动中的领导者，因此是有他们的伟大作用的，但只有在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一致，并能动

员劳动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的情形之下，才能表现出指导群众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反之，如果他的思想和行动，违反了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并脱离群众，遭受群众的唾弃时，他就要一事无成，就要成为最渺小的丑角和最可耻的失败者。特别在今天的时代，只有认真地学习社会发展规律知识的人，只有眼睛向下，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准备为劳动群众的利益牺牲一切的人，只有站在劳动人民中间，而不是站在劳动人民之上，并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因而能够正确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要求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才有可能在社会上做出有意义的事业来。如果眼睛向上，轻视劳动群众，首先只看见个人的利益而看不见劳动群众的利益，脱离劳动群众，不了解劳动群众的生活、思想和要求的人，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业来。

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必须研究人类过去的生产发展规律，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要由此引导我们去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生产发展状况，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及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了解中国工农劳动群众发展生产的要求是什么，以便决定适当的方针办法，来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团结一切进步的人民，共同来打破妨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推倒旧的中国社会，建立新的中国社会。

参　考　书

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第一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叁)(甲)(乙)二节。

恩格斯：从猿到人。

伊林：人怎样变为巨人，第一二部中的二、三、四章。

普列哈诺夫：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二）及（五）第八段。

毛泽东：组织起来，第八段。

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第二是开调普会……”一段。

刘少奇：修改党章报告，第二章第四节。

二、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把社会看做发展的过程，社会不是永久如此，一成不变，而是经过种种变化过程的。凡违反这种看法，把社会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的，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人生观。

社会是如何变化的？社会的变化决定于生产的发展，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发展，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各种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有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五种顺序进步的社会制度：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奴隶占有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五个不同的阶段及与之适应的五种生产关系之统一。

1. 什么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人类社会最早的发展阶段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以如下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是：由最初的粗制的石器到制造弓箭、陶器、精制石器以至于开始制造金属工具，由采集生活资料，经过渔猎到畜牧和初期的种植。在这些过程中，生产力虽有相当发展，然而水平始终是很低的。劳动所得仅仅够维持社会成员的困难生活消费的需要，没有或差不多没有任何剩余生产物。在这种生产力的水平上，就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让一部分人来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剩

余生产物。同时劳动技术水平的低度状况，使社会成员除了依赖集体的劳动之外，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生产。因此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只能是生产资料基本上归社会成员公共所有的、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如斯大林说“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间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的共产主义关系。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了很长的时期，50 万年中至少占了 49 万年以上，世界上有些种族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一个时代人类没有什么发展。我们把这时代通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只是就没有阶级和剥削这一点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来说的，除此而外不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都有相当的发展：由粗石器到精制石器，由采集渔猎到畜牧种植，与这种生产力发展适应的，在生产关系方面就有由原始群到氏族公社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里逐渐发生私有财产。最早的私有财产是比较精巧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的使用需要个人的熟练而不能不成为个人终生所有，但死后仍然归氏族所有。其次，当畜牧和农业分工发展起来，随着发生了氏族之间的交易，代表氏族实行交易的族长们逐渐就把一些可交易的财产据为己有。最后，由于农业的进步，小规模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耕作成为可能，耕地就由氏族共同耕种过渡到分配给小家族单位来经营，起初是把公社共有土地定期轮换分配，以后就进到把一定土地固定给各家族所有，这就是后来土地私有的一个来源。私有财产的范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末期，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劳动剩余生产物，已经使剥削成为可能，而奴隶劳动的使用也就发生了。

奴隶劳动的使用逐渐破坏着原始公社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氏

族公社内部，分化为使用奴隶的富有的显贵的一部分人和比较贫穷的一部分人。氏族成员中间相互平等的权利被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破坏了。显贵的人群渐渐成为支配者，社会由以血统为基础的社会一切成员平等互助的氏族组织变为以地区为单位的显贵和富有人物统治的政治组织。这样就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

2. 什么是奴隶占有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阶级社会，它是以如下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在生产力方面：主要是制造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工具（但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奴隶制的时代还没有发现铁工具，只有青铜工具），手工业和农业的普遍的社会分工和奴隶的集体劳动。在生产关系方面是：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以及奴隶本身，而奴隶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并且没有自己本身的支配权。奴隶的剥削是最残酷的剥削，奴隶主对奴隶可以随便出卖，随便杀死。在奴隶制社会里，“已经不是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间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而是由那些被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所剥削的奴隶们底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

奴隶制是基本上适合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态的，它打破了氏族社会的狭隘性，使社会的血缘的组织扩大为地域的组织，使战争俘虏可以免于被杀死，它产生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的分工和奴隶的集体劳动，并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但奴隶劳动的残酷剥削，始终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限制，因此这种生产关系终于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奴隶社会里就表现为奴隶主和奴隶、显贵者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终于摧毁奴隶制社会，而为封建主义的社会所代替。

3. 什么是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较进步的铁工具，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在农村里农业与手工业在各家庭单位之内的结合。与这种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为地主阶级所占有，同时劳动工具则为劳动者所占有，地主阶级利用自己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使劳动者不能不依附于地主阶级，并向后者贡献劳动剩余的生产物。封建社会下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与奴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有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经济，因此劳动者比较有更多的生产兴趣。但被剥削的残酷程度，并不比奴隶相差多少，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被称为农奴的地位。地主阶级对农奴仅仅不能随便杀害，除此而外，农奴在人格上是完全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尤其是在奴隶制残遗仍然存在的中国，地主阶级对农奴简直还保有某些“生杀予夺”的权力。

封建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由于劳动者有自己的经济，因而对于劳动也发生较多的兴趣，这就使得生产力比在奴隶制度时代有更广大的发展余地。但由于封建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仍限制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日愈显露出来。特别是当工商业日渐发展，城市中间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工场之后，便很快达到了非打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地步。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与城市人民（包括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城市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的主要经济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削，而农民在封建社会下所受的痛苦也最深，农民起来与地主斗争时，其根本的目的是在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使之转变为农民自己的所有权，这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的生

产关系，因此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只有广大的农民起来，才有可能真正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倒坏，都是由于农民暴动的结果。但是农民的分散的小经济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有自己坚固的集中的组织，不可能建立农民自己的国家统治。因此，农民的起义在政治上总是要追随着另外的阶级。在缺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形下，农民起义常常被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所利用，他们在农民群众斗争的压力之下学会采取适当的口号和政策以取得农民的拥护，并因此获得农民革命斗争的果实。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的秘密就在此。在封建社会内部已有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形之下，农民起义常与城市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相结合，并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而资产阶级则常常与封建地主妥协，出卖农民，这样起义的果实就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大都如此。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中，其革命的彻底性和民主性，就决定于农民群众参加的规模之大小。农民群众参加的规模愈大，则其彻底性、民主性也愈大，否则就愈小。但是，在以上的情形之下，农民起义始终只是另外的阶级爬上统治地位的垫脚石，农民自己可能争取所受的压迫的暂时缓和，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相当发展，并且有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地方，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农民起义才能发挥它最大限度的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和民主性，农民才不但能够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并真正获得革命的果实，而且有可能改造自己的经济地位，由小规模经营的个体农民走向集体生产，并由此而得到本身真正彻底的解放。

4. 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起来，并在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一种包含阶级对立的生产方式，并且也是最后的一种阶级对立的生产方式。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生产力方面来说，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就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是一切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劳动者要进行生产活动并谋取生活资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作工，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大量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小规模的工具及生产资料只适合个体生产，不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第二，大批的个体劳动者（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资料，变为除去出卖劳动力以外不能生活的“自由”劳动者。没有大批的“自由”劳动者，资本家就不可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必要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要创造出以上两个条件，创造这些条件的过程，叫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也叫做资产阶级剥夺劳动者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经过中，各国所采取的道路并不一致，但一般都是残酷的、卑劣的、布满了劳动者的血泪的路程。资产阶级常用盗劫、欺诈、侵略战争来积累自己的资本。有些国家大规模地用强力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房屋，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则主要是依靠官僚的残酷剥削，所以官僚资本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它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压倒和窒息了一切其他中小资本。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了大工业，所以它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的。在中国现在，由于工业生产一般落后，为了促进生产力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还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资本主义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大工业使劳动过程成为社会公共的性质，劳动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公共所有制，这就破坏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这就叫做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矛盾，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的矛盾。这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恐慌、战争等种种病态的根源，而其最主要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日愈激烈和广泛的阶级斗争。这斗争的结果是使无产阶级的觉悟日愈提高，组织日愈加强。无产阶级觉悟的最高表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产生，无产阶级组织发展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即共产党的出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之下，无产阶级就能经过各种必经的斗争道路，推翻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

5.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呢？就生产力方面来说，是以电气工业为主的大机器工业，就生产关系方面来说，是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里，生产力就有无限发展的可能，而不再会引起任何阶级的对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社会主义阶段，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的若干残余还待消灭，劳动者是在“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口号下工作；第二，共产主义阶段则表示生产力的更高度的发展，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的生活能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把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者的社会公共财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是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而积累起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剥夺了劳动者，现在则是要把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加以剥夺，这叫做“对剥夺者的剥夺”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策来完成的。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中最前进的阶级，它与大生产结合，并且一无所有，使

得它成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引导一切劳动者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现在苏联在它的国内已完成了这个过程，全世界则正走向这个过程，或已走上了这个过程（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则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将在下一次讲课加以说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首先是生产力向前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各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就由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进入阶级剥削制度，又由阶级剥削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个进步，因为它适合于较高的生产力发展，在阶级剥削制度中，封建剥削制度比奴隶剥削制度进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又比封建剥削制度进步，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要求消灭私有财产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

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私有财产和阶级剥削制度就成为支配的生产关系，而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表现为阶级斗争。一定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他们要坚持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因此他们就代表着现存生产关系的保守的要求，而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则要求剥夺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也就是要求废除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原因，因此他们就代表着反对现存生产关系的要求，或同时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斗争的胜利，就表示着旧的生产关系的崩溃（即旧统治阶级的财产所有权的被剥夺）、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即新的阶级的所有权之获得）和生产力之向前的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

剥夺，地主土地转为农民的土地，官僚资本转为人民的财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即革命），是阶级的财产所有权的转变，是某一些阶级的所有权被剥夺和另一些阶级的所有权之建立，这样的过程就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才能完成。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由今天的阶级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动力，阶级协调就是阻碍社会进步，就是延长反动的剥削阶级的统治的生命。在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势力发展的时候，反动的统治的剥削阶级常常要利用阶级协调的言论和手法来缓和和阻挡革命的冲击。被打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求和阴谋，就是这一种性质的东西。要做一个革命者，必须是面向阶级斗争，而不是回避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一切革命的斗争的浪潮中，总有着许多的阶级卷进漩涡来，而各个阶级在革命中各有自己的要求，并发挥着各种不同的作用。有坚决革命的，有反动的，有动摇的，有在这一个问题上和一个时期表示进步革命，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和在另一个时期又动摇或反动的。研究社会发展史，就是要了解人类社会上有些什么阶级，各阶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及其利益要求如何。而要了解这些，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有方法来分析目前革命中各阶级的情况以及他们所能表现的作用如何，以便正确决定革命斗争中的战略策略；也就是决定哪些阶级应该推翻，哪些阶级应该打击，哪些阶级应该联合，哪些阶级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的依靠。决定用些什么样的政策来联合各进步阶级并发挥他们的革命作用，而防止他们的可能表现的落后甚至反动的方面，并与这些方面进行适当的斗争。对不同的阶级，要依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斗争方法，才能集合成最大的进步力量，彻底打倒反革命势力，建立

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

参 考 书

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二至六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四）及（三）（乙）（丙）。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及第三节。

刘少奇：《人的阶级性》。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1. 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私有的矛盾。这里说的社会的生产，是指由于千万劳动者共同在大机器工业中工作而使生产过程中获得社会公共性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公共性质，要求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就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上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人所有物，因此资本家进行生产，就只是为着利润，为着剥削剩余价值，而不是为着劳动者的需要，不是为着社会公共的需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个别工厂和企业中虽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但就全社会的生产来说却是盲目无政府的，个别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工厂每天生产出大量的商品，但并不考察市场上能否销售出去，资本主义的盲目的大量生产引起市场的尖锐竞争，并在

一定的时候就遇到市场购买力的限制，引起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的恐慌，引起大批的劳动者穷困失业。而劳动者的穷困失业，并不是因为生活的物质资料生产之不足，而是因为生产过剩。在这样的一些矛盾不合理的情形之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是日愈激化，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力量必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愈壮大，资本主义本身的规律使无产阶级一天比一天生长起来，并产生出自己的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产出自己的革命先锋队伍——共产党，成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

2. 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逐渐由小到大，或者把利润一部分投到生产中去使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或者由许多较小的资本汇合为较大的资本。前者叫资本的积累，后者叫资本的集中，资本经过积累和集中的结果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庞大的垄断企业。各种大企业经过银行的投资借贷关系而受到银行的支配，这就由工业资本转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更庞大的垄断资本。垄断使竞争更加激烈。金融资本积累了巨大的利润，使狭小的国内投资市场无法容纳。这样资本主义不但需要向国外输出商品以销售其过剩生产物，又必须输出大量的资本以倾泻其过剩的庞大利润。这样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殖民地之争夺。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由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激烈的殖民地之争夺，就是帝国主义之一些主要特征。帝国主义时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殖民地的瓜分已经完毕，加以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就要发生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殖民地与宗主国间，帝国主义相互间，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就促使资本主义走人坟墓。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削弱了帝

国主义的世界锁链，使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冲破这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一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可能。所以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来镇压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反抗和粉碎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建立起社会主义，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3. 俄国革命：沙皇俄国就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受到打击的帝国主义世界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其所以薄弱，第一是沙皇统治在战争中吃了败战而变为很薄弱，其次是革命人民力量的强大，首先有着吸收了西欧各国革命经验并受到1905年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其次是有广大农民的暴动，以及各民族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指导下与农民联盟，就在全国形成了伟大的革命力量来推翻沙皇的统治。这个联盟又保证了在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俄国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是经过了三个时期：一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或过渡期；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五年计划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度过了大战后最困难的饥荒和外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日月，争取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恢复经济的机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恢复生产，在全国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条件之下，暂时容许了资本主义的存在。这时国内各种经济成分之间进行了斗争。这些成分是：其一社会主义；其二国家资本主义；其三私人资本主义；其四小商品经济；其五族长经济。在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之下，各种经济成分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成分由劣势转为优势，小商品经济走向合作社经济，这就打下

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展开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基础，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的任务，是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才在基本上完成了的。

4. 新民主主义革命：俄国革命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就走入了总危机的时代，走入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资本帝国主义世界是一步步走向总的崩溃，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的争斗，都成为促进帝国主义死亡的力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苏联则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堡垒。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斗争，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这个革命又参加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此，它的最后目的也是在于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人民一起，共同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消灭全人类社会的一切阶级剥削，建设共产主义世界，包括中国自己本身在内——这就是今天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内容之一。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卖国罪行之下日愈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是人民大众日愈广泛地起来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自由而进行革命斗争，但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又有区别。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时代，五四以后则是新民主主义时代。在旧民主主义时代，在国外没有俄国革命，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总危机时期，在国内则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力量，还没有能够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革命的领导地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又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中间世界已进了帝国主义时代，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始终没有成功。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到新民主主义

时代方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在国际上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国内则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第一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不是任何其他阶级领导的革命；第二是广大人民的革命，资产阶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不是主体；第三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即不但在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反对一部分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只对于有利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才采取坚决保护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之下，中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将包含以下各种成分：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第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合作社经济；第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第四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第五个体经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过渡性质的，它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之下将经过一定的发展和改造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但却要受一定的限制，以便容易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面才能实现。在这样的政权下面来实施这些政策，就可能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革命是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而建设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使革命向前发展，进入第二步骤，即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是可以保证最少痛苦的，以不流血的方式达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避免用战争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一点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但这一定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之下，在国家机器（主要是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力机构）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情形之下，在资产阶级没有可能用武装力量来反抗这一种转变，而无产阶级却有可能对许多资产阶级施行必要的教育和改造的情形之下，才能实现。

参　考　书

解放社编：《社会发展简史》第六至第七章。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乙)(丙)。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列宁：《帝国主义论》。
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四)。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二章。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四、国家与政治

国家的发生，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之后，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之产物。在原始社会的民族和部落组织里，社会全体成员是相互处于平等互助的关系中，民族领袖人物是由全

体成员选出并代表全体成员处理公共事务。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权力之存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使用，使社会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富有者和贫穷者，这种分裂就破坏了原始社会的平等互助的关系，而引向阶级敌对的关系，生产力愈发展，阶级敌对的关系愈益成为普遍的和不可调和的性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保持一定“秩序”，就不能不有一种驾于社会之上来调节和各种社会敌对势力的统治权力和机构。这种统治权力和机构，就是国家政权，它的主要成分是包含军队、警察、监狱等在内的一套有强制力的机构。这一套机构是如何来调节各种社会敌对势力呢？是由社会的一定阶级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利用这种权力来统治和压迫另一个阶级，以保持社会一定的“秩序”。

因此，国家并不是代表社会全体的东西，而只是这一些阶级压迫和统治另一些阶级的工具。凡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原始社会崩溃后的奴隶社会里，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是奴隶主压迫和统治奴隶与穷人的权力；在封建社会里，国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是封建主压迫和统治农民和其他阶级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和统治无产阶级及其他人民的权力；在俄国革命以前，国家都是剥削阶级手中的权力，都是社会的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民的权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即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才有了被剥削阶级的或以被剥削阶级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两者不同在于前者是以工农知识分子的联盟为基础，而后者在政权里包含一部分剥削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才有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统治和压迫少数剥削阶级的权

力，才有人民自己真正的国家。世界上出现人民的国家，是世界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斗争得到胜利的结果。十月革命是世界人民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出现了苏联。苏德战争是世界人民的第二次胜利，出现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第三次胜利，建立起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扬，如像苏联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扬的爱国主义那样。总之，凡国家都掌握在一定阶级手里的统治权力，掌握这权力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它使国家的一切机构制度、政治思想、政策法令都适合于自己阶级统治的需要。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一定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人民专政的工具，或者是大多数人民对少数剥削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其目的是在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阶级消灭，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到那时候，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便转变为全社会经济管理的机关，这样国家就自然而然地衰亡下去。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的消灭。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期间，国内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必然要拼命反抗，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必然要拼命设法来进行破坏，因此，无产阶级国家就必须加强，以便镇压国内和国外一切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无产阶级国家是最后的最强有力的国家。所以，国家并不是什么开天辟地以来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只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出现了阶级时候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随着阶级的消灭也就归于消灭。

国家的真正性质，决定于它的阶级性，决定于一定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决定于谁是统治阶级和谁是被统治阶级。所谓国体，

即是指国家的阶级性。蒋介石经常讲要保持国体不变，意思就是要保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性质不变。中国人民则一定要使这样的国体从根本改变！

国家是一定阶级压迫和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因此，在一定国家政权之下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必然要对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进步的阶级在反动统治阶级之下必然要进行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被革命阶级打倒的旧反动统治阶级残遗，在胜利后的革命阶级的国家政权之下必然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复辟活动。在剥削阶级统治下，剥削阶级中间或同一剥削阶级内的各派间，为着争夺国家政权中的优越的地位，经常要发生互相火并。围绕着争夺国家政权的目的而进行的各阶级和党派之间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所以，政治并不是孙中山所谓的“管理众人之事”。政治乃是各阶级争夺政权的各种宣传和组织的斗争活动。这里包含着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政策法令之间的斗争，各种不同的“法统”之间的斗争，各种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由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武装强力统治，所以政治斗争的高度发展，在一定情形下就会转为武装的斗争。对于武装的反动统治者，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后用武装斗争（包括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来推翻其统治，忽视这一点，就可能把革命引向失败。政党是阶级的政治意识最为坚强的集团，它的作用是在于领导本阶级，把本阶级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斗争以至于军事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共产党，才能成为政治上自觉的阶级，才能在正确的领导之下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

国家政权、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政策法令、政党以及一切政治的阶级斗争活动，叫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物，这建筑物是

以社会的生产、经济作为基础的，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各阶级的经济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总要影响到和表现为政治斗争，影响到和表现为有关国家政权问题的斗争。国家及其一切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于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家、政治对于经济没有重大的反作用。反动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必然为这些阶级利用来巩固旧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因此就会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阶级手中如果掌握了国家工具，这个工具就可以被利用来发展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此就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迅速变成生产上先进的国家——如俄国革命后的苏联那样。所以，革命的问题，在基本上说来，乃是一个国家政权问题，革命的胜利与否及其胜利的程度，要看革命阶级和领导它的政党是否能夺取和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是否能打破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及其一套旧的政治建筑物，建立自己的新的国家机构及一套政治建筑物，包括军队、警察、监狱、官僚机关、政策法令、政治思想等等。革命阶级和政党，如果忽视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忽视争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斗争，以及不能坚决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保证自己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革命阶级能否夺取国家政权，完成革命任务，这是要决定于阶级斗争中革命阶级与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之对比，决定于反动统治阶级是否有力量来维持国家统治权和革命阶级是否有力量来夺取国家统治权。当一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阶级力量已经很削弱、很孤立，而革命阶级却有强大的力量和广泛的同盟军时，即使是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革命也有成功的可能，如在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情形一样，否则，即使经济已发展到

相当高度，革命的胜利仍不可能实现。这也是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之一种表现。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要善于决定正确的政治斗争之战略和策略，以便能够削弱和孤立反动的统治阶级，加强和扩大革命势力及其同盟军，以便有力量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苏联共产党领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有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思想，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国家政权的组织，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制度。有君主制国家，有贵族共和制国家，有民主制国家，国家政权的组织制度或形式，叫做政体。政体不等于国体，政体的种类如何，并不能说明国家的真正性质，国家的真正性质是它的国体。同一种国体、即同一种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形式。例如奴隶制度的国家，就曾经兼有过三种政权形式。希腊罗马的民主国家，其民主权利仍只限于奴隶主阶级之内，奴隶则是毫无权利的。封建国家主要是采取君主制，有时也采取贵族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兼有君主制和民主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权之下，也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权利则受到种种限制甚至于毫无权利。美帝国主义者常自称为民主国家，这仅仅是因为它的政权形式是议会民主制，按其国家的阶级实质来说，它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目前在美国之缺少民主权利，其情形比在法西斯政权——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种变相的君主制——之下好不了多少。

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改变政权制度或形式，如果仅仅改变政体，并不就是国体的改变或国家性质的改变。袁世凯做皇帝和做大总统，政体虽不同，国体却同样是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专政。蒋介石做大总统和做国民政府主

席，情形也是一样。

革命的问题，基本上是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即改变国体的问题，而不仅是改变政体的问题，如果不是以革命阶级的统治代替反动阶级的统治，即使政体有某些改变了，革命仍然是失败的。辛亥革命是这样，1927 年大革命的结果也是这样。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许多年代中，参加革命的人就是由于分不清政体和国体的区别，并以仅仅政体的改变为满足，而常常上了反革命者的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人民强大力量打击之下常常表示政体可以有某些改变，但却同时声称一定要保持国体和“法统”不变，其主要目的也是在于要欺骗革命人民，保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的阶级统治，使革命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人民现在的革命是要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全推翻，把它的“国体”、“法统”推翻，代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这并不是说政体与国体毫无关系。政体是适应于国体的，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发展状况，决定着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封建残余势力相当大并与资产阶级密切结合着的情形之下，如在日本，就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封建势力已被摧毁或原来就没有什么封建势力，如在法国和美国，就可能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总危机的时代，金融寡头的资产阶级为要保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就要采取极野蛮残暴的一种变相的君主制，即法西斯政权形式。

就革命的问题来说，革命问题虽然基本上是改变国体的问题，政权问题也不是完全不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或无产阶级领

导的人民政权，需要与之适应的政体。不论君主制、贵族共和制或议会民主制，都是仅只适合于剥削阶级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民的政权形式。君主制和贵族共和制，是露骨的少数剥削者统治多数人民的政权形式，奴隶社会的民主制，是明显地否认了人口大多数的奴隶的任何权利。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有种种限制，劳动群众的选举权一般只是形式上的，劳动人民无法选出自己真正的代表，或无法选出足够的代表参加政权，无产阶级至多只能利用这种民主形式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它仍只是适合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政权形式。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是要利于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是要能集中人民的伟大力量去反对革命敌人，是要能发挥广大人民的统治作用的政权形式，这样的政权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形式，就是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政权形式对于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没有任何限制，广大人民可以从自己的工厂中、农村中、团体中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来组织政权机关，这个人民代表会议是立法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经代表会议做成决议后，即由它本身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付诸实施，而不至受到像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中那样立法与行政机关分立所造成的种种限制。

一方面，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为主体的包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手里，广大人民成了统治者，这个统治力量表现在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体，废除伪宪法，惩办罪大恶极的战犯，把反动军队改编为人民军队等等）；另一方面，建立适合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实现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推翻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的变相君主制，反对

妨碍劳动人民实现真正民主权利的议会民主制，废除伪“国大”伪宪法，废除六法全书等等）这就是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最基本的任务。

参　考　书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叁）（丙）。

列宁：《论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三）（四）。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五）。

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声明》。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问答：《关于废除伪法统》。

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的指示。

五、社会的思想意识

社会的思想意识（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各部门——如文艺、宗教、科学、法律、道德等，——以及个人的思想意识），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情况的反映。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的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斯大林说：“社会的存在怎样，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怎样，那么，社会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怎样。”不能把思想意识看做人生来的聪明才力的创造，看做“先天的观念”的产物，看做某些“生而知

之”的人偶然想出来的东西。要了解一种思想意识为什么会存在，会发展变化，必须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去找根据。

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各种不同的社会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宗教观念、魔术思想、原始艺术、道德禁令等等，反映着原始人类低微的生产力，和以严格的血缘纽带维系着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有各阶级自己的思想意识，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就有可能在精神生活上，思想意识上保有支配的势力，使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思想也受到统治。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则是被压抑的，同时是在不断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斗争中发展的。奴隶社会各种主要的观念形态，一般地都是反映奴隶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些观念形态把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制度当做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另外一方面，奴隶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是反抗奴隶剥削制度，幻想回到原始公社制度。在封建社会里，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是依靠土地所有权的霸占，来使农民隶属于自己，并借此强制农民贡献出剩余劳动生产物，在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就产生各种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如地域割据思想、专制独裁思想、等级隶属思想、贵族特权思想、家庭内的宗法思想、上对下的恩赐思想等等。中国封建社会的支配的观念形态，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这种思想要人严守“忠君”、“孝亲”的教义（“孝亲”的意义就是要把父母看做君主一样的身份），把人生的目的限制在“报君恩”和“报父母之恩”上面；要人承认不劳而食的地主是生来的统治者，而劳力的农民是生来要被剥削的。反对“犯上”“作乱”，不许被

剥削者反抗统治者。各种等级的人要遵守各种等级的“本分”。地主阶级的本分则是要善于学摆架子，按照地主的等级地位的不同而摆出适合于他们的身份的各种不同的架子。这就叫做“礼教”。“礼不下庶人”，即“礼”是专为地主阶级而设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读不起书的，“读书识礼”是地主阶级的特权，因此读书就被看做高于一切的行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即是说精神劳动高于一切肉体劳动。现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还有着身份、架子、面子、特权等等的观念，看不起劳动群众，以接近工农兵为可耻，以劳动有辱，以游手好闲为荣，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头脑里还保有着封建地主阶级已腐朽的剥削思想之残遗。在封建社会里，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对立的，有农民的平等思想，以及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拿到市场上竞争，追逐利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的人生观。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统治妨碍着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发展市场贸易，因此也就妨碍着追求利润的情形下，资产阶级就提倡自由、平等的思想，提倡发展实业，“富国强兵”，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教条迷信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下，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有它的进步性。但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平等，只是反对封建等级的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主张经济上的平等以及政治上的真正平等。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意义，除了反对封建特权的意义之外，还包含着投机取巧，图谋私利，不顾群众利益的自由，包含着剥削劳动群众的自由，市场竞争的自由，以至于侵略殖民地的自由。随着资本主义在物质上发展为金融寡头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也就发展为独占思想，帝国主义思想以至法西

斯主义思想，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所称颂的自由主义，其内容是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自由相通的。这样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由最初的进步的性质变为腐朽反动的性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支配的观念形态——科学、文艺、宗教、法律、道德等，都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基本内容，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如原子科学之于美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成长起来，就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反映着社会上已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一种力量，按照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它有可能担负起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任务。在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即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人类中美妙的空想。无产阶级出现以后，社会主义就成为可以完全用科学方法掌握的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了。

如上所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看做第一性的现象，把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看做第二性的、从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人类的行动是有目的意识性的社会的行动，因此思想意识的作用，就在人类社会生活发展中成为不可少的因素。这一种或那一种阶级的思想意识在群众中广泛传布，可以动员、组织群众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向着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运动。一方面，社会的思想意识是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产生出来，而另一方面，它反转过来又对社会的物质生活发生重大的作用。孔子的思想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中国二千多年间，它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的人民，这样它就帮助了地主阶级维持着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反动的没落的统治者都要努力散布各种腐朽的

思想意识，来麻痹人民的自觉性，来减弱或阻碍从人民方面来的革命力量的冲击，来延缓自己没落的时日，来阻碍社会的进步。希特勒的“优秀种类”的胡说，美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的童话，都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反之，新兴的革命阶级，就要传播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学说，这种学说只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已提出新的革命任务来的时候才能产生出来，而如果它一旦产生出来，并影响了群众的时候，它就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力量，来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完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提出新的任务，也就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马克思说：“理论一掌握了群众，就成为物质的力量。”又说：“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哲学物质武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所以，每当社会上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出现的前夜，常常总有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或思想改革运动，在思想领域上预先做一番阶级斗争。这时进步阶级的先进代表，就以极大的努力，向国内国外学习和探求进步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武器，去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思想。先进的人们传播了新的进步的思想，使之成为群众的精神武器，这样就为物质生活中的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这些统治阶级就开始散布各种封建的奴化的思想，如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思想，作为维持和巩固反动统治的精神的武器。这一类思想的特征，是对国内人民要求保持古代野蛮残暴的专制独裁，而对于帝国主义者则采取依赖、惧怕以至于谄媚的态度。这种思想的传统，一直保持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中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集中了这种封建、奴化的思想），并且还影响了一部分不觉悟的人民。美帝国主义的

“纸老虎”在今天之所以还有多少吓唬人的余威，就是由于许多人感染了这种惧外的奴化思想的结果。另外一方面，也就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提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任务，为着完成这任务，百多年来先进的人们曾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来探求各种与旧思想敌对的新思想，并在实际斗争中考验过它们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社会物质生活的力量。首先有洪秀全所领导的、采取外国基督教的一部分教义来和中国农民斗争实际结合的太平天国农民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后来又有义和团农民自发的、因此也就掺杂着多少封建落后成分，并终于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的反对外洋侵略者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但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农民不是一个能建立更高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所以这些斗争虽然激烈地动摇了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基础，打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侵略的气焰，但却没有能根本推翻旧的统治，解决历史所提出的任务。其次是戊戌政变时候开明的官僚资产阶级提出的君主立宪思想，这些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想应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改良制度来改变中国的政体，戊戌政变的失败证明这种宫廷改良思想不能动员广大人民力量来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以后就又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来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动员力量来表现在辛亥革命，这个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的统治，也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政体，但仍然没有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在中国的统治，而只是换了一个政权形式，这一个历史的考验证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是过时了，没有力量了。这样，中国历史的任务提出了七八十年，由于没有找到足以完全解决这任务的指导的思想意识，由于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已不足以在中国产生出这样的意

识，这些农民的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虽然也起了多少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使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几次波动，但并没有完成革命的任务。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历史任务的思想，是在俄国革命以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成熟到足以作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领导的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来的时候，是在五四运动时候文化战线上露出头角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个新思想是由最初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人们从俄国革命中学习来的，它出现不久，就夺取了孔子的席位，打败了胡适一流的向旧势力屈服献媚的资产阶级实验主义思想，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动员和组织了中国广大人民，进行了四次革命运动！1925—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1946 年至现在的人民解放战争，30 年来的革命战争，把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引向完全胜利的前途，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有着伟大的动员、组织和改造的作用，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彻底完成革命任务的最进步的新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除了身上的锁链以外任何东西也不会失去的阶级，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能表现最彻底的革命性，而不会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那样的有所顾虑、并因此总要在一定的问题上表现出保守性或反动性。它是与大工业生产密切结合着的阶级，因此它是最能了解集体组织的力量，并且天然地承担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领导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历史使命。因此，与剥削阶级的轻视劳动损人利己的

思想相反，无产阶级的思想是牺牲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散漫、轻视纪律、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相反，无产阶级的思想是照顾大局，重视纪律、重视原则、集体主义的思想。剥削者及小资产阶级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常常是从剥削的利益或个人的利益出发，因此，思想方法上就不免总有某些唯心的、片面的毛病，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立场就使它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保持客观的、全面的思想方法，也就是科学地追求真理的方法。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就是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方面。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要成为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而不至于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就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知识分子的出身，一般都是来自非无产阶级的社会环境里面，即使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也免不了在头脑里保留着很多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或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将障碍着一个人的革命工作的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就必须下决心对自己进行思想的改造，以便扫除这些剥削思想或个人主义思想、唯心的片面的思想，代之以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的思想，以及唯物的全面的辩证法的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必须由改造思想的方法入手，才不至于使所学的停止在口头上、书本上，才有可能掌握其精神实质并进一步变为实际行动。改造思想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旧的思想，都是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中长期培养成一种顽固的行动习惯，要想克服这种顽固的行动习惯，不经过适当的思想斗争，就不能达到目的。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时候，要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其原因就在于此。

参　考　书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人的阶级性》。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学社会发展史的方法*

——在华北军区直属队的报告

(1949)

各位同志!

大家这次学社会发展史，华北军区政治部让我讲讲学习方法问题。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学社会发展史的方法”。在总的题目下，讲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学社会发展史；二、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三、学社会发展史应着重了解哪些问题。

一、为什么要学社会发展史

社会发展史是什么东西？社会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一部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从社会发展史学起。从社会发展史中，可以学得一种基本理论：历史唯物论。学历史唯物论有什么好处呢？学了历史唯物论，使我们能够更深刻的了解党的政策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比如为什么要搞土地改革，平常我们只一

---

* 在印发这个报告时，华北军区政治部有个编者按：“为推动指导干部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华北军区政治部于 8 月 11 日特召集军区直属各单位全体干部，请艾思奇同志作学习启发报告。各部队应当根据这个报告结合目前的理论学习情况，认真的讨论，以纠正一切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正确的深入展开理论学习。”我们以华北军区政治部所印发的稿子为基础，作了整理。

般的了解为农民翻身，这是不够深刻的。又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有许多人不了解。资本家生活好，剥削工人，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讲共产主义，为什么现在不马上革资本家的命？对这些政策了解不够或想不通，就不可能正确执行这些政策。而所以了解不够或想不通，其原因基本上就是由于不大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历史唯物论。

什么叫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主要是讲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怎样发展，为什么要那样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党的各种政策，就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按照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发展规律来规定的。比如为什么要保护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及其资本家？就是因为这是今天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将来要实行共产主义，但现在不能完全消灭阶级，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想跨过这一步是不行的，好比上楼，必须经过楼梯。如果有人想跳上去，就要摔跤。学习社会发展史，就好比要我们深刻了解上楼必须经过楼梯的根本道理。了解了这种道理，我们要上楼时就会走得正确些，不至于摔跤。

二、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

基本学习方法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方法——联系实际。在学习中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我们的思想。就是用学得的理论，解决我们思想上搅不通的问题。学了社会发展史，虽然不能把一切问题都想通，但总可以搅通一部分。

怎样解决思想问题？首先要用比较的方法，把书上讲的与我们的思想做一比较。比如书上说人是猴子变的，我们有的人原来不是这样认识。人这样聪明还是猴子变的?！又如有的同志想马上打倒资产阶级，但我们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的。这样就可以把我

们所学的和自己脑子里原来有的思想比较一下。比较之后，就知道我们原来的思想对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思想与他不同，就是证明我们的思想有毛病。有了毛病就得医治，怎样医治呢？那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旧的不对的思想，接受新的正确的思想，并用学得的新思想，代替原来的旧的错误或模糊的思想。

大家虽然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了多年工作，懂得了一些政策，学了许多革命的工作作风，也就是多多少少学习了一些党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但大家的思想并不会是完全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因为我们大家是从各种环境中出身的，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经常影响着我们。例如我们常常有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会妨害我们建立有系统的完全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学习历史唯物论并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其他方面的理论，来批判旧的错误思想，摆脱它的影响。

所谓联系实际，在学习中来说，就是联系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不用这一方法便是教条主义。革命多年的人，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还需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提高。遇见事情想不通，就是思想水平不高的表现，这是经验主义作怪。经验主义者就是眼光看得近，看得不高，像乌龟，所以叫爬行的经验主义。学马列主义就是要我们的思想由爬行的变为站起来的，能看四方，看远处，不只看眼前。

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就是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也就是整风的方法。马列主义的学习，基本上就只有用这一个方法。人一拿起书本，很容易忘了这一方法，书背得很熟，却不能

解决实际思想问题。我们读了书以后，要在脑子中起作用，使思想发生变化，使思想提高，思想提高了，工作能力也就可以提高。

三、学社会发展史应着重了解的问题

就目前大家学习的情形看来，我觉得要对以下的问题作一些解释：

（一）劳动创造世界的问题。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一）劳动创造世界的问题

我们学“从猿到人”，就知道没有劳动就没有人。人在世界上怎么出现的？猿怎样变成人的？就是由于人猿在50万年以前的各种条件之下，被迫进行劳动，在劳动的锻炼过程中转变为人的。所谓劳动，就是利用工具进行生产，找生活资料。最初猿人使用天然的工具，使用工具久了，便进一步学会了制造工具。“劳动创造人”的意思就是类人猿进行劳动，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把自己从动物中区别开，变成了人。

学了“从猿到人”，可以使我们懂得：人类与动物不同，就是人能制造工具，能进行生产的劳动。人类中也有不劳动的，就是剥削阶级。但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短暂的现象，并且这部分人很少。在任何时候人类的主体都是劳动者。

“劳动创造世界”是说劳动群众是决定历史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例如中国革命战争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主要的就是靠着有劳动人民的支持。大家参加军队工作多年，从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了解都很深刻，学了社会发展史，更可以把过去的经验，提到理论上去认识。

人类历史的发展为什么有一定的规律？为什么原始共产社会不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一定要产生阶级剥削，使劳动阶级受苦？这点，是不是也要从“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来了解呢？当然是的。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就是劳动者发展生产的规律。

为什么产生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就是因为劳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不这样。在原始共产社会，工具很粗糙，用石头工具顶多用铜的工具，生产的东西很少，没有剩余，所以就不能有剥削。以后工具进步了，有了金属工具或铁器，生产力发展了，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因为只有私有财产制度，才适合于这种较高的（但又不是很高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不采取私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今天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条件之下，就只能实行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变工合作，如果要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把土地、牲口、工具都作为公共的，那生产一定会垮台。中国今天的农民，如果他所耕种的土地不是自己的，他就不会积极耕种，如果牲口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他就不会爱惜牲口。这是小规模农业生产力决定了的。有了私有财产制度，同时也就有了阶级剥削的条件，阶级剥削制度在一定条件下也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在原始共产社会末期，产生了奴隶制，既可以使战争中的俘虏免死，又可以使奴隶主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奴隶制比起原始共产主义制度来就是较为进步的。所以，不论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都是在人类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产生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按一定的规律必然产生的。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要我们学会按照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看问题，按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看问题，这叫做历史观点。学社会发展史，就是学习运用这个观

点去认识社会。

一个社会制度进步不进步，一件事情进步不进步，主要的标准就看它帮助还是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为什么在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之外，同时还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呢？就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还能相当地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现在工业品的生产很少，国营工厂一下子也发展不了很多，资本家多开些工厂，使工业品的生产加快，使工业品价值便宜，对工农劳动人民也有利。所以剥削制度不一定都是反动的，只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剥削制度，才是反动的。地主的剥削在今天中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以我们的政策就要消灭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是革命的敌人，不消灭不打倒，中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力就不会提高，人民生活就永不会好。

妨碍发展生产力的反动势力，是一定不能长久存在，一定要垮台的，因为这种反动势力的统治一定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贫乏的灾难中，因此也就必然要遭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凡是遭受到千万劳动群众一致起来反对的统治者，是必然要垮台的。因为千万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劳动创造世界的内容之一，就是劳动群众的活动能创造时势，劳动者的群众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首先是劳动者的历史。

把以上所说的做一个总结，就是：学习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就是要了解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样的思想应用到我们的革命工作上，就是说我们工作中的一切政策、方针的决定，都是要符合于劳动人民的这一个根本要求，要从

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上着眼。学习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又要求我们了解：历史的发展必须在劳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来推动，因此在我们做任何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对劳动群众做宣传、组织动员的工作，发动群众，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来做。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的这些内容，是与我们向来所知道的群众观点是分不开的。

（二）阶级斗争的问题

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我们知道，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内容，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学社会发展史，主要的就是要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学习阶级斗争的历史，其目的又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天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正确的认识各种阶级所起的作用，这就是说要由此学会分析阶级，认清哪些阶级应打倒，哪些阶级要联合，哪些阶级是主力，以便正确决定革命的政策，正确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我们在工作中常常不能很正确的掌握政策，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不懂阶级分析。例如土地改革中，发生的某些个别偏向，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清楚的认识哪个阶级该打倒，哪个该联合。学社会发展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分析阶级。

怎样分析阶级？首先要了解各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各种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方面，即进步的或是反动的。我们要分析一定阶级，它在什么条件下是进步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反动的，或者在某一方面是进步的，而某一方面又是反动的。剥削阶级在历史上不一定都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出现，在原始共产社会的末期，就是一个进步；没有资本主义以前，在奴隶社会末期，地主阶级的出现，也是一个进步。奴隶主的剥削和地主的剥削，在他们开始出现的时代，是合理的，进步的，是

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在如果有人提倡这两种剥削，那就是荒谬绝伦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在一百年前是完全进步的。现在在全世界范围来说，资本主义是反动的。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又有某些进步作用，但这只限于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才是如此，在此限度之外，例如做投机生意的资本家，就起着反动的作用。将来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时，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就完全用尽了，就要被消灭。但现在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要求，所以它有某些进步性。

中国有些什么阶级，这些阶级的进步或反动，由什么来确定？这主要的看它的作用是能促进或妨害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促进生产发展，就是进步的；妨害生产发展的，便是反动，这就是在分析阶级时评判好坏的一个标准。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强迫在中国推销大量的外国商品，不许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农民有粮食、棉花，它大量倾销便宜的粮食、棉花，使农民的生产也受影响。封建地主狠命剥削，把农民搞得很穷，弄得农民没法改进生产。官僚资产阶级是专做投机垄断的生意的，这就妨害了正当工商业的发展；北平的物价上涨，是直接地与残遗的官僚资本势力的捣乱有关系的。它们现在虽然不公开存在了，但与一些投机商人联系暗中捣鬼，扰乱市场，破坏生产，使大家生活不好。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中国人民就变得十分贫困，这些阶级妨害生产的发展，是反动的，所以把它们规定为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在要求发展正当工商业的条件下，同时也就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要求，所以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也同样是革命队伍中的朋友。农民人数最多，在旧中国受压迫最厉害（和工人差不多），要求发展

生产，要求革命，所以农民和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主力。其中工人阶级又是领导的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不但在今天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且要求将来进一步消灭一切剥削，建设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将带着头，把社会领导到更高的阶段上去。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就是根据这样的阶级分析，规定了“三个敌人，四个朋友”。规定了政权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各革命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由阶级分析来决定革命斗争的策略的一个范例。

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就是要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用在政治斗争上，也要应用在各种工作上，例如思想斗争方面，也要用阶级分析。毛主席在1928年所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军队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也是以阶级分析做基础的。我们分析自己的思想，也要用这种方法。如果有错误思想，就要找出错误的阶级根源。比如有些人进了城，有了发财思想，这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荣耀门庭衣锦荣归的思想是封建阶级的思想，这是受了地主阶级的影响。

学习分析阶级的目的，是为了正确的指导今天革命中的阶级的斗争。也就是说，要懂得在斗争中团结一切必须团结的阶级，尽可能的集中最大的进步力量，来打击那些应该被打倒的那些反动阶级势力。阶级斗争所以叫“斗争”，因为妥协不能解决问题。对于反动的势力，只有坚决打倒它，社会才能进步。例如帝国主义，就是依靠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生存，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一定要侵略中国，一定要想把中国永远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有些革命的朋友，以为美国政府也可能对中国人民有某种援助，以为美帝国主义在一定情形下也许可能放弃那破坏中国独立自由的

罪恶的政策，这些想法，近来各种事实发展中都证明完全是幻想。有些革命朋友以前曾经幻想过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妥协，事实的发展恰恰证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才是从来也不曾真正打算和人民“妥协”。“妥协”，在反动派看来，只是在革命人民的强大打击之下，不能不采取的暂时缓兵之计。在革命人民也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暂时的妥协是有的，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革命问题。要根本解决革命的问题，还是要依靠革命人民的坚决斗争，才能达到目的。

斗争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反动派主要的是采取军事斗争的方式，但同时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革命的朋友中间，有没有斗争呢？当然也有的。例如资产阶级做投机生意，捣乱市场，对这样的行为就要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如果有人犯了错误，要进行批评。反对投机是用政治的经济的方式斗争。批评错误，是思想斗争。所以，一提到阶级斗争，并不是说都要动用武器，武装的军事斗争，基本上是对武装的反革命势力才采用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投机，我们用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方法解决，对农民阶级的落后方面，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教育也是思想斗争。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及学习马列主义，也是一种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来与我们头脑中残遗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把学习搞好，就得有阶级斗争的精神，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使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学习要有勇气，跟打仗一样，没有勇气就不能学好。打仗要打倒反动敌人，往往勇气很容易鼓起来，但在学习中要打倒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往往不容易鼓起勇气。所以必须要注意一下。（全文完）

（曾收入《怎样学习社会发展史》中，读者书店 1950 年 1 月版）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1949.7)

《北平解放报》1949年7月13日的“学习讨论”栏里，登载了一篇蓝莎的《劳动创造了人》的文章，据编者的按语，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以那篇文章做结束，似乎是把那篇文章当作结论来发表的。如果这样，那我认为很不妥当。蓝莎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的文字，说明劳动如何创造了人的过程，那一部分倒没有什么问题，但他自己所引申出来的一些论点，却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蓝莎引了恩格斯的大段文章之后，这样说：“由此可见，人是实实在在由猿人转变而来的，‘天’、‘神’、‘日月精华’创造了人的说法，只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谎语谎言。这些谎言的目的是在愚弄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相信，剥削者生来就应当剥削人的……”学习劳动创造了人的真理，可以打破宗教迷信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荒谬的神话，这是没有问题的，宗教迷信受到剥削阶级的支持利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说宗教迷信和各种神话，仅仅是剥削阶级捏造出来的欺骗被剥削阶级的东西，宗教神话的最早的起源，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那时的人类社会还没有阶级出现。如果认为先有了剥削阶级，然后又才由这个阶级捏造出宗教神话，那就无从解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始宗教——例如万物有灵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宗教是

怎样发生的呢？它是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生产发展的状况。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里说："在全盛时代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是以极未发达的生产状态，从而在广大地域上仅有稀薄的人口散布着为前提，人类差不多是由与他们无缘的，为他们所不了解的自然所支配，他的简单的宗教观念，就是显然反映这个的。"所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宗教神话的出现，像一切其他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一样，是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样的阶段上，人类只能以那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恐惧和想望来反映自己的某些生活内容，像劳动创造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更高发展的情形之下才能为人类所认识。所以，把宗教神话的出现仅仅看作是剥削阶级为掩蔽真理而"故意"造出来的现象，这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

由上可见，宗教神话首先是出现于人类处在物质生产极低级的阶段。这在人类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乃是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大规模地利用了宗教神话，使它有着适合于自己阶级统治需要的内容，把宗教变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上的武器，成为麻醉人民的精神上的鸦片。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和蓝莎的简单说法相反，某种宗教在一定时候，又曾经表现为被压迫人民的叹息和梦想，他们反抗旧的统治阶级，采取了宗教的反抗形式。欧洲的原始基督教和印度最初的佛教，是奴隶劳动者反对压迫的宗教，中国的一部分道教和迷信神话，在历代农民暴动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曾采用了原始基督教，作为反抗满清政府，反抗旧封建制度的旗帜。这些情形，自然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劳动群众的经济文化都

处于低度发展水平时才会产生。在今天的革命群众中，如果也有人想用宗教神话的形式来作动员组织工作，那就是荒谬绝伦的反动的行为了。

蓝莎的文章中对于阶级的剥削制度的看法，也缺少历史主义的以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把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事实的话简单的称作“反动的邪说”，“有毒的思想”，而没有认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劳心和劳力的分裂和对立也是必然的现象。他说：“我们学了劳动创造人，这些有毒思想，就是被扫清了。也就是再不相信，劳动只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责任（按：这些句子中的文法混乱反映作者的思想混乱），而会了解，人类在最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劳动的，只有在阶级社会发生的以后，才出现了不劳动而享乐的剥削者。因此，劳动人民应该起来用革命的办法去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照蓝莎这样说来，似乎人类社会之所以发生阶级剥削，只是由于人类思想上犯了错误，“相信”了一种荒谬的邪说，以为劳动只是属于劳动者的责任，而剥削者则有权脱离这个责任。所以，只要一天早上，学了劳动创造人，打破了这荒谬的邪说，就懂得剥削者也“应该”分有劳动的责任，就可以动员劳动人民起来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而不必问社会物质生活与政治条件的发展情况。

学习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使我们懂得，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首先是劳动者、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生产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劳动群众的活动，是任何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加强我们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这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指导是很重要的，同时对于唤起劳动人民的觉醒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劳动者、生产者之被剥削，在任何历

史时代都完全是偶然的荒谬现象，是仅仅由于劳动人民受了错误思想蒙蔽的结果。各种剥削阶级都把自己的剥削看作永久不变的制度，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作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革了这类剥削阶级教条的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定剥削制度的出现，劳心和劳力的分裂和对立，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一定条件之下，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乃是必然的，合规律的，并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关于奴隶剥削制度，斯大林这样说道：“奴隶制度，就现在条件看来，是很荒谬的现象，反乎自然的蠢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比较起来，是一个进步。”这样的看法，斯大林称之为“历史观点”，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些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那么，历史科学也就没有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科学不致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由此可知，阶级剥削的产生和它的消灭，都依赖着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上存在过各种的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度比原始公社的制度前进一步，封建的剥削制度比奴隶剥削制度又前进一步，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又比封建的剥削制度更前进一步，而到了这最后一种剥削制度的出现，才造成了消灭人类剥削的社会条件。对于剥削制度的抽象的笼统的说法，而没有历史的分析，无疑是很错误的。每一个具体的剥削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消灭，而并不是剥削制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被消灭。当一种剥削制度在社会生产发展中还起着一定进步作用的时候，它就不是“应该”被消灭而恰恰是“应该”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今天中国的生产发展过程中还具有一定的作

用，所以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就没有提出立刻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任务，而只提出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的任务。历史给予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最后消灭一切阶级。但这个任务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并不仅仅是由于在思想上觉悟到剥削制度的不合理，觉悟到阶级之“应该”完全被消灭，而主要的是由于今天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正发展着消灭一切阶级的条件，同时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也有可能用自己的努力来促进和创设这些条件。思想上的觉悟，其本身也不外是这些物质条件与政治斗争的发展的反映。所以，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学习社会发展史，其目的并不是为要笼统的“骂倒”一切剥削制度，“骂倒”一切旧思想，一概称之为不合理的、骗人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的认识劳动者、生产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活动的规律，要了解劳动者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之下由原始公社不受剥削的生产者变为被剥削者，了解劳动群众在各种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发展起来的生产条件如何使一种剥削制度必然为另一种剥削制度所代替，而最后终于创造和发展了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高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由此我们也才能了解：今天中国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应该创设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达到获得自己最后解放的这一个最高目的，并且用这种科学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斗争，使我们正确地有步骤地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的社会。

（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7月27日，此文多次被转载或收入到文集中；后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学习社会发展史应明确掌握的五个基本观点

(1949.8)

学习社会发展史，不是单纯的学习一般历史，主要的是通过这一学习，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获取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从而锻炼和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观点——辩证的唯物的观点，以树立理论学习的最基本的观点和知识。这一目的必须明确起来，并在学习中紧紧掌握，无论做笔记也好，讨论也好，都紧紧掌握这目的，否则，仅仅去争论一些细节，一些专有名词，就不可能达到这一学习的全部要求和目的。

根据某些单位已有的经验，在社会发展史开始学习时，提出几个应当时时刻刻注意的重点，或应当明确的几个基本观点，以帮助大家去有重点的发现问题与组织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第一个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

人类的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人类依靠劳动把自己从动物中区别出来，并依靠劳动使用和创造工具，创造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的生活水平和物质财富也就不断提高，以改造成了现代这样丰富文明的世界。这一切都是靠劳动和劳动者创造而来，因此，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类劳动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什么

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也不是什么上帝鬼神创造的历史。因此，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和世界，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无条件的尊重热爱劳动人民，紧紧依靠他们，组织并领导他们进行生产改造社会，其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个观点：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当然也没有阶级斗争；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度和贫富的现象开始产生、发展，促使原始社会崩溃，此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前，人类历史上便先后出现了三个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每一阶段中，人类社会都分裂成为两大阶级——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甚至劳动者本身，对奴隶、农民和工人进行各种剥削，组成自己的国家，对劳动者进行统治。在各历史阶段中，由于两大阶级地位的对立，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阶级压迫和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摧残的加剧，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们便奋起暴动和革命，虽然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推翻了奴隶主和地主的统治，并未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但却使生产力大大向前进了两步，使社会之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了物资前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联盟，推翻最后的一个剥削制度，便使生产力获得无穷发展的历史条件。

这样，社会发展史就告诉我们：（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产生和发展了阶级社会；（二）生产力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和冲突，就表现了劳动者对剥削阶

级的阶级斗争；(三) 一切社会的剥削阶级，总是想保守和维持一个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如果没有劳动者所进行的斗争和革命，要想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个观点：国家、政权、军队都是保护阶级利益的工具

原始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人压迫人的阶级，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国家、政权和军队等东西。等到私有制度、剥削制度产生以后，才有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反抗保护其阶级地位的工具。但历史上劳动人民却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这一秘密，误认为这也是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军队；或者当他们起来革命推翻或掌握了这个工具之后，却又不懂得加以巩固，结果仍使它落入统治阶级手中。只有马、恩、列、斯才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用这个真理来教导我们：只有彻底打碎压迫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军队，并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政权和军队，才能战胜一切阶级敌人，保障自己的统治，直到消灭了世界上的阶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我们才不再需要国家、政权和军队，它将自行消亡。

第四个观点：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两者又相互影响和作用

什么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主要的东西，就是上面所讲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人们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关系，而相互结合，这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

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上，就产生不同时代的政治结构（包括

国家政权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道德、宗教等等。这些东西，一般的也都为当时的剥削者及统治者阶级服务的。因此说：社会经济制度是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

可是，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在同一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往往因为已经存在着新兴的经济因素（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或阶级的缘故，也反映出新兴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东西，除了本身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外，还去影响和作用于旧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两种主要的敌对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后者是新生的、发展的、进步的，所以必然要胜利，前者是衰落的、倒退的、反动的，所以必然死亡。马列主义把这一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结合起来又加以区别，以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并教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拿它作为最重要的武器，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

第五个观点：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

上面的四个重点和观点，也应当说是社会发展的四个规律和必然性。四个重点和规律，又是相互区别和统一的，统一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上，这就是前面的第二个重点和观点。就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变化问题，也就是它所体现的阶级矛盾斗争和变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一定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一旦到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它（生产力）就必然要冲破而再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所谓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而要求达到完全相互适应的一种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原载《华北解放军》创刊号，1949年8月1日）

从头学起

——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

(1949.9)

马列主义的学习，在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各种暑期学习会及短期政治学校里，各大中学、各机关、部队、工厂里，到处掀起了学习理论的热潮。这样一个学习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是由于领导方面的鼓励推动，也是由于广大干部、工人、学生、教职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群众自觉到学习理论的迫切需要。这种自觉是符合着中国当前情况的要求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之下，就要达到全国范围的完全胜利了。但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更多的复杂艰难的任务要我们完成，“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要完成这些任务，不但需要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而且需要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会愈更顺利。

应该承认，过去我们一般的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一方面，广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是处在国民党黑暗反动统治之下，学习马列主义就是死罪，解放之后，马列主义思想对

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而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动派的宣传却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解放区是长期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马列主义的学习受着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许多干部虽然在斗争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发展是那样迅速，而我们的理论知识是如此缺乏。很多人对于国际国内的现状不很了解，甚至于保留着错误的或反动的看法。对于中国革命的各种纲领政策不善于领会，甚至在各种问题上抱怀疑的态度，对于个人的生活、前途方面也往往有许多问题想不通。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目前我们一般的学习运动还应该是一个从头学起的时期。

目前许多地方的学习运动所采取的步骤，正是符合于这种情况的。例如一般都是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一个月到三个月里，集中力量对这一门课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一定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不急于马上获得马列主义的理论、政策的一切方面的知识，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迎刃而解。由此前进一步，不论是参加工作，或继续更深入的学习，都有很大的便利。经验证明，这种集中力量，少而求精的学习步骤，对于从头学起的人是有很大效果的。而那种排列许多复杂课程，每天接连不断地听讲授报告，把讨论、消化的时间挤得几乎没有了的学习步骤，则是效果非常微小的。

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步骤是适当的呢？

因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着要掌握马列主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我们解决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钥匙，不是为着简单的在我们的头脑里装满各种知识。读书很多，听讲授很多，不见得就能真正学会马列主义。毛主席说得好："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说明一个二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整顿党的作风》)有一种错误的教育思想，把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目的放在满足学员的求知欲上面，这种思想正适合着某些学员们好高骛远、不重实际的坏习惯，于是就不承认有从头学起的必要，看不起初步的读物，以读大堆的书籍和停止在字面上的了解为荣耀，不能领会每一本书（哪怕是最初步的书）的立场、观点、方法，当然更不知道应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去说明、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是必须要反对的。有了这种教条主义学习态度的人，哪怕他真的已经读过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他仍然需要跟那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一样地从头学起，好好的把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再读一遍，认真弄清楚什么是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的思想以及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再来领会他所读过的其他书籍，才可能得到真正的益处。当然，反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并不等于反对认真读书。如果有人保留着经验主义的坏习惯，自己懒于认真读书，懒于研究讨论，想专门依靠听很多的报告讲授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不正确的。

再重复一遍：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学习态度。为读书而读书，为简单"满足求知欲"，或为夸耀知识而学习，不联系实际，不解决问题，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为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读书，着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这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坚持真正马列主

义的学习态度。

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方法。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了这个方法。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们读书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做过一些实际工作的干部，也是如此。长期埋头在实际工作中，经验一大堆，不能总结提高，一旦拿起书本来，又陷在书本知识的坑里，忘记了联系自己的经验。“做梦也没有想到学习社会发展史还要联系实际和联系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有些干部在听了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方法的报告后所作的自我反省。

如何联系实际？也就是说，如何在学习当中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说明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需要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去深刻体会的。好比要精通游泳的方法，必须不断的在水中游泳，要熟悉学习方法，也要在学习过程中去锻炼。但是，在初学游泳时，首先了解一些初步的游泳方法，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从头学起的时候，掌握一些初步的联系实际的方法，也是做得到而且有好处的。

学习联系实际，第一步是方便的办法，就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就是应用所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应该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工作加以反省，并把自己的思想，拿来和自己所学到的理论加以比较，这样就会发现，自己的各种思想与马列主义常常是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发现矛盾，就是发现问题，我们的思想既然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矛盾，这就说明我们的思想里有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学习当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把我们的思想搞通了，使之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一致，那就算是掌握了联系实际的初步方法。举例来说，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知道了劳动创造

世界的思想，知道历史首先是劳动者的历史，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在做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这个思想作为基础，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原来的思想，一定容易发现，自己的思想与这马列主义的思想是如何矛盾：原来自己所有的，是“英雄造时势”的思想，把历史看作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不懂得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不重视，个人英雄、自以为是、命令主义，成为自己主要工作方式，不懂得做工作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样，就发现了我们思想上应解决的问题。又例如，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知道了阶级斗争的思想，知道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其他的阶级进行斗争。知道在工作中决定政策必须作阶级分析。把这思想和自己原来的思想比较一下，一定又会发现很多矛盾，原来自己的思想，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或者以为某些人还可以有超阶级的立场，或者相信在中国社会根本说不上阶级对立，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或者在工作中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不懂得对不同的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工作中的许多偏差和错误就由此产生。这样，由于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经过一些自己反省，就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着许多矛盾，也就是发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就必须发现和解决这一类的思想问题。

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反对自己原有的非马列主义的观点，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联系实际的初步方法。这也就是说，学习马列主义的第一步是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如果以为自己的思想没有什么问题，不肯定思想改造的必要，不准备好好来克服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相矛盾的自己一切旧的思想，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的思想，这样的人，即使读上一万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每本读上一千遍，也不可能真正入马列主义之门。真正的马列主义是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把学习贯彻到行动中，一个人，旧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变，思想不改造，就不可能把马列主义的思想变为行动，也即是变为自己真正的思想。这样的人嘴里可以讲劳动创造世界，并且也可以讲得很漂亮，实际上却会鄙视劳动，脱离群众，眼睛向上，自称为创造时势的英雄。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永远不会有马列主义的真正思想。

改造思想，必须经过思想斗争。每一个愿意认真学习的人，要走进马列主义的门的时候，都必须准备一番新旧思想的激烈战斗。世界上一切旧的事物都不会自动死亡，而都是在新事物的斗争打击之下才倒下去的。要克服旧的思想，也决不能在风平浪静的状态之下来达到目的。一个在劳动群众面前摆惯架子的旧知识分子，现在要他来和工人农民做朋友，是一定要有一个不痛快的时期的。如果没有周围人们的批评和推动，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番自我思想斗争，就很难完成这样一个转变。所以，学习马列主义，是要当做一件思想上的革命工作，当作一个思想上的战斗任务来做。要完成这革命的工作和战斗的任务，必须善于使用一个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凡是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和个人，学习一定能够迅速前进，一定是有好的成绩，否则学习一定是表面的，在实际上是停顿的，一定没有好的成绩。经验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学习前进的动力。

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是不断的增长，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前进，也要向全国范围扩大，虽然现在还是要从头学起，但我们

相信在这样一个高潮的推动之下，马列主义的知识水平，在中国人民中间必然要迅速的大大的提高一步。而重要的一环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原载《学习》杂志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15日；此文多次被转载或收入到文集中，后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

(1949.10)

《北平解放报》发表了《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之后，不久就接到报馆转来叶逸民写的一篇替蓝莎打抱不平的、完全拥护非历史观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现，证明在目前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像蓝莎那样的谬误思想的确不是一个个别问题，而我们对这种思想加以批评，是切合实际需要的。

根据叶逸民的文章看来，有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批评。

首先要谈一下学习的"主题"的问题。学习"从猿到人"，主要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要获得一些生物进化的知识，而是要了解"劳动怎样创造了人"，是为要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劳动观点"，及揭穿一切过去轻视劳动与轻视工农的剥削阶级观点。也就是说，要"打破旧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这样规定我们学习的"主题"，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问题是在于，如何来建立"新的劳动观点"，如何解答这个主题?在这个问题上就有着两种正相反对的方法：一种是把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来建立的劳动观点，来解答这个主题；另一种是不去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而以笼统抽象的讲述一大堆关于"劳动观点"的名词为满足，以简单的对一切旧观念骂一声"不合理"为满足。在这个如何解答"主题"的问题上，蓝莎、叶逸民就与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我们是主张前一种解答方

法，蓝莎、叶逸民却采用了后一种解答方法。

叶逸民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些客观条件和我们的读者对象，而奢谈学术，或欲引导读者走到比较专门的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上古史）的讨论和研究，相反，倒是脱离实际的。"要建立劳动观点，为什么就一定不能谈"学术"呢？学术也有两种：如果那是指的一般资产阶级大学校里的书本教条，我们自然要坚决反对，因为这种"学术"绝不能帮助我们建立"劳动观点"，而相反的只会引导我们远离"劳动观点"，并巩固"剥削观点"。但是，如果那是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那就是另外的一种"学术"，那就是我们一定要谈的"学术"。因为这种"学术"正是"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的基础，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我们就无从真正了解，为什么一定是："劳动创造世界"，而一定不是上帝鬼神、帝王将相、剥削阶级等等创造世界，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总是保持着统治者的地位，只有到了今天，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推翻这种统治，并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者，以便进一步去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不认真谈一谈这种学术，所谓"打破旧的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就只是一些空话而已！

旧的观点，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它有它特殊的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歪曲的看法作基础，和反马列主义的、为剥削者的利益辩护的"学术"作基础。要"打破旧的观点"，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的"学术"，有系统地来推翻这种旧的"学术"，单凭讲一些口号和名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许多人的头脑里之所以充满着各种剥削思想和糊涂思想，就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学术"讲求得太少或完全没有讲求，不能回答旧的观点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是英雄创造时势，为什么几千

年来帝、王、将、相能够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呢？像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就必须多少讲一些“学术”，了解一些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才能够给予有力的回答。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欢迎多谈马列主义的“学术”，绝不能相反地把它当做“奢谈”而加以拒绝。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从猿到人”，并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只是为要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学术”水平——或理论知识水平，使我们有能力来回答由旧的观点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

不错，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切合实际”，或更正确的说，必须联系实际。但是，所谓联系实际，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这就首先要领会了理论，然后才可以谈到联系，说学习从猿到人的目的是要打破许多人的旧的剥削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这仅仅是提出了当前的一个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掌握马列主义关于劳动群众如何创造历史的理论知识，必须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为着解决当前的这种实际问题而来努力掌握理论知识，这叫做“脱离实际”吗？如果这也叫做“脱离实际”，如叶逸民所说的那样，那么，岂不是说，仅仅满足于提出问题，而不去掌握理论来解决问题，这就算是“切合实际”了？这样一种对待理论和对待实际的轻率态度，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要知道，要解决实际问题，必须认真掌握与这问题有关的各种规律，也就是必须掌握理论，才有可能对问题作深入的了解，并给予解决。当然，叶逸民会替自己辩护说：“我并不反对学习理论，我只是反对在讨论从猿到人的时候，涉及整个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就叫做“要求太高，范围过大，要解决的问题过多”。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求太高，范围太大，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呢？这就要看我们学习的目的如何。如果我们学习的目的仅仅是

在于求得一些“猿如何变人”的生物进化知识，那自然就不需要也不应该涉及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倘若我们不以此为满足，而要由此“打破旧的观点，建立新的劳动观点”，那么，如果你一点也不允许人在讨论中接触到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那就等于你要求人走进屋子里去，却又紧紧的关闭着门一样的荒唐。叶逸民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十分荒唐的主张的人。他和蓝莎同样，承认学习的目的，“重要的不是学习生物进化史，而是要学习劳动观点，了解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财富和文化，结合着自己的思想，批判自己轻视劳动的剥削意识的观点，结合着今天的现实需要，去高度发扬劳动热情，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他承认了学习的要求是这样高，范围是这样大，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多，但却不允许人超出“猿怎样变为人”的知识范围之外去找理论的武器！如果有人不服从他的这一条禁令，多少超出了一点“猿怎样变为人”的范围，他就要给加上一大串的罪名，说：“这是不看问题，不看对象，不看主观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

当然，在学习“从猿到人”的时候，不可能详细讨论全部社会发展史的规律问题。但是，既然我们所指向的目标，是由“建立劳动观点”一直牵涉到“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为什么就不应该在讨论当中按照必要的程度适当地把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历史观点提示出来，以便有可能解决问题，并启发读者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学习呢？我们认为完全应该这样做。而且也正是这样做过了。《解放报》也并没有反对这样做，《解放报》发表了那篇批评蓝莎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叶逸民说这不是《解放报》“所欲”和“所能”做的事，那只是一种主观设想出来的强辩的理

由，并不是真的注意到了他自己所谓的“客观条件”。说“读者对象”的“理论水平、时间精力”不允许这样做，也不是事实。读者的理论水平即使很低，时间精力即使很少，还不至于成为那样了不起的一个障碍，使得他们就不可能接受比“猿怎样变为人”更多的理论知识。像叶逸民那样的说法，是未免把我们的读者对象的头脑估计得太低了。

其实，叶逸民虽然十二分体贴入微地替蓝莎辩护，而蓝莎自己却丝毫也没有尊重叶逸民所宣布的那条禁令，在谈到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和反对“上帝、天、神、日月精华创造人的说法”的时候，蓝莎早已跳出了“猿怎样变为人”的圈子，讨论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到宗教的起源和宗教与剥削阶级的关系的问题了。奇怪，为什么叶逸民竟看不出蓝莎也犯了“不看问题，不看对象，不看主观客观的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呢？

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叶逸民的惟一目的，只在于盲目地替蓝莎的非历史观点作辩护，所以就顾不了自己说出来的话在道理上是否讲得通，在逻辑上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了，例如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宗教神话“不是剥削阶级的捏造。艾思奇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而转了两三道弯之后，他又居然敢于打自己一个耳光，说：“如此，说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谎言，也没有什么‘违背历史唯物观点’之处。”在这里，叶逸民的逻辑是：宗教神话固然“不是剥削阶级捏造的”，但世界上却有一个名叫蓝莎的人，他有一种特权，可以随便说宗教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谎言”，而不能算做错误，不能算做“违背历史唯物观点”！为什么蓝莎竟能取得这样的特权呢？按照叶逸民的奇妙的理由就是：“蓝莎这篇文章不是讨论宗教神话的出现或起源问题。”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只要一篇文章的主题不在于讨论宗教的出

现或起源，那么，即使里面有一些涉及宗教的出现或起源的话是说错了，也仍然不能把它算做错误！

这当然是强词夺理！这种拙劣的辩护，当然掩盖不了蓝莎的过失。不管怎样解释，既然已经说到宗教神话是由剥削阶级故意的捏造产生的，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和唯物观点。宗教神话在阶级社会里常常被剥削阶级大规模地、有系统地利用作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是事实。但这事实只能证明宗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与剥削阶级的利益相结合，而不能证明宗教本身就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东西。因为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还有其他的事实：即使是剥削阶级，当它在历史上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的时候，它就往往不仅不要求利用宗教，而相反地，却成为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例如希腊早期的奴隶主阶级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资产阶级，都曾传播过唯物论的思想，中国古代也有同类性质的唯物论思想。为什么这些剥削阶级又不要捏造宗教迷信了呢？不但如此，同一种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在另外的条件下，又可以成为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形式，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采取过道教、佛教（如元末）、原始基督教（如太平天国）等等的形式。如果是剥削阶级捏造了宗教迷信，为什么它要捏造这些来反对自己呢？举出了这些事实，那么蓝莎、叶逸民所拥护的非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就立刻垮台了！

叶逸民为蓝莎辩护的理由之一，是说蓝莎的文章“仅是指出在今天尚有人相信上帝、神、天、日月精华创造人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意思是说，虽然宗教神话并不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出来的，但在“今天”的特殊情形下，却不必认真坚持这个真理。是的，不仅“今天”人们相信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我们还要说，就是昨天、前天一直到原始社会的人，相信这些思想，也同样是错

误的，因为宗教始终是人民的精神上的叹息、梦呓，是“人的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空幻的反映”。但错误尽管错误，人们曾长期相信它，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且不但今天“尚有人相信”，就是明天、后天以至于相当长时期的将来，还免不了要有人相信，这恰恰因为宗教迷信并不是什么人主观捏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人民生活发展的一定条件的产物，在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没有发展到必要的高度的时候，要想完全消灭宗教迷信思想，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待宗教迷信问题，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不管是昨天、今天或明天，我们都必须首先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根据正确的观点，采取各种适当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在正确政策的施行之下，才能使宗教迷信逐步归于消灭。

要打倒剥削阶级关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条，这是必要的，在前次批评蓝莎的文章中，我们就曾经说明过这一点。我们反对蓝莎、叶逸民，只是由于他们抛开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满足于简单的“骂倒”的方法，以为只要咒几声“这是反动的邪说！”“这是有毒的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要真正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条从根本上打倒，还必须多少讲一点“学术”，按照唯物论的历史观点，来证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如何会必然被消灭。

劳心与劳力的分裂和对立，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现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的确是“合规律的、并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教条，就是由于抓着了这种事实，并把它夸大、歪曲，看作绝对不变的东西。所以，要打倒这剥削阶级的教条，真正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指出这种事实的相对性，指出它仅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存在，而在另外的条件之下，就必然要归

于消灭。让读者知道劳心与劳力的分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和合理性的真理，就会有什么危险，就会妨碍他们起来反对那剥削阶级的教条吗？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头脑清醒地、用正确的社会发展规律知识去回答剥削阶级曲解历史的诡辩。如果剥削者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永久不变的天经地义"，而我们的读者就能有把握地反驳说："不对，那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的现象。"这样的反驳，不是比简单的讲一些咒骂的形容词更为切实和有力吗？叶逸民在这里又表示了他对于读者的头脑的不信任态度，害怕读者"现有水平"太低，接受不了这些科学真理。这当然是完全不对的。像这一类的初步真理，只要经过相当的虚心学习，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读者，其接受的能力至少也不会比蓝莎、叶逸民更差。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是，劳心与劳力的分裂现象仍然存在着，而且在相当长时期的将来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今天这样伟大革命的历史时代"，还不是要立刻来消灭这一个分裂，这也是必须用历史观点来加以正视和承认的事实，并不是可以笼统一概"骂倒"的！

我们并不反对"骂倒"那些该被"骂倒"的剥削阶级，只反对不看历史条件，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阶级。我们可以指出一切剥削制度都不是永久的，将来一定要被消灭，党和国家也一样不是永久的，一样要被消灭（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指出的一样）。但这绝不等于说在今天的中国就要笼统地主张"动员劳动人民起来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笼统地说："剥削制度有什么不可以骂倒？"笼统地"指出剥削制度不好"，"指出剥削制度不合理"。正如我们今天必须肯定主张进步的党派和人民的国家是好的、合理的、不能被"骂倒"的，因为它们今

天还有存在的必要，同样，我们也要肯定地指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是好的、合理的、不能被“骂倒”的，因为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利用它的积极性，还要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它，使之能够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得到相当的发展。当然，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必须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在政治上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为主体，而不应当让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但这仍然不等于可以笼统地“骂倒”一切剥削制度，一概简单地称之为“不合理”的，“不好”的。蓝莎因为不懂得这一个历史主义的真理，所以他虽然在自己的文章里很勉强地提到“在今天的中国，就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封建势力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与剥削制度”，但对于为什么今天我们只主张消灭这三个敌人，而不主张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仍然是莫名其妙，说不出半点道理来。不但如此，因为他的主要思想是在于笼统地“指出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剥削阶级应当被消灭”，而一点也没有谈到要用历史观点来具体了解某种剥削制度要在某种条件之下才能被消灭，所以他全篇文章的精神在实际上是与这些勉强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的片段词句完全矛盾的。这正是要蓝莎自己来负责，叶逸民“这个读者”虽然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大叫、大喊，说对于艾思奇的批评“不能心服口服”，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看，“这一个问题的讨论”，对叶逸民的“帮助”，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很大”：他没有把自己“过去一些思想”很好地检讨一下，没有虚心地想一想什么叫做马列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才会糊里糊涂地帮着蓝莎作了这样一场错误百出的强辩！

（原载《学习》杂志第1卷第2期，1949年10月25日；此文曾被转载或收入到文集中，后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1949.11）

中国人民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节，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值得高兴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国家，与兄弟国苏联建立一切方面的友谊关系，而不至于受到任何障碍，如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情形那样。

对于中国人民，其所以特别值得高兴，是人民国家中间的这种真实的友谊关系，足以保证中国人民获得充分机会从各方面来学习苏联。中国人民在今后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事要向苏联学习，也还要向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苏联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老师，而首先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老师。正如毛主席说的：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苏联人给中国介绍马列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一个重大无比的帮助，其意义“胜过百万雄兵”。如果还有人怀疑苏联对中国帮助不够吗？只要指出这一点意义就够了！“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改变了面目。2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把几千年间的封建势力和百年间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推翻，而代之以人民的统治。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不可分的一件伟大事实，就是从中国人民中间产生了自己的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而善于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中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之下走过来的。中国经济和文化一般的落后，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革命斗争的艰苦过程，给了我们的学习以极大的障碍，在主观上我们又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路。这些条件说明除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具有着成熟了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革命领导者之外，在我们极多数的干部中间，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水平还是很低，我们甚至于缺乏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这种情形，与中国今后愈益复杂的革命任务极不相称。工作的任务需要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我们的广大干部现在都开始有此觉悟，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正在蓬勃高涨。

在我们今天的学习当中，有一点必须要认识清楚的，那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科学，是关于世界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系统的历史规律知识。要熟悉这样的科学，需要持久不断的、艰苦的努力，不能以一知半解为满足，不能半途而废。在初学的时候，也必须要尽可能地以较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来建立一些基本的思想观点和工作观点，来打破若干旧的、错误的思想观点和工作观点。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在学习当中改造思想和改造工作作风。但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有系统的、有条理的科学性的知识，或者叫做“学术”性的知识，是不可能真正达

到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目的的。许多人头脑里充满着五花八门的事实材料，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片段感想，而没有条理的知识和系统的理论，因此工作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分不清什么是主要次要，什么叫轻重缓急。坚持这种思想和作风，轻视理论、轻视“学术”，是经验主义的特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要努力有系统地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克服经验主义的毛病。当然，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认真防止教条主义的倾向，防止使理论从实际脱离，例如认为讲理论是一回事，解决具体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是另一回事，前者才是“学术”，而后者与“学术”无关。而不知道真正的“学术”，真正的科学，就在于要对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作系统性的、理论性的解决。但我们现在更要打破另一种主观主义的障碍，以为解决思想问题不需要有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历史规律知识，不需要“学术”，甚至于认为多谈“学术”、多谈理论，多谈历史规律知识，就好像会要妨害我们建立革命思想观点，而不知道真正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观点，必须一定要有其科学的历史规律知识的基础，必须一定要有其革命的“学术”、理论的基础。

这些倾向和障碍的存在，说明我们在马列主义理论前面是如何幼稚，说明我们自己还需要尽多大的努力，才能在理论学习中间成长起来，使自己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工作岗位上能够称职。在这里，我们除了自己要首先努力之外，就需要苏联的兄弟的帮助。我们希望多多做苏联的理论方面的介绍工作，希望自己设法向苏联同志的著作中学习，也希望有机会直接得到苏联同志们的教益。苏联在这方面过去既已经对我们给过重大无比的帮助，今后当然还会给我们同样重大的帮助。

（原载《人民日报》1949 年 11 月 7 日）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1949.11）

学习人民政协文件，应该同时研究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大家知道，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实现了毛主席著作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学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及《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阐明的国家学说。这一个学说的实现，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这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胜利，也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把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变为建国的纲领，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是经过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艰苦摸索和英勇斗争的结果。在这历史的过程中间，不但封建时代的反动的国家学说被人民唾弃了，就是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国家学说也在人民眼中暴露了它的无力，然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才为人民所接受。毛主席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

毛主席就这样说明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如何在中国人民中间得到胜利的过程。

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与其他一切错误的国家学说之不同，首先就在于它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明确指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并不是开天辟地以来永久存在，而是在社会上产生了阶级之后，由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运用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以及许多反动的国家思想，都要用种种方法隐瞒这一个真理，把国家形容成超于社会阶级之上的，代表全体“国民”的，建立在“神意”、“天命”、“正统”、“法治”、“自由平等的理想”等类神秘的和唯心论的原则之上的权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动阶级都是剥削者，他们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建立少数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前面隐瞒国家的阶级性，有利于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科学学说，它不需要隐瞒国家的阶级性，“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新民主主义论》），相反的，它需要反复不断地揭露这种隐瞒，“清楚的指明”国家的阶级性，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觉悟，团结起来，积极努力，推翻少数剥削阶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建立人民自己统治的国家。

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国家学说指导之下中国人民自己的建国纲领，因此它就“清楚的指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这样中国人民就可以从原则上分清楚世界上两种根本不同的国家：一种是旧的，自有阶级和国家以来几千年间存在过的，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国家，其中包括已经从人类历史上消

灭了的奴隶主国家和现在还残存着的某些封建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像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另一种是新的，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之后，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现的人民掌握国家政权来压迫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接着又在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之下，在东欧、北朝鲜现在又在中国、德国出现了这样的国家。作为人民统治的新式国家，中国与苏联、东欧新民主国家、北朝鲜以及新近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兄弟国，而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英美“民主”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种类。这是学习人民政协文件时，必须依据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来加以深刻领会的。

在旧式的国家里，“国民”的主体，“国民”的大多数，即人民，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权利的，即使是号称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仍只是资产阶级。在新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国民”的主体，“国民”的绝大多数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国民”的极少数，即被推翻了的反动剥削阶级，则是没有民主权利的，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正是有着这样清楚的规定。世界上的反动派要是不满意这样的规定，说这是“极权”，说“你们独裁!”那么好！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对这些不满意的胡言乱语已经给了有力的回击：“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

列宁在《论国家》一文里，说国家的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因此，对于国家的认识是否正确，就成为评判人民有无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如果不了解国家的阶级性质，不能完全脱离剥削阶级的国家学说的欺骗影响，因此在旧的国家里就没有为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而努力斗争的勇气，在新的国家里就没有保卫和加强人民的政权而积极工作的热情，这样的人，就不能算是有真正的政治觉悟。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如果只知道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而不能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工人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就叫做经济主义，这就是不懂得或不深刻懂得自己是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就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不够的表现。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像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如果有工人这样说：“在旧政权下我是成天守着机器，在新政权下我同样是成天守着机器。”并因此而缺少积极工作、发展生产、建设新国家、爱护新国家的热情，这就是分不清楚自己在旧政权下是被压迫者，而在新政权下则不但是国家的主人，并且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脱离错误的国家学说的影响，因此也就缺乏政治上的阶级觉悟的缘故。

在新的国家里，如果有工程师这样说：“在旧政权下我是一样工作，在新政权下也同样工作，有了技术就能为人民服务。”分不清楚在旧政权下只能为剥削阶级服务，而在新政权下才真正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作为一个人民的工程师还缺少人民应有的政治觉悟。

在新的国家里，如果有人把“自由”“民主”当作教条，认为不需要对被推翻了的反动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压迫，认为禁止帝

国主义者的新闻活动，封闭反动派的报馆及出版机关，是缺乏言论自由，这就是不懂得人民必须坚决实行专政，才有可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和人民自己内部真正的民主自由，这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的虚伪学说所欺骗，这就是表示政治认识的糊涂。

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法庭、公安机关以及军队里做工作的人，如果工作不积极、不安心，或者想“改行”，想“退伍”，严格些说，这就是政治上的动摇，因为这是要想放松或放弃自己直接担负着的坚持人民国家政权的严重任务。“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论人民民主专政》)对这些工作缺乏积极坚持和努力加强的思想，这也是缺乏使人民做国家主人和由人民来统治、压迫反动剥削阶级的思想，这种情形，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工作者中间绝对不应该存在的。如果在人民公安机关工作的人以做警察为可耻，那就是政治认识上很大的错误，那就是不认识新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上的区别，忘记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作为人民的武力，人民警察是光荣的，只有旧的国家政权下的警察，作为反人民的武力，才是可耻的。

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如果有人以为可以把苏联和英美国家同等看待，这是严重缺乏人民应有的政治觉悟。这是不认识人民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这样的人应该仔细学习领会《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

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北朝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同样都是人民民主和人民统治的兄弟国。中国与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不同，是在于后者已经实行了工人阶级专政，也就是实行了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则是实行着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也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只采取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方针。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之所以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国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要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的独立，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只有中国的工业发展了，中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才有全部的真正的独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数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现代工业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这就与工农联盟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国家政权有所不同。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屡次教导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决

不要停止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昨天所走的路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今天在走的路，也正是明天中国所要到达的路。“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切新的人民国家共同的而又与一切旧的剥削阶级国家完全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旧的国家是要努力维持阶级剥削和维持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而新的人民国家则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而最后使国家衰亡下去。例如在中国，则是第一步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来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进一步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剥削完全消灭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很自然地归于消灭”，这样，就达到世界大同。

为着将来消灭一切阶级和消灭国家，现在就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权力，就要坚持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国家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国家的权力，才能逐步走向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并予以消灭，现在加强人民的国家权力，就是为将来消灭国家到达世界大同创设条件，这是一切人民国家的共同点。

>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

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论人民民主专政》)

为着将来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下面，就必须对于一切国民，包括各阶级人民，进行各种改造和教育。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反动的剥削阶级是压迫的机关，但在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政权被推翻了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们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也要教育农民，以便引导他们由分散的农业经济走向农业的社会化。在农民的小生产占主要成分的中国，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如果有人以为新民主主义既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此就必须简单的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阶级特点存在和发展下去，而不应该教育和改造；如果以为只要他们承认跟着工人阶级走就行了，不需要任何思想的改造；如果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既算是四个朋友之一，就不必学无产阶级思想，如果有人甚至于说实行思想改造是等于反对新民主主义，那么，请仔细读一读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这一段话：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

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正是因为实行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对于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如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忘记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和改造，它就有离开新民主主义而堕落到旧民主主义的危险。实行思想改造并不等于反对新民主主义的实施，而恰恰只是要反对旧民主主义的抬头。不对各阶级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使自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实现世界大同，是不能想像的。

学习人民政协文件，必须同时研究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国家学说，才能对以上的一切道理获得深刻的理解，因此也才能使自己具有主人翁的充分自觉性，把自己提高成为参加实现新国家的远大任务的积极工作者。

（原载《学习》杂志第1卷第3期，1949年11月15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反驳唯心论

——对天津干部的讲演

(1949.12)

同志们：

天津市委要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间提出的问题。我把许多问题研究了一下，觉得可以归结为一点，归结为用唯物论来反驳唯心论的问题。

我准备先从一般的唯物论讲起，再讲到历史唯物论。

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决定精神；或者说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思想；或者说物质是第一位的东西，精神是第二位的东西。关于这个原则，旧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有不同的理解，旧唯物论即形而上或机械的唯物论也承认物质决定精神，至于精神对物质能起什么作用却不很清楚。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首先是物质决定精神，反过来精神又对物质发生一定的重要的作用。精神对物质也就是人的思想意识对客观存在起什么作用呢？要说明这一点，先要了解精神是什么？精神或思想意识，按辩证唯物论的理解，就是物质的反映，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书上也很容易看到，可是逢到具体问题，很多人就糊涂了，忘记了，所以仍要说明一下。譬如，我在这里讲课，听课的同志们就是客观存在，听课同志们的要求，大家的学习情况，就决定了我讲课的内容。我讲的内容，就是我的思想，而我的这

些思想，正是反映了听众的客观要求和学习情况。我现在的思想不会超过大家的客观需要的范围，我的思想要受这儿的客观环境决定，是这儿的物质条件的一个反映。这样的思想，又能对物质起什么作用呢？第一，如果我的思想是正确的，它便起一种作用，第二，思想不正确的话，便起另外一种作用。什么叫正确的思想呢？正确的思想便是能够正确地把物质情况反映出来，使思想不超过事实发展的真实情况。相反地如果超过了或离开了事实的发展，便成为不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起着不同的作用：正确的思想对物质发展起推动的作用，促使物质发展得快些。错误的思想妨碍物质和客观存在的发展，使后者的发展被耽误拖延。我在这儿讲课，如果思想正确，正确反映大家的要求，正确了解大家的思想情况，我做的解答一定能帮助大家打破学习的阻碍，大家也就较快的得到进步了。如果我的思想不能正确地反映大家的问题，大家要我讲社会发展史，我讲地球的发展，讲动植物的发展，那就错了。这种错误的思想散布了出来，就要把大家学习的方向引错，把学习的步骤打乱，对大家的学习不但不能推进，反而可能使它倒退。所以，精神是能对物质起重大作用的。唯物辩证法一点也不轻视这一点，并且很重视这一点，认为正确的精神作用，可以促进物质的发展使之迅速向前进步，而旧唯物论就不很了解精神的这一个重要作用。再重复说一遍，思想对于物质能发生很重大的作用，但这作用是有一定条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任何一种精神思想都能起积极的作用，只有正确反映客观物质的发展情况和客观要求的精神、思想，才能起这种积极的作用，否则便只能起消极的、阻碍的甚至破坏的作用。辩证唯物论是这样来看精神的作用，按照这种看法，所以我们就很重视学习，就要搞思想改造，使精神由不正确走向正确，使思想由错误变为不

错误，以便能发挥精神的积极作用。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物质决定精神，或者说，首先是精神要符合物质，然后精神反过来又推动物质。革命要靠革命思想的正确领导，而革命思想又是从实际的革命运动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思想不能正确反映革命的运动，就根本不会起指导革命的作用；物质和精神彼此间的关系好像是循环的，但是有一个最后决定者，就是物质。有些人以为讲唯物论的人只知道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承认精神的作用，这是误解，是不懂得辩证法唯物论的错误说法。辩证唯物论者并不这样，辩证法唯物论者很重视思想，重视学习，重视宣传教育和正确思想的作用，但首先要坚持宣传教育和正确思想的作用，必须以物质和客观存在作它的基础。按照这个道理来解释，很多想不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例如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唯心论的问题："我说工程师比工人重要，如果工程师不设计，工人怎么能工作呢？"工程师不好好设计，工人的工作自然做不好，工程师的思想是重要的。劳动者的物质劳动要受工程师设计的指导，这一点辩证唯物论并不否认。但是我们要问：工程师要怎样才能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首先要工程师的计划是正确地根据具体的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来决定的。工程师想造房子，先得把造房子的许多物质条件搞清楚，例如他要正确估计地基的支撑力量，如果想在沙滩上来设计盖大楼，那就一定会垮台。又例如他还要了解工人的情况，技术熟练不熟练等，根据这些工人的物质情况来设计造房子，所以在工程师的计划中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仍是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他的计划一定要服从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否则便是空想，而空想是一定要垮台的。和这个问题类似，又有人说："创作要靠灵感，没有灵感便不行。"不错，创作是要文学家有这种想要创作的感觉，才写得出来，肚

子里没有东西，便什么也写不出来。但问题在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娘肚子里便带来很多诗和创作（笑声）？一个文学家是在社会上生活了很久，体会了很多东西，经过了一个长期地锻炼和了解，看这个看那个，看了不少的社会物质生活情况，集中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在某一个时期，发生了创作的兴趣，才组织成为文章。又有人说："科学家的发明是靠思想上的钻研。"不错，爱迪生发明电灯发明留声机都是苦思了好几个晚上没睡觉的结果，可是如果没有物质，能不能钻研？到哪儿钻、往哪儿研呢？如果世界上没有声波震动的现象，爱迪生能不能发明留声机？科学家所钻研的首先是物质，自然界的物质经过科学家的钻研，才变成了人工的物质。医生治病治得好不好，要看他对病人的物质情况了解得对不对，医生的思想如果正确反映了病人的物质情况，医生治病便治得好，否则，他的思想不能正确反映病人物质情况的话，就要造成庸医杀人的罪恶。不使思想严格服从物质，便不能起作用于物质，便要碰到物质的钉子。思想只有首先服从物质，才能反过来作用于物质。承认正确反映物质的正确思想的积极作用，这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在旧的大学里受过唯心论教育的人，总以为任何思想都可以对物质起决定作用，这是错误的。不能正确反映物质条件的思想，不但不能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相反的，迟早要受到物质的反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首先要把这点原则了解清楚。这原则可以应用于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上。例如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究竟谁重要的问题，学生出身的人，总以为知识分子更重要。究竟哪一个重要呢？这也要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解决，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分子的重要，但知识分子要成为重要的社会成分，只有当他把自己的知识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因此他的重要不

重要，最后仍决定于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一个理论的重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是很重要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之所以能起翻天覆地的作用，并不因为这种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是工人阶级物质条件的正确反映，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又有人问：“劳动创造人，还是思想创造人？”许多人总以为人是思想创造的。理由是：“类人猿运用自己的思想制造了工具，然后才有了人。”不错，制造工具是要用思想的，但问题是：制造工具的思想又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牛和马就没有这种思想？只有唯物论，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牛和马没有具备使用工具的物质条件，更制造不了工具。树上的猴子，两只手用来爬树，可是没有机会经常使用工具，所以也就没有学会制造工具的条件；只有从树林生活中脱离出来了的类人猿，长期经常使用工具，手一天天的灵活了，脑子也一天天的发达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才会有一天发生制造工具的思想。制造工具的思想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劳动经验积累得来的。为什么类人猿竟有一天能制成一把石刀呢？猿猴在没有学会制石刀以前，已经有过很多石头可能变成刀的零碎分散的劳动经验，譬如随便抛一块石头打野兽，石头裂成许多碎片，发现有些破片很锋利，可以拿来做刀用。这种经验反复千百次，最后类人猿才会想起有意识地把石头打破，制成最初粗糙的打制的石刀。我们现在把一块石头磨尖，是很容易的事，但类人猿要学会这本领，却要经过多少万年的劳动锻炼，才能认识做这样一件事。所以，究竟是思想创造人，还是劳动创造人呢？在有意识地打制石刀时，的确是思想的创造，但在学会制刀以前，却要有长期的劳动，要有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才能产生一定思想，思想虽是制造工具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但思

想仍是由劳动所产生，因而最后还是劳动创造人。

总之，人的思想不论怎样高明，最后一定要受到物质条件和劳动条件的限制，绝不能超乎劳动之外，超乎物质之外，凭空的产生出来。中国有一句俗话："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梅兰芳演宇宙锋靠着他两只长袖子才舞得美妙好看，如果要他脱了衣服来舞就不好看了（笑声），这自然只是讲中国古装舞，西洋舞自然不一定要长袖子，但另外的物质基础，如健康而匀称的体格，仍然是决定美丑的条件。聪明的商人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先要受钱的限制。所以大商人可以吃小商人，大资本家可以吃小资本家，"是商人的聪明决定生意做得好不好，还是商人的钱决定生意做得好不好？"商人的聪明有很大的作用，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还是钱。无论多聪明的人，其思想最后总要受一定物质条件的限制。所以中国人不说："只要聪明人便能善舞，只有聪明人便能做好生意。"就是因为多少知道了一些唯物论的道理。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起了伟大作用的，没有他的指导便不会胜利得这样快，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可是毛主席为什么主张现阶段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而不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这便因为他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绝不离开中国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中国的劳动群众条件，来解决革命问题。他的主张是严格符合中国社会的物质发展规律的，这正是他的思想伟大的地方。

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劳动创造世界。这观点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创造人；第二，劳动创造世界；第三，劳动群众的活动创造历史。关于劳动创造人这一方面，不需要多的解释。总之，人是猿类经过几十万年的长期劳动锻炼后，积累了经验，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开始形成的。人的劳动是从制造工

具开始，而不是从使用工具开始。别的动物也有会使用现成的工具的，那是动物的劳动，要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开始有人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类人猿，自然是要比旁的动物聪明一些，但首先一个问题是：这聪明从哪儿来的？在树上时，人的祖先和别的猿类是一样的兽类，为什么离开了树林生活就聪明起来了？这是因为离开树林生活以后，他长期地使用工具，手的动作不能不日愈复杂起来，脑子的组织也逐渐复杂起来，所以聪明也是劳动创造的。深刻地认识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使我们可能建立起一个正确的重视劳动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类始祖，就是以劳动者的资格出现的。人的祖先便是劳动者，没有祖先辛辛苦苦地劳动，便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知识分子坐在这儿听课，也许大家还都在树上呢（笑声）！基督教的《圣经》上说人的祖先是亚当、夏娃，他们是不劳动的，整天在乐园里闲游闲吃，后来劳动了，是因为犯了罪。因为他们偷吃了上帝禁止吃的果子，上帝才罚他们到地上来劳动，并且临放逐他们的时候还诅咒他们说："从此以后你们要从早到晚，满面流汗，才能把东西吃到嘴里。"在宗教看来，劳动是对罪人的处罚，是不光荣的，按他们的理想，无罪的人，是一点也不应劳动的，是应该生长在那不劳动的天国里去过寄生的生活，这些神话，我们是不相信了。中国又有句老话："人之本性，好逸恶劳。"这句话我们也要反对，好逸恶劳是一种社会性，而不是一种天性。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认为不劳动的人是光荣的，如果有人脸上黑了一点，手上粗糙一点，带点劳动的象征，剥削阶级便认为不漂亮，不光荣。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几千年来如此，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不好劳动的习惯，人们便以为那是天性。人是社会的动物，阶级社会里，人的性质是由阶级决定的，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阶级和阶级的本性。旧

社会受剥削阶级影响的人好逸恶劳，觉悟的做革命工作的人却相反，正是好劳恶逸的，每天总要做一点工作，不然便会感觉不舒服，甚至觉得是耻辱，革命工作者现在有这种好劳的性质，将来世界上到了共产社会，劳动更要成为一个人每天生活的必需，不劳动就不舒服，那时好逸恶劳的所谓“本性”，就要完全消灭了。这样，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世界，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劳动的光荣，要建立坚强的重视劳动和爱劳动的人生观。

现在再就第二方面来谈谈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人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劳动创造的，精神文化也是劳动创造的，或者说归根结蒂是劳动创造的。有人认为文化好像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例如他们说：“社会发展史就是知识分子写的。”不错，没有知识分子，社会发展史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这是事实。但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他要脱离劳动，靠劳动者吃饭，被劳动者养活，劳动者不养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便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二、知识的内容从哪儿来的呢？社会发展史是知识分子写的，可是历史本身是谁写的呢？历史本身不是知识分子写的，那首先是劳动者用自己的血汗写的。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我们懂得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是生产，而其中最活泼的力量首先是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才有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由原始共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是生产力呢？生产力是劳动者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而劳动者则是使死的工具成为活的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工具的进步或落后，使用工具的劳动者的熟练和经验，决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高或低。劳动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中国在现阶段只能达到新民主主

义社会，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是使用简单手工工具的小生产者，机器生产太少了，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必须使大量的小生产劳动者转变为大生产者。从原始共产社会变到将来的共产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是“劳动创造世界”的一个最后根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劳动者用自己的血汗写了真实历史的根据。知识分子写的社会发展史，不过是把劳动者用血汗写的真实历史翻译成文字的历史罢了，这就很明白，知识分子并没有创造了历史，而只是写了历史。了解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这一个基本思想，就同时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我们的革命政策问题，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中，一定要推翻某些阶级，如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为什么有些阶级，如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不一定推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要发展劳动者的生产力。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发展中国劳动人民的生产力，为着这个目的，就要打倒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势力，这是决定革命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谁就要被打倒，谁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谁便可以被保留。帝国主义的存在，使我们中国没法发展工业农业生产力，官僚资产阶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同样有很大阻碍，因此就一定要把他们推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好处，从最根本的地方来说，就在于能够解放劳动者的生产力，使之自由发展。有些人说：“地主的生活，有些还不如资本家，为什么要没收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不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是的，资本家有的比地主富有得多，为什么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呢？不了解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意义。我们让民族资本家开工厂，做生意，就是因为它在一定

条件下（在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对于中国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还可以起相当的推动作用。地主阶级虽然有些生活较资产阶级低，但因为它的土地所有权完全阻碍着农民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革命就要对它采取一步步消灭的方针。消灭地主阶级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阻碍。

再就第三方面来说：我们要承认劳动群众创造历史。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个观点最难领会，因为旧社会长期用来教育知识分子的，是各种英雄创造时势的思想，这种思想妨碍着我们去了解科学的真理。英雄伟人在历史上是起作用的，但这个作用也有一定条件，英雄伟人能够作出一点影响历史进步的事业，多多少少总是由于他们的行动比较符合劳动群众活动的趋向。在行动上违背了劳动群众的活动趋向的人，哪怕他已经处于帝王将相的地位，掌握了压倒一切的权势，他终于要成为一个失败者。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证明这一真理。中国历史上各个皇帝朝代的垮台，都是首先受了农民暴动严重打击的缘故，这是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实。英雄造时势这句话是夸大的，英雄只有通过劳动群众才能创造时势，实际上直接创造世界的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双手，英雄的作用不过是多少正确了解了劳动群众的活动趋向，把它集中成为行动方针并由此动员和组织起劳动群众的力量，来共同创造时势。中国共产党在现在能成为人民的领袖，在今天历史上起这么伟大的作用，首先便因为它正确了解了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历史发展的趋向，决定了正确的政策方针，把工人农民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指导革命取得胜利。要问究竟谁创造历史？我们说首先还是劳动群众的活动趋向决定了如何创造历史，其次才是了解这种活动趋向的英雄伟人的思想指导劳动群众去创造历史，英雄伟人对于历史是起推动作用的，但是

这个推动作用要看他的思想行动是不是正确反映了劳动群众的历史活动趋向。我们学习了劳动创造世界，学习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个观点，就可以知道知识分子要想做点像样的事业，要想不至于成为一个历史上的落伍者、失败者，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行动跟劳动群众的趋向一致，一定要跟劳动群众结合，和群众站在一起，自己变为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共产党里面很多人出身是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可是他们扔开了本阶级的立场，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使之变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这样才能在劳动群众中间起一定作用，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有些知识分子在领导革命，实际上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因为在共产党内领导革命而出身知识分子的人，在实际上已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知识分子要学会掌握指导革命的思想，他首先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跟着工人阶级走，而绝不是使工人阶级跟着知识分子走。特别在今天指导革命的人，而一定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向来决定政策、决定行动方针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马列主义，也便是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工人阶级，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来指导革命，就是说明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唯心论者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抽象化和绝对化了，以为知识分子的知识就能决定一切。而事实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的作用如何，最后要由劳动群众来决定。能够正确反映劳动群众的物质发展条件的思想，才能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否则就一点也不起作用。知识分子如果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可以任意自封为领袖，以为工人农民会随随便便盲目地跟着自己走，那便完全想错了。特别到了今天这个社会里，劳动人民都广泛觉悟起来了，有些知识分子拖在后面还

怕跟不上，更不用说要任意把劳动群众带着走。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有资格领导革命，是因为工人阶级有着最彻底的革命性，他们要求的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除了工人阶级之外，没有哪一个阶级能有这样彻底的要求，普通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小私有者，对自己的小小财产和小小家庭生活总是很重视的，可是，说到觉悟的工人阶级，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从前，没有打到北京天津以前，我们城市很少，保卫城市也没有绝对把握，有一个时期，有些拿到手的城市还准备必要的时候加以放弃，在这种情形下，问工人："我们要把工厂搬到山上去行不行?"工人说："有什么不行，工人只有两只手，到哪儿去都是干活，有什么怕的!"问学生："要把学校搬到山上去，行不行?"学生就说："要考虑考虑。"(笑声)问资产阶级更不行了。干革命应该跟着谁走呢？自然是应该跟着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没有顾虑的人走。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决定它在革命行动上是一个最彻底的阶级，共产党领导革命，便是按照工人阶级的发展方向来领导的，毛主席的思想领导，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如果有人要说"毛主席的领导我佩服，可是工人阶级来领导我就不佩服"，那是不懂得什么叫做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懂得毛主席的领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来发挥它的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要成为革命者，便得决心跟工人走，如果只跟小资产阶级走，这样来干革命就不会做得很彻底。知识分子有许多思想不对，便是因为这些思想是跟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走的思想。甚至于也有不自觉的跟了帝国主义走的思想。有了不对的思想，就需要好好地改造一下，把跟着剥削阶级走的思想变成跟工人阶级走的思想。

现在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工人阶级，无

论学哪一门的人都应该如此。有些学理工科的人，有一种单纯技术观点，说："有了技术，哪儿都可以吃饭，哪儿都可以工作。"这话只有一点对，可是基本上不对。只靠技术，总可以吃上饭，总可以多多少少做一点工作，这自然有点道理，但是，如果要说把工作做好，那么，只有技术，没有进步的政治思想，那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思想上还保有着剥削阶级意识，在工作中要考虑很多私人利益的问题，而对于工农劳动群众，在思想情感上又常常是对立的，那就不可能集中全力来努力钻研业务，就不可能认真考虑如何使自己的业务正确地充分地发挥它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因此就不可能有高度工作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这也仍然是说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如何，并不是决定于知识本身，而是决定于他自己对劳动群众所取的态度如何。

我们所需要解答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鼓掌)

(原载《学习》杂志第1卷第6期，1950年2月15日，后经作者略加修改；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

(1949.12)

同志们！朋友们！

世界人民革命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七十岁生日就到了。各国人民都在庆祝这一个日子。中国人民也在全国各地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人民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也就是庆祝自己的革命的胜利。因为如果没有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领导着创造和建设起来的苏联，没有斯大林和苏联的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要这样迅速地得到胜利，是不能想像的。

中国人民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奴役的斗争，从鸦片战争以来，经过了一百多年。几次大的革命和改革运动——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自称“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而临死时的结论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多年间中国人民的遭遇。但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自从列宁、斯大林领导着创造和建设了苏联以后，情形就完全改变了。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之下，中国人民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自己民族中间产生了新的革命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经过了28年的奋斗，就取得了全国规模的基本胜利。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离开了苏联及其领导者斯大林的存在，能设想中国人民可以有这样的胜利吗？当然不能！

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

会里作了一篇讲演，题目是《论中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中国旁边存在着和发展着苏维埃联邦，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协助，不会不减轻中国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又说：“中国的革命是在可能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的经验和帮助的情形之下而发展的”，这就可以使中国的“革命发展道路比较容易些”。

的确是这样，中国人民遭受到世界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又遭受着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的压迫，革命的敌人是极强大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非常困难的。然而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利用苏联胜利了的革命经验和援助”，由于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帮助，革命的斗争负担就“减轻了”，“革命发展道路比较容易些”了，因此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获得基本的胜利了。

在俄国革命以前，中国人民没有像苏联那样的“胜利了的革命经验”可以学习。在那时以前，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中国的先进的人们只能向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学习，但是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所学习到的，最多也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而不是广大人民的革命经验，这样的经验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时了，对于争取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是完全不适合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的屡次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俄国革命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打倒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的国家。苏联人民的胜利的经验就成为世界一切国家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学习的榜样。这在革命斗争中遭受了多次失败的中国人民，这一下才看见了光明的道路，热烈地向苏联学习革命的经验，这里面还包括了孙中山先生，他也认识到了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

无成就”。

为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中国人民应该从两方面感谢斯大林。第一，斯大林和列宁一起，并继承着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创造了革命胜利的经验，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榜样。第二，斯大林在如何“利用”俄国革命经验于中国的问题上，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他亲自做了许多工作，并由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了许多的“伟大理论贡献”。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一件事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在前几天发表的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文章《斯大林与中国革命》里，曾经作了很有系统的很好的说明，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斯大林不但在理论方面思想方面给了中国人民以宝贵的帮助，而且在实际行动方面也给了中国人民以宝贵的帮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孤立的。那时是帝国主义统治着世界一切的地域。而帝国主义所要做的事情，是“从民族的中国之活的肉体上开刀”即绝不是要容许中国民族独立地存在，真正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得到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相反地却要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各式各样的破坏，凡是稍稍研究一下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历史的人，很容易知道帝国主义的破坏，对于这些革命运动的失败所起的作用。那时中国人民所遇见的一切似乎也表示一点同情的“朋友”，实际上是像毛主席所说的，像唐朝李林甫一类的“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朋友”之所以有时也装着表示一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是因为想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向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取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帝国主义特权，譬如美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了中国的“朋友”，就曾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手里，取得了几乎独占一切的特权。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上才出现了中国人民及一切被压迫

民族被压迫人民的真正的朋友。中国人民在新成立的苏联国家那里看见了许多“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它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向世界各国人民发表宣言提议“树立巩固永久的和平”，接着就在 1917 年 12 月向东方各国宣布放弃帝俄时代的一切不正当的权利，并向中国政府提议进行废止不平等条约而建立平等友好条约的谈判。当时中国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是不希望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对于苏联的友好的提议自然就不加理会。苏联不得已，又在 1919 年 7 月，直接对中国人民发表宣言，重申对中国友好平等的意愿，放弃一切帝俄时代侵略中国所得的各种特权，并表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热诚和愿望：“我们对东方民族，尤其对中国人民想脱离帝国主义武力财力的羁绊的运动，是很想予以援助的，我们不仅想援助苏联劳动阶级，而且想援助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宣言自然是非常的热烈欢迎了。我们只要把当时中国的报纸杂志翻阅一下，看看当时工农商学各团体各报纸杂志的相应的电文，就可以想见当时中国各界人民欢欣鼓舞的情形。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才得到真正实际的国外朋友的援助。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期间，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广州政府，遭受着各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反对和破坏，情形是很困难的，只是由于苏联的帮助，才迅速发展起来。孙中山遗下的许多书信，都说明苏联当时的援助所起的决定作用。1925—1927 年一个时期迅速胜利，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能设想的。

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实行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破坏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会来强夺中国的领土。1931 年，“九一八”的灾难发生了。在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个大不幸的时期，只有苏联，尽管蒋介石已经和苏联政府断绝邦交了，仍然通

过外长李维诺夫，在事变发生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向日本提出严正的警告，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情感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尽一切必要的帮助。"同时向蒋介石政府提议恢复邦交。在全国人民热烈要求中苏复交的压力下，经过一拖再拖，中苏两国在1933年底复交了。复交以后，苏联又屡次提议建立集体保卫太平洋安全制度，提议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至于中苏互助协定。由于蒋介石不理睬苏联的建议，继续执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政策，终于又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

抗日战争中间，苏联是援助中国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尽人皆知，抗战初期，美帝国主义曾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资助敌寇制造侵略中国的武器。那时只有苏联，把三万万美元的作战物资援助中国，派遣了大批的航空人才和军事专家来参加中国抗战，不少苏联公民在我国抗战中牺牲了生命。八年抗战的结果，最后帮助打败日本的，仍然是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出兵。如果没有苏联出兵东北，迅速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日本绝不会那样快投降，中国人民的艰苦的抗战一定还要延长一个时期。

以上只是提到苏联帮助中国人民的几件最明显的事实，而省略了其他更多的具体事实。应该指出，这些援助，都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

毛主席在十年前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大会上说："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上了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功劳。"的确是这样，就中国二十几年的历史来说，斯大林是既在理论上援助了中国革命，又在物质上援助了中国革命。斯大林领导着苏联人民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也就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帮助中国革命。

二十几年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的预见，苏联胜利了。革命经验和帮助，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负担大大地减轻，革命发展的道路比较容易得多了。中国的土地这样广大，国内外的敌人这样强大，因此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革命斗争进行了七八十年，总是再三地失败。而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敌人更凶恶了，但是只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革命就胜利了。

由此可见，没有斯大林、没有苏联，不会有中国人民今天的胜利。我们庆祝斯大林的寿辰，也就是庆祝我们今天的胜利。

我们庆祝斯大林的寿辰，就是要使大家更加懂得珍惜斯大林所给予的苏联的经验和援助。我们今天只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我们还需要争取更多的胜利。为着使我们的胜利更快一些到来，我们还需要斯大林和苏联人民更多的帮助，还需要进一步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

我们庆祝斯大林的寿辰，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中苏人民的友谊，反对反动派破坏中苏人民友谊的各种造谣和阴谋行为！

斯大林万岁！

中苏人民友好万岁！

（原载《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关于几个哲学问题

(1950.1)

新哲学研究会座谈会开了三次会，讨论日丹诺夫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方哲学史的发言。我也就讨论中所接触到的四个问题（座谈会内容见本期“座谈记录”栏）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下面的文字是当时的记录加以整理的结果。

第一，关于哲学史的定义问题

我同意这样的意见：认为定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正确的定义，可以给我们指示出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日丹诺夫把科学的哲学史规定为：“科学的唯物论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样的规定，应该对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引起一个认识上的根本变革。要能领会了这一个意义，我们才有可能把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当作科学的工作来处理，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的规律，而不至于像过去的哲学史研究那样，把哲学思想的历史写成人的主观思想的任意自由发展的结果，看作许多偶然出现的天才思想的简单的积累。

什么是哲学的唯物论世界观？唯物论世界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要求人的思想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恩格斯说：“唯物论的世界观，不过是对于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附加

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为什么科学的哲学史就是唯物论世界观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呢？因为我们很容易了解，人类思想的发展，不管中间有什么迂回曲折，从总的方向上来说，就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日益正确、日益丰富、日益完全的历史，就是人类一天比一天更善于了解自然界本来面目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一天比一天更有理由来坚持唯物论世界观的历史。人类对于自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愈更进步，哲学的唯物论世界观就会愈更得到有力的证明，就愈更发展和完成起来，这是一定的规律。不承认这规律，或不了解这规律，不按照这个规律来看哲学史，就不可能使哲学史的研究成为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写出科学的哲学史，而只能写出非科学的哲学史。

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是在平静无事的生活中获得的，而是在斗争中获得的。人类的历史，是两种斗争的生活史，即对自然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对自然斗争的基础上，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基础上，人类一步一步认识了自然的规律，终于创造了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人类获得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特别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创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每前进一步，科学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唯物论世界观也就会获得新的面貌和新的发展，唯物论世界观的发展，反映着人类对自然斗争的胜利和自然科学的胜利，反映着革命阶级的斗争的向前进步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进步。哲学是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总结，唯物论世界观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确的总结。不能离开了这样的联系来研究哲学史，否则也就不会有科学的哲学史。

为什么哲学史又是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斗争史呢？为什么这个斗争也是必然的呢？我们知道，唯心论是和唯物论正相反对的世

界观，唯物论是对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的认识，而唯心论则是对于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的隐瞒、夸大或歪曲。这种隐瞒、夸大或歪曲，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它的产生和存在条件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是由不知到知，由片面的知到比较全面的知的过程。在我们幼稚无知的地方，在我们知识不足的地方，也就有对自然界作牵强附会的外来附加的余地；唯心论的夸大、曲解，在这里就有了立足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哲学是在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间，反动的剥削阶级需要经常地对于自然界、客观世界的某些真面目加以隐瞒、夸大和曲解，因此就要坚持唯心论的世界观，反对唯物论的世界观。因此，哲学史的发展，就不能是平静无事的、逐渐进步的过程，不是唯物论的和平发展的过程，而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过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玄学的世界观的斗争过程，是要揭露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要隐瞒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的两种势力斗争的过程。这个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而唯心论也往往可以得到一时的胜利。唯心论，是符合着反动的剥削阶级利益的观念形态，是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幼稚和不足的地方寄生存在着的哲学观点，是各时代限制人类思想向前发展的障碍物。“唯心论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把唯心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家的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分开。历史上有些唯心论哲学家的思想中有时包含着一些辩证法的甚至唯物论的因素，因此有了进步的意义，但这和唯心论哲学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这并不就等于唯心论哲学有了进步作用。例如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论体系，就没有什么进步作用，而只有反动的作用，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歪曲了它的宝贵的、有进步意义的辩证法方法，使之成为无用的

死公式，它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对于封建贵族卑躬屈节的倾向。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对于唯心论的反动的本质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否则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哲学史。

第二，新旧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问题，在讨论中大家的关心主要在这两点上：一、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二、接受旧哲学遗产的问题。如像日丹诺夫已指出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不同的区别点之一，就在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上面。旧哲学的一般特点，就是企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最后完成的体系，或者说出最完全的绝对不变的真理，它想凌驾在科学之上，一举完成一切科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一举完成只有全人类的认识史才能完成的事业。结果是很明白的，不论哪一种旧哲学体系，就它的主要的企图来说，都成了精神上的流产，都是无结果的空想。马列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哲学不同，它不是要凌驾在一切科学之上一举来完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任务，它是以全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做基础，以一切人类科学的成就作基础，从其中加以总结，抽引出较普遍原理和规律来，以便反过来又可以把它当作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的方法指南。这样，马列主义的哲学本身，就成为一种科学，它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一种贯穿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它不能一举完成一切科学所要完成的全部任务，但是，它能帮助一切科学的研究工作，使之在方法上不犯或少犯错误，一切部门的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者在内），如果他们的研究的确是有科学的价值，的确是能够揭露自然界的本来面目，那么，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必定是或多或少地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接近的。因

此，如果他们能够自觉地学会掌握辩证法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他们将比较地更容易获得成就。

既然马列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有根本的不同，那么，旧哲学还有什么遗产可以接受的呢？如果有什么可以接受的，那是什么呢？应该如何接受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再把前面提到的哲学史的定义吟味一下；既然哲学史在本质上是唯物论的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那就很容易了解，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通过以前的旧哲学发展的历史中准备起来的，在旧哲学中，除了极端唯心论的、完全反动的哲学派别之外，凡是能总结一时代的人类知识而使思想前进一步的哲学，不管它有着上述的非科学的空想的企图，它总是或者对于唯物论世界观、或者对于它的规律（辩证法）的发展提出若干的贡献，当然，这些贡献经常是很受限制的、片面的、以至于歪曲了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就有必要提出接受遗产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与旧哲学有根本的不同，它是对旧哲学的彻底的否定，但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否定本身即包含着继承性，表示着在新的更高的综合中吸收、批判地改造和联合人类思想史上所已经达到的前进的和进步的一切”。马列主义哲学就是在新的更高的综合中吸收、批判地改造和联合哲学发展史上所已经达到的前进和进步的一切。这就是说，要抛弃一切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如像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而要接受有前进和进步意义的东西，如像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接受与批判、改造是分不开的，在马列主义哲学的更高的综合中，不应也不可能只是简单保存旧哲学所发展的辩证法或唯物论因素的受限制的、片面的、以至于歪曲了的原来面目。部分与全体不可分的说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接受”了

辩证法，但他们的辩证法已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接受遗产，不能看作是旧思想中的某些因素的简单承认或新旧思想的折衷的结合。

第三，哲学的党性问题

我以为一般的哲学党性，首先就是表现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派别之间不调和的斗争性。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经常是这样尖锐，以至于使哲学史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党派斗争的历史。这一个事实，在旧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上，是被隐瞒了的。但是人们仍然可以举出许多显著的证据，来证明彻底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的尖锐的党性的斗争。柏拉图为了坚持唯心论，对于唯物论就毫不容情，他甚至做梦也经常想到要烧毁唯物论者德谟克里特的著作。像这样用粗暴的态度来对待唯物论的唯心论者，并不是很特殊，而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唯物论的党性，也同样表现在坚持唯物论和对唯心论不调和、不让步的态度上。列宁就是我们的榜样，日丹诺夫说："大家知道，列宁是不宽恕他的敌人的，在尝试涂抹和调和哲学倾向之间的矛盾的企图中，列宁总是看得出反动的教授式哲学的阴谋。"列宁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也是同样有着党性的，他们始终坚持发展唯物论的方向而毫不留情地对一切唯心论的倾向进行斗争。一个唯物论者如果在唯心论面前表示动摇、让步，如果不坚决排斥二元论的倾向，这就是缺乏唯物论哲学的党性。

当然，不能忘记，哲学的党性绝不是纯粹思想上的斗争性，哲学中的党派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哲学之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营垒，反映着社会阶级之分裂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政治的营垒。在本质上，唯物论反映着进步的、革

命的阶级立场，唯心论反映着保守的、反动的或反革命的阶级立场。但哲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复杂，不是如有些人所想的那样简单，那样机械。在某种情形下，个别的在政治上站在保守的、反动的立场上的哲学家，也往往有成为唯物论者的事实。古代希腊的赫拉克利泰，近代英国的霍布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因为，哲学是一种最高的思想的综合，它的产生，除了需要有一定的阶级基础之外，还需要足够的思想文化的准备条件，而这种条件，在革命阶级最初出现的一个时期，总是准备得很不够的。因此，新的世界观，往往就从这种准备条件比较充分的旧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间反映出来，而发生上述的矛盾现象。如果我们不是从表面的、暂时的、个别的和特殊的情形来看问题，而是从本质上，从一个历史时代的总的发展规律上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唯物论哲学，是归根结底为革命的阶级立场服务的。霍布士的唯物论，在最后结局上，并没有成为专制国王的思想武器，而是成了18世纪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武器。

马列主义哲学之不同于一切旧哲学，其特点之一，就在于公开承认哲学的党性，公开主张辩证唯物论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斯大林说："辩证唯物主义，公开主张哲学应为工人阶级党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所以马列主义者如果不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就是等于自己解除斗争的武器，就是在思想上理论上离开了党的立场。马列主义者坚持辩证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就是在思想上理论上站稳了党的立场。马列主义者担负着伟大的复杂的历史任务：要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斗争，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

来分析社会发展的情况，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指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来完成这样伟大而复杂的任务的。坚持唯物论，就是为着要能够正确地为工人阶级党的政治路线和人民的利益服务。所以辩证唯物论哲学对于马列主义者，不是要仅仅在口头上来坚持的东西，而是要在一切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的指导中去贯彻它。是要"有的放矢"的研究哲学，仅仅在口头上主张辩证唯物论，而在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的指导中以及一切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不能把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的思想方法，这叫做理论与实践脱离，这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或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反科学的、反唯物论的、反马列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对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很大危害性的，是要坚决反对的。不反对这种态度也是等于解除自己的革命武装，等于离开马列主义党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现在让我们把它抄录出来，以便大家了解毛主席是如何强调唯物论哲学的党性的。

> "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党性才会巩固，没有科学态度或没有完全的科学态度，即是说，没有或不完全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第四，研究哲学史的任务问题

研究哲学史的任务，不只是为着了解过去的事实，主要的是为着解决现有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态度，首

先就在于要求我们时时刻刻把当前存在的问题放在心目中，并努力求其正确的解决，什么是当前存在的问题，这是要看具体情形来决定的。譬如在中国目前一般比较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们中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克服旧封建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唯心论影响和五四以来从帝国主义国家广泛流传进来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影响的问题。尔后一种影响尤其大，其中包含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以及马赫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只是马赫主义在美国的一个支流，一如皮耳生、罗素等人的哲学是马赫主义在英国的一个支流一样）等种种唯心论的影响。为着达到解决这问题的目的，在西洋哲学史方面，就要较多地着重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研究，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如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历史。在这一方面，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对于我们还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仔细研读这一本书是一定有益处的。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就要首先研究太平天国以来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史，联系着中国近代革命的实践经验，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的影响，来检验马列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里连带要谈到哲学的统一战线问题，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哲学的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唯心论的统一战线，就是要不论各党各派，不论各人所专的是哪一部门，大家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批判工作，批驳唯心论，发扬唯物论。过去受唯心论影响的人，现在如果决心抛弃唯心论，研究并接受唯物论，也就算加入了这个统一战线。哲学上的统一战线，是以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但是又有区别的。在现今的条件下，政治上和我们根本敌对的人，是在哲学上也不能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这就是说，在世界观上也一定是根本敌对的。但是，在承认新民主主义

的共同纲领的人们中间，也有素来主张唯心论而一时还不放弃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在政治上站在革命统一战线之内，但在哲学上却是站在唯物论的统一战线之外，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能不在哲学的范围内进行适当的批评和争论。因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的原因而对于唯心论思想的散布不予以批评是不对的，是违背唯物论的党性原则的。但在这种情形下来批评哲学的唯心论者，并不就等于在政治上要加以歧视甚至把对方看作敌人，把这两方面混淆起来，也是不对的。

中国现在需要一切比较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们都团结起来共同有步骤地来肃清封建社会的以及帝国主义所给予我们的唯心论的影响。在旧的大学校里，需要把哲学的课程、讲义加以改造，用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来重新整理中外哲学史和逻辑的课程。这是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不能希望明天就焕然一新。但是一定要很快开始努力来做。在缺乏科学的哲学史的现在，在旧的哲学史课程没有经过改造的现在，大学校讲哲学史时，首先多讲一些唯物论派别的课程，而减少不相干的唯心论派别的课程，我以为这是对的。一切能够加强唯物论的阵地和有利于反对唯心论的实际上必要的步骤，都是我们所赞成的。

（原载《新建设》第3卷第1期，1950年1月）

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

(1950.3)

一

各地解放以后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就比较有成绩的地方来说，情形确是很为热烈，并因此被人称为“思想上的解放战争”。不论是做过几年工作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间，或是新来参加学习的知识分子、旧人员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民中间，凡是采用了正确的方法——也即是理论与实际联系、改造思想、检讨工作经验的方法，来认真地把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学过一遍之后，就必然会经过学习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而最后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解放，这就是说，各种旧的对于社会、历史、工作和生活的不正确的看法受到揭发和批评，而某些新的正确的观点被树立起来了。许多获得了这样一种胜利果实的人，衷心地感到非常愉快，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更像一个生活在新中国的人民了。

这种感觉，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事实上只有在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之下，才会有这样空前规模的人民自己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民过去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着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思想上也受着严重的束缚，这束缚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我们把反动统治从政治上打垮之后，它还会保留着很大的、长时期的影响，而必须人民自己不断的努力来争取从这影响下求得解放。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这样说：“有了人民的国家，

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的范围内和全体的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留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我们的学习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开始。

不用说，内外反动派的影响以及其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是很有害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在认识上以及工作上发生错误的主要根源。如果不加以改造、推翻，无疑是会妨碍我们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就学习来说更是这样，在学习中如果对于可能有的各种反动派影响以及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不加揭发、不进行批评，而仅只以背诵大堆书本知识为满足，那么，我们的学习，就不能前进，就会浪费时间，毫无成绩！因此，当我们进行组织马列主义的学习的时候，就必须防止这一个毛病，把反对反动派思想的影响和其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坏思想，作为我们的一个中心任务。

目前许多地方的学习之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在于能够按照上述任务来规定学习的方法和步骤，在学习的全部过程中，充实以新旧思想斗争的内容。例如在学习的开始，就把改造思想的学习方针作一次充分的动员说明；在学习过程中，又能够揭发各种与课程有关联的不正确的思想，依据学习所得的正确思想，及时地给予系统的批判；在学习结束的时候，再就所学的全部心得，来把各人的思想作一个适当的检讨，也即是作一个思想总结。凡是能够认真按照这样的步骤来进行学习的地方，一定就会获得相当大的成绩，而许多地方之所以苦于学习效

果不好，甚至苦于学习无从着手，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不知道或不认真采取这样的任务、步骤和方法。

二

因此，为着要得到较好的学习成绩，首先必须不要害怕揭露思想的矛盾，必须把新的与旧的、前进的与落后的、革命的与反动的、马列主义的与反马列主义的思想对垒明确地划分开来，进行思想斗争，而切忌把原则的对立隐蔽和模糊起来。这是一般的方针，在这一般方针的指导之下，我们又必须要注意，具体学习过程中的思想矛盾的表现，也一定是具体的，各式各样的。不同阶级、不同工作地位、不同生活环境之下生长起来的人，其头脑中所保持着的旧思想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他们学习中所可能展开的思想斗争的内容，也一定是互有差别的。例如在学习“劳动创造人类世界”这一课题时，在学校或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问题的，多半是“智慧创造世界”、“思想先于劳动”、“知识分子比劳动者更重要”等等的唯心论思想和正确的劳动观点的对立，在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间，成为问题的，又多半是工作中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对立，在一些宗教徒中间，首先就有“上帝创造人”的思想和“劳动创造人”的思想的对立。又例如在学习阶级斗争的问题的时候，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生活较安定的知识分子中间就容易发生超阶级的思想；生活较穷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思想激进而又缺少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就容易表现打倒一切的过左思想；资产阶级以及和资产阶级在生活上、思想上或其他方面有联系并受到它的影响的人，就容易倾向阶级调和主义的思想。像这样，因时因地而不相同的具体的思想矛盾，是需要在具体的领导

之下来加以揭露和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布置学习和推动学习的时候，必须依据参加学习的成员的实际思想情况，来决定学习的计划和重点。

这里有两种正相反的学习领导和学习计划：

一种是不管参加学习的人的情况如何，按照书本和现成的公式，逐章逐节地不分轻重地提一大堆讨论问题，订一个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到处都可适用的学习计划，没有任何具体的重点，不联系学习者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如果有人要提出一些思想和工作的问题，就立刻把它挡回去，说这是与理论无关，不属于学习的正课范围。在考察学习成绩的时候，只要求按书本作出答案，当然就不会考虑到什么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的解决了。这是什么样的学习领导和学习计划？这正叫做“无的放矢”的教条主义，这是非马列主义的，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另一种学习领导和学习计划，是按照参加学习的人的思想情况来布置和推动学习。这不是说不要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书本上的一些理论问题，认真地有系统地弄清楚书本上的理论问题是一定必要的，但在同时不能忘记要使之成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武器，首先就要应用它来解决学习者的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在参加学习的人们中存在着的最普遍的问题，就应该成为一定学习时候联系的重点。这也不是说不要一定的研究计划，用预定的计划来指示学习进程的一个大体上的发展方向，是很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在学习的具体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随时发现与学习课程有关的新的重要思想问题，这就必须提出来加以解决。例如在学习“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过程中，如果经过大家的自我检讨，发现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工作作风，是参加学习者中间的普遍问题，因此，必须在他们中间认真树立起群众观点，这就不

妨在这个问题上多花费一些时间和力量，来加以尽可能充分地讨论和解决。像这样的学习领导和学习计划，就是“有的放矢”的，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的放矢”，“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这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指出的正确的学习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刻也不能放弃的。所谓“目的”，就总的方面来说，就是要使所学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与策略问题。”为着正确地掌握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同时就必须克服那可能阻碍我们正确认识理论政策的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检讨工作中失败的或成功的经验和教训。这样，解决思想问题和检讨工作经验，就成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常目的之一，就是我们理论学习中时时刻刻要注意联系的实际。“今天先来专门学习理论，等理论完全学好了，将来再去联系实际。”这样说对不对呢？当然不对。联系实际这一种本领，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够学会的。要学会“有的放矢”，并且能够放得很准，必须一开始就对着真实的靶子射箭，如果只是嘴里空谈如何放箭的理论，手里玩弄着箭而不放射出去，说只要今天把射箭的理论讲通了，明天就一定会射得很准，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今天是教条主义，那么明天也一定仍然是教条主义，决不会出现奇迹，突然变成了马列主义！

三

要联系实际，才能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这也就是说，解决实际问题，和系统研究马列主义的科学规律知识，是分不开的。但是有些人又从另一方面忘记了这个原则；当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以为这是与“学术”无关，因此把马列主义的科学

规律的系统研究撇在一边，而主观地设想另外的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出现某些非历史观点，其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此。

例如说，在学习从猿到人的时候，为着要反对“上帝创造人”、“日月精华创造人”等迷信思想，确立“劳动创造人”的正确认识，就说当前的任务应该只限于设想宗教迷信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东西，而不需要了解宗教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真正规律，甚至于认为研究这些“学术”问题是有害无益的。

又例如说，在学习劳动创造人的时候，因为要使人认识劳动的重要，那就得把一切剥削制度都称为不合理的和应该被“骂倒”的，因此就不应该联系到阶级社会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规律知识，如果谈到了这样的“学术”知识，以至于免不了要指出一种阶级剥削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合理性，这就是危险的，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是不利的。

又例如，既然确定了学习社会发展史的重点是要建立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那就只要把这些观点一个一个孤立地、抽象地来研究好了！不应该再主张在学习当中必须“接触到全部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必须作多少系统的“学术”研究，如果一方面主张要“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说要“提高我们马列主义的‘学术’水平”，这就是自相矛盾！

由于这样的一些理由，于是在所谓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就抛开了马列主义的按照时间、地点、条件和发生、发展、没落的规律来看问题的历史观点——也就是辩证法观点，而采取主观设想的、按照任何时候都不发生变化的理性原则和道德律令来看问题的非历史观点——也就是形而上学观点。

这是不对的。

马列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信仰，马列主义者在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时候，都必须以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为根据，而不是以抒情诗的精神或传教士式的情感为根据。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所赞成或反对的事物，不是仅仅要对它说一声“好”或“坏”，作一个赞扬或骂倒的表示就够了，而主要的是应该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它发生的原因，以及发展和消灭的条件。这样的分析研究，是为着要确定如何来创设真实的条件，以便使得我们所赞成的东西容易生长起来，或促使我们所反对的东西迅速消灭。——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得了实际问题。仅仅说宗教迷信是剥削阶级故意捏造的，并不能把宗教迷信打倒，因为宗教迷信本来不是由剥削阶级的故意捏造产生的。某些（注意——不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确利用了宗教迷信，并且也确实加上了若干捏造的成分。但他们之所以能利用宗教迷信，主要是由于后者在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生活条件当中有着存在的基础。我们是一定要消灭宗教的，但要消灭宗教迷信，必须首先在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创设消灭宗教迷信的条件。对剥削制度也是一样，要消灭剥削制度，并不需要按照一个形而上学的道德原理来宣布一切剥削制度之“不合理”，因为实际上并不是任何剥削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合理的，例如在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正确领导之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成为多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就是有些合理的，当然，它也可以成为不合理，倘若它不服从领导和限制，而与垄断投机、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联系，或者当将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到了已经可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时候。但这是在另外的条件之下的情形，在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不必顾虑那形而上学的道德公式，而可以说：这种剥削是合理的！这样说，并不就等于说我们不要主张将来要消灭一

切剥削制度了，相反地，只有根据这样一种科学的认识，才有可能使我们正确地理解；应如何创设条件，才能达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包含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内——的目的。

“建立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与“接触到全部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问题”，也决不矛盾的。因为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也绝不是宗教式的信条，而是人类历史的科学规律知识的总结。要正确的建立劳动观点，就一定要认识如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必然由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进入阶级剥削制度，而劳动生产力的更高的发展又将人类历史引导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要正确地建立阶级观点，也就一定要懂得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如何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

不指斥宗教是由剥削阶级故意的捏造产生，而相反地要说宗教迷信存在的根源是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不宣布一切剥削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应该全部“骂倒”的，而相反地要指出某种剥削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还有一定的进步性，不把劳动观点和阶级观点当作宗教式的信条，而着重理解它的科学的内容，这样做，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对于我们动员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目的会有很大害处呢？不，绝不是有害，而相反地是有很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我们避免行动的盲目性，才可能使我们清醒地掌握住革命的政策。

我们曾反对经验主义，因为它是近视的、盲目的。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就是要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知识，来克服经验主义的盲目性。非历史观点对于我们的这一种努力是显然有障碍的，因此就必须把它清算一下，才能避免经验主义的盲目性从另一个角落上抬起头来。

（原载《学习》杂志第2卷第1期，1950年3月16日）

前进一步

（1950.10）

一年以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新的国家领导下，开始进行有史以来空前广大的改造和建设事业，全中国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展开了新的面貌，不但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起了全国范围的根本改变，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人民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一年来所采取的主要形式，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三中全会以来所发起和领导的在全国党员和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外，就是各地政治训练班、各大中学校以及各机关干部的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运动，就是各党派各团体的学习座谈会以及其他自发兴起的各种学习研究的组织。这些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是不是必要呢？应该肯定地、毫不怀疑地答复说，这是完全必要的。要完成建设新国家的伟大任务，没有新的思想意识武装了头脑的新人民是不行的。新的人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旧社会旧中国里生长出来，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在身上带着或多或少的旧社会旧国家的坏影响，即使是一些相当长期地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老干部，也不能例外。如果不经常注意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不能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习惯以至于反动派所给予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充分明确地自觉到自己作为新国家主人的地位，就不可能发挥高度的积极精神来爱护自己的国家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如果有人对于自我改造

和自我教育抱着怀疑态度，甚或骄傲自满，对于学习和整风采取抗拒的态度，那他们的认识就是不正确的，就是不符合新国家的发展需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不认识以下的事实，也是一种错误：就是说，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对敌人的事情，因此，必须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必须经过思想上的启发和自觉，经过自己的个人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而不是采取粗暴的、急躁的带强迫性的方法来进行。

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一年来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过程，同时随伴着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高涨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估计一下，到现在为止，就一般的情况来看，理论学习究竟有了多少成绩，要怎样才能前进一步，使我们学习得更好？

就一般的情形来说，我们的理论学习现在是走出了最初的一步，但是，也仅仅是走了最初的一步，以后还需要走更远的路，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许多解放较早的地区，大致都学完了或差不多学完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的课程，经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所得到的成绩是：在学习者的头脑中，多少有系统的树立起了一些新的观点，初步认识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批判了一些旧的观点以及与旧观点相联系的某些糊涂思想；在新解放地区的人民中间以及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许多了解，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统治者以往政治上的反动宣传的影响。在参加过若干年革命工作的、有些斗争经验的干部中间，经过理论学习，对于中国革命的各种政策获得了

较为深刻的认识，有些人也开始能够对于自己的经验加以反省和检讨，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以及为什么是正确的和为什么是错误的。

总之，理论学习的初步成绩是：解决了许多人的新旧思想的矛盾，加深了某些人对革命政策的认识，帮助一些干部开始懂得检讨自己的经验。这就是解放较早的、学完或差不多学完了几门课程的地区的成绩。

为什么说这些成绩只是走了第一步，为什么走了这一步以后，还要用更大的努力来走更远的路呢？因为，这些虽然不能不说是学习的成绩，虽然作为初步的成绩，这也是不坏的。但是，仅仅这一些，还不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最主要的目标。

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就是说，必须针对着一定的问题来学习，必须在解决一定实际问题的活动中来学习，而不应脱离一切实际问题，作孤立的静止的“纯理论”的学习。什么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的实际问题？如何去找到这一个实际问题？这是需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来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死的公式来规定一切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之下都能通用的问题，也不能任意地胡乱拉扯上各种不相干的问题。一定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之下实际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学习理论必须提出的问题。就新解放地区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要他们把检讨工作经验、或者解决某种具体工作问题作为学习理论中间联系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中间是根本提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把批评旧思想旧观点，反对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等作为他们学习中应联系的问题，那么，这就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他们中间实际存在的。同样，在有多少工作经验干部中间，要他们在初步学习

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求得进一步了解各种革命政策，要他们开始来检讨一下过去的经验，这也是很适当的，因为这些问题也是他们中间实际存在的。一年来的理论学习之所以算作有了成绩，就因为它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是初步联系了一些实际和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些初步联系实际的经验，是其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地区值得拿来参考和应用的，就是已经学习过相当时期而且有了成绩的地区，今后也还可能常常用得着这些经验。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经验，都只是初步的，是很不够的，如果停止在这一点，就是错误的。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记熟许多革命的原理原则，并不在于仅仅用一些新的原理原则知识来代替旧的思想观点。学习马列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善于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来解决实际工作中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这就是说，要善于科学地分析周围环境的情况以及各种事物的关系，找出它们中间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从各种客观事物中找出来的正确的规律知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意义，就是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际的客观事物中抽出理论，又反过来用理论来指导实际行动。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记熟一些书本上的现成理论，而是要从书本的理论学习中领会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自己有可能独立地掌握这种与实际事物和实际工作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理论。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讲到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时，这样说：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要使它与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找到方法的。”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用这样的标准，来检查一下我们一年来的理论学习成绩，那我们要怎样看呢?仅仅学习过马列主义的那些初步理论课程的人，能不能领会了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呢？能不能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呢？显然还不能够这样做，还完全没有或差不多完全没有获得这样的能力，显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进行学习才行，而在目前，我们还离这个目标相当的远。虽然也应该说，我们已向着这个目标走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不继续前进，努力达到目标，那么，这第一步也是白走了的！

在这里要顺便谈一谈整风运动。大家知道，目前的整风运动，主要的目的是要反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坏作风。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思想上的实质，就是反马列主义的，就是没有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就是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研究实际工作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不是从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客观情况中引出它固有的规律来作为行动的向导，而是用完全主观的、粗暴的方法去对待工作、对待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要使一般党员和干部经过阅读文件和检讨工作，具体分析自己周围的实际工作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正确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或规律，以便用这些规律知识来指导工作。因此，整风的结果，不但是要改造工作，而且是要提高一般党员和干部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使他们有可能领会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这是毫无疑

义的。但是，由于我们一般干部理论水平原来是很低的，因此，当整风获得了成绩以后，就必须要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才能巩固它的成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

* * *

为着更进一步学好马列主义理论，应该从何着手呢？

经过了初步的学习，学完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后，应该按照干部学习能力以及工作条件，从干部必读12本书中，再选择几种作为进一步学习的课程，例如《列宁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又例如在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中，不妨选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以便更容易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学习能力相当高的干部，应该有计划地坚持地定期把12本书全部学完，必须结合着毛泽东思想，结合着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结合着新中国的纲领、政策，结合着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来进行学习。这些就是首先要着手的事情。

自然，这并不是说，随随便便读完12本书，就可以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好了。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不要说读12本，就是再读几个12本，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这一个问题，有两点值得首先提出来说明一下：

第一，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在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时候，必须注意领会它的精神与实质，也就是领会它用以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自己也有可能应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在自己的周围事变中找出它的规律，来解决自己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要坚决反对用下面的一种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的理论的学习，就是说希望从马列主义的书籍中为自己的工作找出一些现成的公式，以便自己丝毫也不动用自己的脑筋，就可以

解决工作中的一切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用这种糊涂的教条主义的要求来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呢？不但有，而且相当多。例如我们就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

“12 本书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12 本书对于我有什么用处呢？”

“12 本书能帮助我完成收税工作吗？”

12 本书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善于从精神实质上来领会马列主义理论，那是没有这个问题的，那一定是可以找出它的密切的关系，一定会发现很大的用处的。但是，如果用教条主义的要求、用思想上的懒汉的要求来对待马列主义理论，那么，这的确就有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一定只能得到否定的答复的。发出这种疑问的人，有许多是本来就对于理论的学习，对于研究马列主义书籍采取拒绝的态度，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就预期着要得到一个否定的答复，以便给他们的拒绝态度找到辩护的根据。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有心要拒绝学习，如果他们也竟来认真的参加理论学习了，那么，那种教条主义的、懒汉的要求也将要把他们引到失望的前途上去！因为在马列主义的书籍里是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具体工作问题都找得到现成的答案的。

1926 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曾经转述过一个瑞典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所讲的故事，可以作为一切用懒汉态度来学理论的人们的警戒，我们在这里也不妨引用一下：

“事情是发生在克里姆，在海陆军起义时。海军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并向他们说：近年来你们是号召我们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我们确信你们的号召是对的。我们海军和陆军士兵已经讲好了起义，现在请你们给我们指示。社会民主党员们待了一会回答道：他们非召集专门的会

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海军士兵说明：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回答，而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那么事情是会失败的。海陆军士兵走了出来，等候训令，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拿来了《资本论》第一卷，拿来了第二卷，最后连第三卷也拿来了。大家都来找马克思关于克里姆，关于西凡斯托堡，关于在克里姆起义的指示。但是在三卷《资本论》中，不论关于西凡斯托堡，关于克里姆，关于海陆军士兵起义都没有找得一条指示（笑声）。再翻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找寻指示——仍然没有任何指示（笑声）。怎样办呢？而海军士兵们已经又来了，等候回答。怎么了呢？社会民主党人被迫得承认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海军士兵们以任何指示。'海陆军兵士的起义就这样没有成功。'——瑞典同志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故事（笑声）。"

在我们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像类似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荒谬的行为，是可能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许多人中间重复出现的。对于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只求首先了解马列主义理论的初步的一般原理原则，而还谈不到要求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这还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对于需要深入一步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对于不仅仅要求记忆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而主要地是要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那么，这种喜欢从书本上找现成药方的坏倾向，就会成为学习的严重障碍，如果不是经常警觉地来压制住这种坏倾向和克服这种坏倾向，那就不可能前进一步。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第二，应该特别强调自学的精神，应该主要通过个人自学的

努力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而不是主要依靠开会、漫谈、听讲等等的方式来学习理论。马列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不是浮在表面词句上的东西，不是从道听途说中可以掌握得到的东西，必须认真读书，在阅读中间经过个人的深思熟虑、结合实际来悉心领会，才有可能逐渐了解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用以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是如何应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我们如何来学习应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来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主要靠个人自学获得成绩，而不是主要依靠开会、讨论、听讲来获得成绩的。强调自学，自然并不等于不过问实际问题和群众生活的问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态度来进行学习，也是不对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是要把向书本的学习和向实际生活、群众生活的学习密切结合起来。但正是因为要学会善于在学习中结合书本上的理论与实际生活和群众生活，所以就需要个人的独立思考，需要认真的自学。会议、谈话、听讲，当然也是不可少的，它可以启发我们的思想，帮助个人的学习和研究，适当地应用这些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是主要经过了自己个人的认真阅读和努力思考，就一定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真正思想，就一定只能成为表面词句的背诵者，所以，如果有人把主要的学习时间消耗在开会、漫谈、听讲上面，而很少时间或甚至于没有时间用来进行自学，要想获得成绩，是不可能的。

自然，学习的方法，也不能有死的公式，必须按照参加学习的人的能力和条件，来具体规定不同的办法。前面强调自学的方法，是对于阅读和学习能力较高的人来说的，特别是对于有能力学完 12 本书的人来说的。对于文化程度、政治认识以及其他学习

条件都相当低的人，自然就不完全适用。对于初学马列主义理论的人，选择几种较浅的课程，并主要采取讲授的形式来组织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在各种政治训练班里，以初步改造思想作为学习的主要任务，采取较多的会议形式，应用较多的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这也是有益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下，也仍然要以启发学习者的自学精神和独立思考为主要目标，并且应该给予足够自己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是，像有些地方，把演讲和会议的日程排满在学习表上，有些机关，每天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都消耗在讨论、漫谈甚至于胡扯上面，在这样的情形下，学习者的读书时间几乎等于完全没有了，试问这样还像个理论学习的样子吗？试问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如果也算方法的话），能够希望得到什么结果呢？

虽说强调自学，也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领导、推动和帮助，全国各地、各学校和各机关的领导方面，应该按照以上的原则，来做一些必要的组织工作，对于有能力进一步学完12本书的人，应该给予必要的帮助，使他们能获得充分自学所必要的条件，如时间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等等，应该帮助他们克服应该克服和可能克服的困难，有效地进行自己的学习。对于其他参加初步学习的人，仍然可以利用以往的经验来指导学习，同时斟酌情形的必要，在可能的条件下设立讲授班。改正以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差不多完全用开会和听讲来代替了自己学习的坏毛病。

（原载《学习》杂志第3卷第1期，1950年10月1日；后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

(1950.2、11)

初版前言

这是在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讲课的记录稿,印出来供各地参考。

讲课内容，基本上是根据我所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但讲的时候，是针对着听众中所存在的问题，把内容加以若干的伸缩和调整，所以讲的顺序就不是完全照着“提纲”安排的，有些内容是“提纲”中所没有讲到的，有些是“提纲”中讲得较简略而这里发挥得较具体的，也有些是“提纲”中所有而这里省略了的。所以，这个讲稿，只是作为具体应用和发挥那“提纲”的一个例子。各地同志采用此讲稿时，务必参照“提纲”，根据自己周围学习对象的具体情形灵活应用，不必为这讲稿所限制。因为本书是根据讲课记录略加修改而成，所以文字上不免就有重复的以及欠修饰的地方。内容方面，由于需要急迫，有些问题的提法也可能还考虑不够，希望读者多多提出意见和批评。

作者　1950.2

---

* 这里收入的是1950年11月的第二次重改本。

重改本说明

本讲义从初稿付排到现在已九个月，中间接到许多读者来信，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现在按照这些意见以及我自己的某些新的了解，从头修改了一次，在基本内容和叙述系统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增删，但对某些个别问题的解释，已作了重要的修正。对于各位来信提意见的读者，我没有个别地作复，因此应该在这里表示一下我的谢意。

有的读者主张把第一讲后面所附的一些问题解答取消，这一个意见我没有照办，原因是编入这个附录，可以对教课的教员们提供一些讲课方法的参考，而这本讲义的出版，其目的之一也是为着帮助教员们，而不仅是为一般读者的需要，这是应该声明的。

作者　1950.11

第一讲　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各位同学！你们学校要我来讲社会发展史，我是很高兴的。但我在别的地方讲课太多，时间少，不能充分准备，对大家情况又不够了解，所以讲得好不好，很难说，如果讲得不好，请大家批评，使我可能讲得更好。

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课程，在这个课程里要讲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些根本理论作为方法，来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就能认清楚革命斗争的规律和方向，就能正

确地指导世界工人运动、工人斗争，使之能取得胜利。大家过去做工会工作，现在来学习，首先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根本理论，是很正确的。有许多人感到总结经验困难，说："不怕枪，不怕炮，就怕作总结报告。"这是为了什么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不清楚，对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清楚，因此也就不会从零碎的经验里弄出条理、找出方向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由不自觉的工人阶级到自觉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样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答复是：有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成为自觉的阶级。为什么呢？工人阶级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不能认识清楚自己斗争的目标，不能够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因此也就不容易有自己独立的正确的革命行动，就往往容易为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动派所利用，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任务。例如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特别是它们的右派），都是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党，因此就常常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虽然他们中间也日更一日地分化出许多左派的工人，与资产阶段进行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一般说来是很自觉的阶级，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有中国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有些工厂的工人，在有些时候也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现阶段的革命政策，如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这就说明中国工人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时候，还会表现得不很自觉，不懂得自己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的重大任务。做工会工作的人，如果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得不好，就不可能很好地去说服工人，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自己当前的以及将来的任务，并且积极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

下去实现这些任务。所以为了把工人领导好，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以上是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现在讲一讲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学习理论的基本方法，对于我们做工会工作的干部来说，应该就是我们向来一般的学习方法，那就是毛主席在1942年开始号召的整风的方法。整风方法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联系实际，就是要解决我们思想和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人对整风有一种误解，以为整风就是专门找缺点、乱整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整风的方法中包含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便不可能有真正马列主义的学习方法。但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联系实际，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联系什么实际？就目前大家的情形来说，主要的是联系过去工作经验。怎样联系？用所学的理论作指导，来检查过去的工作。没有理论的指导，就闹不通过去工作的缺点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无从检查起。学好了理论，就有可能闹清为什么发生缺点的道理，就可能闹清缺点发生的原因。原因在哪里，道理闹清了，原因找到了，那么纠正缺点的方法，也就容易找到了。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是在学习中间联系实际的一个主要方面。但这并不是说，对于好的经验就一点也不承认、不研究。如果有好的经验，在工作中有了成绩，也可以根据理论的原则，来加以分析，找出得到成绩的原因，研究其中发展的规律，把它整理成条理，作为以后工作的参考。以上就是联系实际的主要方法。

我们没有学习理论以前，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不会检讨。问题发生了，往往不先检查自己，而只是埋怨客观环境、埋怨别人。工会工作做不通，就怨行政方面或上级不重视工会工作，或者怨

工人调皮，没有农民老实，难以对付。总之，把工作困难的原因推到别人头上，推到群众身上，推到客观环境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什么工作都必须有客观的困难，正因为有困难，所以才要我们工作，而我们的工作任务，正是要克服各种客观困难。某些上级、行政方面有不重视工会工作的情形，这是一定时期里往往不可免的事实，如果有这种事实，应该提供行政、上级哪一方面去检讨。但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则对于工作的缺点，首先要问自己做得对不对，慢一点问别人。我们来这里学习，也需要抱着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首先检查自己，用所学的理论作指导，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的缺点弄清楚，研究如何改正错误、缺点，如何找到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自己搞好了，弄通了，客观困难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这样也就把理论真正掌握了。如果你自己精神上没有这种准备，那我敢断定你一定没有办法把理论学进去。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会反转成为自己进步的严重的包袱。毛主席号召学习的时候，曾指示我们说学习的人要丢包袱。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在学习中随时注意自己有什么包袱，要准备把它放下。认真研究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检讨自己的工作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放下包袱，这是目前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也就是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没有什么奥妙，就是要联系实际。这个方法是不能动摇的，如果不采取这个方法，就不叫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学习就是要学习新的，丢掉旧的，不肯丢旧的，怎么能把新的学进去呢？请大家讨论，我谈的这个方法对不对。如认为不对，请指出为什么不对。如认为对了，大家就要照着做。

开始讲正课，今天讲劳动创造世界，在这大题目下又可分为三点来讲：一、劳动创造人；二、劳动创造人类世界；三、劳动

群众创造历史。

一、劳动创造人

这里首先就要讲从猿到人的问题。50万年至100万年以前，动物的进化发展的结果，出现了一种最高等的动物，就是猿类。这些猿类，原来是在树上生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现在不准备讲，因为那是自然科学的范围），有的就逐渐离开树林，到地上来生活了。猿猴从树上下来之后，就不能不适应地上的生活，靠着两手使用工具劳动，来谋取生活；起初自然只是简单的使用现成的天然的工具，例如，随便拿起石头、树枝来使用，经过几十万年，逐渐学会制造工具，就变成人。人与动物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会制造工具。猿猴一类的动物都有时会使用工具，其他某些高等动物也偶然会使用工具，但就不会制造工具。人和动物的不同，除了制造工具一点之外，自然还有其他不同：如会说话、会思想、会直立走路等，但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特点，人和一切动物不同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制造工具。并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来从事劳动，进行生产。动物只有谋生存的本能活动，而不能从事劳动生产，从树上到地下来，并经常用天然工具的类人猿，已开始了初步的萌芽状态的操作，但由于不能制造工具，所以还不能算作人类，只有经过长期的初步劳动锻炼，终于学会制造工具时，猿才转变为人类。所以，我们说到劳动创造人时，意思就是说猿类经过长期劳动的锻炼，学会了制造工具，这样就变成为人。

为什么有些猿类没有变成人？因为从50万年至100万年前，一直到现在，它们始终没有脱离或没有完全脱离树林生活，没有机会经常使用工具来锻炼它们的手和脑，因此也没有机会学会制

造工具，并且日长月久，它们的肉体上的各种器官，也愈来愈不适合于学会制造工具，所以到今天它们还是猿猴。猿变成人，是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锻炼和几千代的变化过程才完成的。所以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讲这些道理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由此可以了解到劳动的重要意义：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人之所以能离开禽兽地位，是由于学会制造工具的劳动。我们应该重视劳动、重视劳动者，而肃清旧社会残留下来的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者的坏思想。其次我们还可以借此清算一下某些关于人类起源及人类生活的糊涂思想，这些糊涂的思想，经常影响我们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而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常常利用来帮助他们达到欺骗、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目的。比如宗教说人是上帝造的，各种迷信思想，说人的生活是由神、由命运支配的。相信了这些宗教迷信思想的工人，在精神上思想上往往受到一种无形的很大的压力，使他们以为自己没有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因为按照这种宗教迷信思想来说，工人及劳动人民受苦，是上帝、是神给的处罚，是命运决定的，劳动者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神才能决定命运，因此即使反抗也没有用处。很明白的，有了这种思想的工人，他的阶级觉悟会比较地难以提高。因此我们领导工人的人就得学习这个科学的真理，明白人的生活是劳动创造的，不是上帝或神给予的。在组织工人进行生产和斗争的时候，要在适当的时机用这些道理去提醒工人，然后工人对自己的斗争前途才更有信心。我们做工会工作，需要教育工人逐渐脱离迷信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但也要注意这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而是一定要经过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并且要使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提高自己的信心之后，才能逐步达到目的的，所以处理这件事情决不能采取急性的态度。同

志们可以想想，在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没有？据我所知是一定有的，而且相当普遍；因此，研究50万年前的事情就可以联系今天工人思想的实际。

二、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劳动创造人类世界，这当然不是说创造自然界，自然界是自然地存在的，是按自然的规律无始无终地发展着的，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有了人类以后，才有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人类的新世界。人类创造世界，当然也并不是与自然完全没有关系，人类是以自然为基础，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使之变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的东西。比如我们这世界上有许多物质现象，桌子，椅子，都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都是劳动者用劳动改变自然而后创造出来的；又比如文化现象：从语言思想到文艺科学，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有人曾问“动物为什么不会说话”？答复就是：因为动物没有人的劳动。人制造了工具，进行劳动生产的时候，要互相传达日益复杂的生产经验，这就是人类不能不创造出语言来的根本原因。动物不会制造工具、进行生产，因此他就没有什么必要传达的复杂经验，也就没有说话的需要，因此在动物中就不会产生语言。

学习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思想，首先就要了解：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原始共产主义到将来的共产主义。人类的历史为什么能这样发展？为什么任何一种动物的生活中都没有这种历史的发展？其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生产的发展，而首先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就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去取得人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人类的劳动生产力，能由小发展到大。不同社会的人类劳动，其所能发挥的生

产力，常常是大不相同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比起来，那生产力简直就小到无法相比。动物生活就没有生产力的问题，每种动物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一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可说，牛吃草、老虎吃肉，老是如此，没有变化；而人就不一样。人类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发展？因为人能制造工具，改进工具，人的工具不是天然生成的，是制造出来的，是可以不断改进的，动物也有工具，但那是天然生成的，是长在它们身上的，从生下来就有的，比如老虎生来就有四个爪子，因为是生来的，所以就不能由自己使它改变，使它进步。自然，按照进化论学说，动物的器官也会变化的，但如果器官变化了，它就是变为另外的动物，而不是原来的种类了。同一种类的动物，器官虽也往往有小的区别，但基本上是不变的。人的工具就不同，它不是生来如此的，而是可以不断改进的。人使用的工具进步了，生产力就提高了。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工具的发展，例如农村妇女用手摇纺车纺线，一个劳动者的生产力最高不过每天五六两棉花，但用机器的纺纱机怎么样呢？在工厂的同志是了解的，不是五六两，而是五六十斤到一百斤！其次，使用工具的并且有着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因素。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在一起工作，生产力的高低相差很远，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人类因为能制造工具、改进工具，并善于使用工具，所以能使生产力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而整个社会也就向前进步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落后的社会是以落后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进步的社会是以进步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而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使生产力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程度

是基本上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的，这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思想的一个主要点。

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思想，就需要了解，要领导工人建设新的中国社会，首先就要从发展新中国的生产力着手，不发展生产力，不可能有经济繁荣、文化高涨、人民生活幸福快乐的新的中国社会。现在中国在政治上是新的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了，但经济上还很落后。所以还离完全的新中国社会很远。如果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好好发展生产。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政策要限制工人单纯要求提高福利？这并不是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工人的福利是应该重视，而且应该照顾的；但是我们要建设新社会，首先必须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工人的福利事业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应该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进度逐步提高，就是不要使福利事业提高到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的程度，而是相反的使之帮助生产力发展。《人民政协共同纲领》里有重要的一条“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也就是说要发展生产力。我们要教育工人，使工人知道自己担负了建设新中国的第一等重要任务——发展工业。我们需要工业，就得工人努力工作。工人的经济要求过高，工厂就有垮台的危险，或者就不能扩大生产，就妨害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工业化的中国就不可能实现了。要说服某些工人们使之放弃过高的经济要求，其解释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国需要发展生产力。搞土改，为什么对？因为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力就有可能大大发展。但有的地方做得过左了，侵犯了中农，侵犯了工商业，这就会成为错误；为什么是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这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会有妨害。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应成为我们检查许多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历史是谁决定的？中国有一句老话来答复这个问题，说："英雄造时势"，这就是认为历史是英雄伟人创造的，而群众只是跟着他们走的。这是错误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反对这种了解，认为时势是千百万劳动群众创造的。一两个工人要实行共产主义，当然不行，但如果千千万万劳动群众都起来要求实行，并为着这个目的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就一定能够实行。中国为什么今天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劳动群众的生产力很低，因为中国的劳动者主要是农民，而农民在现阶段的要求只是反对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所以我们的农村政策只能是实行土地改革，而不能是像苏联一样号召农民来组织集体农场。有人参加革命的时候，认为土地改革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一种农民的看法。目前中国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小生产，因而其所要求的利益也是较狭小的，例如只要求自己有块土地。在没有大规模的农业机器分配到农村去以前，也就是农业生产力没有一个根本提高的条件以前，要求农民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是不可能的，这对于小生产的农民是不需要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要依据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发展需要来确定，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资发展需要决定着历史变化的趋势。有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是群众决定历史发展趋势，为什么历史上没有农民做皇帝，做统治者?"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农民的代表做成皇帝，即便有农民暴动领袖做了什么王，也是暂时的，经过一些时期，他就会失败，或者转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转变为农民的压迫者。不能做成皇帝的原因，等以后再讲。我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这种现象，是不是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历史是皇帝决定，今天的历

史是群众决定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说，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就是在中国过去几千年间，某人能否做皇帝，也主要是由广大农民群众的趋向决定的，我们如果研究过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国历史上出过很多代皇帝，改变了好多个皇帝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之改朝换代是谁决定的？是皇帝、英雄伟人自己决定的吗？不是的！基本上是由农民群众的活动来决定的，每个朝代的第一个创始人，为什么能做皇帝？一般来说就因为他所代表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至少没有受到农民群众的严重反对；每一朝代最后的皇帝为什么又会垮下来呢？就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政府得罪了广大农民群众，遭受农民暴动的致命打击的缘故。所谓“真龙天子”，并不是因为命好，而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对农民群众取得了某种暂时的妥协，他就做了皇帝。明朝末年，李自成为什么能打进北京？是因为他有个口号“跟闯王，不纳粮”，得到农民的拥护，千千万万群众就跟着他走的缘故。打进北京以后，他的队伍逐渐忘记了这些口号，这是他们终于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汉高祖与楚霸王打了五年仗，所谓“楚汉相争”，为什么汉高祖成功了？因为他比较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他比起楚霸王来，算是会注意设法取得农民拥护的。楚霸王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以为只要靠自己能打仗，就可以决定一切，不懂得争取农民群众的拥护。他是贵族出身，不了解农民的力量，因此他在行动中也就不知道照顾农民的利益，而终于遭到农民的反对。汉高祖成功，表面看来，好像是由于他个人的聪明厉害，但实际上却是因为在当时情形下农民比较拥护他的一派，他才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的第一个皇帝，多半是因为没有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对，才坐上了皇位的，但是他的儿子孙子的统治，一代一代传下去，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压迫农民更厉害。假设这第

一个皇帝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要与他父亲一样享受，那就使农民的负担要加重五倍，每个儿子再有五个儿子，农民的负担就要加重二十五倍。皇帝家族愈发展，对农民剥削愈厉害，再加上他的整个统治机构，以及他所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也是一代比一代庞大，一代比一代更要加重剥削农民，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就会压得农民不能忍受，到处起来反抗，结果他所代表的整个阶级统治就不能不垮台。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很少能传至十一、二代以上的，一代二代还好，七代八代农民就忍受不了啦，九代十代就广泛地起来暴动了，这时皇帝就一定要被闹垮。第一代叫“真龙天子”，末一代总叫做“昏君”，其实末一代的皇帝并不一定都“昏”到只会吃饭睡觉，也有比较精明厉害的。例如李自成打进北京时，那个明朝的崇祯皇帝，倒也是很努力的，早起晚睡，极力要把皇帝的座位维持下去，但还是坐不稳，就是因为他的剥削机构太庞大腐朽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已成了农民的死敌，因此他愈精明厉害，也就要愈更成为农民的不能两立的仇人，农民就一定要推翻他，而他也就必然要被推翻。所以这并非什么“真龙天子”和“昏君”的问题。依据马列主义理论来看，时势是要由劳动人民群众的活动来决定的。人民解放军所以胜利，就是由于得到人民拥护，首先是农民的支持。我们的胜利是与土改政策分不开的。农民经过土改，知道共产党是能充分代表他们利益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办法好，所以他们积极参军，吃的东西也自愿贡献出来，有军队，有吃的，又有群众拥护，革命就成为无敌的力量了。我们的胜利是谁的功劳？首先自然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和他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但马列主义的指导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和趋向，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团结一致地向革命的敌人斗争，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马列

主义理论如果不与群众的斗争相结合，是决不会发生这样伟大的力量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就需要深刻了解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这一个道理。

在历史上英雄伟人有没有作用呢？当然有的。例如我们的毛主席当然是有伟大的作用。问题是英雄伟人怎样起作用？英雄伟人的作用只有一点，就是能够领导群众、或者说通过群众的力量去创造时势，英雄伟人并不是创造时势的直接力量，直接创造时势的是劳动群众。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作出一件像样的事情来，一定要使自己的工作与群众相结合，一定要善于依靠群众的力量，或者叫密切联系群众。毛主席怎样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新中国的？首先是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由此了解群众真正的利益和需要，善于按照最大多数群众的最大利益决定政策，善于集中群众中的正确的意见来规定政策，而不是仅仅按照群众的表面的暂时的部分的利益考虑问题、决定政策，因此就能够为群众指出前进的正确道路，领导群众创造新中国。比如解放城市后，有些工厂工人要求太高的工资，如果照着做，表面上好像工人得到利益了，可是如果因此工厂垮台了，工人失业了，新中国建设不成了，实际上对工人阶级仍是不利的。群众的眼前利益和暂时利益固然也应该适当照顾，但如果仅仅只从表面上考虑群众的眼前的部分利益，而不考虑最大多数群众真正的利益，就是错误的，这就叫做尾巴主义。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善于了解群众真正的利益所在，善于按照群众大多数的最大的利益决定政策，这是领导者首先要起的作用。其次，又要善于教育群众，说服群众，通过群众的自觉来执行政策。我们决定了符合于群众大多数的最大的利益的政策，而把暂时的眼前的利益服从这远大的利益，群众不一定马上都能接受，群众可能还是只求满足暂时的部分的利

益，而不了解照顾远大利益的必要，这就是困难，就要解决，就要想办法去教育，去说服。办法是什么？不应该是板着面孔用命令态度，把工人的要求立刻打回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命令主义。不但不能说服群众，反而引起群众反感，脱离群众。做领导工作的人，就要会想办法去启发群众，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使他们自觉地来接受马列主义的正确政策。我们学习这一课，应该检讨一下，我们在工作中是怎样领导工人，怎样说服教育工人的。怎样才能说服群众呢？首先要相信工人群众是可以说服的，他们是懂得或一定会懂得道理的。有些同志缺乏这种信心，说工人调皮，工人不会服从真理，不懂道理。我们要把这种思想纠正一下。工人调皮是工人的好处，你以为他们对工会的领导人调皮不好，但是你不应该忘记，他们更会对剥削阶级调皮，因此也更会懂得道理。正是因为他们的调皮，在某些方面就比农民强，就能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斗争。农民不很调皮，是由农民的小生产的地位决定的；正因为不很调皮，因此几千年长期地受地主阶级的气，虽然有过多次的暴动，仍是没有翻身。今天中国农民有了工人阶级领导，学会了工人阶级的调皮劲，才能获今天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相信工人，是与相信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分不开的。有了这种信心，才不会着急，才不致匆匆忙忙把工人的要求打回去。有了这种信心，就要善于把问题交给工人群众，启发他们自己讨论。工人要求太高的工资，好不好？把问题提出来，让工人自己去想一想，这样发扬民主，一般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工人中间可能有个别捣乱分子，但群众的聪明是可以压倒他们的，只要我们善于启发，让工人讨论，正确意见一定会抬头的。用这个办法，启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自己起来解决问题，这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之一，这也是应用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来指导工作的具体方法。

所以，英雄伟人是可以起伟大作用的，问题是怎样来起这个作用，主要的是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再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自觉来执行政策。这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些主要原则。如果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学习得很好，领导工作麻烦就少。我们领导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从理论的基础上来说，从思想上的主要原因来说，就是不懂得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地来研究一下这个道理，从思想上把问题弄通了，才能在工作上想出办法来。

我讲的都是比较原则的，大家要根据原则，具体地检讨自己的工作，才能学好。

第二讲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关于五种生产方式这一课，要分三个问题来讲：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三、阶级斗争。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生产力，就是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所发挥出来的能力。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是能发展的，由小发展到大，由低级发展到高级。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第一，就是劳动者用来进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工具。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的落后或进步，决定着劳动生产力的小或大、低级或高级。手工业工具与机械工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产力的标帜。大家都知道，在农村，妇女用手摇纺车纺棉花，一个劳动者最高的生产力一天也不过纺五六两；但是用机器生产则不是五六两，而是几十斤了。但仅只有死的劳动工具绝不能成为生产力，它必须要由活的劳动

力来加以发动，所以，第二，要实现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又要有对生产具有一定经验、善于掌握工具来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熟练与不熟练，生产能力相差很多，所以资本家愿用熟练工人，并付予远较不熟练工人为高的工资。生产力的这两个因素不能分开来看，劳动者一定要在使用工具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时，才成为生产力。生产工具也必须在被劳动者使用来进行生产时才成为实际决定生产力高低的标帜。生产力就是由劳动工具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互相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人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类生活的特点之一，就在于能制造和改进工具，并因此而能发展生产力。动物不能制造工具，动物工具是天生的，老虎的工具是爪牙，长在肉体上，不可能把它变成刀、枪；牛羊的角、蹄、胃，都不能发展，它们永远只要吃现成的草，无所谓生产，所以没有发展生产力问题。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就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什么叫生产关系呢？生产关系就是一种财产所有权的关系，或者更正确一点说，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关系。生产资料就是进行生产时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如农民进行生产时，要有牛、农具、种子、土地，这些就是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决定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使用石头工具进行渔猎生产，生产力很低生产过程又是多数人一起劳动的集体性质，这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而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配。没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生活就不能维持。又例如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是使用手工工具的农业劳动，因

工具很小，可以进行个人劳动，只要有一块地、一头牛、一些耕具，一个人就可以种几十亩地，这种生产力是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劳动者就自然要求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但在土改以前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土地为地主所霸占，所以仅仅劳动工具和一些不重要的生产资料为农民所有）。所以生产力的性质、它的发展情况，就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决定了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问题，就是劳动者使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生产力发展情况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性质。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是一定种类的生产。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根本的物质条件，它决定着社会的面貌。

生产关系的性质如果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一致，如在原始公社使用石器进行渔猎的时代，这就叫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合，在这种情形下，生产力就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如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情况、性质发生变化了，而生产关系不变，两者中间就会变为互不适合，就要暴露矛盾，到了这个时候，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趋向于要把旧的生产关系打垮，而换成新的生产关系。如果不打垮旧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受阻碍，就不能顺利前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的性质，而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样生产中的劳动者就要起来斗争，就要求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要求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经过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和解决。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合而引起社会的各种势力的斗争，就是矛盾的暴露，前进的势力推翻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与发展了的生产力相适合的新生产关系，就是矛盾的解决。解决了矛盾，社会就向新的阶段跃进一步。有人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是太简单了一点，片面了一点；比较完全的说法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与解决。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表现为恐慌、战争、阶级斗争，然后经过革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建立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解决了矛盾，社会就跃进了一步。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经过矛盾的暴露与解决，比如我们学习，要使思想发展、进步，就要将思想的矛盾暴露出来，加以解决。学习“群众观点”时，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中在这一个观点上的矛盾暴露出来，就要明确指出有的同志认为工人调皮、不好办、不如农民老实等等的思想，是与“群众观点”有矛盾，然后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的在具体问题上来克服旧思想，树立相信工人群众的观点，这样就解决了矛盾，这就使我们的学习进了一步。一切发展都是矛盾的暴露与解决，社会的发展也如此，但暴露和解决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思想矛盾的暴露是表现为相反的意见的争论，其解决的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暴露，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而其矛盾的解决也主要是通过革命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

二、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有五种生产方式。五种生产方式由一种变

为另外一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是经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的过程。现在我们首先讲：

（一）原 始 公 社

原始公社经过了50万年以上的长远时期，其中恐怕有40万年以上除石头工具外不知道其他更进步的工具。在这种时候，生产力的情况，主要是集体的采集或渔猎生产。这种时代的集体生产，是以极低的生产力作基础的。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每天生产出来的东西仅仅够维持极困难的生活，更说不上什么剩余，这种生产力的情况决定了生产关系一定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说，生产资料基本上归劳动者共同所有，其中有些工具可归劳动者长期使用，如猎枪常在猎人手中，但也只限于他活着时归他个人经常使用，他死了，枪仍归社会公有。生产物的分配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分配，一般讲是平均主义的分配。这种集体的很低的生产力，绝不允许有私有财产和剥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这种生产关系与当时的采集和渔猎的生产力是基本上适合的。有了这种生产关系，才能保证大家维持生活，并努力生产，才能使生产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暴露什么矛盾。这样一直经过几十万年，生产力逐渐发展了，不但石头工具磨得更精致一些，并且发明了陶器、弓箭以至于金属工具，并且发生了农业和畜牧生产的分工，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开始发生了矛盾。因为生产力发展到有了农业和畜牧，生产就开始有可能由个人、家族为单位来进行，而不一定要集体生产了；农业和畜牧的生产力都比较高，除了维持最低生活之外，还可以有剩余了，这就具有了发生财产私有和剥削的条件，这就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渐地发生了矛盾。从原

始公社里出现了农业和畜牧，就表示原始公社开始走向了它的末期，走向垮台的时期。这是原始公社 50 万年以上的历史中最后一两万年间的事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了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奴隶剥削制就跟着农业、畜牧之发展而逐渐的、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由原始公社走向私有财产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就是原始农业公社。在原始农业公社里，土地仍是归氏族公有，但土地的使用则以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为单位来分配，土地定期轮流分配给某一家庭使用，个人不能永远占有一块土地，但一定期间可在一定土地上耕作。这种制度基本上没有超出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但由于土地是由个人家庭为单位耕作，所以工具的私有以及生产物的私有就渐渐形成了。这样就在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逐渐发生了私有制度。这就是说，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基本上未垮，但其内部已发生了破坏的因素。

有了私有财产，人和人之间就发生了贫富的分化，氏族长之类的人，就会比其他社会成员更为富有。这是因为当时有了商品交换，氏族长是对外进行商品交换的代表人物，他有权集中氏族的财产于自己手中，因此他就利用此机会在自己的身边积累更多的财产，并且集中起许多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变为部落中最富有的，也就是最尊贵的人。有了私有财产，并且有可能由少数人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也就有可能强迫多数人为自己劳动，也就是有可能发生剥削。但由于原始公社里的共产主义传统，最初的时候，要在自己氏族内找剥削对象是困难的。因之，最初的剥削对象是打仗时抓来的俘虏。把俘虏用来看管牛羊，进行耕作，这样就出现了奴隶的使用。原始公社时与外族打仗是免不了的，但在生产力很低，没有剩余劳动物的时候，打仗俘虏常是被杀死了，

有时也为了人口不足，把俘虏吸收作为本族人，但一般的是杀死，甚至当作猎来的野兽一样地吃了。等到有了私有财产，劳动生产有了剩余，便可以不杀死俘虏，而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剥削他们的劳动。奴隶的使用是最初的阶级剥削制度。

原始公社的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就暴露了矛盾，一方面生产关系基本上仍旧是共产主义的，另一方面在社会内已逐渐出现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使用，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起来，最后，就使原始公社垮了台。

这一垮台经过了斗争没有？这一垮台是由无阶级的社会变为阶级社会，因此不是经过阶级斗争来完成的，但不是说没有流血斗争，流血的激烈斗争还是有的，这就是原始社会中部落间的战争。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期的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抢东西、抢财产，有时也抢俘虏做奴隶。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里，很具体地描写了这种情形：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日愈增多，在部落中就因此出现了一部分人，他们逐渐脱离生产，专门带兵打仗，打仗成为他们经常的职业，而其目的就是抢别部落的东西。由于财产在这时已开始被人重视，因此，他们认为能抢到别的部落的财产，是一件好事情，是光荣的。这种抢掠行为的意义，就是用激烈的流血的行为，破坏原始共产主义的财产。这一个部落破坏那一个部落的公有财产，用战争方式将别部落的共产主义公有财产变为本部落的私有财产，各种部落互相破坏，这种仗打了许多年，便激烈地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带兵的人也变成最富有的人和高贵的领袖，他们手中经常掌握着武力，使他们有可能最后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终于连本部落的人也受到他们的压迫、剥削，阶级社会就在这些变化过程中间形成起来，代替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的社会。

（二）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是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但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历史上说是个进步。为什么说它是进步呢？因为这种制度与较进步的生产力基本上相适合。奴隶社会主要是使用了金属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之外，还有若干剩余。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产生在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被推翻了的基础上，在这种基础上，一部分劳动者能在自己手中保留私有的生产资料，并有了私人的经济，因此他们就有可能享受自己劳动的剩余，这就能够使他们生产的情绪比在原始农业公社之下更高。另一方面，而且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奴隶主阶级，这个奴隶主阶级最初是由带兵的领袖（军长）及氏族长之类有权力和有财富的人中产生的，他们在自己手中集中了许多生产资料，并把劳动者也作为自己的所有物。他们强迫俘虏以及后来破产的贫穷的劳动者，成为他的奴隶，他们由个别的在家庭中使用奴隶，一直到组织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奴隶农庄和奴隶工厂，来扩大生产，把生产力提到当时可能的最高度，把剩余的劳动生产物集中到自己手中。他们在社会的经济上占优势，因此在政治上也就成为统治者，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压迫奴隶是残酷的，但由于奴隶可供剥削，因此，对于战争俘虏就与原始公社时期不同，不是杀死俘虏，而是使用俘虏去进行奴隶生产，这一点比起原始公社来仍是进步的。由于对奴隶的剥削，使奴隶主阶级脱离了劳动，因此在奴隶主阶级中间就有可能培养出一批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使社会的文化提高了。这也是一个进步。现在如果有人要使用奴隶，就是野蛮行为，但在当时却是人类走进文明的条件，恩格斯把奴隶

社会当作文明时期的开始，就是从这种历史观点来了解的。这种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所谓基本上适合，就是说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而矛盾的表现就在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剥削太残酷时，奴隶无法活下去，生产力就降低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受阻碍了。奴隶社会越向前发展，这种矛盾就越益暴露。最初的奴隶，是在家里使用的，人数也很少，奴隶主有的自己也参加劳动，在这种时候剥削就比较缓和些，但是到了后来，奴隶主完全脱离劳动，使用的奴隶数量很大，往往达到几百几千，奴隶主只知道无限制地剥削奴隶，以达到他们享受奢侈生活的目的，奴隶劳动的痛苦，奴隶主是丝毫不知道体恤的，奴隶是在非常残酷的情况之下劳作，迅速的大批的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奴隶的生产情绪是极低的，他们为了泄愤，常常要破坏工具，这样，就使得奴隶的劳动中不可能应用较好的工具，这一切都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罗马帝国末期的奴隶主，自己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对奴隶则无限制的进行残酷剥削，因此引起几十万的奴隶起来进行多次的革命暴动，把罗马的奴隶社会终于打垮。奴隶社会垮台的原因，主要的和普遍的是由于奴隶的暴动，至于其他具体的情况，各国不同，但都是次要的特殊的。如罗马奴隶社会的垮台，日耳曼人侵入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其所以能被打垮，日耳曼人所以容易侵入，根本原因仍是由于罗马帝国内部奴隶暴动的结果。而日耳曼人的入侵仍只是起着辅助推动的作用。中国奴隶社会垮台的时间和情况，还不能说有最后定论。但其垮台的原因，仍应该肯定是奴隶社会内部矛盾斗争。在奴隶暴动的威胁和打击之下，有一些奴隶主感觉抵抗不了，于是只能采取让步的方法，把土地、工具分配给奴隶使用，只附加一个条件，要奴隶每年交纳年贡，这样就在奴隶社会产生封建剥削的因素。

这种转变形式，在罗马帝国未垮以前已经在罗马帝国内部发生了。中国的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也一定经过了这样一类的过程。

（三）封 建 社 会

奴隶社会垮台以后，就出现封建社会，而且一般的也只能出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更为进步一些，劳动者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解放，农民在人格上比奴隶稍稍有了一些自由，奴隶自己本身是完全属于奴隶主所有，而农民则不是完全属于地主所有了。农民有自己的经济，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劳动工具，生产品一部分交给地主，一部分为自己所有。地主只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一般都不占有工具。这种生产关系，与这时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基本上是适合的。这时的生产力主要表现于使用较进步的铁器以及较复杂的劳动技术，因此就需要对于劳动能有兴趣，自己愿意努力学取生产经验和掌握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的劳动兴趣比奴隶高，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他们对于每天劳动都有了一个希望，希望把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逐渐积累起来，更富有起来，这希望就鼓舞他们去努力学取生产经验，掌握劳动技术，爱护工具以至于改进工具，以便生产更多的东西，因此，就有可能使生产力提高。在奴隶制度垮台以后，只有封建制度是惟一可以实行的较进步的制度，因为只有封建制度在这时是适合于使社会生产力前进一步的需要。在当时要跳过封建制度实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更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必须以大工业的生产力为基础，奴隶制垮台后当然还没有大工业，这时的生产力是以个体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为基础，而只有封建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于这种小农经济的

情况。这种经济是分散的，以小的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就是在一定乡村或小的地区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吃的穿的大体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完全或差不多完全不是由交换得来。这样的农民，他们一年到头全副精力差不多只能照顾自己的小块土地生产，而照顾不了更广大范围的活动，这种情形，就便利了皇帝、将军以及地主阶级及其代表者从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因此，在社会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农民总难摆脱地主阶级和皇帝的奴役。所以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容易出皇帝的。一个地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土皇帝。以前北京城里住着的皇帝，不过是一个最大的地主。地主阶级所以能统治农民和剥削农民，首先是由于前者用各种方法霸占了土地，农民离了土地就不能进行生产和维持生活。地主阶级占有了土地，就能够强制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来为自己服务，受自己剥削。我们读《社会发展简史》，就知道以前欧洲，日耳曼人打垮罗马，许多日耳曼军官占领了罗马的土地，把罗马的奴隶和自由农民转变为自己的农奴，开始成了封建领主，以后这些封建军官又在欧洲各地到处打仗，使当时欧洲各地还没有成为农奴的，自己占有土地的日耳曼自由农民，受到战争的扰害，不得不请求日耳曼军官保护，而日耳曼军官就借此要挟，把自由农民的土地收归自己所有，从此自由农民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耕作，就必须交付地租作为条件，这样就把大量的自由农民一步步变为农奴。所以日耳曼军人的土地占领，可以说是欧洲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日耳曼人占领后所以能够成为封建社会，其决定的原因还是由于罗马帝国没落前的生产发展中已经开始有了封建制度的因素。分散的农民的软弱性，使他们容易受到强制。地主阶级的土地，一般都是用强制力量霸占来的。以后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发生了土地

的买卖，但那种买卖也多半是带有“巧取豪夺”的霸占性质。地主阶级是依靠对农民的强制奴役来剥削农民的，所以封建的剥削又叫做“经济外强制”的剥削。就经济本身来说，农民在生产上是完全不依靠地主的，他使用自己的工具、种子等等，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生产，他应该是独立的个体经济。农民之所以不能不依附于地主阶级并受其剥削，仅因为农民在人格上社会上为地主阶级所支配，受着地主阶级的各种经济以外的强制压迫的缘故。总之，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情况基本上适合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工业，要打垮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中国几千年来，经过许多次农民暴动，结果虽然改朝换代，仍然是封建社会，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迟缓，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始终停止在小农和小手工业阶段，因而不能根本打垮封建社会。当然，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进步，进步是有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推动着这个进步。每次农民暴动改朝换代之后，生产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化，生产力也总多少要提高一些，但是，这些微小的进步，并没有使封建的生产关系根本改变。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是比较停滞的、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拖延了二千多年，印度也是二千多年，在欧洲也有一千三百多年，其基本的原因就是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的生产力本身不容易发展为大工业，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农民十分穷困，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强了这停滞性的缘故。

我们讲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适合，这不是说两者之间就没有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生活十分穷苦，因此也就阻碍了农民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两者的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封建社会下，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都要给地主，使农民无力养肥耕牛，改进工具，使农民不仅不

能扩大生产，而且原有的生产也常常要被破坏。中国过去每一朝代，到了末年的时候，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总是严重到使农民无法继续生产和继续生活，最后就引起农民的大规模暴动，引起农民地主间的残酷斗争。农民暴动，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最高表现。这时如果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了，封建制就要垮台，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那结果仍然还是要回到另一个封建皇帝朝代。在有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下，农民暴动就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领导下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来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样结果统治者还是让了别人，农民又变为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农民自己在暴动中一般不可能有远大的政治目的，他们最高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分得土地，回家安居乐业；因此在暴动胜利后，政治的果实不是为新的封建皇帝所取得，就是为资产阶级所取得，而最后在经济上也就不能不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农民群众才不但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而且也可以成为在政治上统治的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不需要像资产阶级那样在革命胜利后反过来压迫和剥削农民，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包括农民）的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就要领导农民，联合农民，共同在政治上作为统治者，来镇压和肃清反动剥削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达到世界大同。所以，农民的革命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马列主义的教育下，才会成功，而农民自己也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

我们在革命胜利和进了城市以后，如果放松工人阶级的领导，不用马列主义来教育由农村来的干部士兵，往往就要使革命遭到

损失。例如进城以后，有些干部家里的人就想：你做官了、成功了，都找上来，还带一大堆亲戚朋友，都要求照顾，还想来做官发财。这就是说许多人要用封建的思想意识来影响你，或者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影响你，使你走向腐化和堕落。或者用农民原有的思想拖你，使你想退伍回家。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会要受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且终于要吃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亏。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之下，才能走向真正的解放的道路。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反抗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因为他直接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他的基本要求是要分土地，是要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是要根本废除封建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他的反封建的革命性是最为坚决最为彻底的。假若不发动农民，不依靠农民，要彻底推翻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斗争时，总要或多或少利用农民的力量，但资产阶级自己是不能彻底反封建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同时资产阶级反封建时，它向地主阶级要求的，只是政治上的平等和做生意的自由，它只是不满意地主的封建割据和地主的特权妨碍了发展工商业的自由。如果地主阶级能对资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多少让了步，在政治上给以一定地位，给它从事工商业的某些自由，资产阶级就不一定要求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了；所以，在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候联合农民反对地主阶级，但结果资产阶级常常对地主阶级中途妥协了，出卖农民；特别是在封建地主阶级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力量发展比较薄弱的时候，或者在反封建的革命引起了广大劳动群众活动使资产阶级害怕的时候，地主阶级只要让出一点点利益，资产阶级就很容易和地主阶级妥协，而可以让地主阶级保留土地所有权，继

续剥削农民。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常是不彻底的，如日本和旧德国，始终是地主与资产阶级在一起统治着工人、农民。因此，农民要真正解放，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实行彻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政策，并进一步组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四）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垮台以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出现，最初是表现在手工业工场上，由资本家投资建设工场，集中手工工具，雇佣劳动者到工场里做工。后来，进一步又发展为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初是进步的，它把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生产力发展得很快，远远超过封建社会以前的任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了，它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越地位，最后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者。在封建社会垮台的时期，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如在中国现阶段，因为工业还太少，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经营工商业就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的性质是完全矛盾的；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来说，它的劳动生产过程是集体的、社会公共的性质，是成百、成千以至于成万的劳动者共同在一个工厂或企业内进行有组织的生产，这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情况，就必然会需要共产主义，也就是需要使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公共所有。但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说，它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却是属于资本家私有的，这就是在性质上与生产过程根本有了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很快，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很短时期就尖锐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才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就到了垮台的时候了。

（五）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成为实际的可能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而得到实现，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由社会主义阶段到共产主义阶段。不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以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为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是社会公共所有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人能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没有利用生产资料剥削别人的阶级剥削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大工业的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相反的它还会促进生产力无限地向上提高。

今天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段，讲得少一些，下次讲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再详细地讲。

三、阶级斗争问题

现在讲一讲阶级斗争的问题，作为五种生产方式的一课的总结。

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要认识这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首先又开始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最后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情况。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很久，首先就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停滞的。使生产力不能发展的最根本的障碍，是腐朽的旧的生产关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要实行革命，其根本的原因，就

是由于帝国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美帝国主义不将原子能这种伟大的生产力用来发展生产，而用于炸弹的制造，这就是表示帝国主义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是，在社会主义苏联则将原子能用于生产，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这就表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没有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就使生产力能够无限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矛盾？有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阶级社会中那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抗的矛盾，而是生产中和社会中的新旧事物的矛盾，发展中的先进的东西与落后的东西的矛盾，比如斯达哈诺夫的生产，每天能挖一百多吨煤，比普通工人高出十倍，这就是生产力的新旧的矛盾，就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把这些矛盾予以揭露、予以解决，使旧的赶上新的，落后的赶上先进的，使生产力发展，使社会各方面向前发展。揭露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表扬新的批评旧的，鼓励先进的推动落后的，是生产竞赛运动以及各种自觉的竞赛运动的开展。我们的学习中，也有新旧矛盾，比如学习群众路线，就要揭露与群众路线有矛盾的旧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之解决，向前进步。

总之，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革命者的一切努力，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政策之不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根本理由之一，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因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保护工商业，以及高价收买棉花，保证不使棉农吃亏，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所有的政策，工作的对错好坏，都可以由它最后对发展生产力有无多少好处来评判。这是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首先要学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上。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必然阻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受不了剥削而起来斗争，最终目的是为了打破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为土地在地主阶级手里，农民受地主阶级剥削太重，生活穷困得不能忍受，就无法提高生产力，因此农民就一致起来为获得土地而斗争。所以，在阶级斗争中，被剥削阶级所要反对的主要敌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剥削阶级。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因为它们正是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势力。只有打倒了这些反动势力，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才能发展。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后，农民的生产力就会大大发展。打垮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中国的工农业一定可以迅速发展。我们的政策是：能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势力，即使是剥削阶级，如民族资产阶级，也容许它在经济上得到相当的发展，而且可以在政治上团结它。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到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时，才对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完全的阻碍，那时我们就要作为阶级来消灭它。所以，要打倒谁，团结谁，最后的一个主要标准，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上来决定。我们主张阶级斗争，并不是简单地不论何时，只要是剥削阶级就一概打倒的意思，而是打倒那些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正确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社会，不一定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按部就班地发展，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跳过某一生产方式的阶段。比如在苏联，有些落后民族，原来是还没有脱离原始公社的阶段的，但是竟能一

跃而走人社会主义社会；它所以能够如此，也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因为它有苏联国家的帮助。苏联国家帮助它以机器，使它很快获得强大的生产力，这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人用公式主义的方法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为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一切社会都要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按部就班地发展，不如此他就要奇怪起来。这是一种错误。要照这种公式主义来解决问题，那么，如像我们中国西南，有少数原始民族，要使他们进步，就必须先使他们分裂成为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社会，再去组织奴隶暴动，推翻奴隶主的统治，建立起封建地主的统治，再组织农民暴动和资本家来反抗封建地主，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然后再组织工人，并联合农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如果有人真要这样做，岂不是发疯了吗？所以，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决定社会的发展。苏联少数落后民族有了大机器，就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少数民族如果获得先进民族的援助，也有可能一跃而为近代的社会。有人问，中国为什么不马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正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还落后，工业太少，不够社会主义水平。请苏联帮助行不行？单靠帮助是不行的，特别因为中国是大国，更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苏联现在虽然已经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但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大国立刻提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苏联帮助我们许多机器，成百成千地派工程师、专家来我们国家，已经是出了最大的力量，对苏联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还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得到这样大的帮助。我们想一想：我们学校里，如果抽走了一两个主要干部，有时就很难办了，而苏联是成百成千地派人帮助我们，这是用了多大力量？而成百成千的工程师、专家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能立刻使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像我们

这样大的国家，经济又很落后，就只好先走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像东南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半年一年实行了土改，很快就转变到社会主义。所以，学习社会发展史，是要掌握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是死板地记取五种生产方式作为公式主义的招牌。许多人把五种生产方式的规律都误会了，忘记了生产的最基本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后决定生产关系。我们要把生产发展的规律贯彻到对社会的认识上去，贯彻到工作中去，贯彻到阶级斗争中去。现在容许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就因为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然我们同时也要限制资本主义，防止它走到投机垄断和帝国主义的道路。因为投机垄断就一定妨害生产力发展。我们决定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斗争方向也是如此来决定。斗争是一定不能避免的，凡是有阶级的地方，不可能没有阶级斗争，但主要的锋芒是对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反对阶级调和主义。阶级调和主义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这种主张是要让工人阶级服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经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要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也可以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显而易见，是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主张。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调和主义，认为一定要经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如果不经过阶级斗争，使自己成为统治者，而只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企图经过改良道路走向社会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阶级斗争的目标及方向，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及阶级间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今天，我们的斗争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我们要消灭它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在团结中又有斗争，目的是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是消灭。

怎样限制？限制它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资本家总是需要赚钱的，为了发展生产的利益，不能不允许他们赚些钱，但必须限制投机垄断的暴利，以免妨害国计民生。这就要有适当的斗争。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而方式可有各种各样。对不同的斗争对象有不同的方式。有人误会阶级斗争只有武装斗争一种，那是想错了。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一种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我们批评贪污腐化，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官僚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斗争；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会引起武装的斗争，而是用说服教育和组织的方法来领导农民，因为农民不是工人的阶级敌人，而相反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天然的同盟者，长期的战友。武装斗争是对武装反革命阶级使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是有武装的，所以人民主要用武装的力量才打败了它们。中国今天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武装是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手里坚持了武装，就使资产阶级在实行社会主义时不能用武装来反抗。这样就有可能主要利用教育、思想斗争以及其他非武装的方法来达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有人说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杀肥猪政策”，如果这里所谓的“杀”是指武装斗争而言，那就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才恰恰不是杀猪政策，而相反的是为着让资产阶级有可能经过教育改造、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稳健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去，以免武装斗争、战争流血的政策。旧民主主义才是杀猪政策，因为旧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毫无限制，长得很肥，肥到变为帝国主义，肥到把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门都

堵住了，并且是用武装堵住，工人、农民要走进去，只好用武装把它杀掉才能进去。新民主主义节制资本主义，不让它变为帝国主义，同时又对资产阶级加以教育改造，使将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至于受到太严重的阻碍，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武装斗争，这就恰恰不是杀猪政策。

总之，只要在有阶级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阶级间的斗争是绝对的，不过斗争的方式却是有条件的，各式各样的。我们学校，虽然没有地主、资本家，但思想上却往往有地主、资本家的影响，还要进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讲课也是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拿马列主义思想，把藏在我们脑中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打倒。这个问题不能看轻，做一个工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脑子里有地主、资本家思想的影响，那是很严重的问题，这就会把我们的工作引到严重错误的道路上去。所以，我们做工会工作的人，必须认真向影响我们头脑的剥削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就不可能好好学习，学习也就不会起劲，也就不可能进步！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就讲到这里。

第三讲　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各位同志：

今天讲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成四个问题讲：一、什么叫做革命；二、关于资本主义；三、社会主义革命；四、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什么叫做革命

什么叫做革命？前一次讲五种生产方式时，已一般的说明了。今天还需重复一下。为什么要革命？从生产上讲，从社会物质基础上讲，革命就是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推翻它。什么叫生产关系？基本上说就是一种财产（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所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就是要废除某些旧的统治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所有权。革命的任务，就是把某些阶级的某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剥夺了。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就一定有某些阶级的某些生产资料被剥夺；革命是不是彻底，也不要看旧统治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剥夺得是否彻底。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常常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总是出卖农民，与地主阶级妥协；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的不彻底，其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的剥夺不彻底，如英、日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地主仍然握有土地所有权；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种种方面的表现，从经济方面讲，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丝毫没有动摇，也是其标帜之一。我们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是彻底的反封建革命，就是在政策上能够一步步地走到把地主土地所有权最后彻底取消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目前要剥夺两种所有权，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一种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只剥夺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呢？因为妨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财产所有权，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与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是不是妨害了生产力的发展？一般地说，现在还没有妨害；相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的存在，在

一定的范围内，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用处。所以，要不要剥夺这一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主要的是看它是否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同志不了解这点，一进城来，四面一看，许多人穿的衣服都很好，甚至工人弟兄也有比乡下地主穿得好的，十分看不惯，觉得好像都是斗争对象，于是想不通了：乡下地主的土地都被没收了，而城市里资产阶级的财产为什么不没收？这就是由于不懂得什么是革命和不懂什么是革命的对象。我们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以后，将来生产发展起来，工人农民都要穿好的、吃好的，如果仅仅因为穿的好、吃的好就要被打倒，难道我们将来也要被打倒？所以，从吃的好、穿的好这一点来比较一下，就要决定推翻一个阶级，那是错误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妨害了农民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吃穿没有资产阶级好，也需要推翻它。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比有些地主好，只要它正当的经营工商业，不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能按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就是穿好点、吃好点，但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就不需要没收它的生产资料，而应让它存在。发展了生产力，对人民是有利益的。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些，从整个社会、人民利益着想，才能了解为什么不推翻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剥夺妨害生产力发展的那一种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在它没有妨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即使是剥削阶级，也不需要推翻。要了解我们的革命政策，必须根据这点来判断，才不会发生错误。

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受了阻碍，但革命的实现和它的成功，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例如有些人问：英、美的生产力比俄国革命时候高，为什么革命还没有成功？这就是因为革命的成功除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之外，还要有其他条件；革命的实现

和成功，必须通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很削弱，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力量则增长起来，使它们有能力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自己掌握政权。英、美的生产力虽然发展得很高，虽然帝国主义的统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原子能在美国不能用于生产上，而苏联就能，这就因为美国生产力受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缘故)。虽然这一点也就说明了英、美需要革命，但由于英、美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相当强大，不但政治上保持着强大的国家工具，在经济上，由于侵略殖民地取得超额的利润，把一部分用来收买国内的工人贵族，而有能力借此来分化工人阶级，削弱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没有统治阶级的力量强大，这样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就不能使革命实现。所以，产生革命的原因与实现革命的条件要分开来了解。实现革命需要革命阶级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和组织力量，达到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成为优势的势力。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实现革命的一个主要条件，只有革命阶级在斗争中能够应用正确的战略策略，尽量扩大和发展革命的势力，孤立和缩小反革命势力，使革命势力形成压倒的优势力量，有能力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革命。

二、关于资本主义

上次讲五种生产方式时，关于资本主义讲得很简单。资本主义社会是很复杂的，因此这次也不可能很详细地讲。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后来又起来代替封建社会，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因为封建的生产力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很不容易，因为从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小的个体生产基础上要发展起资本主义的

大生产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封建社会都是比较长期地带停滞性的。农民、手工业的生产很容易建立起来，要不了好大的本钱，农民只要天气好，只要有一些简单工具就可以进行农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工厂，则不是那样简单，必须先投下一大笔资本，拿来盖厂房、买机器、雇佣很多工人，才能搞起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是困难的，特别是农村的小生产更不容易变为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最初一般都是由城市的工商业资本中发展起来的。商人积累了一笔资本，变为开工厂的资本家，或者由富裕的手工作坊老板来建立工厂，自己成为资本家，这样才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没有工业生产的时候，商业资本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附属品，为地主官僚做买卖，没有独立性，它们按地主阶级的要求去做生意，不能算资本主义的经济。

资本主义要成为社会中统治的生产方式，必须在社会的生产中积累很大的资本。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需要有一个叫做“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很快的时间之内，积累起很大的资本，其数量之大，要是用正常做生意的方法，就不容易办到，因此，一般的资本原始积累，总是靠不正当的手段，如抢劫、欺骗、侵略战争、利用政治力量征收高额税收公债等等，来加速完成的。如没有这种手段，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里就不可能很快地成长起来。例如，欧洲有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靠做海盗抢劫而积累起来的。在中国社会，情形却有一点特殊，中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压力之下，中国已半殖民地化，因此，中国的资本积累的方法，主要的依靠着与帝国主义联系着的官僚残酷剥削。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官僚资本家，不依靠官僚势力发展起来的资本家是很少的。比较大些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多多少少依靠联合官僚势力才能存在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是受官僚资本排挤同时又是多少有些联系的。而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以表现有动摇性、两面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对官僚资本有着某些联系，或者说多少有些依靠性。

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很快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性质上是根本相反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以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为基础，生产力的特点是以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过程为基础，成千成万的劳动者在一个工厂中做工，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生产过程是社会公共性质的，而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有的，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性质上的根本矛盾，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私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其他矛盾，都是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的，矛盾的表现有许多种，现在只讲一讲最主要的两种：

（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盲目的、无计划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在个别的工厂个别的企业内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技术的配备，生产的数量，成本的多少，都可以预计得很清楚；但是整个社会生产是无计划的。因为资本家的生产都是为着赚钱，不是为着社会的需要，各个资本家为了竞争赚钱，只顾把商品生产出来，向市场上推销出去，绝不会考虑社会需要多少，应该生产多少；因此，整个社会的生产就不可能有计划、有组织了。这叫做个别企业中的组织性和全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或恐慌），为什么发生恐慌呢？因为无计划、无组织的生产，无法适应市场上的需要。市场的购买力有限，资本家却盲目地进行生产，到一定的时候，生产太多了，一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卖不出去了，生产品只有堆在仓库里。一两家不要紧，很多家工厂的产品都堆起来卖不出去，就发生全社会的经济恐慌；怎么办呢？只好把工厂的全部或一部

分暂时停止生产，商店也关门，工人的失业也就跟着增加，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恐慌。恐慌为什么是周期性的呢？因为生产的物品是逐渐堆起来的，要堆到卖不出去成为全社会的恐慌，需要一定的时间，照19世纪以来的情形来说，是10年至12年左右，生产品就堆到发生恐慌了。这个时候，资本家就把商品烧掉，丢到海里，或用各种方法浪费掉，这样东西就慢慢少了，于是又可以恢复生产，又暂时走向繁荣。但以后慢慢的又堆起来了，又恐慌了。这样就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周期的恐慌。

资本主义生产一定是无政府的，因为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所掌握、所私有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要得到利润。生产不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它也绝不会去想如何满足社会的需要，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自己的商品如何推销出去，如何在市场上竞争得到胜利。竞争的方法之一是使生产加快，使成本降低，价钱降低，以便在市场上压倒其他资本家。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推动生产力一天一天迅速提高，就这一点来说，在一定时候它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但是，因为这种生产不是为着社会的需要，生产只是为了资本家赚钱，就有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恐慌。就这一点来说，又表现它和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表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包容大工业生产的伟大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

（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是为了赚钱，要达到赚钱的目的，必须把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推销出去，要推销商品，必须和别的资本家的商品竞争，必须减低商品成本，减低价格，而要减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加重剥削工人阶级。加重剥削工人阶级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延长工作时间和减低工资，这种加重剥削方

法是容易被看出来的。这样剥削的结果，就有可能减低生产成本，在市场上压倒别的资本家，就达到赚钱的目的。第二种办法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改良技术，使机器加快，增加劳动强度，表面上有时还会缩短工时，加些工资，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工人工作很紧张、很辛苦，同一时间，劳动强度增加，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品实际上也就多了；这样也可以使资本家成本减低，在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因此，资本家要赚钱，为要与别的资本家竞争，其根本的方法就是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工厂是他私有的，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不能不被迫地受他的剥削。由于资产阶级不断地要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一天天地加强，两个阶级的冲突，也一天天的更为激烈。一到恐慌时，这种情形就更加紧张，工厂商店关门，工人被推出到街头上去，失业，没有饭吃。而留在工厂里的工人，剥削更加重了，资本家说：现在没有生意做了，只好减低工资，否则，你也出去。生产停顿了，生产力不能发展了。所以，恐慌就表现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妨害生产力发展到了严重的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就会特别尖锐；每一次大恐慌到来时，资本主义社会就发生革命危机，马克思与恩格斯总结欧洲革命的经验时，曾指出：只要研究历史，就知道每个大革命运动之前，都有一个恐慌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垮台，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果。由于工人阶级遭受不断加重的剥削，又由于经过恐慌时期的痛苦，使工人觉悟日愈提高，组织团结日愈加强，以至于发展到有能力把资本主义打倒。资本主义的这个末路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就表示它已走进了末路的时代。在帝国主义以前的一个阶段，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时，资本家主要以改良技术、降低成本、降低价格的办法来竞争，在帝

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的资本主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被少数庞大的银行资本及垄断企业所支配；竞争方法也就不同了，主要不是用改良技术、减低价格的方法，而是用垄断市场价格的办法，比如一包香烟，垄断资本家卖800一包，如果有新起的资本家卖了600，前者就把价钱压到400，来和后者竞争，后者赔不起，就不能不破产；等后者垮了台，前者就可以单独垄断市场，大大提高价格，来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就要扩大生产，企图再赚更多的钱，但生产太多，本国卖不了，就要拿到外国去卖，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就需要向外国推销商品，帝国主义时代，竞争更是空前厉害。但除此而外，帝国主义更重要的特点，是输出资本。垄断资本获得了庞大的利润，在本国容纳不了，就要向外国投资，或是到外国开工厂，或是借给外国政府，要外国拿出很高的利息。旧中国的反动派政府就是经常向外国借款，并向外国付出很大的利息的。这样帝国主义对于外国殖民地市场的要求就显得更加厉害。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而特别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大体上都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缺少殖民地，就不能不向旧的帝国主义国家去进行抢夺，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为了要达到抢夺的目的，就不能不发生战争，这就是为什么要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垮台和灭亡的阶段。帝国主义经过世界战争，自己互相打伤了、打弱了，工人阶级就可以在帝国主义世界受伤最厉害并且力量变得很薄弱的地方，爆发革命，完成革命的任务；帝国主义以前是没有这种有利条件的。所以，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并且，这个革命

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成功;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就是在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现的。俄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为什么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胜利了?因为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世界中比较薄弱的一环;为什么薄弱?第一就是因为俄国帝国主义是在第一次大战时受伤最厉害的国家,因为沙皇政府当时在东普鲁士与德国打仗,把全国精锐军力用到上面,但却连续吃了很多败仗,败得差不多全军覆没,由此俄国帝国主义就大大地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首先就是靠军队,军队垮了,统治也就有垮的危险。其次,最主要的,是俄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其所以强大是因为有高度的觉悟和组织,也就是有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也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领导,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是觉悟很高的阶级),俄国有列宁的领导,这是很重要的。在帝俄时代,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压迫得很厉害,革命家流亡到外国,等于在外国留学,学习各国革命成败的经验;列宁就是学得最好的,他集中了欧洲各国的革命经验,并具体应用它来指导俄国的革命。俄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也是很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以前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中与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划清了界限,1912年更正式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到1917年就能胜利的领导了这个革命。俄国的情形就是统治阶级软弱,革命阶级很坚强;这个力量的对比就决定了革命的成功。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就讲这些。

三、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加以剥夺。在我们中国,在

现在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相反，还要让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得到发展，所以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东欧新民主国家，已在逐渐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也是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实现的，是工人阶级力量战胜和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的结果，革命成功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完全消灭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仅仅是把资本主义的统治推翻了，而其残余势力是多少仍然存在的。所以，俄国革命成功后，就要经过一段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时期。这个任务的完成，需要在政治上有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政权统治，这个政权统治的特点，就在于它规定一切政策的方针，是以无产阶级所提出来的历史任务作为基础，而不是以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的要求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所执行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而不是其他的方针。有人不了解"为什么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又是工农业联盟"，就是因为不懂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道理。为什么要联合农民？联合农民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的实现，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组织一个广大的群众统一战线。联合农民，当然对农民的利益要加以照顾，但整个政策的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方向，是要积极引导农民共同来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方向。不联合农民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如果不联合，不领导农民，农民就可能跟着资产阶级走，农民内部会分化出富农阶级，也就是可能在它的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的势力。不联合农民，就会使资产阶级的力量增强，而不能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所以，工

人阶级专政，必须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使他们不要走向资产阶级，而要恰恰相反的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力量。只要工人阶级努力去联合农民，正确地加以领导，他们是可以跟来的。联合的方法主要是保证把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由个体生产走向集体生产。所以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把工农联盟作为自己的保证和基础。中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东欧新民主国家也是人民民主国家，但东欧新民主国家执行消灭资本主义的方针，我们在现阶段的革命一般不消灭资本主义。因此，东欧新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中国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由此走到实现社会主义，中间要有一个过程，即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过程的长短，是由各国生产力发展情况而定的。例如美国，如果革命成功了，就可能短些。而俄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就长些。俄国革命后是经过了以下的过渡阶段：（一）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阶段。其任务在于打退帝国主义干涉和克服战后灾荒所造成的困难，使无产阶级专政巩固起来。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农民一切多余的粮食都拿出来，交公家分配。俄国当时不那样做，就不能支持反对干涉者的战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二）打退外国干涉、巩固政权之后，就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任务是恢复生产。为了恢复生产，允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活跃，这与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对民族资本家还适当地予以帮助，鼓励其发展。俄国当时仅仅让资本主义自己存在，而并不积极予以帮助，其目的则在于恢复生产之后，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力量增强了，再来把它消灭。1921 年至 1927 年，生产恢复了，社会主义经济占了优势，就实行五年计划，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后期。五

年计划时期，采取了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并使之彻底消灭的政策。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就被消灭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大体上就经过这样的过程。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国际环境里发生的，只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能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生这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要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了解它的整个时代的背景。俄国革命以后，就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什么叫做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危机是与帝国主义时代以前的周期危机不同的。以前的危机虽然也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发生危险，但是可以经过一个时期又变为稳定，暂时转为没有危机；在这种情形下，危机爆发后虽然也跟着可能就有革命运动爆发，但危机结束后革命就低落下去；所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说还只是在准备的阶段，而不能最后胜利，例如 1871 年的巴黎公社的革命，虽然由无产阶级掌握了两个多月的政权，但终于失败了。所以，正如斯大林的说法，帝国主义时代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的现实的问题的时代。也就是说，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已成了现实问题。总危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可以解释作总垮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世界就进入了总危机或总垮台的时期。俄国革命就是总危机总垮台的第一个结果。从俄国起，帝国主义国家就要一个跟着一个继续垮下去；从此以后，恐慌虽然也能周期地略有恢复，但总不会恢复得很好，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继续垮台的命运。大家都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打出了几个新的人民民主国家来，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过去

了，但资本主义始终没有真正的稳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继续在发展，恐慌也继续存在，而这恐慌自然也打击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身上。美帝国主义努力想使经济稳定下来，用马歇尔计划贷款给西欧各国，让它们用借到的钱买美国过剩的商品，但是商品仍卖不了多少，又派兵到各国占领军事基地，想压制革命，但是也压制不了。东欧、中国、北朝鲜、德国东部革命都成功了，以后一个个国家的革命还要陆续成功。而帝国主义的统治则要一个个垮台。有人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打出了许多新民主国家，那么将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是否需要有第三次大战？"今天的情势明白告诉我们：世界人民并不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想要挑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势力，它们以为挑起战争，可以侥幸避免自己的灭亡。而实际上如果真的发生大战，只有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帝国主义迟早总是要一个个垮台，帝国主义的垮台不一定要经过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成功，就是帝国主义总垮台的开始实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好像已经生了很重的病，任何一点风吹、打击都受不了，任何角落中发生的革命运动，民主运动，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严重打击，都成为催促帝国主义走入坟墓的力量。不论在亚洲、欧洲，只要有革命起来，就能动摇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这种情形，就使得在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不论是哪一性质的革命，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所以斯大林说："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与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从西方的无产者起，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的被压迫民族止，建筑了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

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它已经和旧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已带了新的性质，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分不开，它负有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现在的一切革命运动既然都是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打击，因此帝国主义害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害怕中国革命，就好像害怕本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样。有人问:“旧民主主义有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答复说，旧民主主义从来没有过反帝的口号。孙中山在不曾与共产党联合以前，从来没提出过反帝的口号，相反，在他的一生中曾屡次想和帝国主义联合，有时跑到英、美求援，有时与法国谈判，有时与日本统治阶级拉朋友，一直到他最后北上路过日本时，还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当时他反英，却又想联合日本，这一讲演在后来并且为汪精卫所利用，作为投降日本的借口)。“打倒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国际主义性质的革命。我们的革命要与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与无产阶级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切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内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有些人一直到现在对国际主义还不大赞成，觉得好像中国革命可以成为单独一国的革命，不知道在事实上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世界就分裂成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两大营垒，任何一国革命想要成功，一定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革命人民联合，并取得各国人民的援助。当然，世界任何一国的革命首先要靠本国的革命力量团结和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没有本国革命力量的团结和正确的领导，革命就要受挫折甚或失败。但是如果没有各国人民的援助，也

是一样不会胜利的，胜利了也不会巩固的。俄国革命的成功，首先因有列宁、斯大林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的坚强组织、工农的联盟，但同时也还是因为有当时国际革命运动发展的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无产阶级都在斗争，各殖民地人民也起而要求独立解放，这样就迫使帝国主义政府，不能用很大的力量去干涉俄国革命。所以十四国武装干涉虽然发动了，但力量不大，因而苏联人民才有可能在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打退侵略者。所以俄国革命也是在国际革命人民的统一战线的联系下胜利的。自从俄国革命后，世界就开始分裂为两个营垒：（一）反人民、反民主、侵略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营垒；（二）反帝的人民民主营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九国共产党情报局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形势，规定了世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指导方针。实际上从俄国革命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要得到胜利，都必须与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人民的民主运动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则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性质，就是很大的错误。

中国革命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中国本身条件决定的。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国家，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部生产力很落后，这一种情形就要求中国革命有一个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和团结资产阶级的任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主要的是压迫和剥削了中国的工农人民，使工农人民破产，不能发展生产力，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受到限制和排挤，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就有革命要求，也可以成为反帝及反封建

的一个革命力量，中国生产落后，也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因素来发展经济。毛主席曾指出中国的工业生产只占全国生产的10%，而十月革命时俄国的工业生产占40%，俄国经济虽然落后，比起中国还是相当高，并且俄国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也多少带些殖民地的性质，在经济上依赖西方帝国主义，主要是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它是反革命的、反动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和它们联合，加上俄国生产力比较高，所以就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在革命后不过十年就能发动全面消灭资本主义的进攻和全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的情形就不能这样快，要想在推翻反动统治后不到十年就展开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很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数目字可以计算，在十年内要把工业生产从10%发展到30%～40%是很不容易的，要达到能够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就要更长的时间了。也许有好的条件，好的国际环境，可以快一点，但即使快了，也是有限度的，绝不是十年以内就可以达到目的是很清楚的。我们做革命工作，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把成功的时间估计得长一些；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和时间长一点，对我们有好处，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有更多的主动性。因为我们的生产落后，所以要利用资产阶级一些力量，这样会使我们的工业建设得更快些。有的同志说："我们没收了资产阶级的工厂，不见得不能管理；已经解放了很多日子，干部也训练出来了，没收了也可以管理。"当然，我们如果仅仅没收一个工厂，管理一个工厂，这样做也许是不难的，但是我们要开设许多新的工厂，我们要发展全国的工业，我们要解决的不是没收一两个工厂的问题。我们没收了它，使民族资本家及和他们有关的一批人员闲起来，不能发挥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正确的政策是让民族资本家发

展他的工商业，我们又用最大力量来搞国家企业，这样双管齐下，工业发展就可以快一些。没收，少了一份力量；不没收，多了一份力量；没收好，还是不没收好？还是不没收好。认为没收了有办法的看法是比较狭隘的，只看到了一两个工厂的问题，没有看到全国工业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的重要性，工人又掌握了领导，这样我们就有了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因素的条件。利用了有好处，为什么不利用呢？有人说："利用资本家是被动，是不得已。"这种想法也错了。中国人民有发展生产的需要，我们按照人民的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在我们的领导下来利用资本主义，这正是主动，而不利用恰恰倒是被动了。不利用，则资本家要闲起来，与他有关的工程师、技师等技术人员也要闲起来，可以使用的力量不能很好的充分使用，甚至于引起破坏，这倒是被动了。所以中国生产的条件决定了我们的革命要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我们按照人民革命的需要来利用，使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合人民的需要，这是完全主动的，而且只有这样才是主动。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掌握领导，只要我们会领导，把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在于国计民生有利的道路上，而不要让它向着于国计民生有害的投机垄断方向发展，我们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新民主主义时期，而进到社会主义时期。

有人还坚持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是"杀猪政策"。上次我讲新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不是杀猪政策，是就打仗、流血这一点来说的。如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点来说，那么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时，当然是要把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消灭掉或叫做"杀掉"的，不过"杀掉"阶级不等于杀人。实行社会主义就要取消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杀掉"阶级；但如果资产阶级能进行自我教育改造，那么，杀掉了它的阶级，人却有可能转变为建设新

社会的一个力量，就这一点来说，新民主主义就是争取不杀的政策和交朋友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让资本家知道了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就要看我们是不是善于执行政策，是不是善于领导资产阶级进行它们的教育改造。主要的还在于资本家是只要能赚钱就会积极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在帝国主义统治下面，他们始终是受排挤的，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可能有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善于对他们团结、教育和改造，是有可能争取他们为人民所使用的。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采取什么措施？这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形，和他们的教育改造的情形来决定。如果资产阶级中一些人的教育做得好，思想立场改变了，则当社会主义经理也未尝不可能，当了也没有什么害处。有人认为这些人现在已经享福了，将来还当经理，好像是给他们占了便宜。这种看法，是只看到了个人生活的很小的利益，而没有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上来看问题，是不正确的。现在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使工业生产力较快地发展起来，使我们更快地走进社会主义，这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也是有很大好处的。问题是资产阶级能不能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力量。如果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那它对社会、对人民已毫无用处，即使它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要消灭它；如果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那就应该适当地让它们发展，因为它对于社会、人民有用处，所以吃的、穿的好一些也算不了什么。在我们的政权下，那种贪污浪费、荒淫无耻的生活是迟早要消灭的。在中国旧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一般都是奢侈腐化的，但最坏的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它们不但只是大量消耗了人民的财富，而且破坏社会的生产力，所以一定要消灭它们。地主阶级虽然有些人生活也不如资本家好，但是不

从事劳动、生产，专门吃老百姓小米，而且早就妨害了农民的生产力发展，所以也要把这个阶级消灭。至于民族资本家，虽然他们也是剥削和浪费了人民的血汗，但只要能从事正当的工商业，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用处，那就让他们剥削一点，也没有大害。你要利用他们的力量，就要给他一些条件，满足他一些生活上的要求，这才叫主动。等到社会主义实现的时候，工人农民的生活也就提高了。我们不能仅只从现在工人生活的好坏比较上来看问题，而同时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从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来看问题。自然，对资产阶级进行改造、教育的任务，其中就包含着适当的斗争，首先就要使他们不要从事非法经营，不要投机垄断。到实行社会主义时，又要使他们了解："只有这一条路才是惟一的出路。"并采取各种改造的办法把他们引上这条道路。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在这里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而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领导。国家的力量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但也适当的领导和帮助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又对它给以限制，限制它不要走向独占、垄断、有害于国计民生以及和帝国主义有联系的方向。中国的官僚资本也是一种独占资本，这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大官僚与帝国主义勾结形成的一种独占资本主义。我们反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我们要适当发展民族的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帮助国民经济的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多开工厂、促进城乡经济交流、发展工业生产力。让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同时存在，并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领导之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准备进一步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结构，是混合性质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同时存在。在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的经济构成里包含着各种经济成分：（1）社会主义的；（2）资本主

义的；(3) 国家资本主义的；(4) 合作社的；(5) 个体经济的。在这五种中主要的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成分，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而又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适当发展资本主义。这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成分有些类似，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中间，国家主要力量用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这一点是类似的，但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方针则有一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间，对于资本主义不采取一般地加以根本消灭的方针，而采取在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领导之下加以适当的限制，使其不至于有害国计民生而只是有利益的方针。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则仅只让资本主义暂时存在，而其根本的方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政府里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正是表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特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的代表，就有利于在经济上来加以领导限制，以便集中地推动它们发挥其积极性。这样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也较容易获得发展。新民主主义政府之所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机关，其主要特征之一，就表现在在政治上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并让它们在政府里也有代表参加这一点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就要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把它当做革命的对象，在政府中就不能容许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经济上也没有领导和在一定的限制之下让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而只有消灭它的任务。我们与东欧新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主要也就在此。我们政府里一方面让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工作，另一方面要领导资产阶级进行他们的自我教育和改造；这样就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就有可能在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一同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第四讲　政治与国家

各位同学：

今天讲政治与国家的问题，要分四点来讲：一、什么是政治；二、什么是国家；三、两种国家；四、关于政体问题。

一、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政治，简单地讲，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集中的形式；就是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和统治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为两种阶级，分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样就必然要发生两者中间的阶级斗争，这就有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所以，政治绝不是中国历来所谓的“管理众人之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模糊了阶级观点，模糊了政治的阶级性。这是剥削阶级对于政治的看法，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要模糊阶级观点的。剥削阶级统治着人民的时候，它们一定要隐瞒政治的阶级性，这样它们才可以欺骗人民，使人民以为它们的统治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为众人管理事务，而不是为剥削阶级自己的利益办事；这样的隐瞒和欺骗，对于剥削阶级的统治是有利的，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但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不需要这种隐瞒，相反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来说，揭露政治的阶级性，明白指出劳动人民过去历史上受政治压迫的地位，倒是有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就要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是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社会发展到有阶级时，是在有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有了阶级斗争，而在阶级斗争中，胜利了的阶级组织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另外的阶级

成为被统治者，有了这两种阶级之后，才有政治。所以，我们说，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

政治不是简单的事的管理，而是人的统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那些族长等的工作，的确真是替众人管理公共事情，不是对任何阶级进行统治，所以没有人来反对这种“统治”，因为他们并不压迫部落里边任何人，只是集中大家的意见，管一下，照大家的意见执行就是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虽然也有组织，有各方面的机关，但并没有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有管理的问题。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有统治和反对统治的问题。阶级社会里的首脑机关——政府，不是简单地管理事情，而是代表一定的阶级统治另一些阶级。蒋介石的政府，是代表四大家族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统治。我们的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是广大人民对反对派的统治。在阶级社会里，一定有统治的问题，有了统治的问题，就有政治。我们学习什么是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了解这一点之后，那么，什么是政治工作、政治斗争，也容易了解了。什么是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们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就是提高革命阶级的觉悟，团结革命阶级的力量去反对反动阶级的统治，为自己而争取国家的统治权，在既已争取到手之后，就要来巩固这统治权。争取国家的统治权，和巩固已取得的统治权，是政治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或者说，提高革命阶级觉悟，团结革命阶级，争取统治权，或巩固已取得的革命统治权，就是革命的政治工作。如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提高战士阶级觉悟，坚强其战斗力量，使他们能够英勇战斗，打垮反动统治，争取人民的统治权，和保障已争得的统治权。工会的政治工作，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使工人懂得如何争取统治权，在已经有了人民的政府以后，就要懂得如何来

支持和领导这政治的统治权。工会工作者绝不应该仅仅为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而且要进一步为树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领导权而斗争。

政治工作不外两种：一种是宣传教育工作，另一种是组织工作，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革命阶级的政治觉悟，团结革命阶级的力量，去争取和保障统治权。社会上各阶级争取统治权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争取统治权的斗争，李宗仁、蒋介石之间争夺卖国的统治权，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我们与反动派的斗争，就是主要的为着争取人民统治权的革命政治斗争。列宁讲过："革命的问题，基本上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斗争基本上就是革命阶级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为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统治权的问题会成为革命斗争的基本的问题？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是要利用统治地位来保证自己对被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剥削阶级是少数人，被剥削者是多数人，剥削阶级如果没有统治权，就没有力量对付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掌握了统治权，才能保证经常地进行剥削。因此，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为了要反对剥削，使自己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就一定要起来反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并争取自己成为统治者。这样，在阶级社会里，就一定有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同时也就有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样就有了阶级和阶级之间为了争取统治权的斗争，而革命阶级争取统治权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社会上各阶级之间的经济斗争，直接间接地都要联系到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而政治统治权的斗争的胜败，就会影响到整个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得失。剥削阶级必须要争取成为统治者，才能保证自己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经济上的剥削；而被剥削阶级也必须要起来推翻

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使自己阶级在经济上得到解放。一个工厂罢工，或一个村农民要求减租，其所进行的斗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但是这种斗争多多少少总要受到反动政府的干涉，使被剥削阶级的要求不能实现，或至少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工人、农民在经济斗争中总不能不或多或少把斗争的一部分力量集中到政治方面。只有把反动统治的干涉冲破了，才能解决某些经济利益的问题，只有把反动统治打倒了，并且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工人、农民才有可能在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例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工人、农民，就有了这样的使自己得到完全解放的条件，因为他们都成了政治上的统治者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工人斗争，是不能单纯地只提出经济要求，在为着任何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总要适当地提出某些政治要求。《联共党史》有一个地方讲到列宁领导工厂工人罢工，他通过一些工人，熟悉了工厂情况，然后发出宣言，提出了斗争办法和要求，其中在经济要求之外，也适当地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列宁尽管是领导一个工厂罢工，也绝不是将斗争完全局限于经济的目标，而要按可能条件提出适当的政治要求。什么是政治要求？比如要求自由组织工会，要政府承认自由组织工会是合法的，这就是政治要求；又比如要求将保障工人福利规定作政府的法律，这也是政治要求。这样的政治要求，就是要经过斗争，把工人的需要变成统治机关的法律，为自己的阶级争取到一定的政治地位，迫使统治阶级在统治地位上作若干的让步。当然，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政治要求是要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代替反动的统治，而不是仅仅向反动统治阶级要求若干的让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得到解放。但是，当反动统治力量很强，工人阶级还不可能组成足够的革命力量来推翻这种统治，使自己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工

人阶级仍应该随时注意提出可能的政治要求，以争取政治上的若干的胜利，即使不能争取得到这样的胜利，也可以借着提出政治要求，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工人阶级懂得不争取政治权利，不可能保证自己阶级的经济利益，不推翻反动统治，不可能得到真正经济上的解放。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取得胜利，并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就尤其要注意到，这样的统治权，是保障自己阶级在经济上最后彻底解放的最根本的条件，就要把巩固这一个统治权作为自己的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而不要把眼前的经济利益作为第一个任务。如像在今天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之下工人阶级就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作为新政权的主要的支柱，成为贯彻新的人民统治权和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领导力量。

从这里，就可以进一步谈谈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问题。什么是阶级意识坚强、阶级觉悟高的人？那就是懂得政治斗争，懂得要努力争取自己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人。真正的阶级觉悟，就是政治觉悟，工人阶级觉悟高不高，就是要看它们对政治的认识清楚不清楚。工人阶级中有一种经济主义的思想，只知道争取经济利益，不懂得争取政治地位，这就是阶级觉悟不高，甚至没有阶级觉悟的表现；因为它不知道要使自己阶级得到真正经济解放的根本条件，不懂得政治地位和统治权就是这样的根本条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是应该得到自己经济生活方面的适当的改善的，忽视提高工人福利是不对的。但如果工人阶级只看重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同时关心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能否巩固，不在支持人民政权和执行政策纲领方面作领导、打先锋，这也是一种经济主义，也是表示阶级觉悟不够。比如要求无限制增资，轻视统一战线，这种倾向发展起来，就会发生对人民统治权的影响问题。以前我们批评过：工人阶级如果过分重视眼前利益，其行动

在最后的结果上就会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说，工人阶级如果只注意眼前的利益，还可能在政治上发生有害的影响。如果工人阶级只注意眼前的经济利益，那就不容易使自己的阶级在政治上团结一致，甚至于在经济利益上发生内部的纠纷；如果工人阶级轻视在革命中的统一战线，那就会使自己的阶级孤立起来；而一个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得到胜利，要在胜利以后能够把统治权巩固起来，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在政治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同时还要在其他阶级中间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不容许使自己孤军独战。革命阶级如果自己内部没有坚强的团结，又在斗争中孤立了，那即使已经取得了统治权，也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统治权。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农民暴动的失败，常常是由于这一个原因。明末李自成打进北京，已经成为统治者了，但是很快就失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胜利后内部发生分裂和在政治上的孤立。有的同志进了城，生活差一些，就发牢骚，说我们革命十几年，反而吃小米住平房，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统一战线，反对节约一些小米出来养活其他阶级中与我们靠拢的人，这种想法，就算不扣个经济主义的帽子，也有点经济主义的味道。我们如果一定要天天吃肉，吃大米、白面，暂时也不是办不到的，但如果这样做，那么，眼前的经济利益要求也许可以满足了，但在政治上就要吃亏了。中国人民被反动剥削阶级多年来剥削得非常穷困，我们吃多了，就要使许多人饿饭，就会变成政治上反对我们的力量。我们少吃一点，原来吃得多的人看见我们艰苦，也就不敢太多浪费，就可以匀出饭来，使更多的人吃饱，就会减少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这样，我们在眼前的经济利益上自然所得较少，但在政治上就得到很多。我们生活简朴，就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领导行动，使其他的阶级不能不跟着我们走。工

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要靠行动来表现的。政府已宣布，明年干部生活还不能提高，有的干部也许又会发牢骚，在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提高觉悟。我们生活苦一点，其他阶级也就能跟着生活降低一点，农民的负担也可以减轻一点，这样就使农民和我们团结得更好，我们不要以为农民和我们的团结毫无问题了，以前大敌当前，农民千辛万苦，和我们一起战斗，但敌人一倒，对农民就必须适当照顾，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团结。所以，要懂得从政治上、从革命的统治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才算是有阶级觉悟。工人阶级要有这样的阶级觉悟，才能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我们的革命斗争，已经推翻了反动统治，今后的任务，除了还要继续肃清国内反动势力残余以及反对国外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之外，主要的就要进行经济建设，就要发展生产力，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要发展生产力，必须有巩固的政权作为保证。我们说革命的问题基本上是政权问题，并不等于说革命对于发展生产力可以不管。不是的，一定要管，但是要通过一个巩固的人民政权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来管，才可以管得好。有一个巩固的革命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来搞生产，力量就大得很，发展会很迅速。我们学习政治这一课，联系到我们的工作，就要反省一下我们在工作中考虑政治问题够不够。我们领导工人，首先要善于使工人在政治上有较好的认识，使他们充分关心于革命人民的统治权巩固与否的问题，政治认识提高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工人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能否充分贯彻，就要看工人阶级觉悟是否提得很高，是否能在行动中表现出它的政治上的领导。

二、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家？了解了政治，就容易了解什么是国家。政治是

阶级对阶级的统治，统治，需要力量、工具，这力量、工具就是国家。一个阶级要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就要靠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什么是国家政权？就是掌握国家工具的权力。国家工具，照列宁的讲法，主要是一些强力，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侦探保卫机关以及应用这些强力的机构。政府机构就是应用军队警察等等国家工具的机构。一个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必须在手里掌握这些强力、这些工具，否则，就不能维持统治。这就是说，如果这些强力毁灭了，统治阶级也就要垮了，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第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的四百多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打毁了。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沙皇会被工人、农民推翻，其原因之一就是俄国的军队与德国打仗，败得几乎全军覆没了。中国人民今天所以能取得统治权，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胜利和发展是主要条件之一。

所以，国家不是简单由“人民、土地、主权”结合而成的，国家的特点不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的说法，是模糊阶级意识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没有阶级社会以前，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以前只有管理众人之事的族长酋长，他们没有掌握国家的武力去压迫任何人，原始社会的武装是属于社会的，人人是生产者，人人也是战士，武装不是凌驾在社会之上，不是保持在一定阶级或集团手中的，而是掌握在社会内的人人手中的，如果需要战争，还要大家开会决定，指挥战争的人是临时选出来的，战争一结束，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生产者，不能把武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再保持有任何指挥权。到原始公社快垮台时，指挥战争的人和打仗的人才逐渐固定起来，成为专业，但开始也不是为了在民族内压迫任何人，主要是为了和别的部落打仗。军事力量的专门化，成为后来国家产生的一个条件，但仅仅这样，还不是国家。一直到阶级社会正式成立了，武力专门是用来保障奴隶主压迫奴隶，富

人压迫穷人，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这时武力被统治者所掌握，例如说被奴隶主阶级所掌握使用，成为奴隶主阶级的工具，这才有了国家。所以，国家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阶级使用的工具。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用来压迫奴隶，压迫穷人的工具；封建国家是地主压迫农民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用来压迫工人的工具；美国的军队、警察就是用来压迫美国工人及其他被统治人民的工具，美国工人罢工，资产阶级政府就派军队去镇压或代替工人作工，或者强迫工人上工。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超阶级的。

三、两 种 国 家

一切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工具。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又可以分为根本不同的两类：一种是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广大人民的国家；另一种是广大人民统治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只有前一种国家，即少数剥削阶级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国家，如奴隶主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这是旧式的国家。十月革命后才开始有了第二种即广大人民统治、压迫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这是完全新式的国家。苏联国内现在已经没有阶级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劳动分工，有时也讲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别，但名词的意义已经有点不同了。而所以还要加以分别只是由于工人阶级比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居于较为先进的地位。但是苏联仍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来对付反动阶级，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天天想要挑拨战争，进攻苏联或阴谋从内部来破坏苏联，压迫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因此苏联就需要加强国家力量，以便有可能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和进攻，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反

动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苏联如果已进入了共产主义，而帝国主义包围仍然存在，则国家还是需要的，那就还需要有共产主义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产生了新形势，以新的人民国家苏联为中心，把世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及各国人民联系起来，形成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阵线。苏联是第一个人民的国家，苏联的出现，使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看见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懂得自己也应该和可能起来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第二次大战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人民国家，这就是：东欧的新民主国家、德意志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越南等等。新的人民的国家与旧的国家根本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前者是大多数工农劳动人民的统治工具，或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统治工具。其次，就在于新的国家发展的方向与旧的国家不同，旧的国家是为了坚持剥削阶级的统治，不仅不要消灭阶级剥削制度，而恰恰是要坚持阶级剥削制度，因此也要坚持旧的国家的阶级统治。新的国家的发展方向却不同，新的国家本身只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创造出来的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可以引导社会走上最后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的统治因此国家也自然而然衰亡下去的道路。新的国家都是由大多数劳动人民统治，被统治者是绝少数，而且这被统治阶级将一天一天更加减少以至于完全没有，到这种时候，“谁统治谁”的问题没有了，政治统治没有了，阶级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关变成了“管理众人之事”的机关；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侦探等强力机关，人压迫人的工具也全都不需要了，这就是国家的自然而然的衰亡。将来共产主义世界的情形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的领导机关基本上只是管理生产、经济的机关，当然也是管理文化、教育的机关。那时有没有人会破坏这个社会的经济管理规则呢？如果有了，那是不是有了

统治问题呢？如果有，那也是教育的问题，而不是统治问题，不是阶级社会里的压迫人的问题。有人担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会有人偷懒不做工作，并且说“好逸恶劳乃人之常性”，因此以为必须要有压迫的机关，这种想法错了。“好逸恶劳”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所养成的人的坏习惯坏思想，剥削阶级的社会把闲吃玩耍看作光荣的事，而把劳动看作下贱痛苦的事，这样就养成了人的一种“好逸恶劳”的恶习惯；这是人的社会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性；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时，人的社会性质是会变的，那时就会人人认为劳动是光荣的，甚至于是生活的必需，而不劳动则是可耻的，是违反正常生活习惯的。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什么需要用压迫机关来强迫人劳动呢？总之，人民的国家就是要把人民的范围一天天扩大，等到把世界上被统治的人缩小到一个人也没有了，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不存在了，则世界上的阶级、国家也就消灭了。所以新的人民国家是准备过渡到无阶级、无政治统治的也就是无国家的大同世界去的条件。一切新的人民国家都有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不仅把自己的国家搞好，还要联合全世界其他的人民国家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去推翻剥削阶级的世界统治，使全世界变为人民的世界，使全世界人类走到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境地。

在十月革命前的旧国家内，劳动人民是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国家的，那时如果劳动人民说“我是某某国家的主人”，“某某国家代表我的利益”，那就是自己骗自己的。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他只是一个被压迫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国家也不代表他的利益，而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向工人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相信这口号的人，就是受了骗，因为他们在这口号下实际上并不是为自己的祖国打仗，

而是为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打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不是代表工人、保护工人的，而相反的是压迫工人统治工人的。同样，在旧中国，在国民党统治的范围内，人民也没有代表自己保护自己的国家。旧中国人民如果真的把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家看作自己的国家，那就错了。但是，中国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侵略下面，受害的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反抗侵略，是人民的需要，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保卫国家，要求民族独立解放，对人民也是有意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保护祖国”的欺骗不同，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解放要求。不过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和反动统治者所谓的“国家至上”的思想，也有分别，不能不把界线划清。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时，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了救国运动。这个救国运动的目的，是一方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要争取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国家，而反对反动腐朽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抗日救国的口号之下有两条相反的路线：一条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替国民党反动派救国的路线，按这条路线救出来的国家仍不是人民自己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反动派独裁的国家；所谓“国家至上”，实际上是主张反动派的独裁至上。另一条是真正人民所要求的救国路线，其目标是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把反动的统治也推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要求救国运动实现的国家是后一种，就是要实现人民的民主政治；而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就是当时的人民国家。我们是一直坚持按照后一种路线救国，而且得到了成功。现在是既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打倒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中国人民才算真正有了代表自己的祖国了。我们现在

讲爱国主义，就是要爱人民自己的国家，使人民的统治发展、巩固起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说不管由谁来统治，只要是一个国家就加以拥护。人民的爱国主义，是要争取建立人民自己统治的国家，既已实现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以后，就要进一步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发展、巩固。现在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积极努力参加这个国家的各方面建设工作和保卫工作。尤其是工人——国家的领导阶级，就要负更大的责任。建立新国家的根本条件是在于经济建设，要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首先就是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政治建设方面来说，工人阶级就要很好的组织起来，作为人民政权的主要支柱和发挥领导作用，作为保卫国家、巩固国家的领导力量。做工会工作的人便要努力使工人阶级在这些方面来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要怎样才能表现出来呢？就要从行动上、从积极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工作和保卫国家的工作上来表现这领导作用。这就是说，对支持政府、实现政府的政策，工人要走在前面，实现得最彻底。不要只看到个人目前利益，而要首先为国家前途着想。工人阶级走在前面，使别的阶级不能不跟着来，这就起了领导作用。打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要只从个人生活好坏这一方面去打算，而要从整个国家利害上打算盘，从人民政权稳固了没有的问题上去打算，这是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总之，我们务必用一切力量把人民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并坚决保卫它，使它十分巩固。同时也要知道，要把自己国家建设好和使它十分巩固，不仅需要国内的条件，而且也需要国际的条件。这就是说，必须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以苏联为首的人民国家，团结起来，和一切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以及其他国家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我们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国内的，在国外还有帝国主义要来破坏我们的国家。所以一方面要讲爱国主义，另

一面又要讲国际主义。这二者是分不开的，缺一方面也不行。这次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及其他文件，其基本的精神和主要成绩，也可以从这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团结了国内各阶级各党派来建设新的国家；另一方面就是团结了国际友人。也就是说，建立国内的和国外的两条统一战线。纲领和文件本身，就包含着这两方面的内容，政协会议的全部活动过程，也包含着这两方面内容。就国内方面来说，各党派各阶级中间最初有着许多分歧的意见，经过协商，获得了一致，大家一致举手赞成共同纲领，在这个纲领之下团结起来，而这个纲领，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就国际方面来说，政协三个文件都规定了联合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友人的政策，政协会议开完之后，接着就开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苏联派最优秀的艺术家、教育家们组成代表团来庆贺我国开国大典。在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承认了我们的国家，东欧各新民主国家很快也承认了，新德国成立不久也承认了。

国内的团结中包含着领导的问题。中国的人民民主政府与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同的一点，就是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这个国家政权，并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团结资产阶级，这就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阶级调和主义完全不同。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阶级调和主义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地位一点也不改变的情形之下，要求工人阶级去与资产阶级妥协；这种阶级调和的思想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是要欺骗工人阶级使之甘心去做奴隶，所以我们要反对。中国工人阶级今天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同时就领导他们进行一定的自我教育改造工作，使资产阶级放弃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只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事业，来造成

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条件。能不能说对资产阶级是“以团结为主”呢？当然可以说的。李立三同志在亚澳工会会议上清楚地说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以团结为主，又团结又斗争”。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说“以团结为主”并不一定就不好，问题是看怎么样团结，如果像社会民主党那样团结就坏了，因为这里不但说不上工人阶级领导，相反的是要工人甘心受统治。我们的团结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团结为主，又团结又斗争，同时这团结又有一个共同纲领作基础，这是很好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保证领导权作用。军队是人民的，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主体是工 农，共同纲领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再加上我们的模范行动，努力工作，坚决执行纲领政策，吃苦带头，不计较享受，在物质上朴素一些，不要去羡慕旧社会剥削阶级的那一套生活，政治上就取得了主动地位，这就能保证领导。政协会议就是对各党各派的代表进行了一个教育改造的工作，很多的分歧意见，经过协商，都变为一致了。大家一致承认共同纲领，在会议中不仅是简单的团结了资产阶级及其他党派代表，而且是使他们通通提高了，提高到共同纲领的水准。

中国的人民国家与苏联及东欧人民国家不同的一点就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参加政权。人民作为统治者是相同的，有资产阶级在内这一点则不同。这就是说，国体——国家的阶级性有某些不同。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国家；而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里的政权，仍包含着工农联盟在内，但不包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物，因为它规定一切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不容许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但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中放弃了自己阶级立场而转向劳动人民方面来的个别的人也不能参加，这样的个别的人是可以参加，而且事实上在东欧国家

有这样的情形。)，而又执行消灭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制度的方针的人民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互相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则要求在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当国家政权里允许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物参加的时候，当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还要在政治上互相联合，还在建立着统一战线的时候，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里，还不需要立即去实行消灭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而在这个时期里只需要实行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这就是不能成为工人阶级专政。农民是劳动人民，因此他们和工人阶级不是对抗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农民就能够和工人阶级一起，共同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阶级，因此农民参加政权，就能加强工人阶级专政的力量，保证工人阶级实行社会主义，所以工农联盟也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参加，所以只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在这个政权下面，只能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政权算不算工农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就这一点来说实质上与工农民主专政是一致的。但如果把我们的国体简单地称做“工农民主专政”的国体，那就不对，那就说得不完全了，因为还有资产阶级包括在政权内。列宁在1905年前对俄国革命曾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主张，没有包含资产阶级参加的意思，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始终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不能与无产阶级真正联合的。所以在二月革命以后，俄国有二重政权，一方面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工农兵苏维埃，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政府，这两重政权始终是对立的；所以当时革命民主政权（即当时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以

前这个政权还不是工人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包括资产阶级，只能以工农为主体加上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的人民政权则包括资产阶级，这是中国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的称作工农民主专政，只能说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的定义已经很完全了，用不着再下另外的定义来代替它。在中国现阶段的条件下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做有很大利益。中国工人阶级既有能力领导着资产阶级走，那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就有利于人民国家建设，就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现在在一定范围内还有着一些积极的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利用团结并不矛盾，团结就是为了利用。两个对抗阶级的团结就是以能够利用为条件的。利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双方面都有利，对资产阶级也有利，因为在新政权下比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资产阶级的发展更容易些。对于人民有利的地方，是可以推动发展工业准备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说“利用”一词也没害处，因为我们的利用与蒋介石反动派的利用不同，并不是利用完了简单地一脚踢开，或者杀死。自然，就资本主义的制度和阶级来说，是终归要杀死的，但就资产阶级的个人来说，那就不是这样简单，而是在利用中有团结和斗争、有教育和改造，改造得好，就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朋友，就可以一同走得更远。

四、关于政体问题

国体是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即国家归谁统治的问题。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制度。旧的国家政治制度有好几种：有君主制、议会民主制、贵族共和制。新的人民国家政体，虽然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复杂的过渡形式和具体特点（如东欧民主国家

中的罗马尼亚，在最初的阶段甚至暂时有过君主制)，但它的基本的形式，应该只有一种——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为什么有新旧两种分别呢?因为政治制度是服从阶级统治的需要，适应阶级统治的需要的。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很明显的是只适合少数人统治要求的，君主制是皇帝的独裁制度，人民对独裁的君主不能提反对的意见。在这种政体下面，人民的意见绝不可能变为国家的政策，政策只由剥削阶级的头子来决定。贵族共和制不是皇帝一人独裁，而是剥削阶级推举少数代表，三五人、十几人商量决定政治上的问题。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中国始终是由一个皇帝来决定问题的，或者有个宰相来襄助皇帝决定问题，那仍然是君主制。议会民主制也只适合少数人的统治，议会民主制的统治权的代表范围比较大些，决定政治问题的代表多一点，但也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代表，被剥削阶级的大多数人绝没有代表参加政权，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仍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在君主制中和贵族共和制中，剥削阶级内部也还有当权与不当权之分，而当权的只是剥削阶级的最少数。民主制则是剥削阶级较大多数的统治。希腊民主议会代表，都是奴隶主，没有奴隶。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与奴隶社会的民主制是有些不同的。奴隶社会的奴隶，毫无任何权利，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里，则在法律上、形式上容许被剥削阶级——工人——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如英国共产党（英国工党表面上代表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都有些代表，但限制很大，代表不多，美国共产党在议会只有两三席，日本在今年曾经争取了15席，已经是很了不起，空前的胜利了。但这样微少的议席，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广大人数，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的选举权，受财产、居住时间以及各种或

明或暗的限制，例如英国议员竞选人要交大批保证金，竞选不上，保证金也损失了。选举时，还常常要用各种方法出钱收买选民，没有钱贿买选民的人，是不可能被选为代表的。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工人代表被选到议会里，也不能对政府的政策起多少影响，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是三权鼎立的制度（议会、政府、司法互相制衡互相对立)。议会不能直接选出政府机关，政府是另外独立组织起来的。因此议会实际上是说空话的机关，并不能把人民的意志真正变为政府的行动。如法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议会代表以共产党占多数，但是政府是另外组织的，不是按照议会代表的比例组织的。因此政府机关仍被资产阶级所掌握。议会里虽以工人阶级代表占多数，而政府里只有两个不重要的共产党部长（卫生部长与航空部长，现在则一个也没有了)。所以，法国政府执行政策时，还是按资产阶级的意志来执行，而不顾议会里工人阶级代表的意见。美国更明显，美国是总统制，总统选出以后，由总统决定组织政府及各部、院人选，而总统也只有由两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即民主党、共和党提出候选人。候选人的提出是要花大量金钱的，例如要发表竞选演说，一二十分钟的竞选广播，也要付出几十万美金，租戏院、会场都得花钱。工人阶级的党即使可以提候选人，没有钱，也竞选不了。不仅如此，到投票时，还要拿大批的钱，组织跳舞会，放演电影，开咖啡店，让选举人舒舒服服玩一天，只要投他一张选票；所以竞选总统的结果，一定只有出得起钱的才能当选，只有资产阶级支持的竞选人才能当选，也即是只有共和、民主两党的人才有资本竞选。形式上，工人甚至部分黑人都有投票权，但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当选。比如最近一次美国选总统，本来杜鲁门已经威信扫地，各方面都估计他不能当选的，但和他竞选的是杜威，人都知道他是法西斯主

义者，比杜鲁门更为声名狼藉。这样美国的选民就没有办法选更好的人，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反正两个臭家伙摆在面前，只好选一个表面上似乎臭得轻一些的。这样杜鲁门就当选了。

人民民主的国家，则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可以由人民代表直接组织政府，选举也没有那些限制。资产阶级的国家只能或主要只能选出政党的代表，美国的议会里，不是民主党的人，就是共和党的人做代表，没有人民群众及其团体中直接选出的代表，而我们的民主集中制，除了政党的代表而外，还有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有工会代表、产业代表、农民代表、妇女代表、学生代表、商人代表……各种社会团体的代表等等。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直接去组织政府，即由代表大会选出政府委员会来，政府也是直接的人民代表，这样自下而上，一层一层的集中上去，建立国家领导机关。议会与政府就是合一的东西。政府必须对代表大会完全负责，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只有这种制度，才能把真正人民代表选到政府里去，来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及保卫国家的工作。这样的政府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政治力量，才能适合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要求。苏联及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制度在基本上是这样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的，不过在某些具体部分、具体组织上，以及发展过程、发展中的过渡形式上，由于情况条件不同，各国之间有很多差别。例如苏联就没有像中国这样，在政协会议（暂时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闭幕后，除选了政府委员会之外，另外还要选一个协商机关即政协全国委员会，这是因为我国有资产阶级参加政府，所以对于政策及各种重大工作，必须随时进行协商，才容易取得意见的一致而利于团结。这种协商机关，在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需要的。总之，人民民主国家的政体，只能以民主集中制作为

基础，不能采取过去的旧资产阶级的政权形式或其他的政治制度。

第五讲　社会思想意识

今天讲社会思想意识的问题。分四点来讲：一、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二、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三、社会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四、关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

一、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社会思想意识是什么东西？它是包括很广泛的名词。包括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及社会上的文化现象：文艺、科学、法律、道德、政治思想等等。这些社会上的文化现象和个人的思想感情合起来，叫做社会思想意识。在这中间，文艺、科学、法律等等，是在形式上比较集中的，有系统的社会思想意识，所以又叫做观念形态，或叫做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讲的社会思想意识，是包括社会上的观念形态和个人思想感情的。

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人的思想意识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环境养成的。有人问："三字经上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对不对？"我们的答复是："不对！"这说法是错的。其所以错，在于他说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说人从母亲肚子里就带来了好的性质。但事实上，人一生下来，是无所谓好坏，好人坏人是生下来以后，在社会上养成的，而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准，也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而

这里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生产、生产方式。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的思想意识也就怎样。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怎样，社会思想意识也就是怎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社会思想意识也随之而变化。

例如有人问："宗教是怎么来的?"答复是：宗教最初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原始公社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态。为什么生产力落后，就会产生宗教？因为当人类生产力很低的时候，对自然界斗争能力也低，对于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很多困难，没有方法克服，也不能正确的了解，只能用宗教迷信去解释不能克服的自然界所给予的困难。我们现在有好房子，大雨、大雪、打雷都不怕，可是原始公社时代的人类，碰到大雨之后就很苦了，没有好房子，找食物也困难，有时打一天猎也打不着什么；因此，自然而然有一种想法，以为自然界有一种伟大的神秘力量支配着，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什么"神仙"、"魔鬼"，例如说打雷是由于"雷公"发了怒。这就是最原始的宗教迷信产生的情形，它产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生产力低。现在中国的农民信迷信，生产力低也仍是原因之一。比如发现流行病，没有办法，就说是什么神仙妖怪使得如此。像张家口闹鼠疫，如果苏联和中国的防疫队不去时，那就没有办法，只好用迷信解释它的来源。生产关系中的落后状态，也是宗教产生的原因之一；在原始公社里，人的生活绝不能脱离氏族组织范围，因此把氏族的各种制度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赋予了宗教迷信的意义。在阶级社会里，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在生活困苦绝望而又不觉悟的时候，就容易相信自己生活的困苦是由于什么不可知的和不可抵抗的神秘的力量所决定，而在这种情形下，统治的剥削阶级就可以利用宗教作为压迫人民的精神武器。如果人民反对剥削压迫，那么，统治阶级的宗教就威胁着说，这是要遭

受神的“报应”的。这些就是宗教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宗教的根源既然是在生产方式之中，因此，虽然现在先进的人们中间一般已经没有了宗教迷信思想，但是在一般人民中间，宗教迷信还很顽固地存在。要在人民中间彻底消灭宗教，就不能性急，不能希望简单的做几次演讲或谈几次话就可以解决。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剥削压迫，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使人民逐渐了解自己的命运是决定于自己的斗争力量，而不决定于什么不可抗的神力，这样才能够一步一步地把宗教迷信根本消灭。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的思想意识必然反映着阶级斗争。每一阶级社会都有两种以上的代表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互相对立着，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则一般地是占着统治地位。比如在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主的思想，把奴隶看作和动物、牛马一样的生产工具，不认为奴隶是人；而奴隶自己的思想则与此相反，认为自己总是个人，要争取做自由的人。奴隶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仍有残余，地主阶级经常把农民当作牛马来看待。但一般来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对于劳动者的看法比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好一点，地主阶级一般地只把农民看作低一等的人，但在基本上却还承认农民是人，并不完全等于牛马。中国从前把人分为两种：君子和小人。农民都是小人，地主都是君子。君子中也还有等级，做了大官的君子又叫大人，身份就更高了。在中国，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对于做官的还保留着大人的称号，普通读书人有点地位的叫老爷；做到县长，就叫做大人了。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学有许多人做过县长，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县长，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县长，所以就不允许叫大人；如果有人保留着封建思想，要在老百姓面前摆大人架子，那就要给他批评。封建社

会地主阶级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封建的官僚等级思想。把人一级一级地严格按等分开，上等的人都在地主阶级之内，被认为是人格高贵的，下等人主要是劳动者，被认为在人格上是下贱的。上等人对下等人有任意支配的专制特权，下等人对上等人必须绝对服从。读书人总要做人上人，骑在人头上，就算荣耀。封建社会内，不同等级的人是不能随便来往的，结婚也讲求门当户对，如果地主与农民结婚就认为是莫大的侮辱，这是不允许的。这种封建等级思想，现在我们许多人脑中还有残余，工作地位比别人高，就自以为高人一等，耀武扬威；低了，就为地位闹情绪问题。这种思想有时也在我们党内作怪，妨害许多人的工作情绪。共产党员所看重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贡献，而不是专门重视等级，如果自己受了封建等级思想影响，就要发生思想的矛盾。我们看有些苏联同志，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内战时期就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他们做了二三十年的革命工作，现在来中国当个教员也很高兴。这就因为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没有封建等级思想，不把等级问题看得很重，而只是抱着替人民多做事情的热情来中国的。他们觉得在中国有机会替人民多做事情，就认为是荣耀。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官僚等级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思想，故在一般人民中影响很深，我们虽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出身，但往往也受到影响，无意中总以为好像做个什么“长”就有了大人味道，做什么“员”就有点小人的味道。这是才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的时候人们往往要有的思想毛病，再过二三十年，就会觉得这种思想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封建的官僚等级思想是专制主义的，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统治权，可以不讲道理，要怎样便怎样。“官者管也”，上级对下级只有一个管字，没有民主，下级如不肯绝对服从上级的管，就叫“造反”，就是犯了罪恶，严重的要杀头。我们工

作中的命令主义者，要下级绝对服从，不讲清道理，不和群众商量，其原因之一，也就是由于多少有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在作怪的缘故。

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当然不仅只包含一个专制主义的官僚等级思想。除了官僚等级思想以外，例如还有地盘思想。为什么有这种思想？地主阶级就是依靠霸占土地剥削农民来生活的，这就是地盘思想的物质基础。封建国家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其头子就是皇帝）霸占了全国的土地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封建的等级，也常常与地盘的大小相适应。土地霸占越多的人，等级也就越高，皇帝占全国的最大的土地，所以就是最高等级，军阀或地方统治者占一省土地，就比皇帝低些，县长则更低些。当然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的等级一定直接和占有土地大小有关系，我们只是说地主阶级基本上是靠占土地分等级来维持其剥削的，所以它的思想，主要的就是官僚等级思想和地盘思想。我们中间有些人的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往往也是与封建的地盘思想多少有联系的。

与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对立的，首先是农民的思想。农民不觉悟时，自己的思想，是不明显的，他们常受着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依靠地主生活，服从地主、受地主剥削驱使，都是应该的，做官的等于自己的父母。中国有句老话："有土地的人高三辈"，农民尽管自己胡子白了，而对一个小孩子地主还得卑躬屈节。但是，如果农民觉悟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要反抗压迫，就会要求向地主获得土地，就会提出平等思想，来反对封建等级的思想。过去中国打抱不平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代表农民思想的，这就是说，要把不平的（包括身份的不平等和土地、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变为平等的。农民在过去中国一发生暴动，总

是各式各样地表现出要求平等的主张，如太平天国的“太平”两字，就带有农民要求平等的意思，这表现为当时的口号，就是：天下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农民有了相当觉悟才能叫出这样的口号。在太平天国时期，有“一切男女都叫兄弟姊妹”的口号，洪秀全与他的战士都互称兄弟。不过，后来洪秀全到南京做了天王，他和他的一班领导干部中间的封建等级思想就又逐渐抬头了。与农民思想刚好相反！中国孔子的思想则是讲究封建等级制度的，几千年来，中国地主阶级称他为万世师表，就是因为他把封建等级思想讲得很有系统，给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理论根据。孔子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观念形态的集中表现之一。我们是应该反对孔子的思想的，但许多为地位闹情绪的人，却表明他们脑子里还常有孔子思想作怪。

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地主阶级的思想，也是有矛盾的。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剥削无产阶级、开工厂、做生意、赚钱。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在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上产生的。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要开工厂、做生意，对封建等级、地盘主义就有矛盾，封建地主占了地盘，资产阶级做买卖就不方便。两个封建地主占据的地方，从这里到那里，来往就不方便，一个封建地主开了门，你就不能进去做生意，要进去就得额外出钱，这就难赚钱了。旧中国的军阀割据时代，商人从这一省到那一省去进行贸易，阻碍很大，要免去这阻碍，资产阶级就要求打破割据，组织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民族主义在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的剥削要求产生的思想。还有封建等级制度，对做生意也有矛盾。有等级制度，就不好平等做生意，比如做官的买东西，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势力占便宜，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总是有许多的

特权，他们用这些特权来强制其他阶级（首先是农民）受自己剥削，这叫做经济外强制的剥削；这就是说，用经济以外的社会和政治特权的力量来达到经济剥削的目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基本上就是利用特权获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轻商，就是重视地主的特权，而轻视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地主阶级甚至把资本家也看成一种小人，一种下贱的等级，所以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里也要求平等。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是与地主阶级在社会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不是要求与工农在经济上的平等；资产阶级也要求自由，主要是要求地主阶级不要霸占地盘，不要用等级特权来压迫工商业发展的自由，这与农民的要求土地自由也是有分别的。资产阶级只要求封建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让步，使自己地位提高一点，和地主差不多，并能自由开工厂做生意，达到这些目的，它们就满足了，它们并不一定要求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它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农民的并不一样，因此对地主的革命要求也和农民不一样。因此它们在革命中，容易和地主阶级妥协，而出卖农民。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是正相反的。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仅只是要求一般政治上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就是要求废除政治上的封建等级的特权，而并不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资产阶级相反的要反对经济上的平等，要维持有钱人与穷人的分别和有钱人剥削穷人的权利。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受剥削，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就有权剥削人。资产阶级所要求的，是要保护剥削制度和私有财产，而工人阶级则相反，工人阶级所要求的是废除剥削制度和私有财产，使整个社会变为无产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要有这种要求。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是集体性质的，是千百人在一

个厂工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了解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的，生产的工具是大家共同使用的，生产的成果是大家努力的结晶，因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应该归劳动者社会公共所有，生产的果实也应该成为保证劳动者共同生活的共同的果实。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使它成为一个天然地要求共产主义实现的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一定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很容易了解自己在全社会生产中只尽着一部分的力量，一个工作的完成，不是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工人阶级力量造成的。我们看见的苏联同志的思想就是集体主义的。比如你说他工作做得不错，他总认为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不错，而是斯大林领导得好；对于一切工作都不看作自己的，而看作是大家的。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思想。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主要特点是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我们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指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什么这些人有个人主义思想？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多半靠自己的一些小财产加上自己个人的劳动来谋取生活；有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就决定了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我是靠自己能力吃饭的。"相信个人，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出发，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有什么不同？农民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也有个人主义，但他是靠土地生活，有重视土地的思想，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没有重视土地的思想，农民在封建社会中是地主阶级剥削的主要对象，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是最为残酷的，所以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性一般都比城市小资产阶级更强，也是反封建革命的最主要的动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受地主阶级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受资产阶级的排挤，生活是痛苦的。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尤其厉害，他们在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压迫下大量破产，因此他们是有革命的、反抗的思想的，但他们常常从个人出发来想问题，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重，这是他们思想的缺点。在我们党内，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不少的。他们对许多事情都从个人方面来看，所以常常把问题看错了。比如有人有这样的说法："革命中的过左倾向比右倾好。"他的理由是：右倾是投降敌人，而左倾不过是性急，基本上是革命的。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不对就在于只从个人来看；从个人来讲，左倾机会主义好像比右倾机会主义好，左倾机会主义好像还算做英雄，所以虽然犯错误，也不算什么。其实他没有看到，不管过左过右，对人民来说，事情既然办错了，都一样有害无益，所以都一样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从人民和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而不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就谈不上什么左比右好了。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是不正确的。

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就讲到这里。

二、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

思想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有何作用呢？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里已经有了很好的解答。社会的思想意识基本上有两种：进步的和反动腐朽的。这两种社会思想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进步的思想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就是能够动员和组织群众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反动腐朽的思想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就会起阻碍的作用。什么是进步的思想意识？进步的思想意识是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的思想意识。什么是落后的、反

动腐朽的思想意识？那就是违背着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的思想意识。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反动的，它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就起阻碍的作用，它之所以能起阻碍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应用其统治的地位，使其思想意识也能变成为统治的思想意识，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广泛的影响，也就是把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灌输到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头脑中，而被剥削被统治阶级就因此成为不觉悟的阶级，而不知道反抗。更明确地说，被统治阶级的不觉悟，就是表明它不仅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受了压迫，而且也在思想上受了压迫。思想压迫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有形的压迫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如不准看进步的书报，封闭进步报馆、书店之类。从前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看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往往要被杀头，这就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压迫；另一种无形的思想压迫，是使被统治阶级在无形中受了压迫阶级的思想影响，这种无形的压迫比有形的压迫厉害，其作用更大得多，比如我们当中还有封建的等级思想、地位思想，这就是无形中受了封建地主官僚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压迫的结果，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了我们，使我们忘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这种无形中的思想的压迫，是多少年来封建社会环境中养成的，这种环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灭。比如我们革命胜利了，家里的人找来了，说："你做官了。"这就是封建思想通过家庭关系来压迫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解放了，就一切自由了，一切毫无问题了。要知道我们还常常受着这种压迫的。这种思想压迫之所以比政治压迫厉害，就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有形的思想压迫，容易看清楚，是容易使我们懂得应该起来反抗的；而无形的思想上的压迫则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受了压迫，自己还不知道，甚至甘心情愿的受压迫，觉得封建等级思想、官僚思想很好。所以，反

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最厉害的方法就是无形的思想压迫的方法，它无形中巩固了反动统治，阻碍了人民的革命自觉和斗争。甚至于在革命胜利后，它还可以起阻碍进步的作用。例如现在革命是基本胜利了，为什么有些个别的同志还会闹贪污腐化？闹工作消极、闹情绪、闹纠纷、闹不团结呢？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失败了，退出中国大陆了，但是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并没有退出，思想上的反动派仍然继续在起作用，这些思想不打退出去，就会妨害我们的革命工作，妨害我们的进步，妨害中国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所以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打退各种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影响。

现在再说进步的思想意识。进步的思想意识是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需要的，进步的思想必须在社会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进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才能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它就有可能推动物质生活的发展，能够帮助生产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思想如何推动物质条件的发展呢？进步思想的作用，首先是要经过宣传教育，使它影响群众，掌握群众；进步的思想一掌握了群众，就可能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进步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已学过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这个群众运动，就会推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向前进步。例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思想只有在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产生；这种思想的产生，首先自然是在少数的先进人士当中，而不是直接产生在群众当中。然而，一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以后，经过先进人士（例如中国的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宣传发挥，它就逐渐变为群众的思想，群众就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进行斗争，掀起了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今天的新中国。思想意识对于物质生活条件的

作用是这样重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的学习是很重视的。如果广大的干部学习好了，就能进一步去影响群众，正确地指导群众进行斗争，革命任务的完成就可以加快了。

思想意识的进步作用,是有一定的时代限制的。有许多思想,过去是进步的,现在不进步了。这是学习马列主义应当注意的。如封建思想现在是反动的，而二千多年以前，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刚开始发生时，像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就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封建的思想就要比奴隶社会的思想进步。在奴隶社会时，把奴隶劳动者当牛马工具，而孔子却承认了劳动者的人的地位，虽然只承认他们是“小人”，但总算是有点进步作用的，这种思想对奴隶制度多少起了一种解放的作用。但就现在看来，孔子的思想是完全反动的，现在把劳动者看成小人就完全不行了，劳动者不但不是小人，而且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产业劳动者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从前的大人、君子、老爷、地主，现在却要被打倒。在今天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宣传劳动者是小人，剥削者是大人君子，像孔子一样了。在现在，孔子的思想只是反映反动阶级的物质生活要求，只有蒋介石、陈立夫这些最反动的人才要提倡类似孔子的封建思想,想用这种思想来影响人民群众,想强迫人民群众相信封建官僚的等级制度，想要使人民甘心做一个小人，而把他们反动统治阶级看做老爷、大人，这样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斗争性，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时期，也是有进步作用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进步的。因为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要求发展工商业，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时没有别的思想比它更进步。在现在的世界上，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落后的甚至于反动的了；帝国

主义、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有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例如孙中山的思想）也是如此，但比起工人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来，又是落后的了，它在现在已经不能独立地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改造社会的作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必须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发挥其一定进步的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阶段，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虽然不能像反动派思想一样的要绝对禁止它的宣传，但也必须要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加以必要的批判，使资产阶级的发财思想不至于违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原则。至于在共产党内，在工人阶级队伍内，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的影响，例如反对个人发财思想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目的还在前面，我们将来还要带领群众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去。我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允许在工作中有资产阶级的个人发财思想；假如有这种思想，会使我们失去领导作用、带头作用。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最后要使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而今天的世界也是一个条条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世界；所以今天最进步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来做工作，才能推动革命前进。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如果在革命领导队伍中发展起来，是会妨害革命前进的，如果参加做革命工作的人有了这些思想，就必须自己进行思想改造。

以上是讲关于思想意识对于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

三、社会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根据前一节所讲的道理，我们就可以了解，反动阶级一定要

宣传反动思想来影响人民，也就是在思想上来压迫人民，并由此来阻碍社会的进步。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要推翻反动剥削阶级，也就不能不在思想上与反动阶级进行斗争。没有思想斗争行不行呢？没有思想斗争则阶级斗争就不能展开。如果被压迫阶级的广大群众不能脱离反动统治者思想上的影响和压迫，就不能成为觉悟的阶级，就不会懂得应该起来和如何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进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农民就会以为自己是天生的小人，是命该服从地主阶级和依靠地主阶级的，这样的农民群众就不会起来为土地改革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群众所以能够起来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经过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启发和领导，已经有了觉悟，他们已不再相信地主是天生的比自己高一等并且有权利压迫农民的人了，是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亲身体验到不是不劳而食的地主阶级比农民高一等，而是劳动的农民比地主阶级高一等。不觉悟的农民认为是地主养活农民，农民要依靠地主阶级才能生存，在土地改革斗争中的农民的思想却翻了身，他们懂得不是地主养活农民，而恰恰是农民养活地主；不是农民要依靠地主生活，而在实际上是地主依靠农民生活。这样，觉悟的农民在思想上把地主阶级的地位看得比较低了，然后才有勇气起来斗争。所以在进行大规模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前，总先有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斗争的阶段，如新文化运动或思想改造运动等。这个思想斗争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的人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从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在进步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认识到自己阶级的地位和任务，并在这认识的基础上组织和动员起来，为反对旧的反动统治和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革命人民的统治和

新的生产方式而斗争。进步思想的伟大作用，就在于它能动员和组织群众，使他们起来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物质生活条件向前发展。所以每当历史上展开一次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前，总要先有一个思想斗争或文化运动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成为革命运动的思想准备时期。我们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出现之前，就有一个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思想上、文化上的阶级斗争。那时的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大成绩，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战胜了两方面的旧思想:一方面是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思想,那时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前很多人（包括读书人与许多群众）是尊崇孔子的，五四之后，则除了反动的统治者之外，就没有人要把孔子当作“万世师表”了。另一方面是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斗争的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对胡适的争论。胡适提倡实验主义，那是从美国资产阶级学来的。实验主义是什么？实验主义又叫做实用主义，主张眼前有用的就是对的，因此主张研究眼前的一个一个的问题，反对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反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它要使人的眼睛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注意将来的发展，在实际上也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去看到共产主义的前途；这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李大钊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当时很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跟着李大钊同志走。所以五四时代的文化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对封建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斗争的表现。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使一些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觉悟起来，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斗争，进一步领导农民及全国人民

进行革命斗争。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文化斗争作思想准备，则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推动起来。当然，思想文化斗争也是以物质上的阶级斗争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五四以前中国已经有了工人阶级，并且已经有了一些斗争，但范围不大，目标不明确，组织不坚强；而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人阶级的斗争才有了很大的发展，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阶级了。任何时候，要推动革命斗争前进开展，并使斗争走上自觉的方向，以便达到解决革命任务的目的，就必须首先有一个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作为准备，这是一定的规律。像我们现在，已经推翻了反动派在大陆上的统治，今后除了还要继续肃清国内反动势力残余和反对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外，主要任务就是要建设新国家，要发展经济文化，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也要在思想上作一个准备。现在各处的学习运动就是这个准备，就是为着进一步建设新中国而进行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我们在政治上虽然已经打倒了反动派，但许多人脑子里的反动派影响还没有完全被打倒，许多人在思想上仍旧常常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压迫；我们要学习，就是要使自己从这种思想压迫中解放出来。当然，除了反动思想的压迫和影响之外，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以至于农民的落后思想等等也是我们进步的障碍，必须加以纠正和改造。毛主席常讲的思想“包袱”，就是指各种思想压迫，各种非工人阶级的落后思想与反动思想压在我们脑子里的很重的担子。我们要丢包袱，也就是要在思想上推翻反动思想的压迫和排除其他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如封建的官僚等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个人发财思想，落后农民的狭隘思想，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是我们应该丢掉的思想包袱，如果这思想包袱丢掉了，

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出来了，阶级觉悟提高了，则我们就能够在工作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就可能把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学完这一课以后就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思想，究竟有没有什么包袱压迫着我们。消极、闹情绪、不努力工作……都是因为思想上受着压迫，振作不起来。觉悟的工人阶级是积极的、前进的、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在任何时候都是朝气勃勃，充满信心决心，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我们如果缺少这种思想，就表明我们的工人阶级思想是受了压迫，抬不起头来。这样就应该在思想上进行检讨。工人阶级创造新世界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是很伟大的，是过去任何时代的劳动人民都不能比的。因此工人阶级的精神，应该是对一切都有信心，应该相信无论前面有什么困难，只要自己团结和努力，一定会有前途，一定能进步。有些人感觉自己不行，认为努力也是白费力气，他自己并没有病倒在床上，也能看书，做工作，但却没有信心。这是为什么呢？有了这种思想就值得检讨，因为这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农民的保守思想的表现，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的表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有这种保守性和落后性，是因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个体的分散的小生产者，缺少工人阶级的集体的强大力量，在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的时候，对于斗争中的一定困难条件常常无力克服，而免不了要失去自信。工人阶级的“调皮”，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表现着他们集体的力量，他们斗争的自信力，表现着它比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更坚强的地方。工人阶级的调皮，正是它的长处，如果你善于发挥它的调皮劲，引导它向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去进行斗争，就会成为了不起的力量。中国农民之所以能组织成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就是由于“调皮”的工人阶级去领导了他们的缘故，否则农民是不会发挥出这样无敌的力量的。有了共产党带头，农

民组织起来，农民的自信力也就变得无限大了，农民的力量也就会变成惊天动地的了。有些同志做了好多年的工作，经历了多少艰苦的斗争，现在却忽然又觉得自己不行了，这就是农民的思想多多少少又抬头了的缘故。过去为什么能够克服许多困难做了许多的革命工作呢？因为个人依靠了集体，在工人阶级，即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所以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发挥伟大的作用。现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了新的困难，忽然失去了自信，那就是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又在自己脑子中失去领导作用了。所以就要重新检讨一下，提高自己的觉悟，丢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袱，建立起完全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我们学习的信心也就会加强，工作也就会更加努力。这就是说，思想提高了，也会推动物质力量向前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在学习中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以便准备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善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工人阶级将来的新的工作很多，斗争任务很大，我们不仅要把中国搞好，还要配合各国工人阶级把全世界搞好，现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希望也是很大的，1949 年亚澳工会会议之所以要在我们中国的首都北京召开，就是希望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负一些帮助和领导责任。工人阶级应该看到自己的这个伟大的责任，并为着能够担负这任务，起来努力学习、积极斗争。

四、关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

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主要的是在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由不自觉（或不觉悟）的工人阶级到自觉（或觉悟）的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受了落后的、反动的阶级的影响，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不懂得自己斗争的目

标和斗争的道路，这就是不自觉的工人阶级。自觉的工人阶级，是要把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影响和压迫推翻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的指导，才能够形成起来。这种思想是集体主义的，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前途，懂得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不仅看到现在的利益，而且要看到将来的利益。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使我们的眼光远大，就要认识到集体的力量，而增强自己的自信力；就要不怕困难，相信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就要能够看到将来而不去仅只计较眼前的利益；眼前的利益固也应该适当照顾，但必须服从而不违背完成远大任务的需要。不要为着眼前的个人问题闹情绪。闹情绪的人，如果一旦思想进步了，觉悟提高了，回头想一想，一定会觉得以前的自己实在很愚蠢、很可笑、很糊涂，仿佛就像小孩为了一块糖要吵架一样。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并不是随便一个工人都能起领导作用，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提高觉悟，就不能起领导作用。只有觉悟的工人阶级才能做领导者。欧洲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许多工人是不觉悟的，特别是他的领导者，他们就不但不能领导革命，反而被资产阶级领导去了，如像英国工党的艾德礼，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者，也是指的觉悟的工人阶级。有些同志想不通，不相信工人阶级可以做政权的领导者，那是因为他不懂得工人阶级领导的意思。因为他只看到一小部分落后的、不觉悟的工人。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中国最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的组织，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不能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怀疑，就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这一个最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是不能分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党即共产党来实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的马列

主义思想的指导，所以是最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党。因为我们的党的觉悟高，所以就能领导其他的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甚至于起义过来的过去反动阶级中的人物。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开得好?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严格掌握马列主义的原则，在我们的最低政治纲领基础上提高了其他阶级。总之，我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是否能成为领导者，就要看我们是否能把自己的觉悟提高，是否能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并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学了这一课以后，就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自己是否能称得起这样一种觉悟的能在领导地位上称职的工人阶级。我们要检讨一下，自己是否真能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自己有没有什么思想是受了反动的或落后思想的影响，并因此阻碍了自己的觉悟。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界线在自己的头脑里划分清楚，要作思想斗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因为顾虑面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妨碍批评的展开。要了解批评是向反动或落后的思想斗争，不是对哪一个人作斗争。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某一个人搞垮台，而是要打倒思想上的敌人。再说一遍：批评正是要打倒敌人，不是要打倒自己，顾虑面子问题的人，就是实际上把自己站在落后的、反动的地位上，就是在思想上帮助了落后的或反动的阶级。所以，我们对于错误思想，要像对敌人一样的仇恨，要不能忍耐，不要保守它、遮盖它，而要揭发它、反对它。只有反动派才希望我们保守错误，高兴我们把错误遮盖起来，我们只有深刻的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检讨批评，才能使自己进步，才能提高自己的觉悟，才能使我们当得起革命领导者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学习这一课的主要任务。

附录一：

第一讲问题解答

今天解答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学习方法；二、从猿到人；三、宗教迷信。

一、学习方法

有些同志对学习方法还搞不清，觉得联系实际没把握，让我进一步讲讲。

根据这两天讨论情形来看，大家在基本上是摸到门路了，比如一般都把过去工作中间的缺点讲出一些来，有的对自己思想还作了些批评。特别是大多数人都注意联系到群众观点的问题。这样做下去，会一天比一天做得好，对于学习方法会逐渐有把握的。但也有少数人不采用这种方法，不联系思想的实际问题，专门想去研究猿猴是怎样来的，这就不对。研究马列主义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研究 50 万年前的事情，也一样是为了解决现在问题，这是必须要认清楚的。

怎样联系实际?就是应用理论原则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怎样研究和解决？主要的有两条：第一，把理论原则当作我们研究的方向，必须坚持这样的方向，不能动摇；第二，再分析一下自己的实际经验，自己的思想，拿来和理论原则加以比较、检讨，看看是否符合理论原则的方向。如果它是与理论原则的方向一致，就是对的；如果不一致，那我们就得注意是有了什么毛病，就要考虑为什么不一致和怎样才能使之一致。理论与实际联系，并没有

什么奥妙，就是在理论原则的指导之下来检讨实际。大家在讨论群众路线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教员讲的道理我懂得，但碰到具体问题就想不通。"这种说法，就与我们刚才讲过的把理论原则当作我们研究的方向这一条不符合，就是不懂得必须坚持这个方向。要把原则变成实际，的确是有许多具体的困难，比如我们执行政策要说服工人，这就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是说，因为困难就放弃原则、就不要原则了呢？不是的。遇到困难，应该想办法解决。不能说服工人，并不是原则不应坚持，而是不善于坚持原则。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方法太简单了？是不是因为自己基本上不相信工人能懂道理，因此就不肯认真想办法去说服？是不是还可以想一些别的办法去说服？说服不了工人，一般说来，常常是由于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不善于依照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具体方法去说服。过去既然遇到了这种说服不了工人的困难，而不能解决，今天来学习，就要想想：这种困难，是不是还可以想一些别的方法解决？我们要多想一想，按照理论原则多想一想，务必想出一些能与理论原则一致而又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具体解决办法。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要用心多想、苦想，要开动机器。做工作没有办法，常常是因为我们想的不够，只要多想、苦想，许多问题是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的。这两天讨论中有些例子，也可以证明，比如天津电信局，在津郊发水的时候，工人要求早发工资，局里照发了。可是发工资后的第二天物价忽然上涨，工人要求补发亏欠。工会为难了，因为要补发，行政上财政方面是有困难的。和行政上商量，行政上意见与工人意见不同，工会更为难了。当初害怕和工人去讲，但不讲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被迫着和工人解释：这不单是电信局的问题，电信局补发，全天津各部门都要补发，财政负担很困难。这样把要不要补

发的问题，摆出来让工人们自己讨论。结果工人经过讨论，自己让步，问题解决了。这是明显的例证，工人是懂得道理的，只要相信工人，启发工人自己的自觉，是可以通过工人群众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又比如上海初解放后，有的工厂，发生特务鼓动罢工的事，在反动派统治下罢工是好事情，但解放后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主动停了两天工，让群众去讨论：在自己的政权下要不要罢工？结果，特务的阴谋被揭穿了，问题解决了，虽然暂时妨害了两天生产，但是解决了长久的问题。根据大家在讨论中讲出来的这些例子，就可以知道，只要认真坚持群众路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群众路线，做起来似乎有很多麻烦，但是，如果不走群众路线，那麻烦就更大。一件事情，经过群众路线，虽然有困难，但可以解决，不经过群众路线，就会造成错误，甚至于引向失败，那不是更麻烦吗？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理论原则的方向，想尽一切办法务必使我们的工作不违背这个方向。自然，要想使每一件具体工作都做得百分之百跟理论原则一致，是很困难的，在有些具体情形下，需要有若干的灵活性，但原则的灵活应用，其目的仍然是为要使原则能够贯彻，而不是放弃原则。比如有人提出来："我们的政策群众一时不能接受，怎样也说不服群众，那时怎么办？"如果事情不很急，不是立刻发生很大危害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容许有一条：就是等待群众。等待群众是不是尾巴主义？不一定。尾巴主义是无条件的跟着群众的一时的不正确的要求走。等待群众，是要坚持我们一定的对群众真正有利的主张，把话说到头里，告诉群众，如果不按照我们的主张做，是会吃亏的，可是群众不肯听，那就等待一下，只要我们的主张是真正于群众有利的，那么，群众迟早都会觉悟，会终于相信我们的主张，而我们

的威信就更可以提高。在我们工作中，有许多是属于这种情形。但是，如果事情很紧急，比如战争性质的问题，有时也免不了用命令解决，但也必须想办法使群众很快明白。而如果平时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任务又处理得很公平，那么，战争情况下的命令，群众是一定容易了解和接受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但这样的灵活性，并不等于放弃群众路线的原则。所以，对于具体的问题，要多用脑子，才会想出适当的办法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多想、苦想”，也是这个意思。学习是艰苦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就这样讲：学习像爬山一样，只有不怕一切跋涉的艰苦的人，才能爬到最高的顶点。经验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不肯多想，要克服经验主义，必须多想、苦想。我们在这里讲课，只能把原则——群众路线——告诉大家，如何在具体问题上坚持原则，就要大家自己来想；教员讲，大家想，是学习的两个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自己多想、苦想，根据理论原则的方向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某些具体问题。学习不要贪多，正如刘子久同志曾指示大家的，只要真正想出办法来解决了个把两个自己的具体的困难问题，就算有了成绩。一切问题只要经过苦想，是一定可以解决的。不要想了两下想不通，就灰心了，要再接再厉地想，一直到想通为止。坚持原则，是学习的秘诀。原则懂了，不只是嘴上接受了，耳朵接受了，而且要变成行动，也就是要经过苦想来解决具体问题，这才是做革命工作的精神。我们在学习中决不要忘记了这种精神。二万五千里长征，吃草，吃树皮，也要坚持，坚持走到陕北，革命还是重新又发展了。革命者就不能向困难低头，学习也不能向困难低头，如果你要低头了，那你只好休息，只好放弃革命工作。向困难低头，提到原则上来讲，就是政治动摇，学习时向困难低头，也是政治动摇。历史上好多困难

我们都克服了，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反而低了头，那就太不珍重过去千辛万苦的历史了！

二、从猿到人

学习从猿到人，着重要了解劳动创造人的道理，了解这道理，是为要使我们认识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在于能制造工具，在于劳动生产。这一个认识，联系到我们今天实际任务，就有两点意义：前天也讲到的，首先就是要使我们对人的来源获得科学的了解，以便有理由来打破工人中的迷信命运思想。此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我们知道重视劳动。在我们工人中也有某些落后思想，有的工人自己是工人，可是轻视工人，轻视劳动。轻视工人是资本家的观点。人之所以能脱离禽兽范围，就因为劳动，在工人中间要宣传这种思想，知道劳动重要，使工人看得起自己的劳动。据说曾有人对工人讲："你要好好学社会发展史，不然，你要永远做工人。"这是完全错误的。工人学了社会发展史，如果不愿做工人了，那就是学习的大大失败！那除非是学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社会发展史。工人学了社会发展史，应该更愿做工人。因为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阶级，是创造新世界的领导阶级，作为觉悟的工人阶级，是很光荣的。有人说："我有儿子，一定不让他做工人，而要让他做工程师。"做工程师并不是坏事，工人努力学习技术，以至于能做工程师，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说这话的人，他的思想里包含着轻视劳动、轻视工人的思想，把工程师看作比劳动者高贵的人物，而把做劳动者当作可耻的事情，这样的思想是要批评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一直到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统一起来，那时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成为工程师，而每一个工程师，同时也兼

做劳动者。我们的理想应该是要使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劳动者，而不是仅仅做一个脱离劳动和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贵族式的知识分子。

三、宗教迷信问题

有些工人中间的迷信，一时要想说服是不容易的，这是事实，思想的改造有时比物质的改造还不容易；消灭宗教迷信，是我们的方向，但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工作，不能心急，不要认为学完了社会发展史，回到工厂，把工人召集起来，讲一个早晨劳动创造人，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宗教迷信是由于旧社会工人的困苦绝望的条件之下产生的，这种困苦绝望的条件使他们容易相信自己生来命苦的迷信说法，这种条件不改变，工人就不容易从宗教迷信思想之下彻底解放出来，在新社会下，这个条件就容易消灭，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方向，适当进行教育，就一定可以逐步消除迷信。

有些好像是真的神鬼的事情，仔细研究，都可以发现它是假的，是有人搞鬼的。陕北红鞋女妖精的故事，是大家可能也听到过的事情，最初老百姓都以为真有鬼，经调查，才知道是“二流子”搞的鬼。有人说：“某炭矿发水，有十几个工人在坑里住了40天，没出井，又没有死，据他们自己说是老君爷保护每天给了馒头吃。”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炭矿主搞的鬼。矿主害怕工人追问矿井装备不善的责任，为了推卸他的责任，并且为了使工人相信他的矿井里有老君爷保护，以后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进矿井，因此就想出这一套欺骗工人的办法，打发一个人假装成老君，黑暗中给工人送送饭。矿主为什么不公开给那工人送饭呢？因为这样搞鬼，对他们更有利些；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有，那一定是他们搞鬼

的。即使不是如我所估计的用送饭的办法，也一定有其他办法。自然，他们之所以能搞鬼，首先还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容易迷信鬼神，剥削者不过是利用了工人生活和思想中的这种缺点罢了。总之，我们要善于分析问题，站在阶级立场上去分析问题，迷信问题也是一样，站在阶级立场上去分析，仔细想，就能想通了。自己想通了，然后去教育工人，配合着实际的斗争，使工人在物质生活上得到解放，就容易解决问题了。

附录二：

关于理论学习总结

各位同学！我在这里已讲了好几个礼拜，大家各人都做了学习总结，现在又要由我来最后讲一讲了。我因为没在这里直接参加大家的学习，所以也不能作出很具体的总结。只能就我所想到的问题来谈一谈。

我准备讲四个问题：一、对总结的一般估计；二、学习理论课的主要成绩；三、几点经验；四、存在的问题。

一、对总结的一般估计

我很同意方才王向升同志所讲，这一次大家的讲话，一般说来是很好的。大家根据两个月的所学，集中检讨一下自己的思想，解决了很多问题，有些人的问题解决的还很彻底。大家都很认真、积极、老实、坦白，因此一般的检讨都很深刻。有的人认为把多年来未放下的包袱放下了，甚至有的人认为经过像整风、整党这样大的运动没放下来的包袱，这次都放下了。这说明成绩很大。当

然这绝不是说过去整风、整党做得不好，而是说经过整风、整党，有了经验，有了那样的基础，才有我们今天进一步的成绩。在整风、整党时解决了一些问题，这次则进一步解决了更多的问题。所以这次总结，一般说，许多老同志检讨的比较更深刻，因为他们有工作经验，有些人又有整风、整党的基础。其他新同志和地下工作的同志也都是很认真、很坦白地来做这次思想总结，有许多人也做了深刻的检讨。

获得这样成绩的原因，主要的是因为大家认清楚了一点：总结思想就是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就把总结当作一件负责的工作、一个严肃的斗争，也和我们做学校外的许多斗争工作一样，认真的来搞，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当成敌人，因此就有勇气来揭发这些错误的思想。大家都了解，揭发旧思想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那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那种思想存在于我的脑里，不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那表示我们思想上受旧的反动阶级的压迫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拖累，还未解放。如果我们不揭发，而把这些旧思想隐蔽起来，不对它斗争，就等于帮助敌人，就是甘心受压迫，不愿意自己翻身，甘心落后，不愿前进。我们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所以这次大家都比较有勇气，没有顾忌，坦白、老实地把错误的思想揭发出来了，因此也才能比较深刻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还有个别的人没能很好的检讨，希望根据这一认识，想通道理，积极检讨。还有一些人认为现在把缺点全都暴露了，怕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上去见不得人。如果有这种顾虑，也表示认识不够。揭发了错误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恰恰相反，揭发了错误才好见人，才是最有面子的；因为你纠正了缺点，包袱都放下了，这些缺点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如果不放下包袱，仍旧带着满身缺点回去，才

是真正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你就这样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上去，人家就会说你枉自进了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白吃了好几个月人民的小米，出来还是老样子。你自己或者以为戴了假面具，似乎很漂亮了，其实人家全看得出来，觉得那真是丑得很。所以讲了自己很多缺点的人，毫无理由顾虑在将来被人看不起，只有理由相信工作会更好做，会更被人尊重，情形会与所顾虑的恰好相反。

我对总结的一般估计就是如此。

二、学习理论课的主要成绩

我们学习理论的最主要的成绩是什么?我想一句话可以说明，那就是：睁开了工人阶级的眼睛。我们是工人阶级，但在从前许多人的本阶级的眼睛是闭着的，或没有完全睁开的，现在开始睁开了。许多人从前做工作往往是瞎做，是闭着眼睛或半闭着眼睛乱干的。从个人的学习总结和“学习报”上，可以看到我们大家是觉悟到了这一点。

过去自己参加革命，主观上自以为所做的事情都是革命的，但自己所想的那种革命，并不真正是工人阶级所要求的革命，而是工人阶级以外的人所想像的“革命”。比如有人以为革命仅仅是分土地，把土地分了就完了；有人以为革命就等于中国旧小说上的打抱不平，是豪杰人物对穷人的恩赐行为；有人认为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但反了以后又怎么办，就不知道了；也有人以为革命是为了个人找出路，为了自己可以爬高些。这各式各样对革命的想法都是不对的，都不是工人阶级的想法。这就是说，我们以工人阶级的资格参加革命，却不晓得或不完全晓得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应该担负的任务是什么。既不了解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因此对工作中的正确与错误，也就分不

清楚，工作做对了，不知为什么对，错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错。工作做对了，就在自己身上背上了英雄的包袱，以为工作的成绩的获得全是凭个人的聪明、本领，以为全是个人的功劳，因此，革命得到了胜利，就一定要计算着得多少报酬、多少享受，这一点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不高兴了。工作做错了，就认为不是自己个人的责任，而是别人的责任，或“客观困难”所造成，不肯从自己的认识上来检讨问题。这些情形，都表示对革命工作是闭着眼睛或没有完全睁开眼睛干的；为什么革命，为什么做对了或错了，都看不清楚。我说有些人是闭着眼睛瞎干，是不是批评得太尖锐了？是不是还会有人提出抗议，说：我的两个眼睛明明睁着，为什么说瞎干？是的，你的肉体的眼睛是睁着，但工人阶级的眼睛、阶级思想的眼睛却是闭着的，或没有完全睁开的。用社会科学上的名词来说，这就叫做工作的“盲目性”，用日常通俗的名词来说，就叫“瞎干”，都是一样。我的批评，绝不能说是太尖锐，绝不能说不是事实。总之，你们的工人阶级的思想眼睛，是经过了两个月的学习，才开始好好睁开来了的，从前也睁着一些思想的眼睛，但常常不是工人阶级的，其中也有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甚至于也有近乎地主阶级的眼睛。现在这些非工人阶级的眼睛开始闭下了，包袱丢了，工人阶级的眼睛比较充分地睁开了。这就是说，现在比较清楚地知道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是什么，知道革命是为了推翻旧的反动的统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统治；是为了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更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是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知道这些了。从前对这些思想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也常常听到甚至也常常谈到。但是没有变成自己的具体的思想，碰到具体的问题时又忘了；嘴上一般讲讲时好像也很有工人阶级的眼光，

碰到具体问题时，又往往用非工人阶级的眼光去了解，而工人阶级的眼光又很微弱了。现在，经过理论学习，就有可能把从前只是听到或一般谈到的东西，变成为自己的具体的思想，变成观察具体问题的真实的眼睛。这就叫有了觉悟或“自觉性”。学习了两个多月的马列主义理论，就由闭着眼睛的工人阶级变为睁开眼睛的工人阶级，也就是社会科学所说的，由“盲目”到“自觉”，也叫做由“自在”发展成为“自为”。不学马列主义，不学历史唯物主义，工人阶级是不会成为自觉的阶级的。

我们以后学习职工运动史，就会知道，在未有马克思主义以前，工人已有过组织，也有过斗争，但那时的工人阶级只能算是“自在”的阶级。在斗争的时候不知要对谁斗争。自己生活苦，以为是机器压迫的结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到是资产阶级压迫的结果。唱起歌来也是：“机器喝我们的血”，不晓得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喝自己的血，因此就把斗争的目标放在机器上，而不知道打倒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不能够清楚懂得自己的斗争任务以及斗争方法，这就是自在的、不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特点。有斗争、有组织，但没有马列主义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革命斗争的前途，就停止在自在的阶段。有了马列主义指导，懂得要打倒哪些人，自己要走什么前途，同时在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党）领导之下走向这个前途，这样工人阶级就成“自为”的自觉的了。

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从整个来说可以算是自觉性很高的阶级，因为我们工人阶级中间已产生了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我们有了毛主席的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我们党在毛主席指导下做工作，党又带领着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样就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对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领导。像欧洲的社会民主

党的右派领袖以及英国工党领袖一流的人，用改良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来影响工人阶级，这就会阻碍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性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则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马列主义指导，因此能够发挥阶级的自觉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个人来说，许多人对马列主义的知识还是很差的，但因为领导我们的党中央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因之我们做工作就常常可以获得相当的成绩。所以如果我们干部以为做工作有成绩全是由于个人的聪明能力，那就错了。我们工作之所以有成绩，是由于我们工作时能服从党的指导，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使我们不会犯太严重的错误的缘故。成绩主要是由于正确的马列主义指导的结果，绝不是自己个人的。如果离开了正确的指导，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工作，哪里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我们仔细检查一下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一定可以发现那是由于我们在某些地方违背了党的马列主义的指导。总之，工人阶级要与马列主义结合，才能变为自觉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所以就有很高的自觉性，这自然是就整个阶级来讲的，如果就各个干部或党员来说，则又是另一问题，各个干部或党员在做工作的时候，仍常常犯盲目性的毛病，因为各个干部或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一般还是很低，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工农干部，或者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如此。有些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只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以为自己懂得了不少马列主义了，那是骗自己的，这样的人做起工作来的时候，仍然常常不是依照马列主义，而是依照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或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来瞎干的。所以应该认识到中国整个工人阶级虽是自觉的，但许多人自己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则很低，自觉性仍是不够的，所以要很好的学习。经过这两个月的学习，大家思想上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看问题的眼光

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前有些包袱很不愿意放弃，放了就像割肉一样的疼，现在则能够很轻松的放下了；这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就是由盲目转到自觉了。经过两个月学习，我们已经比较会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看革命、看自己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这也要经过许多思想的阶级斗争，经过了痛苦，有的人还流了眼泪，才能有今天的成绩。现在大家已经比较会使用工人阶级的眼光来看革命和自己了。但是应该认识，我们现在只是开始睁开了工人阶级的眼睛，开始清楚地看到了一些东西，这比起以前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个突变，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还是不够的。例如有人顾虑怕将来见不得人，这就证明眼睛睁得不够亮，如果有了充分自觉，便不会还有这样的顾虑了。同时也还有个别的人，包袱还没有放下，这也说明还没有达到阶级的自觉。

马列主义本来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完全学好的，目前只能要求初步学好，思想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都完全解决，有了这样一个成绩，总算不错了，不过不能因此自满罢了。

三、几 点 经 验

首先，由这次思想总结当中，也可以证明工人阶级必须有马列主义理论指导，才能成为领导阶级，才能在思想上工作上走在前面，才不至于落后。

我们以前做工作，多少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上了。但我们是否称职？是否能在组织上、行动上、思想上，真够称为一个领导者，能走在人民前面了呢？经过这次理论学习，大家承认过去的工作多半是不称职的。因为作为领导者应该有的马列主义知识在我们是很不够的，因此在做工作的时候就常常表现盲目性，并因此给人民和工人阶级带来许多损失。比如上级的政策传达下来了，上

级的政策是马列主义的，可是自己没有马列主义思想，就不能很好领会，因而也不能很好的具体执行。这样，我们就不能在工作中走在群众前面，而常常还要落在群众后面。是什么在拖着我们，使我们落后了呢？最主要的是思想中存着非无产阶级的包袱，压迫得我们不能轻快的走路。为什么落后？就是负担重、包袱多、跑不动。因此在学习当中，凡是丢包袱快的，迅速拿起马列主义武器来的，就走得快，就在学习中走在前面。有的老干部的“功劳”包袱压得重，但借着理论学习提高了觉悟，把包袱一丢开，来个典型报告，就成为学习中的领导人，把大家带着前进了。地下工作的、新参加的干部也是这样，丢开了包袱，就站起来了，跑到了前面。丢了包袱，拿起马列主义，情绪饱满地走在前面的人，在班上或小组上立刻成为积极分子，威信就有了，受到大家的尊重。将来到工作岗位上也是这样。包袱在背上，工作一定做不好，被领导的人一定不高兴你，你想提高地位，结果反而可能垮台。所以，我们要把这经验好好记住！在工作中好好运用！这是第一。

其次，我们对非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一定要勇敢、认真、老实。不这样，就搞不好，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的。

在思想总结中可以看出，对自己缺点、错误毫无顾虑地揭发批评的，就搞得较好；相反，就会失败。总结中少数人有两种偏向：（一）对缺点过分夸大。为了表现自己进步，缺点本来是五分，而说成十分，本来是戴一个帽子就合适了，却戴了三个；这似乎是很勇敢，其实叫做不老实。尽管自己戴的帽子多，其实只有一个帽子：表现自己。这样，自己会搞得糊里糊涂，不知真正缺点在什么地方，而别人也莫名其妙，这怎么能进步！所以，检查思想，不要不彻底，也不要超过事实，而要恰如其分。过分夸大，就等于借表面的勇敢检讨来掩盖自己的缺点，并不能真正克服缺点。

这是一种偏向。（二）另一种偏向是推脱责任。承认一些毛病，但不去从思想上很好地分析原因,单纯地把原因推到客观环境上去。未学习以前，许多同志喜欢用推脱法，怪这个怪那个，就只是不肯去怪思想的敌人，总说“客观环境不好，我才有许多错误”。做革命工作的人，是否应该希望“客观环境好些”？当然不应该。我们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客观环境不好，如果环境好了，还用着什么革命工作者呢？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要将不好的客观环境改变为好的客观环境。克服困难，打破不好的客观环境，乃是革命者分内的任务。一个有充分革命精神的人，不应该说自己的一切失败、错误，都是由于客观环境不好。说了这个话，就失去了革命者的光荣身份，就没有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气味，这就是在困难面前屈服，就是在思想上向敌人投降。所以，做革命工作的人，工作做坏了，绝不能完全推到客观环境上去。客观困难是不是需要考虑？当然是需要考虑的。但考虑困难绝不是为了找出理由来原谅我们工作的错误，而只是为了看清楚斗争的任务。革命工作者绝不能向任何困难低头，相反，一定要向困难作坚决斗争，一定要解决困难问题。我们要学斯大林，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他总是在最危险的战线上工作，什么地方最困难，他就到什么地方去，伏罗希洛夫有篇文章，就说到斯大林的这个特点：“在相当平静了的和安宁了的地方，在我们有了成功的地方，这些地方就看不到斯大林。但是在因为许多原因损坏了红军的地方，在反革命的力量发展成功，威胁苏维埃政权本身的地方，在骚动和慌乱随时能够变成惨局和灾祸的地方，那里就出现了斯大林。”我们也要学毛主席，毛主席也是善于在革命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和环境最恶劣的地方挺身出来坚持领导斗争，并且能坚决克服困难和打破恶劣环境，把局面根本扭转过来的。

同志们！斯大林、毛主席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必须向我们的领袖学习！我们应该想一想，就算过去我们在客观上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哪一样困难能够比得上斯大林、毛主席所经历过的那些困难呢。比起我们领袖所经历和克服的困难来，我们所遇到过的困难简直渺小得很，简直是值不得提起了！所以，如果自己是要决心永远做一个革命者，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如果自己还愿意长久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员的光荣称号，就不应该把客观环境困难的问题作为推脱责任的口实，就不应该向困难低头。我们工人阶级，不是什么别的阶级，而且我们还是工人阶级中的先锋队伍。中国伟大的革命是我们领导的，我们要创造新的中国，要推翻世界帝国主义，要做很大的事业，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光荣称号不是随便可以获得的，向困难低头，就没有资格承受这个光荣称号。由此可见，喜欢推脱责任的这种恶习惯，必须坚决地打破它。这是第二。

第三，检查思想，是我们革命工作者、觉悟的工人阶级的经常工作。我们作总结，仅是用两三个礼拜将过去的旧思想突击一下，打掉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但不能这样想：两三个礼拜就能非常彻底解决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把检查思想作为经常工作，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一些老同志，经过整风、整党，今天还有思想问题。这绝不是说整风、整党没有伟大的成绩，因为很明显，没有整风、整党运动，就不可能有几年来革命的胜利。整风、整党运动会将全党思想统一起来了，使全党能够严格地按照毛主席思想指导做工作。使全党在革命斗争中步调一致，领导着中国人民发挥伟大的力量，迅速打败敌人，得到今天的胜利。整风、整党，有的地方做得有些缺点，但那是次要问题，不能因此就把它的空前伟大作用也忘记了。经过了这样伟大的整风、整党运动的人，现在来学习，仍然发现还有些思想

问题。这并不是说从前整风、整党中毫无进步，而只是证明，检查思想，是需要经常做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使我们的阶级不断进步。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干部要“天天洗脸”，因为每天出去做工作，脸上总会带来一些灰尘的，所以要天天洗一下。这当然不是说要我们天天检查思想，天天讨论，天天写思想总结，这样干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还要工作；但在工作当中，应该天天注意有没有错误，并且到一定的时候，工作告一段落，就要总结一下，而在总结工作中必须联系到思想问题，把思想较有系统地检查一下，这样的思想检查，在每一个小的工作部门要这样做，大到一国的党的大会，也要这样做。例如联共（布）党就常常是这样做的，每次大会的总结，总要连带讲到一些重要的思想问题，例如有时指出老干部虽然有功劳、有经验，但要注意不要对新事物失去了感觉，不要背包袱；新干部感觉敏锐、积极性大，但要注意自己没有经验，要向老干部学习等等。联共（布）党革命成功已三十多年，这些问题还是要经常提起的。所以，思想检查是应该经常做的，如果有人这样想：“我已经过整风，我又经过了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思想总结，以后思想决没有问题了，以后用不着再检查了。”那就错了。这是第三个经验。

关于几点经验就讲到这里。

四、目前存在的几个思想问题

（一）有的人有顾虑：现在学习虽有了成绩，将来能不能保持？将来碰到具体问题，会不会又离开工人阶级立场？我认为学习的成绩，基本上是能保持的。只要大家能努力，只要大家有决心，一定可以保持学习的成绩，以后在工作中，一定比从前更能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因为经过学习以后，情形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

已有了一套思想的武器，我们脑子里有了新的东西，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知道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原则。以前不懂这些，所以才有盲目性。现在懂了，有了分别是非的标准，盲目性就一定可以减少。以前做工作有些错误，有许多错误是无意识犯的，有些是明知故犯的；例如做工作只知道单纯为工人谋福利，以及不按群众路线办事等等，都是无意识的盲目性的毛病，这就是由于不懂马列主义原则，认识不高，所以犯了错误。现在学了理论，就有可能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即使重复了，也有可能很快发觉，不致弄得比较严重。又例如有许多个人打算，是明知不对，有意识去做的，那也是因为认识不高，虽然知道不对，但不能深刻认识这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有多远，思想认识提高了，也有可能克服的。现在，我们学习了理论，有了一套分清是非的标准，我们就应该有这种信心，来在以后保持学习的成绩，人的思想真正改变了，行动也就会有改变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后就一点错误都不会犯了，一点也不会有动摇了。错误，动摇，仍然会可能发生的，人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学习也是没有止境的；现在的学习解决了我们许多的问题，将来在新的复杂的工作环境里，可能又会发生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学习来加以解决。如果有人希望以后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了，希望从今以后就不需要继续学习，而可以绝对地"一劳永逸"了，那倒是怪事，那完全是空想。但是，避免某些严重错误的重复，减少某些动摇，又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因为大家的思想比较提高了。这是从大家的思想总结的情形里可以肯定地得到的结论。我相信大家将来毕业回去，在工作上一定会有新的开展，只要认真做上几件事，群众就会看到你的新的面目，因此工作威信也一定会提高起来。问题还是要自己努力注意减少缺点，避免动摇，其方法，就是不要忘记

我们学过的基本的东西。

为要巩固大家的认识，在这里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如何考虑自己的前途的问题。

不同阶级的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前途和光荣也就不同。例如封建社会被压迫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条件极端困苦，他们渴望着有自己的一块小小的土地，自己的小小的房屋和家庭，自己的牲口和农作工具以及其他生产资料，他们渴望减轻和废除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使自己能顺利地种地生产，一年到头平安地吃饱肚子，穿够衣服。这就是这些农民所理想的前途，就为着要争取到这样的前途，中国农民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并经过土地改革而争取到了自己所渴望的这个前途，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光荣。但是能不能说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前途和光荣也就是这样的呢？我们学了社会发展史，就知道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绝不仅仅是这样的前途和光荣。如果有人羡慕这种前途和光荣，要离开工作，以到乡下去守着一块土地过日子为满足，那他就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是在小农民的观点上来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自然，得到了土地的农民，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小农民的前途，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教育和领导，那么，他们还会希望达到上升为富农的前途，上升为农村资产阶级的前途。工人阶级则绝不能把农民所希望的这些前途当作自己前途。工人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所应该看到的是远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并且要教育农民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跟着自己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所考虑的前途和光荣，也是和工人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指依靠小规模工商业为生活的城市居民，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条件大部分也是

与小资产阶级接近的。在反动统治下面，小资产阶级的作坊、商店经常遭受破产的威胁，知识分子也是处在困苦不自由的境况中，因此他们痛恨反动统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尤其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也是有它们的光荣的。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小资产阶级逐渐经过教育改造也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革命力量，并且有其光荣的前途。但是，有的人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的保守的立场来考虑自己的前途，例如以为只要能成为一个多少繁荣的小商店、小作坊的老板或者用什么方法为个人谋得多少的名誉、地位和利益，就以为能满足自己的理想了。如果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考虑自己的前途，那就不应该存这样的想法。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我们所考虑的前途，是要创造大的工业生产来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能停止于小生产的地位。我们还要以自己先进的地位来领导小资产阶级，使他们能超出小经济的狭隘的限制，并经过合作化的道路，跟着工人阶级也走上远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这种领导，那么，按照它的经济发展的规律，它就有上升为资产阶级或破产而变为无产阶级的前途。资产阶级的前途是什么呢？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根本特点，就是利用自己的资本、利用自己所占来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赚取庞大利润。无限制的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按其阶级本来的特性所要追求的前途。革命队伍中有个别的人到了大城市里，产生了个人赚钱发财的贪欲，以至于用投机贪污等不正当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是受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封建社会没落的时期，是并非腐朽的，是也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才是腐朽的反动派，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有

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民族资产阶级也能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一个力量，而对于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也就间接有些用处。我们不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今天的某些重要作用。但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应该以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呢？恰恰相反，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它的进步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必须自觉到自己的这一个先进的地位，而站在更高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

有些人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一些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的影响。例如专讲资格、闹地位、闹等级问题，而不问对于人民的贡献如何。所谓功臣思想，就是多少与中国的封建官僚思想残余有联系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盘思想，有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前途和光荣的考虑。个别的人说："城市工作没有乡下工作好"，"在乡下可以管一块地方"，"当个区长，就是在万人之上，当县长，就是几十万人之上"。像这些想法，也可以算作我们的"前途"和"光荣"吗？封建地主阶级是反动的没落阶级，封建思想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我们应该和这些思想残余的影响作斗争！还有官僚买办阶级的思想，崇拜帝国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者，以亲近帝国主义分子为荣而不以为耻的思想，也是反动思想，我们中间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按照这种思想来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的，但是，如果发现有这一类思想的任何影响，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由此可知，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前途的时候，常常有各种错误的想法，它成为我们的包袱，阻碍我们的前进。这些错误想法的来源，就是由于受了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要领导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社会，工人阶级把人民的彻底解放的前途作为自己最后的前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最高的光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我们不但自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要领导其他各进步阶级，共同来改造自己，来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的时候，绝不应该使自己受到非工人阶级的观点的影响，相反地要坚持自己的最先进的观点，并要准备用自己的先进观点去影响和教育其他的阶级。要时时注意我们是刚从旧社会解放不久，周围的人们常常会用一些落后意识来包围我们。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你是当了傻瓜，吃了亏，如果你自私自利，他就说你是聪明人，值得称赞。这种落后的人们的观点所看到的前途和光荣，是虚伪的，不稳固的。真正的光荣是为人民服务而得到人民的拥护，人民给予的光荣才是真正的光荣。我们应该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这样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光荣，并准备为此克服一切困难。有些人的心情非常脆弱。工作中遇到一点困难，就以为没有了出路、没有了前途，犯错误受了一点批评，就以为没有了面子、没有了光荣，这些都是缺乏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表现。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无数的困难中经过斗争得来的，正确的认识是要不断地克服错误、虚心学习才能获得。应该准备坚决克服一切错误和一切困难，然后才能争取工人阶级的最远大的前途和最高的光荣。只有这样来考虑问题，才能彻底放下旧的包袱，轻松地去工作和学习。要想在以后保持我们学习的成绩，就应该认真地从这方面去用思想。

（二）关于学习中不善于分析的问题。如何加强分析能力？大家觉得对于许多问题不会分析，感到些困难，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解决的。但经过努力是能够解决的。努力的方法，主要的仍是提高觉悟，仍是学马列主义的问题。立场坚定，是非分明，

就是学会分析问题的基本条件。思想混乱不清，其主要原因之一常常是由于受了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缘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会帮助我们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和肃清非工人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感觉到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思想难于分辨，这就是由于还没有很好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缘故。在这问题上我们自己如果一下子搞不好，也可以请别人帮助批评讨论，经过努力学习，互相批评讨论，是一定可以逐渐把眼光提高，获得更好的分析能力的。总之，这都要经一定时期的努力锻炼，才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

（三）关于业务学习的问题。学了理论后要坚决地来学业务。有困难，拿出勇气来克服。学了理论不学业务不行，理论要具体化才有作用，学理论是为学业务作准备。为什么要有工人运动？为什么工人阶级要团结、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从理论的学习中可以得到了解。有了理论作基础，业务就好学了。理论学习的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工人运动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什么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发展成自为阶级，由不觉悟走向觉悟？为什么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马克思主义？19世纪，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尖锐起来，马克思总结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并用以指导工人运动，使之向前发展，这样工人阶级就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理论学习已告诉了我们这些规律，业务学习中的职工运动史是更具体地说明这些规律。把理论和业务联系起来学习，就会减少一些困难。我想，在学习业务时，可能有两种困难：第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我们有些同志，感到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不够，人名、地名不易记忆，这个困难，经领导方面的指导和同学的互相帮助是可以解决的；第二种是理解上的困难，对

职工运动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规律搞不清。要克服这困难，应当注意“时间、地点、条件”。学苏联职工运动史和世界职工运动史，要经常比较的联系着时间、地点、条件去学习，如俄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工会工作，时间条件不同，发展过程和工作做法就不一样。革命以前，主要的是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变为革命的政治斗争。而革命成功以后，工会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由革命斗争的工会工作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了。学习苏联职工运动史时，对中国工会工作问题，也可以联系着来考虑。我们在解放以前，是进行对敌斗争；解放后，主要的是教育工人发展生产、保卫国家、巩固自己的政权、坚决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和解放以前就不同了。我们有的同志，在解放以后的工作中产生毛病，有时就是由于不知道和解放以前的工作加以分别。学习时，应该注意时间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如何有不同的工作。另外，还有地点条件问题，我们学习苏联职工运动史或者世界职工运动史，苏联同志所讲的是外国的经验，有些是可以采用的，有些却不可以硬搬。如苏联工人运动史上，他们没有劳资两利这个问题，而我们则有。我们要考虑到苏联革命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政权中更没有资产阶级，而我们现阶段的革命则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权中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一些方面就不可机械的搬经验。时时注意“时间、地点、条件”，这样来学习，来理解，就可以减少我们听课中理解上的困难。

以上关于业务学习的意见，仅供大家作参考，我们应该努力的去学习，好像打仗一样，拿出勇气来，学习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学习得很好的，预祝大家的胜利！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

(1950.4、11)

引言——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

全国各地的听众们!

今天我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科学讲座的计划，来给大家解释一些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问题。我所讲的内容，大体上是依照我所写的那一本《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来安排的，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把那个提纲拿来参考一下。按照那提纲的目录，我所讲的也分为五个部分，就是：第一章：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第二章：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章：国家和政治；第五章：社会思想意识。

我打算把每一章都分作三四个小题目来解释，在开始讲第一个题目以前，还需要作一个引言，讲一讲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现在我就开始讲引言。

首先要请大家注意，我们把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作为一

---

* 此系艾思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作的广播稿。1950年4月至7月广播，7月至11月又重播一次。1951年3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初版，1952年8月出第7版，这里用的是第7版稿。

个题目讲，这就表示了我们学习的目的。有许多人，把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看作两种可以完全分开的课程，以为学习社会发展史，只是学习一些人类历史发展的知识，而在学习历史唯物论时，又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具体知识，单只学习一些抽象的理论，这是错误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是密切联系着的，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为着要懂得历史唯物论的理论。

什么是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正确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列主义党——共产党的革命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些正确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就思想的基础来说，就是由于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理论，把这些理论作为方法，来正确地分析社会的情况，解决革命的问题。不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想深刻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是不可能的；要想充分正确的执行这些政策，也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做革命工作的人，在自己的主观上的确是忠心耿耿要为革命工作，要坚决执行革命的政策。但因为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懂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因此，在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够真正了解革命的政策，或者了解得不正确、不充分、不深刻。这些人在做工作的时候，即使上面有正确的政策指示，即使他们也自己以为诚心地在执行这些指示，但在工作中仍然常常会犯错误，常常会发生偏差。这些人做工作，虽然由于上面的政策指示和领导的正确，有时也能把工作做对了，得到了些成绩，但对于为什么做对了，为什么会有成绩，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有时他们又把工作做错了，使人民遭受了损失，但如果问到为什么错，为什么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

甚至于有些人，像阿Q一样，工作明明做错了，还认为自己在道理上是对的，明明在事实上使革命遭到了损失，还以为自己在思想上得到了胜利。像以上所讲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叫做是带有盲目性的，他们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正确和错误，分不清楚是与非，甚至于把是非颠倒了，因此他们也就不会在工作的成功或失败中找出经验教训，或者说他们不会总结经验，不会把好的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将来工作的指导方针，不会把坏的经验加以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以便警戒将来避免重犯错误。这样的人也就不可能使自己在政治上提高，在工作上进步，这些毛病的来源，自然不止一个原因，但不懂得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不懂得把这种理论作为分析情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懂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理论，才有可能正确的了解和掌握革命政策，正确的指导革命斗争，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为什么说历史唯物论有这样重要的意义呢?因为历史唯物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理论,只有学懂了历史唯物论,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律,才能够按照这些正确的规律知识来掌握革命政策,指导革命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好。大家知道,唯物论哲学的最根本的观点之一,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任何一种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各种现象、各种东西的规律,都是客观的、有它的必然性的,是不能够由人的主观思想来随便加以改变的。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要承认,人类的生活、社会的发展、革命的斗争,都各有它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性,人类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各种规律,也是不能由人的主观思想随便改变的。例如帝国主义国家一定要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联合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反帝国主义人民的力量并发动殖民地半

殖民地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才能制止它的侵略，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任何人的主观思想都不能够随便改变的。如果有人想凭着人的主观思想来改变这规律，如果有人想用更便宜的方法，例如想用良心、正义之类道理去说服帝国主义者，而不用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去制止帝国主义者，那他一定要碰钉子，一定要失败的。又例如做革命工作的人，必须要和广大群众密切地联系，才有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如果脱离群众，一定要走向失败。这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极重要的规律，这也是任何人的主观思想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个规律来做革命工作，在做工作时不是走群众的路线，而是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路线，那么不管他的主观的想法是如何的好，在实际上仍然是要把工作搞坏的。总之，人类的生活、社会的发展、革命的斗争，都各有它们的一定的规律，因此，我们就只有努力去研究这些规律，正确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的知识来从事工作，来指导斗争行动，才有可能获得成绩，才有可能得到胜利，否则就一定要碰钉子，一定要遭到失败。革命工作的胜利，就是由于在工作的指导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工作发展的规律；革命工作的失败，就是由于违背了这样的规律。这就是一切革命工作中正确和错误的最根本的标准和最根本的来源。历史唯物论，就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革命工作发展的规律和理论，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为着要使我们得到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分析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周围事变发展的规律、认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的规律，使我们有可能来正确的指导工作，正确的规定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的方针，避免工作中、行动中的盲目性，使我们有可能比较清楚的了解和掌握革命的政策，使我们有可能来分析和总结工作的经验，使我们了解为什么成功和为什么

失败，以便将来能够利用成功的经验和避免重复错误。

以上就是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的最主要的目的，这是一个方面，这是我们的正面的目的。

学习历史唯物论的目的，还有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反面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唯心论思想，也可以说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唯心论或主观主义的思想，就是不承认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各有它们自己的必然的规律，或者是轻视了这些规律，唯心论或主观主义的思想就是认为人的主观可以随便支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周围事变发展的方向，可以随便支配革命工作的方向，以为人类社会、周围事变以及革命的工作都没有一定的客观必然的规律。唯心论或主观主义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以为做革命工作的人，并不需要认真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需要认真分析周围的各方面情况来认识事变发展的规律和工作发展的规律。唯心论或主观主义者以为做革命工作的人，并不需要根据周围事变发展规律和革命工作规律来规定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以为只要自己主观上认为对了，以为只要自己的想法在书本上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或者只要在自己以往的某些个别经验中找到根据，或者只要自以为自己的动机很好，以为只要自己的想法符合了什么道德原则或美妙的理想，那就可以简单的照着这些想法来办事，不必顾虑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当前事变发展和工作发展的规律。唯心论或主观主义和历史唯物论是完全相反的思想，是对于革命工作有绝大的危害性和破坏作用的思想，是产生各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各种坏作风的思想根源。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是有普遍影响的，凡是没有学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或者虽然学过一下而没有认真了解的人，都免不了常常要犯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毛病的，

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觉到,他的工作,他的行动,总常常免不了要多少受到唯心论或主观主义的危害。所以,学习历史唯物论,就要自觉地来克服自己的唯心论和主观主义,就要努力做到经常地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历史唯物论,经常使自己的工作、行动不违背周围事变发展的规律和革命工作的规律,使工作、行动避免盲目性,避免错误和损失。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方面的目的。

以下再讲我们学习的方法。

学习的方法,是和学习的目的分不开的。学习历史唯物论,一方面是为着要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知识,是为着要学会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分析周围情况、掌握革命政策和正确的指导工作,另一方面,是要反对唯心论或主观主义,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的思想根源。为要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时候,首先就需要有虚心的态度,就是说,要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十分认真的学习,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学习。要认识到唯心论或主观主义,是经常要在我们的思想里生长起来,经常要影响我们的行动的。不经过认真的经常的努力,要完全克服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是不可能的,要正确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缺少这种深刻的认识,把学习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来看待。例如有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就说:“我以前一直没有学理论,也照样能做工作。”也有些过去随便读过几本马列主义书籍的人,就说:“我已经读过些书了,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这一些自满自足的态度,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大的敌人,是极端错误的。有了几年工作经验,并不等于能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有效的掌握政策,有效的进行工作;读过几年马列主义书本,并不等于真正了解马列主义用来分析周围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因

为有了一点工作经验而自满自足，这是经验主义的来源；因为仅仅读了两本书而自满自足，这就是教条主义的来源。不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唯心论或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都是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根本相反的。有了自满自足的心情而没有虚心态度的人，要达到学习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学习是一种思想斗争，学习的过程，就是新旧思想斗争的过程，是新的思想克服旧的思想的过程，是自我教育和改造思想的过程。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反对和克服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是用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反对各种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以及各种超阶级的、否认阶级斗争和不重视分析阶级关系的观点。凡是参加学习的人，都必须要承认自己中间一定有着许多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的旧思想，一定要用科学的新观点来克服自己中间的旧观点，一定要在自己中间准备进行思想斗争。为着要能够有效地进行思想斗争，就必须要使用一个思想斗争的武器，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习的时候必须要拿出勇气，来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勇于批评别人，也要勇于批评自己。不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建立新思想，克服旧思想，就不可能达到自我教育和改造思想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学习的目的。这是各方面的经验证明了的事实。

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和学习马列主义的一般的方法是一致的。这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所谓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用毛主席的通俗的解释来说，就是“有的放矢”的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必须随时针对着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实际。我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要单纯的背诵书本，单纯的记住一些理论原则，而是要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原则作为方法，来帮助我们分析各种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理论原则作为

方法，就是掌握了“有的放矢”的矢，分析实际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我们的目的。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目的地来学习，就是“有的放矢”的学习方法。在这里，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必须与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分开。公式主义的方法，是把理论看作死的公式，以为实际生活一定是服从这些死的公式的，因此，只要一字一句，背诵这些公式，然后就照着这些公式来说明这样，说明那样，说这一件事是完全符合这一个公式，那一件事是完全符合那一个公式，至于事实上是否真正符合，公式主义者是不管的。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绝不是公式主义的方法，不是把理论看作死的公式，而是把它看作指示研究方向的一些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就是要按照这些原则所指示的方向，来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是不加分析地、用一些现成的死公式来硬套住我们所要研究解决的活的事实问题。例如我们从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知道社会的发展有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在公式主义者看来，就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就是一些绝对不变的固定“范畴”，一切具体的社会都必须要死板地服从这些“范畴”。每种社会都只能属于这一个生产方式的“范畴”，或者只能属于那一种生产方式的“范畴”。如果有人说某一社会不是仅只属于某一个范畴，而是属于两种生产方式中间的过渡的性质，或者是兼有两种以上的生产方式的性质，那么，公式主义者就要大惊小怪起来，拼命反对这种具体的分析，说这是违背了他们的神圣的教义了；例如我们说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曾经遭受到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公式主义的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只能服从于资本主义这一个范畴公式，而不能是一半一半的混合性质。然而，如果我们不是用公式主义方式来学习理论，而是正确的应用理论与实

际联系的方法，是把五种生产方式作为规定研究方向的一些方法原则，而不是把它当作死的范畴公式，如果我们仅只是用这些原则作为引导，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旧中国的生动的社会内容，那么我们的解决就只有一个，就是说，实际的、活生生的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和公式主义的区别。以上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第二点应该注意的是：学习理论和联系实际，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分不开的两个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就需要随时注意联系实际，而不是把过程机械的分做完全不同的两段。第一个阶段只学习理论，而不联系任何实际，一定要等到第二个阶段，才开始来联系实际。如果有一个学习射箭或打枪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学习分为两段，第一段只学习射箭或打枪的理论，不从事任何实际射击的练习，只到了第二阶段才来对准靶子射击，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怎样批评他呢？我们只有说他是糊涂罢了。同样，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如果把学习过程机械的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也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法，不是说把联系实际这个目的摆在远远的将来前途上，而是要把它作为学习过程中间训练自己掌握正确方法的一个不可分的要素。马列主义的理论，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离开实际的。

什么叫做实际？有些人对于实际有一种狭隘的、错误的了解，以为只有在自己的某一个具体的工作范围内的日常事务，才算是实际，只有联系到这一个狭隘范围内的日常事务问题，才算是联系实际，至于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似乎就不能算是实际，超出了这个狭隘范围去应用理论，似乎就是脱离了实际。这种看法，是经验主义的错误的看法。一个人的具体工作岗位中的日常事务，这自然是一种实际，或实际的一个方面，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也仅只是实际的一个方面，不能包括全部我们可以联系的实际。实际这

个概念，是应该从更广大一些的范围来看的。凡是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以及研究工作有关系的周围的事变的情况，以及周围环境中所提出的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仅仅要用理论的指导，来分析和解决一个具体工作范围以内的日常事务，而是也要分析有关我们工作的各方面情况，也要解决各方面更多的更重大的问题。我们在工作中，需要了解国内国外当前的形势，需要了解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以及革命的纲领政策，需要正确地懂得过去和现在的革命斗争经验，全国人民的以及个人的革命斗争经验，我们需要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我们也需要了解群众的思想意识的发展情况以及个人自己的思想情况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的情况，这里面都可能包含着许多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分析研究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说到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学习从理论学习中找到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些周围的情况，来解决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各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做，如果不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而把自己的思想完全限制在日常事务的狭小范围以内，甚至于纠缠在个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以为这就算是联系了实际，以为这就够了，那就是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庸俗化了，那就是仍然跳不出经验主义的狭隘圈子。那是不对的，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日常事务以及个人生活问题一点也值不得注意，不是说完全不应该注意和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说实际这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相当广大，这自然并不是说要大家在学习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一切问题通通拿来解决，并不是要一下子把天下大事到身边琐事，通通都拿来解决，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说，不能把所要联系的对象仅仅限制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这绝不等于说，在学习的时候不需要有中心，不

需要按照时间、环境以及参加学习的人们所处的具体条件，选择某些问题作为重点，用主要的力量来加以解决。相反的，只有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选择应该联系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学习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效果。例如当我们学习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这些章节的时候，对于目前许多工作岗位上的人来说，就可以着重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对于学校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就可以着重联系反对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反对英雄造时势的思想，反对个人风头主义的思想；对于许多关心世界大事的人来说，就可以着重联系世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分别地选择适当的问题，例如如果对于毫无工作经验的学校知识分子，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来要求他们分析解决，那就是错误的。我们所要选择来加以联系的实际问题，必须是参加学习的人们中间真正存在着的问题，如果不注意这一点，乱拉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来研究，这就等于无目的地乱放空枪，这是浪费子弹、浪费学习的精力，这样来学习，就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在学习中间，必须要善于正确地按具体情况提出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地方负责组织和领导学习的人必须要注意的。

关于学习的目的和方法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一章　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第一题　劳动创造人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开始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

第一章，这一章的题目是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在这一章下面，我们又分做三个小题目来解释：第一，劳动创造人；第二，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第三，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现在让我们先讲第一个题目：劳动创造人。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要说明一下，人类是怎样来到世界上的。

人的来源的问题，是在一百多年来才弄清楚了的。大约一百年前，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用了很多的真凭实据，证明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一切高等的动物植物，都是由很低级的生物经过长久的年月逐渐发展、变化而成的。这一个科学思想，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学说也初步说明了人类的来源，指明人类并不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出现在世界上的，也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类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别的比较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成的，人的祖先就是一种高等的猿类。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仅仅指明了人的祖先是一种高等猿类，至于猿类变为人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这个问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够给以正确的说明的，而达尔文只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不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种猿类，怎样会变成人类呢？为什么别的动物不会变成人类？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存在的猿猴都不会变成人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要了解人和一切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人类的最根本的特点在哪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和动物一样，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必须不断的从周围世界取得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东西，例如吃的东西、住的地方等。这些东西，也叫做生活资料。如果不能够经常取得生活资料，那么，不管是人类或动物，都要活不下去，都要从世界上消灭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人类是怎样取得自己

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和动物在这一点上就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动物是怎样取得生活资料呢？动物是完全依靠它们身体上生来的各种自然器官来取得生活资料的，例如老虎是依靠它的爪和牙去捕吃弱小动物，蜜蜂是依靠它们身上的酿蜜器官。动物除了它们自己身上的器官之外，它们不可能创造任何其他的方法，来取得生活资料。人类就不同，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不是依靠自己生来的器官，而是依靠人工制造出来的工具。没有犁头、锄头、镰刀等等工具，农民能不能从田地里取得粮食呢？当然是不能的。工人用铁锤打铁，用织机织布，也都是用人工制造的工具来取得生活资料。总之，人类的生活和一切动物生活的不同，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当然除此而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在这里只是讲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人类在谋取生活资料的时候，是利用人工制造出来的工具，而动物则不能制造工具。

了解了人类和动物的这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那么，也就容易懂得，猿是怎样才会变为人的了。这就是说，要由猿变为人，虽然需要有许多的条件，但其中有一个绝不可少的根本的条件：就是要由不会制造工具，变为能够制造工具。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猿类，虽然是动物中最高等的，但不会制造工具，所以仍然是兽类。

人类的祖先，为什么能够由不会制造工具变为能够制造工具，并因此由兽类变为人类呢？是什么条件引起了这个转变？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先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那些转变的事实经过。

科学的研究已经告诉了我们，猿变为人的这件事，是发生在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到一百万年的时候，在这一个时期以前，动物的进化，已经产生了一种高等的猿类，它们最初是在树上生活，它们的攀援树枝和摘取果实的生活，使它们的前后肢的作用开始

发生分化，而前脚肢就初步有了手的作用。在进化过程中，它们中间一部分逐渐离开树上生活，到平地上来寻求食物。这时就开始学习用后肢走路，而逐渐用手专门使用工具。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老虎那样锐利的爪牙，它们生来的器官都比野兽软弱，而它们唯一的长处就只是有了适于使用工具的手，因此它们就经常把石头或树枝之类的东西拿在手上，来帮助寻找生活资料，和抵抗别的野兽的攻击。就这样，类人猿就逐渐经常的使用起工具来，开始和别的动物有些不同了。但是，类人猿在最初却只能使用天然的石头或树枝，并不能制造工具，在这种时候，还不能算做人类。只有经过一定时期，类人猿的手脚的分工愈加巩固了，手指也变得更灵巧了，同时脑子也跟着发达起来，最后，才学会把石头打成刀或做出其他人工的工具，这样，才开始了人的生活。

以上就是地球上猿类转变为人的很简单的事实经过情形。根据这些情形，大家就可以答复为什么猿类会转变为人的问题了。猿类变为人，是由不会制造工具到学会制造工具，而能学会制造工具，主要的条件就是劳动的锻炼。类人猿起初是由于要适应在平地上的生活，为了寻找食物和防卫自己，不能不经常使用天然的工具，来进行劳动，来用作抵抗其他野兽的武器。这样经过长期的锻炼，终于学会了制造工具，才变为人类。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说：劳动创造了人类。

了解了什么叫劳动创造人，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其他动物都不会变成人类的原因了。由猿变为人，是长期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经常的、长期的使用工具，是类人猿所以能够变为人的决定条件，其他的动物，包括现在的猿猴类的高等动物在内，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是不会变为人类的。

也许有人要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来说，似乎不是劳

动创造人类，而是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创造人类。因为，如果不是猿类由树上到平地来生活，那永远不会有人类出现。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正确的。不错，由树上到平地生活，对于从猿到人的转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这一个条件，并不是直接使猿转变为人的决定的原因。这个条件仅只决定了一点，就是使那最高等的猿类拿起了天然工具，但是能拿起天然工具，还不是人类。由拿起工具到制造工具，才转变为人，而制造工具的能力，并不是平地的条件直接造成的，而是由于长期使用工具的劳动锻炼成的。

也许又有人要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似乎不是劳动创造人，而是思想创造了人，智慧创造了人。类人猿之所以能够变为人，似乎是因为它比别的动物聪明，能够想到要把天然的石块加以制造，把它变为人为的工具。这种说法是不是对呢？这种说法，是唯心论的错误的说法。我们讲历史唯物论，就要反对这种唯心论的说法。不错，人类在制造工具的时候，必须要运用思想，要制造工具，需要在制造之前，先在头脑里多多少少有些预定的计划。人类的各种行动，都要通过一定的思想、计划，这是人的特点，是人和动物的区别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人的思想聪明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类人猿忽然会想到要制造工具？如果仅仅是由于智慧比较高，为什么在树上生活的类人猿不会想到，而一定要到了平地上以后才会想到？而且一定要经过长期使用天然工具之后才会想到？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时才会这样聪明起来？这就很明显，类人猿的聪明、智慧，并不是天生的，它也是劳动锻炼成的。类人猿所以能够在它的脑子里产生了制造工具的思想，这是由于长时期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在长期的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类人猿的手，不断地变得更灵巧，脑子发展得更复杂，手

和脑进步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产生必要的聪明、智慧，能够想到石块可以经过制造变为人为的工具。同时，制造工具的思想的产生，还要依赖劳动经验。例如说，类人猿在和野兽斗争的时候，常常要把石块投出去打击野兽，如果这块石头投出去的时候摔碎了，那么，当它把那石头的碎片再拾起来的时候，它就往往可能发现，有些破片的破口，是像刀一样的锋利，可以用作更好的工具，这样，类人猿在和野兽斗争的劳动中，就不知不觉地得到了一个经验，就是把石块打破了，可以变成更好使用的工具。像这样的劳动经验，在类人猿的生活中重复了很多次，当它们的脑和手也跟着这些劳动的多次锻炼而进步了以后，才会产生制造工具的思想，才会想到有计划地打制一块普通石块，使它变成适合自己需要的工具。这一些情形就足够证明，猿变为人所需要的思想、聪明、智慧，也是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是劳动经验积累成的。

劳动创造人的道理，说明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劳动者的历史，人类所以能够脱离动物界，就是由制造工具的劳动开始的。人类脱离动物界，就是表示人类劳动的胜利。这一个科学的道理，证明了劳动是人类的光荣，因此，也就推翻了一切旧社会轻视劳动的错误思想。轻视劳动的思想，是过去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社会里产生的。剥削的寄生阶级，在社会上占据了较高的地位，因此，就以为不劳而食是很荣耀的事，而劳动是受罪，是可耻的，是不足重视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宗教迷信里，就把劳动生活看作是前世做了坏事的处罚，是因果报应的恶果。旧社会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思想，在社会上有着很普遍的影响，不但使得知识分子把劳动看作可耻的事，甚至于工人农民也往往误认为自己的生活是下贱的生活。

但是，现在时代已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剥削阶级统治的黄金

时代早已过去了。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都纷纷觉悟起来积极地进行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这个斗争在今天已经一步一步得到了辉煌的胜利，苏联的劳动人民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强大的国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越南大部地区，都建立了劳动人民的统治。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胜利，使自己上升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体的地位，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更加巩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就不能不对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看法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把剥削阶级统治时代的颠倒思想纠正过来。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人和不愿意落伍的人，如果自己的脑子里还有旧社会的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残余，就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思想，来把它彻底清算一下。

过去剥削阶级的历史家，常常把剥削阶级的统治当作天经地义，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这一个历史事实当作永久不变的教条。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道理证明了这种教条是荒谬的。劳动创造人的道理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劳动者的历史，而一直到现在，也主要是劳动者的历史。如果说，人类历史到现在是有 50 万年到 100 万年左右，那么其中至多只有 1 万年左右才不是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长久时期里，人人都是劳动者，在人类中间是不知道有什么剥削者寄生者的，只在最后的这几千年中间，人类里面，才出现了少数的统治的剥削阶级和脱离劳动的人们，但是，现在又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劳动人民的斗争，已一步一步得到胜利，现在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阶级剥削制度是要一步一步地从人类世界的舞台上退场了，我们的世界终归又要完全变为一个比过去任何

时代都更美满的劳动人民的世界了。我们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正在为着这样的一个将来的美妙前途而进行斗争，我们中国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达到这一个前途。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要清楚了解世界为什么一定会走向这个前途去的，就是要了解走向这前途去的基本发展规律是什么，就是为要用这些规律知识作为方法，来研究我们工作和斗争中遇到的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来正确的指导我们进行斗争。

关于劳动创造人，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二题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讲第一章的第二个题目：劳动创造人类社会。要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义，首先要进一步说明一下人类的劳动的特点。

前次我们已经讲过，从猿到人的转变，是由制造工具开始的。因此，要分别什么是人类的劳动和什么是动物的劳动，只要看能不能制造工具。动物不能制造工具，动物仅只能利用自己身上生出来的器官，去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除此而外，就没有别的方法来取得生活资料。例如蜜蜂，只能依靠自己身上的酿蜜器官到花里采蜜，来维持生存；老虎，只能依靠自己身上的爪牙，去捕捉弱小的动物，作为自己的食料。这就是说，动物谋生存的器官是自然生就的，任何一种动物都不能在自己生就的器官之外，另外创造出别的人为工具。至多，也只能像类人猿那样，偶然地利用一些自然界现成的工具，如现成的石块、现成的树枝之类，而不能加以制造、改变，使之更适合自己的一定的需要。即使能够，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能多种多样地制造。这样，动物的生活也就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每一种动物，只在

一定的自然环境里才有可能生活，这就是说，只在它们的身体条件能够适合的自然环境里，它们才有可能从自然界里取得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蜜蜂身上的酿蜜器官，是只适合于从花里酿蜜的，因此，只在有很多开花植物的自然环境里，蜜蜂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在没有开花植物的环境里，就免不了要死亡。老虎的爪牙，是只适合捕捉弱小兽类的，所以也只有在弱小兽类较多的地方，老虎才容易生存，在弱小的兽类绝迹的地方，任何凶猛的老虎，也只能自然而然归于消灭。所以，某一种动物或其他生物，都只能按照它的身体上天然生就的器官的条件，在一定自然环境里生存，而不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生存，因为它们不能超出自己身体条件的限制，另外创造出适合各种环境的劳动工具。如果环境变了，不适合于它们的身体条件，那么，它们就只有死亡；或者是按照进化的规律，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它们的某些器官，在它们的后代生物的身上也发生了变化，变成能适应新环境的器官，这样一来，就使它们自己本身变成了另外的生物种类，它们也只有变成了这新的生物种类，才能在新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例如水里的鱼类，只有进化为两栖类（如青蛙类）或爬虫类（如蛇类），才有可能到陆地上和到空气中来生活。如果环境变得很急，它们的后代来不及改变，来不及适应，那么这种生物仍然只有灭亡的前途。

总之，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只是用自己的器官去适应自然界，而不能超出自己的器官条件限制之外，去改造自然界。它们虽然也能使周围自然环境发生变化，而这环境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引起它们自己的身体器官的变化，以至于使它们变成另外的种类。但是，某种类的生物，一般地只能在某种和它适合的自然环境里才能生存，它们不能在自己的身体器官没有改变的情形下面，

有目的有计划地为自己创造各种各样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使自己能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这样一种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只在制造工具的人类身上才能够具有的。

各位听众！你们看，人类的生活，是不是和动物的生活一样的呢？人类是不是只能在一种自然环境里生活呢？当然不是这样的。人类能在各种各样自然环境里生活，而不是只能在一种环境里生活。现在在地球上从最热的南洋、非洲到最冷的北极地方，从很低的大平原如河北，到很高的高原如西藏，从很大的大陆到很小的岛屿，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类在生活着。人类并没有变成鱼类，并没有在身上生着水里呼吸的器官，却可以学鱼的样子，坐着潜水艇游到海底里去；人类也没有变成鸟类，并没有在自己身上长了翅膀，却可以像鸟一样，坐着飞机飞到天空里。在寒冷的地方，没有毛的兽类，如大象之类，是一定要冻死的；人类能用丝、麻、棉花、毛皮等等，制成衣服，因此就可以在寒冷的地方，甚至在最冷的北极地方生活下去。在没有足够弱小动物的地方，食肉的野兽是要饿死，或者减少繁殖的，人类却可以用畜牧的方法，把自己所需要的肉食生产出来，维持广大人口的健康。人类可以盖各式各样的房子来躲避狂风暴雨，至于动物，则除了生来能够筑巢的少数动物以外，是不知道制造自己的住处的。很明显，人类的生活，不像动物以及其他生物那样，受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不是只用自己的器官去适应自然，不是只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取得生存资料，相反的，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界里的各种东西，有目的地为自己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物质生活资料，使自己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里都能够生存下去。人类的生活，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些优越的特点？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劳动，和动物求取生存的活动，有根本的性质上的不同。人的劳动是使用了

自己制造的工具，而不是依赖身体上自然生就的器官。人类能够制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因此就能够不受自然的器官的限制，就不是仅仅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才能生活，而是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都能够取得生活资料和维持生活。人类的劳动，是有创造性质的，而不仅只是自然的。在人类和人类的劳动没有出现以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当然更不是上帝创造的；动物也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的生活不能够脱离自然条件的限制。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就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利用各种自然条件，来开始创造的活动，由创造工具和创造各种物质财富起，一直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是自然界从来没有过的，这就是人类的社会。

要想更深刻的了解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义，仅只上面所说的一切还不够，还要研究一下关于生产的问题。

什么是生产？刚才我们说过的，人类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叫做生产。人类以外的动物的活动，是说不上生产的，因为动物用来维持自己生活的物质资料，是自然的，不是经过创造的。动物是简单的消耗着、甚至于掠夺着自然界的物质资料，而不能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人类的生产，首先我们就会注意到，人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或简单的叫做生产力，是有大有小，而且大小的相差，常常是很远的。大家知道，农村妇女在家庭里用棉花纺线，一个人每天只能纺四五两，但城市的机器纺纱工厂中的工人，一个人每天就可以纺四十多斤到一百斤。一种动物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永远受着自己的生理器官的限制，永远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蜜蜂采蜜，每天所得的数量，不能超过它的酿蜜器官的限制，各种蜜蜂的采蜜能力，虽然也有不同，但作为

蜜蜂总有一定的最高水平。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却不受生理器官的限制，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而是可以无限发展，可以有相差非常遥远的不同水平的。为什么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能够发展？是什么东西决定着生产力的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呢？最主要的是两个因素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第一是劳动的工具。人类劳动的工具是能够不断改进的，不像动物的器官是生就在身上，除非自己进化为另外的生物种类，否则，自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器官的。由于劳动工具可以改进，因此，劳动的工具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有进步的与落后的，简单的与复杂的，不同的工具的使用，就决定了高低相差得很远的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农村妇女使用简单而落后的工具来进行生产，因此，她们劳动的生产力是很低的，纺纱工厂的工人是使用着复杂的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力就远远高过农村妇女。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第二个主要因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自己。工具本身是死的东西，它自己不能发挥它的生产力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者的使用，工具才能够活动起来，才能实现生产力的作用。使用工具，需要有一定的劳动经验，需要能够掌握必要的劳动技术，劳动经验较多、善于掌握技术的熟练劳动者，他的生产力就会很高，否则生产力就会很低。因此，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和能够掌握必要的技术的劳动者，就是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有些工业部门，宁肯出很高的价钱，雇用熟练工人，而不愿出低价雇不熟练工人，就是这个原因。这样，由于人类的劳动能够不断改进工具提高劳动技术，所以生产力就能不断的进步，而不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这是人类生产的一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相互间必然地就要发生一定的关系，人类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生产中的人和人的关

系，就叫做生产关系。人类的生产关系，也是变化、发展、进步的，例如封建的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就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就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变化，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呢？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每一种生产关系，都要在生产力发展的某种水平上面，才能够产生出来。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然引起旧的生产关系的破坏，而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例如由使用手工工具的小生产的水平，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生产力水平，那么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不由封建的变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变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变化了，整个社会制度最后也就会跟着改变。

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和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要放在以后慢慢讲，才讲得清楚。今天，我们只要指出，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劳动生产力发展，决定着社会的性质。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道理是有着多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要建立新的社会，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例如就我们中国来说，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国家，变为进步的国家，不仅仅是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就够了，还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把中国的主要使用小手工工具的落后的生产力，变为主要使用机器的进步的生产力。要了解这一个道理，对于今天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和如何来进行革命工作。有许多人虽然参加革命工作，但对于革命的目的却了解得很不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只要把土地改革搞过，革命就算完成了，好像从此就可以享福、睡觉，不必再准备艰苦的斗争了。他们不知道，打垮反动派统治，仅

仅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开了门而已，也就是仅仅打破了发展中国生产力的障碍。他们不了解毛主席的名言，说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其中尤其要着重发展生产、经济建设的工作。有些人甚至于错误的认为生产的工作似乎不是革命工作，因此就不高兴搞生产工作，他们不知道，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就不可能使中国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如果不能胜利通过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新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完成革命的任务。

各位听众！我们在上面已经把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意思大体上说明白了，现在再解答一个可能会被许多人提出的问题。

有人说：劳动创造人类社会，似乎只能限于就物质生活资料一方面来说，至于精神的东西，例如语言、文化、艺术、科学之类，似乎不是劳动创造的，而只能说是知识分子创造的，或知识分子的智慧创造的。这种说法，是从唯心论的观点产生的，如果懂得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就不难把它驳倒。

语言由劳动产生，是完全容易了解的。我们讲过：人类能制造工具，并能善于使用工具来进行生产，这些都不是生来的、自然的本领，要学会这些本领，或者是需要在长期劳动锻炼中积累起很多经验，需要互相学习经验和互相传达经验。人类在进行生产的时候，相互间又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关系。为着要传达劳动经验和互相学习经验，为着要维持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人类就需要创造一种相互间沟通思想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就是语言。所以，语言由劳动产生，是很明白的。

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文化现象，在阶级社会里，似乎是完全由知识分子头脑创造的，而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首先我们

要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从何而来？在人类社会里，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思想文化的活动？这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阶段，劳动者每日生产所得，除了供自己的生活需用之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的生产物来，养活少数脱离劳动的人。这就是说，社会上能有知识分子这一种人，也是劳动创造的一个结果。动物界自然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人类社会里，在最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还很低，不能提供任何剩余生产物的时候，那时候也就没有这种现象。只在人类劳动的生产力比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的时候，才可能有这种肉体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分化。才有可能出现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今天还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预见到将来的一种新的美妙的前途：在劳动生产力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将来的共产主义世界里，那时由于每个人只要劳动很少的时间，就尽够满足一切生活需要，因此，人人都会要把从事劳动当做自己生活的必需，而同时又都有充分时间来从事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到那个时候，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又要消灭了。那时又将是一切都要由劳动的人民直接来创造了。

其次，如果有人又说：知识分子虽是劳动创造的一个结果，但无论如何，艺术、科学本身的内容，仍然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活动中或智慧中直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有人这样主张，那么，我们先要问他：难道能说，科学、艺术是由某些人的脑子里凭空想出来的？是由他们某一天睡了一觉之后突然想到的？或者还有其他更深的来源呢？当然，它不是凭空被人想出来的而是有更深的来源的。这来源归根结蒂说来，仍然是劳动。一切有价值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作，不管它是由劳动者出身的人所作的也好，或者是由脱离劳动的甚至于剥削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所

作的也好，它的内容，归根结蒂，必定是概括了一定时代相当广泛的劳动人民的各种斗争经验——包括对自然斗争的经验和阶级斗争经验。自然科学，是劳动人民对自然斗争的广大经验的总结，科学家并不是凭空创造出科学来，他们的功劳，只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整理、提高，使它变为精确的、系统的自然规律知识。例如几何学，最初就是把农村劳动者测量田地的经验作为基础，经过整理提高，然后创造出来的。艺术，是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经验的反映，艺术家的功劳，只是在于把这些经验用最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就是那些生动的形式，也是在劳动群众中首先有了它的萌芽的。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成熟的、不觉悟的劳动人民的斗争经验，其中的语言形式，有许多也是劳动人民中间来的。总之，艺术、科学以及一切文化现象，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由劳动者创造出来，但它的产生的根源，仍然是在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来的许多初步经验中有着它的基础的，归根结蒂，在起源上说，仍然是由劳动者创造的。

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第一章第三个题目：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中国从来就有一句话，叫做“英雄造时势”。这就是说，历史是英雄伟人创造的，而不是劳动群众创造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是唯心论的说法，这是把英雄伟人个人的聪明才能过分夸大了的错误的说法。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按照正确的科学的观点，应该说是人民创造时势，应该说是劳动群众的活动创造历史，而不能说是英雄造时势。在原始共产主义社

会里面，人人都是生产者、劳动者，因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当然就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是用不着什么解释，谁也能够明白的。在阶级社会里面，生产者、劳动者虽然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仍然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仍是创造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劳动群众的活动，仍然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力量。例如中国二千多年来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中国农民群众的斗争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中国的旧历史书，曾经用一切的方法来隐瞒这个历史的真相，想把中国历史描写成帝王将相个人活动的历史，描写成仅仅是少数英雄豪杰伟大人物活动的历史，对于改朝换代的现象，想单单用皇帝个人的聪明才能、个人的思想活动来作为说明的根据，例如说，把皇帝个人的昏庸当作一个朝代垮台的原因，把一个英明的皇帝的出现，当作某一朝代兴起的原因。这些历史书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指导下面写成的，因此它要用唯心论的观点来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作用，抹煞农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历史书为着要服从剥削阶级的统治的需要，就把历史曲解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书里，也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隐瞒农民群众的活动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过去每一个朝代垮台之前，几乎毫无例外的，总可以看见一些规模很大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暴动的事实，在旧的历史书里虽然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曲解和污蔑，但是由于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即使是反动的历史写作者，也不能完全把它抹煞掉，不能一点也不把它记载下来。因此，只要我们能有正确的科学观点，那么，就是从这些旧的统治阶级所写的历史书里，也可能找出许多证据，来说明中国农民群众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来证明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而不是由于皇帝个人的聪明才能的不同。也就是说，每一个旧的朝

代的垮台，它的原因，是由于受到了农民暴动的致命的打击，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它的原因，是由于利用了农民暴动的胜利的果实。秦汉两代中间，有陈胜、吴广，西汉和东汉中间，有新市、平林、赤眉、铜马等等。东汉末年有黄巾，隋唐两代中间有李密、窦建德，唐朝有黄巢，北宋末年有宋江、方腊，元朝末年有朱元璋，明朝末年有李自成、张献忠，这些都是历史上最主要的农民暴动的领袖。他们所领导的暴动，在中国历史上意义很大，就是旧的统治阶级的历史书上也不能不记载下来，这些农民暴动就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推动旧朝代灭亡和新朝代兴起的真正的力量，也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的推动力量。这些暴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能够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还没有引起过社会的革命的改变，但每一次暴动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多少有了一些发展，因此，也多少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我们只要用正确的科学观点，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可以知道，一个新的朝代能够建立起来，一般地说，都是由于它多少能够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和农民群众对立，新的朝代的最初的皇帝，常被称为“真龙天子”，被称为英明的真主。他们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歌颂，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在旧朝代时候受到了农民暴动的打击，不能不对农民让步，新的朝代的统治者，代表着这些被迫对农民让步了的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就不至于再像旧朝代那样残酷地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就可以采取一些比较缓和的政策，多少减轻了这些压迫和剥削，就取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也就是所谓的得到了“人心”。这样，新的朝代的统治者利用了农民暴动胜利的果实，就能够把统治的地位巩固起来。但是，一个朝代的最初的皇帝统治，虽然一般都能够对农民

采取比较缓和的统治政策，以后一代一代传下去，皇帝以及和他一起的统治者的家族扩大起来，统治机构逐渐庞大起来，寄生的剥削集团逐渐加大起来，再加上其他原因，如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等等，不可避免地就要使得统治阶级一代比一代更厉害地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最后就终于使农民无法忍受这种压迫和剥削，不能不起来反对这个朝代的统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皇帝朝代的统治，一般的最多不过传到十一二代，时间不过延长到两百多年，就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尖锐地对立起来，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这个封建皇朝的统治到了完全失去农民群众的支持的时候，就走到了它的末日了。在这种时候，任何聪明而有才能的帝王将相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中用的，都不能挽回这个朝代的垮台的命运。例如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就曾经付出相当大的个人努力，来企图挽救他的朝代的灭亡，但是他所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成了农民群众的死敌，他个人的行动也只是和人民敌对的行动，因此，他的个人努力，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也仅只是更进一步地激起农民群众的愤怒，使农民群众对于他的统治更加不能容忍，广大农民群众已不容许他再坐稳皇帝位子，那么，不管他个人怎样积极努力，来避免使自己成为亡国的昏君，但最后还是从皇帝位子上跌下来了。

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归根结蒂就是中国农民群众斗争的历史，这一个历史，能够证明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就是说，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活动，而不是英雄伟人个人的愿望和努力。当然，我们说的是劳动群众创造历史，而不是说一两个劳动者就能创造历史，一两个劳动者的行动，当然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向。但是，如果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都在同一目标下面行动起来，那

就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严重力量，而任何人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力量。朝鲜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她的人民群众全都起来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自由，所以，即使是在庞大的美帝国主义者面前，她还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他们在生产中的情况来决定的。要了解劳动群众的斗争，在某种时期只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不提出那样的要求，只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不产生那样的结果，那就要研究当时的生产情况，才能得到说明。中国两千多年来多次的农民斗争，只造成了封建统治改朝换代的历史，没有把封建社会根本推翻，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虽然也多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并没有引起革命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社会过去一般的生产基础，始终没有超出农民的小生产的水平，而小生产农民的生产力是和封建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互相适合的，在分散的小农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比封建生产关系更高的社会制度。因此，过去中国农民群众的生产情况，就决定了中国过去历史的发展始终采取改朝换代的形式，每一个旧朝代的末期，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而暴动的果实总是被那些建立新朝代的地主阶级所利用，农民暴动的本身，在它给了旧统治者致命的打击之后，自己跟着也就失败了，而暴动的果实就落在新的统治者的手里，或者虽然胜利了，但在胜利以后，它的领袖人物不久又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者，变成新的封建皇朝的统治者。但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到了现代的中国，就结束了。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已经逐渐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已经不只是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有了比农民更先进的阶级走上了斗争的历史

舞台，也就是有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人民群众斗争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要打击封建统治，不仅仅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统治，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革命的根本变化。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这个任务，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终归是完成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工人农民，现在已经不再是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而是成了国家的主人了。所以，现代中国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和过去农民群众改朝换代的历史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劳动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中国人民今天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我们自然不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出了一些力量，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工农群众二十多年来的流血牺牲，要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是可能呢？当然是不可能的。

各位听众！我们在上面讲了很多，已经把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道理说清楚了。但是，现在就可能有人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说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那么，英雄豪杰、领袖人物，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是还有一点作用呢？是不是就要否认伟大人物的任何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并不否认伟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我们指出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并不就等于要否认伟大人物在历史发展上的重大作用，问题是在于怎样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作用。如果用“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来了解伟大人物的作用，把英雄豪杰看作历史的直接创造者，那我们当然要说，这种了解是错误的，是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矛盾的。这种作用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伟大的英雄人物也

不能凭着个人的聪明才能，任意的创造时势；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才是时势的直接的创造者。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情况以及根据他们这种地位、情况，所提出来的要求和任务。就规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成为创造时势的决定的因素。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的个人活动，绝不能任意改变这种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的观点，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的。那么，究竟伟大人物在人类历史中能起什么作用呢？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所能起的作用是这样的：他们能够比较敏锐地看出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所提出的要求和任务，能够比较正确的估计到当前历史事变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也就能够给群众的活动指出比较确定的方针，这样来推动群众进行斗争，来争取实现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所规定了的要求和任务，来促进历史事变的发展。这就是说，伟大人物能够依靠群众、通过群众去创造时势，但不能凭个人的聪明才力任意的改变时势，他们必须要首先按照历史本身的发展方向去行动，必须首先按照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了的方向去行动，然后才能够反过来对历史的发展起重大的推进作用。一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违背着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方向，如果是站到了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派的地位上，不但脱离人民群众，并且成了人民群众的敌人，那么，不管他个人曾经好像表现过多大的聪明才能，不管他们暂时在社会上有着多大的权威和地位，不管他个人怎样努力，不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相反的，历史的前进潮流一定要把他们冲倒，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定会把他打得一败涂地，结果也就证明他绝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只是一个可耻的小丑。这种情形，在历史上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只要举出过去中国历史上被农民群众打倒的皇帝，如

明末的崇祯之流，只要举出最近十年来被世界人民打倒的法西斯统治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就很够了。

革命的劳动群众，要使自己的斗争活动能够得到胜利，是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人物的。劳动群众如果有了自己的杰出的领袖，就能正确的看出自己斗争的方向，就能使自己在斗争中，目标一致，步调一致，在危急的情形下，也不至于发生迷惑、混乱，就能够掌握正确的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能够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灵活的进攻或灵活的退守，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克服困难，能够恰当地掌握一切有利的时机，来取得胜利，因此，领袖人物的存在，对群众的斗争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情形下面，领袖人物的指导，对斗争的胜败，能起决定的作用。例如：中国人民有了毛主席的领导这一件事实，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就有着决定的作用。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指导，使中国人民掌握了明确的革命斗争方向和正确的策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可能推迟很多年。但是，能够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起着这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本身必定也是从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他们一定是经常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能深刻的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长期地和群众在一起进行战斗，在这样的战斗中锻炼出自己的领导能力，并且考验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因此才能够得到群众的热诚拥护，成为群众自己的真正的领导者。这就是说，群众的领袖，也是群众在自己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群众之外能够强加到群众头上去的。脱离群众的人，无论个人有多大的聪明才能，都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群众的领袖，如果这样的人也想以群众的领袖自居，那只能算是他一个人的狂妄的幻想。

所以，不论是讲一般的英雄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好，或者

是讲革命的领袖人物在革命群众斗争中的作用也好，归根结蒂，总是不能违背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就是说，“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是错误的。这一个原理，不仅只是对于英雄伟人、领袖人物可以适用，就是对于普通的革命工作者、普通的工作干部、普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是同样适用的。任何一个普通的革命工作者或工作干部，总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担负着一些责任，他和他周围的人们中间多多少少总有着一些领导者与群众的关系，例如军队里做一个班长，学校里做一个学习小组长，机关里做一个科长、股长，对于班里的士兵，小组里的组员，科里、股里的工作人员，就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例如土地改革工作中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农民群众中间，农村党员和非党农民中间，工厂中的党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非党的一般的工人中间，也就有着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有着先进分子与一般群众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些关系中间，如果要想把关系处理得好，就用得着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论观点，就要反对“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观点。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干部，以及任何一个革命工作者和先进分子，要想真正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把工作做好，首先需要注意的事就是不要使自己骄傲起来，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创造时势的英雄，以至于认为凡事都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思，想怎样办就怎样办，而不把周围群众放在自己的眼睛里，不去考虑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在处理自己与周围群众的关系和处理工作的时候，只凭自己的主观想法，想怎样办就怎样办，那么，你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坚持了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你就是在工作作风上犯了顶坏顶坏的毛病，你就要脱离群众，就要在群众中丧失任何领导的作用和先进的作用，就不可能把工作作好。目前许多工作人员中所犯的官僚主义

和命令主义的毛病，对于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些毛病，从工作人员的思想根源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论观点，就是在思想上忽视了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而把干部、先进分子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想法看作决定一切的东西。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要在思想上反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就要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正确观点应用在实际工作中，这就是说，在工作中一定要坚决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为着这个目的，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一定要首先考虑一下周围群众的实际生活情况，要在决定工作计划和步骤的时候，使它适合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使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并容易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任务。为着这个目的，就要善于和群众商量，要尽量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群众的意见，自然有时也会是错误的，但在群众中间常常可以听到比个人所能想到的更正确的意见。只有虚心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然后才有可能把这些意见加以比较、分析，提出正确的意见，来反对不正确的意见。这就是说，首先要善于向群众学习，然后才有可能来教育群众，说服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群众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面进行斗争。有了群众的自觉的斗争，就有了一个最可靠的力量，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很好的完成工作任务。如果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工作，那就叫做符合了群众路线，就叫做有了群众观点和群众作风。这是正确的工作路线和正确的工作作风。学习历史唯物论，学习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主要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要学会把这种观点变成我们的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就是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之类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坏作风。

关于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这一章，到这里就讲完了。

第二章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第一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各位听众!今天开始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二章。这一章我们要分作三个题目来讲：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五种生产方式；三、关于阶级斗争。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第一个题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在前一章，我们讲了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道理，根据那些道理，大家就知道，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历史。

人类的劳动，人类生产的活动，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是起着决定作用的。生产的发展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任何一个社会的性质和面貌，都是由这一个社会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来决定的。懂得了某一社会的生产、生产方式是怎样，那就一定可以懂得某一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在人类历史上，大体上有着五种性质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就是：第一，原始公社制度的生产方式，或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第三，封建的生产方式；第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五，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五种生产方式，就是表示人类生产发展上基本不同的五个不同阶段。在这五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就建立起五种性质不同的社会。也就是：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二、奴隶制社会；三、封建社会；四、资本主义社会；五、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开始说明，什么是五

种生产方式。但在正式说明五种生产方式的各种特点之前，还需要先解释一下，生产和生产方式，一般的来说是怎样发展、变化的。今天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题目，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一个问题。

前一章讲过，人类的生产、生产方式，是有两个方面，因此我们也要从两方面来看，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一方面，人类在生产中，是要与自然物发生一定的关系，是要使用某种的工具，去改变自然界，从自然界里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就是创造出自己吃的、穿的、住的，以及一切生活和生产中所需要的物质的东西。例如农人用农业工具生产出粮食，工人用手工工具或机器去纺纱织布。人对自然的这一种关系，就表现为人类的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就是从自然界里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人类的生产力是能够发展的，不同社会的人类劳动，从自然界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不同的。人类以外的动物，没有生产力的问题，更没有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因为每一种动物永远只能依靠它自己的生来的身体器官去取得某些现成的自然物，作为生活资料，并不能够创造生活资料，因此也就说不上发展创造生活资料的能力，说不上生产力的发展。蜜蜂能不能自己想办法把它的酿蜜的能力，提高到几倍几十倍呢？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人类却能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农村妇女每天一个人只能把四五两棉花纺成纱线，纺纱工厂的工人一天一个人却可以纺纱四五十斤到一百斤。什么东西使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呢？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种种条件推动着的，但最主要的，是两个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一是劳动者使用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工具。使用了落后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劳动的生产力就会很低，相反的，使用了进步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劳动的生产力就会很高。农村妇女纺

纱的生产力很低，是因为她们使用着落后的手工工具，就是使用了手摇的纺车。纺纱工厂工人生产力高，是因为使用了进步的工具，就是使用了机器。所以，一个社会里的劳动者使用的工具如果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就要开始发生变化。如果工具进步了，那么，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可能就要提高。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高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就必须把中国原来依靠落后工具进行的生产，变为使用进步工具的生产，就必须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如果一个社会，因为各种制度已经腐朽，以致不能够在生产中应用比现在更进步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已经受到旧制度的阻碍了。例如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了反动腐朽的制度，使许多工厂的机器停着不能开动，原子能本来可以作为强大的生产工具的动力，但在美国就不能应用到生产里，而只能用来制造炸弹，这就证明在美国帝国主义制度下面，一般的社会生产力已不能发展了。相反的，在苏联，原子能已开始用来为生产建设服务，实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改造自然地理，大规模开凿山脉和改变河流的工程。这就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生产力可以无限制的发展起来。所以，劳动工具是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要了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首先看一看它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是使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知道了。但是，除了劳动工具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决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那就是使用工具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就是具有相当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因为工具是一种死的东西，要使工具活起来，发挥生产力的作用，首先必须有人来使用它，并且必须要善于使用它。同一种生产工具，在善于使用它的熟练劳动者手里，可以发挥为更高的生产力，如果是由没有经验的不熟练的劳动者来使用，那生产力就会变得很

低。就手工工具来说，熟练的农村妇女每天能经常纺四五两棉纱，但不熟练的妇女，纺一二两都很困难。就机器生产来说，例如在苏联的煤矿里，掌握了新技术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天每人能挖出一百多吨煤，而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煤矿工人，最高明的也只能每人每天挖出十几吨。所以，具有着相当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来使用着工具的劳动者，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例如，在新中国许多地方，工业生产（特别是东北）的事实已证明，使劳动者学习苏联的进步的生产经验和进步的劳动技术，是提高工业生产力的一个决定条件。

上面我们讲了生产力，即人类从自然界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那只是人类的生产、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的一个方面。人类的生产、生产方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人类在生产中，不仅要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人和人相互间，也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够孤独地进行生产，而和别的人不发生任何关系呢？当然是不能的。人类的生产，必须是在一定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之中，才能进行下去；一切人类的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人类相互间在生产中所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叫做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生产、生产方式的又一个方面。人和人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什么样的条件决定的呢？决定一种生产关系的主要条件，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要了解生产关系的性质，只要先问一问，生产资料是归谁所有的？劳动者生产的时候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谁的？所谓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料，其中包括着种种物质的东西，如劳动工具、原料、土地、森林、矿山、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这些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归劳动者个人

私有的，也可以是为劳动者公共所有的，也可以是由不劳动的个人或集团所占有，并被他们利用来剥削劳动者的，这些不同的所有权关系，就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在农业生产中，主要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归不劳动的地主所有，而只有农业生产工具，是归农民自己私有，这样，农民要进行生产，就不能不和地主发生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必须要用自己所有的工具，在地主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而地主就可以利用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强迫农民交出一部分生产的果实，也就是向农民剥削地租。这样的生产关系，就是旧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又例如，不劳动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占有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却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所有的只是自己的一身劳动力，因此，劳动者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和资本家发生一定的关系，也就是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用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而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剥削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样的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为什么一种生产关系会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什么决定了某种生产关系必然产生出来，代替了另一种生产关系？我们的答复是：决定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形怎么样，生产关系也就要怎么样，生产关系总是要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起来达到一种比以前更高的新的水平，就要有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只和旧的生产力相适合，而新的生产关系是与这种新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合的。原始人使用石头工具，进行集体的劳动生产，那生产力是很低的，每日生产所得，除了维持社会成员最低的生活以外，没

有任何剩余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生产力的基础上面，就不能不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不能不共同分配生产物。在这种情形下面，任何人也不可能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利用这种占有来剥削别人；人剥削人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剩余的东西可供人剥削；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面，生产关系就不能不采取原始公社制度，就不能不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才能适合这样低的生产力水平。又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劳动者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铁制的手工工具，是小规模的，由个人或个人的家庭作为单位来进行生产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下，劳动者自己占有了这些小的工具，来进行小规模的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业生产。这种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自己本身不容易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就使地主阶级容易利用武装力量或政治权力来霸占土地，把这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占为自己所有，并利用这所有权来剥削农民的地租。在这种情形下，就有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劳动者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阶级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并受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所以封建生产关系，是基本上和这种个体小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情况相适合的。以上这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的例子，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人类历史上，从古到今，生产力的发展，大体上有如下的一些情形：即由使用粗笨的石头工具，进到制造弓箭，由使用石器、弓箭，又进到使用金属工具（主要是铁器），由使用较粗制的铁器，进到使用较精致的手工工具，由使用铁的手工工具，进到使用各种机器。在这些生产工具的变化的基础上，劳动者的生产技术由狩猎过渡到牧畜，再过渡到农业，由农业过渡到手工业，由手工

业又过渡到机器工业。和这些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的阶段相适应着，就有五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就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或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五种生产关系中间，还有着某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五种生产关系以外的另一种生产关系，而只是五种生产关系中新旧生产关系并存，并且新旧交替还没有完成的阶段。例如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同时包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分，并且还包含着其他成分。这就是一种过渡的生产关系，它的过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在将来是要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过渡。所以，五种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这五种生产关系，是各自适合着或基本上适合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或一定阶段的。五种生产关系和它们所适合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可分离的结合着，就成为生产发展的五个阶段或五种生产方式。总之，生产的发展是由工具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然后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五种生产方式，就表示着人类生产发展中，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改变的五个阶段。

各位听众！上面我们只讲到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我们还没有说到，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对生产力起着什么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并不是完全消极的没有作用的东西，相反的，它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发生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表现在两方面的：第一，如果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情形适合的，那么，它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新的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就容易使用到生产中来，至少是原有的工具有可能逐渐得到改良；同时，使用工具进行生产的劳

动者，也有可能来增进和利用他们的生产经验，有机会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技术。例如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形，特别是在解放较久的东北，就很清楚的看到这种情形。第二，和前面相反的，如果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情形不适合，两者中间发生了矛盾，那么，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就会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严重的阻碍。这就是说，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下，首先新的进步的生产工具在生产中的应用就要受到种种阻碍，甚至于旧有的生产工具也要闲起来或者退步了，劳动者就要破产、失业，无法进行生产，就是在生产中，也不容易很好地发挥他们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了。例如在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下面，工厂关门，机器停开，原子能不能用到生产中，劳动者成百万、成千万的失业；又如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里，民族工商业受到压制排挤，城市里集中着千百万的失业贫民，乡村农民大量破产，连每天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当然也更没有力量把牲口喂得更肥、把农具修理得更好了，因此也就不能把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使社会不能进步，甚至于有时还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倒退的现象。但这自然是一时的，不能长久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受着阻碍，这就是说劳动人民无法进行生产，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这就是说他们终归要感到不能忍受旧的生活，要起来斗争，要起来为改变这种生产关系而斗争。这就是说，代表新的生产力的进步阶级一定要起来为打破旧生产关系而斗争，不到旧生产关系垮台，这矛盾和斗争绝不会停止。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和进步阶级反对旧生产关系的行动，就表现为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发展起来的结果，一定要打垮旧的生产关系，这就是一定要实现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

各位听众！关于人类的生产如何发展和生产方式如何变化的问题，讲到这里，一般的大概可以明白了。对于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具体变化情形，在后面我们还要有更详细的说明，在今天，我们只想提醒大家一下，在听了讲以后，请你们把革命两个字拿来研究一下，把它的意思仔细想一下。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从生产的基础上来说，我们所以要革命，就是由于生产方式中发生了矛盾，就是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妨害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那被妨碍被束缚的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我们所以要实行土地改革，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因为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妨害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束缚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为着要解放中国工农业的生产力，使中国迅速变为先进的国家。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中间有些人把革命看得太简单，以为只要分了土地或打倒了反动派统治，就大功告成，万事大吉，而不知道打垮了旧统治阶级之后，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方面，还要继续不断地做许多斗争和工作，那么，这种想法就错了，那就要请你们把前面所讲的一切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对于你一定会有很大益处的。

今天的题目，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二题　五种生产方式（上）

各位听众！今天我来讲第二章的第二个题目：关于五种生产方式。在这个题目下面，我们要说明，生产力由一个阶段发展到

另一个阶段，并因此使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要说明，一种生产方式如何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一种社会如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

今天只能讲原始共产主义的、奴隶制的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次再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先讲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猿变为人的社会，一开始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性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社会，也叫做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发展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如果说人类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五六十万年到一百万年的历史，那么，除了最近几千年才有了阶级社会以外，其余的时间，全是建立在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时代。什么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呢？以前我们讲过，要了解一种生产方式，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看。首先要就生产力方面来说，原始公社的生产力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社会里，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头工具，或叫做石器。最初是做得很粗糙的石器，以后逐渐能制造精巧的石器，中间还发明了弓箭和陶器，最后又出现了铜制的工具，原始公社的人类所使用的工具是很缓慢地进步着、改良着，因此生产力也是慢慢地发展着的。最初只采集一些现成的自然物质作为生活资料，以后逐渐改良，劳动经验增加起来，就进步到学会打猎和到水里捕鱼的技术，这就进入到渔猎时代，由渔猎时代再进一步，就能够耕种植物和牧养牛羊家畜，也就是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但是，原始公社的最大部分的最主要的时期，都是属于采集和渔猎的时期，后来发明了农业和牧畜，也是很幼稚的。在生产中，主要是靠集体的劳动来取得生产资料，个人的劳动是不可能进行生产的。例如打猎，如果不是好多人一起做，是不可能把一个野兽捉住的，在这种情形下，

生产力虽然有缓慢的进步，但始终是很低的。每天劳动所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仅仅够维持范围狭小的公社集团内的人们的最低生活，而不能在维持生活之外，再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剩余下来，也就是没有剩余的劳动生产物。生产力的发展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这种生产关系一定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人和人是在一种比较狭隘的范围里组成起来，也就是只能由有亲属血统关系的人群组织成公社集团，组织成氏族和部落，在这种时候，个人绝不能离开这种有亲属血统关系的公社集团。离开了就无法生活。公社集团一般的也不可能把亲属血统关系以外的人们组织在自己内部。在这种公社里，社会劳动成员中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是实行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制度，这里的生产劳动，是没有任何人来剥削其他人的自由劳动，因为人的生产力既是这样低，就没有任何剩余生产物可以供任何人来剥削。所以，在原始公社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基本上适合的，只有在这样的生产关系里，才能维持原始人类的集体劳动，才能继续进行生产，保证共同的生活，才能使生产力逐渐发展。

但是，我们要请听众注意：我们说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根本上适合，并不是说两方面在任何时候都是完全适合的，当生产力向前发展起来，到有了农业和牧畜以后，生产力的性质便会发生变化，逐渐成为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的、互相矛盾的了。这可以由以下两点看出来：第一，因为农业和畜牧的生产力都比较高，除维持劳动者生活外，已经能有多少剩余的生产物，因此就有可能产生私有财产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第二，农业和牧畜的生产，已经逐渐不需要集体劳动，特别是农业，可以由个人为单位来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生产的性质由社会

全体集体互助的性质，走向了分散的个人性质，就自然而然地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成为必要，这就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从原始公社里出现了农业和牧畜的分工之后，就表示原始公社开始走向了它的没落期，走向垮台的时期，这是原始公社的最末的两三万年间的事情，在这期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和最后奴隶的使用就跟着农业、畜牧的发展而逐渐地发生了。

在渔猎时代，打猎的人用的武器，是归劳动的人个人终生保有着的。这是因为这种武器的使用，需要相当的熟练才行，并且要随时作防身之用，因此就必须经常保持在一个人手里。但这种情形和后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同，因为个人保有生产工具，在这里只是为了保证公共生产，而不是为个人自己生产私有财产，更不是为了利用它来剥削别人的。农业和畜牧分工以后，有了剩余的生产物，同时氏族和部落中间就有了交换行为，氏族部落的领袖人物如氏族长等，代表本氏族部落和其他的氏族部落做生意，这些人就有机会把氏族部落的某些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劳动生产物，集中在自己身边，并逐渐把一部分霸占为自己的私有物，这就真正发生了私有财产，占有这种私有财产的，就成为氏族部落中间富有的人和高贵的人。由于生产力比较提高，有了劳动剩余生产物，又有了富裕的私有主，这些私有主就有可能利用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但是要利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剥削别人的劳动力，必须在另一方面有一些人失去了生产资料，这种情形，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或部落本身内部，是不会发生的。也就是说，在平等互助、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的社会内，是没有人会失去生产资料的。失去生产资料的人，最初只有一种，就是在打仗中从别的部落俘掳过

来的人。这种人在生产力很低，没有剩余劳动生产物的时候，通常是被杀死了。或者当作猎来的野兽被杀吃了。有时也因为人口不足或其他原因，把他吸收为本氏族的分子，但那是很特殊的情形。当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劳动可以剥削的时候，俘虏就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被氏族中富裕的人当作奴隶来使用。所以，从原始公社内部最初发生的阶级剥削制度，就是奴隶的使用。而奴隶的发生，首先是利用了战争中的外族俘虏。以后贫富分化逐渐厉害起来，才终于连本氏族和本部落内的人也有一部分转为奴隶。

在原始公社的垮台时期，部落中间的战争逐渐成为经常的事。因为这时在部落内部有一部分人渐渐脱离生产，专门从事打仗。打仗的目的，是要抢夺别的部落的财产和人口，作为本部落的财产和奴隶。因为这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出现，财产被人看重了，所以抢劫别的部落的东西，来增加自己的财富，也被人看作光荣的事业，这一批专门打仗的人，就把抢劫作为自己的专门职业，并且也就有机会把战争的胜利品占据起来，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把俘虏作为自己的奴隶。部落间的经常的战争，就相互地把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度激烈地破坏了，专门打仗的一部分人，也成为公社里最富裕的人，成为剥削奴隶的主人，也就是在社会上最有势力的人，这些人后来就和氏族长等公社的领袖人物一起转变为阶级社会的主要剥削者和统治者，建立了奴隶主的国家。

现在再讲奴隶制社会的生产方式。

奴隶制社会的生产方式，又叫做奴隶占有的生产方式，是比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较为进步的生产方式。为什么是较为进步的？这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说明。就生产力方面来说，凡是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它的生产中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必定是以金属工具为主，尤其是以使用铁器为主。劳

动者使用了金属工具，就比较原始公社的人类有了更进步的也就是更高的生产力，就能够耕耘比较大块的土地和制作比较精巧的手工业生产品。不用说，也就可以生产比较多的剩余劳动生产物。再就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这样的生产工作者，他们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连自己的身体也不能由自己支配。奴隶主把他们当作牲畜或工具，可以随便买卖，随便杀死。这种生产关系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情况是基本上适合的。因为这时发生了畜牧、农业和手工业较为普遍的分工，发生了个人和部落间的生产品的交换，发生了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的区别，而富有的人就能够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来强迫穷困破产的人服从他们，受他们剥削。奴隶的生产关系，比较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是较为进步的，因为，首先，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面，战争的俘虏就可以不被杀死，他们的劳动力就可以用到生产工作里面。此外，奴隶主集中了奴隶劳动的剩余生产物，就可以使一批人脱离劳动，专门从事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的活动，因此也就把社会的文化推进了一步，使人类的历史进入了文明时期。文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就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这文明时期，是把奴隶劳动的残酷剥削作为基础的，是奴隶的无数生命、血汗和眼泪建筑成的。在奴隶社会里，阶级斗争非常残酷。这中间包含着奴隶主和奴隶的斗争，富人与穷人的斗争。斗争的残酷性，是跟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剥削的加重，而更加强。最初的奴隶，是在奴隶主的家庭范围内使用，奴隶主一般的多少也参加劳动，在这种时候，剥削比较缓和些，但是到了后来，奴隶劳动的规模变大了，几百甚至几千的奴隶组织在奴隶大农场里或奴隶工场里劳动，奴隶主人把奴隶的管理交给了代理人，自己完全脱离了劳动，过着

奢侈腐化的生活。奴隶的痛苦，奴隶主是毫不顾惜体恤的。奴隶在非常残酷的待遇下工作，受着无限制的剥削，一直到死。在这样的情形下，奴隶生产情绪是极低的，他们对于工作非常讨厌，时常破坏工具，作为出气泄愤的方法。因此，在奴隶劳动中就不能使用比较精巧的生产工具，就不能改进工具，奴隶劳动者的生产技术也就不能不降得很低，在这种情形下，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不能忍受残酷的剥削，就不断的起来反抗。例如在欧洲古代，在罗马帝国末期，就有过好多次十几万、二十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暴动，把罗马的奴隶社会终于打垮了。一切奴隶社会的垮台，主要都是由于受到奴隶暴动打击的结果。虽然具体情况各国常常是很不相同，例如罗马帝国的奴隶社会垮台，表面上好像是北方来的日耳曼人打垮的，其实如果罗马帝国内部没有奴隶暴动，日耳曼人就不可能打败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垮台的根本原因，还是奴隶的暴动。

奴隶社会讲完了，现在再讲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比奴隶社会又进了一步。就封建社会里所发展的生产力来说，封建生产方式下面使用的工具，比奴隶生产方式下面就有进步，首先是打铁的技术有了进步，铁工具的制造比在奴隶生产方式下有了许多改进，其他农业手工业的技术也更为精巧。这样的工具，这样的技术，要靠奴隶来掌握是不可能的，因为奴隶对于工具，毫不爱惜，对于生产技术的掌握毫无兴趣，他们是只能做粗笨的工作的。因此，在生产中，就需要有一种能够相当有主动性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要愿意劳动和对于掌握劳动技术感到兴趣。这就是说，这种比较高的生产力，要求比较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更进一步的生产关系。这种比奴隶制度更进一步的生产关系，就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的

特点，是封建地主占有了主要的生产资料，首先是占有了土地，同时又不完全地占有了生产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在封建生产关系下面，农民的人格还是不自由的，封建地主可以随便支配他们，所以他们仍叫做农奴，但是比较起奴隶来，就比较好一点，地主已不能随便杀死他们，并且，他们和奴隶还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奴隶不能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自己的经济。但农民却可以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并且可以在自己的个体劳动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经济。农民每年生产所得的东西，除了一大部分交给地主作为地租外，其余就归自己所有。因此，农民在生产中，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经济上的希望，希望生产以后，自己所得的部分逐渐积累起来，使自己由贫困而逐渐变为富裕。这样的希望，在奴隶身上就是绝对不能梦想到的。而这个希望，就能够推动农民使他们对生产工作发生兴趣，使他们工作得比较积极，使他们能够爱护工具，努力学习经验，掌握技术，也就是使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之下更为容易一些。

封建的生产关系，比奴隶的生产关系更适合较为高级的生产力，它的优点，在奴隶社会的末期已经被一部分剥削者所发现，所以在当时的奴隶社会中，已经开始有人把土地分给劳动者，让他们自己经营，而每年向他们收取生产物的一部分作为报酬，这就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等到奴隶暴动，把奴隶主的统治打垮之后，这种生产方式就成为新社会的主要的生产方式了。

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垮台以后，就产生了封建的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这时的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这时的生产力虽然比奴隶制进步一些，但那种经济是以劳动者个人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特别是以小农业为基础，这种经济是分散的，以小的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在这种分散的、小

规模生产中的农民，他们一年到头用尽全部的精力，主要的是照顾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的生产，因此就不容易组织成为一个集中的阶级力量。小农民经济的这种特点，使农民容易被其他的阶级所统治。这种情形，就便利了那些地主阶级，使他们能够用军事上的强力或政治的控制手段，来统治农民和剥削农民。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和剥削农民，首先是用军事政治的强力占有土地，用法律的规定来保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农民要生产，不能不利用地主阶级的土地，因此也就不能不在政治上法律上依赖地主阶级，受地主阶级的支配和剥削。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在奴隶制生产关系垮台以后，必然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原因。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面，就经济方面来说，农民的生产是各自独立的，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小工具来经营自己的小的生产，而地主阶级在生产中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地主阶级是用军事、政治和法律的力量占有了土地，统治了土地，来剥夺农民的人格的自由，并达到剥削农民的目的，所以这种剥削是通过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来达到目的的。封建地主阶级用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来进行剥削，因此在政治上就需要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一般都是由一个独裁皇帝作为首脑，下面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等级制度里，下级对上级是在人格上处在依赖的地位，是没有人格的自由的。在社会上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以前，小农民阶级总是受地主阶级的统治和皇帝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在这种生产关系下面劳动者有自己的经济，因此他们的劳动兴趣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提高，生产力就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封建生产关系就表现出它是基本上适合于小农的生产力的，但是，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间，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总是越来越厉害。例如就中国来说，每一个封建

朝代的最初一两代皇帝的统治，对农民的剥削还可能比较轻些，但以后一代一代传下去，对农民的剥削就加重起来，一直到使农民的生产遭受破坏，甚至于连生存也不能维持，这样农民就忍受不下去，就终于要大规模地起来暴动，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就表示封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完全适合的。这样，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下，农民就要不断地对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不断的起来暴动。但是，仅仅只有农民的暴动，只能对地主阶级的统治给予打击，迫使地主阶级作若干让步，不能根本推翻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在小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建立比封建生产关系更高的生产关系。所以，只有等到社会的生产力有了更高度的发展，也就是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相当发展起来的时候，农民的暴动，才有可能和更先进的阶级的反封建斗争结合，并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根本推翻封建生产关系，使农民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面解放出来。这个“先进阶级”，以前曾经是资产阶级，今天则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起这样的领导作用。

第二个题目的上段，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三题　五种生产方式（下）

各位听众！今天我来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二章第二个题目的下一段，就是讲五种生产方式的下一段。这一段的内容包含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分散的、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这就是说，每一个很小的乡村地区，生产几乎本地区所必需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甚至于每一家农民，也能生产出自己衣、食、住所需要的主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的商

品交换是很少的，甚至于完全没有的。这种缺少商品交换的经济，就叫做自然经济。这是封建社会一般的经济情形。但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城市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城市里，一天比一天集中起更多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这些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以后发展起来，就成为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抗的势力。在城市里从事手工业的人，他们发展成小商品生产者，他们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等等，也就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制造出一些生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他们是出卖自己的生产品的小商品生产者，他们的生产，主要的是为了出卖，这和农民的自然经济是不同的。当商业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市场上对于商品的需要扩大以后，手工业也就发展起来，进一步就变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这就是说，由手工业发展为工场手工业，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就是由资本家来投资开办工场，雇用工人来到他的工场中工作。工场手工业和前面说的手工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劳动者已经不是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等等来进行生产，而是在资本家的工场里，用资本家的手工业工具、原料等等来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已不是归劳动者自己所有，不是由劳动者自己拿到市场上出卖，而是归资本家所有，由资本家拿去出卖了。劳动者已经不是出卖自己的生产品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被资本家所雇用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了。在商业进一步发展和蒸汽机械发明了以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就发展成大机器工业。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更快地发展起来，它把生产力提得很高，提到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空前巨大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它对于封建社会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变成不能相容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

治下面，在封建贵族们有着各种专制特权的情形下面，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是没有平等地位的，他们的活动是受限制的，封建军阀和封建诸侯们霸占地盘，割据地方，他们所建立的各种封建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是有妨害的，对于资本家做生意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因此，资产阶级就终于要起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向后者要求“自由、平等”，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城市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和乡村中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动互相配合，就会成为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就生产力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特点是：劳动者用来生产的工具，是工场手工业工具和大工业机器，就生产关系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却一无所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做无产阶级。劳动者既然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他们要进行生产和取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做工，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也就不能不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付给劳动者很低的工资，这些工资的价值，只够给劳动者换来很少的生活资料，维持劳动者自己和家庭的最低的生活。但劳动者得到这最低的一些生活资料，就要替资本家成天的做工，劳动者成天的工作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远超过了劳动者的工资里所包含的价值。这就是说，劳动者每天工作所生产出来的生产品中的价值，和劳动者所得的工资中所包含的价值，是不相等的。前者是超过后者的，而前者超过后者的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当然就不是归劳动者所得，而是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去了，这样，资本家就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的阶级剥削，和以前的阶级社会的剥削，形式上是不相同的。在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下面，奴隶的整个人格和他们的劳动，全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就可以直接用残酷的方法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虽然有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经济，但因为地主阶级霸占了土地，在地主阶级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在人格上也是不自由的，因此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剩余劳动，用各种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受地主阶级剥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面，劳动者在人格上好像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可以作为商品买卖，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但因为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了，所以出卖劳动力的结果，不能不吃了很大的亏，不能不把工资降到最低限度，不能不给资本家剥削了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面，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也就是无产阶级）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保存着一些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商品生产者，这就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用自己的工具、原料、土地等等来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这种小商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很普遍存在的，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就逐渐消灭，许多小生产者受到了大资本的竞争和排挤，就破了产，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无产阶级了。

由以上所讲的，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大量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里，作为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资本。资本家手中所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它的数量之大，是过去奴隶主和封建主所不能比的。第二，大批的劳动者、大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变成除了劳动

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无产者，有了大批的这样的无产者，资产阶级才可以找到劳动市场，来雇佣劳动者到他自己的工场里工作，剥削剩余价值。以上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两个必要的条件。在封建生产方式里面，是没有这两个条件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要创造这两个条件。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过程，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间，常常是用很残暴野蛮的方法来创造这两个条件，例如为了积蓄大量的资本，就采用战争、抢劫、欺骗的方法去夺取殖民地、弱小国家以及别的社会财产，来作为自己的资本。有时也利用政权的力量，向本国人民征收高额的税收、公债，来达到积蓄资本的目的，或者如像中国的原始积累，是靠官僚剥削人民的方法来积蓄资本，所以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官僚资本家。在英国，以前曾经把农民从大块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这样就造成了大批的无产者，同时又把土地集中起来变成适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资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的结果，就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组织到一个工场或一个企业来共同劳动，因此就使生产过程有了一种社会的公共的性质，或者说，是使生产社会化。这种性质，和小生产中的个体劳动性质是显然不同的。在个体劳动的情形下面，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私有，是很适合的，这就是说，因为生产规模很小，工具很简单，原料也很微少，劳动者个人有力量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同时劳动者用自己个人的工具、原料等等来生产，是很自然的很便利的。相反的，社会公共性质的生产过程，因为生产的规模很大，劳动者个人要占有那样庞大的生产资料是没有力量的，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劳动下面，只有把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才是适合的。而把生产资料归个人的私有，就是不适合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面，生产资料虽不是归劳动者个人私有，但也不是归劳动者共同所有，而是归资本家私人所占有。这种私有制，显然是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公共性质不适合的。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和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公共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根本的矛盾。这个根本矛盾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要求废除资本家的私有制和建立社会公共所有制，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间的斗争，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尖锐化起来，最后，无产阶级就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劳动者社会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过程，我们在下一章还要有详细的说明，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现在再讲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有步骤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剥削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有阶级剥削的生产方式是根本相反的，所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长起来，不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从封建社会内部生长起来，而必须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渐建立起来。工人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的财产，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把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者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在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期，是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而资本家却积蓄起很庞大的生产资料，是资本家剥夺了劳动者的财产。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要反过来，把资本家所私有的生产资料加以剥夺，

而归劳动者共同所有，这叫做剥夺者的被剥夺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因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生产中有组织的阶级，它的利益就在于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制度，所以只有它能够领导一切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的世界，正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在苏联的无产阶级，已完成了这个任务，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等正在完成这个任务，中国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去达到实现这个任务的阶段，其他国家将来也一定要实现这个任务。

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什么？就生产力方面来说，是以大机器工业，尤其是电气工业为基础，劳动过程，生产过程，普遍地是社会公共性质的。就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面，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森林、土地、矿山之类，都归社会公共所有，个人仅只能占有生活资料，如个人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住的房子，以及一切生活上消费需要的物品，而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只在有时候可以占有一些不重要的生产资料，如集体农庄中个人的菜园以及细小的园艺农具等等。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既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的剩余劳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面，生产力就可能无限的发展，不会受到生产关系的阻碍。自然，这并不是说，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里，就没有任何新旧事物的矛盾。这种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里，仍然是不断地出现着的。例如苏联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就经常提供新的发展生产的力量，而和一般的旧式的工作者之间就成为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可以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自己解决的，这种矛盾的解决，是通过人的自觉的活动，也就是

通过生产竞赛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国家的领导和组织等来解决，而不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的对抗，不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关系根本推翻的过程。在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下面，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结果，不是根本推翻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使生产关系的形式也跟着发展。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间，自然还包含着各种发展阶段，但一般地是可以分为这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若干残余还存在着，并且逐步地走向消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劳动者间的关系只能采取“各尽所能，按劳计酬”的形式。共产主义阶段，是表示生产力的更高的发展，劳动成为人人生活中的需要，劳动者间的关系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的最美妙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在今天的人类看来，已经是可以接近的现实的前途了。

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问题到这里就讲完了。

第四题 阶 级 斗 争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二章最后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的内容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同时也是对这一章全章做一些总结。

在前两次我们讲了五种生产方式的问题，大家一定更清楚的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而生产、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开始，首先是由生产工具的变化开始，然后生产关系跟着也就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它的基础的。生产力发展到某种

水平，就要出现某种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进一步发展，就要打破原来的生产关系，而出现另一种较进步的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它也是比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更进步的。虽然必须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在劳动者被奴役、被剥削的基础上得到的，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极端穷困和痛苦作为代价换来的。在有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中，封建的生产关系比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进步，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又是比封建生产关系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面，发展了更高的生产力，发展了大工业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它以后就成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由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经过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顺序前进的五种生产方式，它表示生产发展的五个阶段，它的基础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五种不同的水平。

是不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一定要按照这五种生产方式的顺序前进，而不可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呢？就一般的情况来说，是不能跳过的。不过，在某种特殊的情形下面，某一社会采取跳越阶段的发展，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苏联北极附近，有些接近原始公社的社会，由于苏联国家的帮助，直接获得了大机械的生产力，它可以跳过有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的各阶段，跟着苏联各地的人民一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就是说，一种社会能不能跳过某种社会阶段，问题是在于生产力，在于能否有条件获得跳越所必要的生产力作基础。我们不需要把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顺序看作一个绝对不变的死公式。在特殊条件下，在能够

获得必要的生产力基础的条件之下，跳越一定的阶段。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因为社会发展最根本的规律之一，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国某些偏僻地区也可能有接近原始公社的少数民族，如果对这些民族的发展前途，在今日新民主主义胜利的条件下，我们还一定要按照五种生产方式顺序发展的公式，一定要让它们先变为奴隶社会，又经过奴隶暴动，变为封建社会，再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再来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太荒谬、太滑稽可笑了。只要有必要的进步的工具供给到这些社会里，使它们的生产力准备了足够的基础，在人民国家的适当的领导下，就有可能使他们突破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的狭小圈子，一直追上新民主主义的甚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来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生产力作基础，某种新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农民的暴动曾多次的打垮了腐败的地主阶级统治，但因为生产力很低，虽然多少也在缓慢的进步着，而基本上却没有超出以小农业为主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状态，所以各次暴动只能得到改朝换代的结果，没有革命的转变，也就是没有把封建生产关系根本推翻，社会仍然长期地停滞在封建状态中。一切封建社会多多少少都有些停滞的性质。这是因为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严重地阻碍着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它们不容易由小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使生产力的进步非常迟缓。中国的封建社会，又因为再加上其他的各种条件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更为迟缓，停滞性也就表现得更为长期一些。中国民族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迅速的发展起来，但因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民族工商业始终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

本的压制和排挤，以后又不能很好的发展，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虽然有了些工业生产，但和小生产比较起来，仍然只占很少的成分，只占10%的成分。因为社会一般的生产力还是这样低，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可能在今日普遍建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革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统治以后，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来准备新的生产力的基础，只有这准备已经完成了，生产力发展到了必要的水准的时候，才能使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为什么由原始公社能发展到阶级社会，它的原因，一方面，就像前面说过的，是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够有了相当的剩余生产物，有了可以产生剥削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很高，虽然有了相当的剩余生产物，但数量是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有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成天从事辛苦的劳动，才能使另一小部分人能够剥削到足够的剩余生产物，能够完全脱离生产，来专门从事各种政治的和文化的活动，来发展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因此，有阶级剥削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是在经济上、文化上比较原始公社前进了一步，另一方面，跟着这种前进，同时就不能不使大多数劳动者沦陷在被统治、被剥削、被奴役、被欺骗的地位。

在阶级剥削的生产方式下面，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是互相对抗的。所以剥削阶级要维持剥削，就得要利用政治压力。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阶级社会里的主要剥削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并利用政治的强制力量，来压迫劳动群众和被统治阶级，来保证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保证自己的剥削的利益。如像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就利用封建

皇帝和封建诸侯的政治统治权，来保证压迫农民和剥削农民，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者就利用反动的政治统治权来压迫人民，来保证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对于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广大的劳动人民和被统治阶级，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就必须要对统治的剥削阶级进行斗争，来反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想要永久保存现有的生产关系，想要坚持现有的剥削关系，他们决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不愿意推翻现在的剥削关系。因此，当生产力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起来，同时需要使生产关系转变为更进步的生产关系时，在这种时候，他们就要对于这种进步的要求加以阻碍，他们就要代表旧的生产关系，来阻碍生产力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成为反动的保守的阶级，如像已经被打败的国民党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反动阶级；如像把原子能用来制造杀人武器，而不用来发展生产力的美帝国主义者，也是这样的反动的阶级。在反动的剥削阶级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是不满意于现有的统治和剥削关系的，他们向统治的剥削阶级斗争，就是要反对现有的统治和剥削关系的，他们向统治的剥削阶级斗争，就是要反对现有的生产关系，要反对反动剥削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反对使生产力受到现有的生产关系的阻碍，就是要求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能自由向前发展。如像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它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废除封建的生产关系，要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就是要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面解放生产力。中国解放了的地区，经过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也就是经过削弱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到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步地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这样，就使农民的生产力有可能大大提高起来。所以，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反

动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生产关系前进和解放生产力的基本动力，也就是推动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但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旧的阶级社会的情形。十月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了新的情形，统治阶级已经不都是剥削阶级了。经过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劳动人民做统治阶级的国家，如像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些国家里，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为统治者，他们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利用政治的统治权力不是来保证剥削别人，来保存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是要压迫被打倒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逐步的消灭一切剥削关系，消灭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中国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人类的生产力能够无限的向上发展，使人类社会将来能进到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者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或者是已经得到统治权的人民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中间的调和，是不可能的。对于反动的阶级采取调和主义，绝不能够把历史推向前进，只能阻碍历史的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的真理，也是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不能否认，在敌对的阶级中间，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中间，暂时的、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有时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为了抗日的目的，和蒋介石一派的反动统治者作了暂时的妥协，但是就在这种妥协的时期内，中国人民仍不能放松自

己的斗争的警觉性，仍然要在许多方面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断斗争，因为反动派时时刻刻企图进攻人民，并且为了进攻人民的目的，时时刻刻企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妥协。如果一点斗争也没有，采取一切妥协的态度，那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这就是说，不能因为有暂时的妥协，就以为可以实行阶级调和主义。只有反动的统治阶级，在人民力量强大发展的时候，才有时候要利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企图来麻痹革命阶级的革命警觉性，来阻挡和妨碍革命势力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打击，例如欧洲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来阻止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者蒋介石之流，在将要被人民打败的时候，曾经使用过向革命人民求和的阴谋手段，想来麻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反动阶级采取调和主义，常常会在实际上成为阶级投降主义，这种思想，对革命是很有害的。当然，我们坚持阶级斗争的思想，意思并不是要说，任何阶级中间的关系，都是互相敌对的，也不是要说，任何剥削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反革命的，都是应该马上打倒的。有些阶级之间的关系，例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有矛盾，但因为同是劳动者阶级，所以就不是互相敌对的。至于说到剥削阶级，那么，因为阶级剥削的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合乎规律的，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它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某些剥削阶级的出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有它的进步意义，也会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的理由。只有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它才成为反动阶级，才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奴隶制和奴隶主的出现，对于垮台的原始公社来说，是一个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对于没落的封建社会来说，也是一个进步。这些剥削阶

级只在成了统治阶级以后，才开始走向反动方面。这样来认识问题，叫做历史观点。因为有这种情形，在我们从事革命工作、推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必须首先要按照历史观点，分析一下各个阶级的情形，研究清楚每一个阶级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的革命斗争中起什么作用，弄清楚某一个阶级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要按照正确分析研究的结果，来决定我们对各个阶级所应采取的具体政策，按照各个阶级不同的作用，对它采取不同的态度，不能采取盲目的，也就是毫无分析研究的打倒一切的态度。即使是对剥削阶级，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之下采取一切打倒的态度，例如在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中间，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是剥削阶级，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在发展中国工业生产力的需要方面，城乡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是可以利用的。因此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就采取团结的方针。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点，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他们是常常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抱着各种各样的幻想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政策领导下面，才能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只有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正确指导下面，才能确实的表现出来。为着要使资本主义能够确实发挥它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对于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又不能不进行各种必要的斗争。在这一方面，仍然适用阶级斗争的原则，仍然不能采取阶级调和的态度，但在这种情形下面，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发挥资本主义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积极性。这就和对付反动派的政策要有所区别。中国共产党所

以能够引导革命迅速走向胜利，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而这些理论和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它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给了正确的科学的分析研究。我们来学习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学习历史唯物论，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学习分析社会的各阶级，研究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各种不同作用，使我们有可能在工作中正确的了解对待各阶级的具体政策，即哪些阶级应该推翻，哪些阶级应该打击，哪些阶级应该联合，哪些阶级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依靠；使我们正确地了解应该用些什么方法，来联合有进步可能性而又动摇、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它们发挥进步作用，同时防止它们可能表现出来的落后的或反动的方面，并且对这些方面进行适当的斗争。总之，就是为要使我们在革命的阶级斗争行动中，善于分清敌人和友人，善于团结应该团结的友人和善于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使我们不至于打错了目标或打乱了目标，使斗争比较容易得到胜利。

说到斗争，应该注意到有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斗争的对象不同，条件不同就应该有不同的斗争方式，例如武装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思想斗争等等。又例如非法的与合法的斗争，公开与秘密的斗争等等。对于武装的反革命敌人，中国的革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进行斗争，也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彻底打垮敌人在政治上的统治，但在武装斗争条件不够的地区，例如在反动统治的城市里，中国人民也曾采用过文化斗争、经济斗争、要求民主的政治斗争，以及非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的方式。至于说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方面，就不必武装斗争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人民有了政权的情形下面，就可以从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

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也可以从思想上进行批评教育，而这些也就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又如组织农民、教育农民、使农民由个体小生产者一步步变为集体生产者，这中间就包含着对于农民的某些落后方面的斗争方式。在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要联系实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开展新旧思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是采用思想方式的阶级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自然，这种思想上的斗争，是要通过有系统的说道理，不是采取强制压迫的方式，不是用简单的名词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无论如何，在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新旧思想斗争的方式，才有可能使思想认识提高。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到这里就讲完了。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题　什么叫做革命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开始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分成四个题目来讲。第一，什么叫做革命；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第三，社会主义革命；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今天讲第一个题目，什么叫做革命。

什么叫做革命？前一次讲五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已经大体上提到一下了。革命，从政治方面来说，就是推翻一个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让另一个新的阶级来代替它作为统治者。从社会的物

质基础、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来讲，就是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首先就是要打破旧的腐朽了的生产关系，用新的较进步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的地位，这样改变生产关系，目的是为了要使生产力能向前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是腐朽的、是必须打破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和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适合，因为它阻碍着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因为在这种生产关系下面，劳动人民普遍地不能照旧维持生产，甚至于不能生存下去，在生产中不能应用更进步的劳动工具，甚至于原有的劳动技术也表现退步，或者是遭受破坏。所以，如果不把这种生产关系打破，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甚至于反而要降低了。大家如果把旧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情形拿来考察一下，把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的生活情形拿来研究一下，就可以了解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怎样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是进步的？为什么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因为新的生产关系，比起旧的生产关系来，是适合更高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在这种生产关系下面，劳动人民就比较能够发挥生产的积极作用，劳动工具就有可能改良进步，劳动技术就有提高的可能。所以，如果经过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把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生产力发展一定会迅速前进一步，达到更高的阶段。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代替原始公社制度的生产关系，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代替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这些一步比一步更高的革命的变化，都打破了旧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向前发展。

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

33年间，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超过了像英国这样建立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方面，在应用最新的生产技术以及科学成果这一方面，也超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一百多年的美国。所以，革命的意义，从经济上来讲，从生产方式上、从社会的物质基础上来讲，就是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把生产力解放出来。

所谓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的地位，是指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请大家再回想一下，什么叫做生产关系。以前我们讲过，生产关系，主要的，就是指人和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一种财产所有权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就是生产中间所需要的工具、原料、土地等东西归谁所有的问题。所以，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的地位，那意思就是说，一方面要废除、或者说剥夺某些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旧的所有权，而另一方面，就要使一些新的人们获得某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以，革命的任务，在经济上，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上来说，首先就是要转变人和人在生产活动中的一种财产所有权关系，就是要转变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例如土地改革，是反封建的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所谓打破封建的生产关系，就是要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凡是真正的革命，一定有某些人们的某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被剥夺、被废除，而另一些阶级一定获得某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评判一个革命斗争是否彻底胜利，只要看旧的反动统治阶级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废除得很彻底，或被剥夺得很彻底，反动统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废除得很彻底，就表明革命很彻底，否则，如果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废除得不彻底，或者根本没有废除，这就表明革

命不彻底，或者甚至于是革命的失败。例如资产阶级革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常常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常常与农民暴动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接着又常常反过来出卖农民和地主阶级妥协，使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彻底地结束了。而这一个不彻底，这一个对地主阶级的妥协，主要的就在于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剥夺得不彻底，就在于使地主阶级能够把大部甚至于全部土地所有权仍旧保持在自己手里。例如欧洲的英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阶级妥协了结的，这些国家在经济上保留着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也没有完全推翻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英国的国王、贵族，在社会上一直到现在，仍占着优越的地位。希特勒统治以前的旧德国，贵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保留着坚强的地位。这种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帝国主义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结合，这就使得德国帝国主义有了特别强烈的军阀主义的性质，也就是使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德国特别好战、特别凶恶的一个原因。就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这失败可以从种种方面来看，从经济方面来看，辛亥革命以后，除了满清皇族的某些财产权被剥夺之外，中国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丝毫也没有改变，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标帜。我们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基本的胜利了，而且是可以得到彻底的胜利的，这个胜利，从反封建的一方面来说，就是我们能够逐步地彻底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在许多老区已经实现了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也要在两三年内经过减租减息，一步一步地达到土地改革。等到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时，我们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就可以说是彻底胜利了。自然，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在现阶段并不仅只限于反封建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还要

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这些目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是能够彻底完成、彻底胜利的。

现在我们要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有许多人，对于革命的政策不了解，不了解为什么在一定时期的革命斗争，只打倒某一些阶级，而不打倒另一些阶级，只剥夺某一些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剥夺其他阶级。例如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只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仍然保护着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我们只废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废除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些人就不了解，说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我们要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为什么同样也是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就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呢？有些人甚至于简单的用生活来作比较，说资本家吃的、穿的都很好，比起某些地主来，比起某些中小地主来，生活的享受要阔绰的多，为什么生活较好的不打倒，而生活比较差的反而要打倒呢？有些从乡下到城市的干部，向来过惯了艰苦的生活，看见城市里很多人衣服都穿的很好，甚至于工人的衣服似乎也不比乡下地主差，于是就十分的看不惯，觉得城里好像到处都是斗争对象。这些问题的发生，这些想法的存在，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没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知识，没有很明确地了解什么是革命和什么是革命斗争的对象。不了解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所以要打破某种旧的生产关系，要废除某些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只是因为这种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因为某些阶级生活享受比较好的缘故。再说一遍：一种生产关系要不要被打破，一种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不是要加以剥夺，主要的就是要看这种生产关系或这种阶级的财产所有权，是否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就

是要看是不是一定要打破了这种生产关系，剥夺了这种财产所有权，才能够把生产力解放出来。在工业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妨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否妨害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一般地说，不但没有妨害，而且相反的，正常的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维持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实行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在人民国家的正确领导之下，是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也就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革命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打不平，生活享受的好坏，吃、穿的比较，并不是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如果因为到了城市里，看见某些工人吃的穿的表面上似乎和乡下小地主差不多，而没有看见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痛苦，因此就把工人阶级也认作斗争对象，这岂不是闹天大的笑话？所以，仅仅从生活的好坏来决定要不要打倒一个阶级，把革命简单的看作打不平，是错误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妨害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虽然某些地主的吃穿比民族资产阶级差些，他的存在，对于社会总是完全有害无利的，所以就一定要逐步地把他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享受虽然比许多地主好一些，但只要他们是在正当地经营着工商业，不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不从事其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活动，那么，就是他穿好点，吃好点，对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还能有一定的推动进步作用，那就不需要剥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相反的，还要让他们有发展的余地。总之，革命的政策，是要按照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来规定，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来规定，按照人民全体的利益来规定的，而不是仅仅按照个人生活享受的好坏来规定的。

根据上面所说，可以知道，一切革命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来，是由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或者说，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在旧生产关系下面已经不能继续发展了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所以，当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在旧的生产关系下面已经不能前进了的时候，当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已经使劳动人民难以进行生产、难以生活下去的时候，就一定有革命的需要。这种情况存在一天，人民革命的要求也就一天不会消灭。但是，这并不是说，有了这样的情况，革命就自然而然的实现，自然而然的会得到胜利。不是的，要实现革命和要使革命胜利，必须要通过阶级斗争，必须要在革命阶级有力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情形下面，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不认识这些条件，就不能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能实现革命而某些国家不能实现的具体情形。例如有些人不了解，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生产力发展比较英美落后得多，当时英美是经济上最发展的国家。为什么俄国倒实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胜利了，而英美工人阶级的革命一直到现在没有实现？这就是因为革命的实现和胜利，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之外，还要有其他条件；而最主要的条件是，要实现革命，要使革命胜利，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必须使阶级斗争的情况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削弱、很孤立，削弱和孤立到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力量增涨起来，增涨到成为很大的优势，能够在政治上推翻反动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英美帝国主义的生产力虽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虽然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早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些国家里，失业半失业的工人早已到了几百万人的数目，近来甚至于单单美国就到一千多万人，许多工厂商店关门，许多机器停着不能开动，伟大的原子能不能用来进行生产建设，而

只能用来制造战争工具、破坏工具。这些都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早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证明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了，但是，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说，就阶级力量的对比来说，那么，一直到现在，英美资产阶级对他们国内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还是比较强大，他们还保有着军事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各种强大统治机构，他们还没有完全孤立，还能够在工人组织中找了一部分右派分子来帮助欺骗工人阶级。而在工人阶级方面，比起统治阶级来，力量还是较小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一天比一天在继续发展，但还不够强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共产党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虽然一天一天地提高了，但也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能够动员起极广大的群众，来为推翻统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情形，就和十月革命时候的俄国不同，所以革命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首先就是由于中国人民有共产党的坚强的组织领导和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在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中，人民的力量空前地壮大起来，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却一天比一天孤立和削弱下去，最后就能在几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间把反动统治打垮，使革命得到基本的胜利。所以，要实现革命，要使革命胜利，最主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革命阶级、革命人民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加强自己的组织力量，削弱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使革命人民的力量比起反动统治者的力量来，在阶级力量对比上成为压倒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革命斗争中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指导。革命的战略策略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一方面孤立敌人，一方面发展壮大革命人民自己的力量，就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

的势力，集中最大力量打击最少数反动的敌人。就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同盟军，就是使敌人内部分裂、削弱。这个问题，让我们以后讲政治与国家的时候再进一步说明。把现在所讲的总结起来，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形，是实现革命的一个主要条件，只有当革命阶级能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形成压倒优势的力量，有能力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并自己掌握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才有可能胜利。

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关于什么是革命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二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三章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的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很复杂的一种生产方式，要想深刻了解这种生产方式，应该专门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章我们讲五种生产方式时，对于资本主义讲得很简单，今天我们特别再讲一次，对前一章所讲的作一些必要的补充。以前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后来又起来代替封建的生产方式，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从封建社会中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总是带有停滞的性质；因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小规模的、分散的、个体性质的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面，这种小生产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是不容易的。因此从封建社会内生长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不经过缓慢的长期的过程。以前说过，封建社会的经济，主要的是自给自足性质的自然

经济，在这里面商品的交换是很缺少的，甚至于在最初几乎是完全没有的。但以后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就慢慢地破坏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农村里，商业活动使一小部分农民富裕起来，上升为富农，另一些农民是相反的，在商业高利贷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面，贫穷破产，成为贫农和雇农。富农和贫雇农由农民中分化出来，这就是农村里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富农就是最初的农村资产阶级，贫雇农就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商业发展的结果，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来不及适应市场的需要，商业资本家就开始把资本投到生产事业里来。最初是把原料以至于工具分发到各手工业者家庭里，由手工业者制出生产品以后，给以一些工资，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以后再进一步，资本家就直接投资建筑工场，把工具原料集中在工场里，雇用工人到工场里来工作，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就是最初的正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这样，资本被投到生产中，而不是单单用作商业交换活动的媒介，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要在社会上确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使它成为统治的经济形态，一定要首先能够控制着很大的资本，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去积蓄这样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阶段，就要经过一个过程，使资产阶级能迅速把大量资本集中起来，这个过程就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要在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很快“积累”起数量庞大的足以建立大生产的资本，用正常的做生意的方法，是不容易办到的，因此，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总是包含着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如抢劫、欺骗、侵略战争等等。例如欧洲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最初的“原始积累”，就是靠在海上做强盗来达到目的的，有些是靠抢劫殖民

地达到目的的。有时也依靠政治的力量，发行公债、征收高额税收等，来达到“积累”的目的。在中国，情形却有点特殊，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严重的压制，只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一些带封建性的官僚、买办、军阀，依靠着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剥削，“积累”了最大的一些资本，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中国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和封建地主阶级又和帝国主义结合的官僚资本家，不依靠官僚、买办、军阀势力发展起来的大资本家是很少的，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也多多少少是依靠了官僚军阀的势力才能存在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挤，而同时又和他们有许多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表现的动摇性和两面性，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碍，因此有若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们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多多少少又有着一些联系，或者说多多少少有着些依赖性的缘故。

资本主义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小生产集中成为大生产，使社会的生产力大大的提高，这是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初期所起的进步作用，在这种时期，它的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特别是工场手工业变为机器工业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很快地暴露出来，在这种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就成为完全不适合的，成为性质根本相反的东西。什么地方表现这不适合呢？这不适合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但它的生产力是以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生产做基础，或社会化的生产做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把成千的劳动者组织在一个企业或工场中做工，使生产过程有了一种集体的性质或社会公共的性质，

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的公共性质要求把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资本家私有的，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性质上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都是从这一个根本矛盾上产生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些矛盾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现在只讲最主要的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个别企业和工厂内的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却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无政府的。每一个工厂和企业，都是把劳动者组织在一个生产的系统里，由资本家或他的经理来管理，所以它的生产是能够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但是，每一个工厂和企业，都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资本家办这个企业或工厂，目的是要生产出大批大批的生产品来，把它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最后目的是为要赚钱或是为要赚得利润。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每一个资本家都生产出大批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们事先绝不可能了解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卖得出去卖不出去，或市场上能卖多少。这就是说，他们在生产的时候，绝不会知道社会需要多少，应该生产多少，因此他们就不能不是盲目的、无计划的进行生产。如果在市场上遇到了其他的资本家，也生产了同样的商品拿出来卖，那么，两个或许多的资本家为了争取买主，互相间就不能不竞争起来。为了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资本家就不能不设法提高自己工厂或企业的生产力，减低商品的生产成本，这样可以按照比较低的价钱推销出去，来战胜市场上的敌人。资本家为了赚钱，不能不竞争，为了竞争，不能不使生产继续不断地扩大和发展起来，而送到市场上去的商品也就不能不一天比一天加多起来。但是市场上的买主的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资本家这样盲目生产下去，不断地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势必会有这样的一天，就是商品摆在商店上，卖不出去了，没

有人再要买了。因此，利润就赚不回来了，甚至于投出去的资本都收不回来了。因此，工厂也不好再继续生产了。再继续生产就使卖不出去的东西更多了，工厂、商店就要关门了。这种情形，到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现象的时候，就叫做经济恐慌或经济危机。经济恐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产生的现象，因为这种盲目的、无计划的生产，不可能常常适合社会的需要。它一定是一天一天地生产更多的商品，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把商品堆积起来，终于要超过市场上购买的能力，这叫做生产过剩，而恐慌的发生，就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从 19 世纪起，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普遍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和恐慌的发生，是大约每十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恐慌到来的时候，生产力就要遭到大批的浪费，卖不出去的商品，堆在市场上，就压迫着商品的价格，使它不断跌落，使资本家无法赚回利润。因此，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的价格，为了维持利润，就宁可把这些生产品毁灭掉，或者把它烧毁了，或者丢到海里，或者用其他的方法毁灭掉；而另一方面，由于工厂商店关门，工人大批的失业，没有工作做，没有饭吃，他们的劳动生产的东西太多了，结果反而使他们没有饭吃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非常荒谬的现象，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的现象。生产得太多了，劳动者反而更穷困了，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指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根本不适合了。资本家的私有制度，资本家为赚利润而生产的这种制度，和大工业的伟大生产力，是发生尖锐的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了。

以上讲了第一个主要的矛盾，现在再讲第二个主要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能够从自己的工厂、企业里，不断地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赚取利润，这是因为他的

工厂、企业里，有成百、成千、成万的工人为他劳动的结果。劳动者因为自己没有生产资料，只有自己的一双手，只有一身劳动力，为了生活就不能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因此也就要替资本家做工。资本家在他做工之后，给他一定的工资，这工资的价值，总是很少的，通常总是只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和仅仅能养活他的后代，但是，劳动者替资本家工作的结果，他的工作所能产生的商品的价值，除了抵偿机器原料等等的消耗而外，一定比他的工资的价值要高得多。这比他的工资高出的一部分，就叫做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就被资本家剥削去了。例如说，一个工人替资本家做工，他所得到的工资是每天人民币 1 万元，而他工作所生产的商品，其中所包含的价值，用人民币算起来是 3.5 万元，假定这 3.5 万元中，有 1 万元是相当于机器和原料等生产资料的消耗的，那么，只付出了 1 万元工资和 1 万元的生产资料，却收回了 3.5 万元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从他所得的生产品里，多收到相当 1.5 万元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所赚的利润的根本泉源，资本家的利润，是从剩余价值来的，因此，为了赚钱更多些，资产阶级就要加重对劳动者、对工人的剥削。特别是为了要和别的资本家竞争，资本家就需要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来减低成本。资本家加重对工人剥削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延长工作时间和减少工资，这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用这种方法来加重剥削，是很明显、很容易被工人看出来的，因此也很容易受到工人阶级的反对。由于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和斗争的结果，资本家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加重剥削，那就是表面上并不延长工作时间和减低工资，有时还相反地要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但是资本家把生产的技术加以改良，把机器加以改良，使机器的运动加快，使劳动者的工作很紧张，这样一来，就使社会的生产力

提高了，这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劳动者能生产出来的东西，在数量上就比以前加多了。这样，劳动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及养活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无形中减低了。把这些价值和他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来相比一下，就显得无形中更减少了，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更增加了。这样，资本家在无形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也可以使资本家拿到市场上的商品价值成本减低，使他有可能和别的资本家容易竞争，得到胜利。用这种方法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因此，资本家为要在竞争中得到胜利，要保证自己赚到利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必然要加重剥削，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总是集中了非常庞大的财富，而劳动者总是越来越贫穷下去，贫富的差别悬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到了恐慌的时候，工厂关门，失业的工人就加多了，还留在工厂中没有被解雇的工人，资本家也可以用生意不好为借口，把工资减低，这样工人阶级的生活就更困难了。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尖锐地对立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断的发展，特别到了危机恐慌时期，工人阶级的痛苦更加深时，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斗争，就常常要发展成革命的危机，使工人阶级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起来暴动。19世纪欧洲每一次周期恐慌的时期里，总跟着发生多多少少的革命危机。工人阶级在和资产阶级斗争中，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组织一天比一天加强。工人阶级觉悟的最高表现是在自己的斗争中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的最高形式是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伍的组织，也就是有了共产党的组织。

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有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工人阶级就有可能在斗争中走上正确的道路，就比较容易取得革命的胜利。例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的垮台，是在它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实现的。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要死的时代。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叫做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资本家互相间的竞争，主要是用改进技术、减低商品成本、减低价格的方法，因此，在这时候，资本家的竞争，是能够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在这时候，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在很短的几十年时期内，就超过过去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全部总和，因此，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很快就达到和生产关系不能相容的地步，很快就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变为垄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被少数非常庞大的银行资本和独占的企业支配了，它可以垄断市场，使小的和新的资本无法和它竞争，因此它也就用不着一定要用改良技术、减低价格的方法来和其他资本竞争，相反的，为要避免赔本，为要避免新的技术出现，会使旧的技术设备闲下来没有用处，它还要常常阻碍新的技术的运用，因此也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特点，除了大银行的垄断资本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输出资本，大银行和独占企业赚了很多的利润，除了分配给股东作利息之外，就堆集起来成为很大的资本，这些资本在本国找不到使用的地方，就要向外国和殖民地去找出路，或者向外国借款，或者到外国开工厂，总之，要把它使用到国外去赚取利润。中国的反动政府就会经常常从帝国主义国家大批借钱进来，并且为这些借款付出高利贷一般的利息。这样，帝国主义不但要求输出商品，而且要求输出资本，因此，对

殖民地争夺的欲望就特别加强了。而更重要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地球上的一切殖民地，大体上都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了，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都被英、美、法等国分完了，而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感到自己的殖民地不够，于是就不能不想法向旧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也就是要重新分配世界的殖民地。要达到这个要求，除了战争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的，这就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中就发生了各种尖锐的矛盾，首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继续加强了，除此而外，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间的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为了争夺殖民地，也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自相残杀，削弱了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得无产阶级有可能找到帝国主义中受伤最厉害的和最削弱了的国家，从这里爆发革命并且使革命走向胜利。这种情形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是没有的，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灭亡时代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并且，这个革命是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一个国家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至于俄国革命是怎样实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一次要讲的范围，让我们在下次再讲吧。

第三题　社会主义革命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三章的第三个题目：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从政治方面来说，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

治，实现工人阶级专政的革命；从经济方面来说，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要把资本家手中所占有的工厂、机器、土地、矿山等等没收过来，是要没收资产阶级所占有的、并且利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是要把这些没收过来的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劳动者公共的财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基础上，就是要废除资本家的私有制度，建立劳动者的社会公共所有制度，要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变为劳动者社会公共的所有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上，就不会再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很多的财产、而大多数人失去了生产资料和没有什么财产的现象，因此，也就不会有少数人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的现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革命，而不是用一种阶级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阶级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是它和以前人类社会的一切革命根本不同的地方。例如资产阶级革命，是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来代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并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多半是不彻底的，是和封建势力妥协了结的，所以，多半并没有用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制度完全代替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制度，而是常常在新的剥削制度下面又保留着旧的剥削制度的残余。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用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有阶级剥削的制度，就要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是已经完成了，苏联的社会上已经没有任何剥削阶级存在了。在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实行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剥削的政策。中国的革命，目前是胜利了，但是因为中国有特殊的条件，在现在的阶段上还不实行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只实行消灭帝国主义势

力、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还要加以团结，还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在国家经济的领导下，容许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余地，因此，中国的革命，在现阶段上说，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还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到将来工业建设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以及其他条件具备了的时候，还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还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革命将来的前途，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等等的国家，在最后的发展方向上说来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1917年10月第一次在俄国得到胜利的。为什么俄国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能够得到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俄国在当时是世界帝国主义统治中比较薄弱的一环。俄国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它是比较落后的，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起英美等等的帝国主义来，是落后得多的，但是，英美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实现出来，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却能够胜利，这就是因为英美等国在当时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的环节，而俄国则是比较薄弱的一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反革命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而革命阶级的力量发展得很强大，在阶级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是革命力量形成了优势，反革命力量处在极端劣势的地位，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二月革命时打垮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又在十月革命时打垮克伦斯基政府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革命力量为什么当时能够成为优势的力量？首先是因为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俄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是因为当时的俄国工人阶级，是最集中的、有高度觉悟和组织的革命阶级。俄国工人阶级当时为什么是最集中的阶级？因为

俄国的工业发展，虽然比英美等国落后，但是工业本身的集中性却比英美大，当时俄国的全体工人中，有54%是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工作，而在同时，美国的全体工人中，在500人以上的工厂中工作的，却只有33%。俄国工人阶级为什么是当时有高度觉悟的阶级？因为它有列宁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俄国工人阶级在当时为什么又是有高度组织性的革命阶级？主要因为它有了一个按照马列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自己的党，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的工人阶级当时有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沙皇统治的俄国时代，反动统治者对革命势力压迫很厉害，革命人民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也有了长期的历史，这个斗争锻炼出了像列宁、斯大林这样杰出的领袖。列宁深刻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了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各国革命的经验，用来解决当时世界的和俄国的具体革命实际问题，这就创造了列宁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列宁的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点。工人阶级有了这个思想的指导，在自己的斗争中，就能够不至于迷失方向，就能够正确的走上胜利的方向。像列宁这样的正确的指导，在当时的欧洲，是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的。这就使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当时成为最觉悟的阶级，也就是最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斗争方向和道路的阶级。这正如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面，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就成了有高度觉悟的阶级。除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指导之外，俄国工人阶级当时又有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建立起来的、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这也是使得俄国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条件。当时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就是

社会民主党，这些党一般的都是受着机会主义思想领导的，即使有些比较能够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政策的领袖人物，但势力很小，也没有和机会主义完全分离，形成为独立的按照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但是在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十几年，在1905年以前，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的队伍已经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面形成了，到了1912年，布尔什维克的党更正式的成立起来，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党完全分离开了。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就能够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周围团结起来，就能够发挥工人阶级的最大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力量，这也是当时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所不能比的。所以，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是最集中、最觉悟、最有组织性的革命阶级，因此，也是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不仅如此，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又和全国农民反对沙皇专制政府、反动地主阶级的斗争密切地结合着。俄国工人阶级在列宁、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面，一点也不放松地和农民建立坚固的联盟，因此，就能够把全国最大的革命力量充分地集中起来，就能够对反动政府给以最有力的打击。这样，在俄国，因为有集中的高度觉悟和组织了的无产阶级和工农的坚固的联盟，就使革命力量成为很大的优势。至于在反革命统治者那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大战还没有停止，使帝国主义者不容易互相救援，又由于在大战中，帝国主义各国互相斗争，力量都削弱了，特别是沙皇政府那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德国军队打仗的时候，吃了许多败仗，全国最精锐的军队几乎全垮了。统治阶级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是要依靠军队、警察等等的武装力量的，精锐的军队垮了，那么统治力量也就一定削弱了，也就是说，统治也就有垮台的危险了。就像在中国，我们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几百万军

队，因此他的统治也就不能不跟着垮台了。因此，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这一个国家胜利，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形成了很大的优势，而反动派的力量已经极端削弱，因之就处于劣势的地位，就是由于俄国的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当时世界帝国主义者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由于无产阶级找到了和冲破了这薄弱的一环。

总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实现的，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人民的力量战胜了和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结果。但是，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仅只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得到了胜利，这还不是说已得到完全胜利，不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已经完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现成准备好了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根本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只能说是开始建立起来；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这时不但没有完全消灭，而且还会存在着很大的残余。因此，要完全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治之后，继续进行在政治上来镇压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同时在经济上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也就是要继续进行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是要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面来进行，是要经过工人阶级专政的权力来推动，才有可能得到胜利。如像俄国革命以后，就是在工人阶级专政下面，经过一段消灭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过渡时期，才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什么叫做工人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就是一种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任务，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就

是说，工人阶级专政，就是要按照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来规定国家政策，而不是按照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阶级的要求，来规定国家政策。一种国家政权是不是属于工人阶级专政性质，首先是由它所执行的纲领政策来决定，是要看它是不是实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政策来决定，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参加政权的成分，则是要依照具体条件、依照纲领和政策的需要来决定的。在工人阶级专政下面，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代表当然不能参加政权，但是农民的代表却可以，而且一定要参加政权，一定要有工农联盟。有人不了解为什么苏联的国家政权既是工人阶级专政，而又要有工农联盟，这就是因为不懂得工人阶级专政，是指这种国家政权的任务是在于要实行社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纲领政策，而工农联盟，是为了保证这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实现，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共同进行斗争。工人阶级一定要和农民建立联盟，建立统一战线，才有可能顺利执行社会主义的纲领政策，才能够集中最大的力量来对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进行镇压，来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在工人阶级专政下面，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联盟，同时就要教育农民，组织农民，改造农民，使农民由个体的生产者，逐渐变为集体的生产者，使农民由小私有的小商品生产者，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者。只有把个体农民改造成集体农民，把分散的小农业变为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才能保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残余。

因此，由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专政，一直到经济上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那就是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过程，应该有多长的时间，这是没有死的标准的，要看各国的情形来决定。大体上说来，凡是工业生产发展比较高、比较集中的国家，这个过

程就可以比较短些，凡是工业生产发展比较落后一些的国家，这个过程就比较长一些。例如美国是工业发展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胜利了，在美国的工人阶级专政之下，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要比较短些，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很高，并且非常集中，少数大企业、大银行支配了全国的经济，只要把这些大企业、大银行没收过来，全国经济的性质基本上就已经是社会主义了。但是在革命前的俄国，工业生产比较美国落后得多，虽然当时全国的生产有40%以上是工业性质的，但50%多仍然是落后的小生产，因此，没收企业、银行之后，掌握在劳动人民国家手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只能是在40%以下，大部分经济还是小生产，而小生产如果不加以改造、组织，它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例如小农民经济，如果不加以组织、改造，就会自然而然地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少数的农民上升为富农，另一部分破产变为贫农、雇农，变为农村无产阶级。这一种分化，就是表现农村中生长了资本主义。所以，在生产比较落后、小生产成分比较多的国家，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不仅仅要消灭已有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要防止、限制小生产的分化，使它不要生长出太多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要把它组织起来，加以改造，首先经过合作社然后进到集体生产，例如组织集体农场等。要完成这一些任务，就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俄国革命以后，是经过了以下的时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把资本主义残余消灭，把小生产加以组织、改造，一直到把它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俄国革命后，苏联工人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所经过的时期是这样的：第一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这时革命刚刚胜利，工人阶级的专政还不稳固，世界大战的破坏使经济上发生很大困难，14 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帝国主义的

领导之下，侵入苏联国土内进行武装干涉，想要用武力来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为了要打退外国的武装干涉，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就不能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把农民的多余粮食都征发出来，交公家分配，这样来保证革命政府有足够的物资来支持战争。这个时候，是从1917年10月到1921年，经过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共同的艰苦斗争，终于把外国武装干涉粉碎了，把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克服了，使革命政权稳定下来。第二，1921年以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结束了，就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首先是要恢复被战争所破坏了的生产力，准备到一定的时候，国家在经济上有了足够的力量做基础，就进行消灭资本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工人阶级国家把一切大银行、大企业以及一切经济命脉掌握在手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企业，同时为了恢复生产，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企业力量不够强大，暂时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甚至于有时还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例如说，把国家工业所生产的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业品，交给资本家的工厂去加工完成，这叫做加工制，或者把一些矿山之类的企业，在一定条件下租给资本家经营，这叫做租让制。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在苏联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下面，包含着以下的五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家所经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二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第四是小商品经济，第五是带农村公社性质的族长经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国家政权用主要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家经济的领导下面，把小商品经济组织到合作社里，使它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斗争。这一个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经济逐渐成为优势，最后是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在全国各方面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在农村里消灭了富农，建设了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在城

市里消灭了资本主义残余。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就完成了，社会主义就实现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大体上就是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才终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实现了全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的。

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到这里就完了。

第四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三章第四个题目，这一个题目的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环境里发生的。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革命，如像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后，才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所以，要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先了解它的时代的背景，必须先说明一下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革命形势。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世界的资本主义就进入了总危机的时代。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我们说总危机，是说和以前的危机有根本的不同。以前的危机，虽然在它爆发的时候，也多多少少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发生了动摇，使资产阶级的统治面临到了垮台的危险。但是，这种危机经过一个时候又稳定下来，逐渐又转为繁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就低落下去，资本主义的存在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又恢复到相当的稳定。所以，在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虽然也有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是最后都失败了，最大的例子，例如 1871 年法国巴

黎公社的革命，无产阶级已掌握了两个多月的政权，仍然失败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顶点，世界的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失去了进一步向前扩张的余地。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扩张地盘，缓和自己的危机，只有向别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在互相火并中削弱下来，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间找到比较薄弱的一环，来加以打击，把革命引向胜利，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开始真正的垮台。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垮台的第一个国家。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个别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好像得到暂时的经济上的稳定，例如美国帝国主义，不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占了很多便宜，甚至在经济上也得到了暂时的军事的繁荣，但是，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的余地已基本上没有了。因此，真正经济繁荣的恢复，已经是不可能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繁荣，时间也是非常短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已 5 年的时间，帝国主义各国的经济情况，连美国在内，是越来越恶化了。所以，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已进入了总危机的时期，恐慌已和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不同，它是越来越发展得深刻了，是要把资本主义世界一步一步全推进到坟墓去了。这就是说，帝国主义的经济上的总危机时期，也就是它走向总垮台时期。而在事实上也是如此，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起，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走向垮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出现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接着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及越南及其他殖民

地国家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发展。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垮台了，从而也就使它们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使它们的世界统治更不稳了。

总之，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情势就起了一种新的变化，这就是说，全世界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也就是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全世界各国将要一步一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统治，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地建立起劳动人民的统治，全世界一切国家，最后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时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革命运动，对于帝国主义世界统治都会成为一种打击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都会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都会为帝国主义世界增加一份催命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下面，全世界就分成了两个大的互相敌对的营垒，一方面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另一方面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人民的革命营垒。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产生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参加了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营垒。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完全对的。这种情形，就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性质。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人民，一定要和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一定要和苏联以及其他人民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在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已经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得到了基本的胜利，这些胜利，首先应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斗争的结果，但同时不能忽视，这也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各国人

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没有世界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配合，中国人民今天的胜利是不能想像的。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没有站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营垒方面，并且当时也没有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营垒。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时，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就没有一点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的民族主义，仅仅是包含着反对满族统治的一点内容。对于帝国主义者，孙中山先生不但没有明白地提出任何反对的思想，而且相反的，他常常想联合某些帝国主义，常常梦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达到中国革命的目的，这种想法，当然是要碰钉子，要遭受失败的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帝国主义联合反动封建军阀袁世凯，对革命势力进攻的结果。但是，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失败，孙中山先生仍然没有想到要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一直到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了独立的革命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到这时候，才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来。孙中山先生接受了这口号，和共产党建立合作，把反帝和反封建的口号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中心口号，这样，中国的革命运动，才开始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才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因为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是互相勾结、压迫人民极厉害的反动统治者，这一个反动派的统治，阻碍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妨害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停止在小手工业、小农业的

阶段，不能前进，使中国工业非常落后，经济衰落，使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所以必须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使人民得到解放，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这就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还不是要打倒一般的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因为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多多少少受着排挤和压迫，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时期内，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也是多多少少有些革命性的。同时，因为中国工业太落后，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为了要迅速发展生产，使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作为一种辅助，是有好处的，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要一般的推翻资产阶级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相反，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忘记了这一点，对资本主义采取了一般消灭的政策，对于有利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不采取保护的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不采取团结的政策，那就会犯错误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也必须是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才能够得到胜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领导这个革命，因为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软弱，在反动统治下面，它一方面固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但在许多方面又要依赖反动统治者，和反动统治者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本身是不可能提出坚决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张来的，而在中国，如果不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使中国革命得到真正彻底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孙中山先生自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到了临死的时候还是只得作出一个不很愉快的结论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政策，并且为着这些纲领政策的实现，领导着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坚决进行斗争，才不过经过了 28 年，就得到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力量来完成的，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动统治，不能把主要依靠放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而主要的，必须是把广大的农民动员起来，在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下面，才能形成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力量，来打垮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就是这样做的，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斗争，作为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为着这个目的。并且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在 28 年的短时间里，得到震动世界的胜利。所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工农联盟作为基础的。在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中，也绝不能忘记了这个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很必要的，但是因为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软弱性和它的经常动摇的性质，使无产阶级不能不在这一方面对它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经过适当的斗争，才有可能在革命的原则上争取团结它们。同时，资产阶级为了利润的目的，在经济上常常要采用反动统治下惯用的投机垄断等不正当的方法，采用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危害国计民生的方法，以至于超出

了正当工商业的常轨，搅乱了人民的安定的生活，违背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原则，在这种情形下，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方面的坏行为，就不能不经常加以批判和制止，不能不进行教育、改造和其他适当方法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走在一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的轨道上，才能使它发挥生产上的积极作用，帮助生产力发展，而不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的是依靠了革命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达到推翻反动统治的目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武装形式。斯大林曾指出："武装的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的代表，几乎同时都是一些掌握强大武装的军阀，他们依靠着帝国主义的帮助，用封建性的法西斯的极野蛮的方法来压迫人民。为要推翻这种武装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人民首先不能不在乡村地区建立革命的根据地，组织人民的武装，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人民革命战争。中国革命人民的武装斗争，从江西井冈山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最后经过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基本上打垮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在还要继续准备解放台湾，准备完全摧毁它的一切残余势力。中国人民用武装打垮了反动统治，就建立起人民的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政权下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把它变为人民国家的财产；有步骤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逐步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把它变为农民所有的土地；这就是说，要在经济上消灭和帝国主义相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过渡性质的生产关系。新民主主

义经济，总的说来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还不要消灭资本主义，相反的，还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面，在国营经济领导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条件下面，发展资本主义，保护民族工商业。但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要使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要由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经过一定的建设和发展的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里，包括着五种经济成分：第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这是指人民国家的各种国营工商业和银行，以及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之后所建立的人民国家的经济；第二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这种经济是以小农业、小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组织成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面的各种带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第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国家经济领导下面按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经营的民族工商业；第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包括加工制、定货制、租让制等形式；第五是小生产者的个体经济，包括没有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下面，国家用主要的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并且用很大的力量努力把一切小商品生产者组织在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里，使它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经济；适当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使中国的工业能够比较迅速的发展起来；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人民进行教育和改造，首先肃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并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旧社会得来的坏思想、坏习惯，使人民脱离国内外反动派所指的道路，使人民的思想能够适应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需要，并为社会主义的转变作思想的准备。这样，经过一定的时期，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可以使革

命由第一个阶段，转向第二个阶级，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很明白，要使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要有一个能够领导这个转变的国家政权，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国家政权，才能够坚决准备前面所说的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才能用主要的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才能够教育农民，使他们由个体的小生产者逐渐变为集体的劳动者，才能够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改造，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来发展工业，而另一方面，对于它的投机性、盲目性以及其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面，进行必要的斗争。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而是资产阶级领导，那么它就要实行无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就表现在共产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共产党对于军队、警察、保卫机关以及一切主要国家机器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国家的武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保证坚决执行上面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才能保证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时不至于受到严重的特别是武装的抵抗，才有可能避免流血的斗争。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还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因为，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不是当作革命的朋友。我们说苏联是工人阶级专政，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明的。在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下面，在目前的阶段，并不需要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而只要消灭一部分反动的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对于民族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私有经济，则一般的都加以

保护，在政治上，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朋友，并且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与国家政权。因此，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现阶段，还只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

第三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这里就讲完了。

第四章　政治和国家

第一题　什么是政治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四章。这一章所要讲的内容，是关于政治与国家的问题。我们准备把这一章分作三个题目来讲：第一，什么是政治；第二，什么是国家；第三，什么是政体。

今天就讲第一个题目：什么是政治。

对于政治这一个名词，中国历来有一种很模糊的了解，认为凡是管理许多人的公共事情的，都叫做政治。或者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究竟政治是不是仅仅是管理众人之事呢？当然不是。简单的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太抽象、笼统的说法，它只会把我们的认识弄得很糊涂，隐蔽了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隐蔽了政治的阶级性，使我们弄不清楚现在我们常说的政治究竟是什么东西。

究竟什么是政治呢？要怎样来了解政治这个名词，才不会糊涂呢？要了解我们现在所常说到的政治，要对政治的认识不至于产生糊涂思想，首先不能忘记了以前讲过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阶级社会，而在阶级社会里，

政治和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绝不是简单的对于“事”的管理，而是对于“人”的统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那些主张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的人，他们在实际上也是主张由某些统治阶级，由地主或资产阶级来“管理”劳动人民。他们的那种说法，仅仅是把这种阶级统治的内容隐蔽起来罢了。例如解放以前的旧中国的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以及广大人民对这统治的反抗。新中国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也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对残余反动势力的统治。

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并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在人类社会没有出现阶级以前，也就是在原始公社时代，只有一种原始的民主生活，而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政治。那时候社会的领袖人物，如氏族长、部落长之类的人，他们的职务倒的的确确是管理众人的公共事情，他们只执行众人开会决定的或众人同意的各种事务。他们自己也是由众人直接选举出来的；大家把他们选出来，是为了管理大家的事情，他们绝不是代表任何阶级来统治或压迫部落里及氏族里的其他人，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没有阶级社会里的这种政治的性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同样没有任何阶级，因此，将来社会组织机构的领导人物的职务，也是仅仅替社会的全体成员管理经济、文化等公共的事务，他们也不是代表任何一个阶级来统治其他的阶级。因此，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和现在阶级社会里的这种政治的性质，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政治，是阶级社会里产生的现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首先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奴隶主阶

级为着保证对奴隶阶级的剥削，实行对奴隶的统治，就有了奴隶社会的政治。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出现以后，地主阶级统治了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这个统治是以皇帝为最高的代表，皇帝之下又有王、公、将、相以及各种等级的官僚士绅，一层加一层的压在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身上，像一座宝塔压在土地上一样；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都是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这种统治的根本目的，是为要保证剥削阶级在经济上能够经常的剥削劳动人民；因此，劳动人民要想从经济剥削下面把自己解放出来，要减轻剥削或者消灭这种剥削，就不能只限于在经济上反对剥削，而且不能不在政治上反对剥削阶级的统治，也就是不能不对剥削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被剥削阶级如果不知道对剥削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也就不能在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中国两千多年来多次的农民暴动，虽然推翻了某些皇帝的朝代，但没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新的皇帝朝代仍然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所以农民始终没有脱离了被残酷剥削的地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皇帝的统治，但是在北洋军阀的以及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府里，地主阶级仍然和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共同占据着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所以，中国的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仍然不能从经济上被剥削的情况中间把自己解放出来。世界劳动人民第一次真正在经济上的解放，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并且用工人阶级的专政来代替旧的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样，才使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从经济上的被剥削的地位彻底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由的工人和农民。中国的工

人和农民，今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使自己成为政治上最主要的统治者。这样，中国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的劳动人民，在今后就有可能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得到经济上的彻底解放，也可以得到思想上文化上的解放。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下面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组织合作社，实行城乡互助等等的农业政策，以及把官僚资本的企业变为人民国家公共的企业、私营企业中的劳资两利、劳资协议等等的工业政策，这些政策就是中国劳动人民从经济上解放的最初的步骤。这些步骤，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如果工人、农民没有政治上的主要统治地位，是不可能保证实行的。

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就是经济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阶级斗争的集中的形式。剥削阶级如果失去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不能保证在经济上长久剥削劳动人民；同样的，被剥削阶级如果不在政治上反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并且最后争取到自己的本阶级统治，就不可能希望减轻自己所受的剥削和最后消灭剥削。因此，劳动人民要争取自己的解放，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而不能仅仅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就认为满足。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觉悟的工人阶级就要反对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因为经济主义就是仅只知道要求争取经济的利益，完全不知道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甚至于反对进行政治斗争。改良主义的错误，就是不知道应该根本推翻反动的剥削阶级统治，幻想在剥削阶级统治下面，经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改良的道路，而使劳动人民得到解放。这些错误的思想，已经有许多历史的事实证明它的破产了。在反动统治下面要想使劳动人民得到真正的经济解放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

面，中国的工人、农民长久的痛苦生活，就是明显的证据。希望反动统治者实行真正的改良，也是幻想；在中国有些人曾经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上实行改良，这种希望不是也屡次碰了钉子吗？所以，真正的阶级斗争不能仅仅是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所谓政治斗争，就是各阶级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是依靠政治统治来达到剥削和压迫全体劳动人民的目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要争取自己阶级的解放，就不能不向着反对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以及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方向前进。在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就必须要努力来巩固这个统治地位，也就是要坚决的镇压被打倒的反动统治阶级残余势力，使他们没有再翻身的机会。革命人民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或者不重视这些道理，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斗争得到真正的胜利。例如：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人民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如果不懂得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坚决镇压与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镇压和肃清他们的特务走狗，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巩固自己的胜利。

凡是阶级觉悟高的人，也必然是在政治认识上坚强的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悟分子，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就不仅仅要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懂得考虑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要考虑本阶级的彻底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懂得如何组织广大人民的力量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及建立和巩固革命阶级的统治，也就是首先要懂得政治斗争。不懂得政治斗争，只注重争取眼前的利益，而不懂得如何争取和维护本阶级的真正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

要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要考虑政治斗争的战略、策

略问题。正确的战略、策略，就是要能够团结最广大的革命势力，就是要尽可能使敌人的势力孤立、削弱，就是要能够组织最广大的革命队伍，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革命敌人。这样才能够有力量推翻敌人的统治，并在推翻敌人统治之后，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要布置广大的革命同盟军，或者也叫做建立广大的革命政治统一战线。例如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首先就要团结一切革命阶级，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还要尽可能利用敌人的矛盾，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某一部分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暂时联合另一部分敌人，或者使这一部分敌人保持中立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例如，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利用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汪精卫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在一个时期联合了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同时又不断的和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进行严酷的斗争，使抗日战争减少了许多阻力。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首先要联合广大的农民，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最基本力量，没有工农联盟做基础，要想在政治上打垮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最主要的就是靠农民的支持，这是谁也看得清楚的。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也必须要联合农民和组织农民来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肃清反动的残余势力，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巩固人民的统治。在建立新民主义政治的统一战线中间，联合小资产阶级也很重要，一般青年学生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的和不小的革命力量。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也是统一战线中不可少的环节，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能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斗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也有它的重要性。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它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常常保持着许多联系，常常要和它们妥协；因此对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工人阶级不能不在革命运动中进行适当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常常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投机性，特别是因为过去长期的受着官僚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习惯于适应投机垄断、通货膨胀的不正常的经济生活，而不很习惯于经营正常的工商业。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能不对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教育和改造。但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教育和改造，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的政治统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就不可能领导革命斗争达到胜利。轻视革命的统一战线，就是政治认识不够的表现，也是阶级觉悟不高的表现。

现在再谈一谈关于政党的问题。近代的政治斗争都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的，各种政党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阶级来争取政治上的统治；例如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党，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能代表一个阶级的政党，都是这个阶级中间政治认识较高的集团，这个集团把本阶级的要求，集中成为一定的政纲政策，它有一定的适合于进行政治斗争的组织，它有较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因此，它就能够代表本阶级，领导本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党派都能够代表本阶级全体的利益。例如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分裂为各种集团，它们中间的利益多少总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会产生两个以上的政党，代表同一阶级的不同集团的利益。例

如美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历来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着美国大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不久以前，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中间，又化分出一个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就是进步党。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有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着英国大资产阶级的几个不同的集团。工党在名义上虽然叫做工人的党，实际上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它的领袖利用工党的名义，来欺骗以至于收买一部分落后工人，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它仍是代表英国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真正完全代表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政党，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列主义的党——各国共产党和有些国家的工人党和工人统一党等；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工人阶级中间也有不觉悟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受到了小资产阶级甚至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工人阶级中也有不同的阶层，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导集团是工人贵族阶层的代表，而工人贵族的利益是和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利益相联系的，因此，他们又代表了金融寡头帝国主义的利益。工人阶级中间不觉悟的部分，也常常受到工人贵族阶层的影响，因此，在工人中间除了马列主义的党，除了各国共产党以外，还会产生机会主义的党、改良主义的党，例如：英国的工党、欧洲的右派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这些党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的，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党是绝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而只能欺骗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统治。只有共产党，有些国家的工人党和工人统一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中左翼的部分，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能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一直达到胜利。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先锋队伍，是工人阶级中间觉悟最高和组织最坚强的集团。共产党，为什么是工人阶级中间觉悟最高和组织最坚强

的集团？因为，它在思想上是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因此能够看清楚社会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能够掌握正确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它有严格的纪律，有高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工人阶级有了这样一个党的领导，在革命的政治斗争中间，就不致于迷失方向，就能够团结广大的革命人民，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革命人民的统治，并能够逐步争取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我们说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一定要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也就是由于上面所说的这些理由。

关于什么是政治的问题，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第二题　什么是国家（上）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四章的第二题目：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家？只要了解了什么是政治，也就容易了解什么是国家。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关系，一个阶级要怎样才能保证对另外的其他阶级实行统治，那就是要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一定的适合统治的工具；一个阶级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权力和工具，就是国家。这种国家的权力和工具是依靠什么存在的？它主要的就是依靠一些暴力，例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侦探组织以及应用这些暴力的机关。政府就是这种机关，就是统治阶级应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侦探组织等等的暴力机构来实行统治的机关。政权就是一个阶级应用国家工具来实行统治的权力。一个阶级要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要掌握国家的政权；就必须要有权掌握统治国家的工具，也就是要通过政府机关，把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侦探组织等等

的暴力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一个阶级如果不能够控制和应用这些暴力，就不可能维持本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如果统治阶级手中所掌握的暴力削弱了或毁灭了，那就是说它的统治力量削弱了或者消灭了，那么，它的统治地位也就要动摇或者甚至于垮台，在这种时候，如果在这种统治下的革命人民势力相当强大，就可能把统治阶级推翻。1917 年俄国的工人农民在二月革命时候能够推翻沙皇政府，在十月革命时又推翻了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主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的强大发展，但是沙皇的俄国军队，在大战中吃了许多败仗，武装力量大大削弱，后方的军队，又大部分在革命期间转到工农人民方面来，拒绝作为反动派用来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所以能够打垮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打垮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首先就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三年多的时间前后消灭了蒋介石手下的八百多万反动军队的缘故，如果不是消灭了这许多反动的军队，如果不是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个重要的国家工具，要打垮反动派的统治，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是不可以想像的。

所以，国家是阶级对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并不是简单的由土地、人口、主权结合成的东西，土地、人口、主权，只是国家成立的几个必要条件，仅仅土地、人口、主权三个条件，并不能表示出国家的真正性质。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如果说国家仅仅是由土地、人口、主权结合成的东西，那就模糊了国家的阶级性。国家是在阶级社会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掌握国家工具的统治阶级就决定了国家的性质。资产阶级统治的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苏联，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两种国家，是性

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国家。这个不同的详细内容，等下次慢慢再讲，这里暂时不谈。这里只说国家是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跟着阶级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家不是天生的，不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一开始就有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人类社会没有阶级对阶级统治，原始公社的氏族长、部落长之类的人，他们只是替氏族、部落内部的众人管理公共的事，不是代表一个阶级去统治和压迫其他的阶级，因此，他们也就不需要去掌握任何特殊的暴力和应用暴力机构，来保证一部分人维持对另外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原始公社的部落和部落之间，有时候也有冲突和战争，因此，有时也要使用武装和暴力，但是，原始公社的武装和暴力，是掌握在社会全体人员的手里，社会上人人都是生产者，除去老弱妇女之外，人人也是战士，武装暴力是保持在社会中间的，而不是凌驾在社会上面的，不是保持在一定阶级手里，用来压迫社会其他人民的特殊集团和工具。原始公社里如果需要战争，需要应用武力，都是由全体人员共同来决定，由社会的全体来组织武力，战争的指挥者，也是临时选出来的，战争一结束，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生产者，不能把武力长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能经常保持特殊的军事领袖地位，仅仅到了原始公社快要垮台的时候，指挥战争的人和打仗的人，才逐渐的和普通的生产者分开，才逐渐固定化起来，成为专门职业。但是这种专门化了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要在氏族与部落内部来统治和压迫任何其他的人，主要的是为了和别的部落打仗，因为在这种时候，原始部落中间已经发生了私有财产和奴隶的使用，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了互相抢夺财产和抢夺奴隶的斗争，使武力的冲突逐渐变成经常的事情，使战争逐渐变成经常的事情，因此部落中间也就产生了经常的专门化的武装组织。武装力量的专门化，就成为后来

产生国家的准备条件，就成为少数人可以应用武装暴力来统治和压迫多数人的条件。但是，仅仅原始公社的专门化的武装组织，还并不就是国家，要把这种武装组织转变为国家的工具，是在奴隶制度发展扩大成为支配社会的主要制度的时候，也就是在奴隶社会正式出现的时候，这时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尖锐起来，奴隶主和奴隶中间的阶级斗争渐渐成为不可调和的，这时奴隶主如果不使用暴力镇压的方法，便不能保证剥削奴隶，维持剥削者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时原来的军事指挥者变成了奴隶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因此他们手中的武装力量就成为被奴隶主阶级所掌握的东西，成为奴隶主阶级利用来统治和压迫穷人和奴隶的工具。武装力量被奴隶主阶级所掌握、所利用，成为奴隶主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这时候，就有了奴隶主专政的国家。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出现以后，地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维持统治，也是依靠一定的武装暴力和应用这种武装暴力的封建政权机关，例如利用皇帝直接掌握的军队、封建诸侯掌握的军队、封建军阀的军队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僚机关、法庭监狱等，这些军队组织和官僚机关、法庭、监狱等等服从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服从于皇帝、诸侯、军阀之类的人物，成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和压迫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暴力组织；这就构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的工具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被资产阶级用来统治和压迫工人阶级，例如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有人以为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也算是民主国家，以为在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人人都是自由的，那是只看见政权的表面形式，而没有看见真正的事实，那是受了反动资产阶级的欺骗，那是没有看见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内

部，首先工人阶级是没有自由的，如果一定要说是有自由的话，那也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被剥削的自由和失业的自由等等，而绝没有反对过分剥削和反对失业的自由。要揭露这种欺骗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只要看在这些国家里面，当工人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过分剥削，起来罢工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府就要派军队、警察、宪兵去对工人进行干涉和镇压；只要看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经常受到这些国家政府的迫害，例如：美国共产党11个领袖不久以前就无缘无故的被美国政府判处了徒刑，只要看一看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究竟是什么人的国家了。

旧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绝不肯承认国家的这种阶级性。他们要常常收买许多学者文人，制造各种各样荒谬的国家学说来隐瞒国家的这种阶级性，这些学者文人把国家描写成神圣的东西，把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国家制度看作天经地义，看作不可改变的东西，他们把国家描写成好像是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的东西，例如，蒋介石国民党反对派，曾经不断地宣传过“国家至上”的思想，曾经不断地宣传“国体”不可改变的思想；这一些宣传，都是要想隐瞒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的国家的阶级性，都是想隐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来残酷的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的事实。蒋介石政府的国家，实际上只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国家，他们所谓的“国家至上”，实际上只是指四大家族的利益至上，凡是对于四大家族的利益有些微损害的事情，他们就要宣布说，这是妨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他们就要使用国家的暴力来反对这样的事情。国家在形式上是代表全体国民的，但在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凡是有阶级存在的国家，它所代表的，都是国民的一部分的利益，或者是一小部分，或者是极大部分。由剥削阶级作为统治者的国家，都只是代表国民的一小部分，即代表

一小部分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的，它却要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由劳动人民的统治的，或主要由劳动人民统治的国家，例如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代表绝大部分的国民，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总之，一切国家只是代表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代表被统治的、被压迫的阶级的利益。所谓国体，实际上就是指国家的阶级性，就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就是说某些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而另外的阶级是被统治者。我们说到美英帝国主义者国家的国体时，这就是说美英的大资产阶级是美英国家的统治者，工人阶级及其他人民都是被统治者，美英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只是它的政权的外表形式，只是它的政体，而不是它的国体，这种政体使它在外表上看来似乎是民主的国家，而如果从国体的实质上看，就可以知道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我们说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国体时，就是说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旧中国的统治者，而广大的其他中国人民都是被统治者。旧中国是反动派专政的国家，中国人民在这种国家下面是毫无自由的。由此可见，反动派所拥护的国家，并不是神圣的，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而相反的是很恶劣的，是服从少数剥削者的最狭隘自私的利益的，因此也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拥护的国体，也绝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而恰是应该根本改变并且已经被中国人民根本改变了的。这就是说，这些反动派关于国家的神话迷信，关于国体不可改变的胡说，现在已经在事实面前完全破产了，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把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永远打垮了。

旧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不肯承认国家的阶级性呢？为

什么一定要用各种神话迷信的胡说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性呢？因为他们的国家是极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的国家，因为他们必须要利用国家工具，才有可能维持他们少数人的政治统治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如果不在劳动人民面前隐瞒着国家的阶级性，如果劳动人民认识了国家的阶级性，那么，劳动人民就会懂得如何来反对反动剥削阶级，就会懂得争取自己解放的最主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要打垮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就是要根本改变旧的国体。因此，反动统治者就一定要把国家描写成代表国民全体的，以这样的谎话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因此，觉悟的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就应该认识国家的阶级性质。应该懂得国家工具并不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应该懂得，反动的国家政权是反动阶级利用来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如果不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劳动人民要想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利用国家的暴力来维持统治，因此，劳动人民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也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要和这种国家暴力发生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反对反动监狱和反动警察的斗争，发生武装暴动，甚至发展为革命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发展，革命战争是革命的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的革命，就是以武装的革命战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革命阶级要想得到胜利，就不得不积蓄力量准备对掌握了国家暴力的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或革命战争。当反动统治阶级的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国家工具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面，革命的人民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革命的胜利，那一定是幻想，这种幻想对于革命人民的斗争是非常有害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受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间，曾经有过一种议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这种

错误思想，就是不准备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而以为可以采用更便宜的方法，也就是在议会里进行和平的政治斗争方法，争取选举票的方法，来取得工人阶级统治权，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中间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没有能够仅仅经过议会斗争争取到真正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利益。中国人民也曾经有一部分人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抱过幻想，例如在旧政协会议时候，有些人就以为可以经过这个会议，使国民党反动派放弃四大家族的法西斯的反动统治，实现民主政治。大家都知道，这种幻想，后来就被蒋介石发动的进攻解放区的战争所冲破了。反动统治阶级常常要利用各种手段来引起人民的错误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性和警觉性，使他们便于维持自己的统治，便于向革命人民进攻。中国的革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就没有被这种错误的幻想所麻痹，能够有所警惕，有所准备，因此在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就能够发动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并且在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反动军队，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工具，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革命人民胜利的经验，也就足以证明，在反动派掌握着强大的国家工具的时候，在这种反动的国体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形下面，革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在这种情形下面，只有经过武装斗争打碎反动统治者的国家机器，把反动统治阶级打倒，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人民的革命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胜利。

今天只讲了什么是国家这个题目的上半段，还有下半段等下次再讲。

第三题 什么是国家（下）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继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四章的第二个题目：什么是国家。前一次只讲了这一个题目的上半段，今天讲这个题目的下半段。

前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国家是一些阶级统治和压迫其他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并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国家是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就没有国家；同样，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在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之后，国家也就会跟着衰亡下去，因为在那时候就不会再有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事实，因此，阶级统治阶级的工具，即国家工具，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由此可以知道，国家并不是如过去剥削阶级统治者所宣传的那样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东西。一切国家，都有它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

人类社会要怎样才能达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以前已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大机器工业，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组织在大的工厂和企业里面，使生产过程有了一种社会公共的性质，使劳动不再是封建社会的那种小生产的个体劳动，生产过程中的这种社会的公共的性质，就产生了共产主义的需要，也就是产生了要把社会的生产资料收归劳动者公共所有的需要。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了大工业的生产力，就给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准备了物质的基础。当然，只有这个物质基础，还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国家的统治者，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个人私有，而不是归劳动者公共所有，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的工具，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保护资

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阻碍工人阶级把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公共所有的东西，阻碍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首先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时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劳动人民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掌握了自己的国家工具，就可以用来保证自己的统治，用来保证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也就是保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人民国家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把国家的经济加以根本的改造，第一步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设初步的共产主义，然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在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而是已经实现的事实了。苏联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在自己国家的范围内完成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任务，并且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也建立了在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在实行消灭资本主义财产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任务，并且正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苏联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及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是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说这些国家都是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国家，这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这些国家的惟一的主人，而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劳动人民却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这

样说是不对的。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下面，工人阶级以外的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统治都保持有一定的地位，例如在苏联，工人阶级的专政是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盟，经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劳动界的联盟来实现的。我们所以把这个国家叫做工人阶级专政，把那个国家叫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或者都叫做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的个人私有制，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及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这样的任务，是觉悟的大工业中的工人阶级所提出来，而不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所能提出来的。因此，把实现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国家，就叫做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要消灭资本主义及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要镇压和消灭国内外资产阶级对于实现这个任务的反抗，是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的，要使这个斗争获得胜利，需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联盟来共同努力，这个联盟必须表现在国家政权中间。因此，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联合统治的国家，也是一种人民的民主国家，凡是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及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而斗争的劳动人民，都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定的统治地位。当然，这一个广大劳动人民联合统治的国家，是一定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定要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因为国家的任务是觉悟的工人阶级所提出的任务，而不是其他阶级所提出的任务，虽然这个任务的实现，对于其他劳动人民都有利益，因此在这个任务的号召和动员之下，其他劳动人民都可以和工人阶级结成斗争的联盟，但是，如果不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如果不是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劳动人民的联盟就不会坚固，这个任务就不可能贯彻，不可能实现。

各位听众！你们听到这里，或许会问，说：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联合统治的、人民的民主国家，而我们的新中国，也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联合统治的人民民主国家，那么，能不能说新中国也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或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国家呢？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新中国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人民的民主国家，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就新中国的现阶段的性质来说，还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因为，新中国国家现阶段的任务，还不要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实现新民主主义，也就是还不要一般的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阶级剥削制度，而是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要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变为人民国家的财产，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变为农民私有的土地，而对于民族工商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把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把这一部分企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此外，对于一般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都加以保护，并在国家经济的领导下容许它相当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看作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成员，而不是看作革命的对象。在政治的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中间，民族资产阶级也占有一定的、虽然不能是主要的地位。新中国的这些特点，是由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所规定的，这些特点，就表示新中国国家是不同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说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最正确的说法，仍然只有一个，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国家。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新中国现阶段的国家，只是过渡形式的国家，在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只是为要准备经过一定的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过渡到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阶段，过渡到工人阶级专政的阶段。这一个过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曾经有些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怀疑我们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也有些农村中的工作者，以为把小农民集合起来吃大锅饭，就算是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就认为今天也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又是不懂得实行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的工业生产力作为基础。在农村里，必须要大规模应用农业机械，才有可能组织集体农场，也就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10%的成分，而90%都是小生产，而农村的生产都是小的农业，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是绝不能组织集体农场，绝不能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化的。由此可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以内，中国的国家还不是工人阶级专政性质的，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面，经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是必然要实现向工人阶级专政过渡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这个过渡，我们有可能争取做到稳健的转变，避免像俄国革命那样激烈的武装革命，但不能忘记，苏联的国家，仍是指示着我们发展的方向，仍是指示着我们努力的目标。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指出：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我们的新中国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等等，既然都是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广大人民统治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就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完全新式的国家，是俄国

十月革命以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家。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所有过的国家，例如奴隶主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现在还存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动阶级所统治的国家，都是旧式的国家，这些旧式的国家，都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由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国家。这些国家只保护和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广大的人民，在这些国家内部，只是一些没有权利的国民，他们的利益以至于生存，都得不到国家的保障。这一些国家，在形式上虽然好像是代表着全体国民，但在实际上，这些国家里的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是没有真正的代表自己的国家的。例如美英帝国主义国家，对于美英的工人阶级来说，就不是他们自己真正的国家。工人阶级如果把这些国家看作真正代表自己的国家，那就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的来源有两个，或者是因为自己不觉悟，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或者因为他们是工人中的特殊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他们的利益和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利益有着联系，和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有着联系的缘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用“保护祖国”的口号，来号召本国工人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法西斯国家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希特勒之流的民族侵略主义的狂妄思想的欺骗，参加了法西斯侵略战争，这些就是反映了不觉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贵族阶层的错误思想。工人阶级参加了这种反动的战争，并不是真正保护了自己的祖国，而只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国家，去侵略别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是加强了本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统治和压迫，加深了本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痛苦。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悟的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要反对所谓“保护祖国”以及民族侵略主义的欺骗，使帝国主义

战争失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变为国内的革命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觉悟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旧式的国家里面，“保护祖国”和“民族独立”的口号，在任何情形之下也没有一点意义。例如在被侵略的民族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即使是在反动派统治下面，保护祖国和民族独立的要求，对于广大人民也是有很大意义的，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因为一个民族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受痛苦最深的首先是劳动人民。而剥削者和反动统治者则常常是要向敌人妥协投降，和侵略者共同来压迫和剥削本国本民族的人民。在这种情形下，爱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正是广大人民自己的事情，民族斗争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的阶级斗争是一致的，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劳动人民自己的解放是一致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是要在独立的民族范围内，才比较容易生长和壮大起来，才比较容易准备自己解放的条件，在民族被侵略的时候，劳动人民积极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自由进行斗争，就能锻炼和发展自己的力量。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前，中国人民中间所发动的救国运动和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而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也是在这些斗争中大大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政策的压迫，而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总是对美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把压迫的负担，全加在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身上，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面，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也要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但是，劳动人民在这种情形下提出保护祖国和民族独立的要求，并不等于说把反动剥削者的国家当作自己真正的国家，并不是认为值得保护的就是这反动

的国家。相反的，这种要求之所以成为广大人民切身的要求，是因为反动统治者对于侵略势力是动摇的，是常常要向敌人妥协投降，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广大人民为保护祖国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必然就要结合着对反动统治者的斗争，而最后目的也就是要建立能够代表人民自己的国家，如像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就是这样的情形。

新式的人民的国家，和旧式的少数剥削阶级的国家，在历史任务上，也是根本相反的。旧式的国家，它的任务就是要维持一定的剥削阶级的统治，维持一定的阶级剥削制度，例如旧中国的国家，曾经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来维持四大家族的统治，利用来维持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剥削制度。帝国主义的国家，是要维持大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持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制度。旧式的国家，代表了少数剥削阶级，对内镇压被统治的人民，对外所采取的政策，也是按照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来决定的，这些国家有时也能多少抵抗外来的侵略，有时又对侵略者妥协、投降，有时本身又成为向外压迫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侵略者，不管怎样变化，这些国家的行动总是服从一个惟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某些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利益长久维持下去，就是要努力保持国家的一定的阶级性质，就是要努力使一定的国体维持下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保持它的国家的“国体”不变，“法统”不变，不惜把中国的一切权利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要保持“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主义”不变，也就是为了要保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变，要为它的十分过剩的生产品和资本寻找市场、赚取独占的利润，就实行了向全世界扩张基地的侵略政策。这些就是旧式国家的任务，这些任务显然是和新式

的人民民主国家相反的。新式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任务，不是要维持任何剥削阶级的统治和阶级剥削制度，而是相反的要一步一步走向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方向。不论是实行工人阶级专政、以消灭资本主义及剥削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国家也好，不论是首先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好，总之最后的目的是要使一切阶级消灭，因此也就要使阶级对阶级的统治成为不必要，也就是要使国家最后自然地衰亡下去。但是为要完成这些任务，并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使国家衰亡下去，相反的，在阶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就要加强国家、加强人民统治力量，这样才能保证一步步完成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以至于使国家自己衰亡的任务。因此，在人民的国家里，人民就应该努力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发扬人民在历史上反对窃国和败国的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传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比过去一切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人民有了最强大的国家工具，才有可能镇压一切国内反动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打垮一切国外反动势力的侵犯，并团结广大人民进行经济的和文化的改造和建设工作，来完成上面所说的历史任务。苏联劳动人民为自己建设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国家保卫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器，所以它就能够在国内彻底粉碎了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公开反抗和暗中的阴谋破坏，并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就能够把强大帝国主义的进攻，如像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打垮，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在苏联国内，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了，但由于国外还有帝国主义的包围存在，为要反对国外的阶级敌人，以及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解放，仍然要加强国家力量。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只要帝国主义包围还存在一天，就仍然需要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在目前革命胜利的情形下，

也要建设一个强大的人民国家，才有可能保证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才有可能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防御和粉碎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才有可能领导各民主阶级的人民来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反动派所曾给与的一切影响，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坏思想，以便在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之下来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准备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要分清楚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的两种性质相反的国家，新式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旧式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够分别这两种国家，就是缺乏今天的觉悟人民所必须具有的主要的政治常识，就要在认识上和行动上犯严重的错误。我们首先应该深刻的认识，今天的新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能够在今天争取到国家主人的地位，是不容易的，是多年来牺牲了无数先烈们的生命然后才换得来的。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我们爱护的，因此全国人民就要亲密的团结起来，在个人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的来参加国家的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如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保卫国家的各种强力机构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公安和保卫机关等等的工作。我们应该不怕牺牲和一切困难，用全部热忱，也就是用最高的爱国主义的热忱来参加一切国家的建设和保卫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新中国和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是真正兄弟的国家，我们的利益和将来的目标是一致的，人民国家的共同敌人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的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人民国家的共同目标是要最后从世界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达到世界大同的境地。因此，我们应该坚决的、没有任何动摇和疑

虑的和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和世界上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进步人民团结起来，互相援助来加强目前已经存在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阵线，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势力挑拨战争和反对民主的各种罪恶行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就要发挥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兄弟国家以及世界革命人民建立友爱互助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国家要发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兄弟国家和各国革命人民要发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这是一切人民国家为要争取自己的事业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什么是国家的问题，今天就讲完了。

第四题　什么是政体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四章的最后一个题目：什么叫做政体。

什么叫做政体?政体就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治制度。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政体，出现过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的政治制度，举例来说，君主制国家，贵族共和制国家，或议会民主制国家，就是过去世界各国曾经出现过的不同政体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我们的新中国，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政体既然只是表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所以政体的不同，只能说明国家政权在组织形式上的不同，而绝不能说明国家性质的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是指国家的阶级性，是指各阶级在国家里面所处的地位，也就是指国体来说的。或者也可以说，对国家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阶级掌握政权和占有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不是政权组织采取什么形式的问

题。即使是政体很不相同的国家，倘若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基本上是相同的，那么，也就可以说国家的性质也是基本上相同了。例如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美国是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两个国家的政体，或政治制度是不相同的，但是不论英国和美国，都是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因此就国家的性质来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以前已经讲过，国家是某些阶级压迫和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任何一种国家，就国体来说，都是某些阶级的专政，即使是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也不能例外。如果有人因为目前美国的政体，是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制度，就认为它不是金融寡头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只看见国家的形式，而看不见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就是不了解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正因为有许多人不善于区别国家形式与本质的不同，所以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就可以向他们施行欺骗宣传，把自己描写成民主自由的国家，隐瞒自己帝国主义的面目。而有些人也就居然相信了这种欺骗，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多年的文化侵略以及它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卖国亲美的欺骗宣传的影响。为了提高人民的觉悟，就必须区别国家的形式与本质，就必须揭露这种隐瞒。

同一种国体，同一种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形式，可以采取不同的政体。例如西洋古代的奴隶制度的国家，就曾经采取过三种政权形式：有时采取君主制，有时采取议会民主制，有时采取贵族共和制。无论采取哪种政权形式，都仍然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古代希腊罗马的国家，当它采取议会民主制政体的时候，它的民主权利，仍只能在奴隶主阶级的范围之内实施，至于奴隶，仍然是在奴隶主专政的国家下面受着非常野蛮残酷的剥削，而毫无民主权利。它和采取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国家不同

的地方，仅仅在于君主制和贵族共和制的国家，是由极少数有贵族特权的、特别是占有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而采取民主制的奴隶国家，是代表着一般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主要的是从事工商业的奴隶主的统治。封建的国家，主要的是采取君主制。在西洋，有时候也采取贵族共和制，也就是由少数贵族推出代表来共同维持统治。中国的各个封建朝代，都是采取君主制。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在政府的外表形式上有名无实地采取了议会民主制，实质上由于保留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体，因此政体本身，也仍然是以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的君主制、即军阀的专制统治作为基础，这是帝国主义帮助武装起来的反革命势力对革命人民的军事专政的制度。1927 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把这种军事专政的制度更强化了，使之带有更野蛮的法西斯专政的性质。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打垮了满清政府的君主制，政体上有了若干改变，但并没有真正消灭了中国的君主制。中国人民打垮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中国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凶恶的带法西斯专政性质的君主制朝代才算消灭了。资本主义国家，有时采取君主制，有时采取民主制，帝国主义时代的法西斯专制政体，是一种带有君主制性质的最凶恶野蛮的政权。不论采取君主制、民主制或法西斯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各种形式。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政体下面，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权利受着种种的限制，甚至于毫无权利。例如在自称为“民主”国家的美帝国主义统治下面，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是非常缺少的。美国的议会及政府机关，都被两个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所包办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用大规模的贿赂方法以及秘密的暗杀组织来操纵政治，使政府成为

它们手下的最顺从的仆役，这是稍微知道一些美国的真实政治情形的人都能够指明出来的。美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起在以前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的德意法西斯政权下面的情形，即使好一点的话，也好不了多少。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改变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并不就是国体的改变和国家性质的改变。要改变国体和国家的性质，必须根本改变国家的阶级统治关系，例如，过去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最初做了大总统，后来又要做皇帝，袁世凯做皇帝和做大总统，在政体上说，是有些不同的，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面，国体却始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始终是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当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曾有些人大做文章，说这就是国体的改变，而不知道这仅仅是政体的若干改变，不知道如果不根本推翻袁世凯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那么，不管袁世凯是皇帝或是大总统，国家的性质仍是一样的，国体仍旧没有什么改变的。蒋介石有时候做所谓“国民政府”主席，有时候又做大总统，政体和政治制度也有了若干的改变，但就国体来说，始终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袁世凯的情形基本一样，并且是比袁世凯时代更凶恶、更狡猾的反动统治。

由此也可以知道，革命的问题，就政治方面来说，基本上是革命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也就是要改变国体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改变政体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政体上有某些改变，仅仅是改变了某些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而阶级的统治关系没有根本的改变，不是打垮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并建立革命阶级的统治，来代替反动阶级的统治，那就不会是真正的革命的胜利，那就是革命的失败，像辛亥革命，虽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政体，也就是把满清皇帝统治的旧封建君主制政体改变为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外

表上是议会民主制的军阀专制政体。但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没有被打垮，并没有建立真正的革命人民的统治来代替反动阶级的统治，因此，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参加革命的人，就是由于弄不清政体和国体的分别，仅仅以改变政体为满足，以为政体改变了，革命就算是成功了，因此就常常受到反动派的欺骗蒙蔽，使反动派能够用换汤不换药的手段来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在 1927 年大革命中，蒋介石叛变了革命，用蒋介石的新的军阀统治来代替北洋军阀的统治，用所谓“国民政府”代替所谓国会制的政府，这也是仅仅在政体上作了某些改变，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体，却基本上没有改变，革命阶级的统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来代替反动阶级的统治，所以这一次大革命也是失败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常常也喜欢使用表面上改变政体的欺骗方法，幻想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要求，当人民革命的力量发展得比较强大的时候，当人民的民主要求高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会要把政体改变一下，如召开国民大会之类，伪装着他们好像也愿意实行民主了。可是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要坚持所谓“法统”不变，所谓“国体”不变。什么叫“法统”不变？所谓“法统”不变，就是要求人民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是统治阶级的正统，要求人民承认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统治有合法的根据，要求不要改变反动派的这种合法的正统地位。所谓“国体”不变，就是要坚持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所曾使用的改变政体的手段，其目的就是在于欺骗人民，使他们有可能在假民主的掩护下面来缓和革命的打击，来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就是要求不改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如果革命

人民分不清楚政体、国体的区别，如果革命人民相信了他们的这种欺骗手段，如像辛亥革命前后，有些参加革命的人相信袁世凯的统治一样，那么革命势力的发展就要受到阻碍，革命就不能前进。可是久经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已经不再是那样容易受反动派的欺骗了，这种欺骗，每次都被人民揭露了，这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以终于垮台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能够得到胜利的一个原因。总之，觉悟的革命人民，在政治要求上，绝不能满足于仅仅政体的某些表面上的改变，绝不能满足于仅只是政权形式、政治制度的某些表面上的改变，而主要的是要求国体的改变，要求阶级统治关系的改变，要求用革命阶级的统治来代替反动阶级的统治。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工人阶级专政的国体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又例如中国人民的革命是要完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国体，是要彻底废除反动派统治的“法统”，而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来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体。

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我们就知道国家的性质是由国体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政体来决定的，但是，这是不是说政体是完全不重要的东西？是对于国体毫无关系、可有可无的东西呢？不是的，当然不是这样说的。政体对于国体有一定的密切的关系，有它的重要性，政体是国体的一定的表现形式，它必须和国体的发展情况相适应，国家的阶级统治的发展情况和阶级间的具体关系的变化的情况，就决定着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权形式，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因为发展条件不同，因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情况不同，所采取的政体也就可能不同。也可以说，一定的政体，是在一定条件下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东西。例如，同样是以资产阶

级作为主要统治者的国家，在封建的残余势力相当的大，并且和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情形下面，就常常要采取君主制的政权形式。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资产阶级虽然争取到能够参加统治地位，但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仍然强大，并且也没有脱离统治地位，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互相妥协的情形下，就建立了君主制的立宪政体。所谓君主制的立宪政体，就是一方面保持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代表者的君主，作为国家统治的最高代表；另外一方面用国家宪法的规定，来保证资产阶级在政权上统治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情形和日本有些相同，也是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联合统治，因此，也采取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又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封建势力已经被摧毁或原来就没有多少封建势力的国家，像法国和美国就可能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当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面，有时候也可能采取君主制的形式。例如当劳动群众革命的力量发展起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起了威胁的作用以后，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势力，有时也要依赖君主制专制统治的力量。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所以能做皇帝，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1851 年，法国的拿破仑三世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自己做了皇帝，使法国的政体在 20 年中间都采取君主制，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再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总危机时代，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俄国革命以后，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危机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像在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国家，金融寡头的资产阶级为了要维持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权，不能不对国内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对国外发动空前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不能不采取最野蛮残暴的统治方法，也就是采取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形式，采取一种变相的君

主制。但是要建立这种最野蛮残暴的法西斯政权形式，必须要采取种种方法来欺骗劳动群众，并且在被欺骗的劳动群众的支持下面，才能够实现这种政权形式。如果广大劳动群众已经相当觉悟，已经懂得法西斯政权形式对人民的危害，已经懂得坚持民主的要求，反对法西斯政权，在这种情形下，金融寡头的资产阶级要想建立露骨的、公开的法西斯政权，当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时候，金融寡头的资产阶级就只能采取接近法西斯政权的形式，或者在表面上仍然维持议会民主制的政体，而在实际上却采取法西斯性质的各种专制政策。例如美帝国主义在目前对于工人阶级以及进步的人民所采取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性质。因此，政体对于国体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某种政体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来，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面，它和国体的发展情况适合，是因为它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旧中国的反动统治如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类，有时要把政体改变一下，就是由于这种改变是适合于它的阶级统治需要的。

就革命的问题来说，革命的问题，虽然基本上是改变国体的问题，但政体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体，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工人阶级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不论工人阶级专政的国体，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都是广大人民对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它和少数剥削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的统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就需要采取一种适合广大人民统治的政体，而不能采用那一些仅只适合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的政体，就是说，不能够采用君主制、贵族共和制，也不能采用议会民主制，

当然更不能提法西斯制度，因为不论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和议会民主制，都是仅仅适合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人民的政权形式。君主制和贵族共和制，尤其是法西斯制度，是露骨的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的政权形式，这是不用多加解释就很容易明白的。至于议会民主制，实质上也是如此。例如奴隶社会里的民主制，就公开地否认了人口大多数的奴隶群众的任何政治权利，而只承认少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权利。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就有种种的限制，劳动群众的选举权，一般的只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而且在实际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国家，劳动人民都没有办法能够选出自己真正的代表，或者没有办法能够选出足够的真正的代表来参加政权机关，或者即使工人阶级能够选出相当多的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如像在法国的情形那样，但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是立法和行政分离的，也就是说议会和政府机关是各自独立的，议会的代表即使能发表反对政府的意见，但并不能完全约束政府的行动，因此，即使工人阶级在议会里面有相当多的代表，但他们的作用仅仅能够在议会里面做一些口头的辩论，而不能够真正影响政府机关的政策，因为政府机关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面，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里面仍然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地位，工人阶级至多只能利用议会的民主形式来进行某些宣传活动，来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某一些斗争，而不能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议会民主制仍然只是适合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的政权形式，而不是适合广大人民统治少数反动派的政权形式。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形式才是适合于广大人民统治少数反动派的政权形式，才是适合于工人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民主集中制的政权形式，就是人民代表会议的政

体，在这种政体下面，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不受任何的限制，广大人民可以从自己的工厂中、农村中、团体中选出自己的代表来组织政权机关。人民代表会议是立法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是议会又是政府，两者是合一的，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通过他们的代表在代表会议里面做成决议，这些决议又由代表会议本身选出的执行机关，来领导人民加以实行，因此，这样的执行机关，就能够正确的反映和执行人民的意见，又能反过来指导人民，使人民能正确的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帮助政府执行决议。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经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人民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变为国家的政策、政府的行动，不至于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由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分离，使人民至多只能把自己的意志和要求拿到议会上作口头辩论，而不能真正变为政府的行动。因此，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是最便利于广大人民发挥自己的革命意志，是最能集中广大人民的力量去反对革命敌人，是最能发挥广大人民的统治作用的政权形式。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今天的最适合革命人民统治的政体，是人民的国家所需要的最好的政治制度，不采取这种制度，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统治的力量。

关于什么是政体的问题，到这里就讲完了。

第五章　社会思想意识

第一题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开始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五

章，关于社会思想意识问题。对于这一章，我们要分作三个题目来讲：第一，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第二，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第三，关于思想改造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讲第一个题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思想意识，是指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包括文艺、宗教、科学、道德、法律、政治思想等等一般叫做观念形态的东西，同时也是指各个人的思想意识。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思想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指社会的经济条件，要正确的说，是指社会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来说的。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按照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生产方式是怎样，社会的面貌和性质也就是怎样；社会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性质也是由社会的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的生产、生产方式怎么样，社会思想意识的性质也就是怎么样。社会的思想意识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的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所说的"社会的存在"，就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指生产、生产方式来说的。社会的思想意识既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因此它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它绝不是人类头脑中生来就有的、永远不变的东西。如果有人把一种社会思想意识看作天然生就在人心里的、永远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例如，有人认为一切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认为自私自利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这就是一种错误的唯心论看法。因为所谓人性，或

人的某种思想意识，是由社会的存在决定的，也就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的人性，是由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人的阶级地位不同，人的性质、人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同，在阶级社会里面不会有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自私自利的性质是阶级社会里的一种人性，一种思想意识，它绝不是任何阶级的人都会普遍具有的性质，而只是一定阶级的人的性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的确是自私自利的，但是的确也有另外一部分人是大公无私的。什么叫做自私自利呢？所谓自私自利就是损人利己的意思，就是损害大多数人，谋取个人或少数人利益的意思。我们能不能说社会上一切的人都是要损害大多数人，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呢？显然不能这样说的，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只能说是剥削阶级的一种人性，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决定于剥削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剥削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因为剥削生活本质上就是损人利己的生活，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面，某种剥削阶级在社会上也能起若干的进步作用，这是我们以前讲五种生产方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的，但是即使在历史上一定时期起了若干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也还是靠剥削劳动人民来维持生活，也还是要使被剥削的劳动者遭受一些损害，因此，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只是反映剥削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至于劳动人民，从本质上来说，却不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他们在旧社会里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始终被损害的，而不是能够损人利己的。他们任何时候，都是自食其力的，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因此在劳动群众中，就容易产生真正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的英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获得惊人的胜利，就是由于革命的队伍是由广大的觉悟劳动人民所组织起来的；是由于这支队伍中间包含着大批的不怕牺牲个人

性命来为人民谋利益的无名英雄。工人阶级为了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来进行艰苦英勇的斗争，目的是为着最后解放全人类，而绝不是为着任何少数人的私利，所以工人阶级是一个最为大公无私的阶级。共产党人在反动统治下进行革命工作，不怕坐牢杀头，不怕一切残酷的刑法，全心全意地只抱着一个争取人民解放的目的，对于这样的人，如果还要说有自私自利的思想，难道不是闭着眼睛乱说吗？

所以人的社会思想意识，是由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由社会的生产、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在原始公社里面，人类的生产力很低，对自然斗争的力量非常微弱，对自然界的认识非常幼稚，生产关系带着非常原始的、和家族血统关系分不开的性质。在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原始公社的人类的思想意识，就采取了各种宗教迷信、魔术思想的神秘形式，在这种幼稚的神秘形式下面，也包含着一些高尚的内容，就是社会成员间的平等互助的意识，财产公有和集体主义、个人服从全体的意识等等。在阶级社会里面，各阶级有各阶级的思想意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起支配作用的阶级，也就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上，在思想意识上保持支配的势力。也就是说，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也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统治着被压迫阶级；反过来说，被压迫阶级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受着压制，而且自己的思想意识也是受压制的。这种压制是采取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采取公开形式，这就是说，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活动受到统治阶级公开的禁止，如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公开的禁止进步的书报杂志、进步的言论，就是这种公开的压迫形式；另一种是采取无形的压迫

形式，这就是说，利用统治者的各种便利条件，在日常的教育宣传里面灌输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到被压迫阶级中间去，使被压迫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影响，并使被压迫阶级自己的思想意识不能发展。例如，农民中间有许多封建思想，其中主要的都不是农民自己的思想，而是受了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又例如，工人中间也有些人有自私自利的思想，而这并不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来源，有的是由于工人自己出身小资产阶级，因此就受着小资产阶级出身和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受了剥削者、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影响。但是被压迫阶级一方面虽然受着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压迫和影响，另一方面，跟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也会向前发展，这种思想意识的发展，自然是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对立的，并且不断的进行着斗争的。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这种发展和斗争，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相适应，反映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情况。或者说，阶级社会内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情况，是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的情况。在这些斗争和发展的过程中，被压迫阶级是一步步脱离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一步步获得自己独立的思想，被压迫阶级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这就叫做有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被压迫阶级在思想上如果不能脱离或不能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就叫做没有阶级觉悟或阶级觉悟不够。

现在让我们就各个阶级社会的情形来做一些具体的说明。例如奴隶社会里，在社会上起支配作用的主要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一般地都是反映奴隶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这种条件上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形态，总是把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制度当作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把奴隶当作生来

是应该受剥削的下贱的族类，当作牛马牲畜一样的东西，或者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这种思想意识把劳动看作只是奴隶的工作，因此认为劳动是非常可耻的，是牛马畜牲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奴隶主的思想意识，是极端轻视劳动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奴隶，也常常把自己看作很卑贱的种类，把劳动看作下贱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奴隶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是要反对奴隶主的统治，反对奴隶剥削制度，要求得到身体的自由，幻想回到没有奴隶制度发生以前的原始公社平等互助的社会制度。在封建社会里，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因此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也是具有支配作用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什么是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它们霸占了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也就是霸占了土地，并且利用土地的所有权，借助于政治的社会的特权力量，强迫农民在人格上来依赖自己，使农民的地位接近于奴隶，也就是成为农奴，这样就用统治的压力强迫农民受自己的剥削，也就是要农民交出地租。封建地租的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强迫农民每年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土地上工作一定时期，这叫做劳役地租；第二种是强迫农民把每年劳动生产物的大部分，首先是粮食，其次是农村副业的生产品交付给地主，这叫做实物地租；第三种是用金钱交付地租，也叫做货币地租。这些就是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特点。地主阶级的各种思想意识，归根结底，也就是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例如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中的一种，叫做霸占地盘的思想，也叫做封建割据思想，就是反映着地主阶级依靠霸占土地来剥削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又例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独裁思想；讲究身份、门第，把人类分为贵族与平民、上

等人与下等人，也就是在人格上划分等级的思想；由此又有上等人对下等人的特权思想，这一切，就反映着地主阶级依靠政治的统治力量，依靠农民对地主的人格上的依赖关系，来强迫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的一种物质生活条件。旧中国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就是以这一类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例如，以孔子的名字作为旗帜的儒家思想，其中主要的部分就是反映地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或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充满着专制主义和等级特权思想的精神，这种思想要求人们严格的遵守“忠”和“孝”的教条，所谓“忠”的教条，就是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的统治者，就是要绝对服从皇帝，绝对服从封建统治者，使皇帝和封建统治者可以用专制独裁的办法来统治下级和农民。所谓“忠”，在封建社会里或多或少总包含着盲目的绝对服从的意思。这就是说，这种教条主张上级统治者对于下级要享有无限制的特殊权利，享有所谓“生、杀、予、夺”的特权，下级则应该承认自己在人格上，是依靠上级的，是比上级较为卑贱的等级，农民就是依靠地主阶级的、最卑贱的等级。能够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人，就叫做安分守己，就可以算做好奴才、好百姓，不能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人，就叫做有了非分的想法，就是要犯上、作乱，犯上就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意思，作乱就是扰乱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封建秩序的意思。反抗封建统治者和扰乱封建秩序，就是违背封建社会的“天经地义”，违背法律，违背道德原则，就是罪大恶极，也就是说，被剥削的农民和被剥削的人民如果要想动摇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特权，就是罪大恶极。封建思想意识把地主阶级看作生来的比农民高一等的人物，应该在农民面前摆“大人”的架子，地主阶级内部，也要按照自己的各种不同的等级地位，摆出各种各样的适合于他们

身份的不同的架子。过去所谓的“礼教”这两个字，如果加以通俗的解释，就是关于地主阶级如何摆架子和如何维持封建秩序的教条。所以有所谓“礼不下庶人”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只有地主阶级才有资格讲礼，才有资格按照封建秩序，摆他们的架子，至于“庶人”，也就是农民和劳动者，是完全没有这个资格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读不起书的，“读书识礼”是地主阶级的特权，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读书识礼”的目的，也是为着做官，做统治者、“人上人”，因此读书这一件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面就被看作高于一切的行业。因此，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说把所谓专门“劳心”的人看作高于一切“劳力”的生产者。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很大的优越感，以为自己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以为自己应该有什么特殊权利，在劳动人民面前应该摆上等人的架子，看不起劳动群众，不理解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为历史的惟一创造者是知识分子，要他接近工农兵，就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要他从事劳动，就认为受了什么侮辱，这种情形的来源之一，就是在头脑里面还保留着某些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的浓厚影响。这种浓厚影响的存在，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结合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不仅仅是对一般知识分子发生这样的作用，而且在其他的方面也还有各种各样的作用；例如，在参加革命工作中的人们中间，有些错误的思想，就是反映了旧中国的封建思想影响的：领导上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地位观念等等错误思想作风，它的一部分的来源，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独裁思想、官僚等级思想以及地盘思想等等的影响。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反

动思想影响的残余，在革命队伍中间存在，当然是非常有害的，是应该努力肃清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之一，是要彻底推翻封建势力，也应该彻底的消灭封建思想的残余。

在封建社会里面，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农民中间也保留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但是农民也有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地主阶级之思想意识在性质上是对立的，这些思想在平时不大显著，当地主阶级过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农民，使农民不能忍受，并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时候，这些思想就在各种形式下面暴露出来，有时采取宗教的形式，有时采取其他的形式，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思想是一种原始的平等思想以及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的平等思想和地主阶级的等级特权思想是对立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平等思想在农民是分不开的，其中也表现着反对地主阶级霸占大量土地和占有财富的意思。农民是用自己的工具在小块土地上劳动的个体小生产者，上面说的思想就反映了农民的这种物质生活条件；而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农民的原始平等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的物质基础。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人打抱不平思想，就是农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特权制度的原始平等思想的一种反映，甚至于现在参加革命的人们中，也常常有把革命简单的看作打抱不平的。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时候，常常把分配土地作为主要的号召，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中间，就提出过“均田”的口号，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是“天下太平，人人平等，土地平分”，在过去农民起义的斗争中间提出这些口号，是没有得到彻底实现的，并且农民起义本身最后也失败了。但是不论怎么样，这些事实是足够证明农民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间，是用自己的原始平等思想来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等级特权思想相对立，用

分配土地的思想来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霸占地盘思想相对立的，而且这些思想是能起一定作用的。在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中国的农民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提出他们平等的要求和土地改革的要求，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农民的这些要求之提出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不是采取一种原始的粗糙的形式，而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政策的指导，正确的解决问题，使它完全符合于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的需要，所以就能够最广泛的把农民动员起来，发挥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作用，正确地有步骤地彻底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改革要求。这就是说，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政策来指导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今天指导农民参加革命运动，必须要应用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政策去工作，而不是单单凭着农民自己的原始的平等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去工作，也不能凭领导工作者的简单的打抱不平的感情去工作，这是我们现在从事于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及领导农民进行生产建设工作的人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的一点。

今天的题目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

第二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上）

各位听众！今天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五章第二个题目：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这个问题分两次讲完，今天先讲上半段。同时上一次的题目：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还有一小段没有讲完，在没有讲今天的正题以前，还先要把上次没有讲完的补讲一下。

上次讲到封建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怎样决定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讲到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如何产生，也讲到了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怎样和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互相对立的。今天我们还要讲到，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除了农民的思想是和地主阶级的思想互相对立的以外，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是和地主阶级思想意识互相对立的。在封建社会将要垮台的时期，城市的资本主义很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就强大起来，和封建地主阶级发生矛盾，在这种时候，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表现出反封建的进步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特点，是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利用自己的这种占有权，在生产过程中间，来剥削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通过交换的过程，然后资本家才可以达到赚取利润的目的。所以就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来说，资产阶级的需要就不外是发展工商业、追求利润、赚钱发财，这个需要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最根本的内容，也就是反映着这个需要。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为什么能够有反封建的性质呢？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和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业市场的需要矛盾的，也就是和资产阶级追求利润、赚钱发财的需要矛盾的。封建社会的各种特权制度，例如封建时代各业行会的各种规则、制度，就能妨碍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又例如封建社会里贵族和地主阶级享受着各种优越的特权，使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特权来对资产阶级的工商业随便加以干涉和压制，这就会很严重的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制度，把一个社会分割为互相隔离的许多地区，这就妨碍了资产阶级在各地扩大市场发展商业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面，是

不能自由地发展工商业，不能顺利追求利润、赚钱发财的。资本主义最初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但它生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就障碍了它的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时，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面就需要打破这种障碍，就有了反封建的进步要求。这个要求反映在思想意识方面，就是要提倡平等思想，反对等级的特权思想，提倡自由思想，反对专制主义思想，提倡民族国家的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提倡发展实业、发展工商业，提倡富国强兵，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各种保守的、落后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就反映着比较封建制度更高一级的生产力和更进步的生产关系的发展需要。在这种情形下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平等思想，只是为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身份上的不平等，反对一部分贵族或“上等人”享受人格上的特殊的权利，而并不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反对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相反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保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因此，在经济方面，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他们在实际上是要保存不平等的制度的；因此，在政治上，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其次，资产阶级提倡自由，固然包括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要求民主政治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也就是追求利润、赚钱发财的自由，就是剥削劳动群众的自由，就是使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和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就是商业市场上竞争的自由，投机垄断的自由，以至于侵略殖民地和争夺殖民地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作为反封建、

反侵略思想，会有它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提倡民族统一的根本目的，是为着要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造成资本主义的市场，把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本国资产阶级独占的剥削对象，而不是为了要使全民族的广大人民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真正解放。因此，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在国家受到侵略时候所要求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思想，是要求把全民族的广大人民联合起来和发动起来，不但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要从本国的反动剥削者手里争取人民自己的彻底解放；不但要争取本民族人民的真正解放，而且要进一步和世界各民族人民在国际上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争取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思想，不但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也有国际主义的性质，与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出发，不是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因此，这个民族主义思想，也会按照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和作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只在资产阶级也需要反对封建割据，反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它才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除此而外，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到处表现着它的狭隘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时表现为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它使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永远互相对立、互相歧视。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里，这种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行会主义思想——如帮口观念、宗派观念等相结合，愈更表现着它的狭隘性。帝国主义者侵略落后民族和统治落后民族，就常常利用这一种思想，在各个落后民族内部之间进行挑拨，使他们互相分裂，

互相仇视，以便对被侵略民族的阵营实行各个击破，以便他们容易从上而下加以控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时又表现为大民族主义思想，这种大民族主义的表现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之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的政策；另一种形式是：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民族采取侵略的政策，后一种也叫做民族侵略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就是民族侵略主义的最野蛮、最极端的表现。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有时又会变为民族投降主义，如果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与国外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压迫本国劳动人民的时候，它就会这样做的，总之，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当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它的反动性来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会成为反动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成了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它对于劳动人民已处在压迫者的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就开始成为社会上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对各种观念形态或文化部门都给予本阶级的影响，使之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且要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例如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规律，本来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自然科学的发展就要受到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需要的限制，不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不能自由发展的，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然科学也就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像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原子科学，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就只能成为制造杀人武器的科学，而不能成为制造生产工具的科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是无产阶级，它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它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的结

果，反映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思想意识也就一步一步的生长起来，其中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由简单反对机器到反对资产阶级，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现，是表示无产阶级的阶级发展已经成熟，也表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已经成熟。发展成熟的无产阶级，是和大机器工业结合的，并在阶级斗争中形成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使它有可能担负起领导劳动人民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任务，也就是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产主义世界的任务。因此，有了发展成熟的大机器工业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有了实现的客观条件，就不至于仅仅只是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的美妙的空想，而是可以应用来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这种思想一旦变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时，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来推动共产主义走上必要实现的前途。这也就是说，有了发展成熟的大机器工业的无产阶级，就能够产生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就能够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发展成熟的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最后再说一下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小手工业主、小商店老板、小职员、大中学校一般的教员、大中学校一般的学生等等来说的。他们用自己的生产资料，靠自己的个体劳动，或主要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出商品，拿到市场上卖，或者用自己小小的资本，亲自经营小规模的商业买卖。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他们自己从事劳动，他们的地位和劳动者接近，他们在封建社会里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在市场上受资产阶级的打击和排挤，

而不断的破产；因此他们有反封建甚至于往往有反对一切剥削的革命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他们是比资产阶级激进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小的私有主，并且也常常略有剥削(对雇员、学徒等)。他们反封建、反剥削的目的，是为着要保存小规模的个人的财产和发展个人的生产。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使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产生消极的、落后的东西，例如个人自私、眼光狭小、自由散漫、平均主义等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多半是组织成为行会的，如手工业行会、商业的行帮之类，行会的生活习惯又使它们容易有狭隘的宗派思想。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接近于资产阶级，而有发展为剥削者的可能，这又使它们有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而这种坏思想，尤其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间容易发生。这是因为旧社会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针就是要使他们脱离实践、脱离劳动人民的原故，也因为在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近剥削者和发展为剥削者的原故。农民在脱离了封建的束缚，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民的时候，也是一种小商品生产者，所以自耕农民（或中农）也可以叫做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而他们的思想意识，除了前面所说的一般农民思想之外，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也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许多保守的方面。由于以上的理由，所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虽然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可以成为同盟者，而农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革命同盟者，但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性。

各位听众！在前面，我们已经把上次没有讲完的题目讲完了。现在就要开始讲第二个题目，就要说明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

质生活的作用问题。在我们讲前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着重说明了社会的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说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家听了这些说明，是不是会感觉到，我们把社会的思想意识看轻了，把它当作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如果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就要声明，这是误会了。我们着重说明，社会的思想意识反映着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当我们这样说时，意思仅仅是要指出社会思想意识的来源，只想指出它产生的根源。我们的说明还没有涉及社会思想意识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我们说社会思想意识的产生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种说法，并不等于要否认社会思想意识的作用和它的意义，并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谈到社会思想的作用和意义，那么我们又要强调，社会思想意识是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和意义的。为什么社会思想意识能起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呢？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的行动，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和自然界物质不相同的特点，就是自然界的物质的变化和发展是不经过思想意识指导的，是带着一种盲目的必然性的，而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的行动，则是多多少少要通过思想意识指导的，也就是说，人在行动之前，对于自己的行动总要预先作出某些估计、目的、计划以及各种主观的想法。例如要实现革命，要推翻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革命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那么就必须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认识到推翻旧的统治和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是必要的，建立革命的统治和新的生产关系，又为什么是必要的。要使他们有了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目的、新的觉悟、新的计划，然后才能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实现革命的动力。如果群众不能在思想上

认识到这种必要，也就是说，如果群众没有新的思想意识，没有革命的觉悟，没有在自己的主观上树立革命的目的、计划，要想实现革命，显然是不可能的。人的思想意识，自然是由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产生的。革命的思想，是革命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首先在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了革命的需要，然后才能有，也一定要有革命的思想意识产生出来；但是，思想的产生总是比物质生活条件的发生落后一些，在物质生活条件中已经产生革命的需要了的时候，人的思想往往还受着旧的统治思想的影响。如果革命阶级的思想还受着旧的统治思想的影响，那么，他们一时也就不会有自己所应该有的革命的新思想，也就是一时还不会觉悟到革命的需要；那么，这个革命阶级也就不可能积极行动起来，为推翻旧的反动统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斗争。因此，新的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不能不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如果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普遍的为群众所接受，那么它就会起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作用；如果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不能影响群众，相反的，如果反动的保守的思想意识保持着它在社会上的支配的作用，那么它就会麻痹群众，妨碍群众的革命觉悟的提高，使群众不可能集中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种情形，就说明反动的统治阶级有可能利用反动的思想意识帮助支持旧的统治和维持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的进步。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封建地主阶级，是如何利用各种各样的封建思想意识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最近若干年来的世界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已接近死亡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者，是怎样努力在群众中散布各种各样的腐朽的荒谬绝伦的思想，来企图延长自己的寿命，过去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者，捏造亚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的胡说，欺

骗德国人民，发动了法西斯战争。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者，又制造原子弹的神话，梦想骇唬世界人民，以便实现它取得世界霸权的狂妄目的。当然，没落的反动阶级是终于要没落的，它们绝不能逃避灭亡的命运。但是如果它们的反动思想能够对群众给以若干欺骗的影响，那么他们就可能暂时延缓它们的末日到来的时期。所以革命阶级要想实现革命，就不能不首先反对反动的思想意识，消灭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要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的思想意识，来提高群众的革命的觉悟，来组织和动员群众，然后才能够发挥群众的强大的革命力量，打倒旧社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社会上，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以前，总有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或思想意识方面的改革运动，作为实际革命运动的思想上的准备。例如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的准备。在文化的革命运动当中，必然会展开新旧社会思想意识的斗争。新的文化或者新的社会思想意识，是反映着社会上产生了新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反映着社会上出现了新的进步阶级的力量。一个新的阶级的出现，并不能够立刻就有自己的自觉的思想意识，相反的，它在最初总是免不了受到旧的统治思想的影响，而不能认识清楚，或不能充分认识清楚自己的阶级需要，这样它就只是一个不自觉的阶级。新的思想意识，首先是在新文化的运动当中，经过一些进步阶级的先进代表，用很大的努力发现出来。为着要把适合革命阶级需要的新的思想发现出来，进步阶级的先进代表要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历史发展情况，要研究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要向外国的革命运动、革命思想学习和比较，要对旧思想和错误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不仅如此，要证明

某种思想的确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思想，还要把这种思想结合到具体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来加以考验，这就常常要经过流血牺牲的代价，取得了实际经验，才能达到目的。我们中国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是经过了这样艰苦的学习、研究和实践的过程的。中国人民在今天能够有了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这是一百多年来先进人士经过不少的牺牲奋斗才摸索得到的结果。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革命的思想意识，虽然是革命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但并不一定就是由革命阶级的生活中间自然地直接发生出来，而是由革命阶级的先进代表在艰苦的努力中探求出来，并经过先进代表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把理论原则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然后才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才成为实际革命斗争的力量。无论如何，新的思想一旦被先进代表所寻找出来，它就有可能和革命群众结合，成为革命群众手中的武器，来和旧的统治思想进行斗争；就能够使革命群众脱离旧思想的影响，把他们的觉悟提高起来；就能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指导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前途。这就是进步的、革命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所能够起的重大作用。我们如果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拿来研究一下，就更容易了解这一个重大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已没有时间讲了，让我们在下一次再来加以说明吧。

第三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下）

各位听众！今天继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第五章第二个题目的下半段，也就是要继续讲关于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

会物质生活的作用的问题。

前次我们讲到，在近代社会上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发生以前，总有一次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或社会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在这样的运动当中，新的社会思想和旧的社会思想展开了斗争。革命阶级的先进的代表们，努力探求新的思想，反对旧的社会思想，使新的思想和群众的具体实际斗争相结合，使群众脱离旧的腐朽的社会思想的影响，这样，新的思想就能够发生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的作用，把群众组织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来推翻旧的反动统治阶级，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没落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也是要努力散布各种腐朽的思想影响，来麻痹群众的觉悟，来减弱革命的力量，来阻碍社会的进步。

我们前次又讲过，我们准备在这一次的讲话里面，根据中国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来具体地说明一下社会思想意识的这种作用。在没有这样具体地来说明社会思想意识的作用之前，我们还得要先指出一点，就是：进步的社会思想意识，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进步阶级的，因此，它们的作用，也不是一样的，它们的意义的大小也是很有差别的。一般来说，越是正确地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社会思想意识，就越更能发挥巨大的改造社会的作用，越是代表着更进步的阶级立场的思想意识，就越能够得到更巨大的进步意义。中国近百年来人民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的斗争和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在社会思想的发展方面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就由完全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统治者阶级中间，除了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势力和逐渐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旧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一步更进一步地和外来的侵略者

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广大人民。这一个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也就引起了中国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在统治者的反动腐朽思想方面，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由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单独支配的形式，转变为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思想共同支配的形式，由闭关自守、骄傲自大的大封建帝国思想，转变为依赖侵略者、惧怕侵略者，一直到谄媚侵略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思想，在统治者中间，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把统治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思想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式。反动统治者努力散布这种思想，把它当作镇压人民和麻醉人民的精神武器，当作继续维持和巩固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在外来侵略者的打击下面，旧封建统治者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开始动摇了，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在人民中间的影响也开始动摇了。因此，反动统治者就要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面，在旧的反动思想上面，加上了新的反动思想的因素，使它适合于改变了的统治情况的需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就是一方面要继续坚持着应用古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残暴的制度，来压迫中国人民，另一方面，还要采用一些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好像“文明”的方法，也就是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技术，采用一些新式杀人武器和杀人制度，来更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压迫。这种封建奴化的社会思想形式，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就转变为军阀主义、军阀制度。这是完全露骨地用帝国主义的杀人武器杀人制度全副武装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形式，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在封建主义、军阀主义的形式上面，更加上帝国主义者的新的最野蛮的统治形式，也就是更加上了法西斯主义形式。鸦片战争以后，不论是满清统治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论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主义思想，不论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面的法

西斯主义性质的思想，形式上尽管有各种不同，在实质上，始终都不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统治者的封建、奴化的思想，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这一本书，就集中表现了这种封建、奴化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特点，是用封建地主阶级对待农奴的眼光甚至于用敌人的眼光来看待广大人民及国内各少数民族，同时又用奴颜婢膝的谄媚态度来对待外来的侵略者，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当做好朋友和上司，他们宁可出卖国家的权利，来取得侵略者的帮助，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而帝国主义者也就利用这些反动统治者，来达到侵略的目的。在人民起来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时候，反动的清朝统治者就说这些权利“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而人民起来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却坚持要“先安内，后攘外”。这些都是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思想的最明显的表现。旧中国的统治思想，在一部分人民中间，不是没有影响的，例如许多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认识不足，甚至于完全没有认识，崇拜美英的所谓“民主”制度，幻想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害怕帝国主义，害怕原子弹等等的思想，都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思想影响的表现。美帝国主义这一个纸老虎，在解放了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中间，现在都还有着些残余的威风，这就是多多少少沾染了这种思想影响的表现。

旧中国统治者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百多年来是逐步低落下来，它的统治基础是越来越脆弱，一直到被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垮。同样，旧中国统治者的封建奴化思想，虽然现在还有不少的残余力量须待我们肃清，但在人民中间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减弱、越来越缩小；而反映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意识，却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在人民中间发生革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这种新的思想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

级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人民需要解决反对外来侵略者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因为要解决这个任务，就在人民中间，不断地出现着先进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怕一切艰苦困难，不怕牺牲自己的鲜血头颅，努力来寻找和创造新的革命的思想，来动员和组织人民，和反动统治者进行英勇坚决的长期的斗争，这些斗争曾经发展成几次大的革命运动，革命的先进和革命的人民在战斗中，前赴后继，再接再厉，一直到胜利为止。在几次的大革命运动中，都有先进的人物，代表一定的进步的阶级，创造了某种形式的革命思想，来指导这个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也就考验了这些思想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所起的进步作用。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想，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环境下产生的；因此，中国人民的先进的代表，在创造革命思想的时候，一般都是向国外学习某些先进的思想，把它拿来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和一定的进步阶级的斗争要求结合起来，这样就创造出一种符合于当时中国革命情况的新的进步学说、进步思想。鸦片战争以后，首先有洪秀全一班人物出现，他们采取了西洋的原始基督教的一部分教义，把它和中国农民的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太平天国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平等思想，这一个新思想，动员和组织了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很厉害地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使满清政府的统治开始走向分裂和垮台的过程。但太平天国本身是失败了，没有能够完成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的历史任务。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它的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农民，没有更为先进的阶级来指导它，而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的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不可能建立更高的生产方式。因此，洪秀全一班人的太平天国的思

想，虽然也能起一定的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击反动统治者，很激烈地动摇了这反动统治，但不能根本改变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完全新的社会，这样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彻底胜利的。太平天国以后，还有1900年义和团反对外洋的农民运动，这个运动是农民自发的运动，没有先进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的指导，相反的，还受着一些封建落后的思想的支配；因此，这个运动对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气焰，虽然给予了很大的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不屈服的精神，但是结果也得不到胜利，并且在一个时候还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当然更不能够完成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的任务。在戊戌政变以前，又有康有为一班人出来，他们代表着开明的官僚资产阶级立场，从西方国家学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想通过上层的政府机构内部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社会。这一种思想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个政变碰到了旧统治阶级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了。戊戌政变的失败，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只能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少数上层分子来要求不彻底的政治改革，不能够动员和组织广大的人民力量，来向反动势力进攻；但如果只动员少数的上层分子，而不动员广大的人民力量，要想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者，要想推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统治者，改造中国的社会，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是没有正确地反映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它的进步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戊戌政变以后，又出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到了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把这种思想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里面来，他们的新思想所起的进步作用，表现在辛亥

革命中，这一个新思想动员与组织了中国社会里面反对满清专制皇帝统治的许多势力，把满清的皇朝推翻了，也把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政体推翻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得到真正胜利，因为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了旧中国，而只是改变了旧中国统治者的政体，只是改变了旧中国的政权形式。至于说到中国的国体，说到中国的国家性质，说到谁是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这些反动势力的统治，采取了议会民主制的虚伪形式，而实际上是在军阀专政的制度下面继续维持下去，根本没有受到什么动摇，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在实际上是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已经不能确切反映中国社会的物质发展的需要，已经没有力量来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的力量，特别是工人、农民的力量，来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完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因为中国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革命，是不仅仅要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革命，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革命任务，仅仅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依靠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是不可能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它本身的发展不足，它的经济力量很微弱，而同时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它又向来是有着许多的联系的，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它在经济上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最坚决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在中国，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只有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才能成为最坚决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它里面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明确的思想，如像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在辛亥

革命时期，就只有反对满清统治的一点内容，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因此，它不能动员广大的劳动人民，起来坚决的彻底的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因此，它就没有力量来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达到胜利的前途。从鸦片战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对封建势力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已经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彻底完成这个任务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成熟，由于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领导阶级没有成长起来，因此虽然有无数的先进人士，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在英勇的战斗中间努力去探求指导革命的新思想，但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完全适合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新思想，没有找到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思想，因此也就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新思想，这样的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中有了更新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时候，是在新的革命阶级力量成熟起来的时候，才会被先进的阶级代表所发现的，这就是在俄国革命以后，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熟起来，能够作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领导力量的时候，这就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先进的代表人物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下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开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指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个新思想是先后由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所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人们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它在中国出现不久，就推翻了中国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作为旗帜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打败了胡适一流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这种自由主义、改良主

义思想的特点，就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示动摇、畏惧以至于屈服投降，就是常常要向反动势力出卖人格献媚讨好，就是幻想在反动统治下面做一点一滴的改良、一点一滴的实验，就是要反对根本推翻反动统治，反对根本改造旧社会，就是提心吊胆害怕彻底的革命斗争根本动摇了反动统治的基础，甚至于要帮助反动统治者来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以及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实质，这些思想的反动性，五四以来已先后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揭破，同时又在一切改良主义者行动的破产和堕落过程中得到证明。中国革命先进的代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锻炼出毛泽东思想。这样来领导、动员和组织中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来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四次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也就是 1925 年到 1927 年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 年到 1937 年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7 年到 1945 年的抗日战争，1946 年到现在的人民解放战争。二十几年来的革命战争，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导到胜利的前途，这一个事实完全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完全适合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的。因此它也就有着伟大的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有着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因此也就能够正确的指导革命运动彻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这也就证明在今后的革命工作、国家的保卫工作和建设工作当中，仍然是要在

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面，仍然是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面，才能够顺利的完成各方面的任务，才能使中国社会迅速进步。

关于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的问题，今天就讲完了。

第四题 关于思想改造的问题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第五章第三个题目，关于思想意识的改造问题。这是我们的全部讲座的最后一个题目。

在前一个题目里面，我们讲到人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都是不通过思想意识指导的、带有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也有它的必然规律，但它的规律的表现，是要通过社会中各阶级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活动，通过各个人的多少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而不是完全盲目的必然性。社会的变化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或者说，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规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的物质生活中间如果没有某种必要的条件产生出来，就不可能引起某种社会的变化。例如，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大机器工业的无产阶级出现，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社会物质生活中间产生新的条件，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直接就会引起社会的根本变化，这些新的条件首先要反映在一部分先进的人物的意思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新的社会思想，再经过先进的人物努力，使这些思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使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思想，成为他们行动的目的、方针、计划，这样把群众动员、组织起来，集中千万群众的力量，一致对

旧的腐朽的社会势力给与有力的打击，才能造成社会的根本改变。否则，如果没有这种新的社会思想，如果没有一部分先进的人物多多少少正确的有系统的找到了这种新的社会思想并努力把这种思想拿去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即使有了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还不能实现社会的变革。所以，我们反对有一种叫做自发论的说法，这种自发论，把新的思想的作用和先进人物的作用看得很轻，以为只要有了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只要有了新的阶级，只要有了反对旧社会腐朽势力的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自发的斗争，而不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不需要有正确的思想上的自觉的指导，就能实现社会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自发论，而要强调社会思想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要强调新的思想、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句话就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是如何的重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产生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如果没有集中成马列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指导，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工人阶级就不能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使之走向胜利。

为什么革命人民必须要有革命的思想指导才能够胜利？因为革命的人民是在旧社会里面生长起来的，是在旧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的压迫之下生长起来的，也是在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压迫和各种旧思想影响之下生长起来的。因此，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中间已经产生了新的发展的需要，已经有了革命的需要，但他们的思想却常常是比较地落后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的思想常常受着统治阶级思想和各种旧思想的束缚，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需要，他们即使起来进行一些自发的斗争，但是在斗争

中间也看不清楚为什么要斗争，看不清楚如何去进行斗争才有可能得到胜利。在这种时候，他们的斗争就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的，和自然界的发展有点类似；这时他们在斗争中间当然也有某些目的、计划及某些思想的指导，但是，这时他们的目的、计划或思想指导一定是模糊不明的，一定包含着某些错误的因素，而不能确切地反映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发展需要，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发生偏差、错误，甚至于往往还要受统治者的利用，成为适合统治者维持旧制度需要的东西，这就会使他们的斗争毫无结果，使他们的斗争终于失败；或者使他们的斗争果实落在另外的剥削阶级手里。在世界上没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前，在没有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以前，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如像封建社会下面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一般的都是这样枉费气力的结束了的。在世界上有了无产阶级以后，如果没有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来指导劳动人民的斗争，这斗争也同样会枉费气力毫无结果。革命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些人物和思想能够帮助革命群众脱离反动统治阶级思想和各种旧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在斗争中能够正确的看清楚自己的目的和斗争的步骤、方法，使斗争脱离自发性、盲目性，成为自觉的斗争，使斗争有可能得到胜利。

先进的革命思想是怎样产生出的呢？是不是从先进人物的头脑里面偶然想出来的，是不是和新的物质生活条件毫无关系的自己产生出来的，是不是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完全脱离，单凭知识分子的聪明创造出来的？当然不是，我们在前面强调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作用，并不是要说先进人物可以脱离新的物质生活条件，脱离革命群众的斗争，凭空的把先进的思想创造出来，如果各位听众听了我前面所讲的一段话，发生了这样的误会，那么现在就

请你们把自己的想法改正一下，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并不是聪明人的头脑中偶然想出来的，它也只是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只是革命人民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他们的思想基础也是从人民群众中学习来的，不过要能够正确的反映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确的总结革命人民的斗争经验，创造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必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周围的情况做详细周密的研究，必须对旧的社会思想进行批判、清算的工作，把其中腐朽的落后的和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成分加以清除，把有价值的适合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因素加以发展。也必须善于从周围的先进国家里面去学习先进思想，从这些先进思想中学取方法，来研究本国的社会历史，来总结本国革命人民的经验，来批判本国的旧的社会思想意识，这一切，就是为了创造新的革命思想所必须要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很艰巨的工作，正因为是很艰巨的工作，因此才需要首先由先进的人们来完成它，然后进一步使它和群众结合，使群众能够获得自己的正确的革命思想，能够划清新旧思想的界限，能够脱离旧的统治者的思想和各种落后思想的影响，使群众成为思想上自觉的革命群众，才能开展正确的革命运动，中国的革命先进人物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面从俄国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广大人民的斗争相结合，创造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了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把中国人民的革命引向胜利，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中国革命现在已经获得了基本的胜利，要获得完全的彻底的革命胜利，还需要全国革命人民共同来做很多的工作，除了小部分的地区还需要经过战争加以解放之外，除了三万万多人口的新

解放地区还需要进行土地改革之外，还要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一切反动势力残余，粉碎他们的一切暗害、破坏的活动和阴谋复辟的企图，还要加强国防，准备打退一切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首先是要打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要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并准备将来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仍然是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导，没有全国人民在这一个思想指导下面同心协力，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中国人民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一个思想指导之下顺利的完成以上所说的一切任务呢？毫无疑义的是有可能的，但同时也是有困难的。为什么说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因为我们有了人民的国家，这就保证了人民有可能在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胜利地完成以上的一切工作任务。为什么我们又说是有困难的？因为准备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全体人民，是各阶级的联合，是大部分从旧中国开始解放出来的人民，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有不同的自己的思想，并且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面长期的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思想影响，这些旧思想的影响，一定会妨碍人民自己来正确的了解和对待新中国的各种政策和工作，如果不经过教育和改造，就不可能使人民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积极的自觉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说的困难，这是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各种困难中间的一个重要困难。因此，领导各阶级人民进行自我的教育和改造，就成为我们人民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成为顺利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成为彻底完成中国革命所不可少的条件。要造成这个条件，就必须推动全国人民普遍地来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必须广泛的宣传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知识，尤其要提

倡干部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这一个问题来说，我们仍然要反对一种自发论的思想，那种自发论的思想，是以为我们人民既然有了自己的国家，那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用不着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用不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用不着思想改造，用不着把思想改造的运动和建设新中国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

有两种不正确的思想，妨碍着我们的前进，一种是过去做过几年革命工作的某些干部的思想，他们自以为经过了革命的考验，并且有了一些革命经验，自以为思想立场已经没有问题，用不着学习理论，用不着继续改造思想或提高思想；一种是新解放地区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和学习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了解改造思想的重要意义，他们误解了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他们把统一战线看作只是四个阶级的简单联合，看作只是普普通通的拉朋友关系，而忽视了统一战线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忽视了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着要改造旧中国，要在现阶段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知道要完成这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造的过程，就必须同时要有一个人民思想上的自我改造过程。因此他们就认为：朋友的关系是不需要谁改造谁的，既然要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成朋友，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改造思想，就不需要让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政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

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先说那些参加过几年革命工作的人。首先，他们也是旧社会出身的，从旧社会的出身环境所带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经过几年的工作锻炼，虽然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改变，但一般来说，绝不是可以彻底肃清，没有任何一点

残余的，而且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还要不断的受到各种落后的思想影响。例如：到了新解放后的城市当中，就可能要受到旧城市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影响。如果不能抵抗这些影响，就不可能避免思想立场的动摇，这是很明白的。再就工作经验来说，新的工作需要了解新的规律，需要采取新的工作方法，仅仅依靠旧的经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满足于旧的经验，不依靠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工作，就不可能完成复杂的新任务。由此可见，即使是做过几年革命工作，有些工作经验的人，如果不学习理论，不经常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就不可能跟着革命的发展向前进步，甚至于还可能变成为落后分子。

再说第二种人，也就是新解放区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和学习的人。由于他们是长期的在反动统治下面和在旧社会环境里生活，他们在思想上必然要多多少少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影响，必然要带着旧社会所养成的许多坏思想和坏习惯，如果保留着这些反动影响和坏思想坏习惯，就不可能学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工作作风，就不可能理解和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方面的工作，就不可能成为新中国的最有用的人才，甚至也许会成为新中国的各种工作发展的障碍，最坏的也可能甚至于成为人民的敌人。例如：资产阶级如不改造自己在反动统治下所养成的盲目投机习惯，如果他们要任意发展他们唯利是图的思想，在自己的工商业活动中，首先只考虑如何赚钱发财，而不考虑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是否符合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关于私营工商业所应遵守的原则，那么他们就不但不能够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有所贡献，相反的还常常要成为建设的障碍。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为全国人民所反对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就是这种坏习惯、坏思想的表现。又例如：小资产阶

级如果不改造自己的自由散漫、个人突出、轻视劳动、轻视群众的习惯，也不可能很好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工作。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里面，各阶级的统一战线，绝不是普普通通拉朋友的关系，而是要在发展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来建立友谊，是要在这伟大事业中来尽自己的责任，并且要能够担负起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为着这个目的，各阶级人民对于自己的思想就有改造的必要，各阶级人民如果要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有用的力量，就必须要受新的教育和改造自己的思想。当然，人民自己的思想改造，首先也是人民的国家对各阶级人民的要求，也必须要在人民国家的领导下面，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的规模上，使人民来教育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所指引的路上去，而使自己正确的走上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且能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人民自己的改造思想，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正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将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我们不能希望在几天之内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本改造过来，使他们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正如我们也不能希望几天之内在中国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把小资产阶级的小生产变为大工业生产，把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但是，在人民国家的政权下面，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面，逐步的用民主的方法实现各阶级人民的教育和改造，争取各民主阶级和劳动群众尽可能广泛的自觉的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并在将来跟随着工人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道路上去。总之，各阶级人民的教育和改造是要用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思想，是要使各阶级人民按照自己的条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面逐步前进，是要经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前进，各阶级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因此思想改造的内容也有不同，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指导的程度也会由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是教育和改造的最后的方向是一致的。至于在干部中间，在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领导成员中间，尤其应该首先认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思想，使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只有努力掌握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才有可能使自己正确的认识各种工作的物质条件和它的发展规律，才有可能正确的指导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并且领导群众胜利的完成这个工作。

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开始，是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完，希望学完了这个课程的听众，今后还要进一步的加紧努力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自己的思想上的自觉性，以便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能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附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

序

我们为了帮助听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4月10日起增设了一个新的广播节目——社会科学讲座。

我们办的第一个讲座就是请艾思奇同志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这个讲座是从4月10日开始播讲的，起初每星期三次，以后改为每星期一次，连解答听众问题，一共讲了二十三次，到六月底讲完了。根据许多地方听众的要求，我们又从7月3日起，请艾思奇同志从头讲第二遍，每星期一次，计划到11月底讲完。

艾思奇同志的讲稿，经过好多次的修改。第一遍的讲稿，有几篇就是改了好几次才讲的；第二遍重讲时，又修改了不少地方，现在印出来的，基本上是第二遍重播的讲稿，但又有若干地方修改了。

这个讲座有广大的听众。从4月初到10月11日止，各地机关、团体、学校等组织收听并和本台直接联系的共有529个单位，分布在23个省、内蒙自治区、京津和各大行政区直辖市。其中有些是以一县或一市为单位，它包括很多机关团体。收听的人数，据其中373个单位的统计，已有9万3千多人。个别收听者和本台联系的还有很多。此外，还有三十多个地方人民广播电台转播这个讲座，还有好几个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用方言播送这个讲座的讲

稿，收听的人也是很多的。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按本台讲稿播讲，就有听众十万人左右。

许多听众在听了艾思奇同志的广播以后，曾经提来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已请艾思奇同志在广播中解答了，或者由本台写信回答了。有些听者要求把过去解答的问题，作为附录印在这部书里。我们因为这些问题，在艾思奇同志最后修正的稿子里，一般的都讲到了，只要仔细阅读讲稿，就可以得到解答，如果再印出来就重复了，所以没有印。

各位读者读了这本书，如果有意见或问题，仍请写信给我们，我们仍当负责解答。

无线电广播是帮助听众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列宁在 1922 年 5 月 19 日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里，讲到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时，就说过："无论从宣传鼓动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为了播送学习讲座，都有实现这个计划（指当时供给尼日·诺弗果罗德城无线电实验所经费以促进扩音器及收音机的研究、改良和生产的计划——引者注）的绝对必要性。"现在苏联和东欧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把播送社会科学讲座作为广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我国，人民广播事业还很年轻，创办社会科学讲座广播的时间更短，工作中的缺点是很多的。希望各位听众和读者帮助我们，共同推动组织收听，把这个讲座办好，使它在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能得到更大的效果。

1950 年 10 月 20 日

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

（1950.11）

一

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首先是由于它创造了苏联这一个人类中从来未有过的新式国家——工人阶级专政的、广大劳动人民统治的国家。俄国革命永久推翻了自己国内反动剥削者的统治，接着又打退了十几个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第一次使劳动人民获得了真正彻底的解放。这一个事实，为全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光明的道路，鼓舞了一切革命人民斗争的勇气和坚定了他们胜利的信心。十月革命后，全世界一切真诚反对奴役压迫、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劳动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先进的人们，都向苏联学习。在中国，致力革命几十年而屡遭失败的孙中山先生，最后就提出了“要以俄为师”的口号。以李大钊、毛泽东同志等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人们，在五四时代开始向苏联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组成布尔什维克党和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把这些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然后中国革命就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直到获得了今天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以往学习苏联而得到了这样伟大的胜利，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够更进一步地发展我

们的胜利。

十月革命以来，短短的 33 年中间，苏联人民把一个曾经是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大的先进的国家。她的工业生产高度的发展起来，赶上了经过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她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失业现象完全消灭，人人都得到幸福。她使自己强大到足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最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的最主要的力量，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的力量。强大的苏联，对于世界被侵略被压迫的人民和他们的斗争，给予了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帮助，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侵略者、战争的发动者和挑拨者则给以不断的打击。中国的几次革命，都得到了苏联的极大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例如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最后时期苏联在军事上的决定性的援助，中国人民要得到这样迅速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殖民地侵略者及战争的发动者和挑拨者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和教训。这一个胜利，不仅仅在当时停止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继续延长和扩大，挽救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千万人民的生命，帮助他们避免受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祸害，而且对于以后世界人民反对侵略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也留下了重大的影响：使想要挑拨战争或敢于发动战争的侵略者看得见他们的狂妄冒险会得到什么下场！目前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正在日愈广泛和日愈强大的发展起来，苏联仍然站在这个阵线的前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还有人说美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争贩子所疯狂进行的战争挑拨和侵略行为不会遭受最可耻的失败，那是没有理由的。

在短短的 33 年中间，苏联人民为自己建设了强大的不可侵犯的国家，建设了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这样的国家为基础，

对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了伟大的援助。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成就。这样惊人的成就，是由于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面，发挥了最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的结果。苏联人民在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工作中的那种忘我的精神，苏联人民在援助被压迫民族各国革命人民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是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来认真学习的。中国人民在目前特别需要在这一方面来学习苏联，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旧中国，开始创造了自己的新的国家，中国人民在目前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国内国外的任务：要彻底肃清一切被推翻了的反动派残余势力，粉碎它死灰复燃和阴谋破坏的企图，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和保卫国家使美帝国主义者丝毫也不能加以侵犯，要援助被侵略的兄弟国，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和苏联以及世界人民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学习苏联人民，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从事一切工作。

二

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在列宁、斯大林的思想指导之下培养和发展起来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它的基础的。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从而也就能够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国家的各方面任务，以及自己为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而斗争的意义何在，这是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所以能够发挥高度积极力量的原因，这是由于列宁、斯大林非常重视和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来教育人民的结果。

列宁把国家的问题看作是“关于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问题”(《论国家》),他用极大的力量来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体应用于帝国主义时代,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大家知道,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空前紧张的前夜,还写了《国家与革命》一本书,这一本书粉碎了当时流行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维克党中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总结了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那些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革命的行动来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只要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下面,经过议会斗争、经过内阁的改变,就可以“争取政权”的一套机会主义的欺骗是如何谬妄,证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真正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又在别的著作中,亲自总结了1905年、特别是1917年的革命斗争经验,证明俄国工人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创造出来的苏维埃制度,就是俄国工人阶级用来建立专政和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最适当的国家形式。大家知道,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这一些发展工作,对于俄国革命的胜利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倘若没有列宁的这一些理论工作,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脱离机会主义欺骗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状态,就不可能看清楚革命的方向和创造劳动人民国家的方向。其结果会怎样呢?其结果就会如“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上所说的:“我们党就会陷于黑夜徘徊的地位,苏维埃就会陷于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伤,无产阶级就会遭到了失败,而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了胜利。”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来启发苏联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斯大林在1924年所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里，指出了劳动人民在取得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以后，还要把巩固这个政权作为自己的重大任务："'革命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取得政权，夺取政权呢？当然不是。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以后，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期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强有力些，因此全部事情都在于要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在苏联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斯大林经常把"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思想，联系到具体的建设工作的任务上。举例来说，在1931年的一篇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里，斯大林号召经济工作人员努力研究科学，"精通技术，精通生产学"，以便使苏联迅速地克服落后状态变为先进国家时，就指出这样的工作对于保卫国家的意义：

"在过去，我们是没有祖国而且也不能有祖国的，但是现在，当我们已推翻资本主义，而我国政权又是工人政权时，我们已有祖国，而且我们将坚持其独立。你愿不愿意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破而丧失独立呢？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期消灭它的落后状况，而展开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速度。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时说过：'或者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大家看见，苏联人民依照了斯大林的启示，为着坚持祖国的独立进行了忘我的建设工作，几年中间就赶上以至于超过了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使苏联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大家知道，斯大林根据俄国革命经验以及苏联的建设经验，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问题上，曾做了一些列宁所来不及做的工作。当着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当苏联国内的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斯大林回答了那些想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为工人阶级的国家只是用来镇压和肃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以为只要国内阶级消灭了，就可以开始把国家送进古物陈列所里去的思想。斯大林根据苏联国家的经验证明了，工人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不仅只是镇压和肃清反动派一方面，除了镇压和肃清已被打倒的反动派的任务之外，还要担负反对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和团结国内劳动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任务。当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的时候，即使一个国家内部的剥削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劳动人民仍然不能抛弃掉自己的国家，而是相反的还要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国家。斯大林指出那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忽视了具体的历史环境条件，"忽视了资本主义包围的事实，以及由这些事实而产生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危险"，"轻视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派遣间谍、凶手和暗害分子到我们国家里来，并力图利用时机来实行武装侵犯我国的那种作用和意义"，"轻视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军事、惩罚和侦探机关是为保护社会主义国家以防外国侵犯所必需的那种作用和意义"（1939年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中央工作的报告）。大家知道，斯大林所发挥出来的这些真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给与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启示，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处处都证明了斯大林所指出的真理，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些真理的指导，苏联人民就不可能对于希特勒的进攻作充分的准备，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西方和东方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三

以上所说的一切告诉我们，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广大劳动人民对于自己的祖国的一般的热爱，而且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国家学说基础之上，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国家的性质、任务，因而在建设和保卫国家的各种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忘我的精神和行动，是劳动人民的高度觉悟的表现。这就是说，要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就是要把我们的爱国热忱安置在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础上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爱国热忱安置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关于国家的学说的基础上。

正如列宁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同志也把国家问题作为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把解决国家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主要任务。

毛主席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根据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条件，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各种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政权，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十年间农村中的革命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建立的各抗日民主阶级的三三制政权，一直到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后所建立的全国范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其他许多重要著作里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正确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国家问题，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规定了团结四个阶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规定了工农联盟作为国家的基础以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等等的问题，而把这些思想集中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说：“总结我们

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大家知道，这一个主要的公式、经验和纲领，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

毫无疑义，毛泽东同志所发挥的这些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以及在这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应该作为新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有些人以为，爱国主义，就是只要有爱祖国的热忱就够了，这是错误的，爱祖国的热忱，如果不包括着对于自己的国家的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表现在坚决拥护国家的纲领和政策上面，不表现在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而忘我地积极工作上面，那是空洞的东西，必须根据这些思想来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和行动，才能锻炼出真正的新爱国主义。

例如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包含着“对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就专政方面来说，是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同前)。根据这样的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爱国思想，必须要包括着对于这些反动派坚决实行独裁的深刻观念，如果有反动派及其帮凶如土匪特务恶霸之类在乱说乱动的事实，我们就要有立即予以制裁的明确认识和坚决的行动，而不是相反的以为在这种情形下也可以“宽大”一下，也可以施行一下“仁政”。这样，我们

就可以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些深刻的观念、明确的认识和坚决的行动呢？如果没有，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很好的表现出我们的爱国主义。

又例如说，“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所谓人民，“在中国，在现在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的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反动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同前）根据这些原则，那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各方面的国家的工作中，必须善于团结各阶级人民，而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必须以民主的方法对待人民和为人民做工作，而不是采取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不断地教育和改造自己，并且帮助各阶级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而不是拒绝自我教育和改造，不积极帮助别人教育和改造。这样，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我们能不能深刻地这样来想和这样来做呢？如果不能，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正确地表现出自己的爱国主义。

这样的例子，可以从各方面类推，它们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要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为思想的基础，必须把爱国热忱和对于国家的正确认识相结合，必须在每一具体工作中坚决为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而斗争。

四

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里，刘少奇同志说："各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是互相结合的。"又说："纯正的爱国主义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时希望世界人类优秀的理想在自己国内实现，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就是这种"人民大众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纯正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少数削剥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所谓爱国思想，不是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又是与国际主义互相结合的。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是一切国家觉悟了的人民大众所必定要具有的思想，而这种人民大众的觉悟的思想，是在苏联的人民中间得到最高的表现，因此，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互相结合的精神，是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模范。

剥削阶级的所谓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国家主义、大国主义都属于这一类思想），是从剥削者的利益出发的，这种思想的实质，对于国内是要求镇压人民大众，使之服从少数剥削者的国家统治和剥削利益，是要用"国家至上"之类的思想欺骗人民，使人民忘记对反动统治者的反抗，而对于国外，是要用国家的名义，来为少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者谋利益，它使本国的人民大众与其他民族的人民经常地互相对立、仇视，使其永远不能够达到民族之间的国际团结，以便一旦有必要时，可以利用这种民族的对立和仇视的情绪，来驱使本国人民牺牲性命，帮助少数剥削者去抢劫其他民族的财富，帝国主义者利用"保护祖国"的名义来驱使不觉悟的人民进行侵略战争，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与国际主义相矛盾的剥削阶级的所谓爱国思想或资产阶级的

民族主义思想，不是人民大众自己的真正的爱国思想，而是觉悟的人民大众应该坚决反对的错误思想。

真正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从人民大众自己的彻底解放的利益出发的，是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奴役人民大众的要求出发的，因此，这样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没有什么矛盾，而是互相结合的，并且是一定要互相结合的。因为世界各国人民若要求得真正彻底的解放，就只有经过各国及各民族的广大人民在国际的范围内亲密团结起来，相互援助，共同一致，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就是从人民大众的真正彻底解放的利益出发的，这是因为，苏联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要真正彻底解放人民大众的革命。十月革命使“被雇佣者阶级，被驱策者阶级，被压迫被剥削者阶级，破天荒第一次在人类史上升到了统治者的地位，并以身作则来鼓舞着世界各国无产者”，“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世界各被压迫国人民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殖民地革命的时代”（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十月革命不但使苏联的人民大众获得了解放，而且它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斗争联成一气，并成为它的中心和模范。苏联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特性的表现，是苏联人民的利益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以及各国人民大众的利益血肉相关系的表现。“苏联帮助别的民族，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错，苏联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苏联全国人民大众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各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与帝国主义国家只为着本国少数反动剥削者的利益而破坏别的民族和别国人民的利益的情形，是原则上相反的。苏联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帮助

各民族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和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亲密团结，就加强了苏联国家的地位，而苏联国家地位的加强，反过来又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各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力量。

学习苏联的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与真正人民大众的纯正爱国主义相结合，这是已经作了国家主人的中国人民的一个重要任务。国际主义与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这是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经验早已告诉了我们的，孙中山在临终的时候已经认识到“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的方针，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得到了今天的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断地以这样的思想教育中国的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由于革命的胜利，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的方针，现在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的一部分。“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共同纲领第十一条）我们要学习苏联的国际主义，就要认真研究自己的国家的纲领，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实行纲领中的第十一条，并且像苏联人民一样，时时刻刻密切关心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大众的斗争，并以大公无私的精神来帮助这些斗争。

（原载《学习》杂志第三卷第3期，1950年11月1日）

论思想改造问题*

(1951.1)

只要不是对于现实完全闭着眼睛的人，就能看到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中国人民的认识的迅速进步；就能看到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在人民的国家政权下面，不但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当然还很不够，还需要不断的前进，但对于在学习运动中对思想改造抱怀疑的人，已经有足够的事实来破除他们的怀疑了。有些人用“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理由，想证明只要小资产阶级还在社会上存在一天，就谈不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改造，如我们在王鼎臣的思想改造问题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说法，既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同时又是误解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理，把它看作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以至于宿命论了。因此，在理论上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一、“存在决定意识”和“思想改造”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这首先是由于一切存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阶级的存在

---

* 王鼎臣是某机关的干部，在关于思想改造问题上有许多糊涂认识。《学习》杂志从一九五〇年第三卷第一期至第七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是这次讨论的总结，这里选用的是作者的修改稿。

也是活的存在，是经常在发展、变化中的存在。每一个阶级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长出来，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没落或衰亡。同一个阶级，在它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就表现出若干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处在不同的条件下就会有若干不同的特性；有的阶级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会分化或转变为另外的阶级。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有许多差别，同是农民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和在资产阶级统治中，其发展情况就不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又有差别。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各层。上层小资产阶级接近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下层小资产阶级接近劳动人民，也有可能转入无产者的队伍，不能把它们看成完全一样的小资产阶级。存在既然是这样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东西，因此，“存在决定意识”这一个真理，就恰恰能够说明，为什么人的思想意识也是不断变化的，为什么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可以改造的。一个阶级或阶级中的个别人，如果转变到另一个阶级队伍里去，那么，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有可能跟着发生根本的变化。同一个阶级，如果它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变化了，或者它在自己的发展阶段上有了变化了，那么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尽管这个阶级基本上仍然是这个阶级，尽管它的思想意识也并不超出这一个阶级的思想意识的范畴，例如说尽管小资产阶级始终是小资产阶级，而并没有消灭，尽管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始终总有着它的基本特点，但是，既然它有上、中、下各层，那么，要说各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这是谁也知道不对的；同样，要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会完全一样，也是不对的；认为在人民民主政权下面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改造，更是完全错误的说法。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国家里，各阶级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以往被压迫的地位变为统治者，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站立起来，对着全世界扬眉吐气。这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根本的变化，也是中国各阶级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根本的变化。这样一个根本的变化，就不能不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各种各样的、与各阶级人民的阶级本质相适应的许多变化，而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发挥的日益深刻而普遍的领导作用，也规定着这些变化的特点。就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它已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因此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就空前迅速地普遍地提高起来，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就日益深刻而系统地发挥出它的领导作用，这也就规定着各阶级人民思想意识的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两年来遍及全国范围的学习运动的高涨，和它所收到的显著的成果，就足以说明在这一个存在方面的变化的基础之上引起了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意识上的多么巨大的变化。

有的人又从另一方面提出疑问，说：既然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人的思想意识是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用不着再提倡思想改造了。这仍然是用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不了解意识对于存在又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不了解意识固然归根结底是由存在所决定，但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也会和存在互相矛盾。这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由于，人的思想意识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但是，当着某种思想意识在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起来以后，它本身就会有相当的坚持性、成见性，而在物质生活已经继续向前发展了的时候，人的思想意识仍然有可能照旧不变。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的思想意

识就会落后于现实条件的发展。客观存在已经出现了新的面貌，而思想意识仍然不能超出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的内容。这就产生了意识与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表现就在人的行动上：人的行动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人们如果有了落后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会支配着他们恋恋不舍地不肯舍弃旧的社会存在和旧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行动趋向难于适合新的社会生活条件，甚至于会和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形成完全对立的状态，因而使他们成为阻碍新社会进步的反对力量。旧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受到反动统治者亲美的宣传教育的影响，不认识美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本质，不觉得美帝国主义应该受到仇视。这种思想一直遗留到新的人民中国成立以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间，如不改变，就会和客观存在发生矛盾，阻碍着他们的进步，使他们不能够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甚至于要阻碍这个前进的运动。如果中国各阶级人民的思想始终保持着旧中国时代的面目，如果采取自流的态度，任随这种旧的思想状态与新中国的客观存在互相矛盾而不加以解决，那么，我们就很难，甚至于不可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来推动中国广大人民自觉地保卫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那么，新中国的保卫事业和建设事业就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就要无限推迟或甚至有可能归于失败。如何解决这一个意识与存在的矛盾？那就是要提倡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就是不要简单地等待思想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而是要经过学习运动，经过改造思想的主观努力，来自觉的促进和推广这种发展，使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意识在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能够适应新中国的改变了的客观存在，解决其互相间的矛盾，使意识与存在接近于一致。

改造思想，领导各阶级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全体规模上来

进行自我改造和教育工作，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人民民主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区别的标帜之一。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在旧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是依靠工、农劳动人民的力量打败封建地主阶级，而在反封建的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但当它们一旦获得了政权之后，就立即踢开了战友，用一切方法把工人农民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置于被压迫者的地位上，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常常要和原来的敌人——封建势力互相妥协，共同来压迫劳动人民，排挤小资产阶级。这样就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样的国家绝不会领导人民来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也就是绝不会领导人民来抛开自己的旧的落后思想，来认识新的客观现实。居于专政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愿意这样做，相反的，为要巩固它自己的阶级的统治和维持剥削的利益，它就要尽量维持和利用人民思想中的落后成分，甚至于要在人民中间制造愚昧，以便欺骗人民，使人民易于服从统治者的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旧德国的帝国主义者以至于英帝国主义者，都曾利用人民中间的封建时代思想的影响，来建立金融寡头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者以满足各种卑劣的欲望作为钓饵来欺骗士兵走上屠杀朝鲜人民的战场，这是今天世界人民有目共见的事实。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形，和这些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情形完全相反。人民民主国家不是一个剥削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它的任务绝对不是要维持一个阶级的剥削利益和巩固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它是代表广大人民来对少数反对剥削阶级实行统治，它的任务是要逐步解放广大人民，最后消灭阶级剥削制度和消灭人对人的国家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性质和任务，就规定它必须领导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使

人民脱离在旧社会所受反动统治者的思想上的毒害，脱离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习惯坏思想，使人民在思想意识上面目一新，能够与自己的新国家主人的地位相称，使人民懂得如何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挥自己的力量，如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和保卫自己的国家，如何在现阶段的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并准备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国家，必须完成领导人民改造思想的这一个任务，必须使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按照其自己的阶级特点改造到与客观物质条件的发展需要互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矛盾，才能使他们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行动中发挥其与各阶级相适应的自觉性、积极性。中国人民在现阶段的思想改造，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作为基础的，共同纲领规定了目前中国各阶级人民应如何团结起来实行国家统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准备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工作的正确方向，现阶段的各阶级人民改造思想的问题，就是要按照共同纲领所指示的方向，按照各个阶级在共同纲领所处的不同的地位，来分别进行具体的解决，以便各阶级能依自己的特点来改造自己，使自己在今天的新国家中贡献最大的力量。

二、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的问题

这必须对各阶级人民的具体特点作正确的分析。改造思想的任务之一，是要使人民脱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这一类敌人的反动的思想，必须加以坚决、彻底、全部的肃清。这是没有问题的。成为问题的是：在革命统一战线中成为朋友的一些阶级的思想，是不是也要改造呢？小资产阶级是朋友之一，它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应该改造呢？我们的答复是肯定

的。从旧社会里来的各阶级人民，除了无产阶级，由于它的思想就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人阶级中间的思想教育问题只是排除其他阶级思想影响和提高觉悟的问题，此外，就其他各阶级人民说来，它们不仅仅会从旧社会带来若干反动派影响的残余，而且自己的阶级本身，除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能够表现一些前进的、积极的作用之外，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因此，为要使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都能适合于新的社会存在，适合于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方向，就必须有所改造。改造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和对待反动派思想当然不同：对于反动派思想，我们是要求把它整个的阶级思想加以坚决、彻底、全部的肃清，至于人民、朋友间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就一般情形来说，还不是要求某些阶级整个地把它们自己的思想完全加以消灭，而是要首先反对这些阶级思想中某些落后的和消极的因素，使它能够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所以，我们提倡各阶级人民的思想改造，并不是要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思想完全看做反动的、非法的东西，不是要把它们的思想当作敌人一样，采取完全势不两立态度来对待它们。这样的做法，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里作为朋友的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来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自然，如果是就共产党的党内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教育来说，那么，全部排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又是完全必需的。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努力和自己头脑中所保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应该认为保留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任何残余是合法的事情。至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却不能使用共产党党内教育和工人阶级教育的原则，其目标并不是一定要它们把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完全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而

是要首先就它们原来自己阶级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批判其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矛盾的、落后的、消极的或叫做反动的因素，而力求使其与新社会的发展需要相一致。当然，这绝不是说，在这些阶级人民的思想改造中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不是说，在思想改造中不应该使各阶级人民逐步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对各阶级人民的思想特点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就不可能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以及一切违背新社会需要的、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坏东西给予有力的批判，就不可能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使他们的思想适合于客观的需要，就不可能通过思想改造推动这些阶级人民自觉地来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斗争，并准备将来进一步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顺利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要想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正确地进行教育和思想改造，就一定要保证坚定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保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应该力求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个别的或成批的非工人阶级的个人放弃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转入工人阶级队伍以至于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也是必要的，完全合理的。下面我们就来对各阶级人民的特点作一些简略的分析，仅供读者一般的参考。

（一）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受到排挤和压迫，而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由于旧中国工业发展的落后，却还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余地，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

国家的建设中，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表现一定的积极性的。但是，发展不足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本身是软弱的，而且由于长期在反动统治下生活的结果，受到后者的某些恶劣的影响，对于后者往往保持着某些联系和依赖性，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表现出动摇性、两面性。这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和行动。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者常自以为可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间站在不偏不倚的地位上，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道路同世界革命人民的道路中间可以有第三条道路。他们在很长时间中都不能够了解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而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特别恶化了的投机性、盲目性，如不加以改造，对于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也会发生有害的破坏作用。这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就是要发挥其对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能起积极作用的方面，就是要批判其对于革命的两面性、动摇性以及经济活动中盲目投机的有害思想，使其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工作中能保证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资产阶级，它是要剥削工人阶级和牟取利润，否则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改造，其一般的目标并不在于要他们根本消灭其资本主义的剥削思想和谋利思想，而在于把他们的这种思想正确地安置在《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轨道上，使之脱离反动派所指引的道路，并为将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时准备进一步改造的基础。简单地用“一切剥削都不合理”的公式，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一概看做罪恶行为，是犯了非历史观点的错误。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和谋利思想在现阶段自然有其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它们对帝国主义表示崇拜、畏惧，在

帝国主义侵略前面妥协、屈服，如果它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如果它们企图使自己的工商业活动长久依赖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来谋取利润，或企图盲目投机获得暴利，这样的剥削思想、谋利思想，当然是不合理的，甚至于是罪恶的，反动的，是应该反对的。资产阶级如果能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努力建立民族自己的工商业，把工商业活动的方向为着农民、工人及其他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避免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活动和盲目投机活动，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领导下和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求得合法利润，那么，他们的思想虽然也是从剥削和谋利的要求出发，但在现阶段这样的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和谋利思想，在资产阶级中间却是可以容许的（自然，为着保证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我们又必须同时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以外的人民中间扩大影响）。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所应遵循的一般的方针。

（二）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作坊老板、小商人、小店主、小员司、一般学校教员、大中学生（学生有许多是出身资产阶级地主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的，也有一小部分参加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伍，但就其主要成分和一般的思想情况来说，可以算做小资产阶级）等等复杂的成分。在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按其经济情况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生活略有富裕的，属于上层；仅能维持生活的属于中层；经济感到有些窘迫的属于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一般都剥削少数雇员的劳动，其地位比较接近资产阶级，往往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还个别地会走进反动统治者的圈子里去。但是，一般说来，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重

重压迫下，总是大量地、急速地走向穷困、破产，经济上升的希望是绝少绝少，而相反的是大批地、不断地走入了无产者的队伍。因此，除了少数上层分子之外，小资产阶级对于反动派的统治都非常痛恨，有着相当强烈的革命要求，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进行坚决的斗争。五四以来历次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都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参加，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而青年学生运动，由于对政治的反应比较敏感，在历次革命时期中还起着先锋的作用。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转向工人阶级的立场，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所受的压迫、痛苦，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中国的人民政权下面，就完全的解除了，因此在新的国家政权下面，它们的思想意识中的这些积极的前进因素，将能够而且也必须进一步发挥起来，成为建设新中国、保卫新中国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逐步受到改造，由个体小生产转入集体的大生产，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为着要尽量发挥它们思想中的积极的前进的因素，就必须克服其消极的和保守的方面，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的、保守的方面，是决定于它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一些特点。它是小私有主，它的经济生活建立在规模狭小的生产基础之上。一般都亲身参加某些个体劳动。个体的、狭小的物质生活条件养成小资产阶级重视自己狭小的生活和财产的习惯，容易把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小资产阶级之参加革命，首先是由于个人的生活、财产、名誉、地位和利益等等在反动统治下受到损害，它对于革命的希望也首先是在于求得所谓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和解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小资

产阶级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潮流中经过一个时期的体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然后才会逐渐知道同情、重视和关心工农劳动人民的斗争，才会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与个人解放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进一步把自己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或者把个人的要求从属于人民解放的要求，甚至于转变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参加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脱离群众斗争，长久把自己关在小家庭或书斋范围内的小资产阶级，对于群众的力量和群众斗争的意义，一定不会了解、不感兴趣、漠不关心，甚至于会以为是多余之举。他们习惯于用所谓“超阶级的”个人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把社会和革命的问题仅仅看做、或主要看做是个人的问题。他们痛恨反动派，主要是因为看到反动派都是一些贪污腐化卖国残民的个人的集合，而不能进一步认识到反动派的阶级基础，他们佩服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的人民政权，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成员廉洁、勤劳、办事认真，而不知道后者的主要特点及其取得胜利的基础是在于有一个最坚定的革命阶级立场，在于时常不忘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而又能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缘故。小资产阶级分子喜欢把一切事业看做仅仅是或主要是个人的事业，而很少或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切有价值的事业首先是革命阶级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说：“我是靠我的本领吃饭的”，“这是我所完成的工作”，“只要我有了技术，到哪里都一样工作”，以为只要个人有了本领和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个人的本领固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个人的本领的使用没有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为基础，是必然要一事无成的，个人的技术的发挥，是会受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环境的限制的，并不是“到哪里都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名词来加以概括，就是小资产阶级

的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私有财产制度是采取保守态度的。在这一点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同属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范畴之内，并因此很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建立在规模狭小的个体经济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上，因此它就有它自己的特点，这特点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讲其中最主要的几点。

第一，轻视群众、轻视劳动。一般小资产阶级除了少部分上层的以外，还不至于像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那样把劳动群众看做下贱的、生来应该受欺侮和剥削的人物，相反的，他们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受侮辱损害者的不平现象的存在，是抱反对态度的。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己常是多少从事一些劳动的，并且是受排挤和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轻视群众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不能认识或不能重视劳动群众的力量，把革命事业看做居于“负责地位”的人物的个人的事业，看做英雄豪杰“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恩赐行为，以为只要个人本领加强了，或者个人上升到负责地位了，就可以立刻做出救国救民的大事业来。如果他一旦居于负责地位了，那他就会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成了那样的英雄，就要凭着他的个人意志来独断独行，而不去考虑、或不重视群众的意见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坏作风，其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还有其他的来源，如封建的官僚思想、军阀思想等。）轻视劳动，把劳动看做可耻的事情，在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中，以及接近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中，比较普遍存在，一般小资产阶级也有认为劳动是“受苦”、“受罪”的错误思想，这是剥削阶级以至于反动阶级思想在小资产阶级中的恶劣影响之一，它能引导小资产阶级对于那些反动派的寄生生活发生羡慕的心理，并进而走上反动派所指引的道路。克服小资产

阶级的这些缺点的方法，是要引导他们接触工农劳动群众的斗争和参加这些斗争，脱离“离群索居”“闭门造车”的生活，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经济的合作互助，以及其他适当的集体活动（如学生中的群众活动）。学习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使其从思想上认清楚劳动人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散漫性、无政府无组织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个人兴趣、个人利益以及小生产、小集团的存在，采取保守的态度。这种保守的态度，就会阻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认识的进步，使他们不可能了解，政治上的集中领导以及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为什么是革命人民战胜敌人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也不可能了解，在经济上必须由个体的小生产发展为集体的大生产，然后社会才能走上更高的阶段。不了解集中领导的重要，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思想、工作上闹独立性、喜欢独断专行而不尊重领导指示的思想。不了解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重要，把个人以及个人周围的小集团、小生产、小单位的利益放在一切考虑的第一位，这是组织关系上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原因也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即过分的强调个人自由，害怕参加集体行动，害怕受纪律的约束，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害怕克服自己的缺点，也不热心帮助别人改正缺点，懒懒散散，得过且过，“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对于私人的细小得失重视得有如生命，对于集体的人民的共同利害则不甚关心或完全漠不关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是许多小生产的自由联合，而不是以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生产作为经济基础；“打平伙”、“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思想等等，都是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对于小生产的保守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以上这些散漫性和无政府无组

织的思想，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或在将来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中，都会发生消极阻碍的作用，必须耐心地正确地领导他们参加适当的组织行动，使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集体行动的利益，并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和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来提高他们的认识，才能逐渐克服。

第三，超阶级的空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人的行为误认为只是个人的行为，而不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和一定的阶级的活动相联系，不是和这一阶级相联系就是和那一阶级相联系，而不可能真正居于超阶级的地位。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超阶级的空想本身，也正是它的不稳定性阶级立场的反映。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的、不断分化的、可以向资产阶级上升也可以向无产阶级下降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超阶级的空想，使他们经常模糊了敌友的界限，不能把革命敌人看作是敌对的阶级来看待，而以为敌人的行为只是某个人一时的思想错误，因此对于敌人就必然发生种种的幻想。例如以为只要敌对营垒里换了某个领袖人物，或者某个领袖人物的思想改变了，那种反革命者的敌对行为也就可以终止了。必须指出，这种思想在别的阶级中间也会有的，但主要是广泛地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中间。这种幻想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容易受到敌人甜言蜜语的欺骗，而招致革命力量的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人员中特别容易产生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超阶级的看法，以为有技术的人员不论在谁的统治下面都是一样地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在新民主主义人民政权下学习政治和改造思想就是多余的负担。他们不知道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本身虽然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却不可避免地要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立场，因此，他们对于自然科

学知识的理解和技术的应用，也必然要多多少少有着自己阶级意识的烙印，必然要多多少少受到阶级立场的限制。不学习政治，不改造思想，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虽然也可以消极被动地做一些工作，也可以照样吃饭，但绝不可能发挥高度的积极性、自觉性，不可能使他们的工作和研究获得最大的效率。学习政治和改造思想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绝不是多余的负担，而是提高研究和工作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空想的人所不能了解的。对于有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空想的人需要逐步地推动他们参加各种革命政治斗争的群众活动，同时学习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观点，使他们把自己的若干亲身的体验和理论的了解相结合，才能逐渐认识到超阶级的空想为什么是错误的。

第四，片面性、主观性。小资产阶级容易把个人的、小集团和小生产单位的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在思想方法上就免不了要犯片面性、主观性的毛病。这就是说，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周密地依据各方面的事实情况来作为推测和判断的根据，而只喜欢依据于自己生产活动的狭小圈子里便于找到的材料来作为根据，不是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具体规律来决定自己的工作和行动的方针、办法，而是喜欢依据个人主观的愿望、感想以至于感情上的爱好和憎恶来轻率的决定工作和行动的方针、办法。例如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工作者，容易把自己所读过的书本上的词句简单的引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惟一根据，而不顾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否完全符合于这些词句，这就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方法的来源。长期做一定地区的或农村工作的干部，常常把一个地区的经验材料，当做处理一切工作的万应药膏，不管遇到什么新的不同的地区和环境，总是死板的照样应用，这就是经

验主义的错误思想方法的来源。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的表现。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使人们在认识上、政治上和工作上常常发生各种偏差和摇摆，而不能认识事变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掌握坚定的明确的行动方针。“左”倾冒险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急性病与迟疑不定，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这些思想上的偏差，从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来说，都是由于仅仅根据片面的情况、材料或主观的想法来判断问题的结果。今天抓着了情况的一些有利方面，就发生盲目乐观、急于求功和冒险乱冲的想法，明天忽然发见了情况的一些不利的方面，于是又产生悲观失望、迟疑不定和退却保守的想法，这就是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所引起的认识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摇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片面性和主观性的方法，就是要使有教条主义毛病的知识分子接触实际、研究实际，多向实际方面学习，也要使有经验主义毛病的实际工作者认真读书、认真研究革命的政策，多多的向理论方面学习，同时都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便较有系统地研究和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

（三）农民。农民中有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旧富农还带有封建性。我们讲到农民的问题时，都是把中农和贫农作为主要的对象。中农相当于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贫农则处于半无产阶级的地位，农村的无产阶级则是雇农。农民在封建社会下面受到地主阶级最直接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又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特别是贫雇农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是非常之大，和工人阶级在一起构成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也

仍然要受到压迫、剥削而大量走上破产的道路，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面，农民可以经过合作社的道路，跟着工人阶级走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再受压迫和剥削，而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所以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它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新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受到教育和改造，由个体的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民的教育改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农民经济的分散性，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使它们对于个体的经济容易采取保守的立场，所以农民的教育，如毛主席所说的，仍是“严重的问题”，“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四）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个领导作用是通过它的先锋队伍——共产党来实现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掌握这个工人阶级的思想并用来指导革命斗争。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工人和共产党员天生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此也不能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就用不着受到教育和改造了。相反的，只有在不断的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有可能获得本阶级的思想，并因此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是由于：第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队伍的成员，大部不是直接出身工人阶级的，而是由别的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同时旧中国工人阶级是生活在反动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是生活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包围中，这些客观条件使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的思想经常受到非工人阶级的影响，必须对这些影响经常的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第二，工人阶级的

领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思想不是在工人阶级自发的运动中产生，而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和用科学方法总结了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经验的结果。必须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才能成为最有觉悟的、能够担当得起革命领导任务的阶级。由此可知，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必须一方面经常地反对自己思想中的非工人阶级成分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本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为什么也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原因。

以上，我们把各阶级人民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问题的方针一般地说过了。下面，还要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

三、关于思想改造的某些方式的问题

前面已说过，各阶级人民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根本不同于对敌人的思想斗争，其性质不同，方针不同，因而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明显的反动派的破坏思想的散布，应该采取专政的方式，给以坚决的镇压、打击和揭露。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对反动思想进行镇压、打击和揭露的工作，应该随时自觉地来参加这个斗争。至于对人民中间的思想错误以及由于人民觉悟不够而受到的反动思想的影响，就要采取民主的方式来克服，也就是说，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和耐心说服的方式。人民中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细致和长期的工作，不能希望在几天或几星期之内把各阶级人民的思想中的一切落后的消极的方面完全肃清，甚至于对反动派思想在人民中的影响，也要进行长期的不断的改造，而不是几天或几星期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正

如毛主席所说："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5页）所以，在思想改造工作中采取急性的、粗暴的、强迫命令的态度，而不注意启发学习者的自觉自愿，是错误的，是徒劳无益的。这个原则，不仅仅对于正规的大学适用，对于短期政治训练学校，对于共产党的党校以及整风学习运动，也是基本上适用的。但是，这个原则，并不妨害我们规定在一定的短时期的学习中间（长短看情形而定），要求改造思想达到一定的目的，解决某些可能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克服某些可能和必须克服的思想缺点。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人民很快就学到了对美国仇视、轻视、蔑视的思想，而克服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只要我们的计划符合实际情况，那么，要求在一定的短时期内获得一定的显著的成绩，又是应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这也是多次的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果因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工作，需要耐心的说服，于是就听任其自流，容忍其拖延，把一定时期内规定一定任务的办法看做不必要的事，那又是另一个偏向和另一个错误了。自然，在不同的学习环境里，由于学习的要求、领导的经验、群众的基础以及其他条件等等的差别，这些任务的规定以及时间的长短，是应该有差别的，把教育共产党员的党校和党的整风学习中所要求的任务简单地用到非党的学校里，是不对的，把短期政治学校的学习的任务简单地拿来要求正规的大学的政治课的学习，也是不对的。这一切，都需要学习的领导方面能依据情况给予具体的掌握。

这里附带还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关于"思想总结"的问题。"思想总结"（或叫做"学习总结"也可以），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所创造的学习方式之一。在多年来的学习运动中经常采用，全国各地解放以后，又在短期政

治学校以及正规大学的政治课中采用，一般都证明能收到很大的成效。但是，个别大学里采用“思想总结”的方法，却发生了偏差。这绝不是“思想总结”的方式在原则上不对，而是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思想总结”的缘故，所谓不正确的方法，就是：第一，方针上的敌友不分。在“思想总结”中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当作反动思想一样，企图整个加以打倒。第二，急性病。企图一次将一切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错误思想全部肃清，企图一下子把个人一生的历史的总账都算个一干二净，而不是按照可能和必要的情形作适当的检查。第三，命令主义。不是经过自觉的认识和真正学习的心得来作自我批评，而是在小组里或周围环境里多少带逼迫性的空气压力之下，勉强写出些不成熟的意见。这些就是使得“思想总结”得不到应有的成绩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偏差，那么，“思想总结”的方式仍然不是不可以采用的。而且，由于学习必须在一定时期里达到一定的目的，所以，在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把个人的心得作一总结，对自己的思想作适当的检讨，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二）“整风”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一般政治学习里呢？把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整风”的一套方法，简单地用到非党人士的政治学习和正规大学里，那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整风”方法的某些原则，也不能适用。不是的，整风方法所包含的某些原则，如以改造思想和工作作风为目的、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是可以作为一般的政治学习方法的原则来采用的，只要能够灵活的结合具体情况，那么，这些原则在非党人士和正规大学的政治学习中间，也是可以的。

（原载《学习》杂志第 3 卷第 7 期，1951 年 1 月；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

(1951.3)

一、真理的问题是对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反复地论述到关于真理的问题。他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为我们正确地指明了真理的性质，判定真理的标准，以及如何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他“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东西和主观东西的一致性的原理”(《真理报》编辑部)。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是把这些真理的学说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并且用很大的力量来加以发挥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在理论上这样重视真理的问题，归根结底，又由于它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始终是一个成败攸关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用艰苦努力来解决的困难问题。

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里，毛泽东同志曾把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样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

作者注：文内凡未说明出处的引文都是引自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鸦片战争失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期间，中国人民经过了80年左右的斗争，由于没有找到最好的真理，革命运动始终没有获得胜利。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才不过28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宣布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就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来说，革命领导之能否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也是与革命的胜败密切联系着的。在有些时期，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以及1931年到1934年的国内战争时期，由于革命的部分领导者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由于他们把错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误认为真理，就使革命和人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一些革命领导者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对这些错误的倾向进行不断的坚决的斗争，那么，今天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不能想像的。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适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真理的认识对于革命和人民是如何重要，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干部中间，还有很多人不能深刻了解，甚至于完全不能了解。有些人不肯用刻苦努力的精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其借口是不学习理论似乎也可以照样工作，而不知道不学习理论绝不能把领导工作做好，绝不能在领导工作中避免错误或减少错误。有些人在工作和学习中不能够积极地坚持真理，对于真理和错误的界限划分采取无可无不

可的态度，不能勇敢地来揭发错误和对错误进行斗争。对于真理缺乏积极的和严肃的态度的这一切情形，是不符合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的，是和毛泽东同志重视理论学习，重视真理的精神相违背的。

要善于坚持真理，就必须了解什么是真理，必须学会判别真理和错误，必须懂得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实践论》中所发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学说，并把它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二、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

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就不是真理的认识，而是错误的认识。如何判别真理和错误？如何证明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是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通过实践。”“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之真理性，即真实性和威力，现实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争论，乃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所规定了的基本原理，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里，都有更详细的阐明，而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里，是更进一步地具体地发挥了。

否认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曾经是许多反动哲学者引人陷入唯心论和不可知论的泥沼里去的诡计，列宁对这种诡计曾在他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给了深刻的揭露。旧社会的许多学校教师和知识分子之容易沉溺于烦琐哲学的空论，其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中了这种唯心论的毒害。忽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或对于这原理完全无知，曾使许多人在革命工作中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们闭着眼睛不肯对群众的实践经验作任何的调查研究，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和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当做真理，用来任意决定政策，指导工作。凡是与他们的"想当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的东西，即使是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的成功经验，也要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给予无情的打击，凡是在他们的"想当然"指导之下的行动，即使在群众的实践当中遭到失败，碰得头破血流，仍然要找理由把它渲染成伟大的胜利，并继续向失败的墙壁上碰去，而绝不肯承认失败，更不能"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中国的革命人民曾因为这些主观主义的领导者遭受过很大的损失。在今天的工作干部当中，也还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主观主义倾向，他们虽然不是居于那

样重要的领导地位，但如果不去注意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那么，他在一定的地方对于工作和人民，仍然会给予相当的损失。

坚持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来和这一类的唯心论者、主观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务必使他们放弃那种“自封为‘天下第一’”的“虚伪与骄傲”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到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学习，这对于革命、对于人民都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自己就作了杰出的模范。他不但在理论上发挥了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在一切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指导上，始终坚持着这原理。和那些闭眼不看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者相反，毛泽东同志任何时候都不忘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广大人民的实践斗争中进行调查研究，抽引出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来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来对工作提出正确的指导。要了解毛泽东同志如何坚持这些原理，只要回想一下在 1927 年间，他如何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得出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反对的结论，或者回想一下 1931 到 1935 年期间，他如何依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经验，提出指导革命的正确路线，来反对教条主义者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只要回想一下这些例子，就很足够了。

这里必须提起注意，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里，被当做认识发展之基础和真理标准的实践，与旧哲学中有时论到的以及受旧哲学影响的一般人思想中所了解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是一定要明确地加以区别的。旧哲学的唯心论在提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的时候，其所理解的“行”或实践是抽象的、表面的、片面的，甚至于是神秘的、反动的，其所指的内容，或者仅仅是儒家的进退洒扫式的修身行为，或者是对于某些伦理原则的所谓

践履笃行，或者是黑格尔的“用沉思来制定的改造直接的东西”，或者是庸俗的人情世故，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或者是某些腐朽的反动哲学中胡说乱道的什么内心体验。这些唯心论哲学所规定的“实践”和“行”的概念，与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的实践概念，或马克思说的人类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根本不同。五四运动中间为胡适贩到中国来的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哲学——实验主义，其所谓的“实效考验”，也是一种用科学名词伪装了的唯心论的概念。要想根据这些谬误的概念来正确解决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可能的。旧唯物论也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实践行动，如像费尔巴哈，他就把实践看做低级的生理的情欲活动，“把实践只在它的污秽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费尔巴哈论纲》），把“实践的观点，饮食的观点”（费尔巴哈）看做一个东西。“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意义”（马克思）。旧唯物论既然从这样低级的意义上来了解实践，因此也就不可能在认识论里把实践放在真理标准的优越地位上。

学习《实践论》，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实践概念，和旧哲学里的那些浅薄的、混乱的、庸俗的，甚至于神秘反动的概念加以严格的区别。否则，要想正确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其中所包含的真理学说，是绝对达不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辩证唯物论的实践概念的具体内容作了系统周密的发挥，他依据精密规定的意义，有时特别称之为“社会的实践”，或“变革现实的实践”，这就有别于旧哲学中和一般人心目中的那种意义模糊的概念，有别于那种反对变革现实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要求的“实效”。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的具体内容，最主要的，是生产活动的实践和阶级社会的各

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实践。其中生产活动的实践，又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同时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又“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的程度，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同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决定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限制了人民的眼界，特别是各时代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剥削阶级，要蒙蔽历史发展的真相，这些条件使得人类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长久缺乏全面的科学的真理性，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但是，历史上每一次进步的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总使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前进一步。到了伴随着巨大生产力的大工业而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时候，人们终于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这样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因此，只有“社会的实践”，“变革现实的实践”——变革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才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真实基础，任何人如果希望使自己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断地接近客观的真理性，就只有参加在变革现实的实践当中。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必须让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以及头脑中的推理计算与工农业的社会生产活动适当地、直接地或间接地保持某种联系，才

能够在发明发现方面不断地获得新的启发和不断的进步。完全脱离生产活动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纵然也可以获得一些现成的知识，但要想超出现成的知识水平而向新的真理不断接近，是困难的。旧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一般的停滞不进或进步迟缓的状态，基本上是可以用反动统治下自然科学研究与生产活动的条件相隔绝来说明的。研究社会历史的人，或希望对于社会、历史以及革命的问题获得正确认识的人，必须使自己的研究与变革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相结合，必须参加在变革现实社会的而不是保守旧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够真正领会社会科学的真理。脱离了进步的阶级斗争的人，就今天来说，脱离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以美英帝国主义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人，以不问政治而自命清高的人，以少数上层人物的所谓修身践履行为而自满自足的人，留恋旧社会甚至于站在保守旧社会的反动立场上的人，要想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

三、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

人们如何在实践中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接近客观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一个依循着辩证法规律的能动的发展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真理的接近，最初只能达到“感性认识的阶段”，“感觉与印象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获得的初步经验，都是属于这一个阶段的认识。在这个阶段里人们的认识是比较低级的，即只能认识外界“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只有再经过“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产生了概念”。这时人们的认识“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

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这就是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阶段”。理性认识“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能使人们“了确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确它的规律性，了确这一过程与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我们在工作一个时期之后，要把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作一个总结，这就是为着要使认识达到理性阶段。但是，仅仅达到了理性认识阶段，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思想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的问题。“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如果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那就证明理性的认识已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性。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或不完全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证明它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的真理性，就必须加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修正。这就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与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是认识的“更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工作中把经验的总结制定成新的方针、计划，再用来指导工作，就是使认识进入这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当然我们也还不可以把已定的方针、计划看作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而常常要依据工作中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必要的修正。“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因为只有经过这一个“飞跃”，才能完全解决我们对于外界认识之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的问题。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这样写道：“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列宁所指出的这一条认识真理的“辩证法道路”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毛

泽东同志对于真理论，对于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所给予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历史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他总结了这些斗争经验，从认识论的基础上揭发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基本错误倾向之所以失足的原因。真理的认识必须是在实践中经过有规律的努力过程才能获得，不懂得这些必然的规律和过程，不承认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按照这些规律和过程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而以为可以采取任何轻便偷巧的态度，以为仅凭乍然一看或灵机一动，而不必准备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苦心就可以猝然获得，这种无知和侥幸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机会主义态度，正是各种错误认识发生的根源。教条主义之所以脱离客观真理性，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就是由于脱离了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知识；就是由于不懂得“认识开始于经验”这一个“认识论的唯物论”原理；由于不懂得理论都是从许多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个道理；由于不懂得必须“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才能“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由于不懂得为了要取得丰富的感觉材料，就必须对于所要认识的对象及其周围环境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必须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从广大群众的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中去获取大量的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以补个人实践的经验之不足。这样才有可能对经验作出全面的总结。总之，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是接近客观真理的一个必要阶段，因此他们也就不知道应该从实践经验中去抽出反映客观现实的生动理论，而把“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或书本上支离破碎地抄引下来的现成条文当作公式到处乱套。这样就离开了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而走上悬空的主观主义的道路。

经验主义者又是从另一方面遮断了人们接近客观真理的道路，这就是不了解“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一个“认识论的辩证法”原理。他们以个人所有的一点点直接实践经验自骄自满，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一孔之见，轻视各方面的间接经验，不会有系统有组织地从事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学习各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把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改造提高使之成为理性认识的必要，不懂得总结经验的必要。他们把总结经验看作不能忍受的苦事，把阅读书籍学习理论误认为多余之举，把学习新的知识和应用头脑思考问题当作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经验主义者的知识就停顿在狭小的低级的感性阶段，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内部规律性，不可能在实践中“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掌握明确方针，看出远大前途，对于事物发展的客观真理是处在盲人的状况中。

这样，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离开了认识真理的辩证法道路。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学说，详细指明这条正确的道路，就给我们指出了避免重犯这些历史错误的明确方针。

四、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毛泽东同志严格依据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指出认识真理的过程绝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永不停息地向前推移和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真理的认识只能是客观事物过程的正确反映，而客观事物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与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与发展”的缘故。因此，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某一过程和某一发展阶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后，即便是在实践中受到了检验，证明其

为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性的真理，仍然不能把它看作无条件的绝对真理。一旦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间发生了新的推移和转变，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认识也跟着推移和转变，使之符合于新的客观过程的规律，因此，人们如果要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持客观的真理性，那就绝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使自己学习的努力停顿下来，就要不断地跟着实践的发展前进，而使自己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发展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特别依据了革命历史实践的经验，来证明真理认识之不断发展的必要。他说：“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对于革命历史经验的这些总结，具体地发挥和发展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这一个原理：“真理和错误，像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着的逻辑上的范畴一样，只在极端被限定的领域内，才有绝对的妥当性。”这就是说，人们的主观认识，只有当它在实践中被证明经常符合于客观的情况的时候，只有它能够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客观情况的推移转变而推移转变的时候，才能经常保持它的客观真理性。这叫做“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的认识如果一旦停滞不动，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把某一过程某一阶段的

正确认识变成僵死的成见，不能跟着社会实践和客观过程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那么，原来适合于客观情况的正确认识就要变成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真理就要变成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由主观与客观的分裂，理论与实践分裂所产生的错误，就是革命的实践当中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左”的冒险主义，其特点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毛泽东同志充分论证了真理认识之不断发展的必要，因此也就“深刻地说明了和发展了著名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真理报》编辑部)。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我们能够认识绝对真理吗?马克思主义者的答复是肯定的。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因此，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绝对真理的过程，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学习，只要我们经常不懈地从实践过程中，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抽引出新的真理，来充实和发展旧的真理，我们就已经是亲身游泳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我们就能通

过无数的相对真理来接近绝对真理。自然，这一个游泳的过程，是永远没有完结的，那是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那是因为绝对真理的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结的、人类认识日益向更高程度发展的活生生的过程。因此，没有形而上学者所幻想的那种最后完结了的绝对真理。如果一定要勉强去设想和勉强去追求这种最后完结了的绝对真理，不愿意使真理认识的发展脉搏永不停息地跳动下去，不愿意把绝对真理当作“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来看待，不愿意承认绝对真理中同时包括着这个相对的方面，那就势必要把一切相对真理都夸大成绝对真理，把一些有限的活的知识变成永远凝固的僵尸，然而客观过程和人类实践却绝不是永远凝固的僵尸，而是永久向前发展的有生命的东西，这样一来，势必就要使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分裂，使理论和实践分裂，这就不但得不到真正的绝对真理的认识，甚至连相对真理也掌握不住，而所能掌握住的，就仅仅是主观的、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形而上学的愚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想要创造永久完成的绝对体系的哲学家，都是为着这个原因而在历史发展的前面无例外地宣告破产了的。就革命工作中的问题来说，教条主义者把某些抽象的公式当作最后完成了的真理，不顾一切条件、地点、时间任意拿来乱用。有些经验主义者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坚持这些局部经验，不肯学习新的经验。这些错误思想，都是片面地坚持真理的绝对性质，而否认相对真理的存在，在各种实际工作中，是都要遭到严重的失败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绝不能得到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结论，说一切真理归根结底都只是相对的，而没有任何

绝对的性质。有一种哲学上的相对主义者，以为世界上的真理是没有任何绝对的客观标准的，只要人们主观上觉得是真理，就可以算做真理，因此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是非作为是非，而不必承认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这就成为一种怀疑主义和极端的主观主义。列宁所批评的那些“经验批判论”者们，在实际上都有这种相对主义的看法。美国的实验主义是与经验批判论同类的哲学流派，它的所谓“实效考验”的真理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的标准。例如对于美国的反动资产阶级，如果宗教迷信也能产生帮助他们维持统治和赚取利润的实效，他们就可以硬把宗教迷信看作和科学同样有价值的真理。如果科学对于他们所要求的利益不能表现什么实效，那么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真理也要被他们当做谬误甚至于罪恶看待。这些相对主义的哲学流派自然是荒谬绝伦的。就革命工作来说，有些人以感想代政策，凭着主观上的临时的想法来解决问题，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反正都自认为真理。有些经验主义者在各种零星的感性经验之间游移来游移去，无可无不可。这些错误都是在实际上把真理看做仅仅相对的，主观的东西，而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存在。

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相对真理，绝不是与绝对真理完全隔绝的。第一，它是“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因此它的真理性就有着客观的——绝对的标准，而不能由人的“主观上觉得如何”来随便颠倒是非的标准。第二，它的总和构成了绝对真理，因此它本身就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第三，它反映着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定具体过程，因此它在绝对真理的无限延长的链锁中是不可少的环节，我们不能像相对主义者那样割断真理的认识发展中的这一种历史联系，他们把真理误认为只是主观的、暂时的、偶然地孤立出现的，与它的过去和

将来的人类认识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反映每一具体过程的相对真理，都是以前人类认识发展的结果，而同时又是以后进到“高一级的程度”的基础。要使我们的认识不断地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向前游泳，就必须善于取得在每一历史时期人类认识发展所达到的一切积极成果，作为更进一步跳跃的立脚点。教条主义者把过去已经获得的某些书本上的真理变成死的公式，来束缚着自己的手脚，以至失去了在生动的实践经验中向前跳跃的能力。经验主义者局限在当前的狭小的感性知识圈子里，不重视学习理论，不认真读书，不能把人类认识已达到的真理的高峰作为自己跳跃的立脚点。两种主观主义的错误都使认识不能前进，妨碍着人们向“高一级的程度”跳跃。

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里，曾经用“对症下药”的良医态度，告诉我们如何来反对这两种主观主义。这就是要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向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所给与的一个极重要的发展，是在于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这些历史经验，而创造了著名的“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原理，作为我们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真理的基本方针，作为纠正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种偏向的一个思想方法的重心。懂得了这个原理，犯过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知道不应该再去死记书本上的个别文句，并把它当做抽象的绝对的公式来限制认识的前进，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学取那些普遍真理，也就是要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应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实际问题。“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整顿党的作风》),以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另一方面，犯经验主义的人也就知道应该认真读书，以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低级的感性认识，使之上升为有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知识。

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马、恩、列、斯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号召了整风运动以来，在较短的时期里，就在基本上克服了许多革命领导干部中间的教条主义的毛病，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经验主义的毛病，使革命斗争迅速获得伟大的胜利。《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将推动我们进一步去克服教条主义，尤其是克服经验主义，使一切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干部更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游泳，更善于担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使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术界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光辉更伟大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

(1951.6)

各位同志！今天这个座谈会规定要我就《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提点意见。我本来想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也就是先向大家学习一下，再来提自己的意见。但会议的程序已规定要我先讲，所以我只能凭自己所想到的、与我们学习的关系较多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谈谈。

我想讲以下的四个问题：(一) 如何了解实践；(二)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三) 在实践中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问题；(四) 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

现在先讲如何了解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实践看做真理的标准，看做人类认识发展的基础。我们对周围世界一切事变过程的认识，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脱离实践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专门读书，不问窗外一切世事的人，是不会有正确的知识的。所以《实践论》里批判了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空话；这些道理，我现在不想再多加解释，因为目前我们已有许多生动的实际例子，可以作为更有力的证明。

最近报上登载的许多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们参加土地改革后

所写的很好的文章，都说明了土地改革的实践如何使他们获得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正确的认识。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去也曾经是专门研究农民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但在没有参加土地改革以前，他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想法,是与中国农民的斗争情况并不一致的。而参加了土地改革回来以后，他们的认识就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从前他们都相信所谓“和平土改”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他们不能理解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到什么样一种程度。他们以为土地改革既然已成了人民的国家的法令，只要依法行事，地主阶级绝没有不服从的道理。这些看法，如果只是关在房子里想一想，那似乎也好像是对的。可是，一旦走进实际斗争的场面上去，就很快看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了。参加了土地改革的先生们都看见了地主阶级并不是那么轻易地肯服从法令，并不是那么轻易地肯放弃几千年来传统的阶级特权。相反地，它们是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抵抗、阻止土地法令的实现，来保护自己的传统的特权。如果不发动群众，不经过群众的斗争，要想真正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样，接触了实践，就改正了他们的“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使他们认清楚了土地改革的的确确是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在考察人类的认识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了解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开头第一段话，就指明了这个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就不了解这一个真理，那些唯物论的哲学家，总以为人类的认识主体，好像是一面不动的镜子一样，只是消极的接受外界的影像，外界有什么东西，它就反映什么东西，而它对于外界则绝不会起什么能动的作用。这一种唯物论的观点，和人类认识的真实情形是不一致的。事实上人的认识决不是像旧唯物论所了解

的那样的一种固定在什么地方的，对于外界没有什么能动作用的镜子。人类是在自己的行动当中，在自己的社会实践当中去获得认识的。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能动地改变周围世界，也就在改变周围世界的活动当中来认识周围世界。只有依据实践行动，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才能逐步地使我们不正确的认识改变为正确的认识。由“和平土改”的不正确的认识改变为土地改革必须经过斗争的正确认识，这是通过实践所获得的认识上的进步，不参加土地改革的实践行动，是很难获得这样的认识上的进步的。这就证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也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首先就是要联系实际。联系实际，就是说不能脱离实践活动。我们学习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使自己有能力来认识和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在学习中间就不能忘记经常注意各方面斗争发展的一切具体情况，以及斗争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学习理论的方法，应该是要从学习中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帮助自己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以能否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我们学习是否有成绩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样做，如果不注重领会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只是把书本上的某些条文当做公式死记在心，对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和具体情况不认真去注意研究，不做任何分析，就把自己的公式套在上面，那就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

列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我以为很值得我们学习。按照列宁自己的说法，他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时候，是在跟马克思、恩格斯“商量”问题。这就是说，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首先要把一些实际工作里面的问题放在前面，

然后去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解决的？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所处的情况和条件跟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之下如何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了这类问题？我们在自己当前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应用同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商量的方法，就是时刻不忘记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学习方法。

就我们这个学习座谈会的一些经验来说，也可以看出什么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在一个时期曾觉得学习得不大好，但在有一个时期又觉得学习得比较好，觉得大家有了些收获。把这些情形拿来仔细研究一下，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在我们觉得学习不好的时候，正是由于我们在学习中间忘记了联系实际，把抽象原则和名词上的争论当做了我们研究、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在我们觉得学习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学习能够联系了某些实践的问题。例如在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正值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开始发生不久，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于这次战争的认识是很混乱的。我们座谈会里的许多人，对于这次战争的意义、它的发展规律以及发展前途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这时我们就选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的部分章节作为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参考材料，大家从毛主席的著作里来领会他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当时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条件，如何依据这些条件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由此也就使自己能够尝试着来分析当前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所引起的战争的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规定的战争发展的规律。这样就使大家对于这次战争认识得比较清楚了。像这样结合着实践中所提出的问

题，从理论书本中找到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就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这里必须提起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正确地来了解实践。绝不能说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作为正确认识的实践基础。我们要注意《实践论》中特别强调的是“变革的实践”。人类认识的发展、进步，是和变革现实的实践分不开的，也就是和改变自然的生产的实践以及改变社会的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这里就有了认识的立场问题。我们能否坚决站在变革现实或改造世界的革命立场上，这对于我们之能否充分获得正确的认识，是有决定作用的。社会上的反动派、顽固分子，他们不能站在变革现实的实践立场上来看事物，因此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立场问题的解决，在学习方法里面是一个不可少的要素。要想在学习中不断使自己的认识提高，就必须经常注意端正自己的立场，要经常注意使自己站稳改造世界的立场，要对一切反动的、腐朽的、没落的东西采取坚决反对、坚决斗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任何同情、调和的态度。这也就是说，要在革命的与反动的、发展的与腐朽的、新生的与没落的对立势力之间，采取坚决的一边倒的态度。例如说要坚决站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一边，而对于革命的敌人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对态度。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一点动摇、含糊，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自己的认识上、思想上引起混乱。如果因为某个地主是我的亲戚朋友，他在土地改革中成了斗争对象，我就对他发生了多少的同情心。那么，哪怕只是一点点同情心，也就足以使我在这一点上失去了变革现实的实践立场，就会混乱我们对于土地改革的正确认识，就会对“和平土改”发生若干幻想。对一切反动派的被推翻，不能有任何怜悯的心情。这种心情对于客观事实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反动派

的被推翻表示怜悯，就是对几千年来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残酷无情。有了这种心情，就是在精神上站在反对变革现实的一边，而不是站在变革现实的一边，在这样的立场上要想对于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再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

我们在实践中对于世界获得正确的认识，是必须经过一定过程和遵循一定的规律的。并不是有了些经验，或读了些理论书，马上就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能遵循着认识所必经的过程和规律，来规定我们的学习方法，那么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正确的，就会使学习顺利前进，获得积极的结果。如果违背了认识的必经过程和认识规律，那么我们的学习就会失败，就会得不到结果。

认识的必经的过程是：在实践中，第一步获得感性的认识，第二步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有了理性的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才比较深入，比较全面。这样的步骤，是不能乱，也不能少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步骤乱，就是指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人们的思想可以跳过感性认识的阶段，一下子就能够获得理性认识。《实践论》中所提到的那种哲学史上的“唯理论”者就是这样想的。教条主义者也是犯了这一种性质的错误，他们以为人的认识可以采取一种“一步登天”的偷巧办法，以为只要随便读一两本书，死记住几段文字，就算是完成了学习的任务，就可以应用无穷，而不必首先接受许多感性知识，不必搜集材料，调查研究。这样的学习方法就是乱了认识的步骤，就是违背了认识的必经过程和规律，它只能把人的认识引到空洞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了感性知识，还必须提高到理性认识，少了这个理性认识的步骤，以为只要有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感性知识就可以满足

了，那也是不对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认识停止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不知道进一步把许多感性经验总结起来，去求得较深刻较全面的理性认识，以至于使自己眼光受到狭小的经验的限制，不能够估计事态发展的前途，不能够看出行动的方针，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就只能盲目地应付眼前的事务，而不能有计划有条理地来指导工作。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什么区别呢？感性认识就是对于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认识，有些人的脑子里有不少这种认识。你如果要他讲故事，他可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一段一段地讲个没完。可是如果你要求他把这些故事加以概括、联系，说出一套关于这些事件之所以发展变化的道理来，那他就会感到十分为难。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知识的堆积，是感性认识的一般的特点。这种认识是局部的、片面的，仅仅涉及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够深入的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关系或发展规律。有些个别的感性知识，往往还会给我们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印象，我们根据这些印象来判断事情，就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因为个别的表面的事件，和事物的全体、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显得并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如果只看到一个个局部的事件，就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得不到正确的认识。人们为什么要错误地说武训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因为他们只孤立地来看武训个人表面的苦行，而不注意他的行为的本质，不注意他的苦行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联系。因此就不懂得在实质上，在内部的联系上，这种苦行仅仅只是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表现，而绝没有任何为人民服务的意义。

我们还可以再拿朝鲜人民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的事情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在朝鲜的战事

发生的最初一个时期，朝鲜人民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当时曾有一些人根据这一个时期的事实，作出了一种速胜的结论，估计这次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结。大家知道，客观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后来美帝国主义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遭到暂时的失利。当时有一些人又根据这一时的事件，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说美帝国主义者似乎并不是纸老虎，而应该算是铁老虎了（当然，他们所以作出这种结论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恐美病的主观想法)。大家知道，后来事实的发展又证明了，这种悲观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想法，都是由于只看一时的一个个的事件，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事情发展的规律，因此就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就发生了思想上的混乱。这就是只有感性认识而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缘故。经验主义的认识错误，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引起来的。

这里可以附带说明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上会常常左右摇摆的问题。在朝鲜战争初期，许多人的思想的确是左右摇摆不定。其原因之一就是只凭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的感性认识来对事情下判断：今天看见一个顺利的事件，就作出了速胜的结论，于是就引起了盲目乐观的想法，明天又看见一个困难的事件，就作出了失败主义的结论，于是就有了右倾悲观的想法。这样就没有任何把握来确定事情的本身究竟终于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了。有了这种认识上的毛病的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就只能跟着事情现象变化而随波逐流、游移不定，而不可能主动地掌握确定的方向。经验主义者的思想摇摆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停止在感性的认识阶段，而必须提高到理性认识的原因。只有把我们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我们才能避免为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够看出贯穿事物

全体的事物的各方面的内部关系，看出事变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依据事变发展的规律知识来确定行动的方向，才不会因为一时的事情的变化而动摇我们的认识。

理性的认识，是对于事物的全体，对于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要在瞬息万变的、表面上似乎十分混乱、十分动摇不定的一个个事件的现象堆积中，看出它们的各方面的必然联系、必然的发展规律。一切事物，不管在表面上是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必然贯彻着一定的内部关系，一定的规律。正确的理性认识能够使我们有预见事变发展前途的能力，使我们有规定行动方针的能力，就是因为它认识了事物的这种必然的内部联系和必然规律的缘故。朝鲜战场上的情形，每日每时都包含着无限复杂的曲折和变化，仅凭感性认识来判断事物的人是免不了要常常迷惑、动摇的，但如果我们把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依据事情发展的基本规律来作判断，那么我们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战争就可以得到许多确定的认识，例如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一定会被我们打倒，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这个胜利的到来必须经过许多曲折，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必须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等等。像这样的一些认识，就和前面所讲到的摇摆不定的对一个个表面事件的认识不同，它是概括了这个战争的全体的，掌握了它的必然的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如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抗美援朝已经有了的认识一样，就能够对于事变发展的前途作出明确的预见，就能够对于自己的行动有了坚定的方针。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毛主席说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274 页)感性认识只是一个个事件的表

面的认识，而理性认识能掌握贯穿事物全体的必然规律，这就是性质上的差别。要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必须经过感性认识，必须有丰富的感性认识作基础，必须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必须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必须把这许多感性知识、事实材料、实践经验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同上书，第260页)，这样地进行一番思想上的改造制作的工作，然后才能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才能撇开那似乎是捉摸不定的一个个事件的表面现象的堆积，而抽出事变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丰富的感性经验材料作基础，不可能抽出能概括事物全体的规律知识。我们中国的革命领导者能够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发展的初期，就指出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绝不能证明理性认识可以不经过感性认识而凭空得来。相反地，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在过去已经有了长期的十分丰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经验，因为我们的领导者一方面总结过了这些经验，另一方面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各方面事实材料作过了周密研究，才能获得这样正确的理性认识。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没有什么神秘的方法或简便的捷径，惟一的方法就是占有十分丰富的感性知识材料，然后运用自己的头脑，开动自己的思想的机器，认真地、刻苦地来进行分析研究，就能够逐渐学会撇开表面上似乎十分混乱的现象，而抽出贯穿在一切现象中间的、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所谓“概念”，就其内容来说，就是能够概括现象全体的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知识。应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把这些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有条有理地集中地加以说明，就是理论。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把中国革命由鸦片战争到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至于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等作

了概括的说明，并由此规定了我们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应采取的政策。如果仅只凭感性认识来叙述一个个事件，那么要讲完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以及将来的前途，恐怕写几百万字也讲不出个头绪来，但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只写了八九千字，就能把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将来的前途以及今天中国人民斗争的政策方针作出了明确的概括的指示。这就是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优越的地方。学习理论，就是要学会这样来认识事物。就是要学会能够概括大量的感性认识，分析材料、总结经验，使自己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论的学习，自然不能不借助于理论书籍的研读，但这并不是说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着要死记书本的文句。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我们的前人从他们的感性经验材料总结出来的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我们读书的主要目的，乃是为着要参考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参考前人总结感性经验材料以达到理性认识的成果，来帮助自己学会把自己的感性经验材料提高到理性认识。如果没有书本、文件、指示的帮助，如果要直接凭个人的感性认识来了解问题，那么，例如对于朝鲜的战事，我们就免不了要在很长的期间在思想上处于混乱摇摆的状态，而很难在较短的时期里认清楚它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有书本、文件、指示的理论上的帮助，所以我们中国广大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觉悟就能够迅速提高，而在认识上比较顺利地由感性的阶段逐步上升到理性阶段。所以，我们研读理论书本的好处，只在于凭借前人的理性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较顺利地把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我们不能要求比这更多的东西。这样，我们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就应该是经常把当前实践的各方面问题放在前面，把丰富的事实材料放在前面，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性认识放在前面，而在研读书本的过程中，随时努力尝试着参考书中所学到的理论，来总

结自己的经验，来解决当前实践中所提出的各种有关的问题。应用这样的方法，来不断训练自己的思想能力，就可以使自己逐步地学习善于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善于分析事实材料，从其中抽出关于事物的内部联系和事物发展规律的知识。

现在再谈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的问题。

认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的任务也正是为了指导实践，而绝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不能满足于感性认识，而必须使之提高到理性认识，只是因为唯有达到了理性的认识，才有可能使我们对于自己的实践规定出坚定的方针，正确的计划、方案，避免思想上工作上的混乱和摇摆，使实践的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而绝不是因为有理性的认识使我们善于在嘴上讲一套好听的理论。所以毛主席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0—281页）对事物有了理性认识，就必须再应用它来规定工作的计划、方案，使之变为行动，才能够真正完成认识的任务。在学校里有些以专门教书为职业的人，往往只重视理论原则的说明，而轻视实行，这样就会把理论变为空谈，这样一来，那么，就是再好的理论也要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著作，没有不同时包含着一定的实践行动的方针、计划或方案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的著作，才会要把理论限制在空谈抽象原则的范围之内，而不涉及任何行动的方针、计划和方案。所以我们学习理论，就不仅仅要学习借助于书本的理论，来把我们自己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而且还要借助于

书本的理论，来学会如何运用自己所获得的理性认识，使之变为行动的方针，变为各种工作的计划、方案，使之能够发生指导实践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理论，如果只满足于理论原则的抽象空谈，那么，哪怕我们所讲的是正确的理论原则，而在事实上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方法毁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

只有把我们的理论知识变为行动，变为行动的方针、计划、方案，才有可能使理论知识获得检验的机会，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中的错误的地方得到改造，不足的地方得到补充，才有可能使我们思想符合于外界事物的规律性，符合于客观真理性。前面所举过的对于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事的认识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有些人读了几本书，记住了几个理论原则，或者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出了几条原则，就以为掌握了绝对的真理，拒绝进一步加以检验，拒绝把自己的认识加以必要的改正和补充。这是完全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原理的。我们的理论学习，不仅要借助于书本的理论把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而且要经常注意依据实践的结果，来考察我们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以便能够改正和补充我们的认识，在学习方法里如果缺少了这一个环节，也是不行的。

不但如此，我们不仅仅要学会在实践中来检验我们的认识，而且还要学会在实践中来发展我们的认识，因为客观世界的事物是不断地发展的，不断地要由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向另一个阶段另一个过程推移，因此也就要在实践中不断要求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新的问题。所以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

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3页）这就是说，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永远向前，没有停止的，我们的实践也是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而不能停止在任何一点上。因此，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不断前进，不断地努力去发见新的事物和新的规律。如果我们满足于一定事物发展阶段的认识，而停止了学习新的事物的努力，那么，即使我们对于某一阶段的事物的认识曾经是正确的，一旦客观过程和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我们的认识就要变成错误的了。

这里附带再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会发生左右偏向的问题。前面提到的那种思想的左右摇摆，是经验主义性质的，那是由于认识停止在感性阶段，因而被事物的片面现象所迷惑的结果。但即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若干理性认识，如果把它绝对化，不跟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使之推移转变，不经常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去学习新的规律知识，那也就会在思想上和工作指导上发生或“左”或右的偏向，这就是教条主义性质的偏向。这就是说，如果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就会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如果戊戌政变时候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候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现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留有若干残余的影响，就会产生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另一方面，如果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或“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就会成为“左”翼空谈和冒险主义。如果有人希望中国今天就立刻要实现社

会主义，就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而不必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是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

这里连带再说明一下如何了解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喜欢在名词的表面意义上兜圈子，而不重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的实质和精神。辩证唯物论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学说，其主要的精神，正是在于人对于真理的认识是永远不断地跟着客观事物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我们对于新事物的学习努力也永远不能停止。绝对的客观宇宙发展过程是无穷无尽的，反映这个客观宇宙的人的认识也就不会有最后完成的一天，因此绝对真理就是人类的科学知识的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对于事物的每一过程每一阶段的认识，都是相对的，都是绝对真理的无穷无尽的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落伍或在思想上行动上犯错误，那就任何时候也不能满足于已经有的知识，而要不断地努力学习。这不仅我们一般人是如此，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一直到死学习不倦的。

最后再谈一谈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关系问题。

有些人问：“究竟应该先改造自己呢？还是应该先改造世界呢？”我们的答复是：要在改造世界的行动当中来改造自己。其理由，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实践论》，就可以明白。所谓改造世界，就是指变革现实的实践而言。所谓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是如《实践论》所说的，“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5页）。自从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制造了第一件工具起，人类就对自然界实行了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人类一方面进行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进行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在这一切改造世界的行动中，人类开始对于客观外界只有感性认识，而不

能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形下，人的认识能力是处于低级阶段，不能够正确地指导行动，因此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基本上说来是盲目的、被动的，没有正确的预见，没有可靠的方针和计划，在思想上行动上摇摆不定，毫无把握，因此也就不可能确实完成改造世界的任务。当人们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并加以总结，用思想上的改造制作方法从经验材料中抽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知识，把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阶段，这样就改造了自己的认识能力，能够深入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这样也就能够进一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因为人们既然能够认识到事物内部联系和必然的发展规律，就能够依赖自己的认识来指导行动，能够对事变前途提出正确的预见，规定出可靠的行动方针和计划，就能够避免行动上的盲目性、被动性，而能够比较自觉地、能动地来改造客观世界，能够比较确实地、有把握地完成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一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的。

这样，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乃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行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一切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人们必不可少的一个任务。凡是自觉地来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也应该经常自觉地注意来改造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完成改造世界的工作任务。只有脱离革命实践的人，或者反对变革现实的人，才会拒绝改造自己。例如世界上的反动派，他们是坚决站在反对改造客观世界的立场的，因此他们也同样地坚决反对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有个别的人总认为改造思想是对被打倒了的反动派的事情，以为自己即是进步分子，就不需要再谈什么改造。而一谈到思想改造，就以为是耻辱的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对被打倒的反动派分子，我们是用专政的方法，用强迫劳动的方法逼迫他们进行改造。而

在进步的人民中间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为着实现改变客观世界的任务而进行一种自我教育行动。前者和后者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情。人民中间的自我改造，是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用学习、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的。这种改造既然是人民自己为了改造世界所不可少的一个任务，因此应该而且可能成为自觉的运动。但是，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到改造自己的必要，当他有了错误而又不能勇于改正的时候，那他就不可能实行自觉的思想改造，那就必须经过严正的批判来推动他进行改造。这就是要首先通过多少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使之进入自觉的阶段。学习理论，就是一种思想改造的工作，所以，在学习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决不可少的。

（原载《学习》杂志第4卷第4期，1951年6月；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书）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关于"为什么必须克服'功臣'思想"问题的讨论总结

(1951.6)

一

关于"功臣"思想的讨论，已继续了八九期了，各地读者们热烈地参加了这个讨论，并且寄来了很多的文章，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受到普遍注意、需要认真解决的实际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周围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以及各方面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对反革命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革命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这些斗争中，中国人民继续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而且毫无疑义的还会要获得更多的胜利。能够获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当然要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其中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许多老干部的骨干作用以及大批新干部的积极参加，也是不可少的因素。因此应该承认，大批的老干部是能够艰苦努力、积极学习，团结成千上万的新干部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奋不顾身的革命战斗的。这是主要的事实，这是中国人民的革命精力之所以能如此高度发扬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忘记了这一点，对于问题就难以获得正确的了解。

但是，在某些较老的干部中间，情形却不一样。他们失去了革命者和共产党员应有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他们似乎已看不见眼前还有着激烈的革命斗争，更不知道准备将来继续进行长期的战斗。他们开始忙着来盘算私人的利益，把革命的胜利，看作是个人的“功成名就”。“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是熬出头来了。”现在似乎已到了个人“出头”的时候，对革命有“功劳”或者“苦劳”的人，似乎应该获得高人一等的特殊权利，因此就要把个人的地位、“等级”、待遇、享受等的问题作为考虑一切的出发点，而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需要、工作的要求放在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上了。有着这种思想的人，他们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的事实情况是不一致的，因此就要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种种矛盾，就要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许多“不顺意”或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不能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就不能够对周围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对新的工作干部建立团结友爱的关系，而相反地要闹种种不团结的纠纷。他们就要对抗组织、独断独行，情形严重的，甚至会走上腐化、堕落，以致完全离开革命队伍的道路。这就是某些干部中“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情绪”的表现，就是“功臣”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的存在，在我们革命的老干部中间不是主要的事实，但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是在各个地区和各种工作岗位上，都多多少少存在的事实，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工作的事实。

这次大家所讨论到的李龙同志的思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思想呢？所有参加讨论的来信，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否定的答复，而只有肯定的答复，这是正确的。虽然也如《学习》三卷七期《编者按》所说，这“还不能说是一个典型”，或者更正确一些说，这还不是表现得最严重的情形。但它之属于这类对革命有害的思想，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是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应该“加以

克服”的。参加这次讨论的来信，绝大部分对于这一点都提出了肯定的意见，这也是对的。

对于李龙同志的来信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一类“功臣”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来加以批判呢？在这个问题上，参加讨论的读者们已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我没有更多的新的意见，只能把这些正确的意见综合起来，作一些概括的说明。

二

我以为首先值得批判的，是这种思想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对于革命的错误看法：

“功臣”思想中所表现的对于革命的看法，是非马列主义的、非工人阶级的。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就是革命的“完成”。有这种思想的人，似乎觉得今后革命的时期已告结束，而开始到了享受革命果实的时期了，他们以为过去参加革命的人“熬”到了今天，已经算是功成名就，因此在精神上就不再准备继续学习、继续求进步、继续认真地向前战斗了。这种错误的观点的存在，可以拿李龙同志对新干部的那种特殊的看法作为证明。他似乎以为新干部参加进队伍里来，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工作可做，而只是“把咱们用血肉换来的胜利果实，让他们不劳而获地享受”。这就是说，不管“功劳”也好，“苦劳”也好，都由“咱们”在过去付尽了，今后“咱们”就不必再准备为革命付出更多的辛劳，当然就更用不着再“劳”新干部了。这种思想是如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只要想一想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按照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说，革命的最后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只有等到实现了这个目

的，才可以说是革命的完成。在这中间，我们还要肃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这仍是需要长久斗争的革命过程。现在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使我们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这只是我们创设条件来争取完成全部革命过程的开始；不但就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意义来说革命并没有完成，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也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的胜利成果和我们的远大目标之间，还有着很远很远的距离，还需要通过很多的斗争。斯大林同志也曾说过：“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愿意辱没自己的光荣称号，不愿意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那就必须时刻记住自己肩上所分担着的无限远大的任务，就必须坚决反对让那种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来腐蚀自己的革命精力，就必须准备继续不断地向前战斗，就必须唾弃那种希图坐下来享受的堕落思想，就必须认真团结新的干部来扩大人民中间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归根结底，就必须批判和克服“功臣”思想。

“功臣”思想中所表现的对于革命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工人阶级的看法，其又一个特点，是在于把革命看做少数英雄豪杰“打天下”的事业，而忘记了那是广大人民自己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他们的思想违背了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忘记了革命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斗争和人民领袖的正确领导，而一个干部的个人努力比起人民的伟大事业来只能算尽了大海中的一滴水的作用。他们过分地重视了个人的“功劳”或“苦劳”的意义，把少数干部十几年的斗争历史看做革命胜利的主要决定力量。他们不知道个人的“功劳”或“苦劳”虽然有它一

滴的作用，但就是这一滴的作用也只是因为寄托在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大海中才能够发挥出来，而离开了这个大海，个人就会一事无成。一切“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干部的错误的思想根源，都是由于不能够用这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革命事业，而是以“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论观点来看革命事业，并且他们在实际上就把自己看作是造时势的英雄。这就使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去的历史而不能耐心地学习今天的新的工作；这就使他们轻视联系群众，轻视团结周围的工作干部，尤其不屑于团结新参加的知识分子干部；这就使他们经常希望凭着个人的兴趣、个人的意志来行动，而以工作中受到一定的组织领导的限制为苦事；他们经常会觉得组织所分配的工作都不符合自己的兴趣和愿望，而到处感觉到“不顺心”；他们对学习则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不屑于和新的干部以及比自己工作地位低的干部一同学习，而把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学习看做是奇耻大辱。总之，他们是把自己沉溺在个人的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光辉中，以至于在新的人民革命事业前面就失去了进取的能力。有着这种思想毛病的人，如果不认真地加以批判和克服，那么，不管他们在过去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光荣的历史，都将有变成历史的落伍者，变成新的革命事业中的废物的危险！

“功臣”思想所表现的第三个对于革命的非马列主义、非工人阶级的看法的特征，就在于用封建的等级观点来看革命秩序，用封建的特权观点来看干部的工作地位。他们既然把革命事业看做是少数干部“打天下”的行为，而忘记了一个共产党员是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从事工作，因此，其逻辑的结论就是一切“打天下”有功的干部，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应该按照旧封建时代的历史传统习惯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应该享受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权利，因此就不能忍受与一般干部和人民处于平

等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比某些新干部较低的职位。他们带着一种身份的优越感、带着一种要求“封爵赏赐”的情绪（如有些参加讨论的同志所指出的）来看自己周围的工作关系和干部关系。如果自己的工作职位不能满足这种优越感，他们就要大发牢骚，说工作分配不适当，上级不肯照顾和不给予信任，等等。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和特权思想，是“功臣”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资格”的问题又占有着第一等重要的位置。所谓资格，按照封建传统的看法，又是主要地或甚至单纯地强调着时间的因素，而把其他因素放在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山沟沟里转了十年，总算熬出头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只要有“苦劳”，只要“熬”十年，这就是主要的事情，至于“十年”的“苦劳”，对于人民有没有贡献，或有多少贡献，都是次要的问题，能够“熬”到一定年限，“资格”就“熬”出来了。有了“资格”，就有理由要求在工作地位、生活待遇等方面首先受到特殊的照顾。例如选择干部，是应该依据“才”和“德”的标准呢？还是应该依据“资”的标准呢？按照有“功臣”思想的人的看法，如果遇到“德”、“才”和“资”的标准有矛盾的时候，就不能不牺牲一些“德”和“才”的标准，来迁就“资”的标准。这就是说，在形式上是三个标准，而在实质上是要求首先照顾“资”的标准，这就是认为革命工作的负责职位只是有“资格”的人们的独占品，而对干部分配工作就首先应该是为着满足这些人的特权利益，而不是为着革命工作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思想对于革命工作的危害，是很显然的。又例如学习问题，是应该按照个人的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来组织，或者是按照“资格”来组织呢？有“功臣”思想的人不屑于与职位比自己低的干部一起学习，因此就不同意只按照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来组织，

而坚持也要照顾资格。这样，如果遇到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和资格的条件有了矛盾的时候，那就不能不牺牲文化、理论水平的条件而来迁就“资格”的条件；某些干部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仍然要按其资格把他们组织在较高的学习组里去，这样，在实际上仍然是等于按“资格”的条件来组织学习。如果照这样办了，不用说就会使一些学习组织成为有“资格”的人们装门面的形式，而不能发挥其提高干部的文化、理论、政治水平的作用。这对于干部的进步以及工作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以上就是“功臣”思想中所包含着的一系列对于革命的错误看法，这些看法与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完全相反，而只是混合地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剥削思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如果有了这一类错误思想，就应该坚决地对自己进行思想的改造，把这些错误思想彻底肃清，而不应该容忍它保留在自己的头脑中。但是，有“功臣”思想的人，又常常以为思想改造只是非党员和新干部的事情，而对自己则以曾经经过长期锻炼和整风运动为理由，认为不至于再有什么错误思想需要加以改造，因此就拒绝对自己作任何的检讨。这当然是错误的，这不是真理，而只是一个阻碍进步的包袱。中国的革命干部，大部分是从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各人都带着许多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愿望，就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还是免不了要受到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加入共产党，又经过若干时期的斗争锻炼和整风运动的教育，一般地在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方面无疑地会有很大提高，但这绝不等于说就能够把非工人阶级思想彻底肃清了。由于过去紧张的斗争环境不容许干部们有充分学习的机会，整风运动的深

入程度在各个地方也极不一致，因此，像李龙同志这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在自己头脑中保留着许多非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是并不奇怪的。他们之需要从头来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知识以及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的知识，也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在革命获得全国胜利之后，通过复杂的城市生活关系，通过旧的亲戚朋友的关系，更多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以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还会在无形中进一步来包围革命工作的干部，如果不加以注意和警惕，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就会在它的影响之下使我们原有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由此可知，思想改造的工作绝不仅是非共产党员和新干部的事情，也是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应该经常对自己进行的工作。而有“功臣”思想的人，尤其应该认识到这个真理，并认真地来实行这个真理。

三

某些参加讨论的同志，认为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干部应该受到尊重和必要的照顾，并且指出干部中间应该建立新老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正确关系，这当然是很对的。但是，对于有着“功臣”思想的干部，不可能依靠尊重和照顾来克服他们的错误，而主要只能依靠他们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一部分强调要照顾“资格”的同志，就是由于还不能够明确地认识这个真理。尊重和照顾，是不可少的，但必须在一定的原则范围之内。尊重干部，绝不是说对于他们的错误的思想可以做任何的迁就，照顾干部，绝不是说可以做到牺牲革命工作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某些人的不合理的要求。错误的思想和正确的革命原则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干部如果不能放弃自己的“功臣”思想，那么，即使从周围受到了必要的尊重和恰当的照顾，

这种尊重和照顾对于他仍然是不能理解、不能满足的。因此，除了批评和克服他自己的功臣思想之外，绝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矛盾。为着更具体地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不妨再把讨论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来谈一谈。

第一，关于工作分配的问题。按照有“功臣”思想的人们的希望，分配工作必须首先照顾历史，必须依照“资格”的标准来选择干部。这就是说，一切革命工作历史较长的人都必须摆在较负责的地位上。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要考虑到“德”和“才”的条件而不这样办，那就不可能使他们满意，而他们就要认为没有受到必要的照顾和信任，就要发出“老干部不如新干部”，“工农干部吃不开”等的牢骚。如果为着使他们满意，而这样办了，那又要使许多工作岗位占据着一些不称职的人，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失。对于干部的“照顾”，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牺牲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少数干部的不合理的希求吗？当然是不能的！有些人以为这样“照顾”也不会有什么妨害，理由是一切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干部，他们的“德”和“才”也一定经过了考验，因此他们就不会不称职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正如范若愚同志的文章所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在一般的情形下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有些个别人来说，它就只是不符合事实的空话。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情形下面，许多内容复杂、规模庞大的新的工作任务提到了革命的日程上，在这些任务的前面能够不大胆提拔一些的确忠实积极而又对于这些工作有着必要的经验和能力的新干部吗？当然要提拔的。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就只能够以“德”和“才”作为惟一的选择干部的标准，而对于“资”的条件，就用不着给予任何的照顾。这样，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除了让有“功臣”思想的干部放弃他们的那种关于“资格”的特权

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使他们满意呢？

第二，关于生活待遇问题。如果说在分配工作的问题上不可能把“资格”作为选择干部的一个标准，那么在生活待遇的问题上，却可以适当地照顾干部的历史条件，而且随着国家财政经济向前发展，逐渐给予更多的照顾，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这里也仍然要首先考虑到革命和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按照干部们的一切需要来决定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仍然还是处在恢复的过程中，还要求许多干部再忍受一个困难的时期，即使逐渐有所照顾，也仍然要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出发，而不能从有“功臣”思想的人们的愿望出发。这样，如果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那种特权思想，不能够觉悟到应该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那么，目前所能给予他们的任何照顾，都将不可能是使他们满意的。

第三，关于学习问题。对于工农干部的学习上的照顾，目前我们的政府是用了教育方面的最大的力量来举行的。正如有些同志所指出，两年多来新成立的许多工农干部学校和学习组织，如人民大学、工农中学、工农夜校等，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各种工作机关中的业余学习组织，也对于工农老干部有必要的照顾。有了这些学校和工农学习组织，今后的工农干部将大批地在文化、理论、政治水平方面迅速得到提高，他们将学会各方面的国家建设的新的业务技术知识，并因此逐渐有能力担负许多更为重要的工作。这些情形，在旧社会里的工农人民是做梦也难想得到的。这是工农干部得到重视、照顾和信任的事实表现，这说明工农干部在新的社会里不是“吃不开”而是十分“吃得开”。但是，如果有“功臣”思想的人不克服自己的许多错误想法，那他们对于国家的这种重视、照顾和信任也仍是不能领会的。他们不相信学习文化、

学习革命的各种基本理论对于自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是能够为自己的将来的工作开辟远大前途的好事情。相反地，他们倒以为学习会伤害自己的优越感，把它看做是辱没自己的干部身份的可耻的事情。这些荒谬的想法如果不坚决地加以批判克服，他们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国家的这种照顾的好处，永远也不可能向前进步，这是谁都容易明白的。

（原载《学习》杂志第4卷第5期，1951年6月；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1951.9)

在今年1月里，中国新哲学会曾就《实践论》开了两次座谈会，对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历史上的某些认识论学说作了一些批判的研究，并由北大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系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清华由冯友兰先生执笔），登载在《新建设》三卷六期和四卷一期。这两篇文章，检讨了认识论上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中国哲学史上的知与行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问题；二、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的问题。这两篇文章是吸收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意见修改后发表的，其中分析了过去各派哲学对于以上认识论基本问题的解决的片面性，也检讨了过去学校里哲学教学的某些缺点。这里面有许多很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用来作为学习实践论的参考的，但也有某些论点，还值得重新考虑。哲学史的问题非常复杂，要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它所包含的一切丰富内容作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以及从事其他方面科学理论研究的人共同作一个长期的努力，才能完全达到目的。我现在也只能就这两篇文章所接触到的一部分问题，提出一些个人学习中所想到的意见，作为大家进一步研究讨论的资料。

一、《实践论》解决了什么问题

首先值得提出来谈一谈的问题是：《实践论》作为辩证唯物论

的认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中外哲学史上所不曾解决或不能完全解决而在《实践论》里充分解决了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座谈会中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北大哲学系的文章第二节也提到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世界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反映，所以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而一切旧哲学由于它是唯心论或形而上学，所以一定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究竟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论》所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北大哲学系的文章里却还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在这里就需要说明一下。我想，《实践论》所充分解决了的，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变革实践的行动中来克服主观盲目性的问题，如果引用《实践论》上的话，那就是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今天无产阶级历史地所担当的“正确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的问题。指明这一点，我以为是很必要的。这对于我们学习《实践论》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和研究工作中来应用《实践论》，都有很大好处。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写作，是为着从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来反对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而不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它们共同的危害性都是在于使革命运动的指导者对于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丧失了正确的认识能力，因而就把实际斗争引向盲目乱撞的绝境，使革命和人民遭受很大损失以至于遭受失败。革命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右倾机会主义与“左”的冒险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都是认识的盲目性的不同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斗争历史中，不断地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也就是不断地和各种认识上的盲目倾向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地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各方面

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具体规律，使中国革命获得了自觉的、清醒的指导，终于走向胜利。因此，《实践论》，作为科学的思想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一般地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的总结，特殊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克服各种盲目倾向的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这个总结全面地揭示了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的普遍的规律：人类通过自己的变革实践，如何由不认识到认识？如何由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认识进到全面的、本质的认识？如何克服错误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实践论》就是由于揭示了这些规律而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如何克服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的问题，并因此为各方面的革命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端正思想方法和提高工作的锐利武器，如果我们通晓了这些规律，掌握了这个武器，就可以应用它来正确解决我们的各种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之能够获得自觉的、清醒的指导，而收到最大的成效。这正是一切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必须从《实践论》学习的中心课题。目前我们的各种革命工作中有没有盲目性存在呢？应该肯定地说是有的。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各个时期各个工作部门的重要政策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具体工作的内容是十分复杂，新的事物是层出不穷，因此，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人，由于不能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而在认识上行动上陷于盲目，这又是常常可以看见的事实。工厂管理中不注意经济核算，基本建设事业中的盲目施工，对工人农民宣传教育中脱离政治的庸俗的资产阶级倾向，思想改造工作中敌友不分的“左”的倾向以及另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的右的错误态度，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在眼前可以看到的各种工作中的盲目性的一部分例子。学习《实践论》，必须把它应用

于当前的实际，来克服各种工作中的这种盲目状态。我们从报上读到一些同志的文章，他们应用《实践论》的理论来检讨了自己的工作部门的问题，这些部门涉及农业、工业、医学、工程建设、政法、经济、历史、文艺以及其他理论的和实际的方面，这些文章虽然还只是表示一种初步的努力，但在企图应用《实践论》的理论来克服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的盲目性这一点上，方向都是正确的，并且是有收获的，是值得进一步加以发展的。就哲学研究工作来说，即使是作历史的检讨，也应该使我们的研究服从于一般学习《实践论》的这一个中心课题，即是一方面要借《实践论》的学习来克服我们哲学研究工作本身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所造成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要使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各部门的革命工作者来掌握这克服盲目性的科学武器，我想这应该是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二、对于过去哲学学说如何估计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哲学学说，我们应该怎样来加以估计呢？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曾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既然过去的哲学学说仅只是说明世界，那就可以了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问题，如何克服人类的变革实践行动中的盲目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史上都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把它当作问题提出来。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学说都仅仅是错误，而对于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呢？我想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对于历史上的唯物论哲学，尤其不能采取这样的看法。说过去的哲学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等于说过去哲学在历史的发展上没有向着这个问题的解

决接近。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学说，同时又是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最高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出现，并不是和过去哲学的发展没有历史联系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毛泽东:《论新阶段》)，我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一切过去哲学的根本区别，我们强调唯有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思想方法，但绝不能因此就对于过去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北大哲学系的文章里有些论点的提法，还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有这样的一些话：“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错误的认识论”；“在旧哲学史中的一切改变，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式的”。在这些话里面所包含的问题是，第一，没有注意到过去哲学历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原则的不同，而把“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笼统看作同一个东西；第二，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哲学学说里，特别是唯物论哲学里的某些合理的因素，而把一切过去哲学的认识论看作仅仅是不同程度的错误学说，这样单纯消极的提法，无疑是片面的，是违背历史观点的。

为着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顺便把人类历史的特点作一些简单的回顾。

人类脱离动物状态，是开始于以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的时候。人类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求生存的活动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人类的生产劳动中间，就包含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特点。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完全以自己本身的现状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自己之改变自然界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这便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主要区别，而引起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这里说的“以自己之改变自然界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就有着

“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意义，这个特点，是从人类最初学会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时候就开始具有了的。制造工具这件事情，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动，哪怕是最粗糙最简单的一把石刀，要能够制造出来，就必须对于外界事物（石头）的性质有若干的正确认识。动物不能制造工具，就是证明动物还不曾具有人类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能力，就是证明动物的求生存活动是完全处于自发的盲目状态。这样，就认识方面来说，人类是由于与动物的盲目性斗争获得一定胜利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人类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动是生产，在生产行动的基础上，人类一方面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界，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改造着自己周围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即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人类同时又不断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这就是说，提高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能力，使自己愈更全面愈更深刻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因此在实践行动中就愈更减少其盲目性，愈更能够准确地“改造自然界来服从自己的目的，来统治自然界”(对于社会的事物也是如此)。

这样，人类的历史，单就认识世界的一方面来说，也就是为克服盲目性而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是经过长久的年月才对于自然界方面逐步获得较大的胜利，而对于社会方面的认识的盲目性的克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恩格斯说："如果我们需要几千年的劳动才学会我们的生产行动底较远的自然的结果，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较远的社会的结果就更要困难得多了。”(同前)所以，直到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对于竞争、经济危机、战争

等社会现象，还是处在盲目的动物状态。对于社会的认识为什么“更要困难得多”呢？这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里就可以得到明白的解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哲学，即关于宇宙观及认识法则的学问，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出现的呢？哲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人类最初对于宇宙全体和自己的精神、认识能力的了解，是带着宗教迷信的形式的。当人类的生产发展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手工业和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分工的时候，当人类的生产力已发展到能够提供相当的剩余生活资料，足以使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劳动的负担，而从事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活动的时候，也就是在阶级社会发生之后，人类的进步的阶级就能够获得较为完整的许多关于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若干社会历史的知识，而使人类自己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进入一个较高的阶段。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就有可能对于已获得的这些知识加以概括和总结，而达到关于世界的全体以及人类认识本身的较为合理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唯物论的世界观会冲破原始的宗教迷信而崛立起来的道理。

所以，唯物论的世界观（以及实质上具有唯物论性质的辩证法的世界观）的产生，是人类为着认识世界而和自己的盲目无知进行斗争的胜利成果。什么是唯物论？恩格斯说得好：“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唯物论的发展，表示着人类愈更全面和愈更深入地认识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自然科学的每一种新的伟大发现，都使唯物论获得新的面貌，社会革命的一定的前进阶段，也会把唯物论

推进一步。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唯物论并不是一开始出现就能够获得完全胜利的。由于过去长时期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始终是很有限的，从而对于自然的科学认识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对于社会更是如此），又由于过去长时期里主要的掌握科学和哲学知识的人始终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围，因此，过去的唯物论，不论古代的唯物论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的唯物论，都有着片面性的缺点，因而它就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宗教迷信的世界观，以及在实质上与宗教迷信相通，而只是在精巧的合理的外装之下表现出来的唯心论的世界观。我们从哲学史上看见过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唯心论，这些唯心论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代表着人类中的反动腐朽的成分以及对反动腐朽势力妥协投降成分，代表着这些人们的崇拜盲目性、拥护宗教迷信或在盲目性前面表示低头屈服而没有勇气对它进行斗争的倾向（例如不可知论）。这些唯心论在哲学史上与唯物论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由于过去的唯物论本身的弱点以及剥削阶级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使得唯心论有时还战败了唯物论。

这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哲学的历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党派斗争的历史。这个斗争，集中地表现了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愈益前进的科学认识和愚昧无知的斗争，表现了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行动中愈益提高的自觉性与盲目性的斗争。而最后由于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出现，人类才掌握到了足以彻底克服主观盲目性的最完善的科学武器，使唯心论世界观不能不遭到完全的破产和最后的失败。目前人类的思想发展，就是到达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彻底战胜唯心论世界观的阶段，正如目前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到达了无产阶级推翻

一切剥削制度或"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面"(《实践论》)的阶段一样。还在60年前，恩格斯就说：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正确理解自然规律，并认识我们的干涉在自然行程中的较近或较远的效果。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发展以来，我们就愈益能够预见至少是我们最普遍生产行为底较远的自然效果，因而也学会来统治它们。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就愈会不仅感觉到而且还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从希腊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所发生并在基督教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辩证法》)

这自然并不是说，唯心论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完全消灭，而没有任何影响了，恰恰相反，世界上还有反动势力存在，因此它们就要继续用各种方式来坚持唯心论和迷信愚昧的说教，美国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论的一种）杜威等人所吹嘘的什么"世界主义"，就是近年来代表帝国主义反动方向的唯心论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同时，人民中间还包含着非工人阶级，因此在实践中还要不断地产生各种自发的盲目倾向，这样就仍然要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在中国，随着人民的胜利和蒋介石的反动王朝的被打倒，辩证法唯物论已成了国家的领导思想，而以歌颂愚昧盲从作为惟一内容的极端唯心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法西斯"哲学"，就没有合法存在的余地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神秘思想和唯心论哲学，片面性和盲目性，还在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工作中起着不小的危害作用，用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用《实践论》的科学武器来批判这些唯心论和盲目倾向，也是今

后长时期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斗争是一定能够得到完全胜利的。

由此可知，在估计过去哲学历史的时候，如果不把唯物论和唯心论加以区别，而简单地一律称之为错误的哲学思想，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的。如果再加上这样的前提，说："错误的认识论终归要引起错误的实践"（北大哲学系文），那么，过去的唯物论哲学以及实质上有唯物论性质的辩证法思想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都将无法说明了。诚然，过去的唯物论都有它的缺点和错误的方面，但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并不是由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而是由于唯物论的原理得不到全面的贯彻，——例如古代自然发生的辩证唯物论，由于科学研究还很幼稚，仅仅能对自然界的总的轮廓作一个唯物论的概观，而不能对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贯彻唯物论的认识；近代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仅仅对自然现象能够给以唯物论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是机械的），而不能把唯物论扩张到社会现象的认识上。——至于就唯物论原理本身来说，那么，它的发展的每一步，都表示着人类认识世界前进了一步和对于盲目无知的斗争得到了一个新的胜利。过去的唯物论，诚然都没有在认识论上解决了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但唯物论的发展，是一步步向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接近，这却又是不能忽视的。

北大哲学系的文章是从自我批评的态度出发，说："我们旧大学中一向主要讲授着错误的认识论思想"，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能够指出：这里所说的错误的认识论思想，主要的是一些唯心论、不可知论的或神秘主义的认识论思想，那么，这个自我批评就会令人觉得很圆满了。

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旧唯物论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的缺点，除了没有把它的根本原理彻底贯彻到人类世界认识的各方面之外，还由于它在认识论方面是片面的。这个片面性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如果把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拿来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作一比较，就更容易明白后者的内容是多么片面的了。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最全面、最彻底地概括了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如在《实践论》里可以看到的，它应该是包含着以下的几个主要特点：(一) 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主观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物质首先通过感觉为人所认识，正确的认识必须是有"客观真理性"，必须是"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二) 承认认识的社会实践性，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三) 承认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开始于在实践中获得感性的认识，但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的低级阶段，人的认识还要由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的实践；(四) 承认认识在实践中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由这些特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是如何丰富地全面地概括了人类认识的内容。这样丰富的全面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一种哲学认识论——各种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内，所远远赶不上的。如果研究一下哲学史，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都是仅只能够抓着辩证法唯物论所概括了的那些人类认识特点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学说，都只能片面地了解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从来没有对它获得全面的了解。至于唯心论哲学的认识论，则主要地是把认识的能动性这方面孤立地过分夸张起来，由此来抹煞、歪曲或颠倒了其他的特点——特别是抹煞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这个特点；而一切唯心论认识论的共同本质，就在于否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

如何区别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这是在检讨一切旧哲学的时候必须首先正确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虽然和唯心论的认识论同样有其片面性，但两者在人类认识史和哲学发展史上是居于互相敌对的地位，而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这在本文的前节里我们已经讲过了。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相区别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不论就哲学一般来说，或单就认识论来说，这个根本的标准，就是恩格斯早已指出过的：如何看待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或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主观、精神、思维是第二性的东西，这就是唯物论哲学，相反地，把主观、精神、思维放在第一位，而把客观、物质、存在放在第二位，这就是颠倒了事物关系的唯心论哲学。同样，就认识论来说，承认客观、物质、存在是认识的基础，而主观、精神、思维是前者的反映，并且相信人的认识主观有正确反映客观物质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凡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就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相反地，如果不能这样来解决问题，而认

为认识不必以客观、物质、存在为基础，知识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思维的本性里直接产生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前者的反映，这些就是唯心论的特征，我以为，要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首先必须依据这一个标准，而不是首先依据其他的标准。所以，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是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也是一切唯物论的认识论所必须具有的共同的根本特点。哲学的认识论如果缺少了这个特点，就缺少了唯物论认识论的最基本的性质，那不管它在于其他方面的见解如何，它就不能成为唯物论的认识论，而只是——至少在实质上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反之，承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那么，在其他的各点上虽然不符合于以上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标准，仍然可以说在基本上是属于唯物论范畴的认识论。

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清华冯友兰先生的了解是不明确的。他把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标准弄混淆了。他没有提到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这个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标准，而把是否承认认识的实践性认作第一个标准了。在他的文章里，他写道：

“在认识论这一方面，肯定认识为第一性的是唯心论，肯定实践为第一性的是唯物论。前者是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后者是被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

这段话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就整个哲学史来看，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不都是肯定实践为第一性的。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错误，就指出了这一点。反过来说，肯定实践或“行”为第一性的，虽然可以属于唯物论的认识论，却不一定都是唯物论的认识论，而有的也可以仍然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大部分的唯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固然是否定实践为第一性的。但有些唯心论哲学，例如西洋哲学史上的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国过去的

某些宗教哲学，是曾经把实践、“行”的意义放在较高的地位上来看待的。近代法西斯哲学也是标榜“行”的哲学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哲学史上一切重视实践或“行”的学说一律都归入认识论的唯物论党派之内，那一定会发生错误，一定会难免把一些唯心论的认识论误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而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唯物论者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因此又会把一些唯物论的认识论误认为唯心论的认识论。

当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实践论》)不承认认识的社会实践性或实践高于认识的原则，就不能成为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但很显然，这只是就辩证法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的区别而言，而不是就一般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而言。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有许多不同的主要点，如承认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无限发展可能性。而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也是不同的主要点之一。至于一般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不同，则主要的是在于把客观物质性的观点作为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以上两种区别标准是不应该加以混淆的。

因此，冯先生对于认识论方面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所作的这样的区别，我以为是值得考虑的：“以为实践既然是第一性的，认识既然是依赖于实践的，因此认识就只是实践的工具，不能反过来影响实践，这就是机械唯物论，以为实践虽是第一性的，认识虽然依赖于实践，但是认识也反过来影响实践，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这里，冯先生以为机械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同样地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这是不符合于哲学历史的实际情形的，也是不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开头一段的内容的。机

械唯物论之为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正是由于“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之意义”(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缺点，并不在于它不承认认识能反过来影响实践，而是在于因为它不了解认识依赖于实践，不了解客观物质之反映于人的主观、精神是要通过“变革的实践”这个媒介或环节，因此它就只能抽象地、直观地来了解主观反映客观、精神反映物质的唯物论基本原则，而在说明认识如何获得，以及认识如何能反过来影响实践的时候，就不能贯彻唯物论的科学原理，反而给唯心论留下了空隙。这就是说，他们把合理的、正确的认识看做是要由特殊的天才或偶然地掌握了正确思想方法的个人来完成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样在说明认识如何发生和如何影响实践的时候，就不免要产生“意见支配世界”以及只有偶然掌握了合理思想的英雄伟人才能创造新世界的唯心论结论。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哲学中就有这种缺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具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唯物论的认识论因素，他承认“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但由于他也不了解认识通过变革的实践而发生与发展的道理，因此终归陷入了唯心论的圈子，以为正确的知识只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能够获得，而广大人民则永远是不知不觉的“阿斗”，甚至于有“心为万事之源”这样十足唯心论的说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我们虽不能否认，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认识论，由于不了解认识依据实践的原理，就不能贯彻唯物论，并在某一方面陷入唯心论。但不能单独把认识依据实践的原理作为标准，来判决这些认识论整个来说就是唯心论的。因为这个判决所应依据的第一个标准，是关于认识的客观物质性问题。也许因为冯先生的文章是专

讨论“知”和“行”的问题，就没有注意到这第一个标准。但即使仅仅是没有注意到，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不应该不注意到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某些哲学的认识论中，能够看到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的，就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具有了接近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因素。所以，哲学史上即使是属于唯心论的派别，但在认识论上有着重视实践的思想的某些学说，有时就值得我们给予较高的估价。例如列宁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这类思想，就是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的。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里，他写道：“实践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分析认识过程中的环节，并且正是作为到客观的（绝对的——按黑格尔哲学的说法）真理的推移。”列宁指出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接近了人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自己的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这一点了”。并且还说：“马克思是直接邻接着黑格尔，将实践这标准放在认识论中。”列宁的看法，无疑是对的。黑格尔的哲学中重视实践的思想，是接近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但列宁之所以对，就在于他是有分寸地恰当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只是“接近”了，而没有把黑格尔关于实践的思想直接看做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思想。他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邻接着黑格尔”，却没有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就等于黑格尔。在这里，列宁对于唯心论者黑格尔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中间的原则区别，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我们研究哲学史上的问题，应该向列宁学习。例如对于中国哲学史上许多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学说，我们必须对于它的历史价值、对于它的接近辩证唯物论的意义作足够的估计。但如果那是唯心论学说，那就一点也不能忘记它和唯物论中间的严格界线。所以，当我们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就必须首先注意：第一，这种哲学思想是否承认认识的客观物质性？如若它不承认正

确认识的来源是客观物质发展规律的反映，而以为这来源是某种精神的本性，例如或者是来源于主观的“良知”，或者是来源于客观的、超物质的形而上学的“天理”（“天理”的了解有时也可以有唯物论的性质，如果它是指自然界的规律的话），那么，即使它在知行问题上认为行先于知或行重于知，它仍然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第二，必须注意一切旧哲学对实践的了解，与辩证法唯物论都有所不同。马克思曾说过，唯心论者所了解的实践，是抽象的、是失去了现实的感性血肉的概念，是为着实现某种思想、理想或“理念”的（资产阶级的）人的行动。唯心论者绝不会从生产活动、阶级斗争这样具体的内容上来把握实践的概念。中国旧哲学中所讲的“行”，大部分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一部分人的理想作为它的内容的，在形式上它是表示为一般道德伦理的践履行为，而在实质上则是一种梦想在矛盾百出的封建社会中追求不矛盾的调和秩序的行为。这种空想的性质使它能够对封建制度的某些坏现象采取修正的以至于若干批判的态度，甚至于反映出农民的某些反对封建秩序的要求，但这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变革的实践”的意义仍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三，我们还要注意，当我们说到唯心论哲学中重视实践的认识论学说是接近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时候，只能是就某些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而不是就一切唯心论的哲学家来说。这样的哲学家，主张必须通过实践才可以使我们的认识获得客观的真理性，虽然他们对于客观真理性的理解是唯心论的，但正因为承认认识必须有客观真理性这一点才接近了唯物论。就中国哲学来说，我以为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向来加以了解。但是，并不是说一切唯心论哲学中的实践或行的思想都有这种进步的意义。某些宗教性的、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妄说实践是达到某种超越的神秘知识的手段。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

——例如蒋介石国民党的什么“力行哲学”，把愚民主义的盲从思想和盲目行动作为它的说教的中心内容，这些荒谬胡说虽然也似乎在宣扬“实践”或“行”的重要，但和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论是丝毫也不相干的。

我们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不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是不是等于说这些唯物论的认识学说里一点也不涉及实践的概念呢？当然不是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认识学说里也曾涉及实践的概念，特别是中国旧哲学中，由于常常把“知”和“行”的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因此有些属于唯物论派别的哲学者，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认识学说里接触这个主题，并且作出某些向辩证唯物论接近的贡献。问题是在于，虽然这些唯物论接触了认识与实践的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作出一些贡献，而在这个问题上主张行先于知和行重于知的，就成为认识论上的唯物论派别的一个标帜。然而我们仍然应该说，这些哲学的认识论之所以是唯物论的，首先一个标帜还是在于它承认了认识的客观物质性，其次，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哲学对于知和行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即使有所贡献也是极片面的，归根结底，它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例如对于“行”的了解，费尔巴哈的看法是庸俗的，他“把实践只在它的污秽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确定”（马克思），他自称“实践的观点——饮食的观点”。中国旧哲学的唯物论思想的“行”的概念，实质上也不能超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秩序的范围，仅到了谭嗣同、孙中山的时候才新添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内容。一切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看不见实践的概念包含着生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丰富的内容，这就使得它们不可能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因此它们也就不能不“离开人

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而只依据人的某些自然性质（即不是依据人的本质，而只是依据某些动物的本质）来观察认识问题。中国哲学中“性善”“性恶”的争论，以及“天理”“人欲”的争论，都是属于这个范畴内的。这样，由于它们对于人的实践、对于行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对于人的认识、对于知的了解也不能不是片面的。首先，它们不能够正确了解到人的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即不能正确了解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人的认识由感性的知到理性的知的飞跃，以及由理性的知再回到实践的飞跃，它们或者是简直就不知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只笼统地概称为“知”（如中国旧哲学中、特别是宋明以后的哲学中所常见的情形），或者只看见感性的知（如西洋哲学史上经验论的情形），或者只看见理性的知（如西洋哲学史上唯理论的情形）。或者虽然也看见了感性的知和理性的知的区别，但却不能理解由前者向后者的飞跃的规律，而只看作是互相区别的两种认识能力（在中国旧哲学中以及西洋哲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飞跃这一方面的能动性来说，由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不能够理解到认识的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把合理的认识多多少少都当做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来看待，因此它们对于认识能动性的这一方面的理解就常常落入唯心论的圈子，以为偶然出现的聪明人或所谓“先知先觉”就是决定时势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由于“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也不能了解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形而上学假定世界在本质上是不会变化发展的，中国的旧哲学差不多一般地都默认有着某种不变的“天道”（实质上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存在，为自己设立了这样的前提的唯物论者，

在认识论上自然也就要把世界的认识看做是有穷尽的，以为只要有人一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把事物的一切真理或一切“天道”的内容一次汲尽。在这一点上也就有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片面性。

因此，当我们估计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在认识论上有什么贡献的时候，对于它们和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之间的区别，也必须认真地加以注意。如果对于这些贡献不适当地加以夸大，以致使人看起来觉得似乎这已经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了，那是不免会犯错误的。

附带有一个问题要简单地提一下，在前面所引的一段冯先生的文章中，说到唯心论的认识论“是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而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被统治阶级底哲学底认识论”，这样的提法我以为也值得商榷。因为这和哲学史的实际情形是不符合的。过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是剥削阶级，由于这些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在思想上也会发生矛盾和分裂，因此从其中产生出哲学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唯物论派别，也是常有的事。而就今天来说，已有了苏联、中国以及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统治阶级已经是劳动人民或主要是劳动人民，而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哲学和唯物论认识论，已经成了合法的统治阶级的哲学和认识论，这就和冯先生所说的情形完全相反了。我以为，比较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唯物论哲学及其认识论，是一般地代表着进步阶级的思想方面，而唯心论哲学及其认识论，则一般地代表着反动阶级的思想方面。这才是符合着历史事实的。

四、知行难易的问题与《实践论》

冯先生的文章还提到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谈一谈。他说：“关于

我们所举的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讨论中,只有知行难易的问题,在《实践论》中找不到与它有关的讨论。这是因为难易是主观的范畴。在道德教训中,可以应用这种范畴。因此,在中国古代的一个道德教训中,有'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这句话。上面已经说过,中国以前的哲学家讨论知行问题,是从道德的活动出发的。因此也就接受了这句话而对它加以讨论”,“可是在我们对于事物作客观分析底时候,我们是不涉及主观范畴的,在客观地分析事物底时候,我们不讨论这一类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这两段话的意思表现得不十分明确,但大体上是说:第一,《实践论》和中国旧哲学的一个不同之点是在于后者在自己前面提出了道德活动的任务,而前者——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却不提出这样的任务,而仅只是要解决如何对事物作客观分析的问题;第二,知行难易的问题只是人的主观范畴内的问题,而不是客观事实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主观范畴是独立自生的,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第三,道德活动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因此从道德活动出发的中国旧哲学就提出了知行难易的问题,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既然不提出道德活动的任务,而只是重视对事物的纯客观的研究,所以就不涉及知行难易问题。在这里,冯先生对于道德活动显然仍是采取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看法,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又采取了客观主义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不把道德活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呢?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也不会把中国旧哲学中所提出的那种道德活动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为那种道德活动一般地都只是想就封建社会范围内来追求一种调和稳定的秩序的活动,而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这一切保守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以至于反动的活动的。这绝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任何主观的活动目标。相反

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己提起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任务，从马克思起，就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哲学和以前的哲学加以区别：“哲学家们曾经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以前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甚至于不能梦想为自己提起过这样伟大的任务，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所提起的：“整个儿地推翻世界与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们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主观目标就不能用道德活动这个名词来表示吗？应该说，完全能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并且还应该用特别大的字体来表示，以便使人明了这是比过去一切哲学中所设想的更高尚到不知千万倍的道德活动。把根本改造世界的任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且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作为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北京解放后不久，冯先生曾在进步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哲学家的特殊任务是在于经过解释世界来改造世界，把解释世界当做了出发点。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是：首先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来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其次才是依据正确的认识来促进改造世界任务的完成。所以冯先生那种说法也是可以再考虑的。

说“知行难易”是主观的范畴，而只有道德活动才是能于应用这种主观范畴的活动，这也值得考虑。不论哲学范畴或道德活动，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也都是社会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所以，在哲学范畴和道德活动中存在的东西，必然也可以在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中找到它的基础。中国旧哲学中关于知行难易问题的思想，不外是反映着封建社会的各种物质矛盾。封建社会的一些哲学家们努力设想许多道德原则，企图以此作为调节统治者内部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中间利害冲突的标准，并图借此来长久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他们称之为“天经地义”。把这些原

则设想出来，他们叫做“知”，把这原则实现在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中，他们叫做“行”。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行为是由他们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的，封建统治者互相间与封建统治者和人民间在物质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封建社会的人和人的关系中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虽然有许多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为着求得封建社会秩序的永久调和和稳固而设想出这样那样的“天经地义”或道德原则，然而当着要求把这些原则实现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动的时候，就迟早一定要遭遇到物质利益中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障碍，而使这种企图归于失败。事实上例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一类的道德原则，从来就很难说是在作为阶级的封建统治者中间真正实现过。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想使封建制度永久化、合理化的主观企图，另一方是封建制度本身充满着矛盾性、变动性、不合理性的客观事实，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情形下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这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反映在哲学者的头脑里，就产生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那样带悲观性质的结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有时也有人感觉到，就是设想合理的道德原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如像程伊川等人就有“匪特行难、知亦难也”的说法，但在长久的时期中，一般都认为“知易行难”才是真理。这种情形，一方面是前述的矛盾的反映，而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统治阶级要在理论上为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抓着一个原谅和辩解的根据。这又可以看作是过去哲学家只能说明世界而不知道改造世界的一种表现。辛亥革命前后，代表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又利用了“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成语，来为自己对反动派妥协而不能坚持革命的软弱行为找开脱的理由。孙中山先生不了解这个成语在这时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软弱性，而以为

是成语本身妨碍了革命事业，因此煞费苦心地做了一篇翻案文章，创立“知难行易学说”来和中国的旧成语对立起来。很明白，仅凭这个“知难行易学说”，是不能改变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软弱性的，因此要依靠在资产阶级中间宣传这个“学说”来挽救失败了的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仍然又遭受了几次的失败。“知难行易”的思想仅有这样一点积极作用，即在孙中山先生本人，由于明白了知之难，明白了中国革命理论的认识之艰难，因此就能够继续学习，研究摸索，终于找到了“以俄为师”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又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历史特点。

所以，知行难易的范畴，绝不是主观的范畴，而也是客观物质存在的一种思想上的反映。这个范畴也绝不是只能应用于封建时代哲学家的“道德活动”（如前所述，中国旧哲学的出发点，在实质上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活动，而是封建秩序的合理化、永久化）中，而且也曾应用于孙中山先生所从事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中。在无产阶级“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自然也存在着这个范畴。《实践论》中没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这并不是说它在实际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如冯先生所举的知行先后或知行轻重等问题，《实践论》里也并没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来，而在实际上却已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如果不是仅仅以《实践论》一篇文章来限制自己，而能够参考马克思主义的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理论著作，就更容易明白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如何正确地解决了知行难易的问题。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之所以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就理论本身的原因来说，是由于对问题采取了和中国旧哲学不同的观察方法。过去哲学者多多少少总在难和易这两个范畴中间划了一条形而上学的死鸿沟。这种形而上学的

思想方法把“难”的概念看做是似乎包含着绝对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意义，而谈到“易”的概念时，又似乎认为这是和“难”的概念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这样，当人们使用“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成语时，那意思就是说，由于行动中的许多困难无法克服，因此，某些人在道德问题上的言行不一致或者在革命斗争中对反动派采取妥协投降态度，都是无可奈何的，甚至于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当人们又反过来说到“知难行易”时，那意思又是说：认识真理是一件绝对困难的事，所以除了世界上偶然出现的天生的圣贤才智或“先知先觉”之外，是没有能力克服这困难的。“平庸愚劣”的一般人民群众，就只能永久居于不知不觉的地位，从事盲目的活动。而由于“行易”的缘故，就是盲目活动或盲从的行动也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中的消极的反动的因素，这些因素曾被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是大家所知道的。

这样，不论“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思想，都把“难”和“易”的范畴作了形而上学的分裂，都不能正确解决知行难易的问题。这在客观上是前后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主观上就表现了这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工人阶级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把“难”和“易”看做是能够辩证地互相转化的范畴。“难”不是绝对的，不是与“易”完全隔绝的。任何革命事业都有困难的方面，但也一定包含着某些有利条件；因为革命是进步事业，而中国革命又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因此，任何困难，经过斗争，都有可能加以克服，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发展有利的条件，这样就可以把“难”转化为“易”。“易”也不是绝对的，不管担当任何容易的任务，其中都会包含若干困难条件，如果我们有了骄傲轻忽的态度，不去认真对

付，困难条件就要发展起来，就要使我们碰钉子，使我们失败，这样，“易”就会转变为“难”。所以，“知”和“行”的难易问题，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里也会存在、也要被提起的。因为在客观上，工人阶级的“知”和“行”中间，也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间，都在事实上要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是要形而上学地来提这个问题，不是要问何者为“难”、何者为“易”，并由此来找一条避难趋易的道路。如像中国旧哲学中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所表现的那种情形。工人阶级所要提起和解决问题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正确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任务”中间，存在着些什么困难，又存在着什么有利条件？如何发展有利条件来把困难加以克服？不论对于“知”或“行”，都要采取正视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回避困难和在困难面前低头屈服的态度。采取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知难而进”的态度，而不是旧中国剥削阶级的“知难而退”的态度。“行”是困难的，只要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就很容易看见中国革命之能得到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曲折和困难。因为轻视了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中的这各种曲折困难，有些人才会要犯“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行”的困难在利用和发展有利条件来进行斗争的主观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在革命的困难面前表示低头屈服，就是使有些人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的一个原因。至于“知”的困难，马克思自己就曾指出：“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怕险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辉的顶点。”如果没有“知”的困难，那么，为什么革命斗争过程中有些人要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而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和各种错误、各种盲目倾向进行斗争，就不可以

理解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嘲笑了那轻视认识之难的、对科学开玩笑的“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而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一种对知识采取轻率态度的人。但知的困难也同样可以克服，只要肯开动脑筋，多想、苦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经验，认真调查研究，就可以获得提高认识的成效。经验主义者的错误之一，是在于对认识的困难表示屈服，不肯用力思索，不肯“认真读书”。而绝不是由于天生就是只能做一个“庸俗的事务主义家”。所以，不论就知或行来说，都是有困难的，而困难都是可以转化，可以克服的。知和行是互相联系着，知和行的困难的克服也是互相联系着。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我们克服“行”的困难，把实践中克服困难的感性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使之成为理性的认识，这样就克服了“知”的困难。有了理性的认识，又把它应用于实践，使行动获得自觉性，避免盲目性，于是反过来又进一步克服“行”的困难，并经过实践的检验也进一步克服了“知”的困难。这样，由“行”到“知”，又由“知”到“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地发现困难，不断地克服困难，不断地使“难”转化为易，“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可以说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践论》解决“知行难易”问题的基本形式。

（原载《新建设》第4卷第6期，1951年9月6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951.9）

一

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期里指导革命势力使之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篇重要文件。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同志曾写了一系列的对于中国革命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文，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便是这些论文之一。这些论文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给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革命斗争的经验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总结，使当时革命运动中所提出来的许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获得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些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证明了在中国社会里引起革命的各种尖锐矛盾仍然存在，因此革命运动仍然要向前发展，革命高潮必然要迅速到来；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评了某些带右倾性质的对于革命的悲观情绪以及“左”的“冒进”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作为当时坚持革命的最正确的形式；指出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正确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给予了这样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决，就使当时在形式上虽然很微弱

的革命势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指导，而能够在敌人四面包围的险恶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这些科学的著作之一。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决了如何使军队成为革命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斗争使之走向胜利前途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的问题。

在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下，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00—601 页）这一个由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肯定了的真理，现在已经得到了长期的实践的证明，不容人再怀疑了。但是在二十多年前要使这个真理为革命的人民所认识，并且变为行动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经历许多斗争过程的“拿血换来的经验”(同上书，第 601 页)。首先，要使这个真理变为行动，需要使它得到革命的领导机关——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承认。但在 1927 年以前，虽然有斯大林的指示及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当时已有一些同志开始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并且共产党也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发挥了当时来说是空前伟大的革命力量，然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于这个真理是不承认的。这个机会主义的领导招致了 1927 年的革命失败。经过“八一”南昌起义以及以后的许多次武装起义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起来领导革命的武装斗争，克服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进行武装斗争，并不是简单地拿起武器来的问题，要使斗争能够坚持下去，并且还要能迅速发展，那就需要寻找适合情况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否则也难免要遭受失败或损失的。从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又经过了若

干困难和挫折，终于由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术”的思想，这样才把中国人民武装斗争所需要的正确形式和正确方法寻找到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军队，只要会打仗的，都能够担当“工农武装割据”的任务，都能够成为人民手中用来反对反革命势力的工具。革命的人民不能简单地利用反动统治者的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斗争工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早已指明了的普遍真理。孙中山历次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失败，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可以说是给这个真理作了反面的证明。斯大林同志根据这个真理，在1926年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不这样做，军队就会陷于极困难的境地。”（《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没有圆满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个真理。只有在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中，主要是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革命武装的经验总结。这个文件不仅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中所指出的那些普遍真理，并且由于它奠定了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就在如何建立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这个问题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得到了新的充实和发展。

二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要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

的和模范的代表者”，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就是说，为着建立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革命军队，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把军队放在共产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之下，放在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之下。三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已清楚地指明了，正是由于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才在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威震世界所向无敌的钢铁似的人民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0页）没有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绝不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农民战争中锻炼出如此坚强的革命战斗队伍。毛泽东同志看到了这些真理，他和斯大林同志不约而同地对军队中的党的政治工作予以很大的重视，坚决地主张经过这个工作而使军队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个文件里，首先就反对那种错误的“单纯军事观点”，那种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7页）。这种错误的观点不重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不重视军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使得“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同上书，第89页）。这种错误观点甚至于使得有些人的脑子里产生了“军事领导政治”的思想，以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同上书，第87—88页）。还有人“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同上书，第88页）。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些错误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其中所包含的严重危险性，说：“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这里，毛泽东同志就指明了军队发展的两条道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坚强政治领导，这就要走军阀主义的道路。国民党军队走了这条道路，结果是和过去一切反动军阀的军队一样，彻底地归于失败和灭亡。另一方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这样就是真正人民的革命军队所走的道路。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走了这条道路，结果是百战百胜，成为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军队。

为着建立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革命意志的新式军队，除了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之外，还必须有一个与此不可分的重要条件，那就是应该使军队与人民群众密切地互相结合，而切不要使之脱离群众。“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9页）人民军队之为人民军队，就是要能够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斗争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的政策，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让人民由自己的亲身经验相信它是自己的军队，并由此取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从人民中间汲取无尽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人民军队之所以需要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最先进的阶级和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在军队中间实现这个伟大的“宗旨”。而共产党也就有责任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来贯彻这个宗旨。毛泽东同志对于军队的领导，在贯彻这个宗旨上就是最光辉的模范。人们可以看见，在1927年以后的武装斗争中间，毛泽东同志是如何不顾一切艰苦地亲自领导红军做了许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为红军规定的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守则，就是这些“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的辉煌结晶

之一例。这些守则巩固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巩固了红军本身，使它能在最艰难的环境里存在发展，并战胜敌人。这些守则同样也成了以后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守则，成了人民军队战胜一切的力量的泉源。

为此，毛泽东同志就坚决反对那种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那种观点“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毛泽东同志坚持要把人民的革命军队和反动的军阀军队划清界限，要使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而不至于在人民眼中和反动的白军混淆不分。为此红军或人民的军队就不能仅仅把打仗作为自己惟一的任务，它除了打仗之外，还需担任筹款和群众工作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使军队担负了为自己筹款的任务，这样就减轻了人民对于军队的负担，巩固了人民和军队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规定了军队必须担任群众工作的任务，这样就使军队不仅只是一个打仗的集团，而且也成了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为此红军就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8页）毛泽东同志强调这些群众工作的任务是红军的根本任务，他反复再三地说明红军之所以要打仗，其目的也就是为着实现这些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同上）

这样，由于毛泽东同志为红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就使红军成为与旧的军阀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就使它在具体实践中实现为武装人民反对武装反革命的

无敌的斗争工具。随着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红军的工作任务的三个方面在具体内容上是有变化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里面，原来红军的筹款任务，就改变为军队生产的任务；军队的生产，起了为自己筹款和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使当时的敌后军民能够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封锁破坏的严酷环境里坚持抗战。直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至于现在，人民解放军仍然始终担负着一定的生产任务。这样，打仗、生产、群众工作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就成了人民军队的长久的基本任务，也是使人民军队能够一方面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而另一方面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主要基础。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说过：“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31 页)

事实上，由于我们的人民军队有了这样三套本领，由于我们的军队不仅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的时候，这是不能有丝毫动摇和怀疑的)，而且经常是一个强大的工作队(政治的、生产的)，我们就能够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而且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打垮今后的一切敌人。正是由于我们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同时执行了战斗队和工作队的任务，所以才能够在日本投降后几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迅速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并在一切解放了的地方迅速建立起人民的统治权——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固、空前统一、而最有效率的人民民主政权。今后抗美援朝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完成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等伟大的任务，仍然还要依赖我们这支有全面本领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来保证的。

三

30年来中国的革命史说明：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共产党本身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能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对于革命任务的能否贯彻，有着决定的意义。就军队的领导来说，也是如此。没有思想上、政治上以及组织上都很健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要想把革命、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武装斗争领导好，特别是领导像1927年革命失败后那种困难环境下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不可能的。“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7页）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解决红军的政治领导问题的时候，就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的环节。而由于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因此在解决了军队中的党的建设问题的时候，也就同时奠定了一般的党的建设的主要原则。

中国的共产党，自始就是在列宁创建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之下，并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模范创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之伟大，由于它是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作为基础的。所以要在中国建设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就必须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变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是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过程”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按照这样的精神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使党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按

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必须把党内的各种思想倾向加以具体的精密的分析解剖，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而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由此启发党员们自觉地来掌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以求达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有了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做基础，这样来在组织上、纪律上进行党的建设，就可以保证党在组织上、纪律上的真正的一致。

不断地和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不断地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路线。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就是按照这个基本路线写成的。这个决议奠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使党能够领导红军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坚持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克服了党内"左"的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胜利地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按照这个路线，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的著作，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不但能够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渡过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转到胜利的时期，而且为日本投降后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些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在实践中的辉煌表现。

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是由于受到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来。要对于错误思想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揭发这些思想的阶级根源。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文件里详细分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

阶级性质，其中包括有如雇佣军队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等，同时指出一切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在党内发生影响，其最主要的基础，乃是我党所处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环境条件。“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7页），“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4页）。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与片面性，是由于小生产经济的组织散漫，眼界狭小，以及它在反动统治下的悲惨境况的特点产生的。这种狂热性与片面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和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坚忍的战斗性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克服这种错误的倾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就曾经指出这个真理，说：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这种革命狂热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有产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是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的），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

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可是，革命党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犯旧的错误，这种错误往往会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环境里，由于什么意外的原因而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页）

和列宁的想法一样，毛泽东同志绝不仅只是限于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条件产生它的狂热性和片面性这个真理，也就是说，绝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机械唯物论的观点来仅仅指出这真理，而是以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态度，在承认和指出这些真理的基础上，提出和小资产阶级斗争以便“加以节制”和“加以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7页）所以，问题绝不是如某些机械决定论者的想法：以为既然“存在决定意识”，小资产阶级改造就是无望的了；问题是在于领导者是否能够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和列宁所想到的一样，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可以、而且应该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不断的斗争，并由此来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保证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发展前途的。

列宁的话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片

面性，是会在各种特殊的环境里采取各种新的形式、甚至于从来未见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在理论上抽象地来了解真理，而是要能有效地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改造”，那就必须善于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仔细分析小资产阶级思想所表现的种种形式，揭露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党的组织不能相容的本质。要知道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常常会采取某种民主的、进步的甚至于采取伪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不善于加以辨别，我们就会被这种种外形所蒙蔽而看不见它的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因此就不知道和它斗争，反而让它自由地发展起来，让它破坏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基础，使革命和人民的事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情形，在不论外国或中国的共产党过去的革命历史上都不难找到证明。中国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是以伪装的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一个最大和最坏的例子。

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对于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在当时环境里侵入红四军党内来的各种表现形式作了详尽的分析，并针锋相对地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对每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给予正确的批评，而指明克服这些错误的各种具体方法。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表现小生产的自由散漫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非组织观点”，坚持了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观点；批评了小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按照革命斗争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正确合理的分配思想；批评了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批评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批评了“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思想，坚持了切切实实联系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根据地来有步骤地发展革命势力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样详尽细密的科学分析和针锋相对的批评，能够帮助全党明确地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面貌和本质，使它没有任何隐瞒和逃避的余地，使我们易于对它进行有效的斗争。这样就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纯洁性，而对于当时的革命武装斗争发挥了它充分的领导作用。

四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所作的分析是全面地揭露了各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基本思想。以后的许多党内错误思想，常常就是这些基本思想在新的环境与新的形式下的再现。例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以来的农村中间，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曾采取“农业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又例如在有一个时期的地方和中央关系中间，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的观点曾采取地方主义，不报告不请示，无政府无组织的形式出现。毛泽东同志对这一切新的表现形式都及时地给予揭露和批评，而始终保持了党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在各种环境里变化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理论也是发展的。应该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方面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作的一个最光辉的贡献，就是在1941—1942年间为领导整风运动所写的一些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内斗争的

经验，把危害党和危害革命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集中地概括为三个范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以上两者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这样就为我们对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指出了最明确、最集中的目标，奠定了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长久的方针。

主观主义，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错误思想方法，是使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不是相联系的非科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就已明确地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危害性。“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94 页）由此可见，在这一篇早期的著作里，毛泽东同志就已确切地指明，主观主义乃是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方法的基础，也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基础，并指出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必须把党的思想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必须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同时“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际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作为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初期的基本思想，在他的整风运动时期的著作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更多的党内斗争的经验，更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坚决地宣告：“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

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0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也更进一步分析了由于理论与实践分离而从两个极端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教条主义，和只有某些局部的革命经验而没有理论知识的经验主义，他指出这两种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为主而互相补充，曾对于党对于革命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毛泽东同志指出需要从两方面来针锋相对的克服这两种主观主义：“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20页）

宗派主义——这是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绝不相容的反动思想和作风，是把个人和局部的私利放在第一位，而与共产主义的精神——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完全相反的坏思想坏作风。无产阶级的革命党，需要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同上书，第827页）。宗派主义则妨碍着党的“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而有害于战斗。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里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错误思想，在党内存着“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能够“损伤以致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必然造成革命的失败”。在整风时期的著作里，毛泽东同志对宗派主义的内容作了更全面的概括，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和党外

两方面都有它的危害作用：在党内，它破坏各方面的——局部与全体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团结关系，在党外，它破坏党与群众的联系，有使党与群众脱离而陷自己于孤立的危险。针对着这些危险，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提高共产主义的精神”，来防止党内的宗派主义，同时应该在党内进行很大的教育，使干部到党员都真正懂得联系群众的必要，“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同上书，第 838 页）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1927 年后，毛泽东同志依照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所规定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路线，领导着党从最困难的环境里发展起来，到 1942—1944 年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使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获得全党范围内的胜利，这样就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同志团结起来，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因此党就能够进一步来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党内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胜利，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是小生产的农业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很薄弱，无产阶级的人数，就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说很少。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成分，大多数又是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尽管如此，由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的正确方法，加上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训练，就把党锻炼成一个光荣、伟大而又正确的、能够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革命达到胜利的无产阶级先

锋队伍。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面临着更复杂、困难而光荣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正在进行着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并准备将来走上美妙而远大的共产主义前途。由于目前党内有着大批胜利前后参加的新成分，又由于过去战争时期许多老党员的学习不够，因此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有种种表现，如不加以肃清，也会妨害党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前进。为着领导人民担当今后的更复杂更伟大的任务，需要更加提高党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提高党员对革命前途、党的任务和做党员的标准的认识，肃清在目前环境里用新的形式再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及资产阶级的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党的组织。党现在已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并且已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执行这样的任务。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类的文件，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原载《学习》杂志第4卷第11期，1951年9月；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关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

——在安徽宿县第四届文教行政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2.1)

我首先谈谈小学教育工作：小学教育工作是一种最深入、最实际的人民文化工作，小学教育是人民的基础教育，要提高人民文化，就必须要办好小学教育。

过去反动派的政府是不希望提高人民的文化的，因为人民的文化低，就好压迫，好剥削。反动派只希望少数人有文化和提高文化，来帮助它统治人民。现在不同了，老百姓成了国家的主人；要想老百姓当家当得好，就要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老百姓提高文化后，就可以更好的当村长、当乡长，就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

今天政府和老百姓都需要大批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你们大部分都是小学教育工作者，所以是政府和老百姓非常需要的人。听说大家的工作，一般的都是很认真的；尤其是过去的两年间，此地遇着了严重的灾荒，大家有的要饭，有的饿着肚子，……坚持了这个工作，这说明了大家的思想，一般的都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思想，也一定或多或少有些不好的地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为什么我可以说大家的思想会有不好的地方呢？因为大家都是出身于旧社会，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因此，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有不好的

地方，是难免的。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有改造的必要。有些人，过去工作搞得相当好，我们应该承认；但，是不是就算顶好了呢？是不是好到一点也不能提高了呢？不是的！出身于旧社会的人，做工作即使十分积极，也还要有很多缺点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思想多少有些毛病。例如工作只求表面铺张，不求切合实际；或者觉得自己高于老百姓一些，不能完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缺点都会妨碍我们的工作。这便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要改造一下，即使是工作有成绩的，也要改造改造，才能把工作进一步提高。

要想改造自己，就目前大家的情形来看，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要向前看；就是说不要留恋过去，不要只看眼前，而要看将来。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讲：一、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方面；二、工作的前途方面；三、个人的前途方面。我们如果能看将来，凡事就将来的发展前途着想，思想就会清楚一些，工作就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认为向前看是改造思想的主要问题。

我们怎样来看社会发展的将来和我们国家的将来呢？我们国家过去进行了革命斗争，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国内的统治统统打倒了，我们为了彻底消灭它的残余势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也都得到很大胜利了，现在可以说差不多完全把这种残余肃清了。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现阶段，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但这个阶级有一种唯利是图，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的坏思想、坏习惯，这种坏思想、坏习惯，破坏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影响和腐蚀了我们一小部分革命队伍，所以我们就要反击资产阶级的这种破坏和进攻，整顿革命

队伍的思想，进行三反运动，这样才能保护革命的果实，保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保证革命队伍的纯洁，使我们能够顺利地从事国家的各种建设工作。我们的国家建设的道路，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我们国家的前途，是要跟苏联一样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它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坏现象，人人都可以过富裕的生活，并且有很高的文化。

我们所说的这个将来的前途，不会是很远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有机会可以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我们大家做工作时，要时刻注意这个将来，要努力工作，争取它来的早一点，而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努力，推迟了它的应到来的时间。

要争取达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许多条件，首先就要发展工业，发展工业要有资本，要有钱。但是，钱从哪里来呢？能像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的去剥削国内人民吗？去劫掠殖民地吗？去强迫战败国赔款吗？去靠借外债吗？都不能。因此我们要进行增产节约，省出钱来作为工业的资金，但增产节约又必须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浪费可以省出非常大的一笔钱来。单北京一地，反贪污、浪费的结果，据估计就可修好几条淮河，或几条京汉路。所以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需要的大事情，是为争取达到社会主义前途所绝不可少的大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护这个伟大的运动，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除了发展工业这个条件之外，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建设。文化提高了，使老百姓每个人不只都能算账、写信，而且能够做好一切事情。还有组织合作社，组织集体劳动，也是很重要的条件，老百姓现在还不大会组织互助组，组织生产合作社，我们要在土地改革后，帮助老百姓做起来，以便将来要使用机器生

产的时候，不会有很大困难，这些都需要提高老百姓文化，才能够做得更为顺利。

我们小学教师，是进行老百姓中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军队，我们要响应政府每一个号召，教育老百姓，帮助各种号召在老百姓中很好的实现。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我们国家、人民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前途，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工作积极性。

第二个问题是对工作如何向前看：现在我们的许多教育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不如其他工作重要；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种看法或者是由于只看到眼前的情况，或者由于留恋过去。在眼前，我们的国家，因为把很大的力量用到抗美援朝等的紧迫工作上，因此，有时候对小学教育工作，便不可能照顾得很周到；可是这并不能说是轻视小学教育工作，因为工作本身是否重要是一回事、照顾得周到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大家自己做这个工作更不能轻视它。

过去的反动派在表面上好像也重视读书人，故意提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虚伪口号，其实他们是要借此利用读书人，来做他们的爪牙，帮助统治人民(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并不是真的看重教育工作。他们表面上提高知识分子，实际上则坑害了知识分子。不服从他们支配和不受他们利用的革命知识分子，就一定受他们的压迫。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人民的了。教育为人民服务，真正有了它的重要地位了。我们现在看工作的重要不重要，有地位没有地位，必须问它将来对人民有没有好处，而不要只看现在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我们现在干工作是要低着头给老百姓干的，而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干的，我们工作的好坏，有没有地位，是要由老百姓来决定的。个别乡村干部有时候不重视这个工作，这不是主要问题，不能改变工作本身的重要性。有时个别干

部不重视教育，是由于两种原因：一是教师本身有毛病，一是干部眼光不正确。不管怎么样，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重要的，就一定会有地位，干部的看法迟早也会转变的。从前的事情由皇帝决定，现在是老百姓做了皇帝，现在的事情，便是老百姓决定了，所以干工作主要的要看群众需要不需要，要看做的结果群众拥护不拥护。工作的地位，是做工作努力的结果，做出成绩来，群众拥护了，工作就有地位了。所以工作的地位高低，是看它能否给老百姓贡献出成绩。志愿军地位高，因为他们打胜仗，保卫了国家和人民。财经工作地位高，是它保证了物价的平稳和发展生产。史瑞芬也是小学教育工作者，他的工作有了成绩，便到北京见了毛主席，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志愿军、劳动模范一样的有地位。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成绩，或者没有很好的成绩，就没有权利向老百姓要求地位，况且地位也不是要求得来的，只要工作有成绩，老百姓看见了，自己不要求也就有地位了。

对于个人的前途，也是要向前看：本来个人前途，不应该看作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只有国家、工作有了前途，个人才会有前途。有些知识分子在今天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不能像过去那样在老百姓面前摇摇摆摆的了，不能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的身份了，特别是有些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看见了老百姓斗争他的父、母、兄、弟就难过，甚至于气愤，这都是向后看的思想，这都是留恋过去，留恋腐朽没落的东西，这都是错误思想。这些想法，必须改造；否则，便不能进步，永远也不能进步。还有一种人，是只看现在个人生活情况，因为现在生活艰苦，就以为没有地位，没有前途，而不认识到个人前途，必须在努力工作中去争取。有了这些错误思想的人，就不能很好的工作，这对于工作是一个损失；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也同样是一个损失。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正确认识个人的前途，不妨先把自己的成分研究一下，现在这个成分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家庭出身有各种各样，但是，教育工作者，又可以参加教育工会，个人的成分又可以划做一个知识劳动者的成分，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前途，就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前途。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作出成绩，才可以名副其实的取得“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这就说明我们的思想改造是如何重要，只有努力改造思想，才可以脱离自己家庭出身的那些旧的影响，才可以真正争取在实际上改变成分。我们参加了教育工会只是在组织上同工人阶级联系了，还要从事思想改造，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和工人阶级站在一道。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坚决脱离自己出身的阶级，要从思想上感情上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对立起来，而不要同情它。如果你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与地主阶级对立，反而同情它，那你就是不肯放弃反动思想，就是受了封建道德的束缚，那你就没有资格列入知识劳动者的队伍。地主家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应该切实这样做。出身于富农、中农家庭的人，要放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即重视个人利益而不重视人民利益的思想。我们并不是绝对不容许考虑个人利益，但我们首先要强调重视人民的利益，并坚决主张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我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应该经常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等地位上来考虑，而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上来考虑。能够经常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以上只是一些零碎而没有系统的感想，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

（1952年1月31日在会上讲话，原载《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联合版，《文汇报》1952年3月3日转载）

大众哲学*

修改本

(1950—1953)

第一章　绪　　论

一、哲学并不神秘

——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哲学的踪迹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找到

提起哲学，有的人会想到旧社会大学校教室里的一种难懂的课程，也有的人会想到那些算命先生。许多人总以为哲学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学问，或者是一种谈命运说鬼神的神秘思想，以为哲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隔得天地一般的远，普通人绝难过问。其实，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只因为是日常生活，我们太习惯了，太

---

* 这是艾思奇在1950—1953年的修改本。原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要求而修改。这个修改本改动很大，不仅体系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而且在内容上作了许多增改，有些章节几乎是重写的。由于陈伯达策划了对《大众哲学》的批判，被诬为“机械唯物论”等等荒唐的罪名，本书被迫停止出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才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觉得平淡了，因此即使有了哲学，如果不仔细反省和体会一下，也就不觉得它是哲学。例如你有一个朋友，抗日战争以后和你离别七八年，现在又相见了。这时你作何感想？你首先就会觉得他和以前有种种不同，你觉得他的面容多少有些苍老了，但是，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磨折，你会看出他的思想知识更进步，经验更丰富更成熟了。你们再攀谈攀谈，把七八年来各人的经历再叙述一番，就会使你有更多的感触。你会觉得一切都不同了。世界变了样，中国变了样。希特勒没有了，墨索里尼没有了，在中国的领土上也没有日本军阀横行霸道了。中国有很大的地方成了解放区，广大的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另外的地方却仍在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统治之下，在那里，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蒋介石的国民党代替了汪精卫的国民党的地位，广大人民遭受着比以前更利害的压迫和痛苦，也更加积极更加团结地要起来反对这种压迫。就你们以前的朋友亲戚的情形来说，变化一定也很多。有的由小孩变成青年，有的由衰老而死亡了。有的人参加过抗战成了英雄，有的成了牺牲者，有的发了国难财或者胜利财，有的穷困失业。总之，你们会感到一切和以前都有不同，你们会觉得在七八年的时间过程中，有的事物新生出来，有的事物毁灭了，有的事物正欣欣向荣，成为新世界的主人，有的事物衰老没落，或者奄奄一息地进了坟墓，或者正在作疯狂的临死挣扎。这一切现象会使你们感动、叹息、兴奋，并且在你的头脑里，深深地印上一个“一切都变了”的观念。这时，即使你是对哲学毫无研究的人，你在无意中已经有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哲学思想了。你能觉察到这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吗？你只以为朋友的久别重逢是人们生活里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一切感想也只是日常生活里很平常的感想。你以为这种感想和你平

常想像中的那种高深玄妙的哲学是毫不相干。你不但不了解这里面就有哲学，而且如果听见有人说这就是一种哲学思想，说不定你会大吃一惊，说：为什么这样普通的一件事和这样普通的感想中也有哲学呢？其实，你本来一点也用不着吃惊，你之所以吃惊，只因为你向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有那种哲学专家们所写的书本里才有哲学，而忘记了千万人在生活中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面，到处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

千万人的生活和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

请你注意，我们说在日常生活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我们又说，千万人在生活中和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思想里面，到处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根苗。这些话，有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哲学这东西并没有什么神秘玄妙，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得很密切，书本上似乎很高深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某些很平常的思想中间，并没有隔着铜墙铁壁。另一方面是说，日常生活的普通思想中，还不一定就有系统完整的哲学思想，它包含着哲学思想的一些根苗，没有它，就不能生长起哲学思想，就好像没有根苗就不可能生长起树木来一样。但是，完整的哲学思想必须是相当有系统的、明确的思想：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却常常不是这样，它常常是片断的、含糊的、零零碎碎而前后不一贯的感想，因此它和完整的哲学还是多少有些差别。

日常生活中的感想常是没有系统和不明确的，它还不能算完整的哲学思想

如像前面所说的，你和朋友久别重逢，觉得世界上一切都变了。这是你一时的感想。请问你对于自己所遭到的事物，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作这样的想法？我想你一定很难作肯定的答复。你一定会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某些事物，你往往又

会发生固定不变的感想。例如，你往往会以为石头是没有变化的东西，你在反动环境里生活和工作，碰到许多困难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你往往会产生一种绝望的想法，以为黑暗环境无法改变。你有朋友不进步，不学好，你劝他许多次还没有效果的时候，你往往会想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成语。你还可以从你自己和别的朋友的日常思想中，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来证明这许多的感想，和你与朋友久别重逢时所想的并不一样，或者甚至于完全相反。这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感想，常常是动摇不定的，常常被暂时的事物现象所影响，不能前后一贯。究竟是“一切皆变”呢？还是许多事物都不会变化呢？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往往在你一个人的头脑里混杂在一起，你往往觉得两种思想都好像有道理，没有方法辨别哪一种对和哪一种不对。这就表明日常的感想常常是没有系统的、不明确的，这里虽然有“一切皆变”的正确的哲学思想的萌芽，但还不能集中起来，成为前后一贯的完整的哲学思想。

要研究哲学，才能获得完整的哲学思想

因此，如果把哲学看成非常神秘玄妙的东西，以为它和人类日常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明白肯定地说，哲学就在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日常生活中的感想里就有完整的哲学思想，那也同样是犯了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说，任何人都用不着研究哲学了，即使不研究，也可能有自己的明确而有系统的、甚至于很正确的哲学思想了。

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思想不是完整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它常常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含糊不明的呢？为什么必须要经过一番研究，我们才可能掌握一种有系统的、明确的、前后一贯的完整哲学思想呢？

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要答复这些问题，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首先应该指出，我们的生活，不是平静无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生活，是以工农为主的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斗争的生活。在我们中国，广大的人民的生活历来都是非常艰难困苦。一两千年来，人民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皇帝、官僚、土豪劣绅、地主、恶霸以及国民党以来的新旧军阀——的压迫剥削，一百多年来，又加上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以及和帝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经常勾结在一起，就像两座很大的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其恶果首先是中国广大的农民没有地种，或种了地自己也吃不饱，工人失业，或有业也难养活家庭，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工商业不能发展。中国人民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推翻这两座大山。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推翻这两座大山，进行了艰苦、英勇的伟大斗争。这些斗争发展成几次的革命高潮，最主要的是：清朝时候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运动，以上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以后，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其中包括 1924 年到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 年到 1937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十年国内革命战争），1937 年到 1945 年的抗日战争，以及 1945 年以后反对美蒋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经过了这样长期的英勇斗争，到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中国已经接近了全国的解放，在解放了的地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压迫都被推翻了，农民得到了田地，工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工商业界得到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的斗争还是没有完结。因为，一方面，解放区以外的人民，现在还是在帝国

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之下受压迫。在解放区，虽然这些反动势力都被推翻了，而它们的残遗势力并未完全消灭。因此全国人民，不论是解放区的或非解放区的，在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为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并在将来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

我们的生活，就是广大人民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

这一个斗争，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和这斗争发生关系，绝不能逃避它的影响。所以，如果有人要问什么是我们当前的生活时，就应该答复说：我们的生活，就是广大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的生活，是在今天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以便将来更进一步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我们也许不觉得自己是在这样的斗争当中，但实际的情形却是如此。

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人们的方法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我们的斗争内容，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有军事的斗争，有政治的斗争，此外还有经济的和文化、思想的斗争。我们现在只讲一下文化、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戏剧、小说、诗歌、理论、科学、哲学、法律、道德等许多方面。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他们的文化工具，散布它们的一套反动的、专制独裁的、殖民地奴化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麻醉广大人民使之忘却自己是中国真正的主人，盲目服从专制独裁的“领袖”，向帝国主义者屈服，向封建势力和投机垄断的大官僚资本家屈服。因此，人民必须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今天人民在革命的军事、政治、经济

文化、思想的斗争是要反对思想上的麻醉，使广大人民觉醒起来

斗争中已锻炼出一套新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的专制独裁统治，要求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并且解放后向前发展，使我们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向帝国主义者献媚讨好，要求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并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平等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同时进行思想斗争，使自己的新的革命的思想明确地建立起来，使自己不受反动派思想的麻醉，不受某些落后思想的障碍，使自己的觉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日益提高，才能充分发挥革命斗争的力量。

我们的日常思想，经常受到全国文化、思想斗争的影响

现在要回到我们原来的本题上说话了。已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是分不开的，是时时刻刻受着这斗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我们的日常思想，自然不断地受着这个伟大斗争的影响，首先是受着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影响，同时也受着文化、思想斗争的影响。这些斗争是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而我们各个人的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也是极不一致的，因此在斗争中所形成的各个人的思想，也是各式各样、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不在革命队伍当中，没有经过政治斗争锻炼和政治教育的普通人民的日常思想，常常是混乱的，它一方面也可能受到进步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搀杂许多反动派的思想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或小资产阶级落后思想的成分。举最普通的例子来说，有一种人一方面也同情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又羡慕官僚军阀的阔绰

生活(实际上是腐朽堕落的生活)。这种思想上的混杂和自相矛盾，就是同时受了互相斗争的两种势力的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情形，不仅仅在普通的人们中间，就是在参加革命队伍的人们中间，也往往可以碰到的。革命队伍里经过政治锻炼和教育的人，一般都是有着明确的革命思想的，但也有个别的人，由于品质恶劣、锻炼不够和受了反动派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等原因，而追求个人享受，不顾革命利益，甚至于腐化堕落的。这种情形告诉我们，文化、思想的斗争是非常深刻普遍的，它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细微的地方，我们如果不随时随地加以防范，经常学习研究，经常检查反省，那就往往会不知不觉中受到封建思想或殖民地奴化思想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害，我们的觉悟就不能提高，就会麻痹大意，就不能发挥最大力量来向反动派斗争。

哲学思想，也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部门，也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常常受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常常受反动的、错误的、蒙蔽真理麻醉人民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当我们想到“一切皆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前一种哲学思想的萌芽。如果把这种思想明确而有系统的掌握住了，我们就会相信：中国的现状也要变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是可以彻底消灭、推翻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工农人民是要完全翻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定要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越更深刻地坚决地掌握了这种思想，对于周围事变就越更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就越更有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种哲学思想就是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唯物辩证法哲学就包括着这种思想。当我们从相反的方面来想，觉得黑暗的环境无法改变，或者如许多落后的人一样，以为一切都决定于鬼神

命运，自己只能听天由命，这时我们就受到了反动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就会失去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违背真理的，它对于广大人民的斗争非常有害，而对于反动势力的统治却非常有利。两种相反和敌对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人中间进行斗争，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研究，不辨别，听任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影响我们，这就会使得我们的思想没有系统、混乱、零碎、不明确、不一贯，就难于掌握完整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满足于日常的哲学思想，而不加一番学习研究的工夫，对自己的思想不认真地检讨分析，不批判错误的有害的思想，我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哲学知识，就不可能对周围事变获得正确的认识，不可能有充分的信心和勇气，和全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

在两种敌对的哲学思想影响之下，我们的日常思想就常常混乱

写作这本《大众哲学》，就是想在中国人民的文化、思想斗争方面尽一点小小的力量。其目的，就是想帮助读者研究一下：什么哲学思想是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广大人民斗争利益的，什么是反动的、带欺骗麻醉性的、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这里不妨先指出来，最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想，以后逐步讲清其中的道理。我尽可能用大家日常都知道的事例来说明这些问题，以便大家能够把日常思想中正确有益的思想抓紧，而把错误有毒的思想清除，以便较系统、明确地掌握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的哲学思想，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一本粗浅的小册子完全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这

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抓紧正确的哲学思想，免除思想上的混乱

本书只能做一些初步的启发工作，引导大家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并在实践中应用。这是我的希望，不知是否做得到。如有不对的地方，很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以便改正。

二、果树林里找桃树

——哲学是什么

我们已经了解哲学并不神秘，已经知道哲学的踪迹在日常的思想里到处都可以找到了，但是，究竟什么是哲学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哪些思想是属于哲学一类的，哪些不能算是哲学思想呢，假使有一个人走在各种各样的果树林中，想要找寻桃树，如果我们仅仅向他说，你到处都可以找到桃树，那他是不能满足的。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什么样的树是桃树，什么样的树不是桃树，这样他才能够容易找到桃树。

在同样的环境之下，不同阶级的人会发生不同的感想

我们还是从生活的问题讲起吧。试就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来说，那时人民的生活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处在生活困难的情形之下的人，会发生一些什么思想呢？首先他们自然要对于自己的目前境遇表示不满，对于社会现状表示不满。这是一切生活困难的人大致共同的思想。但是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简单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对于现状的不满是各种人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的；而这些不同的想法是由于各种人的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有的人会由不满而变为绝望，会感到人生没有意思，会以为世界无可留恋，个别的人甚至于会进行自杀。有的人相信命运的观念，遇到困难的时候，只埋怨自己的命苦，认为现状无法改变，即使是牛马的生活，也只能默默的忍受，而不敢希望翻身抬头。又有的人

却相反地认为生活困难不是生前命中注定，而是由社会上的许多事实原因所造成。由此相信这令我们不满的社会生活现状一定有方法可以改变，只要能看清楚这些原因，并且努力从事实上打破这些原因。例如说看清楚了旧中国人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不够团结不够觉悟，没有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彻底打退侵略和推翻这种统治，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以工农为主的全国人民，把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成为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主要的方法。好了，我们看，同是处在生活困难境遇中，而各种人的想法是那么不同！我们再看，在遭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上，除了生活困难的广大人民以外，还有少数生活优越的人，他们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资本家，他们专门依靠剥削广大人民，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对于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除了剥削和压迫人民之外，说不上什么职业。他们以为自己生来就是社会上的统治者，广大人民应该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命定的应该征服别人，而别人也命定的应该被他们征服。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而不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例如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宣传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接收主权”，而不准广大人民接收，广大人民要去接收，要在抗日胜利之后起来做主人，他们就不答应，就要用武力、用内战来禁止这种接收。这是他们中间的主要思想。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坐食游荡、无所事事，每天所追逐的只是消遣作乐，这些人的思想又稍不同，他们用游戏作乐的眼光来看一切，说：“人生不过是寻乐而已，不过是美梦而已！”

各种感想中就包含着各种哲学思想

我们举了以上各种人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正是旧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里很容易可以碰到的，而同时也是包含着各种哲学的萌芽的。这是些什么哲学的萌芽呢？让我们加以说明吧：第一种人感到人生无聊，世界值不得留恋，这里面就有“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二种人以为生活困难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主张消极忍受，这里就有“宿命论”的哲学思想。第三种人认为我们只要能够把生活困难的现实原因研究清楚，就可以找出克服困难的方法，这里面就有着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第四种人坚持认为少数人是天生的优越人物，反对广大的人民有自由生存权利，这就包含着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所宣传的一种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也是带宿命论的性质，它把少数人看做是天生的或命定的应该来压迫和统治大多数人的。最后一种人把人生看做游戏，以追逐乐趣为能事，这是一种“享乐主义”的哲学思想。

这种种思想，我们都加上了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名字，是不是有人要说太大胆了呢？那些惯于在书斋里和大学教室里推敲词句的教授学者们，是不是会笑我们浅薄呢？也许会如此！但是，让他们去说笑吧！我们不需要在他们的书本里找是非的标准，而主要应该在人类生活事实中去找真理。我们做的并没有错，而且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举出来的这些思想，的确可以叫做哲学思想，这些“主义”，和那些砖一样厚的专门哲学书里所谈的“主义”并没有根本的分别。

哲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也就是世界观

为什么说这些就是哲学思想呢？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这些思想，和那些专门的哲学书上所讲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根本的认识或根本的看法。悲观主义的人认为世

界上的一切根本都是没有希望的，宿命主义者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根本决定于鬼神上帝，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变化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和规律，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全社会的广大人民需要向少数统治者或独裁领袖屈服，享乐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游戏场，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要来享乐的，值不得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不同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用哲学上的专门名词来说，就是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很多都不是对于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而只是对于世界一部分事物的部分认识。例如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对于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有国民党的一些军事将领们以阵地战为主的思想，有另外一些人以运动战为主的思想，还有中国共产党以发动广泛的游击战，辅之以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思想；关于抗战的前途，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速胜论”思想，也有国民党中另外一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亡国论”的思想，也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及进步人士所接受的“持久战”的思想。这些不同的思想，都是对于抵抗日本这一个具体事件的认识或看法，而不是对于全世界一切事物的总的认识或根本看法，所以都不能叫做“世界观”，而只能叫做“抗战观”，都不是属于哲学思想的范围，而是属于军事政治思想的范围。

哲学思想主要解答整个世界的问题，其他思想主要解答某一事物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弄清楚了，不论在我们的日常思想中，或是专门书本所研究的问题中，都可以同样找到哲学思想。只要这种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思想包括到哲学的范围内；

如果这些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关于我们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类物如何看法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说它不是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是哲学思想和一切其他思想的分别。

但是，在我们认识清楚了哲学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分别以后，我们还不要忽视它们中间的关系。哲学既然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因此它也就必然要涉及我们对于世界的一部分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事物的看法中，同时必然包含着某一种哲学思想。以前我们说一切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思想里都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其原因就在此。就把刚才抗战问题的例子拿来说吧：例如“亡国论”思想，一方面它是某一些人对于抗日战争这一件事的不正确的认识或看法，在这种认识和看法中，虽没有直接提到整个世界是如何如何的问题，但它仍然和某一种世界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对于事情悲观失望，认为世界上事情的困难是无法改变的。这在根底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思想。又例如那持久战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国抗战的实际历史事实中证明的确是真理。这种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关于中国抗战的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是按照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各种主要的事实条件加以深刻研究而得到的结果，因此，这种科学思想的根底里，就包括着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这两个例子，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思想，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或每一类物的认识和看法，都在根底里包括着一种哲学思想，或者照专门哲学的说法，都有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哲学思想所涉及的，都不仅仅是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如何看法的问题，它同时也贯穿在我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看法里。

哲学思想是其他各种思想的世界观基础

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一切思想，既是世界观的基础，因此

就有着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方法的作用或研究指导的作用。“亡国论”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是受了悲观主义的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指导，把日本的强和中国的弱看做不能改变的，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做绝望的。如果他肯虚心学习，接受唯物论的思想，抛弃悲观主义的思想，按照唯物论的方法，把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各种最主要的事实条件认真研究一番，那么，只要他不是汪精卫的死党，或昧着民族良心要跟反动派去和敌人讲妥协，他就应该承认亡国论的不对，就应该接受持久战的真理。这一种情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就会受到不正确的方法的引导，而这种方法就会把我们带到错误思想里面去；反之，如果我们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在我们看事情和认识问题的时候，也就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能使我们对于每一件事和每一类物找到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我们研究哲学，目的就在于学习掌握一种正确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于要学到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武器。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犯错误，就要使革命队伍和革命人民遭受损失。

哲学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思想方法。研究哲学就是要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什么叫做哲学了。但是，我们就此能算完全找到桃树了吗？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番解答。我们不仅要求懂得什么叫做哲学，而且还希望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哲学，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先一般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

对于事物的正确认识和看法。还是用抗日战争的例子来说，对于抗战的三种看法——亡国论、速胜论和持久战，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抗战八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看法都不对，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才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和前两种不正确的思想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呢？它的特点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持久战的思想，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只是我们头脑里的思想，而且是把事实的发展规律正确的反映在这一个思想里。至于那不正确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它的内容却和抗战的事实发展规律全不符合，它之所以叫做错误思想，就在于这种思想不能正确地把事实发展规律反映出来。什么是这里所谓的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变化发展中一定不移的关系和过程。由于敌强我弱以及其他许多事实条件，抗战必定要经长期的战争而不能速胜，必定要通过防御、相持和反攻的三阶段的道路，必定要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才能渐渐削弱敌人以致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由于我们是进步的，敌人是倒退的，我们多助，敌人寡助，我们是大国，敌人是小国这些事实条件，因此只要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定归于我们，而事情的发展绝不会如亡国论者的悲观想法那样。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关于中国抗战发展的规律，抗战中一定不移的各种关系和过程，都在持久战的思想里正确地反映了出来，而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却完全违反了这些规律，因此持久战是正确的思想，其他两种思想就是错误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就是能够正确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

现在我们就可以谈到什么是正确的哲学思想了。各种正确的思想，都是反映了一定事物的发展规律。而正确的哲学思想，则是正确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应如

正确的哲学思想，是要能够正确地反映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规律

何认识的总规律。这样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就是辩证法唯物论，我们学懂了它，那我们对于世界就有了正确的根本认识或根本看法，就可以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就能够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掌握到有力的方法武器。研究各种事物规律，是科学的任务。我们如果要想对于一定事物，获得正确的思想，避免错误的认识和看法，就必须对这一类事物作科学的研究。但要对于任何事物能作正确的科学研究，就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作为基础，就要研究整个世界变化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的总规律，而这就是哲学的任务。因此，我们如果想获得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避免受到错误的反动哲学思想的影响，就必须很好的研究一下哲学。

还要重复说一下：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正确的哲学就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科学的研究，找出它们的真实的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我们在革命行动中和斗争中就不至于摸错道路，就有胜利和成功的希望，否则就要受到挫折或失败。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应用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就为我们指示了持久战的科学真理。中国人民所以能够以一个弱国而在八年抗战中，挡住一个强大敌人的侵略铁蹄的前进，给它以有力的打击，最后把它打败，并且发展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作为走向全国解放的基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我们依照了持久战的科学思想进行抗战，而不是依照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来指导行动。正确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有这样的重大作用，它就是我们进行革命的阶级斗

研究哲学必须时时刻刻抱着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目的

争的有力的思想方法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哲学，学习掌握那正确的思想武器——辩证法唯物论。学习哲学既然是为着掌握革命斗争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武器，因此，我们研究哲学的时候，就也必须时时刻刻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一个解决实际问题和指导行动的目的，在研究中经常联系工作和斗争中的问题，切不要缠绕在与当前实际毫无关系的空洞议论和名词的纠纷里。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三、两军对战

——哲学的两大类别

现在还要再讲一次生活困难的问题。

同是一个生活困难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和看法却因人而不同。认识和看法不同，结果也就大有差异。有的人在生活困难的压迫之下悲观消极甚至于自杀了，有的人拼命忍受着牛马的生活，得过且过，能多活一天算一天，有的人勇敢坚决地起来和困难作斗争。我们已经把第一种人叫做悲观主义者，把第二种人叫做宿命论者，把第三种人叫做唯物主义者。还有一种人把压迫和剥削别人当做自己当然的权利，再有一种人每日闲游浪荡、追逐乐趣，我们把前一种人叫做专制主义者，后一种人叫做享乐主义者。以上种种的人，都是社会上容易看到的普通人，绝不是什么哲学专家，

但我们却把他们的认识和看法都加上了专门的哲学名词，好像他们都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这一点，我们已用不着再加解释，大家读过前面两节文章，早已明白了，这些人虽然不是专家，他们的思想仍有各种哲学的内容，因为这些思想代表各种人们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同是一个世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就是说，在各种人的眼睛里，世界呈现为各种不相同的面貌。在悲观主义者的眼睛中，世界上好像充满了愁云惨雾；在宿命论者的眼睛中，世界上一切都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在唯物论者的眼里，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发展，都是由事物本身的一定的原因所引起，而一切发展变化都有着一定的规律；专制主义者把世界看做少数独裁者的奴隶集中营；享乐主义者把世界看做游戏场。为什么世界会有这样多的面貌，是世界自己在化装做戏吗？当然不是！世界只是这一个世界，它自己并没有什么装扮，我们觉得它有各种各样的面貌，那只能怪我们人类眼睛上常常带着各种各样的着色眼镜。你们看，凡是带着色眼镜的人，世界在他的眼睛里就失去了本来面目，而呈现出各种人工的色彩。带了青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青色的；带了红眼镜，世界就好像都是红色的。我们这里说的着色眼镜，自然只是一个比方。各种人的世界观之所以有不同，并不是简单地由于他们在眼镜店里配了各种不同的有色眼镜。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乃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更正确些说，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坐井观天”，意思是说坐在井底的人眼里所看见的天和在井外所看见的是有不同的。天只有一个，井外的人看起来是空旷辽阔的，而井底的人看起来就只像一

各种人之所以有不同的世界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个圆盘。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和这个比喻有些类似。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同，同一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样子。

中国社会两大营垒内，都包括各种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

在前一章里早已说过，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一种斗争的过程，而这种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本上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把中国社会分成了革命和反动的两个大营垒，在这两大营垒里，各自包含了许多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集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在人民的革命营垒方面，首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开明人士和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营垒里，有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军阀、政客、汉奸、特务等的阶级和集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复杂的阶级和集团，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于事物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有种种不同。首先两个营垒是处在根本对立的地位，在中国问题上，就有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在人民的营垒方面，根本的思想是希望中国得到解放，使中国成为民主、自由、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国家；在反动的营垒方面，他们的根本思想却是不惜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目前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在中国建立起他们少数剥削者的专制独裁统治。这是两个营垒的根本的对立思想，是两个营垒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是，两个营垒中包含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所有着的就不简单只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同是站在人民的营垒方面的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解放的要求是各有差别的。工人阶级坚决要

求在中国解放之后能够得到彻底的翻身，农民也是这样，工农阶级成为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则首先关心的是中国解放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又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能和反动营垒始终进行坚决的斗争，而资产阶级则常常表现动摇妥协的倾向。在反动营垒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集团是坚决反对人民的死硬派，另一部分由于与其他部分的矛盾冲突，并且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往往竟能够和人民营垒方面形成一时的和一定条件之下的妥协，甚至于结成统一战线。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形来说，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来坚决反对抗日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而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时就曾经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和中国广大人民作了暂时的妥协——但在妥协中间仍然时时进行反对人民的活动，并发动了几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胜利了，情形就有了改变，从前和人民暂时妥协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军阀、官僚、特务集团），现在是和美帝国主义一起，站在坚决反对人民的立场上了。我们讲了这一长篇，是想说明什么呢？我们是想说明：在两个大营垒中间，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中间，因为都包含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和集团，他们的地位不同，他们的关系常有变化，因此他们对于同一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就表现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形，并且也常会发生变化。

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有各种不同的世界观

就世界观的问题来说，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这正是因为社会上有各种各样阶级和集团，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因此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就各不相同。例如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呢？你要找它的来源，可以走到一些在旧社会中受了地主阶级影响而没有觉悟的农民群众中去。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80%，他们在过去历史上曾举行过多次的起义，把一些横暴的专制皇帝的统治打垮，表现了他们很伟大的力量，最近30年来，他们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之下觉悟和组织起来，更成为无敌的力量。但是，在旧社会里，当没有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农民的思想常常是被狭小的生产范围所限制，不会团结、组织，不容易集合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因此常常也就不认识自己的力量，在困难和压迫的前面，就没有反抗的信心。由于这一种生活地位的限制，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麻醉影响，使得他们认为世界上事情是命定的，无法改变的，对于压迫和痛苦，除了拼命忍受之外是没有方法可想的。因此，宿命论的世界观，不管它是日常生活中听闻到的也好，或者是专门的哲学书上读到的也好，就中国过去的情形说来，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和麻醉人民的一种反动的哲学思想。农民在不能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大规模地起来反抗的时候，就会抛弃这种反动思想。农民受到了共产党的思想、政策影响和领导，他们就更加觉悟起来，就能够勇敢地起来反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就能够组织、团结成伟大的力量，能够把敌人最后打败。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就没有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就接受了进步的唯物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否认世界上的事情由于命定，而相信广大人民的团结和组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改变一切，创造一切。

我们讲了宿命论的世界观和唯物论的世界观，找出了它产生的社会原因：前一种是地主阶级以及其他主张专制主义的反动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工具，后一种是革命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法唯物论的。

哲学思想是有阶级性的

这就是说，哲学思想是有阶级性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是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宿命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用来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也是过去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主义统治权的思想武器。享乐主义是依靠剥削过着游荡寄生生活的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而悲观主义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社会上走向没落、瓦解的阶级。反动统治阶级到接近末日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可能产生出悲观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分子在生活趋向破产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能走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队伍中，也会产生悲观主义的情绪。

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可以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集团里找到它的来源。像中国这样的社会，内部包含着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中国社会可以找到的世界观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上面列举出了五六种，如果要完全列举出来，那么，五六十种恐怕也举不完。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有点迷惑了。世界只有一个，在我们的眼睛里却变幻出这样多的面貌，这样多的世界观！那么，哪一种世界观是反映了世界的真正面貌呢？要从这样多的面貌中，去找真正的面貌，是不是可能呢？什么是世界的真面貌，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这问题我们在以前已解答过，那就是要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思想。要在这样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里，找出一种能够正确反映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哲学思想来，岂不非常吃力？岂不要把人弄昏头脑，甚至于徒劳无益？好的，如果有人发生这样的忧虑，觉得事情难办，那么，我可以先说：请你们放心，不必那样着急！

你说这是吹牛吗？绝不是吹牛，问题就在于要研究。世界上

的一切问题，如不加以研究，总会觉得茫无头绪，如果仔细研究一番，就可以找到它的条理，找出正确解决的办法。人们的世界观是那么复杂多样，这自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更深刻的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归根结底，只有两类。就好像在中国社会里，虽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它们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并且也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矛盾，但归根结底，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营垒的对立，即一方面是反动势力的营垒，另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的革命营垒。哲学也是类似的情形，多种多样的主义、派别，它们的内容各不相同，互相间也经常有争论、战斗，但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都可以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战。

人们的世界观虽然种类复杂，都可以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为什么事情又是这样简单明了呢？请听我慢慢讲来。

我们天天睁着眼睛看我们的世界，就知道这里的事物是多到计算不清，从天空到地上，从周围的一切到我们自己，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就是用“万花缭乱”这句话也不够形容它们的繁多。但事物虽然繁多，我们还不至于被它们弄得头昏眼花，而仍然能够清清醒醒地生活下去，这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观察分析的能力。我们有了这种能力，能够从表面上好像凌乱不堪的宇宙万物中，发现它们的秩序、种类、规律，发现它们中间的一定关系。我们能分清楚某些东西是动物，某些东西是植物，能分别春夏秋冬的时序，能从人类社会里看出各种的阶级和集团，能看清楚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封建势力，能够看出各阶级、各种社会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能看出：在我们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时候，随时随地都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关系，即我们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大体上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周围世界的事物，不

我们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现象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精神、意识等“主观的东西”，一类是外界物质或“客观的东西”

断地被我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又利用自己的这些认识去影响周围世界，改变周围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把自己作为认识的主体，这里包含着我们的思想、感觉、感情、意志等；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做被我们所认识的客体。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神、意识一类的东西，我们叫做主观的东西；属于外界的客体，也即是物质、存在一类的东西，我们叫做客观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分为两大类，在我们的认识过程中，任何一件事物、一种现象都可归入这两类之一，不是主观的、精神的，就一定是客观的、物质的。

对于这两大类的现象，我们虽然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加以分别，但他们中间并没有隔着不能越过的鸿沟。相反地，正如前面已简单提到的一样，它们中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这里有一把

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经常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

椅子，我们说它是客观的东西，是物质，但它映进我们的眼睛里，就在我们心中引起了椅子的感觉和认识，这样它就和主观、精神（我们的感觉和认识）发生了关系。详细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我们对椅子的感觉和认识），只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即椅子本身）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主观的、精神的东西绝不是能离开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而凭空存在的。又如我们想拖开那把椅子，让它不要拦着我们走的道路，这是主观的思想，是精神的作用，但这思想立即引起了我们的动作，我们就把椅子拖开，这就是以主观改变了客观，于是主观就和客观的事物、和物质发生关系了。这就是说，主观的、精神的东西本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反映，但

它反过来又对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发生一定的反作用。又例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这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这件事物反映在我们头脑中，就有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就转变为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掌握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是主观的精神的东西，中国人民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在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又变成了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现象。像这样，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的互相关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到处可以看见的。

我们天天在生活着，时时刻刻与周围的一定事物进行斗争，因此我们的主观就天天、时时刻刻和周围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我们的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所发生的关系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主观思想怎样与客观物质发生互相影响和作用呢？这一个问题，就成为我们生活中和斗争中最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和看法，也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的性质。

主观与客观如何发生关系的问题，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

我们以前举出了五六种世界观，我们说还有几十种以上的世界观。它们的样子是那么五花八门，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也是那么多种多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终于可以发现，归根结底，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最根本的仍只有一个。不论哪一种哲学思想，最后都得要答复：主观与客观、精神和物质是怎样发生关系的？试把前面享乐主义的世界观拿来看一看，它把世界的一切都看做梦，看做人们心中的幻影，它是怎样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呢？它是完全不承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了，它把客观、物质都当做主观的幻影，以为世界上除了主观的东西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它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东西，把主观、

精神看做世界上最高的惟一的东西，以至于不承认有客观、物质，这种认识和看法，在哲学上就叫做唯心论。再拿那宿命论的世界观来看吧，它把世界当做神灵手中的玩意儿，以为世界的一切都受着神的心意支配。这种世界观，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客观物质的存在，但把一切客观事物都看做神灵的心意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认为一切都是由一种神化了的主观、精神创造出来，并且服从着这种主观、精神的，这仍是把主观、精神当做最先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把客观、物质当做附属的产品，所以仍然是唯心论的世界观。此外，专制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少数人的统治权威是天生命定的，主张独裁领袖的思想、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如国民党中一部分反动派所主张的“领袖脑壳论”——即一切由“领袖”脑壳中的思想决定）；抗战中的速胜论者，不顾中国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困难，只按照自己希望速胜的主观愿望来判断问题；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空空洞洞地说胜利是由于精神战胜物质，而抹煞了广大人民、尤其是解放区人民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伟大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这一切思想都是把主观、精神的作用过分夸大，把它看做最高的决定一切的力量，在根本上都以一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做思想基础的。

唯心论的根本思想，是把“主观”、“精神”的作用过分夸大，把它看做决定一切的最高的力量

和上面的各种世界观相反，另一种世界观即唯物论，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时，不是把主观、精神摆在第一位，而是把客观、物质摆在第一位，认为客观的世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精神、意志为转移的。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世界，绝不是主观的幻影。客观、物质的变化、发展，都是依照它自己本身的性质，通过一定的关系和过程，也就是通过它自己本身的规律，绝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灵心意所能

任意创造和任意支配，也不是一个“独裁领袖”的“脑壳”就能随便决定一切。我们不能违背着客观物质本身的规律，任意改变事物，我们要想改变事物，只能利用这些规律，顺着这些规律去推动事物，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要善于利用风势，帆船才能顺利前进，行船不会利用风势，就不可能顺利前进，甚至于不能前进而要后退，因为帆船要靠风力推动，是它的客观规律。市面上流通货币太多，物价一定上涨，这是“通货膨胀”的规律。我们要使物价跌落就不能违反这个规律，让纸币以及其他通货任意增加发行，而是必须顺着这个规律，设法把通货数量减少，或即使不减少也要给以适当的节制。抗日战争由于力量的对比以及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必须经过长期战争的道路，这是中国抗战的规律。中国人民要想在这战争中获得胜利，就不能违反这规律，就不能依照唯心论的急躁心理希望速胜，而必须依照着这规律，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争取敌我力量对比逐渐变化，以至于使我们的力量变为优势，才能打败敌人。这就是说：唯物论的世界观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承认客观世界是独立的物质存在并且有它自己的规律。除此以外，唯物论的另一主要特征也要说一下，这就是认为主观、精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从客观、物质中产生出来的，是第二位的东西。是先有了人的脑髓然后有人的思想呢？还是先有了思想才有脑髓？当然是先有人的脑髓然后才有人的思想，主观的精神是从客观的物质里产生出来的（也叫做派生的），思想是发展到最高级的物质（即人的脑髓）活动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反映的作用。是先有椅子然后才有椅子的感觉，还是相反的呢？是先有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性、曲折性

唯物论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物质有独立的存在和自己的规律，物质是第一位的东西，精神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东西

的规律然后才有关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认识以及持久战的思想呢，还是相反的呢？事实证明绝不是相反的情形，事实证明客观事物和它的规律存在在先，而关于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思想（也就是主观、精神）只是前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

一切哲学上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两军对战。找不到真正第三种的中间的哲学

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对于这两类现象的关系，有两种根本相反的看法：把主观、精神看做第一位的东西，而把客观、物质看做第二位的东西，是唯心论的看法；认为第一位的东西是客观、物质，而主观、精神只是第二位的，只是“派生的”东西，这是唯物论的看法。哲学史上所有千种万样的世界观和什么什么主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入这两大类别之中。各种哲学中间无限错综复杂的战斗和争论，都可以最后归结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就好像中国社会各阶级集团间的无限错综复杂的斗争，都可以最后归结为广大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军对战。在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两大营垒之外，找不到真正的第三个营垒，即使有，也只是那一种摇摆在进步与反动之间的一种不坚定的营垒。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外，也找不到真正第三类别的哲学，即使勉强去找，也只能有一种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左右摇摆的骑墙派哲学，即所谓二元论的哲学。哲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营垒的斗争，自然是有阶级性的，它是人类社会里各阶级间的斗争倾向在世界观——思想方法上的表现。从来唯物论一般都是历史上有进步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而唯心论则一般都是历史上起反动作用的阶级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派的思想基础。中国的反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如像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之类，

革命阶级必须坚持唯物论，就是哲学的党派性

都是唯心论的。领导中国广大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严格地建立在辩证法唯物论这个世界观——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坚持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而和一切唯心论作不妥协的斗争，这就是哲学的党派性。

四、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

——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从前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在一条路上，有两个人对面相逢，并且同时看见路旁挂着的一块招牌。招牌的正面涂着金色，背面涂着红色。甲向正面走来，看见了金色，说招牌是金子做的。乙向背面走来，看见了招牌的另一面，一口咬定是红漆的。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相让，于是发生争执、吵闹，以致打起架来。后来是另一个人出来调解，提醒了两人的偏见，大家才明白刚才的争执，都是毫无意味。原来招牌本身兼有两面，而每人只看见一面。所有的争执，其实都是各人眼光狭隘的结果。

故事就是这一点。大约因为一经人指点，两人不再争执，于是故事也就完结了。但我们如果再深刻的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还不能完全没有问题。两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人肯再用一点思想，马上就会追问："招牌两面的颜色果然不同，但仅只知道这一点，还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还要再问：招牌的本身究竟是什么造成的？是木头吗？金属吗？抑或其他的东西？"这问题，自然还不难解答，因为木头或金属等东西是很容易辨别的。掂一掂重量，敲一敲声音，不必十分

麻烦，就可以大致判断它是用什么造成。但是，如果问题是从哲学的观点上来提起，那么，事情就不这样简单，而花样也就多起来了。那时人们就要依照着自己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个问题。主张“人生如梦”的唯心论者，会告诉我们说：“你说是一块招牌，在我看来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团感觉，一团幻影罢了。你有时感觉到它是金色，有时是红色，或者又感觉到它是木头或金属，但这些看法，也不外都是从你自己的感觉上得来的，没有你的感觉，这一切东西都不会存在。”另外一个宿命论者，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相信冥冥中有神灵主宰一切的唯心论者，他发表意见道：“世界是神灵随自己的高兴安排成功的，那一块招牌挂在前面，也不外是神的心意的表现，而并不全是我的感觉。”唯物论者的意见却直截了当得很：“招牌就是挂在那儿的招牌，它本身就独立的在那儿挂着。它并不是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乃是招牌在我们的感觉器官里的反映或影像。它也不是神意的表现，它只是自己存在在那儿的物质。”

这就是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每种花样表现着一种世界观，世界观有几十几百种，那么一块招牌上也就可以翻出几十几百种花样。但是归根结底，世界观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花样也可以最后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类。这一点，以前已经讲过，现在想更详细的说明一番。

我们先谈一谈那把世界和招牌当做一团感觉的唯心论。它的特点，是完全否认了客观物质的存在，以为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主观精神以内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我和我的感觉、思想、意志等等消灭了，那么世界也就没有了。这一类唯心论，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主观唯心论”。它的拥护者很不少。单就西洋来说，两千年前希腊的哲学家中间，就有一派人拥护过它。以后

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一切都是我们主观精神以内的东西

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又有一个哲学家叫贝克莱的，把它捧上天去。20世纪以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更有一种叫做经验批判论的哲学，把主观唯心论戴上了一副科学的假面具，它甚至于影响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一些思想不坚定的人。他们把这种荒谬的哲学思想在自己的革命营垒里大大的宣扬起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世界观，在这种偷进内部来的敌对思想前面，几乎被排挤出来。幸亏列宁看清楚了这个危险，亲自费很大的力气，写了一本叫做《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厚厚的书，给了它一个彻底的打击，才算把它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营垒里驱逐出去，俄国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营垒里的哲学思想基础才算巩固起来。在中国也有不少主观唯心论的信徒，三百多年前明朝的王阳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他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他用花作比喻，认为只有当我们看见花的时候，花才存在，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就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论。唐朝诗人李白说"浮生若梦"，这也有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成分。就日常生活里的情形来说，有一种人，常常以为自己所想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不管事实上究竟对不对，在做工作的时候，不是根据调查研究，按照事实的情况来决定工作方法，而是凭个人的感想办事，他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可以任凭个人的主观随意创造或消灭，自己想要怎样便可以怎样。这种人虽然不一定会公开主张一套有系统的主观唯心论哲学，但他这种思想就有着主观唯心论的性质。

日常生活中也有主观唯心论

主观唯心论的错误，首先要在事实面前暴露马脚

唯心论是错误的世界观，主观唯心论尤其容易露出马脚。在什么情形之下它会露出马脚来呢？在两种情形下它会露马脚。第一是在生活事实前面对照的时候，它会露出马脚来。一切自以为是，只相信自己主

观所想的，而不把客观情形放在眼里的人，一定要在事实前面碰钉子，一定要失败，也就是在事实前面证明他所想的不对。失败就是主观唯心论的马脚的暴露；失败就证明的确有一个客观世界在我们的主观之外独立存在，证明世界绝不是存在于我们自己主观里的幻影。

主观唯心论在理论上也是荒谬不通的

其次，如果我们用点脑筋，把道理仔细想一想，主观唯心论的马脚也就会在另一方面露了出来。哲学史上早已有人证明主观唯心论的道理是讲不通的。拥护主观唯心论的人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是我的感想、梦幻，或思想、意志的表现。但是我们就要追问："这些感觉、梦幻等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万花缭乱的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总有一个产生的来源。"这一个问题，似乎不难答复，但仔细一想，主观唯心论者就要感到非常为难。因为如果要使他的主张彻底，他就应该答说："世界就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梦幻，所以也就是我自己的主观内部产生出来的，并没有其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荒谬不通："世界既然只是我的主观里产生的，那么，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我之外，一切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了。"这就成了哲学上所谓的"独在论"。按照这种"独在论"的道理推论下去，那就必然要得出许多荒谬绝伦的结论，例如说："我不是我的父母所生的，恰恰相反，我的父母才是我的主观所生的！"又如说："并不是我生存在世界上，恰恰相反，整个世界才是生存在我的主观里！"等等。一切主观唯心论在实际上必然都要成为荒谬的"独在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人，我们有时说他是"目空一切"或"目中无人"，这种人思想情况就有点"独在论"的性质。但是，狡猾的主观唯心论者有时也会感到这种结论实在不通，而不敢把自己的道理公开推

到独在论上去。他们想在我的主观之外，给世界另外找一个来源。从哪里找呢？他们当然不肯说，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之外独立存在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成为唯物论，而不是唯心论了。那么，怎样解答呢？英国的贝克莱的解答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很狡猾地、也很勉强地用神的主观来代替“我”的主观，说：“世界是在神的感觉里，是由神的感觉产生的。我的感觉，只是神的感觉的一小部分。”但这样一来，他更是陷入了双重的荒谬的泥坑：一方面，他自己给自己的主观唯心论打了一个耳光，他除了他自己的主观以外，又承认还有一个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仍然避免不了独在论的结论。人们就可以用他原来所讲的一套道理，向他提出质问：“既然你说世界上存在的东西都是你的感觉，那你怎么能说神就是实在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你的感觉呢？”

唯心论是要把人引到宗教迷信的泥坑里去

但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贝克莱的这种解释里，另外包含着一个阴谋企图，那就是想把我们引到宗教迷信的圈套里去，要我们相信宿命论，相信神的主观精神支配着世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不仅贝克莱有这种阴谋，一切唯心论都有这种阴谋，它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要把你引到宗教迷信以及宿命思想的圈套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唯心论的根本特点，就是过分夸大了主观的精神的作用，结果就主张世界上只有精神，没有物质，或至少也要主张物质完全受精神的支配。而在宗教迷信的思想里，也认为世界的最高支配者是神，是神的心意和精神。这一点，在根本思想上不是和唯心论完全一致吗？因此，一切唯心论在道理说不通的时候，就常常索性丢开道理不讲，把神灵硬拉来顶救兵，好像《西游记》上孙悟空对妖怪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请南海观世音菩萨来帮忙一样。有些凭主观感想办事的人在临到失败以后，常常不肯反省自己主观的错误，不肯虚心地

研究事实，却埋怨自己的失败是由于“运气不好”。当他这样诅咒的时候，他虽然不一定会想到这是一种宗教迷信思想，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这一个圈套：就是不知道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思想违背了事实的规律，而以为是违背了冥冥中的神意。

唯心论是通向宗教迷信的桥梁

自然，宗教也有宗教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和唯心论混为一谈。宗教的世界观一般都是用迷信神话来表现，宗教里还有种种仪式行为。这些特点，都不是哲学的唯心论所有的。但是，如果从根本思想来讲，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讲，那么，唯心论和宗教就是相通的。唯心论不用神秘的仪式来欺骗你，而是用冠冕堂皇的一套诡辩的道理和巧妙的言论来迷惑你，使你不知不觉相信了那宗教的根本思想，不知不觉在精神上被拖到庙宇里去。唯心论并不就是宗教迷信，但它却是用最狡猾的道理安排成的一条通向宗教迷信的桥梁，神话和仪式只能欺骗和吓唬愚昧落后的被压迫群众，使他们迷信神力，看不见自己被压迫的真实的原因，使他们失去了反抗的信心，糊里糊涂地以烧香拜佛来安慰自己。但在唯心论的影响之下，就是学者、思想家也往往会甘心情愿的去过敲木鱼的生活，它的思想麻醉力量实在不小。因此，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除了它们的神话仪式之外，都有一套宗教哲学，如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和佛教的佛学。这些宗教哲学内部自然也有着派别斗争，其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唯物论性质的派别，与唯心论派形成尖锐的对立，而那些唯心论派的宗派哲学，对于宗教迷信的传播，是起了很显著的配合作用的。

我们刚才所讲的，已经超出主观唯心论范围之外了。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害怕暴露独在论的荒谬绝伦，不敢把自己的一套道理讲彻底，说世界上除“我”之外，什么也不存在，因此都要向

神灵求救，承认除了“我”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神，这个神才是世界的真正支配者，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都决定于这个神的心意。但是这样一来，就不是主观唯心论，而变成另外一种唯心论，即哲学史上所谓的客观唯心论了。这种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不同，就在于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一切都是“我”的感觉、思想等等，世界一切都只是个人的主观精神的表现，而客观唯心论则认为世界一切是神的感觉、思想等等，是一个伟大的充满在宇宙各处的主观精神的表现。一切宗教迷信的思想，都认为神是世界的最高支配者，认为神能创造一切，因此在根本上说来，一切宗教迷信里都包含着一种客观唯心论的思想因素。当然，宗教迷信里的客观唯心论因素，比起专门哲学上的客观唯心论来，是很粗糙的。它的荒谬的神话，使人容易感觉到它的不合理。哲学上的客观唯心论，在根本上虽然和宗教迷信思想有共通的性质，但它却要讲一套狡猾精练的道理，使人一下子很难看出它与宗教迷信相通的马脚，但它迟早总要露出马脚，因为在它花言巧语地说到最后时，总要承认，他所谓的伟大的充满宇宙的精神就是神。

客观唯心论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神的感觉，思想的活动

世界上最有名的客观唯心论，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伟大的精神运动，这个精神，他叫做绝对精神。这个精神的特点，就是思想活动。这种思想活动，他认为是具有着一种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辩证法的性质，世界就是由这种精神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发展，在黑格尔看来，并不是物质的变化发展，而是这个绝对精神的思想活动。用手抛石头，石头飞起来，在黑格尔看来飞起来的不是物质，而只是绝对精神自己的思想的一种表现。中国的抗战，如果要黑格尔来解释，他就不会看做是中国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物质斗

争，而要看做是绝对精神自己的思想斗争，是这种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内部思想矛盾的表现。

客观唯心论的世界观，也是荒谬的，不管它的道理讲得怎样动听，它仍然像主观唯心论一样，经不起生活事实的对证，也经不起理论上的认真批判。为了把问题解释得简单明了，让我们撇开专门的哲学理论，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碰到的事情来说明。要在我们日常思想中找客观唯心论，最好的材料就是公式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凡是有公式主义毛病的人，都不会按照事实的具体情况灵活解决问题，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永远只会用一套呆板的办法来办事。都市里办国民教育的一套正规办法（如集中很多学生，分班分年级上课等等），到地广人稀的西北农村里就行不通，但有的人一定要这样办，这就是公式主义。从外国学了一套阵地战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也想照样应用，这也是公式主义。抗战初期，国民党中一些人曾想用曾国藩打太平天国的公式，主张以守为主，以攻为辅，反对游击战运动战，这也是一个好例。公式主义的思想基础，就带有客观唯心论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一些固定了的思想公式看做决定一切的东西，以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受这些公式的支配和安排，而不知道世界万物各有各的变化发展规律，不受任何既定公式的限制。公式主义者当然不会宣布世界万物是受神的支配，或受到一种伟大的精神和思想的支配，但在实际上它是承认了这种支配，因为盲目相信思想公式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它根本就是和客观唯心论一致，甚至于和宗教迷信一致的。好了，这一下子我们好捉着客观唯心论的马脚了。它既然是把死的公式迷信成为世界万物的支配者，那么，一旦碰到了活的事实，碰到并不

日常生活中的公式主义，就是一种客观唯心论

公式主义在事实面前也要露马脚

受这些公式限制的事实，这种迷信就要被打破了。城市的正规教育拿到偏僻乡村里就办不通，阵地战的公式在1937年上海抗战中碰得头破血流，曾国藩的公式想拿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只落得一个愚昧落后的笑柄！公式主义的破产，也就是客观唯心论的破产。但是你们也许要问了："不错，公式主义固然是这样荒谬的，难道黑格尔的问题也是这样简单吗？这样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你只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想把它驳倒，这未免太轻率了吧？不是马克思也曾称赞过黑格尔的哲学吗？"请不必着急，让我慢慢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想这样轻率地把黑格尔的哲学简单地一笔抹杀，问题是要有分析。要分清楚黑格尔的哲学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荒谬的部分。不错，马克思称赞过黑格尔的哲学，那是只称赞他的合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他的辩证法的方法，这种方法承认世界上一切事物永远变化发展，这是和事实一致的、合理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连他的荒谬部分也加以称赞。这荒谬部分，就是他的客观唯心论。要知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唯心论是坚决反对，并且给予过彻底的驳斥的。马克思怎样驳斥黑格尔的唯心论呢？在根本上说来，他也不外是指出了它的公式主义的荒谬性质。黑格尔写了一本叫做《论理学》的书，把绝对精神写成一套固定了的思想公式，并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些公式。马克思的驳斥，主要的就是指出黑格尔的思想公式（也叫做唯心论体系）常常和事实不符合，并且和他自己的辩证法的方法也有冲突。辩证法承认事物是永远的向前发展，而唯心论体系却又要把这种发展死死的限制在一些思想公式的框子里，因此使得他的辩证法也受到大大的损害，成为不彻底的东西。马克思称赞黑格尔的辩证法，说这是他的哲学的合理核心，但同时又指斥他的唯心论体系，说这是一个荒谬的外壳，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也有公式主义的性质

所以主张要打破这唯心论的外壳，以便救出它的合理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怎样打破黑格尔的唯心论外壳呢？那就是抛弃一切死的“公式”、“体系”，切切实实地研究活的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这样就采取了唯物论的世界观，把黑格尔的唯心论的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论的辩证法。

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二元论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混合物，不是第三种哲学

现在我们要先讲一下二元论在招牌上所看见的花样，然后再讲唯物论。俗话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很好用这句话来说明。以前早已说过，二元论并不是唯心论和唯物论之外的第三种哲学，只是把两种世界观勉强硬凑在一起，成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思想的混合物。二元论的哲学表现一种动摇的立场，它既不敢彻底的主张唯心论，又不愿完全赞成唯物论，想把一种荒谬的思想和一种合理的思想调和起来，就好像拙劣的画师，既不愿把人完全画成鬼样子，又不能或不肯切实认真地画出一个正确的人像，结果他所画出来的东西，就好像是鬼和人的混合物：看起来像鬼，又有点像人。总之，绝不是鬼和人以外的第三种东西，而只是疑似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哲学的二元论就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之间疑似和摇摆的东西，它有时像要偏向唯物论，有时又在实际上和唯心论、宗教迷信等打成一片。其中道理请让我们慢慢解释。

世界上最有名的二元论哲学家，就外国来说应该要数 18 世纪末叶时候德国的康德。如果他的前面挂着那一块招牌，他会怎样

去了解它呢？他一定首先承认，这招牌是客观的东西，是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并且它的本身是物质。但如果你再向他追问："你所说的这招牌的物质是什么？是木头吗？是金属吗？"那回答一定出乎你的意外。康德的回答是："物质固然是物质，但那物质的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你反驳他，说："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呢？只要敲一敲声音，掂一掂重量，或者再试一试它的坚硬如何，不是就很容易判断是木头或者金属了吗？"康德就会很狡猾地把你驳回来："你所说的重量、声音以及坚硬等等，都是我们人的感觉。你所知道的只是这些感觉。你把某些感觉联合起来，说这是金属，或者是木头，所以，你所谓木头，或金属，都只是一团感觉集合起来的名称。除了你的感觉之外，你不知道任何东西，外界存在的那木头或金属的本来面目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到的。"康德的哲学思想的特点，就是认为物质的本来面目（康德叫做"物自体"）和我们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他一方面承认物质是存在的，并且承认我们的感觉是由于物质和我们的感官接触才引起的，就这一方面来说，他是赞成了唯物论。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只是一些感觉，我们不知道"物自体"是什么面目，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自己的主观感觉里过日子，这样一来，又成为主观唯心论了。这样，康德把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硬凑在一起，就成了他自己的二元论。

康德的二元论，是把唯物论和主观唯心论硬凑在一起

康德的二元论，是偏向唯心论方面的，他的哲学里有许多漏洞，恰恰适合替唯心论开后门。首先有人就要问他："你既然说没有办法认识物质的本来面目，那为什么你敢断定它一定存在呢？譬如，你前面有一间屋子，当你还没有方法认识它的内部的时候，你

怎能断定里面一定有人呢?"唯心论哲学者就常常抓着康德哲学思想里的这样一个漏洞,说他既主张我们不能认识到屋子的内部,却又武断说里面一定有人;说他一方面主张不能认识"物自体",一方面又偏要说"物自体"存在,这在道理上就讲不通。要想把道理讲通,只有取消二元论,或者站在唯物论方面,承认感觉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的反映,我们通过感觉就可以认识"物自体",这样我们肯定"物自体"存在就有理由了;或者相反的,干脆否认"物自体"这东西的存在,跟主观唯心论一样地主张世界就包含在我们的主观精神里。康德的学生和他的许多后继者,都走了后面的一条路,把"物自体"干脆丢掉,以后就发展成有名的德国唯心论。这德国唯心论变来变去,最后就出现了黑格尔的哲学,又成为客观唯心论,这是以前我们已经讲过的了。至于康德自己,最后也是偏到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方面去。因为还有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逼着他不能不走向这方面去:世界的本身是物质的,我们也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内部生活的,但是我们却看不见这世界的本来面目,那我们的生活不是就像瞎子走路一样的危险了吗?而且也许,我们的情形比瞎子更坏吧?因为瞎子虽然没有眼睛,还可以利用触觉和利用棍子来摸索道路,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方法摸索我们的道路。我们就好像梦游病者,只能看见自己的梦,自己的感觉,前面有危险的悬崖,我们也不可能自己觉察。这样,世界上的人全是梦游病者,为什么都能好好的生活下去呢?为什么人类在生活中还不至于莫名其妙地落到"物自体"的悬崖下去呢?如果康德肯丢掉唯心论,他对于这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因为他可以改变他的主张,承认感觉是"物自体"的反映,我们的感觉能够引导我们认识物质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能够看清道路,不至于

康德的二元论,是偏向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方面的

在悬崖前面失足。但是，康德不肯丢掉唯心论，一定要坚持二元论，结果他就只好偏向唯心论方面，作了一个带宗教迷信味道的解答，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失足，“是由于幸运”。这样，命运之神的心意，就被康德看做世界的支配者了。

“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画师要把鬼相和人相混合成既不是人又不是鬼的第三种独立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或者更像人一些，或者更像鬼一些。二元论者在道理上也是不能独立地站稳脚跟的。它如果不偏向唯物论，就一定要偏向唯心论和宗教迷信，否则它本身就有一大串难题解决不了。要想把少数孤家寡人决定一切的专制思想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时势的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要一个人不放弃公式主义而又能够按照事实情况灵活办事，也是做不到的；要希望一个有速胜论思想的人执行持久战的战略一定要发生危险。中国两千年前有个孟轲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同时吃到鱼和熊掌两样食品，但是不可能，那只好选择一样，丢掉鱼，吃熊掌了。”二元论者想同时把唯心论和唯物论都吃进自己的哲学肚子里去，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免不了要害消化不良症的。那怎样办呢？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抛开二元论，在两种世界观中选择一种，而丢掉另一种。选唯心论好不好？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论曾这样做过。但唯心论的情形，我们已经讲过，不论是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都是荒谬不通的思想，都会要把人引进宗教迷信的圈套里去，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它。因此，问题的解决是很明白的：我们要选择唯物论，而丢掉一切种类的唯心论；要反对少数天生优秀的头脑决定一切的反动思想，反对不顾客观事实、只凭主观感想办事的错误想法，反对“公式主义”等等，而要相信广大劳动人民力量，要在做工作时注意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要按照事实的具体情况灵活解决问题……。

唯物论首先要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物质

现在我们就要详细说明什么是唯物论了。

唯物论的一个起码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承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或者说，世界的一切现象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如果连世界的物质性也不承认，那怎么还能叫做唯物论呢。但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有人还要进一步问：你所谓的物质，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对这一个问题如果答复得不好，你的唯物论就往往站不住脚，而且会在无意中被唯心论所打败。

例如我们平常往往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一提到物质的时候，就以为是指某一种僵死的，自己本身永远不会变化活动的东西，例如说到木头和石头是物质时，就把木头石头看做是自己永远不会变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简单的看法来看物质世界，那么，我们的唯物论包管站不住脚！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世界，是包含着千变万化的现象，包含着继续不断的运动和发展。如果你说物质自己本身不会变化活动，那么人就要问你这些千变万化运动发展的现象是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说物质自己不会变化活动，那么我们势必要承认世界上除了物质之外，还得要有另外的一种力量，来推动物质，使他发生变化运动。是什么力量呢？如果你要假定世界上的事物，除了物质现象之外，还有其他东西，那么这东西不是别的，自然就是精神。你既然认为物质自己不会运动变化，那你就势必要承认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是由于精神力量的推动，也就是在事实上要承认精神支配世界。这样你就完全失去了唯物论的立场，你不但会成为承认物质、精神各自独立并存的二元论者，而且简直要成为主张精神高于一切的唯心论者了。而且你这样思想，早已普遍的受到

如果认为物质不会自己变化活动，就不能站稳唯物论的脚跟，就会落进灵魂不灭的迷信思想里

宗教迷信家的利用，他们把世界看做是耍木头人戏。把物质看做木头人，它的背后隐藏着神灵，物质的运动变化，在宗教迷信者看来，却是由神灵在冥冥中支配推动的。人的身体是物质，人的身体所以能够活动，全靠在躯体里有一个灵魂，灵魂一离开，躯体就失去一切的活动能力，这就是死亡。大家知道，这正是宗教迷信里最普遍的灵魂不灭的思想。你如果把物质世界看做僵死的东西，你就不可免的要做灵魂不灭思想的俘虏。

灵魂不灭思想的谬误

当然，灵魂不灭的思想，也是很幼稚、很容易看出它的不合理的。只就最重要的一点来说：它把精神或灵魂看做能够自由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在事实上就永远得不到证明。我们在事实上所见的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附属在一定的物质上表现出来的，例如说到感情和思想，我们只能看见张三或李四的某种感情和思想，绝不会在张三李四之外，在什么地方发现一种独立存在的感情和思想。迷信的人会说梦中的鬼怪神灵就是独立存在的精神，殊不知那只是他自己的梦，那只是他自己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东西，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头脑，同时这种幻想的产生，也由于白天看见或者想到了什么东西，也不能离开一定的所感所想的对象，因此绝不能说梦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总之，“绝不可把思维和思维着的物质隔开”，这是马克思的名言。再说，就算退一万步讲，假定精神是能够离开物质而存在，那也不能答复这样的问题：无形无体的精神，怎么能推动有形有体的物质呢？例如人把石头抛起来，这是人用自己的物质的手把它抛出来的，不是人的精神想要它飞，它就能飞起来了。你们试试看，你们单单心里想要一块石头飞起来，它是不是就能飞呢？绝对不会的！世界上绝没有人心想要怎样便怎样的如意事，只有经过物质力量才可能推动物质运动，单单精

神作用是什么也推动不起来的。要木头人戏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物质的人，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无形无体的精灵鬼怪所耍的木头人戏，如有人说到这些事，那一定是巫神蛮婆假造的鬼话。

但是，不管“灵魂不灭”的思想是怎样幼稚而不合理，你如果对于物质的性质没有正确的了解，你就不但不能驳倒这种思想，而且不知不觉就要被这种思想所征服。要避免这一个危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切不要被平常的粗率而错误的想法所束缚，也就是不要把物质看成不会变动的僵死的东西。你要承认，物质本身自己就会变化发展，世界上的一切千变万化运动发展的现象，都是物质自己的变化，不需要任何物质之外的神秘力量来推动。如果你的思想不是那样粗率，而是能够比较仔细一些看问题，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就是木头石头，也并不是本身丝毫不能变化的，例如木头会腐朽，石头会风化，不过这种变化很缓慢，要经过较长的时间，表面上一下子看不出来罢了。

唯物论不但要承认物质自己会变化发展，而且要正确了解物质怎样变化发展

但是，仅仅笼统承认物质自己会变化发展，还是不够的。因为有人还要问，你所谓的变化发展，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发展？你对于这问题如果答复得不对，你也就不能把唯物论的世界观坚持下去。为什么呢？让我现在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证明给你看。过去有一种唯物论，叫做机械的唯物论。在欧洲，这种唯物论是从 17 世纪就流行起来，一直到 18 世纪末了，还在法国大大的发展。这种唯物论在那时是最进步的哲学思想，它曾经和宗教迷信思想坚决战斗过。它否认物质的变化发展是由物质以外的任何力量推动的结果，它认为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都是在物质本身内部可以找到，它认为物质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就是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这样，机械唯物论就把鬼神的支

配作用从自己的世界观里驱逐出去。但是，这种唯物论思想就是有一个缺点，它把物质的变化发展的性质看得太简单了。它认为世界上物质的变化在根本上说来就只是机械的变化，而机械的变化归根结底就是由于一种机械的力(如吸引力、向心力、离心力等)所引起的位置的变化(一件东西从这里移到那里)和数量的变化(一件东西增多了或减少了，集合了或分散了)，而说不上真正性质的变化(一种东西变为另外一种东西)。它认为世界上一切千变万化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可以看做各种不同的位置变化和数量变化的表现。世界上不会有真正新的东西，世界的舞台上转来转去的都是一些老的角色。世界上如果出现了新的东西，照这种唯物论说来，这并不是真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是由于某种机械力的关系使原来隐藏在什么地方的东西显露了出来，或者是原来分散的东西突然集中起来，我们以前以为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因为以前隐藏着或分散了，我们注意不到的缘故。好像军事上所谓的“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的变化一样，一个军队“化零为整”，并不是由无到有，而是由分散到集中，“化整为零”也不是由有到无，而是由集中的大队伍化为分散的小队伍。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归结为位置和数量的变化，也就是机械的变化。它认为只有机械的变化才是根本的变化，真实的变化，而其他的各种变化，例如新的东西的产生和旧的东西的消灭，都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上还是位置和数量的变化的表现。

机械唯物论认为一切物质变化只有位置和数量两种变化，把物质变化看得太简单了

机械唯物论认为世界上一切物质的变化根本上只是简单的机械变化，他们把各种物质和物质中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一概还原为一些很简单的机械的关系和作用，如相互推动、吸引、冲突、摩擦之类。机械唯物论认为这些关系和作用才是物质中间

的真实关系和作用，而其他的一切关系和作用，如社会现象、人的身体上的生理变化等等，都是表面的，而且归根结底，都可以用这一些机械的作用和关系来解释，都可以看做是机械的关系和作用所引起的结果。有一个法国唯物论者叫做拉美特利的，甚至于写了一本书，名叫《人就是机械》，这书就是用机械的关系和作用来解释人的身体的生理现象。

机械唯物论不能说明新的东西的出现和旧的东西的消灭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机械唯物论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了。照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看来，那么世界上就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新的东西，也不会真正有任何旧的东西消灭掉。这种看法，和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就不大符合。我们在世界上就常常看到许多新的东西出现和旧的东西消灭，这些现象如果硬要依照机械唯物论的道理，就会解释不通。特别是社会现象：就新生的来说，例如中国有了共产党，这是1921年才出现的；中国有了解放区，这是1927年以后才产生的；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世界大事；就消灭的来说，例如德意法西斯国家被打垮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死了；大清帝国被推翻了，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没有了。如果硬要照着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来说明这些事实，那么我们势必要说中国共产党，解放区和苏联，都是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有的，不过以前是分散和隐藏在什么地方，现在才集中出现，这岂不要闹大笑话？又如果说德意法西斯国家、希墨罪魁、清朝、袁世凯北洋军阀等等都没有消灭，而且永远也不消灭，我们觉得它消灭了，只是因为它们都分散隐蔽到世界的什么角落里去了，这岂不要令人骂你发疯?！你们也许要问了：机械唯物论既然是这样荒谬的思想，为什么从前还有许多大哲学家提倡它呢？并且为什么曾经要把它看做进步的思想呢？要了解这问题，必须注

意时代的条件。机械唯物论是十七八世纪的哲学，离现在两三百年了，那时世界上的科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那时主要的科学就是机械科学。那时的社会，是正当欧洲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要求推翻封建社会的时候，但资产阶级中间对于社会问题没有人用科学的方法来好好研究，没有深刻了解当时社会变化的真正性质。因此，那时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只能利用机械科学作思想武器，来反对封建思想和宗教迷信，因此在那时提倡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在反对封建思想、宗教迷信、提倡科学这一点来说，还是在人类思想上起了革命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世界上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也有了最进步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并且我们已看见了无限复杂的新旧事物产生和没落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还提倡机械唯物论，那就成为落后反动的思想了。十几年前，苏联有一部分人提倡机械唯物论的哲学，受到了苏联哲学界严厉的批评。

机械唯物论在两三百年前的欧洲是进步思想，到现在就落后了

凡是否认物质本身能变化发展的唯物论哲学，都叫做形而上学的唯物论。

不承认物质能变化发展的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

机械唯物论虽然主张物质有位置和数量的变化，实际上不承认物质本身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不承认新旧事物的变化，因此也仍然是形而上学唯物论的一种。和形而上学唯物论相反的，是辩证法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哲学。

从下面一段起，我们就要开始说明什么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了。

六、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

——辩证唯物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举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天气冷了，如果我们衣服准备得很少，那么即使心里想不受冻，也不可能。在反动派统治的穷人很多的都市里，每年冬天要冻死很多人，这些人是不是自己愿意死呢？当然不是，但是他们还是死了，这在他们就是大不如意的事。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速胜论的思想出现呢？就是因为中国有一部分人幻想马上得到胜利，但是抗战却继续了八年，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不如意的事了。共产主义社会是很好的理想，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只能首先取得新民主革命的胜利，然后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到较远的将来再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事情对于我们也要不如意的。照这样，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世界的事物是在我们主观心意之外独立存在着

我们如果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总括起来，仔细的想一想，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在我们的主观心意之外独立存在着，它们的发展变化的情况不是依赖我们的心意为转移的。世界上的事情，绝不是我们随便想要怎样便会怎样，相反的，常常是我们希望这样，而偏偏事实上就不会这样。如果我们按照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想要单凭我们的主观心意去随便决定一切事物，想要一切事情都照我们主观希望的去做，例如硬要在中国立刻实现共产主义，硬要计划使抗战三个月胜利，那结果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做不通！也叫做碰钉子。主

观唯心论不对，那么客观唯心论又怎样呢？我们的主观心意既不能随便决定事物，那么是不是也可能有一种非常伟大的客观存在的心意，能够对一切事物起决定作用呢？是不是有神灵呢？那么，也请试一试吧，就照着求神拜佛的公式，做一番祈祷吧。冻死的人能因祈祷而复活吗？持久战能因祈祷而变为速胜的吗？显然是不能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四五十年前，中国曾有过一次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反对“洋人”，表现了中国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反抗。但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用迷信落后的方式来组织群众，标榜能够用一种神术，抵御枪炮，打退洋鬼子。结果怎样呢？结果大家都知道，神术毫不灵验，义和团的群众成千成万的壮烈牺牲了，八国联军还是打进北京城里来了。这类历史的事实，足够证明，世界上的事物绝不受任何神灵的支配，也不受任何类似神灵的客观心意的支配。

世界上的事物既不受我们人的主观心意随便支配，也不受客观的神的心意支配，这一点既然得到证明，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世界的一切现象，根本上是物质自己的变化、物质自己的发展。物质变化发展的最后原因，不能从精神力量里去找，而只能在物质自己的内部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去找。衣服少了受冷，是北风跟我们的皮肤发生作用。日本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发生关系，就造成持久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作用，就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总之，物质内部和物质相互间发生关系和作用，就形成世界一切事物千变万化运动发展的现象。如果你再仔细研究和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各种物质的内部关系和相互作用，都有一定的特点，这些关系和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变化发展，也有一定的经过和结果，一定的秩序和过程。北风吹

在皮肤上所给予的感觉一定是冷，而不是热；帝国主义一定要侵略弱小国家和民族，被侵略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于侵略一定要反抗，而不是屈服，甘心屈服的一定只有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不是大多数的人民。这些关系，都是一定的。在冷风中不穿衣服，经过相当的时间人一定冻死；中国广大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经过持久的战争，而结果日本侵略者一定要失败。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事物的内部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有一定的特点和一定的过程，这种一定的特点和一定的过程，就叫做事物发展的规律。世界上的事物，就是依照本身所具有的一定的规律变化发展，并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它们之所以一定要如此发生关系和作用、一定要如此发展和变化，这是它们自己的规律使然，而不是由于人的心意支配或者鬼使神差的结果。

事物是依照它本身的规律而发展变化并互相发生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懂得，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有不如意和碰钉子的事了。这个世界是在我们的心意之外独立地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依照它们自己本身的规律变化发展，不管我们的心里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它总是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变化发展。我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呢？因为我主观的心意里所希望的，我所高兴愿意的，常常与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不符合；在这种时候，事物是服从我的主观愿望呢？还是各自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变化发展呢？当然它一定不会服从我的主观愿望，而一定要照它本身的规律变化发展。因此，事情的发展当然就不如我的意了。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能够捕水边的虫子，但不能捕空中的天鹅，这是物质的一定的规律。如果你所希望的事情和物质规律相违背，例如说，要想

不如意和碰钉子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事物规律不符合

在冬天的田地里种出西瓜来，要希望在冷天光着身子迎风而不发抖。要希望人能长生不老，要希望帝国主义对中国没有侵略的野心，那你就必定要落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笑柄。如果你不肯服气，一定不顾事实的规律，一定要依照你所希望的去做，那么，请试试看吧，包管你费尽了天大的力量，还是得不到半点结果，还是要失败，碰钉子！

希特勒想独霸世界，日本军阀想征服地球，墨索里尼想使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支配一千年，这是全世界人人明白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好典型。世界大势趋向民主，趋向社会主义，专制独裁终归要消灭，帝国主义终归要死亡，这是世界发展的规律。不管法西斯头子怎样梦想，世界大势仍要这样发展下去。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都失败了，因为他们硬要违反世界的规律，所以碰了大大的钉子。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子蒋介石想学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已经大碰钉子。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动派，想使法西斯残余复活起来，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反对世界人民民主运动，同样要大碰钉子！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变化发展规律，对不同的事物不能用同一个简单的看法去对待它们

世界上的事物是千种万样，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到国家大事，从地上的河流山川，到天上的日月风云，每一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和别的事物的规律不同。我们研究各种事物的规律，可以发现其中有某些规律是各种不同事物的共同的规律，这些共同的规律我们叫做普遍规律。例如过去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社会，但除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将来要在全世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各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阶级斗争的，这就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通的普遍规律。又例如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它们的变

化发展都是不会违背辩证法的法则的，所以辩证法又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但是，除了这些普遍规律之外，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又各自有着它的特殊性，有着与别的事物互相有区别的特殊规律。植物生长的规律和动物不同，各种动物的生长规律又互相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会发生失业、恐慌，社会主义的国家却人人有工作，经济天天向上发展。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经常要依附一个帝国主义，即使如在抗日战争中那样有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某一帝国主义，也经常会发生动摇投降的倾向；广大人民、尤其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却始终采取坚决反抗的立场。国民党的官员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批地公开地投降敌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一个也没有投降敌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是经过防御、相持、反攻的三阶段，是以游击战为主而辅之以运动战。苏联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却比较迅速地得到胜利，并且只经过防御和反攻的阶段，而采取的战术是正规战争而不是游击战争。不同的事物，其规律性也有不同的特殊表现。因此，我们的思想和愿望，对于不同的事物，也要分别对待。如果对于不同的事物，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和愿望，那么，我们的这种想法和愿望，即使能适合此一事物的规律，但却一定要违背另一事物的规律；在此一事物上能够如意，在另一事物上却要碰钉子。例如我们相信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一定能坚决抗日，这种想法是合乎事实规律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蒋介石代表的一部分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以同样简单的想法去对待，说他们也是中国人，以为他们也一定坚决抗日，那么，事实的规律就要打破你这一个幻想，就要给你碰钉子。在抗战中间，的确有一些人碰了这样的钉子。由于这个钉子的教训，这些人才知道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分别看待，才知道正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广大人民，是首先团结和组织广大的劳动群众来进行战斗，而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却要经常警惕他们的投降倾向，和这些倾向作坚决斗争，加以揭露、打击，而不要对他们抱片面的幻想。

公式主义者就是不懂得不同事物有不同规律

总之，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其普遍的方面，又有其特殊的方面。研究事物的规律时，自然不能忘记它的普遍的方面，但尤其要注意它的特殊的方面。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我们也就要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才能够免于碰钉子。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只看见事物的普遍规律而不注意在不同事物里的不同的特殊规律，因此就用一种简单的看法去对待一切事物，这样就会要犯叫做“公式主义”的错误。“公式主义”是什么？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它以为世界上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死的思想公式，能够支配一切事物，因此只要我们仅仅抓着这一个死的公式，就能够当做万应灵药，来对付一切事物。其实，如果我们让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受到死的公式的束缚，而不能适应各种不同的事物规律，那我们所有的，将不是万应灵药，而是到处使我们碰钉子的有害的毒药！

好了，现在我们把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大体上讲清楚了，唯物论承认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依赖人的心意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都是具有自己的变化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的东西。但仅仅这样说，还不能明白地把机械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分清楚，因为机械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论同样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和有它自己的变化规律的。要怎样说才能把两者分别清楚呢？我们已经知道，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的变化的根本形式，只限于位置的移动和数量

的增减，而不承认物质本身能发生性质上的真正变化。机械唯物论把机械运动的规律，当作一切事物变化的惟一普遍的根本规律，想用简单的机械规律来说明一切现象的变化。17世纪法国的笛卡尔用机械规律来说明动物的生活现象，18世纪法国的拉美特利用机械规律来说明人类身体的生理现象。有些机械唯物论者想用机械的规律来说明社会的现象。说到这里，我们又看出机械唯物论的一个毛病来了。原来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公式主义的圈套里去，它已经不是彻底的唯物论，不能认识到各种不同事物的不同规律。它错误地把一个简单的机械规律的公式当做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它不知道机械规律只是一部分自然现象的特殊规律，这一个特殊规律，绝不能代替一切事物的共同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的共同的普遍规律，只有根据各种科学（包括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概括，才能够揭发出来。机械唯物论时代的科学水平，还不能做出这一种概括，所以，它在解释自然界的机械运动现象时，虽然也还能够保持一些唯物论的观点，但对于其他的现象，特别是社会现象，就站不稳这一个立场，就只能用简单的公式主义的方法任意胡说了。这种唯物论自己既然站不稳脚跟，因此也就不能够彻底打败唯心论。相反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时，德国的唯心论曾经把机械唯物论打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勇气进行坚决的反封建革命斗争，因此就丢开了唯物论，而采取了唯心论，把唯心论当做和封建宗教势力妥协的思想桥梁，但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本身的弱点，也是战败的一个原因。辩证法唯物论就没有机械唯物论的弱点。它不但承

机械唯物论用机械运动作为公式说明一切，不是彻底的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事物的性质变化，以及事物的产生和死亡的规律

认世界上一部分事物具有机械力学的性质，承认数量和位置的变化是某些事物变化的主要形式，但它更重视的是事物自己本身的性质的变化，注意到一事物在适当发展条件下，能转变为另一事物。辩证法唯物论不但承认机械运动的规律是物质运动的真实规律，而且指出化学的变化，生物的进化、生长，社会的发展、变革、斗争，也各有各的特殊规律，指出每一种事物有它自己独立的规律。因此，机械的规律绝不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本身也只是一种特殊规律。只有根据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概括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共同的普遍规律。世界上经常有新的事物出现，也经常有旧的东西死亡。什么事物该新生起来，什么事物该死亡没落，也是由于事物本身的规律使然，不依赖任何主观的心意为转移。结了婚的夫妇，一定要生小孩，除了有病或其他不正常的条件，要想这新的生命不产生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人太老了一定要死，即使不愿死也没有办法。奴隶社会在世界上早消灭了，封建社会也将近完全消灭了，这是社会历史的规律，谁要想恢复奴隶社会和全盛时代的封建社会，那是妄想！法西斯统治世界的幻想也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也日愈走近死亡了，现在世界上新生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一定要在全世界生长起来，并且最后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规律，谁也不能违抗。以美国的反动派为首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动派，要想用一切力量阻止社会主义的生长，也一定要大碰钉子，就如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样！

我们讲了上面一大篇，有的人也许会觉得不耐烦，要提出质问了。他说："请不要再讲下去了吧！我已经发现了你的大漏洞。你说你在讲辩证法唯物论，我看倒有点像宿命论。你说一切事物都有它本身一定的变化发展规律，人的主观心意绝不能任意违反

这规律，这不是等于说一切都以命定、一切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么，人在世界上岂不是只有听天由命或者随波逐流了吗？人的任何主观努力和奋斗，对于世界岂不都是徒劳了吗？这难道还不是宿命论吗？”

唯物论认为人的心意不能随意决定事物，但决不是宿命论

这个质问发的很妙，问得很有些道理，但是，这绝不会把我们问倒。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和宿命论是有根本分别的，他说没有区别，是因为没有完全了解。不错，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事物有它本身的规律，我们的主观心意不能任意和它违背，因此我们也不能依我们主观心意随便决定一切，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是命运的奴隶，不能对世界上的事物作丝毫的改变。说农民不能希望冬天在田地里种出庄稼，并不等于说农民不能设法改良耕作法，使庄稼长得更好；说我们不能希望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我们不能幻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坚决抗日，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规律，拉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到抗战营垒方面来。按照宿命论的思想，就要把上面的“不等于”看作“等于”，因此就要取消一切主观努力，反对农民改良耕作法，反对抵抗帝国主义，反对在抗日战争中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暂时的统一战线。但是，按照辩证法唯物论，对事情就不能这样消极地来看，

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人就可以利用这种知识去改变世界

而一定要从积极方面来看：正是因为知道冬天在田地里不能种庄稼的规律，因此就可以选择最适宜的天气，采取最适当的方法，使耕作改善，生产增加；正是因为知道帝国主义一定要侵略中国，并且知道只有依赖广大人民的反抗才可以战胜侵略，因此我们就要发动广大群众，争取胜利。由此可以知道，承认事物有自己的

独立规律，并不见得就会把我们引到宿命论的消极无能的泥坑里去。恰恰相反，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以后，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规律的知识来正确规定我们主观努力的方向，我们就有可能避免碰钉子、走错路，我们就能按照事物自己的规律，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工作，使工作容易成功。而只有违背事物规律的唯心论观点，才会使我们到处表现无能，到处碰钉子，才会使人误认为自己是在受命运的播弄。所以宿命论只是和唯心论有联系的思想，只是在唯心论者碰了太多的钉子之后，以为一切没有办法，才会发生这种“听天由命”的错误思想。

只有唯心论才会碰钉子，才会成为宿命论

唯心论把主观精神放在第一位，以为世界一切事物都受心意的决定，这是错误的。唯物论把主观精神放在第二位，认为人的心意如果违背物质规律，就没有丝毫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的心意的作用完全要被否认了。人的思想如果能够与事物的规律一致，如果能认识这规律，适当地利用这规律，它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利用这些规律知识，去改变世界上的事物，就能创造许多新的事物。例如能制造飞机飞上天空中，能把地瘠民贫的陕北地方的人民变得丰衣足食，能把分散落后的农民改变为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队伍，能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人就能改变世界，利用世界上的物质来为自己服务。

我们不能像宿命论者那样，甘心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我们要把这些大山完全推倒。但是不是心里想要它倒，它就自然而然的倒了呢？这是唯心论的妄想，世界上绝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为了推倒我们头上的大山，必须懂得怎样才能使山倒的规律；要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

革命胜利不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必须要认识革命规律，要有正确的斗争指导

等方面的复杂斗争，要学会认识这些复杂事物中的各种规律。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规律，就一定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如果不能，那就会失败，就会永远被压在大山下面，不得翻身。我们说革命一定会胜利、反动势力一定要失败，这个“一定”，必须包含着这一个条件，就是：指导革命者必须能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斗争规律，给群众以正确的指导，而不要犯错误。不能认识各种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斗争规律，就要犯错误，就会使革命碰钉子。我们今天的革命之所以能走向胜利，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已经有了能够正确认识这些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能够有把握领导中国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正确地进行斗争，所以就不致于像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及1924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那样的失败了。

要认识事物规律，必须对每一事物的情况有具体了解

要怎样才能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各种规律，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要对于每一件事物的情况有具体的了解。即使是同一事物，情况不同，规律也就不同。例如要把山推倒，如果我们有开山的机械，就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有“速胜”的规律。如果没有这种机械，只能用人力挖土、挑土，这又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希望“速胜”，而必须用愚公移山的办法，作长久坚持的打算。如果我们能认清这个规律，照这个规律去做，一担一担慢慢挖，那么，时间虽然长一点，还是一定可以有胜利的把握。如果我们不按照这规律办事，一定要和开山机械赛快，那么，事情一定不如意，一定弄得筋疲力尽而毫无成功希望。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能像苏联

打德国那样较快地转入进攻，而必须作长久的坚持，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后来抗战转入反攻阶段，苏联参加了对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很快地投降，这就是好比有了开山机械，日本法西斯的山就倒得快了。中国革命是带有长期性的，但在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强大了，当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时，革命很快就胜利了。

怎样才能了解每一事物的具体情况，正确认识它的规律呢？这就不是马马虎虎随便看一看，心血来潮地偶然想一想，就能达到目的。客观事实常常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就必须要下一些苦工夫，对你所要认识的事物，加以仔细的调查、研究，以便详细认清它的具体的特殊情况，然后才可能认识到它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革命的指导需要我们作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如果不经调查研究，只凭自己主观的"想当然"，乱说一顿，例如把中国抗战和某些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样看待，把城市办学校的工作和偏僻乡村办学校的工作同样看待，用这种轻率的主观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工作，一定要违反革命斗争规律，一定要犯错误。在这种时候，即使你嘴上讲很多唯物论的革命的名词，你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是唯物论，而恰恰是唯心论，也叫做"主观主义"，你这样的行动，必定不能推进革命，而恰恰会妨害革命。这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了不少教训的。只有改变这种态度，才能使革命不碰钉子。

唯物论者必须凡事仔细调查，认真研究，才能认识事物规律，正确的解决问题

如果你有心要做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那么，对于你最重要的事情，就不是嘴上讲什么是唯物论，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有一套唯物论的本领。这就是说，你要使自己养成这样一种习惯：遇到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能够认真地作系统周密的

调查研究，把它本身的具体规律寻找出来，然后按照这规律去办事，去解决问题，去指导工作，使事办得好，问题解决得顺利，工作做得有成绩，不致于碰钉子，或至少不碰大钉子。我们以前讲过，革命的党和革命的阶级必须坚持哲学上的党派性，坚持唯物论的思想，反对一切唯心论的思想。我们所以一定要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甚至于要断送革命。坚持唯物论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在工作中，凡事认真调查，仔细研究。不调查研究，只凭想当然办事，就是唯心论，就是主观主义。一个共产党人如果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就表示他的“党性不纯”。为什么是党性不纯？因为有了主观主义的毛病，一定要使革命碰钉子，一定要把革命的事业办坏，这也就是没有能够负起一个革命先锋队员所应负的责任，没有能负起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这就是缺乏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党性。

中国革命现在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但要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复杂的斗争中，把这领导贯彻到各个地方各个斗争部门，就必须每一地方和每一部门从事革命工作的人，都能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能够在行动上坚持唯物论的观点，坚持哲学上的革命的党派性，坚决为肃清一切主观主义和唯心论而斗争。这就是要凡事谨慎地从事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认真注意掌握其中的具体规律，正确指导群众进行斗争。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只要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能够？怎样才能够？这些问题等以后慢慢来谈。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七、用照相作比喻

——反映论

照相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事。谁都知道，要照相，总得要有一个照相机，这是一种方形的暗箱，前面装着一个镜头，外界事物的影像，经过镜头射进暗箱内部，暗箱内部装着涂有化学药品的底片，影像射到底片上，使化学药品发生变化，照像的手续便告完结，再把底片拿去冲洗、晒印，影像便映到纸上来了。

暗箱、底片、镜头、以及其他附带的许多东西，是每架照相机所必不可少的要件。这些东西适当的配合起来，就构成照相机，就具有摄取影像的作用。重要的是不单要有这些东西，而且要把这些东西适当配合，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具有特别作用的机械，没有适当的配合，那么，镜头永远只是镜头，暗箱永远只是暗箱，底片也只是底片，绝对照不出像来。人类认识周围的事物，就某一方面的情形来说，与这照相机的作用有点相似（当然绝不是说相同）。通常我们总是说：人类有感觉、有思想、有精神、有意识，也就是说，人类有认识周围事物的能力。当我们碰到一间房屋时，我们的意识使我们知道这儿有房屋；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的精神就知道这儿有一条路；我们的国家被侵略，广大人民被压迫，我们精神上认识到要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作战，

意识、精神以及认识能力，是一种最高级物质的作用

我们的民族意识使我们懂得要坚决和侵略者战斗，等等。我们应该知道：这认识的能力，这精神和意识，也就仿佛照相机的摄影的能力一样，不是凭空存在的。要有镜头等等适当配合起来，才能摄影，同样，要有人的活的肉体，以及健康的头脑和五官的组织，才会有正常的精神和意识的现象，才能够认识事物。世界上的物质很多，有矿物和植物，它们也有一定的组织，但是不能够认识。也有很多的动物，大部分都没有认识能力或认识能力很薄弱，只有一部分高等动物才有较多的认识能力。像人类这样的智慧，却仅仅是人类这一种最高等的能进行社会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活动）的动物才能具有。所以，人类的意识、精神，人类的认识能力，是离不开一种最高级的物质，离不开人类的肉体和五官，离不开人类的社会生产和阶级斗争，它是这一种最高级物质所发生的作用，就仿佛摄影能力是照相机的物质作用一样。

人的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

还有，照相机所摄的影像，是外界事物的影像。外界没有的东西，绝不会在底片上出现。人的认识，也是外界的反映，外界有什么存在着，我们也就只能认识什么。城市的知识分子初到乡下，往往要在乡下人前面闹笑话，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庄稼，因此就免不了要五谷不分。孙中山的言论里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马克思、列宁的书里从没有谈到反法西斯的世界人民统一战线。世界上所没有的、或是不曾发生过的、或没有接触机会的东西，也不会凭空在人的思想意识里出现。做梦和神话，似乎是与外界物质无关的单纯主观的想像了吧？不错，人类能够凭自己的主观活动，想像出一些似乎是客观世界所没有的神话来，这是照相机所做不到的。可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你就知道即使是梦和神话，它

的内容也是以日常见过的事物作基础的。如果世界上没有猪和猴子，小说家绝不会造出猪八戒和孙悟空的幻想。

精神和意识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东西，物质才是第一位的东西

摄影必须有两个物质条件做基础，第一要有照相机，第二要有能摄的外界事物。人的认识也要有两方面的物质基础，第一是健全的五官和头脑，第二是直接或间接能接触到的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而人所有接触的事物范围，是决定于他自己的社会物质生活环境和阶级地位，社会物质生活环境和阶级地位不同，所接触的事物也不同，则认识也不同。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就没有认识，就没有精神和意识。认识、精神和意识，是高级物质的作用，它不是在物质之外独立存在的、第一位的东西，而是由物质派生的、第二位的东西，而物质才是第一位的东西。这是唯物论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喜欢寻根究底的人，可能要发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像照相一样，把外界的事物影像摄取到我们的意识里，但是，它所摄取的影像，是不是和外界事物一样的呢？我们所能认识的，的确是世界物质的真像吗？或者只是自己骗自己的假像呢？如果你相信我们能认识世界的真像，那就要把它为什么真的道理讲清楚。"

人的认识能否摄取外物的真相？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是需要回答的。因为在哲学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不可知论"，就主张我们不能够认识世界的真像，认为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的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得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天晓得！"说这话的人虽然不是在讲哲学，他往往是人在一件事情做坏了的时候偶然发出的叹息。但是在这种叹息中间，却包含着一种不可知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

人的认识能力表示绝望，认为事物的真像究竟怎样，只有天老爷才晓得，人是无法晓得的。在世界的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前面说过的康德派的哲学。他们的看法，若用照相作比喻，那他就说照相机所摄取的完全不是外物的真实影子。

“不可知论”认为人不能认识外物的真像

为什么呢？他们说：照相机的性质是这样的：它一方面虽然能够和外界接触而摄取影像，但另一方面却在摄取时把真实的影像改变了。试把照片上的人和真正的人比较一下吧，你就可以看见，照片上的人影是多么缩小了，颜色又只有明暗二色，嘴唇的红色和眼球的褐色，在照片上一点也没有了。还有，真正的人是活动的，照片上的人却永远只有一个死板的姿势。这一切，难道还能算是真正的人影吗？根据以上的理由，他们就断定，照片上的影子，是经过了底片和照相机本身的性质所改变，因此它与外物原来真像是完全不同了。由此推到人类的认识，他们以为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说：我们所能认识到的一切，都经过了我们的感官和头脑的一番改变，而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譬如这里有一块糖，我们觉得它是甜的，这只是我们舌尖上的感觉，离开了我们舌尖上的感官，甜的味觉就不会存在。同是小米饭，西北的农民觉得是很好的美味，拿到南方的有钱人的前面，那简直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小米饭究竟是好吃呢还是令人讨厌呢？这与小米饭本身性质都没有关系，只是人的主观作用不同，所以感觉也就不同。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广大人民的眼里是豺狼、是骗子，在中国反动派的眼里却好像又成了亲老子。“不可知论”者对于这种现象，又会下判断说：既然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的眼里，可以发生这样不同的感觉，这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感觉都是主观的，要认识美帝国主义者本身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达不到的事！

唯物论主张物质的真相可以认识，“不可知论”是不对的

好了！我们不要跟着“不可知论”跑得太远，要快回过头来批评批评它才行了。我们是赞成唯物论的，如果一直跟“不可知论”跑向前去，结果势必要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梦游病者的生活，这就是丢掉了唯物论，而只落得一个主观唯心论了。所以，要使我们的唯物论站稳脚跟，就必须把“不可知论”驳倒。聪明的读者在这里一定会问：“唯物论既然反对不可知论，那么唯物论的认识论一定可以称作可知论了吧？”是的，哲学史上固然从来没有人用过“可知论”这一个名词，但一定要说唯物论的认识论就是可知论，也并不见得就不对。唯物论不但承认客观世界里有独立地存在着的物质，并且认为物质本身的真相是可以认识到的。用照相的比喻来说，唯物论就认为照相机是能够摄取外界事物的真相的。为什么能够呢？让我们把“不可知论”驳倒以后，你自然就明白。

就从照片的颜色说起来吧。“不可知论”者因为上面只有明暗两种颜色，就以为完全不是外物的真像了，这是不是对呢？这是不对的。且不说现在早已经发明了天然色彩的摄影技术，就算照片本身的性质只能摄取明暗两色，而不能保持住唇的红色和眼睛的褐色，在这种情形之下，照片上的影像和原来的东西自然是有点不同了，虽然这样，你总不能说，那明暗两色的影像，完全是底片上平白无故发生的幻影，你总不能不承认，这影像根本还是由外物本身投来的。外物不同，影像也就不同，没有外物，也就根本不会有影像。同时，不论就影像的形态或内容来说，虽然由于底片本身特有的性质，使它不能反映外物的各方面的色彩，但它所反映的明暗两色，还是外物本身各种色彩的一部分，还是外物的部分影像。因此，你就不能说它完全不能摄取外物的景像，你

只能说它反映的不是外物的全貌，但总之它还是反映了外物的部分面貌。

一块糖，我们觉得甜，这甜味当然是舌尖上的感觉，也是我们主观上的感觉，但我们绝不能说它只是一种幻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这种感觉的的确确是由糖的本身性质所引起，如果糖的本身不能发生甜的作用，我们就万万不会有这种感觉。拿一碗苦药来叫你喝一下看，你还能说它是甜的么？除非你是疯子，或者因为你病了，舌头上的感觉麻木，或者你要故意骗人，否则你就绝不会说甜，而一定要说苦，这就可以证明你的味觉原来也要靠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来决定。所以，当我们说糖是甜的时，这是表示我们已认识到了糖的本身的一种作用，也就是认识到了一种物质的客观性质。同样，农民觉得小米是美味，而不会觉得观音土是美味，这是认识了小米的一方面的性质。美国反动派，对中国人民说来，像狼、像骗子，这也是美国反动派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些反映都符合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情况。由此可以知道，“不可知论”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外界事物反映到我们的主观意识里，并没有像“不可知论”所说的那样完全改过了样子，它仅只是不能一下子摄取外物的全部真相，但我们每一次的认识，只要是正常的认识，总可以反映外物的一方面的性质或一部分的真相。除了神经错乱的疯子，生理上不正常的病人，因各种原因而对事情抱有错误成见的人，以及故意要曲解事物真相的反动派或骗子之外，人们所有的认识都不会只是主观幻觉，都一定有一点一滴的客观物质的真实面影。承认外物能够被我们所认识，这是辩证法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

> 我们的每一次认识，都可以反映外物的一方面或一部分真相

唯物论的认识论，又可以叫做“反映论”。它承认我们的认识，

就是外界物质世界在我们主观里的反映，就仿佛照相是外物在照相机的底片上的反映一样，但是，这种反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认识事物的全部，每一次认识，都有一定的限制，都只能认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的面貌。“不可知论”夸大了这一个限制，断定说我们完全不能认识外物，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虽然不能一眼马上看穿事物的真相，但是我们可以慢慢一部分一部分认识，这样来一步步地达到掌握全部的认识。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活的，是能够运动发展的，对于周围的一切，可以逐渐地愈更完全地认识它。例如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在最初的时候(例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候)，只有关于外来的“洋人”压迫中国人民这种朴素简单的认识，显然是不完全的，可是不能说它没有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客观事实。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了，中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了一下中国人民与外来“洋人”的关系，才认识到压迫和侵略中国的不是随便哪一个“洋人”，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洋人”，这样的认识就比义和团运动时候的简单朴素的认识完全了。所以，人的认识也是运动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类逐步地走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

认识是运动发展的过程，逐步地达到事物的全面认识

人的认识可能发生错误

也许有人又要质问了：“如你所说，那么，人的认识都能够反映事物的真相，世界上岂不是就没有错误的认识了?”我们答复说：“我们主张人类有认识事物真相的能力，但并不因此就否认人的认识常常会发生错误。”例如唯心论的世界观就是错误的认识，这我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要坚决的这样主张。我们在前面也附带说到：疯子、病人、对事物有成见的人，以及故意要曲解事实真相的反动派和骗

子等等，他们的认识就是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因此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并不否认人的认识会发生错误。我们所要否认的，只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特点，是认为人的一切认识都是错误的，根本不能反映外物的真相，这样一种极端的主张才要遭到我们的反对。我们说我们有能力认识事物的真相，但要使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必须克服许多障碍，否则我们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为什么呢？让我们还是先用照相的比喻来说明。有了照相机，我们就有可能摄取外物的正确的影像。但这也只是可能，如果要使这可能成为事实，就有许多附带的问题要解决。例如，倘若你没有学过摄影的技术，那即使有好的照相机也没法摄出影来，这样，你就首先必须克服这技术上的困难，才能达到摄影的目的。又，即使你学过技术，倘若你没有很多实习的经验，或者即使有经验，你在摄的时候马马虎虎，不仔细对准光度和焦点，那你也不可能摄成正确的影像。因此要摄成正确的影像，你又必须练习，必须在每一次摄影的时候仔细研究，仔细处理。技术、经验、仔细等等，这些是方法上的问题，要摄好照片，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但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照相机本身的好坏质量问题。好的照相机可以正确地摄各种各样的事物对象，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飞的、走的，动的、静的，明的、暗的，但是坏的照相机却做不到这一点，它只能摄取一部分的事物，例如它感光很慢，就不可能摄飞行的东西。如果镜头坏了，或者是表面凹凸不平，那么，它甚至于任何东西的正确影像也不能摄取。所以，有技术有经验的摄影工作者，还要选择质量好的照相机，才可能发挥他的摄影能力。现在再回过来说认识的问题，要发挥人的正确认识能力，首先必须要解决方法上的观点

要使我们的认识不发生错误，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观点和阶级立场

上的问题。例如你依照了唯心论的观点，遇事不仔细调查研究，只凭“想当然”来解决问题，那么，即使你是天下奇才，也没有方法正确认识客观的事物。至于方法，那就是一定要学会辩证法。不学会辩证法，也难于获得正确认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说明，这里不再多讲。这里我们只想特别提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阶级立场问题。这个问题，仿佛就是照相机的质量好坏的问题。坏的照相机就根本不可能照出好的照片，即使世界第一的照相师也没有办法。阶级立场不对，也就根本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即使你是生来非常聪明的人也是枉然。所谓阶级立场问题，就是你从什么人的利益出发来看事物的问题。你是从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看事物呢？还是从反动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看事物呢？例如认识中国的问题，先就要问你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呢？还是从无产阶级及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如果你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上说话，那你就会把美国帝国主义者看做亲老子，并且把坚决抗战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看做敌人，把民主同盟以及一切要求民主的人民看做障碍物。如果你是从无产阶级及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那么，你就把美国帝国主义者看做“豺狼”、“骗子”，你能认识到它仅仅对于无耻的反动派才像是亲老子，你就能把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以及解放区人民看做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把民主同盟以及一切民主人士看做为中国独立、和平、民主而战的同盟者。同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因为立场不同，看法也就这样完全相反。请问这两种看法，是哪一种对呢？哪一种才是正确的认识呢？当然对的还是后一种看法，还是从无产阶级及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出

同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因为立场不同，看法也就完全不同

发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

因此，如果你决心使自己的主观意识有充分的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充分正确地认识一切事物，那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你必须依照无产阶级及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来考虑自己的立场，就是要努力使你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就是要决心以你的全部工作、全部能力，用到广大人民的解放事业上，而为了这个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简单点说，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立场，就是最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你如果能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所遗留给我们的坏影响（如果你身上有这种影响的话），那么，你看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不至于因为有什么成见或因为有什么顾虑，而妨害了自己彻底了解问题的真相，你就有可能对一切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

要获得正确的认识，首先就要能站在广大工农人民的利益上看问题

八、卓别麟[1] 和希特勒的分别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人类的认识和照相并不完全相同

前面我们用照相作比喻，来说明我们的认识是什么一回事。但是，凡是比喻，总是不完全的，它只在某一些方面比得对，在别的方面，就不一定对了。用照相比认识，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专讲照相和认识是如何相似，以下我们就要讲两者如何不同了。

---

① 即贾波林，南方通译作卓别麟。——艾思奇原注。

我们的认识，和照相最相似的，主要的还是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我们的感觉器官，从周围摄取种种色色的影像，使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件的周围事物的外表形像。假使电影上的卓别麟走到我们面前，眼睛就会告诉我们：这位先生的嘴唇上有小小的胡子，头上戴顶破礼帽，裤子、皮靴都大得很不相称，手上捏着一根竹鞭当作手杖，走路的姿势也不大平稳……。眼睛里所感到的这一切，和照片上的卓别麟是一个样儿。照片上所能摄取的都是事物的外表形像，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也是事物的外表形像，这些外表形像是可以由直接的感官接触而认识得到。一撮胡子，一顶破帽，一根竹鞭……，卓别麟这些外表的各个部分的特征，都可以由照片直接摄取，也可以由感官直接认识。这种由感觉器官直接认识的事物的外表现象，我们叫做“感性的事物”；由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我们叫做“感性的认识”。

由感觉器官所得到的认识，叫做“感性的认识”，这是和照相机相似的

总之，我们说人类的认识可以用照相来做比喻，只是就感性的认识来说的，因为感性的认识类似照相，只能像照相片一样的摄取一件件的事物的外表形象。如果我们人类仅仅只有感性的认识，那我们就永远只是像在照相，只能认识一些外表的事物形象，如胡子、破帽、竹鞭等等。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简单，我们的认识能力，除了“感性的认识”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种认识，使我们不只是能摄取外表的形象，而且能认识更深刻的东西。还是把卓别麟拉来具体的讲一讲吧。已经说过，照片上印着的卓别麟只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照片上除了那一副褴褛的外形之外，不再告诉我们什么。但是，请你仔细想一想，卓别麟仅仅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仅仅是你在照片上所看见的这一个外表形象吗？我相信你一定要答复不是。你一定说卓别麟绝不仅只是留着小胡子

的人，而且还是另外的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我们的感官是直接“感觉”不到的，但我们用自己思想却可以“了解”得到，它有一个名字，就是“滑稽大王”。我说我们所感觉到的是一个留小胡子的人，但我们所了解到的却是“滑稽大王”。这话你肯相信吗？你也许不肯相信，并且还要反驳我说：“滑稽大王也能为我们直接感觉到的。我们不是经常看滑稽大王的电影吗？这不是表明滑稽大王可以直接看到吗？”你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正确，让我们把事实分析给你看看。如果你单凭感性的认识，那么，试把一张希特勒的照片和卓别麟的照片摆在一起，你能分别他们的不同吗？卓别麟演过《大独裁者》，如果把他扮的大独裁者的相片，和德国法西斯独裁者的相片摆在一起，外表上能看出什么不同吗？仅从外表上看，一定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这时如果有人说卓别麟和希特勒没有分别，你一定要大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呢？因为你除了承认他们在外表上一模一样之外，你心里总认为他们在根本上还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不是外表上直接感觉到的，是你心里了解到的。你能了解他们一个是滑稽大王，一个是法西斯魔王，你这种了解，并不会因为他们有外表上的共同点而被蒙蔽起来。

再用另外一方面的例子来讲一讲，事情就更容易明白了。假使你是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人，我们把卓别麟的相片，和罗克、劳莱、哈台等人的相片，一起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发生怎样的认识呢？你一定只能认识到这些人的不同，而绝不会想到他们中间的共同点。因为在这种时候，你仅仅能够凭着照片上的表面形象来认识他们，你对于他们只能有感性的认识，你只能感觉到卓别麟有小胡子，罗克戴眼镜，劳莱是瘦子，哈台是胖子，各人有各人的特征，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在一起。但是如果这里来了一个看过

很多电影的人，他一定笑了起来，说："看呀，这一群滑稽大王都摆在一起了！"这位看电影很多的人，他对于卓别麟、罗克等人就不仅只感觉到他表面的不同，他对于这些人已经有了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能了解到他们同样都是电影上的滑稽大王。

我们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外表形象；一种是理性认识，能了解事物本身深刻的特性

现在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了：我们有两种认识，两种认识反映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是感觉器官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这种认识只能为我们反映事物的外表形象，如小胡子、戴眼镜、胖子、瘦子等等。另一种认识所反映的却不是外表上直接可以感到的东西，它是比较深刻的东西，它是代表事物本身深刻的特性，如滑稽大王、法西斯魔王等等，这种东西要凭我们的"了解"、"理解"来认识，这种认识叫做"理性的认识"。我们又看到，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认识不但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而且往往有相反的结果，两种认识的结果往往会相互矛盾。不论在日常生活中或世界的大事里，我们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这种矛盾。例如这里有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政府的官员，只从外表上看，那么他们都是高鼻子白皮肤的西洋人，如果你了解到他们本身的特性，你就知道他们是相反的人物，一个是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而一个是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代表资产阶级。日本军阀和中国老百姓，从皮肤颜色来看，同样都是黄种人，比起苏联人或英美的工农人民来说，在外表上他们还是更接近的，但从社会地位或阶级性质上来看，日本军阀是侵略者，是中国老百姓的敌人，而苏联人和英美的工农人民，却是中国老百姓的朋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往往就是这样相反，这样矛盾的。这种矛盾还被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强调人类皮肤颜色的关系，而故意抹煞了人

类的社会阶级的关系，强调种族的对立，而抹煞了社会阶级的对立，这样来制造出他们的侵略思想。例如希特勒宣传亚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生来有征服世界的使命；日本法西斯宣传黄种人的东亚，而黄种人又以大和民族为最优秀，应该成为盟主，这样来为它的侵略行为辩护。丘吉尔想使英美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到美国去发表了一篇演讲，也利用英美两国语言相同的外表特点，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理由，而抹煞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和英美人民中间的矛盾。

现在我们碰到一个困难问题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它们同样都是人类的认识，它们本来就像是一家人，像是两公婆或两弟兄，但这两公婆或两弟兄是那样的不和气，往往要大家抬杠。“感性”先生说是这样，“理性”先生偏要说是那样，究竟谁靠得住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场纠纷，实在难得排解！从古以来不知出了多少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为了排解这场纠纷而费去无数的脑汁。可惜很多的哲学家，虽然头脑可以算得聪明，但因为态度不好，不能公正对待问题，常常只是偏袒着一方，不能正确了解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方面所有着的一定的地位，因此让这公婆俩争吵了两千多年，也没有办法制止。一直到离现在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唯物论出来了，才算公平合理地解决了纠纷。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引起了长期间哲学界的争论

让我们简略的把情形说一说吧。有许多哲学家，是偏袒感性先生的；有许多哲学家，又是跟理性先生一鼻孔出气的。偏袒感性先生的哲学家，就只相信感性的认识才能反映事物的真面目，以为只有像照相一样得来的认识才靠得住没有错误。这一类的哲学

偏袒感性认识，认为只有它才能认识事物的真面目的，叫做经验派哲学

家在哲学史上总称为经验派的哲学家或经验论者。为什么叫做经验派呢？因为他们相信经验是一切正确认识的来源，而他们所谓的经验，就是指感觉上的影像或感性的认识。承认认识首先是从感性方面得来，这本来是对的，因为客观物质是首先要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才能反映到我们的主观意识里，但是，这些经验论者太偏袒感性认识，结果就把理性认识打入冷宫里去，认为理性的认识不可能使我们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例如对于卓别麟，他们只相信那小胡子、破礼帽，才真正是卓别麟身上的东西。如果有人说："卓别麟是滑稽大王。"那么经验论者便要皱起眉头来，说："你错了。卓别麟只是一个留小胡子的人，因为只有他的小胡子和他这个人的形状，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东西，只有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有留着小胡子的人才是卓别麟的本来面目。至于'滑稽大王'，那只是你嘴上说说的一个名词而已，滑稽大王这几个字，并没有生在卓别麟的脸上，也没有刻在他的身上，你并没有在他的脸上或身上看见它，而只在你的心里觉得他是滑稽大王，那么，他本身究竟是不是滑稽大王，你是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经验论者只相信直接感触得到的感性认识，他们认为不直接由感觉器官得到的理性认识，只是我们主观里的东西，而不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真面目，它只是嘴上说说的名词，并没有反映任何客观事实，它只是抽象的或空洞的名词。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没有经验论者呢？当然，经验论的哲学专家，是不容易碰到的。但是有些普通人的观点，也可以归入经验论一类，这种人倒常常可以碰见。这类人虽然不至于像哲学专家那样把道理推到了极端，连卓别麟是滑稽大王都要怀

疑，但他们在事实上却常常袒护感性认识，只重视一件件的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相信理性的认识。例如在苏德战争的头两年，当德国法西斯军队一直向着莫斯科前进，还没有被苏联军队阻止住的时候，有一些人根据这一时的表面的现象对于苏联就抱着悲观失望的看法，以为希特勒军队真是无敌的。在这种时候，你向他宣传社会科学的理论，说法西斯一定要没落，社会主义的苏联一定要胜利，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只相信他直接看得到的才是真实的东西，而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也好像是与事实不一致的空洞名词或抽象言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了经验论的观点。盲从希特勒的人，以为皮肤的颜色不同是人类中间的敌视和斗争的原因，而不相信社会科学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思想观点上来说，也可以说是有着一种经验论的因素。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只重视自己个人或自己周围的人们的直接斗争经验，只注重零零碎碎的经验，而轻视有系统有条理的理论知识，认为谈理论是空洞无用的，这也是一种经验论的观点，这叫做狭隘经验主义。

偏袒理性认识，认为理性才是正确认识的来源，这叫做理性派的哲学

现在要谈一谈那些和理性先生一鼻孔出气的哲学家了。这一些哲学家，又太偏袒理性的认识，以为感性的认识只是表面的、虚假的、混乱不清的幻影，以为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正确认识的真正来源，才能反映事物的真面目。这种哲学叫做理性派的哲学。拿卓别麟的例子来说，理性派的哲学家一定要坚持卓别麟只是滑稽大王，而不是留着小胡子的人。他的理由是："只有滑稽大王才能代表卓别麟的根本特性。至于小胡子，希特勒嘴上也有一撮，你不能把卓别麟的小胡子和希特勒分开，你说卓别麟就是留有小胡子的人，那只表示你没有真正认识卓别麟。"理

性论的哲学家，既然认为感性的认识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们以为我们要求得真正的认识，就不必依靠感性认识。他们以为我们有一种内心的理解能力，只要运用这种理解能力，而不需要依赖任何的感觉经验、任何的调查研究，直接就能够了解事物本身的特性，就能认识事物的真正面目。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有人主张聪明的人对于事物的深刻认识是天生的，不是学习来的，也就是不必经过感觉经验以及调查研究得来，这就是一种理性论的观点。在明朝时候有个王阳明，更把这种观点发挥到极点，提倡一种名叫“致良知”的哲学思想。他所谓良知，就是说的人类生来具有的正确认识，所谓致良知，就是说要我们努力从自己内心里唤起我们这种生来的知识，而不要去做调查、研究、观察、学习的工夫。他举他自己的例，说他曾坐在竹子旁边观察了七八天，想来想去，人都病了还是毫无结果，所以还是不观察的好。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自然不会碰到那么多理性派的哲学专家。我们周围的人，谁也不会把道理讲得那么极端，以至于连卓别麟有小胡子这一件明明白白的事情也要否认。但是类似理性派的观点，却常常在很多人的思想言论中表现出来。特别是有许多读书较多而又没有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常常犯一种毛病，就是过分看重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轻视实际经验和实际知识。遇到问题要解决的时候，他们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办法，而是依靠书本上引证的词句，加上他自己主观的一套推论，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握事物的真理。这种人对于自己的言论思想的实际效果如何，是不看重的。他们只相信书本上的词句和自己的“想当然”，只要把这两件东西加起来，作成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言之成理”，他们就很满足、很得意了。至于这一篇文章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正确解决问题，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甚至即使是与实际情形完全不合，他们也满不在乎，因为实际的东西，本来是他们所轻视的。这种人走在革命的队伍中，就会把外国书本上的革命理论，逐字逐句简单生硬的搬到中国来用，而不管是否每字每句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把外国书本上的个别原理当做宗教信条那样看待，只知道简单地背诵它的词句，而不知道应该同时注意研究一下外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革命经验，不知道还应该比较一下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和革命经验。这种把书本词句当做宗教信条来看待的坏作风，我们也叫做“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既不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经验，因此也就不能正确的指导革命。当他们一旦居于指导的地位，就一定要犯错误，就一定会使革命受到损失。这就是偏袒理性的害处。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教条主义，在抗战初期，蒋介石一流人主张打阵地战，就是抄了清朝时候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动首领曾国藩的教条，说打仗要以“守的为主，攻的为客”。这是封建的教条主义，也使抗战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经验派和理性派都各有偏袒，不能解决认识问题的争论

我们看，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哲学家，本来是想给感性和理性这两公婆或两兄弟排解纠纷的，但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使他们自己互相对立起来了。在外国，经验派的大本营是在英国，理性派的大本营是在欧洲大陆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两个大营垒在哲学史上对立了很久，抬了几百年的大杠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这是由于他们的看法不对。在他们的眼睛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好像是两只绝对势不两立的老虎，如果把两只老虎放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绝没有并存的道理。“一山不容二虎”，因此他们以为排解纠纷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救活一只，杀死另一只。但是究竟要杀哪一只，而哪一只又应该留着呢？对于

这一个问题就发生分歧了。经验论者喜欢感性认识，就说要杀死理性认识。理性论者看中了理性认识，就说要杀死感性认识。于是就争吵起来。这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纠纷不但没有排解得了，反而发展成为经验派和理性派的两大对立营垒，把纠纷扩大，变成了战争，事情倒弄得更僵了。

经验派和理性派都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间的矛盾，看成了两只势不两立的老虎，这里包含着一种错误的看法或错误的思想方法。这种看法在哲学上叫做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和辩证法的方法是相反的。它喜欢把不同事物看成相互孤立的、绝对分离的东西，而不注意事物中间的联系。一切不同的事物在他们眼中都不可能有联系，至于互相抬杠互相闹纠纷的事物，那更是不能两立了。其实世界上事物的实际情形，和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不符合的。两公婆或两兄弟尽管天天吵架，但他们仍然是一家人，而不是两只老虎（严格说起来，就是两只老虎，相互间也有一定联系的）。如果你把人类的认识多研究一下，你就知道，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是同时兼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这两方面经常结合在一起，简直难分难舍。你要把任何一方面撇掉，都觉得有些不妥，就好像单身的男女不能建立完全的家庭生活一样，单凭感性认识或单凭理性认识都不可能成为完全的认识。你说卓别麟只是留小胡子的人吗?那只是看见了卓别麟的外形，不能了解他的特性。你说他只是滑稽大王吗？那么这又太抽象、太空洞了，罗克也是滑稽大王，你怎样说明他们两人的具体分别呢？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密切联系，不能分开，不能偏废

你要说明这分别，其方法之一，就是要向感性求援助，说卓别麟是留小胡子的（当然还有其他特点）滑稽大王，而罗克则是戴眼镜的（当然也还有其他特点）滑稽大王。只有这样把感性和理性

的认识都拉在一起，你才能够对一件事物得到完全的认识，否则你不是只落得一个外表，就是只落得一个抽象空洞的名词。依照这样的道理，我们就可以说：那些只有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人，虽然自己以为是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半知识分子。同样，只有实际经验而不学习理论的人，他们也同样没有完全的知识，而只有片面的知识。好了，事情既然是这样，我们在排解纠纷的时候就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只偏袒一方而抹煞另一方，如像经验论或理性论所做的那样，而是应该把两方面好好的拉拢，使它们很自然地合作起来。这就必须要公平地承认各个方面的地位、权利，正确对待互相间的关系，必须要正确了解两个方面各自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懂得正确地对待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适当地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可能经常获得比较正确的完全的认识。

要正确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认识论虽然叫反映论，并不完全像照相。照相里只有类似感性认识的反映，人的认识却除了感性认识之外还有理性认识，必须正确对待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才能反映事物的真面目。究竟要怎样对待？究竟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什么关系？这问题必须要用辩证法的看法来解决。但是这里已没有篇幅了，等下一段再讲吧。

九、原来是一家人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当一个电影院要放映卓别麟的影片时，照例很早就有广告张贴出来。这时，我们就在街角上、墙壁头、报纸里，到处发现这位留

着小胡子的流浪人的画像。这小胡子的影像,前次曾经说过,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可以认识到的,所以叫做感性的认识。感性认识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是真实的呢?当然是的。小胡子留在卓别麟嘴上,是的的确确的事实,谁也不能怀疑。但是这里立刻又发生了问题,卓别麟的小胡子跟希特勒的太相似了,如果只从小胡子上来看卓别麟,那我们就很难把他和希特勒分开。于是我们又想到要从更根本的地方来认识卓别麟,就是要认识他是在性质上和希特勒根本不同的人物。这时我们就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认识到他是滑稽大王了。

已经说过,我们用理解力认识到滑稽大王这种性质,这种认识作用,叫做理性的认识。我们还说过,理性的认识是怎样常常喜欢和感性认识抬杠,感性先生说是这样,理性先生偏说是那样,他们的争吵是这样激烈,以至于有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误认为是两只老虎老打架,想打杀其中的一只来解决纠纷。但在打哪一只的问题上,这些哲学家自己也争吵起来了。现在我们站在唯物辩证法反映论的观点来看,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们不是两只势不两立的老虎,而是兄弟或公婆,尽管他们激烈地争吵个不休,始终还是一家人,还是要共同生活下去,拆散不了的。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这种争吵抬杠,并不简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两种认识能力在互相捣蛋。追根究底,这种争吵抬杠原来是包含在客观的事物里。原来卓别麟这个人本身就是包含两个方面的:一方面他是留小胡子的人,这是他的外表;一方面他是滑稽大王,这是他的性质。因为卓别麟这个客观事物本来有这两方面,所以反映在我们人的脑子里,也就有两种认识;因为卓别麟的这两方面本来不完全一致,反映在我们脑里的两种认识也才会互相抬杠。所以这两兄弟或两公婆的争吵抬杠,并不是我们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是反映着事物本身的矛盾

的认识能力自己爱兴风作浪，而只是反映了事物本身的复杂内容罢了。如果事实本身的这两方面一致了，它的外表和它的性质一致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脑里，也会觉得好像是很和谐的夫妇或兄弟，这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就不会抬杠了。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上海、北京各地的人们，经常看见美国军队欺负中国老百姓，这是他们从感性认识里经常看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再从理论上告诉他们说："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现在采取侵略政策。"他们会不会反对呢？当然不会反对，因为这时他的感性认识和他的理性认识是一致了，他们所感到的美国军队的外表和行为，和他们所了解的美国国家性质是不抬杠了。这种情形，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或者马歇尔最初来中国"调停"的前后，是不会有的，那时美国军队的坏行为还没有完全暴露，美国政府在外表上装得好像是一个公正的"友邦"，仿佛既帮助了中国抗日，又似乎不偏袒国内各党派的任何一方。在那时候，它所给人们的感性认识，好像是与帝国主义的性质不一致的，它就与理性认识有抬杠的作用。因此，那时如果我们说美国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有些人为感性认识所蒙蔽，就不肯相信。所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原是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结果，理性和感性抬杠不抬杠，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也叫做本质）和它的外表（也叫做现象）一致不一致来决定，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的东西，也不会在我们的头脑里凭空出现。

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如果和它的性质一致，我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里也就会一致

理性认识是怎样产生的

现在恐怕有人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了："理性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我们很难了解的。我们很容易了解感性认识是如何产生。因为你在前

面已经用了很浅近的比喻，把它说得十分透彻了：感性认识有点类似照相，由我们的感觉器官直接从外物摄取的。但是，理性认识是怎样来的呢？它不是直接由外物摄取的，并且也不可能直接摄取，因为它所反映的不是一件件的事物的外表现象，而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前面说是要用我们的理解力去'了解'，才能得到理性的认识。这个所谓了解，岂不有些神秘吗？性质是外界事物本身内部的性质，而'了解'是我们头脑中的了解，这两件东西不是隔得很远吗？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呢？"

是的，这是一个必须要解答的问题，而现在也正是解答的时候了。我们的理解力和事物的性质之间，的确是有相当的隔离，不能直接接触，那么怎的会发生理性认识呢？要想把一条河流的两岸连接起来，应该靠什么呢？自然要有一座桥梁。的确，事物和我们的理解力之间，需要有一座桥梁，才能达到理性认识的目的。什么是这一座桥梁呢？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更进一步发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亲密关系，更加看出两方面果然是真正的一家人。原来从事物的性质到达理性认识的桥梁，不是别的，正是感性认识。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感性认识，那也不可能有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乍然看见了卓别麟的照片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滑稽大王，即使你告诉他这是一个滑稽大王，他也不会真正了解你所说的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能够了解滑稽大王呢？一定是常常看电影的人，电影看得愈多的人，愈更能够深刻了解卓别麟这个滑稽大王。我们以前说，看见卓别麟的小胡子的人，往往误认为这是希特勒。这也只是指那些从来没有看见过卓别麟电影的人说的，例如中国解放区乡下的小孩子，对希特勒是很知道的，如果把卓别麟的像片

由客观事物反映为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做桥梁

给他看，他一定告诉他妈妈说："看呀，希特勒变叫化子了！"这就因为他没有看过卓别麟的影片。凡是看过卓别麟电影的人，他一定一眼就能认出这是滑稽大王，而不是那欧洲的法西斯魔王。因为当他一看见照片的时候，他就会联想起以前看过的许多卓别麟的影片，每部影片都是讽刺旧社会，使人发笑的。他的脑子里的卓别麟，不仅仅是眼前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且是一连串的滑稽电影故事，这些故事的总体，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滑稽大王的认识，和他对希特勒的许多侵略疯狂行为的认识完全不同，因此他绝不会把卓别麟的像片和希特勒混淆起来。

要先把很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才有可能达到理性认识

现在我们懂得理性认识是怎样发生的了。原来理性认识的产生先要有许许多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对于一件事物如果没有感性认识或者感性认识很少，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或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但如果感性认识多了，那你就有可能经过它而达到正确的理性认识了。只看见一张照片，绝不能想到这是滑稽大王，看了许多电影，你那滑稽大王的认识就牢固起来了。只看见美国政府人员或军队的一两件事情，你绝想不到他是帝国主义，甚至于相反，以为他是好朋友、公正人士。等你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的看了他们许许多多行为事实之后，你的脑子里对于他这帝国主义的认识就愈益明确了。又譬如对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人，你倘若只听见他们的某些漂亮的言论，或者只看见他所做的一两件表面上似乎不坏的事——例如你只看见他们参加抗战，参加 1946 年的旧政协会议，和各党各派共同签订政协决议，以及蒋介石提出允许言论自由等四项诺言，你或者会以为他们是真正爱国家、赞成民主的人，但是等你长时间的观察了他们的一切反对民主、压迫人民的行为之后，你才深刻的了解，他们原是非常顽

固的专制独裁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漂亮的说话都只是假装门面骗人的手段。所以，没有很多感性认识做基础，是不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的。为什么把许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就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理性认识呢？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我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观察到各种现象的互相关系，就有可能把他们加以比较、分析，就能够看出有些关系是一定不移的，是反复出现的，是真实的关系，有些关系却不是经常的确定的，而只是偶一出现的，表面的，甚至于是不真实的、伪装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由此可以找到一些深刻地支配着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的某些确定不移的秩序，也就是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卓别麟这小胡子的流浪人，经常出现在电影银幕上，每一出现，必要引得观众发笑，这是卓别麟与观众中间的确定的关系。美帝国主义的许多行动，都是要扩张它的势力，侵略别的国家，它帮助中国抗战，对中国来说，实质上也只是为着在中国扩大它的势力；他一面表面上"调停"中国内战，另一面却拼命帮助独裁政府建立军队，准备内战。把这些现象中反复出现的各种关系加以全面的综合研究，就可以得到一条规律，就是美帝国主义当局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为着把中国降为殖民地。就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从他的许许多多可以直接看到的事实里，能够归结出一些固定的规律，就是它一定要反对民主、压迫人民，而为了反对人民，又一定要依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总之，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使我们能够看见客观事物里的许许多多现象，从这许多反复出现的、内容丰富而且复杂的现象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深刻地支配着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的许多确定的关系，认识到他们的规律，这样也就能够认识了事物的根本性质，因

从许许多多感性认识中，可以看出事物间的确定的关系和规律

为所谓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外就是事物的各种关系、各种规律的总称。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性质，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规律，是因为它们与其他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如卓别麟的演技使人民愉快，希特勒的行为使人民遭殃，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使中国人民痛苦、愤怒和反抗等等；而卓别麟和希特勒之所以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就由于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不同，就由于在这种关系中的规律不同。

单单感性认识的积累，并不就是理性认识，而要加上分析比较的思考工夫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感性认识的积累，是理性认识的桥梁了。但为什么只是桥梁呢？为什么不能说许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就成为理性认识呢？因为，单单把感性认识积累起来，仍然只是感性认识，仍然只能认识一些片面的、零碎的，甚至于似乎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外表现象。单单靠感性认识，就不能超出这些片面零碎混乱矛盾的现象，找出其中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规律来。要找出这规律来，就不能只依靠感觉，而要再用一番思考的工夫。就是要把这许多现象加以比较、加以分析，要研究那许多现象相互间如何发生关系，哪些现象中间的关系是经常的、一定不移的，哪些只是偶然的、不重要的，甚至于是表面的、虚假的，然后把这些确定的重要的关系抽出来，把那些偶然的、不真实、不确定的撇开，这样就可能把握到事物的规律。中国一般人民能够认识到美帝国主义要想把中国降为殖民地，并且能看出马歇尔的调停内战的“公正”面目乃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这并不仅只是长期感性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根据许多对帝国主义的感性认识而加上了一番比较分析的思考工夫的结果。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规律早已研究清楚，并在一般人民中间宣传这些知识，就帮助人民较为

分析比较，就是应用理解力，就是思想的概括作用，就是经验的总结

迅速地完成这种思考工夫。这种思考工夫就是理解力的应用，在哲学上也叫做思想的“概括”作用。在革命工作中，我们常在一定的时期总结经验，而总结经验的目的，也就是为要把这时期中的感性认识（经验）加以分析概括，找出工作中的规律，使我们的零碎片面和表面的感性经验知识变为全面的、有系统有条理的理性认识。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有着怎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了。原来他们是在分工合作，共同来帮助我们一步步深入地反映世界上的事物。感性认识第一步反映事物的外表现象和外部关系，理性认识再进一步反映事物中间的各种内部关系、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有如父子

种确定的规律。现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好像又不是公婆或兄弟的关系，而是父子关系了。我们首先要有感性的认识，感性的认识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好像人要长大到成年的时候，才有可能和理解力结婚，产生出一个儿子——理性认识来。由此可以知道，那些偏袒理性先生的理性论者，是大大错误了。他们把理性认识讲得很神秘，以为是人们天生的一种能力，可以不依靠感性认识作基础，就可以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性质。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没有父母也可以生儿子一样的好笑。没有感性认识，要想获得深刻的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你连事物的表面现象都还没有看见过，你怎能够希望了解事物现象中间的内部关系和确定的规律呢？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或看见过战争的人，要他谈战略战术的规律，是不是可能呢？一个从来没有下水游泳过的人，要他讲游泳的规律，讲怎样才不会淹死，是不是可能呢？当然，也许有一种爱吹牛皮的人，明明自己一点打仗经验没有，偏要大谈战争规律，明明一次也没

有下过水，偏要当游泳教员，但这种人讲的战略战术和游泳术，一定空洞而无内容，一定是一套骗人的空话，如果有哪一个傻瓜真照他所讲的去做了，一定要打败仗，或一定要在水里淹死！有人要问：毫无打仗经验或打仗的感性知识的人，如果看几本战略战术的理论书，不是也就可能了解一些战争规律吗？我们的答复是：不能。自然他也可能照书背诵词句，但他绝不可能了解这些词句的真实意思在哪里。三岁的小孩，不是也可以背诵帝国主义、法西斯蒂之类的词句吗？但这些词句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三岁小孩能否了解？当然不能，原因就是他没有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感性知识。所以小孩即使能背诵这些词句，也只是说出一些没有理解到真实内容的空名词。前节我们讲到的那种教条主义者，他们轻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实际知识，或者完全缺乏这些实际知识，而专门搬弄外国书本上的革命理论，在实际上也和三岁小孩谈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罪恶一样，不能真正地了解那些理论。仅仅有书本理论知识的人，说他是半知识分子，已经是很够了，事实上连这一半他们也不一定能获得真正的了解。

理性派和教条主义以为不依靠感性认识就可以有理性认识，这等于说没有父母就能生儿子

我们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比作父子的关系，这一点也没有要轻视理性认识的意思。相反的，我们还要说清楚，按照通常的发展规律来说，儿子的一代，总应该比老子进步一些（不是指个别的儿子来讲，个别的儿子当然有比父亲更退步的），理性认识也是比感性认识更高一步的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只有感性认识，我们就难免为零碎片面的事物外表现象所迷惑，我们就难分别卓别麟与希特勒，难确定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好朋友还是豺狼，难确定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而在希特勒军队向莫斯科一直前进的时候，就难有把握说

希特勒一定失败，在1947年初解放区军队退出了某些城市的时候，就难得建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必胜的信心。总之，如果只有感性认识，我们就容易为当前的局部、片面、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能预先看见事物变化发展的较远的前途，不能对事物作全面的了解，不能通晓事物中间的较普遍的确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各方面的感性认识及实际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达到理性的认识，看清楚了这些事情的一定的规律，那么，以上的疑难，都可以完全解决了，而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发展变化的前途都可以有先见之明，对事物的整体就可以有一个全局的了解，对于事物中间的较普遍的确定的关系就可以斩钉截铁地作明确判断了。所以，那些偏袒感性认识的经验论者，轻视理性认识，轻视理论，只相信自己直接感到和经验到的东西，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坚持这种观点，那一定会把自己束缚在局部的狭隘经验的圈子里，或弄得眼光短浅，固执褊狭的成见，或者弄得动摇不定，思想为现象的变幻所左右，不能对事变的发展前途有先见之明，不能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不能满怀信心地向前战斗。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以感性认识为满足，一定要更进一步，求得更深刻的理性认识，就是要求得事物的规律知识。

只相信感性认识而不注意理性认识，就会陷于眼光短浅，遇事没有先见之明

但理性认识究竟是感性认识的儿子。要想获得真正的理性认识，必须在感性认识方面先有充分的准备。要对中国革命运动获得正确的理性知识，要掌握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必须着重学习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经验，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把这些实际的材料加以研究，加以分析、概括和总结，找到中国革命各方面的

要从中国的革命实际中找出中国革命的理论

规律。总之，要从十分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去分析研究和找出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仅凭个人主观的感想或凭简单地从书本上引来的片言只字来下结论，这就是正确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就是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然，我们并不是轻视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相反的，我们是非常重视一切科学著作的理论知识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样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因为这些著作里包含着丰富无比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知识，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正确的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知识。但是，第一，应该了解，这些伟大的科学著作中的理论知识，也是从极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上辛苦研究出来的，我们自己如果不多少有一些同类的感性知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著作。例如我们要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要了解其中的许多深刻的理论，我们就必须同时学习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有这些历史的感性知识作基础，才有可能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著作。第二，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之后，就可以用它来指导我们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但必须注意，我们的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可能又有一些新的特殊情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不可能把我们所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都完全现成地涉及到了。所以，当我们用科学著作上的理论知识来解决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这些已经确定的规律知识作为一般的指导，而我们自己还必须在这一般的指导之下，对那些特殊情况下一番独立研究的工夫，把那些新的特殊的感性材料加以分析，找出一些特殊的规律，才能正确了解我们具体的工作的性质，才能正确解决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

来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具体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有的放矢”的态度，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的态度。教条主义者想单纯依靠书本上的理论，而对具体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不肯搜集材料，不肯认真地作独立的调查研究，这是“无的放矢”的态度，是错误的态度。

一〇、由胡桃说起

——认识和实践

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试问我们的感性认识所能觉到的是什么？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表面凸凹不平，再用手去触一触，是硬的，或者用鼻子嗅嗅，没有一点气味。还有什么没有呢？怕不再有什么了。这就是我们眼前对于胡桃所能感到的一些外表的东西。但我们对胡桃的认识，当然不只这些东西，除了这些外表的感觉认识之外，我们还能够认识到胡桃的各方面的关系：我们知道它可以作为人的食品，而且相当美味，相当有营养价值。我们也知道它是一种植物的种子，把它放在土里，有了适当的阳光、水分和肥料，就能生长成为树木。这些都是胡桃的性质，是胡桃这种客观事物所包含的规律。这些规律为什么会被我们认识了呢？眼前的感性认识就能直接告诉我们吗？当然不能。胡桃的肉是藏在壳里，不把它敲破，就不可能看见。胡桃树要从这颗种子里长出来，那是将来才会有的事，眼前我们的感觉，是不可能看见这一切的。我们怎样能够认识这胡桃的规律呢？照前节讲过的道理来说，是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我们先有感性认识，而且把这感性认识逐渐积累起来。我们不是今天才看见胡桃，在今天以前，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看见过胡桃了，我们好多次看见别人敲碎胡桃，我们自己也敲过胡

桃。如果我们是在乡村里生活，那我们也会看见过农人种胡桃树，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可能种过胡桃树。第二，在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上，我们又加上了思想的工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已把这些感性认识加以总结，把那反复发生的现象概括起来，认识出它们中间的一定不移的关系，因此也就认识了它的规律：敲开胡桃（只要不是坏了的）一定得到美味的食品，种在土地上适当的加以培养一定可以长成树木。这些步骤叫做认识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达到理性的过程。我们在过去日常生活中已不知不觉的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今天一眼看见胡桃，不用把它打破，不用把它放在土里去栽种，已经能够推测出它会发生一些什么作用了。理性的认识，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按照一定事物的规律的知识，来推测这一事物未来的发展以及它将会发生的作用。

但是这里有一个秘密，我们还没有说出来，前面说过：我们在以前吃过胡桃，种过胡桃树或者看见有人种过胡桃树，因此才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才能总结成理性认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没有对胡桃采取过这些行动，能不能有这些认识呢？我敢说绝对不能。没有这些行动，单单看见过胡桃的外表，那么，即使反复看见过千万遍，仍然只能认识这是一个黄褐色的硬圆球，此外便毫无所知了。因此，我们对于胡桃，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地位上去认识它：一种是在行动上和胡桃不发生任何关系，不敲它、不吃它、不栽种它，总之，不把它的现状加以任何改变，简单地从旁观察它，这叫做在旁观的地位上去认识事物。在这种地位上认识胡桃，我们将永远只能认识到它的外部形状，至于它的内部怎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有人一定要问内部怎样，那我们只好跟“不可知论”者一道走。明朝的王阳明整整用

我们认识事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旁观的地位上去认识，一种是在实际行动中认识

七天工夫观察竹子而没有结果，就是这样的原因。这是在一种地位上所发生的一种认识结果。另外一种地位和上面相反，是经常在行动上和胡桃发生关系，敲它，吃它，栽种它，或看别人栽种它，总之，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叫做在实际行动中来认识事物。在这种地位上来认识胡桃，我们就不会永远只看见它的一些简单的外部形状，相反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隐藏着的内容和内部关系剖露出来，把"不可知论"认为无法知道的东西经常变为可知，于是我们就常常能获得新的感性认识，能发现事物中间的新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的认识，如果再经我们亲身试过，就更能够实实在在证明它是不是确定的关系，是不是一定不移的规律。单单听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还可能半信半疑，要是我们自己也吃过，那就完全无疑了。单单听人说胡桃是植物种子，我们还可以怀疑，如果我们自己也种过或亲眼看见人种过，那就要完全相信了。所以要通过实际行动，才有可能让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用我们的行为来切实地检查这些认识，使我们经过行动的检查证明而得到正确无误的理性认识。

要在实际行动中，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和正确的理性认识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我要向你们道歉了！我在前面费了很长的篇幅，讲了好几次反映论，可是总没有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这就是人的实际行动，哲学上也叫做"实践"。由胡桃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实际行动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有决定作用的。实践是我们一切认识的基础，不论我们的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归根到底都是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得来的。首先，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地获得很多新的感性认识，并由此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其次，我们的认识之正确与否，又要拿到实际行动中去加以检查才能得到证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只有指导实践获得成功的

规律知识，才是正确的知识。如果在实践中碰了钉子，或部分地碰了钉子，就证明这种知识是完全错误或部分错误，必须加以抛弃或修改。总之，认识是服从于实践的，做什么，才要学什么，也只有在做的过程中间，才能够确确实实地学到一些东西。如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也只有在解决中国各方面的革命问题的实际行动当中，才能逐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好。脱离了实际行动的地位，我们的认识就会停止不进，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规律知识。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改变自然；二、改变社会

我们这里所说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是改变事物的行动，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的行动。这样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实际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做工，这种行动又叫做生产的实践，因为在这种行动中，人类就能改变自然，生产出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如吃的饭、穿的衣等。另一种实际行动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皇帝以及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俄国人民推翻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这种行动又叫做阶级斗争的实践，在这种行动中革命的阶级推翻腐败没落的反动阶级统治，建立新的革命阶级统治。就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改变社会的实际行动，就是反对旧社会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就是要推翻这些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我们除了继续肃清反动派之外，又要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改造，也要教育工人阶级自己，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曾经讲过，要想使我们自己有充分正确的认识，把事物的真实面目反映在我们的脑子里，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站

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我们可以完全懂得其中的道理了。旧中国广大人民（以工人农民为主）亲身遭受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最残酷的剥削压迫，并且也能坚决与专制独裁者和外国侵略者斗争，他们的亲身痛苦经验，使他们容易深刻认识到，要使中国进步必须努力打破这个束缚中国向前发展的胡桃壳。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站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上，就不可能深刻认识中国民族遭受压迫的灾难之深重，就不能认识推翻这种压迫的迫切需要。抗战胜利一年不到，广大中国人民就完全认清楚了美帝国主义的豺狼面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而把这豺狼认作老子，这就因为中国人民所处的地位是要打破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硬壳，要让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成长起来，而国民党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位是要保守这个硬壳，因此前者很容易（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之下）看到侵略者压迫者的凶狠面目，而后者却不容易看见，即使看见，他们也要装作看不见。专制独裁者经常玩弄手腕，假意发表许多民主的诺言，或者采取各种欺骗的措施，深受压迫的广大人民在实际行动中深刻认识到独裁者的诺言从来不会兑现，因此就比较容易了解他们的虚伪；但是一些比较处在上层地位的人，没有亲身深刻体验过受欺骗的苦味，却往往要受到迷惑，甚至有时受到反动派的收买拉拢，对专制独裁者产生各种的幻想。

中国广大人民的立场，就是改变中国旧社会的立场

前面讲世界观问题时，曾经说过各种世界观是代表各种社会阶级集团的看法，说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其中道理，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了。不同的阶级，对于革命的实际斗争所处的地位也不同，有的反对革命，要保守旧社会的胡桃壳，有的坚决要革命，要

不同的阶级对事物有不同的认识，就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的立场不同

打破旧社会的胡桃壳。有的比较动摇，有的完全脱离革命，但也不坚决反对革命，只站在中立旁观的地位。各阶级在革命实际斗争中各自所处的这种不同地位，使他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也有差异。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反动势力压迫时，很容易成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和广大人民一起行动，对于后者的伟大力量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也就无从理解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发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是反对人民的，他们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没有感性认识，他们的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的武装，因此“抗战必亡”就成为他们的理性认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他们的生产工作是有组织的，他们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的力量，他们也能理解组织和团结的坚强与否能决定斗争的胜败，所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就可以最后战胜日寇，也可以最后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旧社会的农民由于生活分散，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不能形成坚强的组织，虽然对于封建统治者也能进行英勇的斗争，但因为力量不能集中、不能充分发挥，以致常常遭受失败。农民阶级的这些弱点也形成了他们的认识上的弱点，使他们对于自己的伟大力量往往缺乏信心，因此封建统治者的宿命论思想就能够影响他们。但是当他们受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团结成为强大的组织力量，并起来进行斗争，那他们就会看见新的天地，就会在思想上高度地觉悟起来，抛弃宿命论的影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使自己翻身。中国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

广大农民有无产阶级领导，就能够脱离宿命论的思想，而相信自己的力量能使自己解放

斗争，其主要的成分，就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自己解放自己并解放全民族的广大人民的斗争。

以上许多例子，表明各种阶级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正确的、合乎事实真理的，有错误的、违背真理的，而这些在最后都决定于一定的阶级立场。脱离了群众的革命阶级斗争，或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眼睛不敢面对客观现实，他们的思想也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就会有许多错误的思想。反革命阶级与人民为敌，是反对社会的进步发展的，因此他们的思想也就成为与真理正相反对的欺骗人民的思想。相反的，无产阶级为了改造世界而领导和参加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的立场就使他们有可能面对客观真理，他们就有可能对于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外国有一句话说："压迫人的人，聪明的也会变为愚蠢。"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他们首先在感性认识上，就不会觉到（或不会深刻的觉到）被压迫是如何痛苦的事。因此也就不相信被压迫阶级一定要反抗到底，不到斗争胜利不止；因此他们就会发生错误的梦想，以为骑在人民头上做皇帝的事可以成为千秋万世的基业；因此他们就要愚蠢地向广大人民的铜墙铁壁进攻，不到自己碰死不止。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群人的灭亡，就是外国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的愚蠢行为的榜样，慈禧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台，就是中国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的愚蠢行为的榜样。要想不愚蠢，要想有正确的思想，最根本的条件，是要站稳革命的阶级立场，要站稳广大人民的立场。小生产者和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私的立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都是妨害正确认识的，而后者的立场甚至于还要走向有意的隐瞒真理和诈骗行为。无产阶级的集体生活、集体斗

只有和广大群众一起斗争的革命阶级，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争的立场，把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是保证我们没有主观成见，虚心学习，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立场。这也是共产党人的立场。

正确的理性认识能使我们预见将来，指导行动，不至于走错路

前面我们讲革命的实践如何产生正确的认识，现在我们又要反过来讲一讲，正确的认识对于革命的实践是如何重要。我们的认识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由感性阶段达到理性阶段，而理性认识就使我们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有了这种规律知识，我们对于周围事变的发展前途就能有先见之明，就能够预测某些事物将来一定要发生发展，以及如何发生发展，某些事物一定要消灭，以及如何消灭。我们就能照着这些预测去定出一定的方针、计划，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的行动不犯错误，使我们能走上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走消灭的道路。我们推测胡桃有肉，就去打破胡桃，我们了解石头没有肉，就不去打石头。这样地来行动，就不会枉费精力，就可以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知识，就能预测革命的前途，就能够在事先很好的作准备工作，就不至于走错路，碰太大的钉子，使革命遭受损失，总之，就是能够正确指导革命运动。例如我们认识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规律，我们在行动中，就不会像亡国论者一样灰心丧气，以至于投降敌人，也不会像速胜论者那样轻率急躁，集中很多兵力和敌人打阵地战，使民族力量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在抗战的指导上就能作长久布置，如发展游击战，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八年的抗战，就是由于广大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正确理论指导之下，才能保持民族力量的继续生长，建立了解放区，坚持到最后胜利。没有持久战的正确理论，是不可能有这样伟大成绩的。所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

运动”，只有依靠正确的理论知识及其预见来指导革命运动，才能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我们之所以必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密揭示出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知识，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指导中国广大人民胜利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指导中国人民争取使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们要再回过来讲一下：如何才能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知识？前面说过，正确的革命理论知识，是以革命的实际行动为基础，是从广大人民的实际革命行动中产生出来的知识，是经过群众实践的反复证验，是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例如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抗战以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等反动势力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已经在历史上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即经验），这些感性认识反复证明：广大中国人民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必须经过艰苦而曲折的道路，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确定地认识了中国革命要经过长期战争的这一个规律，把这些规律知识应用到抗日战争中，加上了抗日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就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的指导理论。所以持久战的理论，并不是从革命领袖的脑子里偶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因为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群众的斗争反复证明了的规律知识，所以才能够正确的指导群众的斗争。认清这一点，在我们的认识论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说，要保证

正确的革命理论，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也才能正确的指导斗争

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必须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这里讲到广大人民的立场，必须包括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和善于学习群众斗争的经验这一点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正确认识革命规律的目的。凡是做革命工作的人，不论他担负的工作大小，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熟悉他所担负的工作的规律，而要熟悉工作的规律，就必须善于学习与这工作有关的群众的经验。学习群众斗争的经验，就是要把成功的经验加以发扬推广，把失败的经验作为教训，避免将来再犯错误。试举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做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生产落后的农村里，领导农民组织变工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生产，用这一条规律知识指导生产运动，曾发生很大的效果。这条规律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不是指导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凭空想出来的？当然不是。其实它的初步经验，是农民群众中原来就有的，是由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不过在旧社会里，农民的变工组织只是临时的个别的现象。解放区的生产运动的正确指导，就是把这些农民群众原有的初步经验，加以总结、集中，把它提高、推广，成为普遍的运动。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概括和集中起来，加以提高、推广，加以普遍化，这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叫做“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也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无论担任工作大小，如果能够善于运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正确认识工作规律，就可以把工作做好，把斗争引向胜利。一个革命工作者，他必须和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并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倾听劳动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然后才有可能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掌握革命的规律

正确的认识事物和指导工作的方法，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知识,反过来又以这种知识来指导群众的斗争。

说到这里，有些知识分子一定要发问了："如你所说，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只有一条路了，这就是从中国革命的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这样一来，书本上的革命理论就毫无用处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可以不读了，甚至于中国革命领袖的书也可以不读了。"我们答复说，在前一章我们就说过，我们绝不轻视书本理论知识，而是相反地十分重视一切科学著作的理论知识。但我们又必须指出：从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是我们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要能指导中国革命工作，是要掌握中国革命（包括我们自己直接做的具体工作在内）的规律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许多普遍的科学原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及我们的各种具体工作的指导，不从这些著作中学习理论，要正确了解中国革命规律和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但中国革命中以及我们的许多的具体工作中，有着许多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例如抗日战争和持久战的规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规律、抗日游击战争的规律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并没有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解答，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些普遍原理，而对于这些特殊情况特殊规律不作独立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运动和指导这些革命工作。要掌握这些中国特有的规律，解决具体工作中特殊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革命群众斗争经验中去学习。这样，正确的学习方法，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确定的许多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群众的实践经验，来认识中国革命以及我们许多具体工作的特殊

从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是学习革命理论的正确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规律。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就因为他是这样正确地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方面是反映了他们指导革命的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经验和规律，这些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于别的国家别的时候，另一方面，他们的著作也包含着许多普遍的经验和普遍的规律，这是对于世界各国以及中国都适用的。例如要推翻封建社会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律，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规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规律，这些普遍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有了这些普遍的理论知识，就可以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某些一般方向，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般的指导。例如，根据这些理论，我们确定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包含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建立同盟关系等等。但是单只有这些一般的方向，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为中国还有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和特殊经验，不是这些一般的方向所能完全包括。我们要把那一般的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和总结这些特殊情况和特殊经验，找出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包含的新的特殊规律，例如我们由此认识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虽然也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却有它的新的特点，即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一般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我们就有了完全符合于中国情况的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了。因此，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并不是毫无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必须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自然更

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才能得到正确的革命规律知识

必须学习)，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把原来的活理论变成死理论的方法，单纯依靠书本上的某些一般原理或现成词句而不重视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错误方法。我们的方法应该是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作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普遍真理作为一般的引导，来总结出中国革命所特有的具体规律，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这叫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叫做从实际出发再回到实际的学习方法。用这种方法学习理论，就不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运动特点的具体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如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那样。

一一、是朋友还是豺狼

——真理论

前面讲过，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曾给了中国人两个相反的印象：一个是在中国广大人民眼中的印象，他们觉得美帝国主义者一天比一天更像豺狼；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印象，他们硬要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尤其在他们自己看来，更是一天比一天像爷老子。这两个印象，两种相反的认识，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照我们在前面的答复，那就是：“豺狼的印象是正确的。”读者诸君！你们赞不赞成这个答复呢？我想你们会赞成的。如果有人反对，说好朋友和爷老子的印象才对，那你们一定要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又有人说：“两种印象都正确”，你又怎办呢？你当然又要反对，说这种说法太荒谬，

太没有道理。又是豺狼，又是好朋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东西！

但是，世界上无奇不有，往往我们以为荒谬的事情偏会存在。现在我们当然还没有听到过这种议论，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又是豺狼又是好朋友。但和这有些类似的思想，还是不难找到的。在哲学上，它还成了认识论上的一个派别，曾经有许多大哲学家拥护这种主张。这种派别，叫做主观真理派。它主张人们的认识没有客观的真假标准，各人的主观就是道理真假的标准；只要主观上认为是真的认识，只要自己以为是想得通的道理，那就算是正确的道理，就是真理。因此，照这种哲学思想的观点来看，一个人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豺狼，固然是对的，另一个人硬说它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对的，反正一切道理都由人的主观来决定，人的主观上相信是对的，就是对的。两千年前曾经有一个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就是万物的标准。"这就是主观真理派的有名的格言。

主观真理派不承认认识的真假有客观的标准

你说荒谬不荒谬呢？不说客观事物是人的认识真假标准，反而说人是万物的标准了，这样的思想居然还成了哲学上的一派，哲学家的头脑岂不奇怪？但是，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这并不是哲学家的头脑奇怪，只是我们自己以为奇怪。我们早已说过，哲学并不神秘，哲学在日常的人们思想里就有了基础。主观真理派的思想也是一样，不仅只哲学家中间才有主观真理派，我们普通人中间，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主观真理派。有一种很固执的人，他们和别人谈问题的时候，总不肯考虑别人的意见，别人如果反驳他，弄得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会气势汹汹的拍起桌子来说："我就是这样主张！反正我认为对就算对。"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不是也曾碰到过这种人吗？你们对于这种人有一个批评，说他是"主观

太强”，说他是“固执己见”。这种人，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观真理派，他喜欢把“我认为”当做真理的标准，而不管他的这个“我认为”是否合乎客观事实。

还有一种人，表面上和前一种人完全相反，看起来简直是另一极端，但根本上也还是主观真理派。这种人遇到有人争论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听了甲的说话，就觉得甲对，听了乙的说话，又认为乙对。公婆吵架，在他看来就是公也有理，婆也有理。这种人你们是不是也碰到过呢？你们碰到这种人，就会给他们一些批评，或者说他是“毫无定见”，或者说他是“到处讨好”。这种人自己没有固定的主张，当然更不会要固执什么主张。他没有一定的是非的标准，当然更不知道客观的标准，别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就是他的标准。这种人，看起来好像很公平，很没有成见，实际上他是是非不明，好坏不分，其结果还是承认了非的一方面，委屈了是的一方面，帮助了坏的一方面，抹煞了好的一方面。你说美帝国主义也是豺狼，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那你就是事实上赞成它是好朋友这一个谬误思想，而不坚持它是豺狼这一个真理了。英美有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主张一个国家不但要让民主主义者有宣传自由，而且也要让法西斯反动派也有宣传的自由，他们说这才叫做“民主”，才叫做“自由”。他们反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法西斯反动派毫无宣传自由。这种“自由主义”，表面上似乎在主持公平，实际上是在帮助法西斯复活，伤害了真正的民主。这种“自由主义”也可以算一种主观真理派，因为他们否认民主的真假的客观标准。当民主主义的死敌法西斯主义者向他们说：“给我宣传的自由，否则你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也就表示赞成，说这个法西斯主义者也是在讲民主主义了。

主观真理派是荒谬的主张

好了，我们已经把主观真理派的荒谬面目揭露得够了。那么，我们是什么派呢？当然，我们就是客观真理派。我们已经屡次讲过，人类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你的认识对不对，就要看你把客观事物反映得正确不正确，看你所认识的是否和外界物质存在的真面目符合。比方我们的认识能力是镜子，一面镜子很平很光，前面来了一个漂亮的美人，照在镜子里也是一个美人；另一个镜子是凸凹不平的哈哈镜，漂亮的美人照进去，却变成了又短又肥的大肚子女人。如果这两面镜子会说话，它们互相争论起来，都坚持说："我反映的才对！"那时，你怎样去评判它们的争论呢？如果你愿意做主观真理派，你就得两面都去讨好，说："平面镜反映得对，哈哈镜也反映得对。只要你们自己主观认为对，那就对了。"但是，事实上你并没有真正两面讨好，而是委屈了那平面镜子，更得罪了镜子外面的美人。你愿不愿意做这样一个主观真理派呢？如果不愿意，那就得用另外一种评判的方法：不要依靠镜子自己的主张做标准，而要依靠镜子外面的真正的美人做标准，来比较一下，看哪一面镜子的反映是真正的面目。这样你就是客观真理派，就是把客观事物本身作为认识的正确与否的标准。

唯物论承认认识的真假要以客观事物做标准。这就是承认客观真理

当然，世界上的事情，不会像照镜子那样简单。镜子只反映外表影像，是否正确，一眼就可以看出，人的认识不但要反映事物的外表，而且要从外表的感性认识，深入到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要了解事物的本质，这就不是从旁观的地位上一眼便能看穿。这就像以前说过的，要依靠实践，依靠实际行动，在实际行动中来看它如何变化，由它的变化情形和过程来认识它的规律。你的前面有一个胡桃，你的脑子认识到它可以剥肉吃。这个认识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和客观的胡桃一致？这不是从胡桃的外表能看出

的，只有动手敲破胡桃，才能得到最后的证明。美帝国主义是豺狼还是中国的好朋友？哪一种看法合乎客观事实？这不是由外交上演讲声明之类的表面文章可以看得出来，必须在中国人民与它所发生的实际行动关系中，才能证明它毕竟只是吮吸血液的侵略豺狼。

有人又会提出一种新的反驳来了。他们说："好吧！我们就丢开主观真理派，承认真理必须有客观性，必须得到实践的验证，证明它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实。总之，我们就加入客观真理派吧！但是，客观真理派也不见得就能证明，美帝国主义一定是豺狼，而不是好朋友或爷老子。中国的人民固然得不到美帝国主义的什么帮助，但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者，却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他们得到了军火、借款、剩余物资、军事顾问、军事训练等等，他们就依靠着这种帮助，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能够给人这样的帮助，难道还不能算好朋友吗？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脑子里的爷老子印象，难道不是这一个客观事实的反映吗？中国人民觉得美帝国主义是豺狼，固然得到了实践的证明，但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爷老子的想法，不也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得到证明了吗？说美帝国主义是豺狼固然是客观真理，说它是好朋友或爷老子，不也同样是客观真理吗？"

这一个反驳，看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对。反动派脑子里的好朋友和爷老子的印象，固然是客观事实的一种反映，也有他们自己的实际行动作证明。但是他们是站在反动派保守现状的行动立场上反映事实，他们这面镜子是有毛病的，所以就像哈哈镜或坏的照相机一样，把事实反映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原来美帝国主义帮助他们，成为他们这些反动派的好朋友或爷老子，其真正目的正是要加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剥削，在实际上正是豺

狼行为的一种表现。反动派自己本身已经成了豺狼的奴才和儿子，他们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的资格，说美帝国主义是他们这些反动派的朋友或爷老子，固然是近乎事实的（所以说是“近乎”事实，是因为严格地说，那也不是什么朋友关系，而只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但如果把他们的朋友夸张成中国人的朋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错误就仿佛哈哈镜一样，把原来短的东西，拉成长的影像，或把原来的瘦人照成胖的影像，和真正的事实完全不符合了。自然，反动派是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做中国人的资格的，他们一定要以中国的主人自居，甚至把自己称做中国的惟一代表，而把广大的人民，把中国真正的主人看做它自己和它爷老子的奴隶。这是他们的反动立场使然的。正是由于这种反动立场，才使他们的主观的镜子所反映的认识影像，成为错误的，荒谬的，违背真理，带有欺骗性质的。按照中国广大人民的实践经验来说：只有明确的指出反动派没有代表中国人的资格，而反动派的“朋友”和爷老子决不等于中国人的朋友，这样才合乎客观事实真理。

好了，现在我们明白真理必须有客观的标准，必须要符合客观事实了。我们不能按照反动派的主观想法，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只能按照广大人民的实际经验，证明它是一只残忍狡猾的豺狼。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否认另一方面的事实，就是：如果对于反动派来说，那么，美帝国主义者的确可以算作爷老子，因为美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给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撑腰，也的确是一个事实，并且也是广大人民在实际斗争中体验得到的。因此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说美帝国主义可以有豺狼和爷老子的两重资格。我们所反对的，只是说它对同一中国人民可以同时有两种资格，如果说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是豺狼，而另一方面它对反动派却是爷老子，那这种说法我们还是完全赞成的。为什么

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又赞成美帝国主义者的两重资格了呢？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必须讲出一番新的道理。这个新的道理，叫做“真理的相对性”。什么叫做真理的相对性呢？就是说真理并不是绝对不变，它只在一定的客观情形下才是真理，客观情形变了，真理的看法也就要变。我们说美帝国主义者是豺狼，这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的，如果对于反动派卖国贼，那就要说它是有了爷老子的资格，才能算真理了。总之，我们对于事物的某一种认识，常只是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才是合乎事实的，如果换了一种情形，就不能照那样认识了。原来世界上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身，都是有这种相对性的，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就会发生不同的关系、作用，就会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就要按照不同的情形，对事情作不同的了解，才能正确的反映事实。如果情形不同了，而我们的认识和了解依旧不变，那就不能反映客观事实，就会变成主观的错误了。再把美帝国主义拿来研究一下吧，我们说它对中国人民是豺狼，这是不是不管任何情形之下都能这样说的呢？也还不是，因为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我们只是对美国反动的统治者才能这样说，对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人民和美国的民主分子，就不能那样说，不但不能那样说，而且还要坚决肯定地说美国人民和民主分子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第二，就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也只因为它对中国实行了豺狼的政策，才说它是豺狼，其实在有些情形之下，也不是绝对不能成为一时的朋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政府参加了抗日战争，虽然就在这时他们也已经包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豺狼目的（因为这是它的本质），但在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一点上，他们暂时成了中国的盟友，并且不仅仅是一部分大地主

认识只在一定的情形下才是真的，这是真理的相对性

大资产阶级的朋友，而且成为抗日的中国人民暂时的盟友。所以，客观事物是有相对性的，是跟着情形的不同而常常变化的，我们的认识，既然要以客观事实为真理的标准，因此也必须要能反映出这种相对性来，必须在不同的情形下对事物作不同的理解，才能正确无误，才能成为客观真理的认识。

读者们或者要问："照你所说，你又是相对真理派了。你主张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对的，只在一定的情形之下，或者对一定的事和人才是真的，在另外的情形之下或对另外的事和人来说就变成错误了。你反对绝对真理派，你认为一切道理的正确或错误，都不是绝对不变的。今天你承认的道理，明天你就可以坚决反对它，在这一块地方你说的话，在另一块地方你就可以完全否认，你的一切主张、认识，都要准备随时把它抛弃，都不必对它负责。这对不对呢？"如果有人像这样提出问题，那是一个误解。我们主张真理有相对性，绝不是表示对自己的主张和认识可以不负责任，那是极端的相对真理派的想法，这种想法也叫做"相对主义"。我们不是极端的相对真理派。我们认为真理有相对性，同时也有绝对性，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这是怎么解释呢？请听我慢慢解释。

"相对主义"是错误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

先要把什么叫做绝对真理弄清楚。有一种极端的绝对真理派，他们认为真理不能有丝毫相对性，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认识才是真理，那就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有丝毫改变的认识，如果情形变化，认识就必须有相应的改变，那这种认识就不算真理了。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本质上像豺狼，同时在太平洋战争中又说它是我们一时的盟友，在极端的绝对真理派看来，这种认识就不是绝对不变的，因此也就

极端的绝对真理派也不对

不能算做真理了。请问读者诸君，你们赞不赞成这种极端的绝对真理派？我想你们一定不赞成。因为你们明明知道，把美帝国主义看做豺狼的认识，是反映了当前的客观事实，符合于客观的标准，所以就得要承认它有真理的性质。不能因为一种认识要跟着情况变化有若干相应的改变，就说它不是真理，而且恰恰相反，只有跟着事实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地改变，我们的认识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才能够有客观真理的价值。如果客观的情况改变了，而你的认识偏要坚持不变，那才一定要成为错误。所以极端的绝对真理派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反对世界上有一种绝对真理，不过我们所说的绝对真理，与极端的绝对真理派所说的意思不同。我们所说的绝对真理，不是指那绝对不变的认识，而是指一切经过实践证明的符合于客观实际情形的正确的事物规律的认识。我们说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有类似豺狼的作用，是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来流血痛苦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就有它的绝对性。但是，承认了这一点绝对性，并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的特性就仅仅限于这一点，并不是说这一个真理就不能再有其他方面的表现，就不能再被展开，不能再有所补充了。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美帝国主义者也曾短时期成了盟友，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真理。所以，真理既是经实践证明，就有了客观性，也就有一定的绝对性，同时真理的认识又不是一次完结的，它是随着客观事情的变化而不断地展开新的方面，要有所发展和补充的，所以它又有相对性。

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

弄清了什么是绝对真理，那么，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密切关系，也就很容易了解了。这是怎样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指出：绝对真理是无数的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知识的总和，每一种正确的客观规律知识，都

是具有绝对性的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的一片断或一部分，同时，每一种客观规律知识，又都是在一定情况之下所达到的一定有限的认识，又都是一个相对真理，所以，也可以说全部绝对真理乃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我们已知道，任何事物的规律，都不是一下子就会全部展开出来，而是在发展当中一步步地表现出来的。对于普通的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中国人民来说，今天美帝国主义者才表现出豺狼的面目，而昨天它的这种面目却完全隐藏着，并且还是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出现。要想一下子认识事物的全部规律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认识到绝对真理的全部，而只能在事物认识的发展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接近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就认识了帝国主义的许多规律，但那时还没有法西斯主义，所以列宁的书里也还没有提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规律。现在我们认识到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规律，这是比列宁在的时候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丰富、更完全了，但是世界的帝国主义一天没有完全倒台，就可能还有许多新的变化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去掌握。即使帝国主义完全倒台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也还不能完结，因为那时我们又要去发现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许多规律知识。因此，我们的认识，是经常有相对性的，我们每一个时期所得到的认识，都受着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之限制，都只能认识一部分的事物规律，而不能把事物的一切规律吸尽。但是，这样的认识同时又是有绝对性的，因为每一种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它本身就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绝对真理并不是超然在这些相对真理之外的东西，而是无数相对真理

我们不能一下子认识全部的绝对真理，而只能在认识的发展中一步步去接近它

我们的每一次认识都有相对性，同时又更接近完全的绝对真理，这就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

的总和。我们的每一次新的认识，都表示我们的认识更完全、更接近于全部绝对真理，都是在总的绝对真理认识宝库中增加了一份财富。我们不能像极端的相对真理派那样，以为今天认为是真理的，明天就可以认为是绝对的错误，对自己的思想可以经常抱不负责和没有信心的态度，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重视每一种情形下所得到的新的知识，虽然明天在另外的情形下又必须有另外一方面的看法，而不能把今天的认识照样引用，但今天的认识，仍是表示比昨天更进一步接近了绝对真理，仍要承认这是更多的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一个新的方面、一个新的部分。我们今天的新认识，不是把昨天的真理完全打倒，而是使它得到更完全的补充。恩格斯曾认为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胜利，这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帝国主义以前的时期）说来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理。但到了列宁、斯大林的时代，由于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所以就应该说主张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胜利，才是客观真理。有了列宁、斯大林的新的理论，并不就可以说恩格斯在当时所主张的不是真理，而只能说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革命理论作了新的方面的补充，使它更丰富、更完全。总之，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真理认识的相对性，因此就永远不应满足于现有的知识，而必须不断努力，不断调查研究，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和学习新的知识。另一方面又要相信我们每一次获得的正确的认识虽然一方面是相对真理，但另一方面同时又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要相信无数相对的真理积累起来，可以不断接近绝对真理，因此就要学习积累知识，不要把任何有价值的经验教训随便忘掉，天天努力使自己的经验更加丰富，认识更加完全，以便更有能力正确地、周密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更善于指导工作。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一二、天晓得

——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前面许多次的讲话里，我们所谈的都是认识论的问题，现在就要把它结束，另外开始来讲一些新的东西了。这一次的题目叫做“天晓得”。这是一句大家听得很熟的俗话，用这句话来做题目，其目的之一，是想使大家容易感觉得有兴趣，不至于因为以前讲了很多而疲乏起来。

“天晓得”，这句话我们在前面讲认识论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它所包含着的一种哲学思想，也略略解释过。当我们听见有人讲“天晓得”的时候，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定是他碰到了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使得他感到没有办法，使得他叹息，觉得人类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他要告诉我们：有许多事情，只有“天”才晓得，人是无法晓得的。这种思想，就相当于哲学上一种关于认识论的见解。过去哲学界曾讨论过一个问题，叫做人类的认识能力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解答的事情是：“人类究竟能够晓得多少东西？”“天晓得”这句话，就给了一个解答，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所能晓得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有很多事情，人就无法知道。我们不要以为这一个解答很平凡，而小看了它，要知道这种解答在哲学历史上也曾一时占了重要地位，成为很时髦的哲学思想。前面说过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就是“天晓得”一派的有名

“天晓得”的思想就是“不可知论”

领袖之一。他认为人类只晓得事物的表面现象，至于事物本身的真面目（他叫做“物自体”），就不是人类所能认识得到的了。不过康德是个大学校里的哲学专家，他不喜欢用老百姓的俗话谈问题。他没有把他自己称做“天晓得”派，他的哲学，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这就是前面也提到过的：“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固定不变的

大家知道，我们是不赞成“天晓得”的思想的。过去几次的讲话里，已经说明过它为什么不对的道理，我们在这里不妨再提一下。主张“天晓得”的人，他们先就把人类的认识能力看做固定的东西，这就是说，人永远只晓得那么多的东西，除此而外，就只有“天晓得”！一个胡桃摆在前面，让“天晓得”一派的哲学家来看时，他一定说我只能知道这是圆而硬的褐色东西，至于它的内部是怎样呢？那是“物自体”“不可知”，那只有“天晓得”。美国曾是反法西斯国家，也叫做民主国家，美国的当局发表公文、演讲、声明之类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要拥护民主政治，但是法西斯国家打倒以后，在德国、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美国所采取的实际行动都是包庇法西斯势力，特别明显的就是麦克阿瑟在日本极力支持天皇的老地位和反动派组织的内阁。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让“天晓得”派来答复，那就仍然是这一句话：“不可知！可知的只是那些表面的声明、演讲之类，以及这些包庇法西斯的外表行动，至于为什么的问题，那是美国本身的‘物自体’，我们的认识能力不能渗透进去，不好妄自猜测。”读者诸君，你也许要反对我了。你会说：“世界上哪里有这种蠢人，连打破一个胡桃都不懂得？何况善于思想的哲学家，他们的头脑更不至于这样简单。你所谓的天晓得派，恐怕是一种虚构吧。”请你不要着急！你要注意我们提到胡桃的事情只是一个比喻。凡是比喻，总是特别的简单，

其目的是要使人容易明了，不要被高深复杂的弯弯曲曲的道理所迷惑。世界上的确没有这种蠢人，连胡桃也不懂得打破，但这是因为胡桃的事很简单，人人容易懂得，碰到复杂的哲学问题，就不一定这样了。你不要以为“不可知论”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如果你能抓着它的根本思想，你就会知道，“不可知论”派哲学家的想法，在实际上就是那么愚蠢，等于不懂得打破胡桃。他们以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固定不变的，人类所能知道的东西是有一定限制的。他们不懂得经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可以把事物内部隐藏着的东西揭露出来，使最初在外表上看不见的东西，终于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使“物自体”变成能供人利用的事物，使“天晓得”变成人晓得，使人的认识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深入。

“不可知论”不懂得实践可以使人的认识进步

所以，我们反对“天晓得”派的主张，因为它在实际上是一种很愚蠢的思想，不合乎人类认识的事实。人类所能晓得的东西的确是一天天在进步，有许多事情，在从前人看起来只是天晓得，但现在却被人晓得了。有许多事情，我们在幼小时候看起来莫名其妙的，长大了几岁以后，就觉得非常明白了。认识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种认识都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都有相对性，都是认识了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关系、作用和规律，我们能够把这部分的认识不断的增加、积累起来，逐渐接近完全的绝对真理的认识。认识是一种历史的过程，是在人类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种运动，没有静止不变的认识。所以，在我们过去许多次的讲话里，完全没有提到人类能晓得的有多少，不晓得的又有多少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不需要这样问。今天我们虽然有些事情不晓得，但明天说不定就可以晓得了，没有什么绝对不能认识的“物自体”。没有破壳

人的认识是发展的，没有静止不变的认识

的胡桃肉是“物自体”，破了壳以后就变成能供人利用并能为人认识的东西了。我们只能问目前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晓得，却不能说我们所晓得的东西永远只是这些，而另外的东西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晓得。

我们要研究人类的认识怎样发展进步的问题

我们既然不能问人类晓得的东西有多少，也就不必白费精神去研究什么认识能力的问题了。我们只知道人类的认识是不断进步的，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认识怎样进步、怎样发展，怎样把认识积累起来，不断接近完全的绝对真理，怎样使我们所晓得的东西一天比一天更丰富、更全面。前几次讲话里所谈过的，也不外就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简单总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答复了人类所晓得的东西（也就是人类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认识都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我们所晓得的东西都是周围世界事物的影像，不是我们头脑里凭空产生的。其次我们问：这种反映是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只摄取外表的影像？我们的答复是不完全像照相机。我们一方面经过感性的认识摄取事物的外表形象，这一点倒有点像照相机，但我们的认识不仅只限于事物外表的反映，还要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关系、作用和规律，了解它的根本性质（或叫做本质），这就还要有理性的认识，这就不是照相机一样单从外表可以反映出来，而要用我们的理解力去认识。我们再问，我们的认识为什么能从事物外表的认识深入到根本性质的认识，为什么不单只有感性认识，而且进一步有理性认识？我们的答复是：人类的认识和照相机还有一个不同之点，就是人类并不像固定不变的照相机一样，只是消极的简单接受外来的事物影像，人类是天天在实践、在行动、在改变周围的事物。人类改变的事物，概括起来说，就是社会和自然。所

谓改变社会的行动，就是进行革命的社会运动，进行阶级斗争，在中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对人民内部各阶级进行教育改造，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所谓改变自然的行动，就是进行生产。农人种地，工人做工，都是生产的行动，都是改变自然的行动。人类就是为了要能够正确地进行改变社会和改变自然的这些实际行动，才要来认识事物。人类就是在这种行动中不断的发现新的事物，接触新的事物，不断的使自己的感性知识丰富起来，同时就把这些感性认识加以总结、理解，找出事物内部的确定的关系和规律。所以实际行动是我们认识的基础，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才能真正认识革命的规律，亲身下水游泳的人才能真正认识游泳的规律。这些规律的知识，对于人类有什么用处呢？有了事物规律的知识，就可以预测事物的发展，就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在实践当中做得很正确，不至于碰大的钉子。因此认识虽是以实践为基础而发展起来，但它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实践。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认识指导实践的时候，又必然接触新的事物，这样一方面可以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检查和证明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又可以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进一步总结出新的理性认识，使我们原有的知识可以得到补充、修正和发展。总之，我们的认识是和实践结合着的一种发展

人的认识是和实践结合着的发展过程

过程：它首先在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再用我们的认识指导实践，再在进一步的实践中检验和证明我们的认识之正确与否，同时再获取新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由实践到认识，又由认识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又得到新的认识，又再进一步去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我们的认识就不断的前进、发展，就愈更高度地接近绝对真理。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认识

到美国一个时候成了我们共同作战的盟邦，我们以这种认识指导我们的行动，和美国（以及苏、英等其他国家）建立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关系，结果共同打败了日本，这证明我们前面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这种同盟关系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已得到了许多另一方面的认识，首先我们回想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帝国主义始终没有真正帮助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已参加抗日战争了，但我们从种种事实上仍可以认识到美国政府的反法西斯政策是不彻底的，特别到日本投降以后，更看出它的行动和我们中国人民的斗争要求相反，不是彻底肃清法西斯残余，而是包庇这些残余和反动派，并帮助它恢复力量，不是真正根绝法西斯独霸世界的侵略思想行为，而是要用它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来代替这种思想行为。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用这认识指导进一步的行动，就是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在这些实践行动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认识，例如我们认识到美国人民中可以找到我们的朋友，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要求世界和平。因此我们又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只能代表美国一小部分帝国主义分子的要求，而不能代表美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分子，我们还可以继续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人民民主自由的联盟。这样，我们的民族斗争的实践和我们的认识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不断地循环往复地使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步比一步地更加提高，更加完全。

以上我们把认识发展的情形简单的重述一遍，算是把前几次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讲话作了一个收场。现在我们就要给新的讲话开锣了。什么是我们开锣的新节目呢？这就是关于认识方法的问

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题。为什么还要讲方法的问题呢？因为不讲方法，即使懂得了以前的一切道理，也还不能够很好的认识事物。把以前的道理，在实际上应用起来，不外是两点：第一，我们的认识既是与实践密切结合着，因此在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有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要和广大劳苦人民的实践行动一致，也就是要以广大人民的利益或斗争要求为我们认识的出发点；第二，认识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事物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的规律知识，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就要有唯物论的观点，也就是一定要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一定要积累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实际斗争经验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要以个人主观的猜测来解决问题，不要轻率的凭着书本上引用的某些话和自己的"想当然"来解决问题，而要一方面善于用科学著作的普遍原理作研究指导，另一方面又善于依据广大人民的实践经验去掌握具体事物的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但是，有了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有了唯物论的观点，是不是就够了呢?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正确认识事物的规律了呢?那还是不一定。那还要讲正确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方法讲得不好，即使你有真诚为人民服务的一片好心，即使你调查了许多事实材料，积累了许多经验，你没有好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那还是不容易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规律，那你也就不能正确指导实践，你也就空有一片为人民服务的好心而不能很好的达到服务的目的，因此你的立场观点的正确性，也就要打折扣，也就不能完满表现出来。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方法，不要正确的立场和观点，那你这方法当然也是空的，也是无的放矢。中国有一句话说，"巧妇难为无米炊"，善于做饭的女子，如果没有米，也没有办法做出

好饭来。把认识比做做饭，那么，客观事实就是米，而思想方法就好比“巧妇”做饭的方法。你首先要想法得到米，你才能使她的做饭方法有地方施展出来；你先要让客观事实材料有可能充分反映到脑子里来，你的研究方法才用得上去。怎样才能使客观事实有可能充分反映进脑子里来，首先就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没有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跟广大人民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地打成一片，你就不能真正体验到人民的痛苦和改变社会的迫切要求，你就等于闭了眼睛不愿去看世界的真相，说得严重一点，就等于有意无意跟着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去做欺骗世人的勾当，这样你就失去了忠实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就等于断绝了认识的米的来源。没有正确的唯物论观点，一切只依靠你自己主观的推想，这也就使客观事实材料不能很好的反映到你的脑子里来。总之，没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你就不可能获得正确认识的米，即使真有那么一个思想上的“巧妇”，也不可能做出认识上的好饭，即使勉强做了，那也只是一些主观的空论，不是客观的真理。反过来说，没有好的方法，立场、观点的正确性也不能圆满表现出来。立场、观点、方法，这三个东西是不可分开的，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学习怎样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非常正确，就是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主要的也就是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要简单地去死记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文献上的许多片断条文。仅仅记得马克思主义书本文献上的条文词句，而不懂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这叫做教条主义的学习。懂得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能够很好应用，这就叫做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实质，这才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如果能够这样，那即使不能把书上的词句倒背如流，也不要紧。

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我们以前既然把立场、观点的讲话收了场，以后就必须为方法的节目开锣了。我们讲方法，是以什么为目的呢？是要告诉大家：方法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不正确的，我们就要反对它，抛弃它；正确的，我们就要学习它，掌握它。掌握正确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没有米固然做不成饭，有了米，没有好的方法，也做不好饭，也只是把宝贵的米浪费了。

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什么是不正确的方法呢？这当然要以后慢慢加以说明，才能够详细知道，但现在也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的特点提示一下：正确的方法，就是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一致的方法，不正确的方法，就是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例如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会变化的，这是事物的规律，如果你用变动的方法、变动的眼光来看事物，你的方法就合乎这规律，它就会是正确的；如果你把事物看做不变的，你就违反了这规律，你的方法就错误了，即使你调查了很多材料和积累了很多经验，你的认识仍然不会正确。例如，反动势力现在表面上好像还很强大，你如果应用变化的方法，就得要研究它的这种强大如何要变为弱小，走向没落，就要注意从你所调查的事实材料和积累的经验中，去找出它由强变弱、由大变小的原因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就是正确的。如果你用了相反的方法，把这种强大看做永远不变的，你的思想就自然而然的去寻找出它如何强大的理由，而不注意相反方面的材料和经验，那么，你的研究就会错误，这种错误会使你悲观失望，使你对推翻反动势力没有信心，不能勇敢的进行斗争和指导斗争，无意中把你引到为反动势力服务的立场上去，也就是在客观上成为他们的辩护者和帮助他们巩固了统治的地位。

正确的方法，是与事物的发展规律一致的方法

我们所说的正确方法，就是辩证法的方法；不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就是辩证法，不正确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辩证法本身，就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应用辩证法的方法，就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真面目。形而上学的方法是违反事物的辩证法规律的，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会发生认识的错误。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我们主观上“想当然”得来的，这也是经过千千万万人类的实践的证明才得到的结论。因为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几千年来，人类在实践和认识当中，有的时候运用了辩证法，有的时候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结果证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认识事物都得到了错误的结果，而应用辩证法方法都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因此我们讲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就要告诉大家来认识什么是辩证法的方法，并且好好学习它，同时看清楚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如果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在用这种方法，那就要努力丢掉它！

一三、无风不起浪

——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

现在我们要开始解释辩证法的规律了。我们选择“无风不起浪”这个成语来开头。你们听见别人讲过这个成语吗？如果听到，请回忆一下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讲的。我听到这成语的时候，是在“九·一八”后的第二年，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把我们的东北抢去了。当时就听到一种风传，说汪精卫以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许多要人都跟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勾结。大家知道，汪精卫在当时还不是公开的汉奸，他还是蒋介石的所谓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中国的一般人民只知道是张学良丢了东北，而不知道当时张

学良的不抵抗行为是受了国民党最高负责人即蒋介石的命令。所以有些人听说国民政府内部的要人也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往往会发生怀疑，甚至于认为是怪事，并且很关心的问道："真的有这事吗?"对于这样的疑问，就有人用"无风不起浪"的成语来作答。他的意思是说：凡事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没有风，绝不会起浪，现在风传国民政府的许多要人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那一定有它的原因，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

"凡事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这就是"无风不起浪"这一个成语里所包含的重要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头脑里都存在着。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一切事物的出现，总有它出现的一定原因，一定的道理。我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一种事物是毫无一点原因而凭空存在，如果我们感觉到有什么事物是没有来由的，我们一定要对它发生怀疑或者感到奇怪，一定要去追究它究竟为什么出现的。而如果我们用心去研究、去寻找，总一定能够把这些事物的发生原因和条件找出来。

拿前面所说的例子来讲吧。对于当时的风传，有的人所以会怀疑以至感觉到奇怪，正是由于它们没有看见它的原因和条件，或者没有去研究它的原因和条件。如果他把事情加以研究，找出了它的原因和条件，那他的怀疑奇怪都会打消，而承认这是很自然的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风传呢?你研究以后，就会发现这样的原因：原来那个国民政府并不是真正代表国民的政府，它是一些主张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所垄断的政府，而汪精卫就是其中之一。凡是专制政府，都要压迫人民，反对民主，以保持少数人升官发财荒淫腐化的剥削寄生的生活地位。为了这目的，他们不惜采取任何卑鄙无耻的手段，他们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向外国侵略者摇尾乞怜。清朝皇帝曾提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

口号。袁世凯为了要做皇帝，不惜答应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卖国条件。蒋介石国民政府也是专制独裁的政府，因此蒋介石自己出卖国家民族以及它的要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乃是毫不足奇的，而“九·一八”后的那种风传，也绝不是毫无来由的。

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围的某些事物有一定的联系

“无风不起浪”这一个成语，表示我们一般人的思想里多多少少都认识到一条辩证法的规律。这条规律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不是与周围的其他事物毫无关系的。每一事物都和周围的某些事物有一定联系，都和这些事物有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什么叫做互相依赖？这就是说，这一事物的存在和另一事物的存在是分不开的；没有另一事物，也就没有这一事物，反过来说，没有这一事物，也没有另一事物。什么叫做互相制约？就是说，这一事物的变化，也必然引起另一事物发生变化。风和浪是联系着的，有风就有浪，风平就浪静，风的大小，又必然引起浪的大小。请你随便举任何一个例子来说吧，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件事物，可以不依赖周围其他事物而孤立存在的吗？可以完全不受周围的任何影响而永久固定不变的吗?我敢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做不到这一点！这并不是我敢大胆夸口，而是因为事物不能孤立存在，乃是一条最普遍的物质规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逃不出这条普遍的辩证法规律，正如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试把你自己来做比方，首先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世界上就不会有你这一个人存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环境，你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生活。你的生活之所以和美国人不同，就是由于你的周围环境和美国不同；你的环境不是资本主义的环境，而

联系就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

事物不能孤立存在，乃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社会主义的环境，因此你的生活只能在两条路中间择取一条：或者是做一个革命者，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或者直接、间接地跟反动势力走在一道，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并向帝国主义者屈服。你在社会上生活，必须有一定的职业，或者一定的工作岗位，你的职业或工作岗位就为你过去的生活经历和学习过程所决定。例如，你过去如果没有学习过文化，就不可能在文字宣传岗位上工作。再举其他的一些例子来说吧：树木要依赖一定的阳光、水分、肥料才能生长，大雪要在北方的冬天才会降落，牛羊要依靠吃草，虎豹离了肉食就不能生活，不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地租，就不能做地主，不投资开工厂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就不能叫资本家。任你举无数千万的例子，都可以证明，你所举出来的事物，都和它周围一定的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和它们有互相依赖和制约的关系。这些周围的事物，就成为它的产生或存在的原因和条件。这种关系，我们叫做事物中间的“有机的联系”。世界上每一事物，都和周围的事物有机地联系着，都有一定的周围事物作为它的原因和条件，它也就是由于有这一定的原因才能出现，就是由于在这些条件之下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这些原因和条件变了，那么它本身也要发生变化，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继续存在下去。

事物互相依赖、互相制约，这种关系叫做有机的联系

这就是辩证法的第一条主要规律，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首先就是违反着这条规律。按照辩证法的这条规律，整个世界的事物，不是各自孤立，而是有机的互相联系着，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按照形而上学的看法就正相反对，认为世界的事物都没有联系，事物的发生和存在都不必以另外的事物作为原因和条件，整

事物的有机联系是辩证法的第一条主要规律。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首先违反这条规律

个世界就是无数分散孤立的事物偶然凑合在一起。中国的宗教神话里，认为人可以修炼成神仙，做到不饮不食，长生不老，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为什么它是形而上学的幻想？因为它以为世界上有一种人，可以不依赖任何条件而能生存下去。读者诸君，你们觉得这种神话很荒谬么？你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就知道它是完全的荒谬，就知道世界上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神人存在。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的思想受了形而上学的影响，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走到这一类的荒谬的道路上，那时你不但不觉得它是荒谬，而且还以为你的道理满对。比如你有一个朋友，他在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下面升官发财了，他得意洋洋的向你夸耀："这全仗我的本领！"你一听这话，觉得满对，你想，没有本领的人怎样能升官发财呢？别人不能升官发财而他能升官发财，可见全仗他的本领了。请你不要见怪，我这只是作一个比方，并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来看问题。但假定你会这样来看问题，那么你就是中了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毒了。一个人在哪种情形下能够升官发财，是有种种条件的，例如要和贪污腐化的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要依赖反动统治者中间的亲戚故旧的关系，要昧着良心剥削老百姓。如果你忘记了这些条件，真正相信升官发财全仗他的本领，那你就是受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把人的本领和周围的各种条件隔绝，把一个人的升官发财这件事情看成孤立的现象，这种看法，乍然间你也许发现不出它的错误，但仔细研究一下看看，这样的想法，不是和相信仙人能不饮不食、长生不老一样荒谬么？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人们的思想，那么，像有这类荒谬想法的人，不是也很不少么？

好了，我们已经把这一条规律的内容大体上说清楚了，同时

按照有机联系的规律，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首先就必须认识与这事物联系着的原因和条件

我们认识事物时所应该采取的正确思想方法也很容易明白了。既然一切事物都和周围一定的其他事物有着有机联系，它的发生和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那么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事物的时候，首先就必须研究哪些是和它有着联系的事物，就要去找出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条件。试把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思想拿来仔细研究一下，你就发现它总是很好地应用了这一种方法的。持久战的理论，是在八年抗战中完全得到了实践的证明的伟大的正确理论，这理论一开头，就告诉了我们中日两国的几种条件的对比（敌小我大，敌强我弱，敌是退步的而我是进步的，敌人在国际上的援助较少而我的援助较多)，告诉我们在这种条件的对比之下，为什么中国抗战一定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为什么一定能争取最后胜利而不会走到亡国论者所想的那种悲观前途。由于认识了持久战是必然的规律，因此在指导抗战的时候，就必须依照这个规律去做，就是不要急躁，不要求速胜，也不要悲观失望，要耐心地正确地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以至争取到最后胜利。

不能把事物的原因和条件弄清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要把事物的发生原因和存在条件弄清楚，才可能正确的了解这一事物。错误的认识都是由于弄不清楚事物的原因和条件，或者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些原因和条件。速胜论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认清敌强我弱的条件；亡国论的错误，就是由于只看见这一个敌强我弱的条件，而没有看见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条件。不认识一事物的原因和条件，你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不能了解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就会对于它觉得怀疑，或者觉得奇怪和莫名其妙。虎豹的爪牙为什么

不认识原因和条件，就不可能了解一事物存在的意义

那样尖利呢?为什么牛马的牙齿就不是这样呢?如果你不知道前者是要依靠肉食，而后者依靠草食，你就不知道两种不同的牙齿存在的意义。反动势力为什么对人民那样野蛮残暴？如果你不知道反动势力要依靠剥削和压迫人民而生存，你就很难明白它一定要这样野蛮残暴的道理，更不懂得在这野蛮残暴的外表背后，还包含着它的弱点，就是说反动势力在实际上是很孤立的，是与广大人民对立的，它不能不用野蛮残暴的行动来补救它的孤立地位，如果人民都觉悟而且团结起来了，对反动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进行坚强的抵抗，它就可能被打倒，它的野蛮残暴的面目只有纸老虎的意义，那强大的外形是迟早可以戳破的。

当我们研究一件事物的时候，首先自然是要有充分的调查材料并且积累许多实际经验，有了这些事实材料和实际经验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些材料拿来研究分析，而研究和分析的方法，首先就要从它里面找出我们要研究的事物所联系着的那些原因和条件来。即使表面上好像是同一的事物，如果它所联系的条件不同，我们就要给予不同的了解。例如人类，如果照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起来看，而不依照人所依赖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了解，那么，世界上任何一国家、任何一阶级的人都是同样的人类，都是一种最高等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如果照辩证法的方法来看，我们就会了解，虽然同是人类，由于他们所依赖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就有了阶级的分别：靠收地租不劳而食的就是地主，佃地耕种受人剥削的就是农民，投资开工厂剥削劳动者的叫做资本家，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一点资产，因此也只能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叫做无产阶级。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地

同一事物，在不同条件下就要有不同的性质和规律，就有不同的意义

点、不同的时候，就会联系着不同的条件，因此也就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性质和规律。同是广大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在苏联，因为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所以就能采取正规战争，在较短期间打倒敌人；在中国，因为生产条件落后和大部地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就只能以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抗击敌人。这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地点所表现的不同性质。同一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丘吉尔，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以前，曾经积极主张与苏联联盟反对法西斯国家，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倒以后，却转过来阴谋组织英美联盟反对苏联，以前所以要联苏，是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疯狂侵略行为已威胁了英帝国的基础，以后之所以又反苏，是因为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已经没有了，又露出了保守党的帝国主义面目。这是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规律。一切事物既然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联系条件，因此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也必须善于根据这不同的地点、时间和条件，认识事物的不同意义。所以说："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凡是正确的理论，都一定是正确地根据地点和时间、条件，认识出事物的特殊的意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新民主主义论》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但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看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种特殊的性质？这就是因为首先看到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新的时代条件，即在国际上，是处在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的时代，在国内，中国资产阶级很软弱和无产阶级已经觉悟，并且已经有了它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

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

总之，如果我们要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事物，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注意与这事物有机地联系着的条件的变化，以及这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事物的变化。我们特别要注意新的条件，以及这新条件所产生的事物的新意义，如像新民主主义理论所做的那样。这叫做具体研究问题和具体认识事物的方法。只有具体地认识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才能反映事物的真面目，才能反映客观的真理。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两句辩证法的名言，第一句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对于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又一句是说："没有抽象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不具体认识各阶级人们的不同的生存条件，只一般的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人类，这种认识就是抽象的认识，这种认识绝不能把人类生活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所以抽象的认识不能反映客观真理，只有根据各阶级的生活条件来分析清楚不同阶级的人类，才能得到人类生活的真理的认识。

要注意事物的条件变化，特别要注意新的条件所产生的事物的新的意义

要具体地研究问题，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

有两种错误的思想方法，都是不懂得按照地点、时间和具体条件来认识事物。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例如把书本上学习到的某些一般的革命规律知识硬套在中国社会上，而不管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在这种具体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有的人用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规律知识来套，于是就说中国革命要让资产阶级去领导；有的人用一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知识来套，又走了另一极端，说中国马上就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思想，都没有经过具体的研究，忽视了中国当前的具体条件，所以都不能认识中国革命的真正性质。还有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思想

不研究具体条件，就是抽象的认识，这种认识都不是真理

方法，这是有些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往往犯的毛病。他们喜欢把某一地点或某一时期的经验，拿到其他的地点和时间里去随便应用，而不管另外的地点、时间里是否已经发生了新的条件，是否应该有新的认识。苏联的剧本《前线》里所描写的戈尔洛夫，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以自己有俄国革命初期内战的经验而自豪，他把这经验拿到苏德战争中来应用，仍以为打仗只要勇敢就能解决问题，而不知道苏德战争是以高度的技术条件为基础的战争，单凭勇敢是不能争取胜利的。不论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过去获得的某些认识当做简单的现成的公式，死板地用到新的地点、新的时间之内来，而不管具体条件的变化。两种方法都违反事物的辩证法规律，都是脱离具体条件孤立地观察问题的形而上学方法，都对于我们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要求有很大妨碍。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思想里有这种方法的成分，就要努力想法把它清除掉！

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都是不能够研究事物的具体条件，都是违反辩证法规律的错误思想方法

一四、不是变戏法

——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

世界上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变动，这是我们人人看得见，人人承认的事。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变动呢？对于这问题，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一种见解，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变动，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

凡在较大城市住过的人，没有看过变戏法的，恐怕是很少了。大戏院里常常有大规模的戏法表演，有时也可以在街头碰到跑江湖的卖艺。通常的戏法，不外是把一件东西变成另一件东西，例如一

根棍杖放到毡子下面，立刻爬出一条蛇来；一粒米放在杯子里，他可以给你变成一满杯；或是一些枯干的水草放进玻璃缸去，用手帕一盖，就变成满缸水里游的活生生的金鱼。这一类的变法，在戏法中是最普通的，无论在大戏院里或街头的卖艺里，都是常有的节目。

观客对于魔术师所玩的这些把戏，照例是睁大着好奇的眼睛去观看，有些人对于这种变化往往会深信不疑，以为棍杖真的给魔术师变成了一条蛇了。真的，一个变戏法的人，如果不能使观客惊奇、赞叹和信服，他的戏法就根本没有人来看，也就不要想靠这一门职业来吃饭了。他要把他的技术弄得极其巧妙，使看的人出了钱，受了骗，还要信以为真，感到非常满意。其实棍杖并不真的会变成蛇，一粒米也绝没有真的立刻会变成一杯米的道理。魔术师不过是预先将蛇和满杯的米藏在观客所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到了临台的时候，秘密地搬出来，暗中和棍杖之类调换，巧妙地蒙混过观客的眼睛，戏法就算变成功了。

这就是变戏法的变动。大家知道，这种变动，并不是真正的变动。棍杖根本没有变成蛇，一粒米也没有真的变成满杯的米，只不过把两种东西调换了一下位置。如果硬要说这里有什么变动，那么至多也只能承认是位置上的移动，或者再加上米的数量上的变动，也就是一种机械的变动，绝不能说棍杖之类的东西本身有了变化，这是第一；其次，这一种位置的移动或数量的变化，并不是由棍杖之类的事物自己本身引起的变动，它完全是受魔术师的支配，它的变动的力量完全是外来的，它本身完全没有自动的作用。

变戏法的变动，只是位置和数量的变动，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变化

有许多人，常常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动看做变戏法一样的变动。他们虽然承认事物的变动，然而所承认的只是位置的改变和数量

的增减，也就是只承认机械的变动。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有一种对于历史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都是循环运动。试翻开许多旧小说来看，开头常有这样的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就是把历史的变化看成分与合的简单循环。照这种看法来说，那么，历史的变化，都只是表面的了：在表面上，我们好像经常看见有新的历史事物出现，然而在实际上并不真的有什么新事物，一切都是老早就有了的，它不过是从暂时隐藏的状态中又重复出现，正好像有一个历史的魔术师，把过去的某些事物悄悄地藏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给人再看一次。事物的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变动，历史的本身也根本没有什么进步，不过是一盏转来转去的走马灯而已。

把一切事物的变动都看做外力引起的数量和位置的变动。这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这种关于变动的见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也叫做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它只承认事物的表面的变动，而不承认事物本身内部的实质上的变化。它要我们相信这样的两点：第一，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一切变动，只是变戏法样的骗人的事情。水变成冰，大鱼生出小鱼，稻秆上结成谷子，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中国出现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结果出现了解放区，一切的自然变化，生物繁殖，社会变革等等的现象，都是表面的。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是永久固定不变的，它们的本身决不会由一种变成另一种，我们所见到的变化，不外是一种东西隐藏了，而另一种东西又来代替它的位置罢了。第二，就像戏法的变化是由魔术师制造一样，事物的变动也绝不是事物本身的自己变化，事物的本身都是死的，要使死的东西变动，必须假定有一种外来的活力，于是，为说明一切变动的来源，就不能不假定世界上有一个大魔术师，掌管着一切的变动，而万物的变动，都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最后仍把我们引到宗教迷信的路上

是由他推动的。这魔术师是谁呢？是人吗？人绝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就只好说是神了。这样，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结局又是要把我们引到宗教迷信的路上去，相信冥冥中掌握因果报应的鬼神了。

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动，和变戏法绝不相同，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出来的。

一切自然界的变动，社会的变动，人类思想认识的变动，都不单只是位置上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也起变化。水结了冰，我们绝不能说，这是魔术师把水藏了，又把冰拿出来，而是水的本身变成了冰。封建社会经过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绝不能说是神把封建社会装在荷包里去了，又把资本主义社会拿出来。我们只要研究一下社会科学，就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抗战八年，中国出现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伟大人民武装，又出现了解放区，这些也绝不是以前在任何地方曾存在过，而现在才搬出来，它完全是从中国人民斗争中新生长起来的东西。人类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并不是谁把感性收藏起来，又拿出了理性。理性认识本身，就是感性认识的总结。无数的事实，都可以证明世界上的事物本身经常在

事物本身经常有性质的变化，而不只是位置和数量的变化

起变化。如果照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来看，说事物仅只有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那么无数的变化事例都将得不到说明，都要成为不可解释的怪事。如果你不肯相信，硬要把魔术师的道理拿来解释，那就请你解释解释看，我担保你的解释一定是荒诞无稽，笑话百出，与事实完全不合！

所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规律不一致的。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事物的变化发展，就不能得到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规律的

认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不仅包含位置和数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自己也在经常变化。我们经常看见一种事物转变为另一种事物，经常看见世界上有新的东西出现，又有旧的东西消灭了、没落了。小孩子生出来，长大了，老了，老人又死了，又有新的小孩生出来。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了台，发动了战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法西斯国家被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人民起来抗战，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中国出现了新的民主的解放区。事物在一定的时候作为新的东西产生出来，经过一定的时期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又归于消灭、没落，或转变为新的东西。这叫做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具有生长条件的事物，就作为新的东西生长起来，并不是什么地方搬出来了隐藏的旧东西；具有没落条件的事物，就一定要归于腐朽、消灭，绝不会原封原样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世界上找不到一件事物能永久不变。中国从前有些皇帝，妄想寻找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方，使自己免于死亡，并且最后飞升到天堂里去，事实证明那是极其愚妄可笑。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以为事物的本身不会变动，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愚妄可笑，并不比那些皇帝更为高明！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没落过程

好了，我们已经用事实驳倒了那种不肯承认事物本身会有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同时也就证明了辩证法的观点，证明一切事物经常都在变动中，都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了。现在再谈谈这变动的原因。事物自己本身的变动，是不是由于事物之外的什么力量，或什么魔术师或鬼神操纵的呢？我们说：不是的，事物变动的原因，可以从事物本身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里去找

到，而不能仅仅用事物之外的力量来说明，更不必用魔术师或鬼神的操纵来说明。我们并不忽视外部力量对于事物变动可能发生的重要作用，但我们要特别强调，事物变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事物的本身内部。例如鸡蛋变鸡，需要从外面得到一定的温度，这种外力是不能忽视的，但外来的温度，只能使鸡蛋变鸡，而不能使石头变鸡。为什么只有鸡蛋才能变鸡而石头不能呢？这就是因为只有鸡蛋本身内部才包含着变鸡的根本原因，而石头内部则没有这种原因。所以，外面的温度，只是促成这个变化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引起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之被打败，德意法西斯国家之所以垮台，不能不说是中国、苏联以及其他各国人民抗战的结果，但日本、德、意法西斯之所以终于被打败，根本原因是在于它自己本身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中国之所以出现了解放区，是由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决不是外来的什么力量把解放区从什么地方搬到中国来。所以，事物的变化，首先是因为事物本身内部包含着变化的原因，其次是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的联系造成一些外来的促进变化的条件，而事物内部的原因则是根本的。我们反对形而上学那样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外力，更反对宗教迷信那样用鬼神来说明事物的变动。我们主张用事物内部的原因和事物的互相联系来说明事物的变化。这就是说，变化是事物自己本身的变化，变化绝不是事物之外的任何神秘力量引起的。

辩证法的又一条规律，就是事物的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

把一切事物都看做是在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中，把事物的变化发展看做事物的自己运动发展，这就是辩证法的第二条规律。正确的认识方法，都必须要遵守这条规律，而绝不能违反这

辩证法的方法，是要把事物当做自己运动的东西来研究

条规律。这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一件事物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不要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你所要研究的东西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把你所要研究的东西看做时时刻刻在变化发展的东西，也就是要研究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要研究它在发展过程中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是正在发生的新生的东西呢，还是已经发展成熟了的东西呢，或者是已经走向消灭的衰亡的东西呢。第二，要研究它所以会变化的原因，研究它为什么一定要生长起来，或者为什么一定要消灭、死亡，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变化，而不那样变化。这些原因，都应该从事物本身内部及其周围的各种联系当中去找，而不要单单用事物以外的原因或用什么神秘力量来说明。假定你在做一件工作，你在工作中有了一些经验，并且对于工作的各方面情形有了一些调查的材料，你怎样来总结这些经验，研究这些材料呢？你首先要估计你这些工作是在发展，还是没有发展，是有成绩，还是可能失败。如果是有发展、有成绩的，那么，你就要研究：是哪些原因使它发展的？首先要着重研究你的工作本身的情况以及你所采取的办法有些什么可以发展的优点，同时也要研究周围有些什么有利的客观条件。如果是有缺点或者失败了，你也要研究它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也包含你的工作本身的困难以及你的办法有无缺点，和客观环境里有什么不利的条件。经过这样一番研究和总结之后，你对于你的工作才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才懂得它为什么成功和为什么有缺点，并且以后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这种正确的认识，来指导同类的工作，你可以根据工作本身的情况，采取好的办法，丢掉坏的办法，争取有利条件，设法克服困难条件，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缺点，避免再遭失

应用辩证法总结工作，就要注意工作是否在发展，及发展与否的原因和条件

败，就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使工作更发展。我们在解放区发动人民来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情绪很快地高涨起来，群众参军参战的活动大大发展起来，但有的地方发动人民较困难，群众参军参战的运动发展比较迟缓，你如果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你一定可以首先从群众本身的情况找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群众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而群众之能否发动得好，就要看你能否根据这个情况采取一些正确的办法来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旧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的生活和土地问题是有生死攸关的联系，因此，土地问题解决得好，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消灭了，广大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的积极性就会空前提高，就会把保卫解放区看做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就了解打垮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有关自己切身的利益。反之，土地问题解决得不好，农民仍然没有脱离或没有完全脱离封建剥削的苦海，他们就不能够深刻感觉到解放战争对自己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们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提高，在这种条件之下，群众参军参战的运动自然就不会做得很好。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发动人民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其他客观条件，也起一定的作用，例如某些农村如有灾荒，对土地改革的工作就要发生一定的影响，如果你不同时或首先注意到解决灾荒问题，那么土地改革也就不容易开展。这样，在我们研究清楚了这些原因和条件之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认识来正确地指导工作，从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着手，那么，原来发动群众有困难的地方也就可以发动起来，发动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得到进步，使工作能够向前开展。

总之，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要求我们能够认识清楚，哪些事物是在发展中的，哪些事物是在消灭中的；要我们了解正在发展的事物，是由于什么原因和条件而得到发展，正在消灭的事物，

辩证法的方法要研究哪些事物是发展的或消灭的及其发展和消灭的原因

是因着什么原因和条件而一定要没落。如果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得到了正确明了的认识，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认识来指导工作，使工作进行得顺利。我们怎样用这些认识来正确指导我们的工作呢？我们的办法是要应用这些认识来确定我们在工作中斗争中应该依靠什么和反对什么。认清楚了什么是向上生长的事物和腐朽没落的事物以后，我们在工作中斗争中就要依靠向上生长的事物，而不要依靠腐朽没落的事物。就要根据向上生长的事物本身所包含的发展的可能因素来采取正确的行动办法以促进其发展，而这正确的行动办法中同时也要包含争取有利的客观条件和克服不利的客观条件的办法。

在工作中要依靠生长的事物，努力争取发展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是依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大抗日人民武装来战胜日寇呢？还是依靠了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雇佣的军队呢？八年抗战的事实，证明是依靠了前者，所以才得到胜利，因为前者是向上生长的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是因为它是与人民结合的军队，是因为它获得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觉悟不断地提高和组织不断地加强了的人民的支持，是因为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穷无尽的力量泉源。

向上生长的事物，即使最初看起来非常弱小，只要得到了它生长的必要条件，那它的生长力量就是无敌的，任何反对的势力也不能阻止它的生长。

有条件向上生长的事物，即使最初非常弱小，它的生长力量仍是无敌的

八路军、新四军最初只以两三万的少数，处在敌后最困难的环境里，遭受无数次敌人的残酷扫荡，抗拒着敌人大半数的兵力，遭遇到水、旱、蝗种种天灾的折磨，结果还是日愈壮大起来，而在日本投降以后，又能组织

成强大无敌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大量歼灭了敌人的兵力，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迅速地走上了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我们用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正确认清楚什么是向上生长的东西，紧紧地依靠它，努力争取使它顺利生长的条件，那么，即使我们自己方面力量的暂时和表面上好像显得有些弱小，我们也不会丧气，不会在困难之前屈服，因为我们深信这种弱小仅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而生长的潜伏力量则是真正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将近没落和死亡的事物，即使眼前还显得很强大，但它无论如何摆不脱死亡的命运，无论如何不能避免它的末日的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军队曾经一时横行欧洲，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经好像真的要独霸东亚，但是三四年间很快的就被打倒了。我们有了辩证法的正确认识，那我们对于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以及它的表面上不可一世的威权，也就用不着畏惧，就能够以坚强的信心向它进行战斗，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威权也仅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是外强中干，是专门吓唬神经衰弱者的“纸老虎”，而它的死亡之不可挽救，才是真实的、必然的。

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应用事物自己发展的认识方法来正确观察事物，学习认识什么是向上生长的东西和依靠这些向上生长的东西来进行斗争和工作，这样就能使我们成为大无畏的英勇战士，成为具有满怀信心能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者！

一五、追论雷峰塔的倒塌

——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雷峰塔已倒了二十多年了，到杭州西湖去的人，再也找不到它古老的形影，但在市面上出卖的西湖风景画片中，仍然少不了

一幅“雷峰夕照”，一般人对它的印象也不见得就已完全消灭。我们现在来追论它倒塌的往事，似乎还不致于使大家觉得生疏罢。

塔为什么会倒塌呢？自然，年代久远，遭受了长时间风雨的剥蚀，这是使它倒塌的原因之一，但据一般的传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被人偷拆。因为它是古塔，迷信的愚民都以为里面一定有什么神灵，把它的砖块偷回家里，希望可以借它来消灾降福，于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雷峰塔的砖便一块一块的被人搬走，而它的基础也就一天一天不稳固了。最后自然终于到了不能支持的一天，以致倒塌下来。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从雷峰塔的砖块最初被人偷拆，一直到它倒塌，中间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偷拆者每次只能从塔上取去一块或两块，失去了一块或两块砖，对于雷峰塔是不是有影响呢？当然不能说没有影响，因为构成塔的成分减少了，塔的支持力减弱了。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微小，小到看不出来，塔仍然是塔，并不因为失去了两块砖就有什么改变。照这样拆去一次两次，甚至于几十次，塔上的砖虽然渐渐少了，那矗立在山上的塔，还是不会改变它的形状和性质。但是偷拆的人绝不会只有几十个，偷拆的次数也不会到几十次就完结，而塔的支持力量是有一定限制的，它能够抵抗几十次的偷拆，即不一定经得起几千次几万次的偷拆。被偷的砖渐渐多了，终有一天要超过它的支持力所能抵抗的最大限度，一超过这最大限度，塔就不能再维持它原来的性质形状，于是就要变，就要倒塌，这就是以前雷峰塔的遭遇。

雷峰塔的倒塌，是表示一种古老事物的没落。塔是一种迷信的建筑物，他发生在宗教社会的条件中，它依靠着群众的迷信要求而存在在世界上，但最后仍是在群众的迷信行为影响之下毁坏了。表面上看，塔的变化好像很简单，仅仅是一个矗立高耸的东

西倒塌下来，但实际上，它却包括着一个相当复杂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人类社会的宗教迷信行为的条件密切联系着的。我们现在不是谈宗教，也不想研究它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只想从认识方法这一个角度上来论一论它怎样没落，怎样倒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由雷峰塔的被人偷拆，到它的倒塌，是经过了两种变化：第一是在未倒以前的变化，

雷峰塔的倒塌是经过两种变化过程：量变；质变

这一时期人们把砖一块一块的偷走，塔上砖的数目渐渐减少，塔身的支持力也渐渐薄弱了，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变化，塔始终是塔，始终是一座矗立高耸的迷信建筑物，我们说这时期的变化是数量的变化，是渐变，是外表上不显著的变化；第二是在倒塌时候的变化，这时砖的减少已达到最高限度，塔已不能支持原来的形状，于是哗啦一声，倒塌下去。这时的变化就很明显，矗立高耸的迷信建筑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废墟，我们说这一时期的变化是性质的变化，是突变，是一望而知的显著的变化。

量变和质变，是一切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形式

数量的变化（简称量变，也叫渐变和不显著的变化）和性质的变化（简称质变，也叫突变和显著的变化）是一切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无论什么变化，都可以归入这两类中的一种。就自然界的变化来说，例如鸡蛋的孵化，在未破壳以前，是量变；破壳而成小鸡，是质变。就社会的变化来说，一个社会内部酝酿革命，是量变；酝酿成熟，革命爆发，由一种社会转变为另一种社会，是质变。就中国人民的抗战来说，在抗战的八年中都是量变；八年末了日寇投降，抗战结束，就是质变。就认识的发展来说，搜集事实材料，积累实践经验，增加感性认识，这是量变；把材料和经验加以研究总结，把感性认识加工改造，提高到理性认识，这又是质变。我们以前说过的机械的位置移

动，它本身也有量变和质变两方面。例如，把一块石头绑在绳子头上，用手的力量把它甩成圆圈，这种位置移动是一种循环运动，手上愈更用力，圆圈就甩得愈更快，但始终仍是循环运动，这只是量变。如果手上用力过度，绳子断了，石头就突然一直线飞出了，这就由循环运动变成直线运动，这就是质变。世界上事物的种类是多到计数不清，它们的变化的种类，也是多到计数不清，但不论哪一种变化，都可以归入量变的一类，或者是归入质变的一类。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质

不论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质。鸡蛋是一种动物的种子，能孵化成小鸡，这是鸡蛋的质；鸡是一种家禽，它能在人类的豢养下生长繁殖，这是鸡的质；雷峰塔是西湖边的一座圆锥形建筑，它的存在是为着满足群众的迷信需要，这是塔的质；旧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在那里占着统治势力，从旧中国里生长起来的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那里都被推翻了，而人民成了统治者，这是中国社会两种不同的质。

一事物的质，使它和其他事物有区别

一事物的质，使它和其他事物有所区别。我们说某物和某物不同，主要是指它们的性质不同。同是人类，为什么地主和农民不同呢？因为地主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的社会性质不同。同是军队，为什么人民解放军与军阀的军队不同呢？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而军阀的军队，则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封建势力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的私人军队，是反人民的军队，这是性质上根本相反的两种军队。什么是质呢？用哲学上的名词来说，

质是事物的一种内部规定性

质是事物的一种内部的规定性。这就是说，一定的质，规定事物有一定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它和周围事物发生一定的关系和作用上，表现

在它的一定的变化规律上。当我们说一种事物的性质不变时，那就是指它的特征，它对周围事物的关系、作用，它的变化规律在根本上都没有改变。就因为这样，所以性质不同的事物就一定有区别。例如说军阀的军队，最早有清朝皇帝的奴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军队，后来有袁世凯以下的北洋军阀的军队，1927年以后又有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军队，这些军队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就它们对人民的关系和作用来说，它们的根本的规定性始终没有变化，它们始终是依赖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武力，因此它们的性质始终是没有根本变化，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军队，它们和人民解放军是根本不同的，是完全相反的。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量

不论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量。塔是要一定数量的砖和保持一定数量的支持力，才能立得稳固。鸡蛋有一定的大小，它的内部孵化情形，也有一定的程度，或者已经差不多孵成小鸡了，或者还完全是黄和白，这一定的孵化过程，也就是作为鸡的种子的变化的量。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量，例如它的物质生产能力，一定比封建社会高。

质和量，是任何事物都少不了的两个方面

总之，无论什么东西，不但都有一定的质，而且都有一定的量。我们不能设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可以没有它自己的质，我们也不能设想，世界上能有一种东西可以不具有一定的量。如果我们说世界上可以有一种东西存在，它的数量是等于零的，那一定要闹天大的笑话！一定的量，是每一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到三个人的数量，就不能成立团体；没有千万块的砖石，就不可能建筑一座宝塔。总之，质和量，是任何一种事物都少不了的两个方面，它在每一种事物中都联系在一起，不能缺少任何一方面。

世界上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当中，没有一件事物是有

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不是量变，就是质变

一刻停滞的。而一切变化，都可以归入质变或量变两大类。事物不是在量变当中，就是在发生质变，整个世界，就是质变和量变交织成的一个变化不息的活动体。有人以为世界有些事物可以不会变化，这是一种表面的看法，往往是因为把量变误认为不变的缘故。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事物的性质不变，所以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变化。鸡蛋在孵化的过程中，内部已经渐渐变为小鸡了，但表面上看来，始终好像仍是同一个鸡蛋。八年抗战中，敌我力量对比有了种种变化，但在日寇未投降前，始终是抗战过程，表面上看来，始终是敌人侵略而我们抵抗，这个关系没有变化。总之，在量变的一定限度之内，事物的质，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表面上看来好像它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样子，这叫做质的“相对的安定性”，或者叫做“相对的静止”，我们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事物不变，就是因为事物有这种相对的“静止”和“安定性”的缘故。其实这种“安定性”和“静止”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彻头彻尾完全的安定和静止，只是在量变的一定程度之内，质的方面大体上不变化，而不是事物本身真的有静止不变的时候。如果我们把相对的误认为绝对的，以为世界上真的有固定不变的事物，那就错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就是犯了这种错误。

在量变过程中质在表面上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叫做质的相对静止

形而上学的错误；把相对静止看做绝对的

质的相对静止有一定限度，过此限度就要起变化了

我们要再说一遍，质的安定性和静止，只是相对的，只是在量变的一定限度之内保持不变。过了这个限度，就不能再保持这安定性和静止，就要发生质变了。鸡蛋孵育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破壳变成小鸡；雷峰塔的砖减少到一定程度就要倒塌下来变成废墟；

抗战坚持到一定时期，侵略者就被打败；革命酝酿到一定程度，社会制度就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质变的时候，事物常常是在比较短促的时间之内，发生激烈的显著的变化，所以也叫做“突变”或“飞跃”的过程；也叫做“连续性的中断”，因为这样的突变，是由一种质突飞猛进到达另一种质，而使旧的质不能连续保持下去。（这里要注意：质变虽然常常是在比较短促的时间之内发生激烈的变化，但决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一定如此。在某种情形下，质变的过程也可以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以人类社会来说，阶级社会的质变，是采取爆发式的革命过程，这是较短时期的激烈变化，但在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下面，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也是社会的质变，但却只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这样，量变和质变，就是世界上事物变化的两种根本形态，这两种变化，在世界万事万物中交织着，并且密切的联系着。在量变的过程中，我们因为表面上看不见质的变化，每每以为量的变化和质没有关系，然而如果仔细一研究，就可以知道两种变化形态的有机联系。量变就是质变的准备，在量变的过程中，事物的质的安定性渐渐发生动摇，到了一定程度，就完全失去这种安定，而突然引起质变。由砖被偷拆到雷峰塔倒塌，由鸡蛋的孵育到它的破壳，由革命的酝酿到爆发，由八年的抗战到日寇投降，都是由量的变化引导到质的安定性的破坏，这叫做由量到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完成以后，事物就有了新的性质，并且又重新安定起来，而开始新的量变。雷峰塔的废墟有废墟的变化，破壳后的小鸡就开始自动觅食生长，社会变革后新的社会就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发展起来，日寇投降后中国人民又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进行新的斗争，即人民解放战争。在新的性质出现以后开始

质变即“突变”、“飞跃”和“连续性中断”

量变和质变有密切联系，量变就是质变的准备

新的量变，这叫做由质到量的变化。世界上事物的变化，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完成，又是进一步的量变的基础，这样交替着发展下去，成为事物变化的无穷的连锁。无论你把任何一种事物的变化拿来研究一下，你都可以看见这一种变化的连锁。这叫做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简单点说，也叫做“质量互变律”。这也是事物的辩证法发展的一条顶普遍的规律。

由量变转为质变，质变后又转为新的量变，这就是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读者诸君，你们会不会怀疑，说我们又把世界的变化，看做一种走马灯式的循环变化了？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这不是循环是什么？这个怀疑，我想你们可以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它消除。只要把事实的例子看一看，就可以知道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绝不是简单的循环，因为后一种量变，和前一种量变是不同的，它是以一种新的质做基础，而前一种则是以旧的质做基础。鸡蛋的量变是它的孵化，小鸡的量变却是动物个体的生长。封建社会的量变，是表现为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后，它的量变却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的生产力发展。谁都知道，机器工业的生产力，和小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力是大不相同的。两下比较起来，机器工业的生产是又大量、又迅速，小农和手工业的生产则是又微小、又缓慢。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由鸡蛋到小鸡，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决不是简单的量变和质变的循环，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向上发展过程。量和质互相转变的规律，作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表示一种较为低级的质经过量的增长，就要转变为更高级的质，同时又以这高级的

质量的互相转变，并不是循环，而是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向上发展过程

质为基础，开始高度的数量的增长。

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既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因此，如果我们要想能够正确的认识事物，那我们的认识方法就不能违背这条规律。我们不要照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事物的数量变化当做是与它的质毫无关系的东西来研究，认为一切变化实质上只是位置和数量的变化，和事物的质丝毫不相干。我们一定要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把事物的量变和它的质变联系起来看，要研究数量的增长如何引起质的提高。要注意到任何事物的量的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必定要引起一个显著的、根本的质的变化，才能继续提高，否则发展就要受阻。这就是说，我们要以革命的观点、准备彻底改变事物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这一个方法，对于社会生活问题的研究，特别有重大的意义。在社会生活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研究：一种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怎样要终于引起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革；广大人民对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的不满增长到一定程度，怎样要必然引起革命的爆发；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力量发展，怎样由防御阶段进到相持阶段，由相持阶段又进到反攻阶段，以至于取得胜利；人民解放军力量的日愈壮大，怎样使反对美蒋统治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为进攻，由进攻又达到全国的胜利。总之，我们要以革命者的身份来看社会变化的问题，而不要用保守的、改良的方法来看问题，不要幻想在保持着旧社会制度、不加以根本改变的情形之下，就可能使社会迅速向前发展和进步。如果用后面这种方法来看问题，一定要犯大错误，犯改良主义的错误。用这样的错误方法来看问题，就等于主张永远不破蛋壳，而希望小鸡在壳内继续不断地生长，或主张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买办大地主

辩证法的方法，就是要用革命的观点来研究事物，要研究事物在发展中必然要经过质的根本改变，才能向前进步

的专制统治永远不推翻，而希望在这种基础上发展民族工业和民主政治。这样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显然是违背事实规律的。所以，辩证法的方法，是一种革命的思想方法，它要求我们研究：如何在一事物的量的增长中，来准备它的质的飞跃；如何达到它的质的飞跃，以便它的量的发展能够继续猛进；如何以这种革命精神和革命规律知识来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注意，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这就是说，质变必须以一定的量的发展程度做基础。量变还不到一定程度，就要引起质变，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勉强这样做，结果是会落空的。鸡蛋没有孵到一定日子，就要破壳，一定得不到小鸡，而只是浪费了一个鸡蛋。革命群众的力量没有准备好，就要发动革命，一定会使群众白白遭受损失，而不能获得革命的胜利。这种错误，叫做“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掌握量和质互相转变的辩证法规律，一方面要确立革命观点，反对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在进行事物的根本改造之前，要注意一定程度的量的准备，不要在准备不成熟的情形下发动改造运动。

质量互相转变的规律，在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上有不同的表现

质和量的互相转变规律是普遍的，但在各个具体的事物上，它的表现又各有特点，而不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在方法上也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身的具体情形来分别研究。由反法西斯战争到战争的胜利，在中国是持久战，在苏德战争中就不是持久战，这是因国家的不同而量变的过程也有长短的不同。过去封建社会经过革命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半封建社会在今天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却能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因时代不同而质变的情形也不同。质变的形式，在一种情形下是爆发式的，在另一种情形下则是逐渐过渡式的。这些都必须根据事实条件的不同而加

以区别，以便在实际行动上作出正确的指导。总之，不论质变和量变，都因时、因地、因事物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这里仍然支配着“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时间”的规律。因此，我们研究事物的质和量的变化时，也要根据不同的条件、地点、时间而加以不同的分析，具体地来认识每一事物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特殊情况或具体条件。切不要把一件事物的质量互相转变的情形，当作一个固定的公式去乱用，硬说另一事物的变化情形也一定如此。

研究事物的质量互变时，也要根据条件、地点、时间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具体研究中国的革命运动怎样发展，中国社会怎样进步，旧中国怎样变革而成为新中国，新中国怎样由现阶段逐渐过渡到更高的阶段。能够具体认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学习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就可以算是有成绩了。

一六、岳飞是怎样死的

——对立统一的规律

岳飞是中国宋朝时候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本来有能力可以打退当时的侵略者——金人，但是因为政府里当权的是投降派，用计谋杀害了他，使当时的抗金军队失去了主脑，大半个中国就沦陷在侵略者的手里。所以中国人民对于岳飞的死，直到现在一提起来就觉得惋惜。中国人民痛恨陷害岳飞的汉奸秦桧，给他铸了一个铁像，跪在岳飞的墓前，让千万人来唾骂。现在离岳飞的死已一千多年了，到浙江杭州去游玩的人，还可以看见那秦桧夫妇的可耻的跪像。

岳飞是怎样死的？自然是被汉奸害死的。岳飞为什么会被汉

奸害死？因为他是民族英雄，他坚持要反抗民族敌人，所以汉奸把他害死。这是一般人对于岳飞的死的看法。我们能够怀疑这种看法吗？当然不能。如果你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说害死他的人不是汉奸，那你的思想就大有问题。但是，倘若我们把问题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仅仅这样的看法，还是不够圆满，还不算全面认识了岳飞死的原因。我们应该还要有些补充。

据说，岳飞的死，是因为秦桧用了种种阴谋，假借皇帝的命令把他从战场上调回去，然后害死了他的。倘若他坚决不服从卖国政府的调动，他就可以不致陷入奸人的网罗，也就不至于断送自己的性命和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事业。但岳飞却不能不服从调动，不能不走上那条死路，因为岳飞一方面虽然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却又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使他不能不服从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调动。因此，岳飞的死，直接的原因固然是由于汉奸的出卖，但岳飞自己的阶级所具有的本来的弱点，也是使他致死的一个重大原因。

读者诸君，你们一定想像得到，当岳飞接到调动命令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在他的心里，两种思想在激烈的发生冲突。一方面在他前面摆着民族的任务，要他留下来抵抗敌人，另一方面又要服从皇帝的卖国命令，让几年的抗金功绩变为泡影。要坚持完成抗金的事业呢？还是依照专制独裁君主的命令来办事呢？正相反对的两个念头，同时存在于岳飞的心里，这就是他内心必然要发生激烈冲突和痛苦的原因。但岳飞究竟还是封建专制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分子，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坚决违抗专制君主的命令，虽然眼看着民族抗敌的事业就要前功尽弃，虽然内心里有着激烈的矛盾，虽然是十分出于无奈，但君主的命令究竟还是占着上风，于是就产生了岳飞的悲剧。

读者诸君，我们讲了一大篇岳飞的事情，和我们的哲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目的，是想用岳飞的这一个事例，来引出一条辩证法的规律。这条规律叫做对立统一的规律，又叫做事物的矛盾规律，它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互相反对的许多方面，这些互相反对的方面经常发生冲突、斗争，这叫做事物自己本身的矛盾。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这些对立方面斗争的表现，或者说，这些对立方面的斗争情形，决定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前途。又要做民族英雄，又要服从封建皇帝的命令，这是岳飞自己思想上的两个互相反对的方面，是岳飞自己本身的矛盾。我们说一般人对岳飞的看法不圆满，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岳飞的一个方面，把岳飞只看做一个简单的民族英雄，他们没有看到岳飞的另一方面，没有看到这个民族英雄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他在当时一定要服从皇帝的命令。他的悲剧的产生，不仅是由于汉奸的陷害，也是由于他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弱点。他的民族英雄的事业和他的阶级的弱点，是互相矛盾的，是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这两个对立方面互相斗争的结果，他的阶级的弱点占了上风，才使他遭受秦桧的陷害。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互相反对的许多对立方面，这是对立统一的规律

对立统一的规律是一个普遍的事物发展规律。任何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都包含着自己的矛盾，包含着互相对立的各个方面。如果看不到这些对立的各个方面，而只看到一个方面，而且把这一个方面误认为是事物的全部，以为事物就是单纯地只有这一个方面，而不在自己的内部包含着矛盾，包含着对立的方面，那就是形而上学的看法。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不合事实的，或者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一般人对于岳飞的看法，就是

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要求我们在研究事物时，要看到它的各个对立方面

不完全合乎事实的形而上学的看法。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也叫做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是一般人在思想上最容易犯的毛病。这种方法使我们看不到事物的全部真相，因此也就常常要把我们的认识引向错误。我们要使自己的认识正确，就必须丢掉形而上学的看法，应用辩证法的方法。这就是对于任何事物，都要看到它的对立方面，要研究它的矛盾。所谓对立的方面，具体说来，就是正面和反面，过去的方面和将来的方面，腐朽没落的方面和生长发展的方面。就岳飞来说，作为民族英雄，是他的积极的方面，是他的正面，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所具有的弱点，对于他的民族英雄事业却是一个消极的反面。不只岳飞有这样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我们现在的许多进步的革命的人，也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对立的方面。我们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努力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我们的正面和有远大的将来发展前途的一面；但是我们又往往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遗，甚至于有其他剥削阶级意识的残遗，我们常常有些自私自利的打算，它妨害我们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又是我们的反面，是必须克服的腐朽的方面。不只人的思想意识有这些相反的方面，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物，也有这些相反的方面。鸡蛋是正面，鸡蛋内的胚胎发展是反面和将来发展的方面；水是正面，加热的水渐渐转化为蒸气，又是水的反面；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和封建统治者是代表这个社会的正面，也是要走向腐朽没落的方面，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则是反对的方面和具有将来发展前途的方面。就旧中国的情形来说，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说，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买办官僚资本家（目前是美国买办）和大地主的统治是现状的正面，是

所谓对立的方面，就是正面和反面、过去和将来、生长的方面和没落的方面

腐朽没落的方面，工农群众及要求民主的广大人民是反面，是发展的方面。在解放了的中国，情形却相反，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掌握了政权，成为现状的正面，和发展的方面，而封建的残遗势力，却只是走向完全没落的反面。

我们看，无论就什么事物来说，都可以找出它的正面和反面，过去方面和将来方面，发生发展的方面和腐朽没落的方面。我们在以前讲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的时候，曾说过世界上有的东西在生长，有的东西没落和消灭。现在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生长的东西和没落的东西并不是互相隔绝的，两者常常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或者说，它们就是同一事物本身分裂的表现。蛋壳和胚胎，是同一鸡蛋的两个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阶段；在同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一方面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统治，另一方面有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势力。一定的事物，都由某些互相反对的方面所构成，都有某种内部矛盾。毫无矛盾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胚胎，就不可能成为活的鸡蛋；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社会，反过来说，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把资产阶级完全消灭了，那无产阶级也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了。有光明的地方，一定也有某些黑暗、阴影，有了某些黑暗，就愈更衬出光明。有流水的地方，一定有某些地方水被堵塞了。有了适当的堵塞，就可以确定水流的方向（中国老话叫“不塞不流”）。一只脚向前走的时候，另一只脚一定要踏稳在地上不动（中国老话叫做“不止不行”）。这样，对立的两方面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密切地联系

没有内部对立或自己矛盾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

在一起，成为统一在事物内部的不可分的两面，缺了一方，对方也不能成立。这叫对立的互相依赖，也叫做对立的同一性。也就是中国老话所谓的“相反相成”。我们说对立的统一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就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具有自己的内部的矛盾。

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既然任何事物都有它对立的各方面，有自己的内部矛盾，因此每一事物经常都会有内部的冲突和斗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通过自己内部对立方面的冲突和斗争

任何事物在发展当中，都不是风平浪静、顺利无阻的，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对立方面或对立势力之冲突和斗争。只要看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是经过了多么长期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新生的势力绝不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向前发展，腐朽没落的势力也不会毫无抵抗和挣扎地走向消灭，它对于生长的势力一定要给以一切可能的阻碍和破坏，以便延缓自己死亡的时限。生长的势力也必须克服一切阻碍和破坏，必须经过斗争和大叫大喊，才能向前发展。在

在事物发展中，其对立的斗争愈更加强，矛盾愈更暴露

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对立的斗争一般并不是愈更减弱，而是愈更加强，其矛盾不是愈更隐晦，而是愈更暴露，直到矛盾得到解决为止。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斗争，比起辛亥革命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来，其规模就大了许多倍，比起1926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也大了好多倍，这就说明中国革命愈向前发展，斗争就愈更尖锐和激烈。但是，在发展中，新生的势力和腐朽的势力，虽然互相都有增长，而新生的势力是在斗争中愈更受到锻炼，愈更坚强而不可抵抗，腐朽没落的势力虽然也千方百计努力使自己增大增强，比较起来却日愈

变得脆弱，日愈接近坟墓，不管它在进坟墓之前如何疯狂挣扎，也不能挽救其没落的命运，不能避免终有一天要为新生势力所打倒。

> 新生势力全胜，腐朽势力死亡，就叫做解决了矛盾

当新生的势力在斗争中获得了全胜，发展中的困难全被克服，腐朽没落的势力归于死亡或者被压倒，这就叫做解决了矛盾。这时事物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就要向前发展，由较低的质进到更高的质。如果新生的势力一时不能克服腐朽势力的阻碍和破坏，甚至于暂被压倒，那就是没有解决矛盾。这时事物的发展就停滞不进，甚至暂时后退，如像岳飞被杀害，使宋朝人民不能把侵略的金人赶走。但在这时，并不是说矛盾消灭了，或者矛盾不再暴露，相反的，矛盾仍然存在，并且还要继续暴露，对立的斗争仍然要尖锐化起来，不到克服矛盾不止。岳飞虽然死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的斗争，迟早还是要胜利。太平天国、辛亥革命、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先后失败，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成功，绝不会停止。

> 不能解决矛盾，事物的发展就停滞不进，或者暂时后退

> 发展就是对立的斗争。发展的过程，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的过程。对立统一律是辩证法的核心

“发展就是互相对立方面的斗争”，这是列宁说过的一句辩证法的名言。由生长到没落，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由新生的代替腐朽的，这是发展的过程。这些过程中间，自始至终，都包含着对立的斗争。发展的过程，就其根本内容来说，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暴露和解决的过程。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自己发展的根本的原因。所以，对立统一的规律，是事物发展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不了解对立统一律，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事物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

展中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与买办官僚地主阶级的分裂一天比一天显著，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直到完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止。

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要研究事物的矛盾和解决矛盾

正确的研究方法，必须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方法，这就是要研究事物的矛盾和解决矛盾。因此列宁有这样一句名言："辩证法按其本义来说，就是要研究对象自身内部的矛盾。"怎样研究矛盾？就是要把我们所要研究的事物加以分析，认清楚它的对立的各方面，揭露它的矛盾，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

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揭露矛盾，而要掩盖矛盾

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不去分析事物的各个对立方面，而只注意某一个片面，不去揭露矛盾，而要掩盖矛盾。只看见岳飞是民族英雄，而不注意他同时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看不见由此所产生的他的本身的弱点，这是在岳飞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方法。只看见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强国，而不分析它的许多弱点（退步、小国、寡助），这是抗战开始以前亡国论者的形而上学方法。说中国内部只有大贫小贫，而不承认中国内部也有贫富非常悬殊的各种阶级对立，掩盖了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这是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方法。一个做领导工作的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和自己的干部，只看见优点而不承认缺点，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片面看法。日本投降后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些人以为由此一定可以走上和平前途了，忽视了美帝国主义正在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向解放区，就是一种对和平的片面的看法。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所谓兼听，就是说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必须设法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

打听清楚；所谓偏听，就是说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兼听则明，就是说听了对立的意见，才能明白认识事物的真相；所谓偏听则暗，就是说如果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会糊里糊涂，对事情认识不清。这也不外是说，要有正确的思想，必须分析事物的对立方面，揭露矛盾。

在社会生活和革命问题的研究上，最主要的就是要揭露阶级矛盾。在每一问题或每一事件发生时，就要研究与这事件有关的是一些什么阶级，各阶级对这事件的主张和要求有何不同。例如，我们要打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对于这一伟大事件，中国的各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工人农民是最积极斗争的主力军，其中工人阶级又是领导的力量，地主阶级是站在反对革命的地位上，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的，但是不坚决的，其中有人甚至幻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得到和平、民主以及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各阶级的简单的分析或矛盾各方面的大体上的揭露。

揭露矛盾，就有可能解决矛盾

揭露矛盾，就有可能解决矛盾。揭露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楚一方面有垄断政权、卖国专制的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四大家族，另一方面有要求中国独立、民主、自由的以工农为主的广大人民，就知道要使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就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动后者的一切力量，推翻前者的独裁统治。这样，所谓解决矛盾，根本上说来，就是要知道怎样发展新生的进步的东西，消灭腐朽的没落的东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站在新生的进步的势力方面，与腐朽的没落的势力进行斗争。必须把斗争进行到底，不能幻

解决矛盾，就是要站在新生的势力方面，与腐朽的势力斗争到底

想与腐朽没落的势力和平共居。不坚决清除个人自私的或剥削人民的思想，不可能希望发展进步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坚决斗争，不可能希望发展民主势力；不把地主恶霸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势力和威风打下去，不可能希望农民群众抬头。

互相对立的势力在一定情形下可有某种统一、某种妥协

互相敌对地斗争着的对立势力，在一定的情形之下，可以有某种形式的联合，某种的统一和妥协。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势力，与中国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统一战线；半殖民地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同盟关系；社会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的英美为反对法西斯国家也建立过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对立势力相互间做了某些让步，相互间的斗争有某些和缓。

对立的统一、妥协是有条件的，并且只限于一定方面，在其他方面仍继续斗争

但是，这种统一和妥协，是有一定的条件，是由于双方都有一个更大的共同斗争目标，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是为了要解决更大的矛盾，即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势力的矛盾。所以，首先必须有这个条件或其他什么重大原因的存在，才能建立敌对势力之间的统一和妥协，同时正因为是有条件的，所以统一和妥协也只是限于一定的方面，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斗争。中国人民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对于后者的专制独裁与抗日的不彻底性，仍不断地加以揭露、批评，并对此进行必要的斗争。这种斗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但不会破裂统一战线，而且还阻止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几次对敌人投降的企图。斗争反而成为巩固和维持统一战线的保障。所以说："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

就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来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如果不知道与对立势力建立某些必要的联合行动，找出某些方面的妥协点，往往就要犯过左的冒险主义错误；但是，在建立统一战线和实行某些必要的妥协的时候，如果不懂得继续进行必要的斗争，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对腐朽势力采取投降主义的态度。

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注意其具体性、特殊性。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在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时，必须注意矛盾的具体性、特殊性。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矛盾。和不同的对立势力之斗争。要正确解决矛盾，就必须依照不同事物的不同对立情形，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广大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势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的矛盾，是经过各种严重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而主要的是经过军事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的。这种矛盾的双方是完全敌对的，它的发展结果不能不引起冲突性的或对抗性的斗争，这种矛盾就叫做对抗性的矛盾。还有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在中国的革命营垒内，也有自己的内部矛盾，例如在共产党员中间，有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残遗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要经过尖锐的斗争来解决，然而解决不是用武装的形式，而是用说服、教育、开会批评以至于某些场合的纪律处分。工作与疲劳，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矛盾，要继续工作，必须克服疲劳，要与疲劳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就决不是思想检讨，更不是武装冲突，而是适当的休息。但对于一种不正常的疲劳情绪，即懒惰的行为，我们又要采取批评、教育等思想斗争的方式。正确的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必须具体研究每一种矛盾的特殊性质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具体方法，切不可把解决一种矛盾的斗争方式，作成一个死的公式，用到其他一切矛盾中去。

要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必须注意什么是一定情形下的主要矛盾

在研究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时候，又必须注意，什么是一定情形下的主要矛盾——即在许多矛盾之中首先要解决的矛盾。任何事物的联系都是复杂的，都包含着许多对立的方面。在中国的革命问题中，就包含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与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这许多矛盾中，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矛盾成为主要的东西。从“九·一八”到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是主要的矛盾。日寇投降以后，这主要矛盾是解决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代替了它，那就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对立。就世界的范围来说，第一次大战后不久，各资本主义国家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对立，曾是主要矛盾；德国希特勒上台以后，这主要矛盾就被另一主要的矛盾所代替：即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其中包含帝国主义国家如英、美）及其广大人民的对立。德、意、日法西斯倒台以后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反对民主反对世界和平的势力和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民主和平的势力的对立又成为主要矛盾。认识事物的主要矛盾，是很重要的。认识主要矛盾，就能够抓住首先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能够提出斗争中的中心任务。要正确的指导斗争，就是要善于抓住一定时期的中心问题、中心任务，并使用最大的力量来解决它、完成它。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做事要分轻重缓急”，这就是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首先解决主要矛盾，而对于其他比较次要的矛盾，则必须在服从于主要矛盾的原则之下来加以解决。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对后者作了重大的让步，停止了没收

解决次要矛盾，必须服从于解决主要矛盾的任务

土地的政策，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改良政策，这就和缓了当时国内的矛盾（全国人民与四大家族、农民与地主的对立），而把全国最大的力量推动起来解决主要的矛盾（中国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寇投降以后，情形改变了，中国人民就发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土地改革的政策，这就是因为要解决的当前的主要矛盾改变了，这时的主要矛盾是变为全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把其他矛盾的解决方法也加以适当的调整，以服从于主要的目的。

革命斗争必须有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导，才能得到胜利，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导，其中心要点，也就是要能抓住主要矛盾，认清主要斗争的对象。而在解决次要矛盾的时候，必须服从于主要矛盾，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以便有利于配合主要矛盾之解决。不学会这一点，就不能算懂得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一七、没 有 了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这次讲话之先，我们先去请教一位朋友。他是卖水果的。他告诉我们做水果买卖，都有季节性，不是每种水果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樱桃只在三四月才有，枇杷不到五月不甜，桔子至多留到六月就要腐坏了。一种水果有一种水果的限定的季节，做买卖的人要趁着时期去赶办，买水果的人也要赶着时季来买吃。倘若你买的人不趁着三四月内去买樱桃，到落潮以后的五月，才想起来去问，那时水果店里的人一定摇摇头对你说："这东西现在已经卖完了，没有了！"

“没有了！”你听了这句话，就会想：水果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消失了。就是水果店里的人，他说这话的意思，也是表示那种商品从市场上消失了。这是当然的，既然已经卖完，还能说没有消失么？如果有人对于“消失”这两个字表示怀疑，你一定要说他是疯子吧？

但我们应该再仔细想一想。

假如我问你：“樱桃这商品从市场上消失，是无缘无故的么？”你当然马上要反驳，“何尝是无缘无故的呢？因为过了时季，而且卖完了，这就是消失的原因。”好了，这里就有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樱桃在市场上消失，原来是在买卖过程中消失，不是无缘无故的消失。水果店里的人已经把它推销出去，买的人把它吃了，这就消失了。但是，卖水果的商人因这种商品的消失而受到损失没有？当然没有；因为他获得了相当的代价，买樱桃人把钱给了他。就这一点来说，所谓的消失，也可以叫做“转变”。因为商人手中虽然没有了樱桃，但又有了钱币。樱桃转移成货币了，它并没有绝对的消失。

平常所说的“没有了”或“消灭了”，都包含着“转变”的意思，没有绝对的消灭

这样一来，我们主张对“消失”二字应该多想一想，并不是全无理由了。你不能反对我们的这个主张，因为事实上这件事确是一种转变。我们再回想一下以前的讲话，那里我们讲到雷峰塔倒塌、蛋变成鸡、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些变化，都表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消灭。一种东西的消灭，就表示另一种新东西的出现，就表示一种转变的过程。

事物之所以能够转变，是由于它自己内部的矛盾

为什么这转变会可能呢？为什么樱桃会转变成货币，而雷峰塔会转变成废墟呢？这就可以用事物本身包藏着的矛盾来说明。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或反对的势力和倾向。雷峰

塔一方面有它自身的支持力量，一方面又包含着足以使自己倒塌的重量。在一定条件下，反面的倾向发展增大起来，到了一定的限度，就要破坏原来的东西，而使它变成另外的东西。雷峰塔的支持力减少到某种程度，它必然就要倒塌。樱桃转变为货币，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形呢？有的！樱桃自然还有樱桃的特殊情形，它变成货币，表面上是和货币对调，看来好像只是位置的变换，并不像雷峰塔一样地由本身变成废墟；但樱桃之所以能和货币对调，同样还是由于樱桃本身的矛盾。樱桃是一种食物，它可以供人食用，我们说它是有一种使用价值，而在市场上，它却不但是食物，同时还是一种商品，它不但可以供人食用，而且还可以供商人交换买卖，因此它又有一种交换价值，这交换价值与一定的货币内包含的交换价值相等，就这样，它本身已包含货币的性质了。因为它本身包含着这种和食用不同的矛盾性质，所以才能够和货币对调，而转变成货币。这种转变，仍然是自己本身的变化，和变戏法的受外力（魔术师）作用的位置转换是不同的，这一点必须首先认清。

事物的反面在一定情形下变为正面，就发生性质的转变，这叫做“向对立方面转化”，也叫做“否定”

不论是蛋变鸡也好，雷峰塔的倒塌也好，封建社会变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社会主义社会也好，樱桃换货币也好，它们的转变，都是因为它们自己内部包藏着自己的反面，在一定的情形之下，这种反面的东西变成了正面的支配的东西，于是事物就失去了原来的性质、状态，这些性质状态就转移成反面的性质、状态。这种转移过程，在哲学上叫做“向对立方面转化”的过程。转移后所出现的东西，对于原来的东西来说，叫做“否定”。这是哲学上的名词，未免太有点文绉绉的了。要改成俗话也可以，那就是前面水果店

伙计已说过的“没有了”。“没有了”，我们由上面所叙述的一切，就可以明白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意，并不是指一件东西绝对地完全地消失了。消失的只是一方面，一方面没有了，另一方面却又有了一种东西，或者也可以说是新发生了一些东西。

把“否定”认作绝对消灭，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看吧！辩证法所交给我们的“否定”（或者“没有了”），和我们平常所想的“没有了”，是有很大的不同。原来我们平常所想的“没有了”，都是按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解释的。形而上学是非常呆板的思想方法，它看问题是采用一种简单的，也叫做带片面性的看法。它所说的“否定”，就是绝对消灭的意思。它只会从一方面来看事物，而不会同时看出事物的正面和反面。因此，当它说“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表示一件东西绝对消失了，绝不会想到它还会转变成另外的东西。但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却不是这样呆板，它要我们看出事物的矛盾，看出它的正面和反面，它告诉我们某种东西被否定了的时候，同时就暗示着另外的东西从原来的地盘上出现。不！不！还不仅是这样！以前所说的都不够，我们现在还得要补充一点：“否定”，不单只同时暗示着新的东西的出现，不单只是旧的东西转变成自己的反对物。换一句话说，新的东西不仅只是另外的东西，不仅只是和旧东西相反的东西；它和旧东西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它还把旧的东西的某些内容保存下来。雷峰塔的废墟里，还保存着雷峰塔的散乱了的砖瓦。鸡把蛋壳破了，抛弃了，但鸡的本身就是蛋白蛋黄的孵化物的保存。商品变成货币了，那些货币里就保存着商品（樱桃）的交换价值。自然，这里所说的保存，并不是把旧的东西原封原样保存下去，而是改变了旧的性质、状态，变成了新的东

“否定”不只是转变为反对的方面，而且保存着原来事物的某些有生长力量的方面

西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不是一切都保存，而是抛弃了和克服了一些部分，单把需要保存的东西保存下来。雷峰塔变成废墟，废墟里保存了砖瓦，砖瓦就是废墟的组成部分，而塔却永远没有了。鸡保存了蛋的内容物，但不是照蛋黄蛋白的原样保存下来，并且把蛋壳也抛弃了。货币保存商品的交换价值，却绝不自己变成原来的商品。人民的军队歼灭反动的军队，把缴获的武装和俘虏保存下来，这些武装和俘虏就不能再作为反动的武装和人员而存在，它们的反动性质一定要被克服，而坚决反动的人一定要被消灭。所以，这里所说的保存，决不是原封原样保存原事物和旧势力，而只是要保存其中具有生长力量的或者还具有存在的条件的东西，同时却要克服和消灭那些腐朽死亡的或不再具有存在的条件的东西。旧中国的反动派，借口要保存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想给青年们灌输腐朽的封建奴隶的文化思想，而压制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这种行为，就不是真正保存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也不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腐朽反动的东西，是一定要被淘汰，而不可能被保存下去。在中国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中，只有那些对广大人民的进步民主运动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才有可能被保存，才有可能发展。

> **“否定”也要从两方面来了解：一方面是某些事物的消灭，另一方面是某些事物的保存、发展、进步**

所以，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来看，“否定”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指某些事物被消灭了、克服了，或者被抛弃了；同时另一方面却又表示还有些事物被保存下来，在新的性质或新的形态之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看法，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形而上学只能看到一方面，把“否定”单单看作某些事物的消灭，而看不到同时有另外东西的生长。这两种看法，哪一种和事实一致呢？当然是辩证法的看法才

和事实完全一致，而形而上学则不能完全反映事实，因为在事实上，否定不是一种东西绝对消灭了，而是转变为另一种东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否定，这是不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一切都绝对消灭了呢？当然不是，消灭了的只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在旧社会中生长起来的广大人民民主势力却向前发展了。

前面讲对立统一的规律时，就已经说过，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我们必须研究一切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是要能够看出同一事物的各个对立方面。现在谈到事物的“转变”、变化、否定，也要从相反的两方面来看，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认识。当我们看到有些新的东西生长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同时注意到有另外的某些东西正在没落和死亡。反过来说，当我们看见有某些东西在退步、没落、消灭或死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另外的东西在前进、发展、新生起来。例如工作之后要休息，一方面看来，是工作停止了，这是表示某些东西的消灭；但从另一方面看，休息是恢复精力，是进一步工作的准备。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方面是采取防御和许多地方退却的战略，但在防御和退却中却争取了进一步组织人民力量起来抗战的时间。在日本投降后反对美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解放区军民最初放弃了许多城市，但另一方面却歼灭了反动军队大批的有生力量。在革命斗争中，即使遭受失败，也可以从失败中取得经验教训。因此，如果我们会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问题，我们就可以在事变当中经常看到发展前进的道路，即使在挫折、失败、严重的困难前面，也不至于退缩、畏惧、灰心丧气，而能够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找到前进的道路，并因此能够以充分的信心、大无畏的精神

积极进行战斗，因为你如果从另一方面看，只要你是真正革命的，只要你的思想行动是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是依靠广大人民的，那么，就在挫折、失败和严重的困难当中，还可以找出战胜挫折失败、克服严峻困难的条件，只要你依靠这些条件，你就可以最后得到胜利。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就是这种意思。

旧的东西被否定了，转移成另外的东西。但是，事物的变化是永远不停止的，新的东西又有它自己的矛盾，这矛盾的发展，又引导它再转移成另外的东西，再被另外的东西所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蛋变成鸡，鸡长大了又生蛋；工作后休息，休息后又进一步工作；在抵抗反动派的自卫战争中失去解放区许多城市，歼灭大量反动军队之后就转入反攻，再恢复已失去的城市；雷峰塔变成废墟，终有一天这废墟又被人清除，而在它的原来地盘上盖起另外的建筑物来；等等。在这里，有一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以上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些这样的例子：事物经过再一次的否定之后，又恢复了某些原来的特点。如原来的蛋经过鸡的否定之后仍然生出蛋来；商品换成货币之后，商人仍然拿它去换成商品；工作之后休息，休息之后又恢复工作；自卫战争中丢掉城市又恢复城市。这一类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个来，它表示事物的变化发展中有这样的规律：事物不仅会转变为另外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会在再一次的转变中恢复原来的许多特点。这种情形，在辩证法的哲学上称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事物经过再一次的否定，往往恢复原来的某些特点，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并不是说原来的东西原封原样的恢复了。如果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说，否定是简单

的消灭，那么否定之否定就一定是简单的恢复原样。“二”否定成了零，再来一个否定就又恢复成“二”，这只是一个循环。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像形而上学的关系那样简单。事实的发展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是表示原来事物简单的恢复，而是表示它向更高阶段上发展。它所恢复的特点，也是在更高的发展基础上恢复的，因此它也包含着许多新的更高的特点，而不是仅仅恢复原来的特点。鸡生出的蛋，不是原来的一个蛋，而是许多的蛋，这些蛋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新的性质，能孵化成各个不同的小鸡。商人得了货币，再去办货物时，这些货物虽然也有商品的特点，但一定不是原来的樱桃，它一定成了价值更多的其他种类的水果或用品，一部分且将成为商人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拿到市场上来卖。把反动派有生力量歼灭后恢复的城市，虽然也是原来的城市，但这城市在解放区人民的手中就更加巩固了，不再那样容易让出来了，或者就永久成为人民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由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出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规律，最初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以后转变为阶级私有的社会制度，最后阶级私有的社会又转变为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最好和最明显的例证，因为高级的共产主义虽然和原始共产主义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没有阶级和私有财产，但除此而外，不论就发展的程度和其他的另外许多特点来说，都有绝大的差别。总之，“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普遍的辩证法规律，事物的发展常常是经过再次的转变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并且在一定条件下恢复原来的一些特点。在这种情形下，哲学上就把那原来的事物叫做肯定阶段（例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第一次转变

否定之否定并不是原封原样恢复原来的事物，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走向更高级的阶段

后的事物（例如阶级私有社会），叫做否定的阶段，而再一次转变之后带着最初阶段的特点而出现的事物（例如高级共产主义社会），叫做否定之否定阶段。

“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是辩证法的规律中之一个。从前有人（也许现在也还有这种人）有一种浅薄无知的误解，以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是辩证法的主要的或惟一的“公式”，这是非常错误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只是前面讲过的几种辩证法规律的一个具体表现，了解了前面的辩证法规律，也就了解“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如果丢开前面讲过的其他规律不管，把这个规律当做惟一的公式去看一切事物，而不看看事物的具体情形，那就完全不是辩证法的方法。我们不能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当做死的模型公式，对任何事物都拿去乱用，因为这规律虽然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在客观事物中表现这种规律，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具备适当的具体情况，绝不是任何两次连续的变化都一定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例如由封建社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再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变化，如果硬把“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关系当做公式套在上面，那就不仅套不上去，而且会成为笑话。如果你硬要说社会主义恢复了封建社会的特点，那岂不是荒谬到了极点?社会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是毫无共同之点，事实上就没有任何特点恢复，你一定要说恢复了什么，那你就违背了唯物论，成了唯心论空谈，你所谈的就完全不是真理，而是违背事实的谬论。我们早说过，思想是事物的反映，辩证法的认识方法，也必须与事实的规律一致。因此，我们如果要在事物中间去找“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必须首先要把事物本身的具体条件研究清楚，以便了解它在什么情形之下发展到否定阶段，又

不能把否定之否定当做死的公式随便用到一切事物上

在什么情形之下达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我们要再说一遍，“否定之否定”虽然是普遍的规律，但在不同的事物发展中，这种规律的表现就有不同的具体情形，并且要有不同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这规律也不能表现出来。例如蛋孵成鸡以后，你必须把鸡正常的喂养下去，才能再下更多的蛋，如果你在它未生蛋以前就把它杀了吃了，那么，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就不能表现出来了。

事物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只在一定的情形和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把否定之否定规律作为思想方法，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注意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为认识方法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在研究一切问题的时候，注意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不要把事物的发展，看做像一条直线一样上升，而没有任何迂回、后退、停滞的形式。也不要把事物的发展看做简单的循环，而不注意它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在发展中必须经常克服矛盾，因此一条直线上升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各种各样的曲折、迂回、后退、停滞形式，总之，经过否定阶段的形式，就成为发展中不可免的过程。不破壳变鸡，不可能生更多的蛋；不经过休息，不能恢复精力，继续工作；走路时一脚不停，不能让另一脚前进；不缩回拳头来积蓄力量，不能再伸出拳去打人；不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地区，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经过阶级私有制度的阶段，不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力以达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是螺旋式的。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它的曲折变化。在我们实际革命斗争中，这种认识方法的应用尤其有重要的意义。为着克服革命斗争中的矛盾和困难，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走了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正确的革命指

正确的革命指导就在善于引导人民航行在曲折的道路上迂回前进，不要总是盲目直撞

导就在善于引导人民航行在曲折的道路上，看清楚各种暗礁和避开这些暗礁，当暂退则暂退，当转弯则转弯，不致盲目直冲，以致遭受挫折失败。例如在敌人强大武装进攻前面，就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土地，以避免锋芒，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中歼灭其有生力量，然后才可以再恢复失去的城市和土地。如果不肯走这迂回的道路，想用一股直劲打退敌人，结果不但得不到胜利，反而要吃很大的亏。又例如为着打败敌人，共产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团结，为了团结，必须取得思想一致，必须清除各个党员中的思想分歧，清除各种反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就必须走这样一种迂回的道路，就是要经过党内思想斗争。只有经过思想斗争的否定阶段，才能够达到思想一致，才能够达到更进一步的原则上的团结。如果害怕思想斗争，害怕走曲折的道路，想用无原则的妥协办法保持团结，结果一定得不到团结。

世界是进步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的，中国革命一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单就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国内的统治这一个目标来说，是已经胜利了，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中国人民今后还要经过种种困难并经过斗争战胜这些困难。要有高度的信心，但又要时刻注意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要有充分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以便通过曲折的道路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前进，使中国社会一步步经过社会主义时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研究“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时必须学会的一些方法上和工作态度上的原则。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

一八、七十二变

——现象和本质

读过《西游记》的人，看到“七十二变”四个字，就会想起孙悟空来。不错，我们现在就要从孙悟空讲起。孙悟空是《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的作者用虚构的方法描写出来的一个有反抗性的猴形人物，这个人物靠着他的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曾经把一切的天神都愚弄过，把天宫、地狱、水殿都打闹得个一塌糊涂，后来天上的统治者派了全部兵将，施用了一切法术来对付他，才勉强把他制服了。

这一切的故事，《西游记》上写得很详细，用不着我们重说。我们现在要讲的只是那七十二般变化的厉害处。他忽然变作水中的鱼，忽然变作天上的鸟，忽然又成为一块石头，忽然又变成一座庙宇，但是不论变来变去，始终只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反抗天上神仙的统治秩序。他依靠着变化，使别人看不清他的原形，能隐蔽起他的反抗行为和计谋，使那些神仙迷惑起来，所以就让他偷吃了天上的蟠桃，骗走了赴会的大仙，天上兵将来讨伐他的时候，又吃了他不少的亏。……

“鬼话！鬼话！”性急的读者一定有点忍耐不住了。你们一定要叫起来，说：“谁要你给我们讲这些《西游记》上的鬼话呢？这只是小说作者的幻想罢了。请你讲一点现实生活里的哲学罢，不要把我们带到幻想的云雾里去！”不错，我们现在得要马上把幻想

停住了。不过我得要声明：我讲了上面这些，也并不是仅仅为了要说许多毫无意思的鬼话。请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生活中难道就不会遇见过类似七十二变的孙悟空的情形吗？自然，世界上决不会真有孙悟空这么一个怪物，你们永远也不会遇见他。但是你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人物以及一切的现象，不也常常是变幻离奇，几乎和孙悟空有些相像吗？说小一点，用个人的事情做例子吧。例如你交了一个朋友，在你未和他做朋友以前，他不是和你全不相识吗？由陌生不相识成了你的朋友，不是一个变化吗？这个朋友一个时期和你的关系显得很亲密，他的意见和你的意见很一致，但在另一个时候忽然又和你有了争执，甚至为了某些问题和你大吵大闹起来，这不又是一种变化吗？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交朋友的经验的人，这种变化，往往就会使你吃惊，觉得这朋友前后仿佛是两个人。你如果只从这一点去想，不去了解这朋友的根本的性情，以及他对你的根本态度，你就会觉得这人面貌态度简直有点变幻莫测，你就弄不清楚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能帮助你的还是对你有敌意的。因此你就迷惑起来，不知道怎么对待他才好，是把他作朋友看待呢？还是和他作对呢？

看吧，一个朋友的面貌和态度的变化，是绝不会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那样变得厉害的，但是如果你不加以研究，你也就会为这种变化的现象所迷惑，不知道怎样对付他才好。天上的神仙为孙悟空的变化所迷惑，不知怎样对付他，那情形也就和这差不多。

再举大的例子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就它对中国的关系来说，在抗日战争的前半期，它好像是一个中立者，珍珠港事变以后成了我们共同作战的同盟国家，日本投降后几次宣布尊重中国的独立，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并且派来了

马歇尔，一时之间俨然成了中国国内战争的公正调解人，不久以后又暴露出它是在积极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和民主运动。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关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曾一时迷惑了一部分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分不清美帝国主义者究竟是朋友还是侵略者。这种变化虽然好像没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那样厉害，但它迷惑人的作用还不是一样吗？

再举中国的反动派作例子：反动派要实行独裁，捣乱中国，为着达到捣乱的目的，它何尝不是也变来变去？忽然又对解放区人民进行军事进攻，忽然又说要“政治解决”，开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忽然又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暗杀民主人士，忽然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套御用宪法。这一套套的把戏，对于没有政治经验的人，不是也能引起迷惑的吗？

现在我们要回到哲学问题上来了。我们从这次起，就要根据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来研究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间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矛盾，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对立方面。这些客观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对立方面，是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它们反映在我们的思想里，就成为一些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普遍的概念，或者叫做互相对立的范畴。我们讲了上面一大套，只为着要说明两个哲学上的范畴：现象和本质。我们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世界上的事物普遍地都有这样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它外表上变化不定的形状，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朋友的亲密和争吵，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不同态度，反动派的许多坏把戏等等；另一方面是事物内部的一定的关系、作用，如像孙悟空变来变去总是要破坏天上的统治秩序，朋友终归是朋友，美帝国主义一定要侵略中国、反动派一定要压迫人民等等。我们思想

事物都有两方面：外表变化不定的形状，这是现象方面；内部的一定的关系，这是本质方面

中的两个范畴，现象和本质，就是反映事物的这两个方面。事物的外表上变化不定的形状，就是它的现象方面；事物内部的相当固定不变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等等，就是事物的本质方面。任何一件事物都有这两个方面，都有它的现象的方面和本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每一件事物中密切地结合着。现象和本质这两个范畴，就是反映这种结合的普遍范畴。

现象和本质常不一致，而且有时好像相反，这是现象和本质的矛盾

我们从以上的例子又可以看出，现象和本质是常常不一致的，而且往往好像是相反的。美国的国家本质是帝国主义，但在马歇尔来中国的初期，你从他的一切表面行动上看，似乎就有点不像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者，相反的却俨然是一个和平使者。独裁政府口头上也常常讲民主，也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如果只从这些现象上看，就往往不容易了解它的本质。事物表现上的现象是五花八门、变幻不定，往往使人捉摸不到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本质上的关系、作用，却是相当固定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有名的比喻：例如河水的流动，从表面上看，往往觉得它的方向好像没有一定，部分的水有向河岸流的，有打漩涡转圆圈的，有飞溅到空中的，甚至于有倒流的，但如果从河流的根本关系上看，那么河水的总方向始终是往下流，这却是一定不变的。这个比喻，是很巧妙地说明了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或对立的情形。一切事物的现象和本质，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或对立的情形之中。在现象中往往有和本质表现得完全相反的，在哲学上就叫做假象。

在现象中表现得和本质完全相反的，哲学上叫做假象

但是，如果你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你又可以发现，现象和本质的这种对立和矛盾，并不是绝对的。许多现象虽和本质不同，

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不是绝对的。现象就是本质的表现，与本质有不可分的关系

甚至于似乎是完全相反，但它并不是和本质没有关系，更不会打消了本质，相反的，现象和本质分不开，它就是本质的表现，对于本质的发展，它还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孙悟空变成鱼，并不会使那人物的反抗性消灭，相反的却是他的反抗本质的表现，是为着达到他的目的所必须的变化。马歇尔的公正面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打消，这种虚伪的表现乃是为了欺骗世界，而更便利于侵略的目的。如果我们按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看做绝对的对立，而不把它看作统一的事物内部的两方面，以为侵略的国家决不能有和平公正的虚伪面貌，或者以为和平公正的表面手段决不能出自侵略国的代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真正关系，就要大大的上当。我们要不上当，就要按照辩证法来运用我们的思想，不单只

不单只要认识现象和本质的矛盾，而且要看出它们的同一性

要认识本质和现象的矛盾和对立，而且要看出它们的同一性。要能够看穿一切五花八门的现象，甚至于与本质似乎完全相反的“假象”，都是本质的表现，或者说都是在本质发展中各种不同情形下的表现，而这些表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本质有一定的不可分的关系，就好像河流中的逆流、横流、飞沫、漩涡等等现象，都不是在河流根本动向之外产生的，而正是河流激荡过程中必然要有的各方面的现象。

事物的本质，常常不是直接就能认识到的

我们由以上的例子又可以看出，事物的本质，常常不是直接能够认识到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关系和作用，它平常都不暴露在事物的表面上。我们直接认识世界，是依靠感觉器官，而我们的感觉器官所能接触的都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只凭直接的感性认识或局部的

只从表面现象认识事物，就常常会受到迷惑

经验知识来认识世界，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我们就要为变幻不定的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就不能了解事物的真实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天上的神仙怎样为孙悟空的变化所迷，一部分中国人怎样曾经一时为马歇尔的公正面貌所迷，我们还可以指出无数的事例，表明现象是如何经常的迷惑人的认识，以致看不清楚自己应走的道路，摸错了奋斗的方向。中国是封建社会残余势力很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妨举封建的土地关系做例子。所谓封建的土地关系，就是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地主一年到头，不必做任何劳动，就可以用地租的形式，把农民劳动的大部分果实收归自己享用。所以，按照事情的本质来说，本来是地主依靠农民的劳动生活，如果农民不劳动，不交租，地主就无法维持生活。但是，从表面的现象来看，情形却好像恰恰相反，好像是农民依靠了地主，没有地主租给土地，农民就不可能生活的样子。几千来年，地主都是用这种表面现象的看法做理由，来证明剥削农民是应该的，而农民自己也常常为这种现象所迷，相信了地主阶级的这种欺骗，以为自己真是靠地主生活的。甚至直到今天，中国革命人民为了要消灭封建制度而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还有些农民，以为反对地主的剥削似乎是违背道德良心的事。这种颠倒的思想，妨害了农民群众的觉悟。因此，最近几年来在土地改革中动员农民，就不能不首先提出“谁依靠谁”的问题，来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了解从来以为农民依靠地主是错的，而地主依靠农民才是真的。这样

指导群众进行革命运动需要揭露事物的本质

打破了他们的迷惑，使他们了解事情的真实本质，然后他们才感觉到理直气壮，知道反对地主的剥削和为自己争取土地是应该的，完全合理的，才知道自己以前是无理的被压在地上，现在应该积

极起来为自己翻身而斗争。这一个例子，证明我们进行革命运动的时候，是如何需要揭露社会阶级剥削的本质，并且需要使群众了解这本质，如果广大群众为现象所迷，不认识社会阶级剥削的本质，对于革命运动是有很大阻碍的。

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这样重要，但本质又不是直接能够认识到的。怎样才能不为现象所迷，而达到认识本质的目的呢？这就需要对事物加以科学的研究。怎样叫科学的研究呢？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请读者们回想一下以前我们讲过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之所以要由感性的阶段提高到理性的阶段，其目的就是为着要撇开现象的迷惑，找出事物的本质。感性的认识或经验的知识，把事物的现象反映到我们头脑里，我们再进一步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来理解这些现象中间的内部关系，找出它们中间的一定的关系和作用，认识它们的规律，这样就得到了本质方面的认识。这样，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经验提高到理论，就是使我们的认识由事物的现象方面深入到本质方面去的过程。

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做科学的研究

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经验提高到理论，这就能使认识深入到本质

我们以前讲过，理性的认识，并不是在感性认识之外，而是要以感性的认识作基础，运用我们的理解能力去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事物的内部关系和规律知识，就可以提高到理性认识。因此，要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是离开事物的现象知识凭空可以达到目的的，而是要把各种现象做基础，运用我们的理解力，加以研究分析，把各种现象之间的内部关系和规律寻找出来，这就是本质方面的认识。

要认识本质，必须以现象的认识做基础，加以分析研究

比如我们要认识河流的本质方面，是不是闭着眼睛，不去观察任何河流的现象，凭着脑子里的空想就可以达到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首先必须睁开眼睛，去察看河道、河床、水流、漩涡、逆流等等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加以分析，研究，弄清楚哪些现象是决定河流方向的主要条件（如河道、河床的方向），以及在此条件之下，哪一部分的水流只是一时激荡成的逆流和漩涡，哪一部分的水流才代表坚定正确的方向，经过了这样一些分析研究，最后你才能确定河水是流向什么地方。你要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是不是闭着眼睛不首先观察一下美国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具体现象，仅凭着脑子的空想就能做到呢？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以能深刻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因为对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现象首先作了许多观察，然后加以分析研究，认清楚了决定美国政治的根本条件仍是帝国主义的独占资本势力，认清楚了马歇尔等人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一时的公正和平面貌只是表面手段，然后才深刻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者是想要独霸世界，侵略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是一定要帮助中国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这才完全认识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要认识本质，必须以大量的现象认识作基础

要由现象进一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有一个重要的要点，就是要以大量的各方面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基础，切不可以少量的部分的现象的观察为满足。只认识少量的部分的现象，这叫做“眼光狭窄”，叫做“一知半解”。人为什么会被现象或假象所迷惑？其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眼光狭窄和一知半解。如果有人竟会深信马歇尔是真正的“和平使者”，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仅仅看见马歇尔来华最初一个短时期的行为，那时马歇尔在外表上

装得公正无私，好像真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调解人，你如果不把他的前后行动表现以及美国政府的各方面的行动表现联系起来研究，而只孤立的去看这一段现象，那你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又如日趋没落的中国反动势力，在一定地方或一定时间内，当他以疯狂挣扎的姿态向民主势力进攻的时候，尤其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它会显得好像也很强大，就如患肺病的人将死时的“回光返照”一样。如果你只看见这一时的或这一个局部的现象，你就为现象所迷，以为它是一个向上生长的强大势力，而看不见它在本质上已是走向死亡。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如果你只看见纸老虎的凶恶的形象而不连带看见那是纸做的，你就也许要给它吓倒。所以，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首先观察大量的全面的现象。从前我们说过要达到理性认识，必须搜集大量的材料，积累多量的经验，这也不外乎就是要使我们有机会观察大量的各方面的现象，把许多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分析，才可以得到理性的认识。“狭隘经验主义”，就是拘泥于少量的或局部的现象知识，因此也就容易为局部的现象所迷而发生错误。

大量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关系才是本质的、巩固的关系，才不是暂时的现象

为什么一定要研究大量的各方面的现象呢？因为在大量的现象中起支配作用的事物关系，才是本质的关系，才是巩固的关系而不是暂时的现象。因为要研究现象的各方面，才能分析比较，以便确定哪一些方面是相当巩固的关系，哪一些是暂时的现象。

河流的水，大量都向下流，只有局部是逆流和漩涡。而逆流和漩涡归根结底也是还要汇合到向下流的方向去，向下流的方向是全部河流的起支配作用的方向。所以本质的关系就是这向下流

的方向，而逆流和漩涡则是附属的暂时现象。马歇尔的公正面貌只是暂时的，而美国政府的代表人物的言行，以及美国军队、美国商品对旧中国的侵略关系，却是经常不断地破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马歇尔的虚伪的公正面貌，归根结底也是为着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所以侵略的关系才是它的本质关系。

广大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才是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

又如旧中国的农民，他们的绝大多数在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军阀的压迫剥削之下几乎不能生活，他们渴望着得到土地，因此他们需要推翻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官僚、军阀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这是在大量的农民群众中起支配作用的关系，是旧中国农民生活要求的本质。但如果我们只从部分的表面现象来看，情形似乎就不如此。在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有的农民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最落后的个别农民，甚至于认为反对地主是似乎违背了道德良心。如果你只看到这些片面的或个别的现象，你就很难认识到农民要求的本质，很难认识到农民群众中所包含着的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力量。这样，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观察大量的现象，找出大量现象中普遍存在的起支配作用的关系，就要对现象的内部关系作全面的分析，分清楚哪些是相当巩固的和哪些是比较暂时的，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次要的，这才能认识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关系。由此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在研究社会革命问题时，一定要有群众观点，一定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因为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问题，才是支配社会革命动向的最本质的问题。只有抓住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才能正确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现象的迷惑，认识事物的本质。

我们获得了本质的认识，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各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假象。假如我们认识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我们就容易了解为什么马歇尔要假装公正的面貌；认识了河流向下的根本趋势，也就容易了解为什么在一定的地方要荡起漩涡和逆流；认识了旧中国的农民迫切需要从地主阶级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并获得自己的土地，也就了解为什么在“谁依靠谁”的问题上地主阶级要对农民进行欺骗，并使部分落后农民受到这种欺骗。

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打破现象的迷惑，认识事物的本质

这样，我们的认识，是要由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不会为现象所迷，相反地却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每一现象以至于“假象”的原因和意义。这样，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就不会为“假象”所迷而走错路，就能正确地应付一切现象的或局部的临时的事变，就能够顺利地达到我们斗争的目的。

认识是要由现象深入到本质，而认识了本质，就更容易了解各种现象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本来就有从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例如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樱桃的买卖，就想到这是货币和商品的交换，而不只是樱桃和货币调换位置。后者就是感性的现象的认识，而前者就是向着事物的本质深入了一步，就是向着支配现象内部的普遍关系深入了一步。这种普遍关系的认识，是我们日常经过千百次的买卖经验积累而成，也就是观察了大量的买卖现象而得到的认识。这就是说，这种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的。但是，科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把这种能力提高，使我们能够更深刻更有系统的认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认识事物内部的更深刻的关系和更多的规律。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本来就有深入事物本质的能力。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更提高这种能力

例如我们由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我们就不但能认识樱桃的买卖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为什么它们中间能进行交换，我们发现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是由于它们都有一定的价值。我们不但认识它们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还可以一层比一层更深入地，研究它们的价值从何而来。我们从人类生产商品和货币的大量材料来研究，就发现它们的价值是由于人类生产出这些商品所要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花费社会必要劳动多的商品，价值就大，花费社会必要劳动少的商品，价值就小。栽种樱桃要花费劳动，铸造钱币要花费劳动，所以它们都有价值。但要取得空气，就不必花费劳动，所以空气就没有价值。总之，我们从商品的交换里，还可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研究出它们的许多内部关系。我们可以从一系列的本质，研究到更深的再一系列的本质，以至于许许多多的层次。我们由马歇尔的前后行动，认识了他的侵略本质，更认识到这是美国国内反动派的一贯的政策，再进一步还可以认识到这种政策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独占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大扩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要向全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就要妄想独霸世界。我们还可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经济的危机将要到来，美帝国主义之急于要向世界扩张它的侵略是要延缓危机的到来。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为不是表示它的向上生长，而是表现它走向死亡，不是表示它的力量无敌，而是表示它自己的困难重重。这样一层比一层深入地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我们就能看出世界与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就不会为它的一时的强大现象所迷惑、所吓倒。这样，我们在为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时候，就能够有非常明确的方向和坚强的胜利信心。

科学的研究使我们能由一系列的本质，深入到更深的本质，以至于许多再深的层次

一九、“谈虎色变”

——形式和内容

老虎是可怕的猛兽，普通人一谈起老虎，精神就要有几分紧张，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做“谈虎色变”。老虎，单单它的样子也是很可怕的，把它画在纸上，胆小的人看了，就会觉得毛骨悚然。所以又有一句“纸老虎吓人”的俗语。我们现在把美帝国主义比做“纸老虎”，因为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帝国主义一样，是已经一天天走向崩溃，它在经济上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政治上遭到了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反对，所处的地位非常孤立、脆弱，就好像纸上的老虎，看起来似乎很凶猛，实际上却是可以戳破的。它可以吓唬一下胆小的人，但对于胆大勇敢、敢于和它斗争的人，它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了。

认真说起来，不要说“纸老虎”吃不了人，就是真正的活老虎，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动物，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说它凶猛，甚至于称之为兽王，但它在实际上也没有能够独霸了动物世界，即使它想独霸世界，也只是妄想，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它不能到空中去征服飞鸟，也不能到水中去捕捉鱼类，连土中的蚂蚁，看起来好像非常弱小，但它们生存繁殖的情况，不但不比老虎差，而且种族茂盛，老虎的生活和它们比起来，反而显得凋零冷落了。

弱小的蚂蚁，为什么竟能够与强大的老虎并存在世界上，而且甚至于比老虎生活得更繁盛呢？这有种种原因，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动物学，所以不想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想讲下面的一点道理：老虎和蚂蚁，不但有强弱大小的不同，而且它们的生存形式也有根本的不同，这是它们能并存在世界上的原因之一。

老虎的生存形式是孤单的。它强大凶猛，在兽类中很为特殊，甚至于有时被称为兽中之王。但这个兽王却是那么孤立，连它的同类也不能很好团结，因此就有"一山不能容二虎"的俗语。蚂蚁的生活是集团的形式，它们经常是一大群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间有帮助、有分工，蚂蚁虽然弱小，但靠着这集团的力量，能够维持繁盛的生活。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形式

老虎和蚂蚁的谈话到此要停止了。我们谈了这些，目的是要引到哲学问题上来。现在已经引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它已经使我们接触到这一次要谈的哲学范畴——形式和内容。这又是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普遍的范畴，它反映了一切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一定的形式。我们前面说到了两种动物生活的形式，一种是老虎的孤单生活的形式，一种是蚂蚁的集体生活的形式。我们还可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没有它自己的形式。鸡蛋是椭圆的形式，桌子有方或圆的形式，水有流动的形式，泥土焦炭不成一定的形状，而不成一定的形状，也就是泥土焦炭的形式，这叫做无定形的形式。以上讲的只是自然界的某些事物的外表形式，若就人类社会的情形来说，那就有封建社会的形式，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社会内部的革命斗争，有政治的形式，有文化的形式，有军事的形式。政治斗争中又有公开的斗争与秘密的斗争、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等不同的形式；军事斗争中又有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不同的形式。思想上有新旧思想的不同形式，文学上有古旧的文言形式和现代的白话文学等等的形式。总之，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形式之中发展变化，它的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就是它的内容。蚂蚁在集团的形式中生活，它的生活

事物在一定形式中变化发展，变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就是它的内容

的全部过程，由产卵、孵化、成长、工作、养育后代，以至于死，就是蚂蚁这种动物的生活内容。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和敌人斗争，这些游击队伍的产生、训练、发展、战斗过程、游击队与人民及解放区政府的关系、战争的结果和影响等等，都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内容。

形式使各种事物在外表形状上有所区别

事物的形式，使它具有一定的外表形状。不同的形式，使事物在外表现象上有所区别。同是军事斗争，分散零星的游击战和集中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在外表上一看就可以分辨出它们的不同。一篇白话文和一篇文言文，拿来一读就立刻感到不同的味道。但这种区别既然是外表的，因此形式的不同，不一定就是全部内容的区别。往往有形式不同而内容却基本上相同的事物，也有形式上好像一样，而内容却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国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打游

形式与内容常不一致。形式不同的事物往往内容相同，反之亦然

击战，有时也打运动战；但不论形式是游击战或运动战，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日寇投降后解放区人民军队主要用运动战歼灭进攻的反动军队，在很多地方也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形势改变，转为对敌人进攻时，又采取了大规模的阵地战、攻坚战的形式，但不论形式如何不同，其内容都是人民为独立民主而战，都是反对反动专制的独裁政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使中国殖民地化的阴谋的爱国自卫战争。白话文可以写一篇革命的宣言，用文言文也可以写出基本相同的内容。这就是形式不同而内容上却基本相同的例子。希特勒曾经举行所谓“国民投票”来选举他做“大总统”，罗斯福做美国总统也是经过人民投票选举的形式，两种投票选举的外表是相同的，但内容却

不一样，希特勒的选举是法西斯独裁政府欺骗人民的手段，罗斯福的选举，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普通的民主制程序，虽然这种“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表面的。汪精卫开过“国民大会”，反动独裁政府也开“国民大会”，孙中山曾主张要开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这都是形式上似乎一样，而内容却不一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辨别事物，不可单从形式上着眼，而要同时从内容上着眼。事物的形式，往往造成一种外表的“假象”，模糊了内容，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矛盾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只看见形式，不注意它的内容，就往往发生迷惑，看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认错了它的真正性质。反动派欺骗人民，就是常常在形式上耍花样，例如开“国民大会”之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把中国的一切主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拖到穷困的绝境，做了无数卖国残民的非法罪行，但这个政府因为曾是在外交形式上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这个形式就把它的一切非法罪行伪装成合法的样子。一切反动统治者都善于把自己的非法行为伪装上合法的假象，如果有人竟会被它们欺骗，当真以为那些罪行是合法的，那就是由于只看事物的表面形式而不看它们的真实内容的缘故。

认识事物，不可单从形式上着眼，而要从内容上着眼。因为形式往往会造成假象，模糊了内容

因为形式与内容有以上的矛盾，因此往往有人把它们误认为可以随便分开的东西，并且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作比喻，把形式比做瓶子，把内容比做酒。有些事物是旧内容新形式，如封建独裁者开“国民大会”，这叫做“新瓶装旧酒”；有些事物是新内容旧形式，如用文言文写革命思想的文章，这就叫做“旧瓶装新酒”。这个比喻，在谈文艺的问题时用的特别多，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它把形式和内容比做两件可以随便分开的东西，

而没有看见两者深刻的内部联系。没有酒，瓶子还是瓶子；没有瓶子，酒还是酒；把酒装进瓶子去，仅仅是装满了瓶子，对于瓶子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酒和瓶子的关系只是外在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却不是这样隔膜的。一切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本身所具备的形式，就是内容发展中所表现的结构状态，绝不是像瓶子那样从外面装上去的东西。方形的桌子，是在制造桌子的时候就同时形成，绝不是先制成了没有一定形状的桌子，然后再把方形装上去。蚂蚁生活的集团形式，绝不能和蚂蚁的生活分开，它就是蚂蚁生活过程的组织构造状态。

> 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形式就是内容本身的结构状态

独裁者伪装民主，这伪装民主的内容本身就一定要具备“国民大会”伪造宪法一类的假民主形式。形式和内容是不能随便分开的，这种关系在哲学上叫做内在的关系，与瓶子和酒的外在关系是不同的。

> 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的关系

形式和内容的内在关系，首先表现在内容的优越地位，或内容的决定作用上。形式既然是内容的结构，因此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并且在它的发展中，必然要形成它所要求的形式。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坚持敌后战争，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这种战争要求我们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形式。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在正确的领导下，必然地形成了普遍广泛的游击战形式。日寇投降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渐壮大起来了，在反对反动派的战争中，力量对比与以前不同了，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内容就要求形式也跟着转变，由游击战为主的形式转为以运动战为主的形式，又由运动战为主的形式发展到在某些条件下进行阵地战、攻坚战的形式。形式一定要适合内容的性质，不适合内容

> 内容的优越地位或决定作用

要求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迟早总要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例如，

不适合内容要求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会被淘汰、消灭

在抗日战争中，如果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甚至于阵地战的形式，就要遭受严重的损失，甚至于遭受失败。在反动势力统治较巩固的地区，革命工作要求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形式，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形式，也要遭受严重损失和挫败。内容对形式的这种决定作用，与瓶子和酒的关系显然是不同的。酒绝不会要求一定的瓶子，更不会形成它所要求的瓶子，只要是瓶子，不论新的、旧的、方的、圆的、玻璃的、瓷制的，以至于葫芦之类，都可以把酒装进去，而不发生什么问题。

内容既然要求一定的形式，为什么有时新内容竟可以采取旧

内容所要求的形式，是依其本身发展情况及周围条件来决定

形式，有时旧内容又会采取新形式呢？这是因为内容所要求的形式，是依照它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它所处的条件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它要求这样的形式，在另外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它又要求另一种的形式，绝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正是辩证法的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都是在“真命天子”的名义下采取公开独裁的形式；但在人民的民主要求一天天高涨的条件之下，反动派要想实行专制独裁，绝不敢像清朝以前一样，一旦掌握了政府的大权，就立即把专制皇帝的形式公开摆布出来。它不能不采取一些伪装的民主形式，如像袁世凯一样，要经过一连串伪造民意的办法，才敢宣布帝制，或者连皇帝的招牌也根本拿不出来，就在“执政”、“主席”、“总统”的名义之下实行专制独裁。新的事物在发展的初期，常常要采取旧的形式出现。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内容上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争的先驱，但采取了旧农民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好像和过去的农民战

争一样，只以一个皇朝的争夺的胜败为结局。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是采取了宗教改革的形式。不论旧形式新内容，或新形式旧内容，都是在一定发展情况和一定条件之下，由内容决定它所需要的形式，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容对于形式也并不是毫无影响。旧酒装进新瓶，瓶的“新”不受影响；旧内容取新形式出现，这新形式就要受到影响。就像孙悟空变成庙宇时，因为他自己有一根尾巴，就使他变成的庙宇后再也不能不留一根特异的旗杆一样，旧内容藏在“新形式”里，也免不了要终归露出它的伪装的尾巴。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伪装民主，假扮了顽固派和“民主”派的激烈斗争，吵闹得个天翻地覆，最后是“领袖”出来大喝几声，全场就此“鸦雀无声”，这就是独裁的尾巴在伪装民主的形式中暴露的一例。再说新内容采取旧形式而出现时，那旧形式也不会完全保持旧的原样。新内容的秧歌剧或京剧，在形式上也不会完全保持旧秧歌剧或旧京剧的原样，这是一切观众都了然的事。旧瓶装了新酒，瓶仍然是旧瓶；旧形式有了新内容，那旧形式就会开始蜕化，并由此成为新形式形成的起点。这也正是内容的决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形式对内容也有它的反作用，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东西

但是，内容的决定作用，只是形式和内容的内在关系之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形式并不是单纯被动的东西，它之所以为一定内容所需要，它之作为一定内容的发展形式，就是因为它对内容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简单的说来，是在两种情形之下，表现为两种相反的作用。第一种情形：如果形式是适合内容的发展情况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它是内容所需要的恰当的形式，那么，它就有促进内容发展的作用；第二种相反的情形：如果形式是不适合内容的发展情况的，换一句话

说，如果它是内容所不需要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对于内容的发展就会发生阻碍的作用。专制独裁政治为广大人民所反对，因此反动派需要采取各种伪装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对于他们的欺骗阴谋的施展能起某些帮助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对反动派的斗争，首先就要揭露他们的伪装形式，使它的反动内容暴露出来，这样反动派的欺骗就会破产，专制独裁的阴谋就有可能在广大人民的反对前面被粉碎。在抗日战争中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斗争形式，就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增长抗日人民的力量，这是由于形式适合内容发展条件；如果采取运动战为主以至阵地战的形式，就会使抗日人民受到损失，这就是由于形式不适合于内容发展情况。日寇投降后人民军队的力量壮大了，这时如果对反动派仍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形式，那就反而束缚了自己的力量，不能有力地粉碎敌人。对老百姓宣传革命思想，要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形式，才能发挥宣传力量，因为这样的形式才适合于内容的需要；用文言文写新内容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没有白话文好，就因为形式不适合内容的需要。

形式如果适合内容的发展要求，它就有促进内容发展的作用

形式如果不适合内容发展的要求，它就有阻碍内容发展的作用

形式和内容比较起来，内容是变化不停的，而形式则是一种比较固定的东西。譬如中国的旧戏，戏的内容可以有千万种，但曲调却是翻来覆去只用有限的几十个。旧的京戏和改良的京剧以至于编入革命内容的京剧，所用的调门基本上总是一样的。中国人民中间民主思想的传播很早，但传播这种新思想所用的文字形式，在“五四”以前很长久的时期都是旧的文言文。鸡蛋在孵化的过程中，蛋的内容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而蛋的形式，则一直到小鸡破壳以前，始

内容是变化不停的，形式则是比较固定的

终保持原状。抗日游击战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在壮大，但在转变为运动战以前，游击战为主的形式不变。这些例子，证明形式对于内容，也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它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随着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内容发展了，而形式却在一定的时期始终保持原状。这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就产生这样的规律：即形式落后于内容。某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形下，本来是与它的内容适合的，是能促进或帮助内容发展的，但这内容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一形式就变成不适合的了，就成为内容发展的阻碍物了。椭圆的蛋壳，本来是保护蛋黄蛋白孵化的，但等小鸡孵化完成时，它就成为内容继续成长的障碍了，就成为内容所不需要的了。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关系的变化，用哲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叫做由内在的关系变为外在的关系，也就是由互相依赖为主的关系变为互相排斥为主的关系。到了这种时候，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就要发生冲突、破裂。这种冲突和破裂的原因，是由于内容必须要冲破原来的形式，取得另外的新形式，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其结果就是：或者是原来的形式被冲破，或者是内容的发展被停止、被窒息。以鸡蛋为例，或者是小鸡破蛋而出，取得独立活动的形式以继续繁殖，或者是蛋壳坚固不破，蛋的内容终于腐坏、死亡而壳也自然同归于尽。又如，用文言文宣传民主思想，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引起文学革命，抛弃文言形式，采取白话形式。旧戏的改造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逐渐打破旧的调门限制以及其他凝固形式的限制。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由内在的转变为外在的之时，就必须依照内容的发展要求，向旧形式作斗争，以取得新形式。

适合内容的形式，当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变为不适合的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由互相依赖变为互相排斥，内在的变为外在的，就发生内容和形式的冲突和斗争

一种社会形式只在一定时期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另外的时期就变为不适合，就要发生革命，打破旧社会形式

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同样表现着这种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的关系。一种社会形式或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情形之下，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为后者的阻碍物了。封建社会形式比较奴隶社会，是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但在封建社会中间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冲破封建社会，才能继续发展，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原因。资本主义在它的初期，是能刺激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的形式，但在末期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就成为生产力的严重的阻碍力量。为着冲破这一个阻碍，就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式，在那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是生产力发展的致命的障碍，是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要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式，建立新的、能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种社会形式，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革命工作首先要看有没有具体内容，而不要看形式上像不像革命工作

按照形式与内容的这种辩证法关系，在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首先就要使工作有具体的内容。所谓革命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必须能够解决实际斗争中的一定的具体的问题，例如说要对于反动派的某一方面的具体行动给以打击：或者是粉碎它的一个进攻的队伍，或者是揭露它在宣传上的某种欺骗，或者是打击它在政治上的某一个阴谋，或者是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或者是替老百姓解决一个其他困难问题（如生产问题）。由于内容的优越地位，所以对于工作首先要看有没有内容，而不要看形式上像不像革命工作。我们反对形式

形式主义、洋八股、党八股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内容或不看重内容

主义（其中包括党八股、洋八股），就是因为它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下笔万言，满纸革命名词，而对于当前的革命问题毫无关系，这是写文章的党八股、洋八股。在房子里做报告、填表格、开会，空喊激烈的口号，而不去接触群众、了解和解决群众中真正存在着的问题，这是工作上的形式主义。此外还有种种的形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革命工作首先要有内容，其次就要按照具体情况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我们首先要使工作有切实的内容，其次就要善于按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或工作形式。革命斗争有文化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等等形式，有利用旧的形式的斗争，有采取新的形式的斗争，有和平斗争、有武装斗争。革命工作者应该依据情况，善于选择和掌握最能发挥工作力量的形式，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特别在情况变化的时候，要善于抛弃不适合的形式，随时调换另外适合情况的形式。

在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中掌握主要的形式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可以同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又要能掌握主要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有“五四”以来城市学生运动的形式，有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也有经济斗争的形式（农民抗租、抗捐、分土地、清算诉苦，工人罢工、请愿、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但就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来说，其中最主要的革命斗争形式，则是武装斗争，是人民军队对反革命军队（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的战争形式。自然，这并不是说，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要采取以武装为主的斗争形式。相反的，如果不是就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说，而是就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来说，仍然可以以军事以外的

其他形式为主，例如“五四”时期中国人民主要地是进行了文化斗争，在一定的时期又主要地是和反动派在城市里进行政治斗争等等。在适当时期斗争形式的变化，以及主要斗争形式的掌握，是为了推进革命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艺术。

二〇、规规矩矩

——规律与因果

社会上一般人都很重视规矩，对人说，“你不懂规矩”，他就会觉得是一个侮辱。要说服别人听自己的话，叫一声“规规矩矩的！”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上海的三轮车夫要价钱，总说：“规规矩矩要多少。”这表示他所要的数目是很正当的，你应该照给。乘客还价，也说：“规规矩矩只能给多少。”表示少给一点才合道理。反动的统治者利用人们重视规矩的习惯，就强调政府要实行“法治”，强调人民要守法，这意思就是说要遵守专制政府所定下来的种种规矩，这样他们就有理由来反对人民的各种民主要求，反对实行人民的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并不是要反对规矩，并不是不要守法。问题是要先问“法”的内容是什么？是人民自己的民主的法，还是反动专制的法？如果是人民自己的民主的法，当然就要遵守；如果是反动专制的法，那就一定要反对，一定不遵守。总之，不能只从形式看问题，不能一看见凡是有“法”的外表的东西就一定非遵守不可。而要看内容，要看那法的内容是否符合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的规矩礼法，被统治者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并且认为不但人要遵守规矩和法，就是宇宙万物，也为一定的神秘的法和规矩所管制。月到阴历十五必圆，天气在夏季必热，冬季必冷，其他事物的存在变化，都有一定的秩序，而

这些秩序，封建社会不是把它当做一种自然规律来看，而是把它当做一种神定的法和规矩来看。如果世界上的事物忽然不按照一定的秩序出现，例如说十五日发生月蚀，或者冬季忽然转暖了，那就叫做反常，就以为有什么触犯神灵的事情发生，而世界上的人就要受到什么可怕的惩罚了。

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变化，都有一定的秩序

这种思想，当然是属于迷信之列，凡是有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不会有这种神怪思想，都不会相信世界上事物的秩序，是由于一种什么神灵预先给它们定下了规矩。但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变化，也的确是有它的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过程。从表面的现象上看来，这世界的事物真是万花缭乱，错杂不堪，但只要细细加以研究，就可以从每一种事物中找出它一定的变化秩序。战争现象，可以说也是够错杂缭乱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才完结不久，如果从"九·一八"算起，这就是打了15年，世界各个角落都受到波及，打来打去，表面上看好像混乱不堪，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出它的根本的秩序：例如说这战争始终是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在战争的初期是法西斯进攻，战争的过程中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愈更团结、愈更觉悟、愈更强大，终于把法西斯侵略者打败。这些变化的秩序和过程，是一定不移的，这就决定法西斯必败，民主势力必胜，世界一定要照这样的秩序发展，而不会有相反的过程。这样，在表面上看起来不论怎样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事物，在实际的变化发展中却有一定的秩序和道路。

我们这次所讲的问题，以前早已重复地讲过几次了。我们这里所谓事物发展的一定秩序和过程，就是以前讲过的事物的规律（也叫做法则）。任何事物都按一定的秩序或过程而变化，这种性质，叫做事物的规律性（或叫合法则性）。世界上并没有神灵，事

事物的发展都按一定秩序，这叫做规律性或合法则性

物的变化也不是依照神灵在冥冥中定下的规矩而变化，而是依照它自己本身的规律性而变化。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事物，目的就是在于认识事物自己本身的规律。认识了某一事物的规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事物是如何变化发展，就可以预测事物变化的将来前途，并利用这些知识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怎样认识事物的规律？其方法的要点，以前也讲过了。现在

规律决定于事物的发展情况和条件

再概括的说明一下：规律决定于事物本身的矛盾发展情况和它所联系的条件。要认识事物的规律，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情况和条件。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以及持久战大体要经过三阶段的规律，是由于研究了种种敌我矛盾的情况和条件，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以及敌在国际上寡助而我多助。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是敌我两国本身的矛盾发展情况；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是敌我所联系的环境条件。把这些情况和条件加以综合研究，就得出持久战的各种规律。所以，事物的规律，就决定于该事物的矛盾发展情况和一些重要条件相互间的关系。

上面讲的是社会变化的规律。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一样的。例如河流的方向，是决定于水的本身的流动性质，加上地形的条件；植物的生长，是决定于种子内部的矛盾情况，加上土质、水分、空气、阳光等等条件。相同的种子，加上相同的条件，就会表现相

自然科学的实验，是用人工造成标准条件，来确定事物的规律

同的发展规律。同一种谷物，春天同时下种，用相同的方法耕耘，它的生长和成熟状况也一定是相同的。自然科学上的实验，就是用人工造成一种标准的环境条件，使一定的实验物品和这些条件结合，然后观察它的变化情形，这样来确定该

事物的规律。例如把一种植物放在人工制成的温室里，让它的周围经常保持一定的温度，加上一定的肥料和水分，来观察它在这种标准条件之下的生长过程。

在现实世界里事物所处的条件复杂，因此变化的情形也非常复杂

规律决定于事物本身的矛盾情况和它周围的一定条件。在现实的世界里，每一事物周围的条件都是很复杂的，绝对不容易找到一种完全合乎标准的条件，如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因此，即使是同一事物，它们的变化规律的表现绝不会完全一致。例如人的一生，在一般正常条件下，都是由幼年、青年的时代，经过壮年达到老年，然后死亡，这是一定的过程，一定的规律。但在实际上千万个人的生活过程，就有千万个不同。有的可以正常的达到老死，所谓“终其天年”；有的在壮年、青年，甚至于幼年婴孩时代就死了，这叫做短命夭折；有的高年还像青年一样健康；有的未老先衰。照现在科学上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能得到最圆满的生长条件，不论饮食、运动、精神各方面都很合理，那么最长应该可以活到一百四五十岁，但在实际上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因此，我们对于事物的一般规律知识，都只是依照某些最重要的条件，来了解它的一个标准的发展秩序，我们的一般的规律知识只是一定标准条件下的规律知识。在现实世界上，由于事物关系万分复杂，除了最重要的条件之外，还有其他的条件能够给事物的变化以影响，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标准条件下的规律的道路变化，就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偏差，与标准条件下的一般规律有许多具体的不同。因此，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律知识来预测现实事物变化的前途时，我们就只能指出一个大体上的一般方向，而不能像算命先生一样，把每

规律知识只是标准条件下的一般知识，对现实事物的预测只能指出一般的方向

年每月每日的具体细节都算清楚（事实上算命是骗人的，它也不能真正这样地把事情算得清楚）。例如说抗日是持久战，在抗战初期我们只能规定它时间是长久的，不是一两次战役可以胜利，并且规定它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至于究竟长到多少年，三个阶段又各占多少年，这些具体情形，就不能妄自武断，而要看战争将来发展中其他条件来决定了。如苏联在抗日战争的第八年参战，这就是没有预先知道的条件。这个条件使战争过程迅速结束，使中国的反攻阶段缩得很短。如果苏联不参战，显然战争还要延长相当的时期。

我们能撇开复杂的影响，了解一般的规律知识，这是思想上的抽象能力

因此，我们的规律知识，都是只就标准的条件之下来了解事物的一般变化过程，而把现实世界上一定会出现的其他复杂影响撇开了（或抽去了）。我们能够撇开具体的复杂现象，而理解到这种纯粹的规律知识，这种能力叫做思想上的抽象能力。规律知识反映了事物的根本发展过程，反映了事物的一般的变化方向，比较起表面的似乎很零乱复杂的现象的认识来，它是一种更深刻的更正确的认识。但是，它又是抽象的、内容较单纯的、具有相当凝固性的知识，它只能反映事物的一方面（虽然是深刻的、本质的方面），而不能反映现象中的全部复杂生动的东西。列宁说："规律只能抓着静止的东西，因此一切规律都是狭隘、不完全、近似的"；"现象比规律更丰富。"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它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应用一般的规律知识的时候，不要把它当做算命先生的骗人的死公式来看待，而只能用它指示事物发展的一般方向，以及指出我们实际行动的一般方针。而对于详细的具体发展过程，以及为实现一般方针而应采取的实际行动的办法计划等，则要在事物的发展经过中以及实际工作过程中去具体地加以认识和了解。

事物发展中如果条件改变，则规律性也要改变

事物的发展条件是常常要改变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新的重要条件，事物的规律就要有新的改变。例如日寇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这时中国却出现了新的条件，即美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内战。这时中国人民虽仍然要为独立民主而战，但它的规律已不再是持久的游击战争，也再不是三阶段的过程，这个战争是循着新的规律发展：例如由于人民军队力量的壮大，以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高涨情绪，因此敌人虽然有一个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仍然很快的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垮，战争的过程在敌人方面只经过了进攻和崩溃两个阶段，在人民解放军方面就是主动撤退和转入反攻的两个阶段。

应用规律知识必须注意条件变化及规律变化，不要把一种规律当做死的公式应用

辩证法的方法，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规律的时候，要注意到事物条件的变化和规律的变化。不要把一种规律知识看做永远不变的公式，不管条件变化与否，到处一样地拿去乱用，作为预测事变指导工作的依据；如果这样做，一定要犯错误、碰钉子。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时候，是必然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在有了共产党的时候，条件就变化了。在这新的条件下，如果有人还以为资产阶级革命仍然只能让资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不应该去争取领导，如像中国陈独秀主义者所主张的一样，那就犯错误了。

普遍的规律和特殊的规律

有比较普遍的规律知识，这种规律是与比较长时期和广泛地存在的条件相联系的；有比较特殊的规律知识（或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这是决定于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方所存在的某些特殊条件（与普遍的

条件同时存在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要推翻封建制度和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比较普遍的规律知识，这一条规律知识不论在有没有共产党存在的条件之下都是适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并且在它领导之下使资产阶级革命在得到胜利后就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在有共产党存在的条件下才有的特殊规律。我们需要普遍的规律知识，它能指示事物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因此也使我们在研究事物和实际行动中能看出一个大的方向；同时我们又必须掌握当前事物发展的规律的特殊性，必须认识普遍规律在一定地方和一定时间的特殊条件之下的特殊表现，这样我们才能看清眼前应该走的具体道路。一方面把较普遍的规律知识作为研究的引导，一方面按照具体条件找出这些规律知识的特殊表现，以便解决当前实践行动中所提出的具体问题。辩证法的方法，就要求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掌握规律知识。如果只知道普遍规律，而不能认识或不注意它的特殊表现，就要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如果没有普遍规律知识作为研究的引导，那就只能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当前事物的狭隘范围，不可能在认识上把事物发展的眼前的情况和它在较大范围里的发展趋势全面地结合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就是不注意或不善于应用普遍的规律知识作为研究的引导，因此虽然有实际经验，却不能明了这些经验在事物的总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具有的意义，不能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成为有综合性的有条理的规律知识。只有一方面能以比较普遍的规律知识作为引导，一方面又能依据当前实际条件来掌握发展规律的特点，这样才能掌握事物的活的规律知识，也就是掌握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这种活的理论。它任何时候也绝不能停止在某些已知的

要用特殊的规律补充普遍的规律知识，才能掌握活的理论

一般的原理、一般的规律知识上，它要求我们不断地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它要求我们生动地掌握一般规律知识在具体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它要求我们能独立地依据新的条件找出新的规律知识，来补充和发展已经获得的普遍规律知识。中国共产党，就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就是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来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的特点，并发现某些中国革命所特有的新的规律，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的理论（例如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理论）。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掌握了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就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获得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谈到规律，必须附带讲一讲因果规律。因果观念，是在一般人头脑中很普遍的思想。“凡事必有其原因”；“一定的原因，必定产生一定的结果”。这是一般人头脑中的因果观念。但是这种因果观念，常常是歪曲的、错误的，甚至于是属于迷信性质的。例如旧社会的“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人遭受苦难，是由于前生做了坏事，遭受神的惩罚；反之，生活幸福的人，是由于前生做了好事，因此得神灵好的报应。这种思想把一切事情的原因归之于神的力量，而使人不了解真正的原因。它不但是错误的、迷信的，而且是帮剥削阶级说好话，把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罪恶事实掩盖起来，把他们的腐化的奢侈的生活享受，看做是好人应得的好报，把被压迫人民的穷困生活，看作是活该受罪。这种思想里，当然没有丝毫因果规律的成分。我们说的因果规律的思想，是要承认事物发生的原因

一般人的因果观念常是歪曲，错误，甚至属于迷信性质的

因果规律是事物本身的规律

都可以在客观世界里去找，可以在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去找，用不着什么神灵的力量。有一定原因就产生一定的结果，这是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定的法律和规矩。这是谈到因果规律时首先要承认的基本思想。

普通人所指的事物发生的原因，往往不是重要的或真正的原因

虽然如此，但是一般人在应用因果规律知识的时候，常常还是会发生错误。当他们指出某一事物是另一事物的原因时，在实际上所指出的往往不是重要的原因，甚至于不是真正的原因。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有许多美国报纸把它归之于原子弹的力量，旧中国有许多受美国影响的言论机关，也是这样看。其实原子弹虽然对日本的战争力量也起了相当的影响，但并不是摧毁日本的战争力量并使它很快投降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乃是苏联的参加远东战争。因为苏联的大军迅速进入东北并粉碎了日本关东军，把日本帝国主义最主要的侵略据点和最重要的军事后备力量都摧毁了，这才使日本不能不立即投降。美国报纸的言论不过是替美帝国主义宣传而已，并不是真正说出了事物的原因。又例如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反美大示威。表面上看起来，前者好像就是后者的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日寇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一贯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国反动独裁政府一贯的卖国行为。强奸的事件，只是一个刺激的原因，也叫做“机因”。这种“机因”，本来只是一件较小的事情，单单它的本身，绝不可能引起那么大的群众怒潮。小事情之能成为大风暴的原因，乃是由于另外有了更深刻的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以为小事情就是重要的原因，那就反而把重要的原因掩蔽起来，便利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那是错误的。

有的人喜欢讲"惟一的原因"，以为一事物的发生，就只是由一个原因所决定，而用不着其他的原因，这也是一种错误，也是不合乎事实。例如苏联的参战，是促使日本立即投降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仍然不能说这是惟一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作用，和全世界各同盟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作用，对日本的投降都是很大的促进的力量。我们早已讲过，事物的发生，决定于许多条件，因此，如果以为所谓因果规律，就是指一种原因只能产生某一个结果，而不会产生另外的结果，那就不合事实，就一定错误。事实是同一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相反的，不同的原因，如果有各种适当条件的配合，却往往产生相同的结果。希特勒的侵略行为，在法国得到了胜利的结果，在苏联却完全失败，这就是因为法国处在反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之下，而苏联则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优越的条件。美军强奸女生引起了全国学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其直接的原因与"一二·九"学生运动不同，但结果却有同类的性质。因此，要正确地了解一件事物发生的意义，必须研究它的全部原因，也就是要研究它的各方面的条件，切不可把一两种条件，或不重要的事情看做惟一的原因。辩证法关于联系的规律，在事实上就包括了因果规律，而且是使旧的因果规律思想得到了更充实更完备的内容。

事物的发展是由于许多条件，不会只有"唯一的原因"

要研究事物发生的全部原因，也即是各方面的条件

内因和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发生作用。事物发展最后的决定作用在内因

事物的存在，有它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内部条件（即内部矛盾），也有外部的条件，因此就有内因和外因的分别。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长期沦为半殖民地，这种结果的外因，是世界上许多帝国主义竞争中国的市场，而内因则是中国的反动

统治者出卖国家利益，压制人民的民族斗争。如果中国没有反动统治者的卖国专制行为，让广大人民都能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那么帝国主义就不可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所以，外因是通过内因才发生作用。事情的结果，最后决定于内因，而不是最后决定于外因。法国之被希特勒打败和苏联之能打垮法西斯国家，也可以由内因的最后决定作用来给以说明。当我们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时，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自己的阵线巩固和壮大起来，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研究事物的外因和内因的关系时，我们所应得到的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二一、“在劫者难逃”

——偶然、必然与自由

这次想先讲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地方发生战争，老百姓都纷纷逃难。那时消息很不灵通，只听见传说兵灾要来了，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百姓都不清楚，因此逃难的人也不知道要逃到哪里才好。城里人只管逃到乡下去，乡下人只管向城里逃上来。逃来逃去，谁也不知道哪一块是真正安全的地方。结果是乡下固然遭到了军队的蹂躏，城也终于被攻破，全城人大多数都遭屠杀。事情过了以后，就听见一种传说，说在事变当时，有许多人跑到一个大寺庙里去祈求菩萨保佑，并且问寺庙的住持应该逃到哪里去才好？乡里还是城里？而那个住持的答复却很玄妙，他说：“城里也好逃，乡里也好逃，在劫者难逃。”

这种答复很滑头，它并没有给逃难的人指出任何一条生路，而是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那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逃到哪里都好，如果你逃在虎口里送了命，那是你命中注定要死的，你是在

劫者，谁也没有办法救你!”

但正因为是那样滑头，反而发挥了欺骗作用。如果负责地指出某条路是生路，而结果却死了人，那么，哪怕是偶然死了一个人，也会影响人们的信仰。现在这样不着边际的说一套，迷信的群众反而以为这真是神圣的大道理，平常的人莫测高深，除了服服帖帖的信仰“佛法”以外，是没有办法了。

这个故事，表示以传播宗教迷信为生的人，都有一套迷惑人的办法，他们能利用各种机会，把一种特别的思想打进老百姓的头脑里。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宿命论”的思想。它叫人相信一切都是神灵在暗中算定了，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所谓“在劫者”，就是指命定要遭受灾难的人，这种人要想避免或反抗灾难，都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活下去就行了。

宿命论主张人的命运为神灵操纵，这种命运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性质

我们现在不想专门讨论“宿命论”的问题，但宿命论的思想中包含着的见解，与我们这次讲的题目有些关系，所以先把它提一下。宿命论的思想，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发生，都是为命运所决定，这种为命运所决定了的一定要发生的事物，它的发生是无论如何不能避免的。宿命论者把这种不可避免的性质，归之于神灵在冥冥中的操纵力量。它是一种宗教迷信的思想，而宗教迷信的思想都是骗人的，与事实的真理并不符合。这是我们以前屡次讲到过的了。

但我们反对宗教迷信，并不是要把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一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性质也完全否认。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迷信神灵，并且认为神灵支配一切的思想，至于事物本身发展过程中所有着的某一方面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却是我们不能加以否认的事实。前

次我们讲过，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就会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而且是一定不移的要依循着这种规律发展变化，决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种“一定不移”的性质，也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性质，在哲学上又称做必然性。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必然要消灭，就是说它一定不移地要走向没落的过程；我们说全世界人民的民主运动必然要胜利，也就是说胜利的前途，是民主运动发展的一定不移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它一定不移的规律，都有按照这些规律发展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从神灵的意志来的呢？当然不是。希特勒演讲的时候，常常说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谁也没有看见什么上帝来帮助他成功。成功的恰恰是苏联，是反对上帝和不相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希特勒。

事物按规律变化，也有一种不可避免的性质，这种性质就叫做必然性

事物的必然性，是事物自己本身的性质。它不决定于什么神灵的意志，也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决定于它自己本身发展的情况和周围的条件。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些情况和条件，就可以断定它必然地会按照什么规律发展。

事物的必然性，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决不是出于什么神灵的意志

夏天空气里水蒸气多，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要下雨；北方冬天很冷，在一定时候必然要下雪。风调雨顺，又加上农人的勤于耕作，那庄稼必然长得好；久不下雨或下雨太多，人们又没有任何防范的准备，那就必然要成为旱灾或水灾。这些自然界的必然性，和社会现象的必然性一样，都是事物本身具备的性质，都决定于事物发展的情况和周围的一定条件，这是唯物论的必然性思想，这是客观事实的真理，与宿命论的荒谬神话是根本不同的。

偶然性是与必然性对立的范畴。有许多事情在事物发展中不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带偶然性的事物

与必然性对立的范畴，就是偶然性的范畴。我们把许多一定不移的事件，叫做必然的事情；相反的，有许多事情，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看起来并不是在过程中一定要发生或不可避免的，但在事实上却出现了，这种事件，我们就说它是偶然的事件。一个中国的女大学生，在某夜偶然被两个美国兵强奸，居然就引起了全国规模的反美示威运动。中国妇女被美兵强奸的事不少，惟独这一次引起了反美运动，而其他许多次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岂不是偶然？学生的爱国运动也有好多次，每次引起来的直接原因，都不一定是由于妇女被污辱，而这一次却恰恰是这样一件事成了引火的原因，这也是偶然。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士兵，没有被打死，后来居然成了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如果希特勒早被打死了，德国的法西斯反动组织是不是就可以不产生了呢？当然不会。如果没有希特勒，一定会在另外的头子之下产生法西斯组织。德国法西斯的头子恰恰是希特勒，这并不是一定非如此不可的事，所以这也是偶然。今年冬天下雪，恰恰是在某日某时，而去年冬天下雪，却又在另外的时间；夏天的冰雹，恰恰打坏了某家农人的庄稼，而别家的庄稼却丝毫也没有受灾，这些自然现象，也是偶然性的。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自然界以及社会的现象，我们可以找出无数偶然性的例子。我们思想中的偶然性这个范畴，就是反映这类不是一定非出现不可的偶然事件，它与那一定不移的必然事件，是有着一种恰恰相反的意义。

思想中的偶然性的范畴，就是反映发展中不是一定非出现不可的偶然事件

有一些人，主张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物，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照他们的意见，过去德国反动派中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

斯主义者的反苏战争之失败，固然是必然的，法西斯主义的头子恰恰是希特勒而不是别人，也是必然的；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要引起广大人民反抗，固然是必然的，某一女生被强奸成为人民的反美大示威的机因，也是必然的；我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固然是必然的，我昨天夜晚几点钟几分钟时候被跳蚤咬了一口，在我的一生中也是必然的。我们平常以为是偶然的事物，在这些人看来，都有它必然要发生的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主张呢？他们的理由是：无论什么事物，它的发生总有一定的原因，不但我们平常认为是必然的事物，有它发生的一定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偶然的事物，也有它的发生的原因。希特勒如果不与德国最反动的势力有相当的勾结，为什么能成为德国法西斯头子？某女生如果不是夜晚出去看戏，为什么会碰上美国兵而遭受污辱？我昨晚如果不是睡在床上，而是在街上走路，怎么会被跳蚤咬那一口？谁能说这些事情没有原因呢？既然要承认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那也就必须承认这是必然的，因此也就不能说世界上有任何偶然的事物。

机械论者主张世界上没有偶然性，认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因此都是必然的

有这种主张的人，在哲学上叫做机械论者。他们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发生，都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我们所说的偶然性，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主观上的错误思想。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许多事物称做偶然的，那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有偶然性，而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发生原因弄不清楚。所以，他们就说，偶然性的范畴，乃是由我们自己主观上的无知所产生，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个主观的范畴，而并没有反映着任何客观的事实，倘若我们能知道一切事物的原因，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偶然性可说了。

机械论者的思想，粗粗一看，好像也很有道理。一切事物都

是有原因的，因此都是必然的，这不是很对吗？但你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里很有毛病。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它所以会发生的原因，这是不错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会离开了唯物论的观点，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说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找不到来由，是神妙奇迹。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就和宗教迷信靠拢起来了。我们早已证明宗教迷信的荒谬，也证明了唯物论是真理，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的原因。但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原因，并不等于说应该断定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有必然性。这是因为：在事变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事件是不可避免地要贯彻和实现；而另外有些事件，却是可有可无，它的出现与否都不能够改变事变的根本过程，它可以多少影响事变的进程，或者给与多少的促进，或者给与多少的阻碍，或者使事变过程发生多少曲折，但它不能使事变根本转移方向。它本身的作用有时还会被其他许多复杂细微的相反的事件和倾向所抵消，而对于发展过程全然表现不出什么影响。女生被污辱的事件如果不在某夜发生，全国学生的反美爱国运动就不会在那些日子爆发，所以这一件事是对爱国反美运动起了某些促进的作用，但是即使没有这一次事件，爱国运动迟早仍要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女生被污辱事件，则是在爱国运动中可有可无的。在爱国运动中，这种不幸的“机因”是可以避免的，例如“五四”、“九·一八”以及“一二·九”的学生运动，就完全是由于另外的事件所触发。所以，事实很明白，有些事件在事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实现，它成为发展中的支配倾向，这种事件我们就叫做必然性的事件；有些事件不是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如此发生，它的出现也不能改变事变的根本过程，

有原因的事物，并不就等于必然性的事物

在发展中成为支配倾向的、一定要贯彻实现的事件，就是有必然性的事件

在过程中没有支配作用，我们就叫做偶然性的事件。不但必然的事物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偶然的事物也同样存在于客观世界里；不只必然性的范畴是客观事物的一种性质的反映，偶然性的范畴也同样是客观事物性质的反映。偶然性并不是我们主观上错误的认识，并不是由于我们对原因无知。我们即使完全知道了某些偶然事件的原因，仍然不能改变它在事变中的偶然的、不成为支配倾向的性质。机械论者是把必然性和偶然性混淆起来，或更正确些说，是把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同等的地位，那是不合乎客观事实的错误思想。

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支配倾向的事件，就是偶然性事件

有的人要说，偶然的事件，既然是有原因的，就某一方面来说，还是有它的必然性，因为有因必有果，也就是一种必然性。跳蚤饿了，恰恰跳到睡觉的人身上，一定要咬一口，这有它的必然性。这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被跳蚤咬一口，对我睡眠的过程不会起根本的改变，即使咬醒了，我仍然可以继续睡在床上，就我睡眠的过程来说，它总是不起支配作用的偶然事件。所以，偶然性就它所影响的必然过程来说，总归是偶然的，只就它自己产生的原因来说，才可以算是有着某种的必然性。因此，在哲学上，有时就把偶然性叫做“外在的必然性”。

同是由一定原因产生的事件，为什么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两种对立性质呢？这是由于原因本身有它们的区别。一般的来说，凡是对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经常地起着决定作用的条件，就是引起发展中的一种支配倾向的原因，就是形成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原因。美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大战后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反动政府的卖国媚外政策，全国人民

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条件，是产生必然性的原因；细微的、影响作用很小的条件，是产生偶然性的原因

在这种侵略行为和卖国政策下所遭受的苦难和所引起的忿恨，解放区军民的坚决有力的斗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一个时期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程中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以这些条件作为原因，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的爱国运动，就是必然的，任何人也不能加以阻止，并且不到胜利不会停息。一个女生一时高兴要在夜晚看戏，两个美国兵在同一时间喝醉了走到街头来，这些都只是一个地方一个时间和在个别人身上存在的细微的条件，而不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生活中经常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以这些细微的条件作为原因所产生的事件，就是偶然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一定要表现在这一件事上，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也不一定要由此事爆发出来。这里有量和质互相转变的规律，即原因本身的量的大小区别，就使它所产生的结果有必然或偶然的对立性质。

必然性一定要通过无数的偶然性

客观事物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在任何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经常都要遇到各种各样细微复杂的条件，对于发展过程形成无数的偶然影响。所以，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随时随地都和无数偶然的事件结合着，并且要通过这无数的偶然性而贯彻下去。爱国运动不但由女生事件偶然触发，爆发以后，又偶然由某一些学生首先带头领导，某些学生首先热烈响应，某校学生恰恰在某时开会或某时走出街头，某些市民偶然出门遇上队伍，偶然又由某个学生递给他一张传单，等等，示威运动就通过这无数的偶然事件而必然地发展下去。总之，在必然性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条件的结合，随时随

必然性转化为偶然性，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

地都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偶然性；这许许多多的偶然性，虽然不能成为发展中的支配的倾向，虽然它们互相抵消，但最后又都转化为必然性。就像无数的小溪汇合成长江大河一样，无数的偶然事件的总汇，就成

为必然事变的洪流。必然性向偶然性转化，偶然性又向必然性转化，两者密切地联系着，这就是事物发展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的统一。

不但只要认识事物的规律性，而且要把发展中的必然性从偶然性分别开来

我们认识事物，不单只要认识它的发展规律，不单只要认识正确的因果关系，我们还要把发展中的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分别开来。所谓认识必然性，就是要从无数纷乱复杂的偶然的摇摆倾向中，找出一定不移的发展方向。必然性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预测事变的前途，以便决定我们行动的方针，使我们有可能依赖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前进，而不致被偶然事件所迷乱、所动摇，或者甚至把暂时的偶然的事件误认为长久的方向，因此走了错路。在第二次大战后，美帝国主义者对世界实行扩张政策，对中国积极侵略，中国人民对这种侵略行动要起来进行强烈的反抗，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而女生被美兵污辱，乃是为这必然发展过程所贯穿着的偶然事件。我们认识了必然规律，就知道应该通过污辱女生事件来看穿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来看穿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而不应该孤立地单单只注意到这一件偶然事实的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承认，广大学生为此事而发动抗美运动，是完全合乎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发展条件的具有必然性的正确的行动。如果我们把女生被辱事件看做单纯的道德风化问题，以为可以简单用法律了结，那我们就是被偶然事件所迷惑、所蒙蔽，就不能得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反动派，就正是要想引我们这样做，因为如果广大人民都只注意法律问题，只关心法庭上的审判，而忘记了这是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那结果甚至于可以把爱国运动阻

认识必然，就不至于为偶然事件所迷惑

延下去，使它不会因这一事件而爆发起来。

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党派采用暗杀手段，马克思主义者则反对把这种手段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暗杀个人，只能在政治斗争中消灭一个偶然的因素，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在苏德战争以前，如果有人杀死了希特勒，是不是德国法西斯运动就会停止、反苏战争也不会爆发了呢？绝不会的！死了希特勒，定然还会有另外的人出来做头子，德国法西斯运动依然要发展下去。所以反对法西斯的正确道路不是暗杀法西斯头子而是建立广大人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便造成阻止法西斯运动生长的强有力的条件，只有这样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再例如 1936 年 12 月 12 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件偶然事变，中国共产党努力使这件事和平解决，饶了蒋介石的性命，是因为看清楚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种必然性，所以要它和平解决，以便民族统一战线能较快形成，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看不清楚这必然性，以为杀了蒋介石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做去，就会使西安事变得不到和平解决，那么，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时期将要推迟一些，中国人民将要多遭受一些内战与日寇侵略的双重痛苦。

因此，认识必然性，把发展中的必然倾向和偶然事件加以清楚的分别，对于我们的实际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认清楚了什么是发展中坚定不移的必然的倾向，我们对于自己在实际行动中所应走的道路才能有明确的认识，才不至于走上违反必然性的道路，或者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不走违反潮流的、一定要碰钉子的、灭亡的道路。用今天中国的例子来说，就是要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同时也才会按照这应走的道路方向，来正确决定我们行动的政策、办法、方针、计划，

以便比较正确地顺利地走上这条道路。第二，认清楚什么是发展中偶然的摇摆、偏差、曲折，甚至暂时的逆转，我们就不会因为碰到意外的困难、挫折或其他的变故，而在行动中发生动摇退缩的心情，甚至变节转向。第三，认清楚了一切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联系，认清楚必然性要通过无数的偶然性来贯彻它的方向，我们在行动中，就要不但不为偶然事变所迷惑，而且要学会正确对付一切偶然事变，利用各种“机因”，以促进必然性的发展（如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要善于引导偶然性的各种小溪，使它转移和汇合到必然性的洪流里去，使它加强而不是抵消必然性洪流的力量。

认识必然，就有了“自由”，就能够在行动上有自觉性，避免盲目乱撞

认识必然性，能够坚定地迅速地走正确的方向，不为偶然的变故所迷惑、动摇，并且能驾驭偶然事变，这就叫做在行动上有了“自觉性”，这就叫做有了“自由”。哲学上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说，“自由”就是能够在认识上行动上不为偶然性所左右，不至于盲目地随波逐流、摇摆不定，而能够主动地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是能够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分开，能够把偶然的事变引向必然的道路。如果不认识必然，看不清正确的方向和没有能力抗拒偶然性的迷惑和影响，这就叫做行动上的“盲目性”，这就要走错路、碰钉子，甚至于灭亡。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不自觉到自觉（或者称做由“自在”的阶段到“自为”的阶段），其主要的标帜，就是在这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能够认清楚社会之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并且产生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伍——共产党，这个先锋队伍就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这种必然性的认识作为指导行动的方针，并坚决、勇敢、有步骤、有计划地领导着工人阶级

及一切劳动人民为实现此方针而斗争；在中国则是领导着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进一步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革命领导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启发群众，使之在斗争中由盲目性进到自觉性，由不认识社会周围的必然规律到认识这些规律，并依循着这些规律的方向自觉地起来斗争。机械论者把偶然性和必然性混淆不分，就有引导我们走到盲目性和不自由的危险。因此，我们要反对机械论，不只因为它不合事实，并且也因为它在实际行动中是有危害性的。

二二、“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物，平常多半不注意去想，马马虎虎过去，便也不觉得什么。若注意去想，又往往会觉得，即使最简单的事物，也有令人惊奇的地方。譬如我们渴了要喝水，世界上也恰恰就有水给我们喝。为什么恰恰就有水喝呢？这不是很奇妙的事吗？老鼠伤害人的器物，恰恰就有猫生在世界上，可以替我们捉老鼠。为什么恰恰有猫呢？这不是太凑巧吗？老虎、豹子生来只会吃荤，没有活的动物的肉，就过不了活，恰恰就在它们身上生着锐利的爪牙，使它们便于捉到别的动物。鹿、马之类走兽，身上没有爪牙，容易受虎、豹的伤害，但恰恰又生了四只善于跳跑的腿，便于逃脱虎、豹追捕。虎、豹的爪牙和鹿、马的腿，用处虽然不同，然而恰恰能够适合它们生活的需要，不是也很凑巧的吗？为什么能生得这样巧呢？这不是很令人惊奇的现象吗？

惊奇尽管你惊奇，事实确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事实。如果仔细注意一下，就觉得世界上的事物似乎差不多都是这么凑巧的。于

是我们就进一步要求加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凑巧的事物呢？有一种人就会答复我们说："事物之所以这样凑巧，并不是偶然，乃是预先有了安排的。水本来就是安排好要给人喝的，猫是生来就为了要它来吃老鼠的，虎、豹的爪牙是安排好了来捉小动物的，……换一句话说，天生万物，原先本来就有一定的目的，一定事物产生出来，都是为了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水是为给人喝而存在的，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

事物的存在适合一定的目的，就叫做目的性

这个答复，是想叫我们相信：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并且它的一切构造，也都适合一定目的。事物适合一定目的，这种性质在哲学上叫做"目的性"。所谓"目的性"，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呢？自然是有的。目的性这一个范畴，的确反映了某些事实。水适合于解渴的目的，猫适合于捕鼠的目的，这些情形，我们都不能否认，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客观事物里有目的性这一回事。但我们要反对的是有一种人把这目的性的作用太夸大了。上面那一个答复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以为在世界上，目的性是支配一切的，一切事物，都是为着实现预先安排好了的目的才产生的。这种见解，叫做目的论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目的论的世界观，相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先有一个目的，那我们就不能不问：这样的目的，是谁来安排的呢？答案不外是："要能够管辖世界万物的全能全智者，才能够替世界的一切规定它们的目的"。这样的全能全智者，除了神灵以外，还有谁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向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投降，相信起神灵、相信起宿命论来了。这就是目的论的世界观里所包含的阴谋把戏。

目的论的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为着实现预先安排的目的

目的论的世界观既然以为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安

排了的，于是我们以前说什么“规律”呀，“因果”呀，都在排斥之列了。因为谈到“规律”和“因果”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事物是按照自己本身的规律而发生发展，事物是一定原因所产生的一定结果，事物除了它本身的规律和因果关系之外，绝不受外来的任何目的所规定。而目的论的世界观，却和这种思想恰恰相反，就是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被一种外面安排好了的目的所规定，而不一定要依照它自己本身的规律和因果关系。神灵的主宰高高在上，万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为了实现神灵的目的，只要能实现这目的，即使违反规律，出现神异的奇迹，也是完全可能的了。所以，目的论的世界观，和主张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性的唯物论，是不能相容的。

目的论的世界观否认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是一种接近宗教迷信的思想

我们主张唯物论，认为事物有自己的规律，认为这才是真理；而目的论的世界观，则是违背了事实真理。因为从我们人类长久的经验以及科学的研究，都可以证明，除了荒诞的神话之外，世界上绝没有什么神异的奇迹，而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都有它一定的产生的客观原因。不错，前面也说过，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某些事物的确有一种目的性。但是这些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规律性的产物，还是有它的因果基础。例如水适合给人解渴的目的，这固然是事实，但这事实的存在，乃是由于人的身体的生长和维持，需要不断地补充水分，而因为人的身体有这样的规律，所以水才适合人喝的需要。这种目的性，完全可以用规律性来解释清楚的。所以，如果现在有人用目的论的世界观来加以解释，说水是造物主或神灵特别安排来给人喝的，那么，只要稍微有一点合理的常识的人，就都会立即起来反驳，指出这是荒

客观事物的目的性，归根结底都是规律性的产物

谬的神话。

当然，喝水的例子是太简单了，目的论者要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主张，是很容易被我们驳倒的。但是，如果目的论者用更复杂的例子来进行宣传，那要驳倒他们，就比较要费一些力了。例如就虎、豹的爪牙来说吧，目的论者在这里就可以振振有词了。他们说："虎、豹的爪牙，恰恰适合捕捉小动物的目的，这种目的性，难道也能用'因果'和'规律'来解释吗？如果说爪牙不是虎、豹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而是在生后依一定规律或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那么，为什么一切虎、豹的身上恰恰都长起爪牙来，而绝不长出牛角或马蹄来呢？为什么周围的复杂原因对于这样凑巧的现象竟不能加以动摇呢？对于这样凑巧的现象，你如果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你就驳不倒目的论的世界观，你就不能不承认爪牙之类，都是在虎、豹生前神灵为它们安排好了的，都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产生的东西。"

这一个难题，在一两百年以前，本来是比较难解答的。但是，幸而后来科学发展了，在英国出了一个生物科学家，名字叫做达尔文。他发现了世界上生物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不但可以说明为什么虎、豹身上恰恰生出爪牙，并且可以说明为什么一切生物的生活现象，都有某种目的性，为什么它们的身体构造，恰恰适合于生存需要的目的。这个规律，就是关于生物进化的规律。它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现在的一切生物，都是过去多少万年进化的结果。生物的本身，和它的环境分不开，它从周围环境取得自己维持生存的资料。周围环境的情况，又影响它的本身，使它不断发生变化。在过去长久年月中，生物的环境不断变化着，生物本身也与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着而不断地变化，并由此产生了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生物种类，其中有些种类，由于自己的机体构

造变化得比较适合环境条件，容易取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有的种类，因为本身机体的变化不适合于变化了的环境条件，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或先或后都灭亡了，只有那些机体构造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种族，才继续发展到现在。不能适应环境条件的生物就被消灭，这叫做“自然淘汰”，能够适应环境条件的就能保持存在，这叫做“适者生存”，这就是达尔文发现的进化规律，也叫做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有了这个进化论的学说，我们就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虎、豹恰恰生着爪牙，为什么现在的一切生物的构造，都恰恰能适合它自己生存需要的目的？原来这并不是什么神灵预先安排下的，原来这是过去长久时期生物进化规律的产物，是因为机体构造不适合生存的生物，都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的结果。所以，照进化论的学说，一切生物构造的目的性，都不是神灵预先的安排，都可以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因果关系来说明，这是毫无疑义的了。

生物构造的目的性，是生物进化规律的产物

不论无生物（如水），或有生物（如虎、豹），它们的目的性都是由一定的规律所产生，都是一定原因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客观世界并不是依预定的目的而存在，目的论的世界观是不能成立的。然而，目的论者似乎还有一个最后的退路。他们会说：“无生物界和生物界，都依从你们的意见罢。但我们的目的性，还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大本营，不受一切因果关系和规律性的支配。这个大本营就是人类。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先有目的的。一个人，不论一举一动，总预先会想到一个或大或小的目的，毫无目的的举动，在人类是不会有的。如果有，那除非是疯子，或者是在梦游状态中。例如解放区的人民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解放战争，参加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不是每一个人，都看清了自己的

目的，才会来参加的吗？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专制独裁，不是每一个人都看清了目的么？反动派的宣传者常常污蔑爱国民主运动，说这是受'别有用心者'的挑拨，说这是'盲从'的'无意识'的举动，也即是说这是没有目的的举动。试问每一个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同胞，你们听到了这种话，能够不认为是污蔑，能够不愤怒地起来反对吗？当然，你们一定要起来反对，因为你们对于自己的行动，是能够负责的，你们是知道自己的行动的目的的。由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人类的生活行为，是决定于一定的预定目的。我心中的目的是怎样，我就怎样做。我是自由自在，不受什么因果规律的支配或束缚的?!"

这一套理由，自然说得有几分道理。但社会科学又告诉我们，这一套理由是不充分的。正如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帮助我们反驳了生物中的目的论一样，社会科学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帮助我们反对人类社会的目的论。按照社会科学的理论，我们反驳上面的说法。我们说，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

人类行为的目的性，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

但是，我们要问，人类的目的又是哪儿来的呢？是神灵帮助决定的吗？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吗？抑或是仍然有其他物质原因决定的呢？为什么有的人有这种目的，而有的人又只能有那一种目的？为什么广大人民都以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为奋斗的目的，而决不会以拥护卖国独裁政府为目的？为什么反动派却相反，一定要以维持卖国独裁政府为目的，而决不以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为目的？这些目的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凭空来的，更不是神灵在冥冥中决定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目的，是决定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于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有阶级的

人的目的决定于他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就决定于他的阶级利益

社会里，人的目的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不同的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就有不同的行动目的。反动派是属于帝国主义走狗的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少数一群人，他们是靠着残酷的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来维持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少数者的孤立的地位，使他们害怕民主，而要求专制统治，使他们要依靠帝国主义者，来压迫中国人民。以工农为主的广大的人民的地位却相反，他们身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因此他们奋斗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不是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是大的例子，如果缩小一点，就个人的普通生活目的来说，也是一样。人在吃饭之先，先在心目中有一个要吃饭的目的，这目的一方面决定于生理的原因，就是肚子饿的刺激。另一方面，同是吃饭的目的，穷人和富人又有不同，穷人只要求清汤淡饭，乞丐则只要求残汤剩饭，富人却要求珍馐美味。这种目的性的不同，表面上似乎是各人自由自在地想起来的，实际上则是不同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规定的。

我们说人类的目的决定于一定的阶级利益，这并不是说人绝对没有选择目的的能力。有些人出身是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社会或家庭，但他们走向了民主的道路。这种事实，是不是推翻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套道理了呢？当然不是。因为，第一，这种情形，在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人说来，是个别的、极少数的，整个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一般的都不会超越自己阶级的利益，而选择真正民主的道路，他们只能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采取坚决反民主的道路。第二，这种少数人乃是脱离了他们本阶级立场的分子，他们之所以能够那样选择，也有它的原因。首先这是表示他们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些少数分子，或者是与他的阶级

中最得势的集团有了利害的冲突以至于受到排斥压迫，或者是由于他们受到了广大人民斗争的影响，认识到了走专制主义的道路必然要失败，而民主的势力必然要得到胜利，所以他就选择了民主的道路。人类能选择自己的目的，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目的性是无缘无故“心血来潮”任意决定的。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种正确的目的而不选择另一种不正确的目的，乃是因为他的思想反映了真实的客观必然规律，归根结底，仍可以找出一定的规律和原因来。

人类有选择自己的目的的能力，但这种选择，仍有一定的规律和原因

我们驳倒了目的论的世界观，说明人类生活的目的本身也有一定的原因，它在最后也还是表现着某种因果性和规律性，这样说是不是又变成宿命论，认为人的主观努力没有丝毫作用了呢?喜欢追究问题的读者们是一定要发生这样的疑问的。但是细心的读者，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就自己可以得到解答：即我们反对目的论，并不就等于主张宿命论。宿命论是说人类本身没有丝毫的自由，一切都是生前决定了，但我们却已经说过，人类对于自己的目的，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怎样能够有选择的自由呢？这里就用得着前面说过的“自由是必然性的认识”的道理。如果我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丝毫认识，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完全被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决定，我们就只能盲目地跟着一个决定了的目的走。反之，如果我们能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例如说我们能深深了解民主的道路必然要胜利，专制独裁的道路必然要失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实现，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专制和民主两个目的之中进行选择，我们就能够避免盲目性，自觉地走上必然胜利的道路，而离开必然失败的道路，就能够坚决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

唯物论反对目的论，但决不是宿命论

主义而奋斗。

因此，我们的目的是否正确，决定于我们是否能正确认识事变发展规律。被压迫阶级是否觉悟，也与他们对周围事变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有关，与他们所选择的目的是否正确有关。农民如果不认识地主是依靠剥削农民为生，反而以为自己是依靠地主生活，就不可能选择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反封建为目的，这就是不觉悟的农民的基本思想情况。无产阶级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的时候，虽然也对资产阶级斗争，然而斗争的目的是很模糊的，或者采取破坏机器的方法，或者只为某些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绝不会明白知道还有一个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的。有些贵族工人甚至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跟着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领袖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指导，能够认清楚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因此也就能领导无产阶级为着历史所赋予自己阶级的任务和目的——经过各种斗争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无产阶级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指导，就由不自觉的阶级变为自觉的阶级，或者说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所以，即使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如果不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不自觉或不觉悟的阶级，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目的，甚至于他的目的会违反本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使不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当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到必须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在一起来反对反革命的势力，并以这些认识来正确决定自己的目的，坚决英勇的为实现这目的而斗争，那么，他的行为就能够和被剥削被压迫的革命阶级的利益一致，就成为革命

阶级的一员。因此，在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各种重大行动中，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这样的教育，是为了要以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知识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提高革命队伍的觉悟，使得人人在行动中都能掌握正确的目的。

人的目的能否实现，要看这目的是否合乎社会发展规律

我们的目的，只是我们主观的希望，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并不就是事实。有了目的，不一定就能实现。目的能否实现，首先要看你的目的是否合乎社会发展和周围事变发展的规律。如果你的目的是违背了社会发展和周围事变发展的规律，例如说你要想学袁世凯做皇帝，要想像蒋介石那样把专制独裁制度永久维持下去，那么，你这种目的就只能永远是主观的妄想。当然，专制独裁主义者们绝不肯承认自己的目的是妄想，他们总以为它是有实现之可能的。但在事实上，这种目的决没有变为事实的可能性，因为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已不是一百年前封建的中国和世界，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里，已没有重新建立一个专制帝国的条件了。

现在我们已讲到另一个哲学范畴——可能性的问题上来了。什么是可能性呢？一种事物的出现，在客观世界里已具备一定的物质因素，但还需要一定条件，它的出现才会实现，才会成为必然的事实，而在另外的情形下就不会成为事实，或被另外的事实所代替，这就是可能性。简单点说，可能性就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出来，能够成为事实的这种性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得到完全胜利，而且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趋向在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里已具备着它的必要的因素，但要使这种趋向成为必然的事实，需要创设一些条件，例如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社会

事物的出现，只在一定条件下才会成为事实，这就是可能性

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又如经过革命达到这胜利的道路,有种种可能的情况,或者会很快胜利,或者会要拖延得很迟,或者比较顺利比较很少痛苦的得到胜利,或者在中途要遭受一定时期的严重挫折,付出很大的牺牲代价。这种种情况的实现的因素,在革命运动中都是包含着的。其中无论哪一种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之下出现,而且种种情况之中必有一种出现。所谓一定的条件是指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广大人民民主势力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情形。如果广大人民民主势力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策略,不失去一切有利的时机,那么胜利就会比较快,比较少些痛苦;如果在斗争中犯了错误,那么胜利就会拖延,就会遭受损失或一时的失败。总之,在斗争的过程中,这种种可能必有一种成为事实,但无论哪一种都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现实,成为必然的事实。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是指那能够成为事实的东西,它们虽不是立即要成为必然的事实,但只要实际上有一定的条件出现,就可以成为必然的事实,这样的可能性,叫做"实在的可能性"。还有一种人们所谓的可能性,是根本不能成为事实,而只是在人的主观上觉得可能。例如前面说过,反动派妄想专制独裁制度可能永久维持下去,这种所谓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客观事实的根据,而只是反动派的主观妄想。这是把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这就不是"实在的可能性",而可以叫做"抽象的可能性"。如果有人设想可以不经过任何斗争和挫折,太平无事的得到革命的胜利,这种想法,也是抽象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是脱离事实的无益的空想。这种无益的空想,是从事革命运动的人必须要避免的,万万不可使它成为我

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叫做"实在的可能性"

根本不能成为事实,只在人的主观上以为可能的,叫做"抽象的可能性"

们指导行动的思想。

可能性转向事实，并在发展中成为必然的东西时，就叫做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可能性并不是必然存在的事实，抽象的可能性根本不能成为事实，但实在的可能性，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就会转变为必然存在的事实。当一种可能性已转化为事实，并且在发展中成为巩固的、必然的东西时，我们就说这种可能性是实现了，或者说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了。在广大人民努力斗争的情形下，革命任务完成的时间的确在事实上加速了，反动派要想动摇这种事实以延迟革命胜利的一切企图都被粉碎了，那么，革命胜利的时间之缩短就成为现实性了。现实性这一个范畴，是指那个不仅仅在事实上存在，而且在事变发展中成为巩固的必然的东西。如果在事实上虽然存在，而在发展中并不巩固，例如袁世凯宣布做皇帝，国民党反动派开了“国大”、伪造了“宪法”，这些虽然也是事实，但并不是现实性，因为它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就像水中的泡沫一样容易消散。

事实上虽然存在，但不是发展中巩固的、必然的东西，这就不能算是现实性

事物发展中的对立势力之斗争，使它有种种的可能性

事物发展中为什么会有种种可能性？这是由于发展过程是矛盾的，是在对立势力的斗争中开展的，而对立势力的斗争，又联系着各种复杂的条件。斗争的结果是必然的，即新生的东西一定最后胜利，而腐朽的东西一定最后失败，这一点是一定不移的、必然的。但由于条件的复杂，斗争的情况和发展的情况就有种种变化的可能性。对新生的东西有利的条件愈多，它的胜利就愈快，如果这种条件愈少，而困难条件增多，它的胜利就要拖延。而各种条件中间，人的主观努力也可以创设出最重要的条件。更多的主观努力，更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发展的规律和更正确的政策掌握，

一种可能性能否实现，决定于各种条件，而人的主观努力就是一个重要条件

更广大的群众觉悟和团结起来参加斗争，更适当的斗争形式的选择，都可以成为加速胜利的可能性的实现条件。如果有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我们又能紧紧的抓着这些条件，加强人的主观努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斗争，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加速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如果有了有利条件，而我们却不能抓紧时机，进行正确的革命指导，那么有利条件就不能发挥作用，结果成为现实性的，就不是革命的加速胜利，而是革命胜利时间的拖延和苦痛的加重。

由此可见，辩证法唯物论并不是宿命论，虽然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但并不是说人的努力毫无作用，一切都是命定。相反的，人的努力可以在革命发展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人的正确的努力，可以争取一切有利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而避免严重挫折的可能性之成为事实。革命指导者的任务，就是要能够认识事变发展的规律，估计发展中的各种可能性，对最坏的可能性作出充分的估计，以便准备好足够的条件来克服这最坏的可能性，而使有利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以便避免革命过程中可以避免的损失，减少斗争中的痛苦和时间上的不必要的拖延。总之，以充分的准备来对付最坏的可能性，以便有余力来随时克服一切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是促成有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我们要重复说一遍以前说过的话：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用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依据着这个思想武器指导下所获得的正确的知识，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胜利地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变世界、改造中国的斗争。我

们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就是要用它来引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发展规律，确定中国革命应该走的道路和各种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起来进行斗争，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只要我们正确地为此目的而努力，那么这些可能性是一定可以变为现实性的！

附录：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

(1938、1951 译)

一、马克思给安能科夫

——1846 年 12 月 28 日于布鲁塞尔

如果不因为那书店老板迟延到前星期才把蒲鲁东的书《贫困的哲学》送给我，你也许早就会接到我对于你 11 月 1 日来信的答复了。我用两天工夫把它浏览了一遍，才能够在现在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因为我是匆促地读完了这本书，所以我不能留意到细节上。我只能讲些关于它所给予我的一般的印象。如果愿意的

* 艾思奇于 1938 年开始译此书，那时系从 1934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国工人出版社新出德文本《马克思选集》中译出的，只包括九封信，删略较多。1951 年译本，是根据 1949 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俄文版译出的；原有九封信仍包括在内，但作了增补和修订，其他十二封信都是新译的。人民出版社 1951 年 7 月出第 1 版，1956 年 4 月出第 3 版。现根据第 3 版排印。艾思奇曾按照他自己的译本，给中央党校学员作过系统讲解。所以，我们作为附录收入本卷。

话，我可以在以后的信中更详细地写到它。

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书总的说来是不好的，是很不好的。你的信里也嘲笑蒲鲁东在这部很不像样而又自命不凡的著作里所标榜的“一点儿德国哲学”，但你认为哲学的毒素并没有浸入到他的经济研究方面。我也并不想把蒲鲁东的哲学看做是他的经济研究错误的原因。蒲鲁东并不是因为作为可笑的哲学的所有者，才给予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上的虚假的批判，他之所以把可笑的哲学供给我们，是因为他不了解现代社会制度的锁链（engrènement），如果使用蒲鲁东以及其他许多人由傅立叶那里借用来的词汇的话。

为什么蒲鲁东要讲到神，讲到普遍的理性，讲到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说它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错误的，说它总是和自己本身相等的，说人们必须对它获得正确的表象，才能够掌握真理？何以他要依靠浅薄地摄取了的黑格尔哲学，来把自己描写成深刻的思想家？

他自己就提供给我们揭破谜语的关键。蒲鲁东在历史中看见社会进化的某种序列。他看出历史是进步的实现。总之，他看出作为单独的个体的人们，没有理解到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是错误地设想了自己本身的运动，这就是说，一眼看去，他们的社会发展似乎是超越于、独立于、不依赖于他们的个人发展的东西。他没有能力来解释这个事实，于是在这里就出现关于自己显现着的普遍理性的臆说。再没有比发明神秘的理由，也就是发明缺乏正确意义的空话这件事更容易的了。

蒲鲁东先生不是正因为承认自己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完全无知——当他从普遍理性、神等等大吹大擂的名词里去找依靠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理解经济的发展吗？

什么是社会？不管它属于哪种形式，是人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社会形式吗？绝不能。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种相应的交换和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消费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形式，就会有一定的家庭组织、阶级状况，一句话，就会有一种相应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就会有一种相应的政治状态，而这政治状态正是公民社会之正式的表现。这一切，都是蒲鲁东先生不会了解的，因为他以为，只要从国家转向公民社会去求诉，也就是从社会之正式的总结转向正式的社会去求诉，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

还必须要再附加一点：人们对于自己的生产力——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并不是能自由选择的，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已经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的活动的产物。固然，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但这能力本身却决定于人类所处的情况：即由以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和在他们之前已经存在（不是他们所创造的，而是过去世代的生产物）的社会形式所形成的情况。任何后来的世代都是靠着先前的世代所获得的生产力（它对于前者是作为新的生产的原料）而存在的，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在人类历史中间构成了一种联系，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这历史，当着人们的生产力愈更发展了时,从而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愈更发展了时,就愈更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得出必然的结论：人类的社会史，常常只是他们的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对于这点是否意识得到。他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了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物质的关系,只是他们的物质的、个人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的形式。

蒲鲁东先生把观念和事物混淆了。人类绝不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也不放弃那他们借以获得某些生产

力的社会形式。完全相反，为着要使争取得的成果不至于丧失，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实，人类在他们的交换方法不能再和既已获得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瞬间，就不能不改变他们的传统的社会形式——我这里所说的“交换”是指最广义的用法，就等于德文里的“往来”（Verkehr）的意思。举例来说，譬如特权，行会和社团的制度，中世纪的法规等，都是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仅只是适应于既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以前存在过的曾使这些制度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的。在这些社团和法规的庇护之下，资本就积蓄起来，海上贸易发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来，而人们如果还要想保守着那使这些果实在其庇护之下成熟起来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连这些果实也要失去。由此才发生了两次暴动，即1640和1688年的两次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旧公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即政治的状态等，在英国都被打碎了。这样，人类实行生产、消费、交换等所依据的经济形式，都是**过渡的**、**历史的**。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就改变一切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仅只是这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

这些都是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尤其是很少论证到的。由于没有注意到历史的现实过程，蒲鲁东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一些幻影来作为补充，而这幻影是力图要成为辩证法的幻影。他不觉得有必要来讲一讲17、18和19世纪的事，因为他的历史是出现在想像的九霄云雾之上，并且是高高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限界之外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派的废物；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们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按照他的观点，人类只是被观念或永久的理性利用来使自己发展的工具。**进化**，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那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天国里实现着的进化。

如果你揭去了这神秘词句的掩盖，你就会看见蒲鲁东先生是在向你叙述着那种秩序，那里面的经济的范畴都是在头脑中安排成的。用不着很大费力就能证明，这是最糊涂的头脑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一开始就讨论到他所爱好的玩艺，即价值。对于这一部分作品，我现在不打算加以分析。

永久理性的经济进化的系列，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对于蒲鲁东先生，劳动分工是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一定的样式吗？难道行会制度不能算是劳动分工的另外的样式吗？又，难道在英国由 17 世纪中叶开始而到 18 世纪末叶完结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劳动分工，不是绝对地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的劳动分工吗？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善于了解事情的本质，以至于竟会忽略掉连普通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忘记的事情。讲到劳动分工时，他全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谈一谈世界市场。难道说 14 和 15 世纪，当殖民地还不存在，当欧洲还不知道有美洲，而和东亚的交往仅只能依赖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时的劳动分工不是应该根本地区别于已经有了殖民地的充分发展的 17 世纪的劳动分工吗？

但还不止此。难道说各民族的一切内部组织，它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是劳动分工的一定样式的表现吗？难道说这一切不会要随着劳动分工的变化而变化的吗？

蒲鲁东先生是那样不能够理解劳动分工的问题，以至于连城市和乡村的分化也没有提到，这分化，以德国为例，是从 9 世纪到 12 世纪之间产生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分化是永久的，不变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它的产生，也不知道它的发展。他在自己的全部著作里是这样地论述着，好像这一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产物，是会要永久地继续存在下去似的。蒲鲁东先生关于劳动分

工所讲到的一切，都不外是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他以前已经讲过的东西的概括，而且还是非常肤浅的，不完全的概括。

永久理性的第二步进化，是机器。劳动分工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被蒲鲁东先生讲得非常神秘。劳动分工的每一种样式，都有过自己的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就不是完全用手工作，他们有许多器械，而且还有极复杂的，如像车床、船只、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出现一般地看作劳动分工的结果，是非常荒谬的。

顺便指出，蒲鲁东先生对于机器发展的历史之缺乏了解正像对于它的产生的历史一样。应该说，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要一般地是比生产的发展快，而机器的发展，则是市场要求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仅只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战斗的结果。但这只对英国来说才是正确的；至于说到欧洲各民族，那么，他们之被迫应用机器，乃是因为不论在他们本身内部的市场上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了英国的竞争的缘故。最后，在北美洲，不但由于对别的民族的竞争，也由于劳动人手的不足，即由于北美洲的工业需要和它的人口之间的不相称，唤起了机器的采用。根据这些事实，你就可以断定，当蒲鲁东先生把竞争的怪影当作第三步进化，当作机器的反命题召唤出来时，是表现了怎样的一种识见。

最后，把机器看成与劳动分工、竞争、信用等等相并列的经济范畴，一般地说也是荒谬的。

机器不能算作经济范畴，正如拉耕犁的牡牛一样，现代的机器应用，是我们现代经济制度的一种关系，但机器的利用方式并不等于就是机器本身。火药总是火药，不管它的使用是为着要引

起人类的伤害，或者是为着要治疗人类的伤害。

蒲鲁东先生做了空前的努力，来把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制等按照我这里所列举的秩序，从自己的头脑中构想出来。几乎所有的信用制度，在英国，在18世纪初期，在机器还未发明以前，就已获得了自己的发展。国家信用仅只是使税收得到提高和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造成的新的需要获得满足的新的方法。最后，所有制在蒲鲁东的体系里构成末尾的范畴。在现实的世界里却相反，劳动分工以及蒲鲁东先生的一切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它们在总体上构成现在时候人们称做所有制的东西；离开了这些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就不外只是形而上学的和法律的幻想。另外时期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是在全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的。由于断定所有制是孤立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就做出了某些比方法论的错误更坏的事情：他暴露自己不懂得把一切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统一起来的那些联系，他暴露自己不懂得一定时期的生产形式具有着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由于没有看见我们的社会的建制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由于不能理解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发展，蒲鲁东先生对于它们就只能给予教条主义的批判。

当要说明发展时，蒲鲁东先生就不得不依靠虚构。依他的想法，劳动分工、信用、机器等等的发明，都是为着给他那麻烦的观念——平等观念服务的。他的解释是极端的幼稚。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平等的名义之下构想出来，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是趋向于反对平等的。他的全部议论都处在这种情况中，这就是说，他采取随意的臆测，但是，由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步都和他的虚构相抵触，他就由此做出结论，说矛盾存在着。同时他却掩盖了这一点：即矛盾仅只存在于他那麻烦的观念和现实的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首先是由于没有历史知识，因此就不了解，人们是在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时候，也即是在生活的时候，就发展着一定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不可免地要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造和发展而发生变化。他不了解，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并且只在这些关系存在着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就陷落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错误当中，他们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是永久的，而不是历史的规律——这规律，仅只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是现实的。因此，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做现实的、过渡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之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着问题，把现实的关系看做仅只是这些抽象的东西的体现。而这些抽象的东西，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已睡眠在上帝的胸怀里的一些公式。

这里，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就开始陷于严重的智力上的困境。倘若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神的心胸里的流出物，倘若它们都是人们的隐秘的和永久的生命，那为什么，第一，发展会存在着，第二，蒲鲁东先生会不是保守主义者？对于这明显的矛盾，他是用对抗的全部体系来作为说明的。

试举例来解释这个对抗的体系。

垄断好，因为这是经济范畴，也就是神的流出物。竞争好，因为它同样也是经济范畴。至于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那却是不好的。尤其因为垄断和竞争彼此要互相吞没的，就更不好。怎样办呢？蒲鲁东先生以为，这两种永久的神的思想既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显然地在神的胸怀里也同样会具有着双方思想的综合，在这里，垄断的坏处由于竞争而得到均衡，相反地也是一样。观念双方之间的斗争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即只有它们的好的方面向着外部显露出来。神必须培养这些隐秘的思想，然后应用它们，而

一切就会美满了。必须去发现那隐藏在与个人无关的人类理性的混沌中间的综合的公式。蒲鲁东先生是一分钟也不动摇地以发现这个秘密的资格自任。

但是，请把视线略微投到现实生活上去吧。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你不仅仅会找到竞争和垄断，也同样会找到它们的综合，不是表现为公式，而是表现为运动。垄断生出竞争，竞争生出垄断。然而，这种均衡化的结果是造成愈更困难和愈更混乱的局面，而不是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的那样会排除现代局面的困难。这样，如果把现代经济关系所从属的基础加以改变，把现代的生产方式加以消灭，你就会不只是消灭掉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也会消灭掉它们的综合——竞争与垄断的现实的均衡化所由以产生出来的运动。

这里我给你举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范例。

自由和奴役表现为对抗。我不需要讲到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役，它的坏处也用不着提及。只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就是奴役的好的方面。问题不在于间接的奴役，不在于无产阶级的奴役。问题是在于直接的奴役，在于苏立南、巴西、北美南部诸州等地的黑种人的奴役。

直接的奴役之成为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是正如机器信用等等一样。没有奴役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役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创造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是巨大的机器工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黑人贸易没有建立以前，殖民地给“旧大陆”的产品是很少的，并且也没有使世界面貌发生什么显著的改变。这样，奴役——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经济范畴。没有奴役，北美洲——最进步的国家——也许会变成家长制的国度。只要把北美洲从世界地图上除去，你就会看到贸易和现代文

明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完全的衰落。而奴役的消灭，就可以看做是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这样，正由于奴役是经济的范畴，所以它是自从开天辟地就会为一切民族所遇到。现代的人民只能在自己中间掩盖着奴役，但在“新大陆”又使它暴露出来了。蒲鲁东先生的关于奴役的这些想法究竟是为着什么呢？他是要寻找自由和奴役的综合，寻找真正的黄金般的中心，换句话说——寻找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均衡。

蒲鲁东先生很能了解人类制造毛呢、麻布和丝织物这些事；而了解这样一些微末的事情，并不算是很大的劳绩。但蒲鲁东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类还能适应着自己的生产力来生产出他们在其中制造呢料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更了解不到的是，人们不但生产着与他们的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且还会创造出观念、范畴，也就是创造出这一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因此，范畴也和它所表现的关系同样，不是永久的，它是历史的和过渡的产物。蒲鲁东先生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范畴看成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创造历史的就是它们，而不是人类。抽象、范畴，只就它自身来看时，也就是，把它从人类和人类的物质行动分离开来看时，自然是不死的、不变化的、不运动的，它本身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这不外等于说，抽象这东西就是抽象的。多好看的同语反复！

于是，在范畴的形式上所看到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也成了永久的公式，它既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

用另外的话来讲：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直接肯定，说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他看来是永久的真理，他是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因为他把在思想的形式上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加以神化。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思想的、范畴的形式上呈现到他前面来时，他

就把它当作自发地生出来的、天赋着独自的生命的、永久的本质。因此，他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线。因为他是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立论，并把它们当作永久的真理，他就要寻找这些思想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均衡，却看不见它们保持均衡的现代的方式，正是惟一可能的方式。

事实上，一切良善的资产者们所做的，他都做了。他们都告诉你们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也就是作为抽象的概念来看，是生活的惟一基础，但在实际上，他们却还希望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希望竞争不要有竞争的悲惨结果。他们都希望着不可能的事，也就是希望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不要具有这些条件的必然的结果，他们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形式，就像封建的形式是过渡的一样。这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以为资产阶级人类是一切社会的惟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设想不到那样的社会制度，在里面人会不再是资产者。

因此，蒲鲁东先生必然地是**教条主义者**。他把那引起现代世界的变革的历史运动，归结为要在两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中间去找到适当的均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位灵敏的青年就用技巧来发现隐秘的神的思想，发现两个孤立的思想的统一，其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蒲鲁东先生使它们从实际生活孤立起来，使它们脱离了它们所表现的现实性的结合，即现代的生产的缘故。蒲鲁东先生用自己的头脑的荒诞的运动，来代替那人类已获得的生产力和不能再适应于这生产力的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伟大的历史运动，来代替那在一国的许多阶级中间以及在许多的国家中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来代替那惟一能够解决这些纠葛的、实际的、强有力的、群众的行动，来代替这一广泛的、长期的而又复杂的运动。这样一来，有学问的人，能够知道神的隐秘的思想

的人们，就创造着历史，而普通的人民只要在实践中承受他们的启示就行了。这样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是一切政治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现代的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并不是通过社会的行动，而是通过他头脑中所进行的辩证法的转动。在他看来，范畴即是推动力，因此就用不着靠改变实际生活来改变范畴。完全相反，应该先改变范畴，然后作为结果，就发生现实生活的改变。

由于热望着调和矛盾，蒲鲁东先生就根本不问一问，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加以推翻。他和那些想把国王、众议院和上议院都看作社会生活的不可少的部分，看作永久的范畴的政治教条主义者完全一模一样。他只想去寻找新的公式来使这些势力得到均衡，其实它们的均衡恰恰是在它们的现代的运动里，在这些势力之一或者成为另一势力的胜利者，或者成为奴隶的运动里。像这样，在18世纪就有过很多平庸的头脑努力想寻找真正的形式来使社会的诸阶层，即贵族、国王、国会等等得到均衡，而到后来，不论国王、国会或贵族都没有了。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之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覆没，一切构成封建存在中对抗势力之基础的社会关系之覆没，就是这些对抗势力的真正的均衡。

因为蒲鲁东先生把永久的观念，纯粹理性的范畴摆在一个方面，而把人类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在他看来，这只是那范畴的应用）摆在另一个方面，因此你在他那里一开始就遇到关于生活和观念，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种种的形式里反复出现的二元论。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抗，只不过是表示蒲鲁东先生对于他所神化了的范畴的平凡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没有能力来加以理解罢了。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我已不能再涉及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

的那些可笑的责难。请你暂且同意我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情况不了解的人，是更没有能力来理解那为破坏这个社会而进行的运动，以及这个革命运动的文献表现的。

我对蒲鲁东先生完全同意的惟一的一点，——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所表示的反感。在他以前，我已经因为嘲笑了卑屈的、温情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我的敌意。但蒲鲁东先生只能算是为自己造成了一些奇怪的错觉，因为他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幻想——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关于夫妇爱的夸夸其谈以及他的一切庸俗议论——来和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相对立，而后者，例如就傅立叶来说，是比我们良善的蒲鲁东先生的骄傲自大的鄙俗见解更为深刻得多的。由于他自己也很感觉到自己的论据的完全空虚，自己谈论这一切事情的十足无能，因此突然不能自抑地陷于狂怒，陷于高傲的愤怒，哀号起来，发狂，谩骂，谴责，诅咒，捶胸顿足，向神和人吹嘘自己的清白，说社会主义的丑事与自己毫不相干！他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幻想或他所认为的温情幻想给予批判。他像圣者，像教皇一样，把诅咒加在贫穷的罪人身上，而对小资产阶级以及可怜的、色情的和宗法式的家庭幻想则唱起光荣的颂歌。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者、经济学者。小资产者在发展了的社会里，由于他本身的地位关系，一方面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者，这就是说，他迷惑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感受到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着这样的骄傲：他是不偏不党的，他发现了那敢于说与中庸之道的确有所不同的真正的均衡。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它的本质的基础。它本身不外就是具有形体的社会的矛盾。它需要在理论上来证明它在实际

上的情形，而蒲鲁东先生的功劳就在于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解说者；这是真实的功劳，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以后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很想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随着这封信送给你，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够出版这本书，以及我曾在布鲁塞尔跟你提起过的对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你很难想像这样的出版在德国所遇到的是怎样的困难，首先从警察方面，其次从出版家方面，这些出版家是甘愿作为我所攻击的那一切倾向的代表人。至于说到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只是贫穷，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德国共产党的成员恨我，因为我攻击他们的乌托邦和他们的夸夸其谈。

二、马克思给魏德迈耶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至于说到我，那么我的功劳并不在于发现了近代社会里有阶级的存在，也不是在于发现了阶级互相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之前早就指出了阶级间的这种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做过阶级的经济解剖。我的新的东西，是在于指出：（一）阶级的存在，只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结合；（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向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专政本身只是作为达到一切阶级的消灭和达到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

三、马克思给恩格斯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前天有一个不大的宴会庆祝《人民报》①的成立纪念。那一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我认为那是适时的，尤其是因为在所有侨民中只有我一人（这事在报上已经宣布了）受到邀请，而第一次的祝杯就是让给我的。我应该为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我用英语发表了短短的演讲，但没有把它印出来。②我所预期的目的是达到了。塔兰底尔——他是要付出两个半先令才得到参加证的——和所有其他法国的以及别国的侨民集团，都相信我们是宪章党的惟一亲密的同盟者，相信我们虽然放弃了公开的示威运动，而任随法国人去公开地讨好宪章党，但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权力来把历史已经归属于我们的地位重新抓住。下面的事使这一点更加成为必要：在2月25日比亚茨所主持的会议上，出席了德国的无知之徒舍尔彻尔老头儿，他用一种狭隘得真是令人可怕的行会情绪来控告德国的"学者"，探告那排斥了他们这些无知之徒，并迫使他们在别的民族面前出丑的"智力工作者"。你，当然，

---

① 《人民报》是宪章党的机关报，由1852年到1858年间在伦敦发行，主编是依·琼斯。——俄文版编辑部

② 马克思的演讲在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所载的关于宴会的报道上登出了。——俄文版编辑部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就认识舍尔彻尔的。我有好几次又看见了友人沙配尔，并且发现他成了忏悔的罪人。这两年来他所度过的孤单的生活看来对于他的思考能力倒发生了很好的效果。你明白，在任何情形下有这个人在手边总是好的，而尤其重要的是把他从维里希的手里夺取过来。沙配尔现在对于文得米尔街①的坏蛋们抱着很大的愤恨。

你给斯蒂芬的信我会送去。李维的信应该保留在你那儿。请照常处理所有的信件，我不要求把它们退回来。愈是让它们少通过邮局，就愈更好些。我完全同意你对于莱茵地区的看法。对于我们具有决定命运的作用的，是当遥望着将来的时候，我就会看见某些带着“背叛祖国”的气味的东西。要看柏林的事情怎样变化，才能确定我们应不应该走向迈因斯会员们②过去革命时所走到过的那种境地。这不是容易的。我们从莱茵河彼岸的勇敢的法国弟兄们那里得到了多么大的启发！德国的一切事情都有赖于无产阶级革命要能够得到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那时一切就会很顺利……

① 在伦敦的文得米尔街有着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房间。——俄文版编辑部

② 马克思所指的是迈因斯市的雅各宾的党员，他们参加了1792年占领迈因斯市的法国革命军队。——俄文版编辑部

四、马克思给恩格斯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你的《论军队》①很好，只是它的规模使我吃惊了，因为我了解像那样繁重的工作会怎样使你受到损害。倘若我知道你竟至于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可把这件事情作为罢论了。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白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联系的见解的正确性。一般地说，战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例如工资制度，在古代，就是首先在军队里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样，在罗马人中间，Peculium Castrense②就是对于非家长的动产私有权给予承认的最初的法律形式。同样，行会制度最初也是从Fabri③的团体里产生的。同样，机械的大规模的应用，也是在军队中最初看到。就是金属的特殊的价值，以及它的作为货币的用途，就其起源来说，好像也正是依据于它在格里木石器时代刚完结时的军事意义的。又，一个工业部门内部的劳动分工，也是最初在战争里推行起来的。甚至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都简要而明白地概括在这里面。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

① 恩格斯的论文《论军队》发表在《新美洲百科全书》里。——俄文版编辑部

② 兵士在军营中的财产。——俄文版编辑部

③ 在军队服役的手工业者。——俄文版编辑部

应该从这样的观点上来考查问题。

你的阐述中遗漏了的惟一的一点，在我看来就是：(一) 真正雇佣军队的最初的出现以及很快地在迦太基人中间大规模地应用(为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我想研究一下我不久以前才认识的一个柏林人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二)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意大利军事的发展。战术上的计谋正是在这里创制出来的。同时，马夏弗里在他的《佛洛伦斯的历史》里，对于雇佣兵队长如何作战的情形有着非常有趣的描述。我要替你做一些摘录。但如果我到布莱顿来找你时 (何时?)，我宁可把马夏弗里的那卷书随身带来。他的《佛洛伦斯的历史》——是杰作。(三) 最后，亚洲的战争体系，像它最初在波斯出现的那样；而以后在蒙古，土耳其等地方又发生了极其多样的变形……

五、马克思给恩格斯[①]

——1866 年 7 月 7 日

……对于我们的生产手段决定劳动组织的学说，能够有比在杀人工业里[②]所有着的还更辉煌的确证吗？我想要你在这方面写点东西（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让我用你的名字作为附录放进我的书里，这一定要花费你许多的精力。你考虑一下吧。倘若能成的话，那就把它放进我详细论述这个主题的第一卷里。你能理解我会多么样的欢喜，倘若你是在我的主要著作（我现在才只做了一小部分）里直接作为一个帮手，而不仅只是在引用文句中出现的话……

① 这一段是原有译本九封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没有收入，依年代顺序应列为第六，但因与第四信内容相联系，故仍予保留，并列为第五。——译者

② 即指军事。——俄文版编辑部

六、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5 年 2 月 23 日于伦敦

昨晚我收到了你的使我感到很大兴趣的来信，其中有几点我要答复一下。

首先我想简单地向你声明我对拉萨尔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在他进行宣传工作的时期破裂了的：（一）由于他那讨人厌的自吹自擂，同时其中还夹杂着最无廉耻的对于我的著作和其他人的著作的剽窃行为，（二）由于我坚决地责难他的政治策略，（三）由于还在他进行宣传工作以前，我就从伦敦这儿向他详细地解释过和证明过：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干涉——这是荒谬的见解。在他给我的信中（从 1848 年到 1863 年），或是在他和我个人会见的时候，他常常表明自己是我所代表的党的拥护者。但是当他在伦敦（1862 年年底）发觉他的把戏在我面前要不成了的时候，他就决心以“工人独裁者”的资格挺身出来反对我和旧时的党。不管这一切，我还是承认了他的宣传工作的功绩，虽然在他迅速地升官之后，这宣传在我看来也似乎愈来愈更暧昧了。他的突然的死亡，旧的友谊，伯爵夫人哈兹费尔德的申诉信，资产阶级报纸对这个生前曾使他们那样害怕的人所表示的卑怯无耻使我发生的反感——这一切推动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来反对

卑劣的柏令德（哈兹费尔德把这声明送给了“北极星”①）。然而，这个声明并没有涉及拉萨尔的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想法，也由于希望消除我认为有危险的某些因素，我就和恩格斯一起答应与“社会民主党人”②合作（这杂志登载了国际劳动者协会成立宣言的译稿，并且按照它的希望，我在蒲鲁东死的时候写了关于他的文章），并且在施维泽尔寄来了它的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就决定让它把我们列为撰稿人。对于我们还有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保障：威·李卜克内西是编辑部的非正式的委员。在这个期间很快就发现——那证据已落在我的手里——确实是拉萨尔背叛了党。他和俾斯麦签订了正式的条约（并且对于这事他并没有给自己取得任何保证条件）。他要在1864年的9月底到汉堡（和疯狂的施拉姆以及普鲁士的警察特务马尔一起）去“逼迫”俾斯麦实行施勒斯维格—荷尔斯泰因的合并，也就是说要用“劳动者”的名义来宣布这个合并，等等，而俾斯麦就为此而允诺普选的权利以及某些社会主义的诈骗。可惜，拉萨尔竟没有来得及扮演这出喜剧！否则他就会陷入到那样可笑和愚蠢的地步，以至于使一切类似的尝试都将要从此绝迹！

拉萨尔走上了这条歪路，是因为他是米克尔式的“现实的政治家”，不过具有着更广阔的规模和抱着更巨大的目的。（顺便提一下，我早就相当熟悉了米克尔，我曾指出他的出现是由于民族

① 《北极星》——拉萨尔派的周刊；1860至1866年在汉堡出版。——俄文版编辑部

② 《社会民主党人》是拉萨尔主义者施维泽尔1864年末在柏林办的刊物。——俄文版编辑部

联盟①对于汉诺威的小辩护士可以作为很好的手段，来博取超出自己的狭小乡邻的全德国的名声，借此提高本人的“现实性”，以便反过来又在自己的汉诺威本土获得身价，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之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像米克尔和他今天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亲王所宣布的“新纪元”，借以攀附到民族联盟和“普鲁士的上层”方面一样，正如他们都是在普鲁士的保护之下来发展“公民的自尊心”一样，拉萨尔也想和布兰登堡王家的菲力普第二共同来扮演无产阶级的侯爵罗莎，而使俾斯麦作为他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中介人。他仅只是模仿了民族联盟的先生们。同时，后者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向普鲁士反对派呼吁，而他却是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名下来和俾斯麦握手。民族联盟的先生们这样做是比拉萨尔更有理由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习惯于只看见直接横在他们脚底下的作为“现实性”的利益，也因为这个阶级在事实上甚至于对封建主义也到处进行了妥协，而作为劳动阶级，则就其本来的天性说是必然地应该忠实于“革命”的。

对于拉萨尔那样充满虚荣心的、好表现的性格说来（这样的人，决不是用官职、市长地位之类的小价钱就可以收买得了的），由斐迪南·拉萨尔来树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间接的功绩，乃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想法。但在实际上他对于这种功绩的现实的经济条件是过分地无知，以至于不能够批判地来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卑劣的“现实的政策”，——它使德国资产阶级忍受了1849年至1859年的反动并对民众之被愚弄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

① 民族联盟——1859年秋成立的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要把一切除奥地利而外的德意志国家都统一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以后民族联盟支持了俾斯麦的政策。——俄文版编辑部

——使得德国劳动界那样地“风气败坏”，以至于竟会欢迎这种吹牛广告式的解放者，他约许通过一次跳跃就要把劳动者带到理想的境地。

现在再回到我最初所讲的事情上来吧。“社会民主党人”报社刚一成立，我们就看到，哈兹费尔德企图要实现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瓦格涅尔（“克洛依兹新闻”的成员）和俾斯麦建立联系。她把“劳动联盟”（全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人”等等交给俾斯麦掌握。“社会民主党人”势必要宣布施勒斯维格—荷尔斯泰因的合并，势必要一般地把俾斯麦认作保护人。只是由于在柏林和在“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里我们有李卜克内西，才把这个精巧的计划推翻了。虽然我和恩格斯都不喜欢报社——对拉萨尔的卑屈崇拜，向俾斯麦不时地表示奉承等等，——但究竟更重要的是应该和报社暂时保持正式的联系，以便制止哈兹费尔德老太婆的阴谋和工人党的完全堕落。因此我们是用友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恶作剧，虽然在私下我们也常常写信给编辑部，要他们像对进步党人那样地来对俾斯麦进行斗争。甚至于当趾高气扬的小丑伯恩加德·伯克尔认真地依据着拉萨尔的遗嘱所传授给他的意旨，来阴谋反对劳动者国际协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忍耐了。

这时，施维泽尔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论文愈更变成俾斯麦式的了。我以前就写过信给他，说进步党人可以被“联盟的问题”所吓住，但普鲁士政府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完全废除联盟的，因为这会把官僚主义打开一个缺口，结果就要使劳动者得到公民权，就要破坏仆役制度，就要废除贵族们对农民施行鞭笞的刑罚，而这一切都是俾斯麦所不允许的，并且一般地和普鲁士的官僚主义政府是不能两立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推翻了联盟的法律，政府就会用空话来搪塞（例如这类的空话：

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入”的办法等等)，以便极力保持这些法律。所有这些都被证实了。但施维泽尔先生做了什么呢？他写了论文来拥护俾斯麦，并把自己的全部英勇气概用来反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叔尔茨，福黑尔等等。

我相信施维泽尔等人是有真诚的心情的，但他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他们想就现存的条件来作打算，而不愿意让米克尔独占“现实的政治家”的特权。(后者似乎想要为自己保持和普鲁士政府合作的特权)他们知道，在普鲁士(并且也在德国其他地方)工人的报纸和工人运动是只能在警察允许之下存在的。因此他们就想来顺应当前那样的环境，想不去刺激政府，等等，全然就像我们的“共和主义的”现实的政治家一样地“接受”霍亨索伦族的皇帝。但是，由于我不是“现实的政治家”，我就认为有必要和恩格斯一起来公开声明拒绝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你很快就会在一些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

由此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没有事情可做。那里的政府公开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利。如果我要在那里做宣传工作，那只有在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被接受了的条件之下，才会得到允许的。

我宁愿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①把我的宣传工作做一百次。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并且是有着高度重要性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致力于普选权的问题，这问题在此地自然具有着与在普鲁士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般地说，这次“协会”的胜利，在此地，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都超过了所有的预想。只是在德国，当然，还

① 这里说的是第一国际。——俄文版编辑部

有拉萨尔的信徒和我作对，第一，他们极端愚蠢地生怕失掉自己的影响；第二，他们知道我是公开反对德国人所谓的“现实的政治家”的。(这是这样一种“现实性”，它使得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一个人只要得到一先令的会员证都可以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还有比利时人)采取了这种个人会籍的形式——这是因为法律禁止他们以团体的资格参加我们；由于在德国也有同样的情形，因此我现在决定向此地我的朋友以及德国的朋友们提议在各处组织些小的团体，不管会员的人数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取得英国的会员证。因为英国的团体是合法的，所以这个方法即使在法国也不会遇到阻碍。我非常希望，你和与你最接近的人们也经由这样的途径和伦敦取得联系。

七、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6年10月9日于伦敦

……我非常担心日内瓦的第一次大会，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的全部过程都进行得很好。①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都超过了意想。我不能也不想去出席大会，只替伦敦的代表们草拟了纲领。我有意地限制了它的论点，使它们可以取得工人们的直接的同意和共同的行动，并且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把工人们组织成阶级的需要提供直接的营养和推动力。巴黎的先生们的头脑中，装满了空洞的蒲鲁东主义的词句。他们口口声声讲科学，而自己却什么也不懂得。他们傲慢地对待一切革命的、也即是从阶级斗争本身生长起来的行动，傲慢地对待一切集中的社会运动，也即是那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如像劳动日的法律上的规定）来加以贯彻的运动。借口自由，借口反对统治权或借口与一切权威作对的个人主义，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安静地容忍了并且容忍着最可耻的暴政——在事实上只是宣扬了由蒲鲁东主义所观念化了的普通的资产阶级经济！蒲鲁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他对于乌托邦主义者的虚假的批判和虚假的对立（他自己本身是小资

---

① 第一国际的日内瓦大会，在1866年9月3至8日召开，会上蒲鲁东主义者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大会确定了马克思所写的国际章程，而所通过的决议是以马克思的指示作基础的。——俄文版编辑部

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这样一些人的乌托邦里面，则有着新世界的预想和在幻想中的新世界的描画)。起初迷惑了和引诱了“辉煌的青年”、学生，以后又迷惑了和引诱了工人们，特别是巴黎的工人们，他们从事于奢侈品的生产，自己毫不知觉地，强力地与腐旧的垃圾联系着。无知识，爱面子，妄自尊大，饶舌不休，虚情假意的夸张，这一切使得他们几乎要来捣坏一切，当着他们以那么多的，和他们的会员数目完全不相称的人数出现到大会上来的时候。在报告里我不直接指名地给了他们一个应得的打击。

使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在巴尔的摩尔同时召开的美国工人大会。那里的口号就是要组织起来向资本斗争，而且奇怪的是，我给日内瓦制定的大部分要求也由于工人们的忠诚的本能而同样地在那里被提出来了。

我们的中央会议（其中不少的部分是我参与了的）所号召起来的这里的改革运动，①现在取得了很大的规模，并且成为不可战胜的。我经常在幕后工作，并且自从事情上了轨道后就不再为它担心了。

① 英国的选举权改革的运动，它最后争取到了1867年的改革。——俄文版编辑部

八、马克思给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说到《中央报》，那么，论文①的作者对我算是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当人们一般地考虑到有关价值概念的事情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意我的结论。这不幸的人没有看到：倘若说在我的书里没有列出论“价值”的一章，那么，我对现实的关系所给予的分析，就可以说是把真实的价值关系的资料和证据都包括在内了。人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谈到必须对价值概念有所证明，那只是由于对所讨论到的对象完全无知，也是由于对科学方法完全无知。所有的小孩子都知道，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那不要说一年，只要几个星期，就会因饥饿而灭亡。同样地谁也明白，为要产生出与多种多样的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物品的量，就必须有多种多样的，在数量上确定了的社会综合劳动的量。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的必然性**，绝不会在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之下**被消灭，能够变更的只是**它的表现**的方式，这是自明的道理。自然的规律一般地都不能够被消灭。只有表现这些规律的**形式**，可以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更。表现劳动的这种按比例分配的形式，在那样一种社会结构下面，即当着社会劳动的联系是作

① 指1868年莱比锡的《中央文学报》28期所登载的对《资本论》的书评。——俄文版编辑部

为个人劳动生产品的私人交换而存在的时候，这表现形式就是这些生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阐明价值规律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说，如果对于一切在表面上与规律有着矛盾的现象想一下子就给予“说明”，那就得要先于科学而拿出科学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嘉图犯了错误，他在自己的论价值的第一章里，把一切可能的范畴都设想做现成的东西，而这些范畴之是否与价值规律相适应，却是还需要首先加以阐明的。

另一方面，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理论的历史终归证明了，价值关系的理解经常总是同样的，不过有时比较明确些，或者比较模糊些，有时混杂着很多空想成分，有时又具有较大的科学的确定性。由于思维过程本身是从特定的关系中成长起来，它本身就是自然的过程，因此现实地理解着的思维只能是同样的，不过随着发展的成熟性的不同，特别是随着思维器官的发展的不同，而有着程度上的差别罢了。此外一切都是胡说。

庸俗经济学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现实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的大小是不可能直接成为同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要点就在于，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任何自觉的、社会的生产调节。合理的东西和具有自然的必然性的东西，只表现为盲目地作用着的平均数。庸俗经济学者却认为，只要他针对着内部关系的揭露而自命不凡地提出反对的主张，声明事物在现象上是另外一回事，这就算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了。事实上他所引以自负的，乃是在表面性前面匍匐献媚，乃是把表面性看做根本的东西。那究竟还要科学干什么呢？

但是，这里面还隐藏着另外的一些东西。事物的联系一旦被看清楚了时，对现存秩序的恒久必然性的理论上的信心，就会在

这秩序实际上还未崩溃以前就先宣告崩溃。因此，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在这儿就要求把荒谬的妄想永久化。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原因，那为什么以阿谀为生的那些空谈家还会得到酬劳？——他们投在科学上的惟一王牌，就只是说在政治经济学里一般地都不容许应用思索。

够了，很够了。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出，这些资产阶级的僧侣是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工人们，甚至于工厂主和商人们，都了解我的书，并且能够钻研它，而这些“**有学问的**书呆子们”却诉苦说我对于他们的思考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九、马克思给库格曼

——1871 年 4 月 12 日于伦敦

昨晚我接到一个很使人不安的消息，说拉法格（不是劳拉）目前是在巴黎。

如果你看一看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是主张最近法国革命的意图不能像从前那样把官僚的军事的机构由一只手转递到另一只手，而要打碎它，而这也就是大陆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前提条件。我们英雄的巴黎同志们的意图正是这样的。这些巴黎人有着多么大的灵活性，多么大的历史的首创性，多么大的牺牲精神啊！经过了六个月的，比起外敌来说，更多地是由于内部叛徒所引起的饥饿和破产的日子之后，他们在普鲁士的刺刀面前站立了起来，好像并不曾有过法兰西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口！历史上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英雄主义的例子。如果说他们是被打败了，那罪过不在于别的，而只是由于他们的宽大。在到达维诺伊之后，立刻就应该向凡尔塞进军，并且随即就要把巴黎国防部队中的反动的部分调出巴黎。由于好心肠而放过了时机。人们不愿意发动国内战争，好像那出奇的败类梯也尔并不曾以他解除巴黎武装的企图来发动了这个战争一样。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建立公社而过早地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全权。又是由于“正直”而成为迟疑！不管怎样，目前巴黎的起义——即使它已被旧社会的豺狼

们，猪猡们以及下贱的走狗们所压倒——仍然是我党自六月起义时期以来最光荣的功绩。比一比吧，这些具有冲天精神的巴黎人，和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的神圣罗马皇帝的奴仆以及他们的充满着兵营、教堂、容克地主气味的，特别更多地充满着庸人气味的陈腐的化装跳舞。

顺便提一下。从路易·波拿巴的财库里直接发布出来的关于补助金的文件的正式公告中，指明福格特曾在1859年8月接受了4万法郎！我把它通知了李卜克内西作为进一步利用的材料。

你可以把哈克斯特豪生的书寄给我，因为我最近不但从德国，而且还从彼得堡完整无恙地接到了各种小册子之类的东西。

谢谢你给我寄来各种杂志（请更多地寄来，因为我要写一些关于德国，帝国议会之类的文字）。……

十、马克思给库格曼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你的信收到了。这些时来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只能少写几个字。我实在不了解，你为什么能够把1849年6月13日示威运动①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今天巴黎的斗争相比较。

如果斗争只是在准确有利的时机条件下进行的，那当然，创造世界的历史就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当然要作为组成部分而进入一般的发展进程中，同时又为另外的偶然性所抵消。但事情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的程度上却依赖于这些“偶然性”，而其中就有着这样的“情况”，如像一开始就站在运动前头的人们的性格。

就这一次来说，有决定性的不利的“情况”，不应该在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是在于在法国内部有着普鲁士人的存在，并且他们已站立在巴黎的前面。巴黎人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凡尔塞恶党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逼使巴黎人在二者之间择一：或者接受挑战而进入斗争，或者就放弃斗争。在

① 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举行了山狱党所组织的示威运动，反对法国军队暴力推翻罗马共和国。运动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被镇压下去，它只能证明法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破产。——俄文版编辑部

后一种情形下面，工人阶级的道德败坏，会比随便几个领导者的牺牲更是极大的不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阶级和代表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的阶段。尽管这一次的事情并不曾直接有所成就，但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新的出发点却仍然争取到了。

十一、马克思给波尔特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共产国际的创立，是为着要用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真正的组织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和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最初的章程和成立时的宣言，早就指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宗派主义不曾在历史进程中被打破，国际就不可能巩固起来。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处在互相反对的关系中。当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从事独立的历史运动时，那时宗派还有自己的（历史的）辩解理由。一旦它达到了那样的成熟程度时，所有的宗派就变成本质上反动的东西了。此外，国际的历史也重复了曾在一切历史中显现过的东西。陈旧了的东西企图在新出现的形式里把自己恢复和巩固起来。

国际的历史，也正是总委员会对于宗派的不断的斗争，正是对于那些企图在国际本身内部巩固起来来反对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斗争在国际的大会上进行过，而更多地是在总委员会的一些特别会议里对个别的宗派进行过。

因为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者①）在巴黎是属于协会的创始

① “互助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这样称呼自己，因为他们以“互相帮助”这个口号作为标榜。——俄文版编辑部

人之列的，因此很自然地，在最初几年间，他们在巴黎就居于运动的首脑地位。后来那里终于与他们相对立地形成了集体主义的、实证主义的以及其他的集团。

在德国，有拉萨尔的党羽。我自己曾经有两年之久和声名狼藉的施维泽尔通过信，确凿不移地向他证明拉萨尔的组织仅只是宗派的组织，证明那样的组织与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是敌对的。但由于他有自己的“理由”而不了解这一点。

1868年年末俄国的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成立以自己为领导的，号称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联盟”的第二个国际。他，一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以这特别的组织来代表国际的科学宣传，并想使它担当第二个国际之内的国际的特殊职务。

他的纲领是很肤浅地从各处拉来的混合物——阶级间的平等(!)，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圣西门主义的蠢话)，无神论指定为社员们的信条，等等，而最主要的信条（根据蒲鲁东主义）则是禁止参加政治运动。

这种幼稚的童话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曾得到过共鸣（就是目前也还在某种程度上能找到支持），在那里工人运动的真正的前提还很少发展。在罗马语系的瑞士和比利时的一些爱虚荣的、野心的、空洞的教条主义者中间也得到共鸣。

对于巴枯宁来说，他的说教（从蒲鲁东和圣西门取来的一些断片所拼凑成的胡说）曾经是，现在也还是从属性质的东西，即仅仅是他个人吹嘘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方面是个零数，那么，作为阴谋家倒是符合他的本性的。

总委员会曾经要在几年之间进行斗争来反对这种阴谋（这阴谋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

南部)。它最后终于通过国际会议的决议1，2和3，IX，XVI和XVII，①来施行早经准备好了的打击。

很明白，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1，2，3和IX现在是对美国的委员会给予了法律的武器，以便停止一切的宗派主义和浅薄的小集团，在必要的时候就开除他们……

……很容易了解，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是把夺取政治上的统治权作为自己的最后目的的，为此就必须要有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定的组织。

另一方面，一切的运动，一切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反对统治阶级并力图通过“从外面的压力”来战胜后者的运动，都是政治运动。如果是，例如说在个别的工厂中或者在个别的工业部门中企图用罢工之类来强迫个别的资本家缩短劳动时间，那就是纯粹经济的运动；相反地，如果运动的目的是在于要强迫发布关于八小时劳动日的法律，等等，那就是政治运动。这样，从工人们的分散的经济运动中到处成长着政治运动，成长着力图把自己的利益用普遍的形式，用对于自己的社会具有强制力量的形式实现出来的阶级的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要求某些先行的组织，那么它反过来又同样地成为使这种组织向前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还没有把自己的组织发展到足够开始向统治阶级的集体的权力即政治的权力举行决定性的攻击的地方，他就需要时时刻刻在这方面从事准备，为此就要不断地进行反对这个权力

① 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国际伦敦大会(1871年9月)决议解决了以下的问题：国际的巩固，总委员会的集中化和领导作用的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和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巴枯宁的宗派主义集团的清算。——俄文版编辑部

的宣传鼓动，就要对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保持敌对的阵势。要不是这样，工人阶级就会被后者所玩弄，如像法国的九月革命所显示的那样，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如像英国的格拉斯顿之流一直到现在还能够要弄的把戏所显示的那样。

十二、恩格斯给库诺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巴枯宁在1868年以前一直进行着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以后就加入了国际，在柏林的世界大会①上遭到失败之后，立即就开始在**国际内部**安排反对总委员会的诡计。巴枯宁有一套特别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他的蒲鲁东主义里面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在他看来，应该清除的首恶并不是资本，从而，也并不是由社会发展的结果所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群众和我们都共同地有着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权力不外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着保护自己的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创立起来的组织机构，那么，巴枯宁却主张**国家**创造了资本，主张资本家占有资本，**只是由于国家之赐**。这样，既然国家是首恶，那就必须首先消灭国家，然后资本也就会自己归于灭亡。我们的说法却相反：消灭资本——一切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然后国家就会自己归于衰亡。这是根本的区别：要废除国家而没有先行的社会的变革，是荒谬的；而消灭资本，这**正是**社会的变革，

① 这是指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联盟的柏林大会，1868年以前巴枯宁一直是这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俄文版编辑部

它本身包含着一切生产方式的改造。但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根本的恶，那就不应该做任何足以支持国家存在的事情，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国家——共和国、君主国等等。这样一来，就要**把一切的政治完全放弃**。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参加选举——这是违背原则的。应该进行宣传鼓动，咒骂国家，自己组织起来，等到你终于在自己这方面获得了所有的工人，也就是大多数人时，那时一切国家的机关就会归于消灭，国家就会被废除，而国际的组织就会来代替它的位置。这个伟大的、千载的王国将由此开创的行动，就叫做**社会的清洗**。

这一切都叫喊得非常激烈，而又简单得使人在五分钟内就可以背熟，——这就是巴枯宁的学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年轻律师、医生和其他教条主义者中间很快地就会得到共鸣的原因。但工人群众永远也不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公共事务不会同时又是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在本性上就具有**政治的主动性**，而任何人如果向他们提议抛弃政治，他们就会断然加以拒绝。向工人们进行放弃政治的说教，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等于要把他们驱赶到僧侣们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们的怀抱中。

在巴枯宁看来，由于国际并不是为着政治斗争而建立，而是为着在社会的清洗时立即来占有旧的国家机关的地位，因此它应该尽可能多地接近于巴枯宁的关于将来社会的观念。在这个社会里，首先是不存在任何的**权威**，因为权威——国家——是绝对的恶。(在没有上述机关所表现的意志时，在没有统一的领导时，这些先生们究竟打算怎样来开动工厂，行驶火车和驾驶轮船呢——这些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权力也要停止。每一个人，每一个公社，都是自主的，但是，即使是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某些自主权，这

社会怎么可能存在呢？——这一点巴枯宁又是沉默不言。

因此，国际也就要按照这样的模型来建立。每一个分组都是自主的，而在每一分组内部，每一个人也要自主。鬼才要接受巴塞尔决议①，它把有害的、败坏道德的权力交给了总委员会。即便这种权力是人们自愿地付托的，也应该被消灭掉，就只因为它——是权力。

这就是那一切骗术的根本要点。但是，谁又是巴塞尔决议的起草人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以及他一些同志们！

当着这些先生们看见，在巴塞尔大会上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移到日内瓦，也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他们就采取了另外的做法。他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联盟，一个在大的国际内部的国际结社，他们这样做的借口，你现在在巴枯宁派的意大利的报纸例如“Proletario”，“Gazzettino Rosa”上还可以见到：对于拉丁民族，需要有比较冷静的、迟缓的北欧人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小小的计划由于总委员会的反对行动而遭到挫折，不用说，总委员会是不能够容许在国际内部有任何独立的国际组织存在的。从那时以来，每当巴枯宁和他的党徒们在图谋把国际的纲领偷换成巴枯宁的纲领的时候，上述的计划就以各种的形式再现出来；另一方面，反动派，从柔里·法佛勒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在事情涉及进攻国际的时候，总是恰恰攻击了巴枯宁的空洞的吹牛的谬论。因此我才需要有12月5日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宣言，这宣言也登载在“Gazzettino Rosa”上面。

① 这是指1869年9月6日至12日第一国际的巴塞尔大会的决定。——俄文版编辑部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二三十个尤拉人①组成的，追随他们的工人整个说未必能达到两百个；先锋队伍都是些意大利年轻的律师、医生和杂志编辑人，这些人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资格出现，有几个这样的人在巴塞龙纳和马德里，偶或也有个别的人在里昂和布鲁塞尔，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工人；这里只有一个惟一的例外，洛宾。

由于没有办法召开大会而不得不召集的伦敦会议②，被他们当做了借口，而在瑞士居留的法国流亡者的大多数又都转向了他们方面，——因为前者（蒲鲁东主义者）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同族，也因为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开始了进攻。自然，在国际里面，是到处都可以找到不满意的少数人和未被赏识到的天才的，而这些人也不能说不算是一个数目。在目前时候，他们的战斗力量是这样的：

1. 巴枯宁自己——这次进攻中的拿破仑。

2. 两百个尤拉人和 40 到 50 个法国的宗派（日内瓦的流亡者）。

3. 在布鲁塞尔的赫因斯，Liberté 的主笔，但这个人在表面上并不追随他们。

4. 再就是从来也不曾被我们承认过的“1871 年的法国支部”的残遗，他们已经分裂为 3 个相互敌对的部分；还有 20 个左右被德国支部开除了的（由于集体退出国际的提议）拉萨尔派如像施维泽尔的类型，他们作为高度集中和强力组织的保卫者而竟显然

① 生活在瑞士的山区——尤拉的人。——俄文版编辑部

② 指 1871 年 9 月 17—23 日第一国际在伦敦开的大会。——俄文版编辑部

地接近了无政府派和自治派的集团。

5. 在西班牙有几个巴枯宁的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在工人中间，特别是在巴塞龙纳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至少在学说方面是如此。但另一方面，西班牙人是很注意组织的，而缺乏组织这一点就会使他们对于对方感觉到奇怪。巴枯宁在这里能否获得胜利，只有到四月的西班牙大会上才能够弄明白，但由于工人在那里将会要占优势，因此我是不觉得有什么忧虑的。

6. 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有都林、波伦亚和吉尔根蒂的支部曾主张要早期召开大会。

巴枯宁派的报纸号称有20个意大利的支部加入他们方面，我对它们毫无所知。无论如何，差不多到处都是由巴枯宁的朋友和信奉者们掌握着领导权，他们发出了很大的叫嚣声音；但是，倘若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事实，就可以知道，并没有多少人追随着他们，因为广大的意大利工人群众一直到现在究竟全都是些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如果国际在那里不和弃绝政治的行为划清界限时，他们将仍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意大利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巴枯宁主义者目前在那儿还是居于国际内部发号施令者的地位。总委员会对于这点并不想有所抱怨；意大利人有权利干很多的蠢事，而总委员会要反对这些事情也只能经过和平争论的道路。他们也有权利主张按照尤拉人的精神来开大会，虽然像这样一些才开始加入国际而对于任何情形都还不熟悉的支部，竟然能在这一类问题上立即就确定地站到一个方面来，特别是在他们还没有向双方听取意见以前就这样做，这自然是极为奇怪的事情！我已经坦率地向都林人说出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对于其他有过同样主张的支部我也要照样做。因为所有这些加盟的声明都是间接地表示同意通

告里所包含着的虚伪的反对总委员会的谴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在短时期内也还要发布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通告。如果你能在它的出现之前阻止住米兰人的类似的声明，那你就算是满足了我们的全部愿望了。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都林人，他们曾附和了尤拉人，也就是说，他们曾责备我们这里有权威主义，现在忽然又要求总委员会用权力来出面反对那敌对的都林人的“工人联盟”，并且要求它按照它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方式来做，如像把柏赫里开除出“Ficcanaso”之类，而后者并不是属于国际组织的，这一切还要我们在未曾听取“工人联盟”的意见之前，未曾听取它对这事提出什么意见之前就要做到！

前星期一我曾寄给你登载着尤拉人的通告的“Révolution sociale”，一期日内瓦的“Egalite”（可惜，登载日内瓦联合委员会的复信的那一期我已经没有了，这委员会所代表的工人比尤拉人所代表的要多到20倍以上的），和一期“Volksstaat”，从“Volksstaat”里你可以看到德国人中间对于这一段历史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地区的会议——有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是全体一致地表示拥护总委员会。

比利时的大会（12月25日至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要在例行的大会上（9月）来进行。我每天从法国都收到表示同意的信。在英国，很容易了解，这一切的阴谋是找不到适当的基地的。总委员会当然也不会为着少数从事阴谋的狂妄自大的人物的便利来召集临时大会。当这些先生们还能把自己约束在合法的范围内的时候，总委员会很愿意给予他们活动的自由——这一个由十分复杂的分子所组成的联盟很快就会自己发生分化；但，如果他们想从事某些与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有矛盾的企图，那么，总委员会就

要执行自己的任务。

如果你设想一下这些人们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正当国际到处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那你就由不得地要想到这种事情会与各国警察局有着联系。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柏西尔，日内瓦的巴枯宁主义者就把一个警察局的首席专员作为自己的通讯员！有两个著名的巴枯宁主义者，里昂的阿尔伯特·里查德和勒布兰，他们向他们所附托的一个工人——里昂的索尔表明，推翻梯也尔的惟一的方法，就是让拿破仑第三再坐到皇位上去，因此他们就拿着拿破仑第三的钱到处奔走，来在流亡者中间进行有利于拿破仑第三复辟的宣传。这就是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在柏林，拿了俾斯麦的补助金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唱着同样的曲调。由于这事情与俄国警察有连带关系，所以我把这问题暂时搁置一下，但巴枯宁对于涅察也夫的历史却完全是糊里糊涂的（他当然不承认这一点，但我们这里掌握着第一手的俄国的报告，并且我和马克思都能读俄文，因此他是隐瞒不了我们的）。涅察也夫必定是俄国派来进行挑拨的特务，或者至少他的行动是这一类的；除此以外，在巴枯宁的俄国朋友中，还有着各种各样可疑的人物。

我十分惋惜你失去了自己的职位，我曾特意写信给你，要你避免一切发生这事的可能。你留在米兰，对于国际非常重要，远胜过公开的出面所能够收到的那种微不足道的效果；在秘密的行动之下仍然有很多事情可做。如果我能够在翻译方面帮助你，我会非常高兴来做这件事。请告诉我，你能够从哪一种语言翻译成哪一种，什么是我可以为你效力的？

我的照片就这样也被警察局的狗腿子们劫去了。我要寄给你另外的一张，也请寄两张你的来：其中的一张准备交给马克思小

姐去以便促请她把她父亲的一张相片寄给你（仅仅她那里还有几张好一些的）。

再一次请你对那些和巴枯宁有关系的一切人们保持小心谨慎。一切的宗派都有一个特点，即它们的成员是紧紧地互相勾结着并且从事阴谋。你的一切消息——你可以完全相信——会立即传到巴枯宁那儿。他的信条之一，就是认为对自己的约言的遵守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都不外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真正的革命家为了事业的利益是常常要加以藐视的。在俄国，他公开地讲到这一点，在西欧，——这是秘密的说教。

请尽可能快地写信给我。如果你能够做到使米兰的宗派不至于加入意大利宗派的一般的合唱队，那就非常好了……

十三、恩格斯给倍倍尔

——1873 年 6 月 20 日于伦敦

我先对你的信作一个答复，因为李卜克内西的信还在马克思那儿，而他现在又找不到它了。

并不是赫卜涅尔，而是约克给赫卜涅尔的有委员会签署的信使我们这里的人担心，恐怕那不幸被拉萨尔派所把持的党机关会要利用你的结论，来把“Volksstaat”改变为所谓“真诚”的“Neuer Social-Demokrat”。约克明确地承认了这个计划，而由于委员会又追认了任命和更换编辑的权利，因此无疑地危险是大到顶点了。行将到来的赫卜涅尔的派遣使这计划更进一步确定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地认识我们所处的境地，这封信也就是为此而写的。

……说到党和拉萨尔派的关系，那么，你自然是比我们更善于判断在个别情形下所应该采取的策略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下面的事情。当人们像你一样地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全德意志工人联盟实行竞争的时候，就很容易太多地考虑到竞争对手方面，以至于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总是先想到他。但要知道，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全部算起来都只是由微不足道的少数德国工人阶级所组成的。依照许多经验所证明了的我们的意见，宣传方面的正确的策略并不在于要从这里和那里去夺取敌人的组织成员中的个别人物和集团，而是要去影响广大的、尚未被吸引到

运动中来的群众。一个由我自己从荒地里找到的新人，比十个常常要把自己的不正确的观点因素随身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投诚者更有价值。如果能做到仅仅吸收群众而不要地方的领袖，那也还行。遗憾的是常常要附带地接受一大堆这类的领袖，他们不是由自己过去的观点联系起来，就是由自己过去公开的主张联系起来，并且他们首先总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原则，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反倒宣传着真正的拉萨尔思想。这也正是在爱森那赫①的不幸事件，在那时，这也许是不能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是绝对地使党受到了损害，而且我要问，如果那时没有这些人参加进来，难道党在今天就不会至少是同样地有力量吗？无论如何，如果这些分子获得了增援，我认为就是不幸。

不要因为关于“统一”的叫喊声而把自己弄迷惑了。那些最喜欢把这个口号挂在嘴上的人，恰恰就是挑起纠纷的主要角色；目前瑞士尤拉的巴枯宁主义者们正是这样，他们是所有的分裂活动的挑拨者，却对于统一比一切都叫喊得更厉害。这些统一的狂热叫喊者，他们要不就是些眼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的一切混合成没有定型的稀粥，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仅只是使得堆在一锅里的各种各样的成分相互间陷入更加尖锐的矛盾（在德国，有些先生们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的协调，这是你们的绝好的例子），要不他们就是一些无意识地（例如密尔伯儿格）或有意识地想要伪造历史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最顽固的宗派主义者和最喜欢播弄是非的人以及最卑劣无耻的人在一定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声音叫喊统一。

当然，每一个党的领导都希望获得胜利，而这也是很好的。但

① 恩格斯指的是1869年爱森那赫会议，在那里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俄文版编辑部

在有的情形下面，为着更重要的东西又需要有勇气牺牲暂时胜利。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党，它的最后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它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眼前又是像巨人那样地成长起来，这就用不着在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地得到暂时的胜利。把国际作为例子来说，在巴黎公社之后，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被吓得要死的资产阶级把它看做是万能的。国际本身内部的群众也以为将永远继续是这样。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气泡是一定要破的。国际吸收了各种不中用的人。在它内部存在着的宗派主义者愈来愈无耻了，他们对国际胡作非为，希望人们会原谅他们的极端的愚蠢和卑鄙。我们却不加以容忍。看清楚了气泡终归会要破裂，我们就力求不去拖延灾难，而是设法使国际纯洁地和保持本来面目地离开灾难。在海牙破裂了气泡，你也知道，大会①的多数参加者都抱着失望的沉重心情回到家里。可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失望者，他们曾幻想在国际内部找到普遍的友谊和协调的理想，到了自己的家里却遇到比在海牙所爆发出来的更加厉害的争吵！现在这些闹宗派的争吵家却进行着协调的说教，并且向我们叫嚣，说我们是不能容人的人，是独裁者！但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协调的态度，如果我们抹煞了已经成熟的裂痕，结果会像什么呢？宗派主义者，也就是巴枯宁主义者就会获得更多几年的时间，来借着国际的名义作出更多的蠢事和丑事来。最发展的国家的工人们，会要因为不满而走开；气泡不会破裂，它会因为受到针刺般的伤害慢慢蜷缩起来，而最近将来的大会——在那里，危机一定会要发展起来——将会变成最庸俗最丑恶的个人间的内讧，因为原则在海牙已经被牺牲了。这

① 指1872年9月1日至7日第一国际在海牙的大会。——俄文版编辑部

样一来，国际就要在实际上遭到破灭，为了统一而“破灭”。我们不这样，我们为着我们的光荣而摆脱了腐朽的分子（出席了最后这次具有决定性的会议的巴黎公社委员们说，任何一次公社的会议，都不像这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的裁判会议那样给予了他们惊心动魄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全力进行说谎，诽谤，阴谋的勾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假冒的国际大多数的代表者们自己现在宣布说，他们没有勇气出席最近的大会（详情在跟写给“Volksstaat”的稿件一道送来的文章里）。如果我们必须再行动一次的话，那么，一般地和整个地来说，我们仍然不会采取另外的办法；至于策略上的缺点，那自然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信徒中间的最好的分子，是日趋自己走向你们，因此，像主张所谓统一的人们所希望那样，在果实还没有成熟时就要把它摘落，那是不智的。

此外，老黑格尔就已经说过：党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力量，它走向分裂，并忍受得起分裂。无产阶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种种的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都有一些不愿意再前进的人们堵塞着道路。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实际上到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党的分派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些分派相互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古罗马帝国处在最严重的被迫害时期的基督教宗派那样。

你还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说“Neuer Social－Demokrat”有着比“Volksstaat”更多的参加者，那只是说明每一个**宗派**都必然有着狂热的信徒，依靠了这些狂热的信徒——特别是当宗派还是新出现的时候（如像施勒斯维格—荷尔斯泰因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它就比那没有任何宗派妄想而只简单地代表着真实运动

的党会赢得更为巨大的暂时胜利。

我要结束了，邮件要送走了。匆忙中还有一件事：马克思在没有完成法文译本①以前（大概在7月底）不可能过问拉萨尔的事，并且那时他又极其需要休息，因为实在太累了。

① 说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俄文版编辑部

十四、恩格斯给左尔格

——1874年9月12至17日于伦敦

……和你的离开同时，旧的国际就完全结束了自己的存在。这也是对的。它是第二帝国时代的东西，那时笼罩在全欧洲的压迫，指示着刚才复苏起来工人运动要保持统一和抑制一切内部的争论。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推到第一位，那时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进入运动或尚待进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的理论上的特点在全欧洲，也就是在群众中还不十分清楚，德国的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的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还很软弱，不能任意为所欲为，而巴枯宁的新的胡闹甚至于还没有在本人的头脑里出现；甚至英国的工联领袖们也以为可以在党章序言所论述到的纲领的基础上来参加运动。第一次巨大的胜利就会要破坏这一切派别之间的天真的合作。这样的胜利就是巴黎公社，它无疑地是国际的精神的产儿，虽然它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国际直接的推动；这样，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国际对于公社是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的。当着国际因为公社的关系而成为欧洲的道德力量时，这时纠纷就开始了。每一个流派都想为着自己来利用这次胜利。分解开始了，这是不可免的。对于德国共产主义者——真正准备继续在旧的广泛的纲领基础上进行工作的惟一的人们——的增长着的力量所存在着的嫉妒心，把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推向巴枯宁的冒险主义的怀抱。海牙大会在事实上是

做了结束——而且是对于双方的党。还能够在国际的名义之下来做一些事情的惟一的国土，就是美国，因为那儿的上层领导还受着健康的本能的支配。但现在那里的威信也衰落了，想要在它的内部鼓舞起新的生命来的任何进一步的努力都是愚蠢的和白费气力的。在十年的期间国际支配着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奠定将来的方面，它很可以自傲地来回顾自己的工作。但它已经历过了自己的旧的形式。要想像旧时那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即建立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党的联盟，那就必须要有普遍的工人运动的压力，像 1849 年至 1864 年那样。但在现在无产阶级的世界已经太大和太广阔，所以还难做到。我估计，将来的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通过几年中间发生了它的作用之后——会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也就是树立着我们的原则的……

十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克等人的通告

——1879年9月17至18日于伦敦

……苏黎世三人的宣言。

这些时候收到了黑赫布尔格的"年报"，上面登载着一篇论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①。据黑赫布尔格自己给我的通知，这篇论文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写的，因此它就是这些先生们对于先前的运动的确实评价，从而也就是新的报纸的确实的纲领，因为报纸的路线是由这些人决定的。

一开头我们就读到：

"拉萨尔看做是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的运动，他不但号召了工人，而且也号召了一切正直的民主主义者来参加的运动，应该由科学的独立的代表者和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来作为先导的运动，这运动在约汉·巴普蒂斯特·施维泽尔的领导下是浅薄化了，它变成了产业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片面的斗争。"

我不想来研究这些话是否符合实际，以及符合到什么程度。这

① 论文是黑赫布尔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写的，登载在社会改良主义的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年报》上。——俄文版编辑部

里施维泽尔所以特别受到斥责，是因为他把这里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慈善事业运动的拉萨尔主义降低为产业工人为自己利益而进行的片面的斗争，而这一降低，实际上却是把运动深化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了。不仅如此，施维泽尔还因为“拒绝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受到非难。但是，难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要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内来找地位吗？如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由“正直的人们”所构成的，那他们就不会想要加入到党内来，如果他们竟然想要加入，那不外只是为了捣乱罢了。

拉萨尔的党竟“宁愿非常片面地使自己成为工人党”。写了上面的论文的先生们竟然在这非常片面地使自己成为工人党的党里作了委员，并且还在它里面担任着正式的职务。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如果他们所想的正如他们所写的一样，那就应该离开党，或者至少也要放弃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等于承认他们打算要利用自己的正式地位来进行斗争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党如果还让他们保留正式的职务，那就是对自己的出卖。

这样，照这些先生们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为真正的人类爱所鼓舞着的一切人”的全面的党。为着证实这一点，它就应该首先断绝粗糙的无产阶级的热情，并在有教养的和具有慈善心情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来“获得优良的口味”和“熟习优良的语调”(85 页)。那时，某些领袖们的“不漂亮的风度”就要让位于修养良好的“资产阶级的风度”(好像这些人们的外表上不漂亮的风度，也不能不算是他们该受斥责的很重要的东西)。那时很快就会出现“许多来自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阶级中间的多方面的人物。也就是必须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鼓动工作获得显著的胜利”。德国社会主义是

“过多地重视了争取群众的意义，并因此忽视了所谓上层社会中间的强有力的宣传工作”。因为“党还没有人有能力在议会里来代表它自己”。但“我们希望并且认为有必要把委任托付给这样的人，他们有时间和可能来彻底地研究某些有关的问题。普通的工人们和小手工业工人们……能有足够闲暇来做这事的，仅仅是极少的例外”。所以，还是叫资产阶级来吧！

一句话，工人阶级没有能力亲手争取自己的解放。为着这一点，它就必须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富的”资产阶级方面的领导，因为只有后者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那有利于工人的事情。其次呢？不应该有任何需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想法，——只需要用强有力的宣传工作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但是，既然我们希望争取社会的上层，或者即使是争取其中对于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那我们就要注意使他们不至于受惊。这样，三个苏黎世人就自以为是作出了最能安定人心的发现：

“正是在今天，在反社会主义的法律的压迫下面，党证明它并不情愿走上暴力流血革命的道路，相反地，它决定……开始走合法的，也就是改良的道路。”这就是说，如果这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只相当于选民人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且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是多少头脑清醒地不要在墙壁上去把额头碰破，不企图挑起以一敌十的“流血革命”，那就表明他们是要从此以后永远放弃利用国外发生的任何重大事变，放弃利用由此引起的急激的革命高涨，甚至于放弃利用在这高涨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之中人民所赢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又在什么时候出现那种无教养的人，做出3月18日①一类的事来，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会像

① 指1848年3月18至19日柏林的革命的巷战。——俄文版编辑部

“一切热中于街头堡垒战的败类们”（88 页）那样地参加到斗争里去，而是要“走上合法的道路”，要使暴动和缓下来，要收拾起街头堡垒，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脚跟脚地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去反对那些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倘若写文章的先生们起来声明说，他们并不是要这样讲的，那么，请问他们想讲的究竟是什么呢？

下面还有更妙的。

“在批判旧秩序和提出改变旧秩序的要求的时候，党愈是冷静，愈是客观，愈是稳健，那么，目前（当着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已被施行的目前）出现的棋局——处心积虑的反动派向害怕红色怪影的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棋局——就愈更没有重复的可能。”（88 页）

为要把资产阶级从恐怖的暗影里解放出来，就需要清楚明白地向他们证明：红色怪影在实际上仅只是怪影，它并没有真实地存在着。但是，什么是红色怪影的秘密呢，难道不正是资产阶级对于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所感到的恐怖，对于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所感到的恐怖吗？消灭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和“一切独立的人们”“不至于害怕来和无产阶级携手”。然而，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受到了愚弄。

这样，让党用自己的柔顺驯服的作风，来证明它已经永远弃绝曾被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当做借口的“粗野性和过火行为”吧。如果党能自愿地答应不越出这法律的范围之外，那么，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当然就会很亲切地废除这个法律，那时它已成为多余的了！

“人们应该了解”，我们并不想“拒绝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尽可以放到以后的年代来做，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我们的一切精力都要用来争取达到一定的，十分切近的

目的，这目的是在我们能够开始考虑实现更进一步的任务之前，无论如何先要达到的”。这样一来，“现在被悬得太远的要求……所骇退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群众，就会开始来和我们联合了。

用不着拒绝纲领；不过应该把它的实现搁置……到一定的时候。接受它，但实际上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要在自己生存的期间来追求它，只是为要做成遗嘱来交托给儿子和孙子。目前则把“一切力量和一切精力”都用到种种细微末节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方面，借此表示自己多少总算做了些事情，而同时又不至于使资产阶级受惊。这样说来，像“共产主义者”米克尔的做法，就好到不知多少倍了：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坚定不移地相信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将在几百年后不可避免地归于崩溃，就狂热地从事投机活动，使自己成为引起1873年市场暴跌①的一份力量，并以为这就算是在实际上做了某些破坏现存制度的准备工作了。

还有“对于投机公司发起人的过分夸大的攻击”也使他们不愉快，因为，据说后者仅只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因此“最好是……避免去咒骂史特鲁斯贝尔一类的人”。可惜，一切的人都仅只是“自己时代的儿子”，如果上述的理由就算是充分的根据，那就得要停止对任何人的攻击，而我们就必须拒绝一切的论战，一切的斗争；我们就应该不声不响地挨自己的敌对者的闷棍，因为我们，聪明人，知道这些敌对者仅只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们只

① 1873年的市场暴跌结束了所谓“股份公司泛滥”的时期，疯狂的投机和交易所赌博的时期，这时期是在1870至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到来的。——俄文版编辑部

能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对所挨的闷棍给予百倍的还击，而是相反地，要怜悯这些可怜的人。

同样的理由，我们发动巴黎公社也得到了坏的结果，那就是“从我们这里推走了许多对我们有好感的人，并且一般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仇恨”。并且，党“对于10月法令①的施行也不是完全没有罪责的，因为它十分不必要地激起了资产阶级的仇恨”。

这正是三个苏黎世的书报审查官的纲领。它没有任何可以置疑的地方，特别是对于在1848年就已经非常熟悉这类讲话的我们。在我们面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宣称，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社会上的革命地位所激发，可能“走得太远”了。不是要坚决的反对立场，而是要到处调和；不是要对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要设法去劝说他们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不是要对从上面来的压迫进行愤怒的反抗，而是要温驯地低首下心，承认应该受罚。一切历史地必然的争执，都被解释成不可理解的事，一切的讨论最后都归纳为这样的宣言，说在我们中间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分歧。在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名义出现的人们，今天又同样成功地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如前者之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那样，后者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也看做是远远的将来的事情，看做是在当前的政治实践上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人们可以随意进行调和，采取妥协主义和慈善家的做法。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纸上也承认这斗争，因为它已经不是可以随便否认的事情，而在实际上却来掩盖它，抹杀它，减弱它。社

① 说的是1878年俾斯麦所发布的反社会主义的紧急法令。——俄文版编辑部

会民主党不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党，不应该引起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仇恨，或者一般地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仇恨，它应该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进行强有力的宣传；不是要把远大的、资产阶级所害怕而在我们这一代又不能完成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是最好让它把自己的全副力量和全副精力用来实现那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补缀，这样来巩固旧的社会制度，也许借此还能将那最后的灾祸转变为渐进的、一点一滴地实现的、尽可能地和平的蜕化过程。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在煞有介事地注重实际的伪装下面，不仅仅自己什么事也不做，而且还要企图妨碍所有不属于空谈的事情的出现；这类人，他们在 1848 年到 1849 年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的行动而对于运动的每一步都来加以阻碍，结果终于把它引向失败，他们看见反动，非常意外地觉得已陷入了绝路，没有可能进行反抗或逃避。正是这一类人，他们想把历史塞进他们自己的普通眼界的框子里去，但历史任何时候也不顾这种框子，而只走自己的道路。

至于说到他们的社会主义的信念，那么，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章里就有了足够的批评。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不值得注意的和“粗野的”事情而避开了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东西，就只剩下“真正的人类爱”和关于“正义”的空洞词句了。

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从来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中间的个别人物会靠拢到战斗的无产阶级方面来，并且给他们带来教育的因素。这是我们在“宣言”里已经清楚地证明过了的。但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两种情形：

第一，为着要给无产阶级的运动获得真正的利益，这些人物就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这绝不是大多数归附到运动里来

的德国资产者都能做到的；不论是“未来”或是“新社会”①，都不能提供任何即使是把运动推进一步的东西。那儿没有任何在事实上和理论上能够帮助教育的材料。那儿所有的，只是企图把了解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大学校或什么地方出身的这些先生们所制造出来的种种理论见解调和起来；而这些见解，由于德国哲学的残余在今天所经历着的瓦解过程，是一个比一个更加混乱的。那儿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要求首先对于新的科学加深自己的学习，而是企图这样那样地强迫这科学适合于自己的从外部加上去的观点，以便迅速地替自己构成一套自己专有的私人的科学，同时就狂妄地要想用它来教育别人。因此，在这些先生们中间，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不是把每一个问题弄得明确，而是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幸好，这差不多只是限于在他们自己本身内部。这样的教育家，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用自己没有学习过的东西去教育别人，党即使没有他们也完全能行。

第二，如果有别的阶级的代表参加到无产阶级运动里来时，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以及这一类的成见的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学懂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但是这些先生们，正如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装满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这些观念无疑地是有它的存在理由的，但这只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队伍以外的事。如果这些先生们要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那他们也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那时我们也许可以为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建立联合而和他们举行谈判。但是，在工人党内，他

① 《未来》和《新社会》是社会改良主义的杂志；前者在 1877 至 1880 年在苏黎世出版，后者在 1877 年至 1878 年在柏林出版。——俄文版编辑部

们却是异己分子。如果有什么理由要暂时容忍他们，那我们所要做的也仅只是容忍他们，而不是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还要懂得和他们的分裂仅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样的时间，在我看来，是已经到来了。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党怎样才可以再容忍这些论文的作者留在自己的队伍里。如果党的领导竟然在某种情形下落到了这些人们的手里，那就是说让党随便受到阉割，并使它不能再保有无产阶级的精力。

至于说到我们，那么按照我们的过去来说，我们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在将近40年的期间，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推动作为历史的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变革的强力杠杆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是怎样也不能够和那些企图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取消了的人们走在一道。当着国际建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地规定了战斗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够和这样的人们走在一道，他们公开地表示工人们没有足够的教育来解放自己，而只能从上而下地，由慈善为怀的大小资产阶级的手里获得解放。如果新的党组织采取了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方针，如果它成为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那么，遗憾得很，我们就不能有别的办法，而只能公开地起来反对它，并且解除我们之间的那些联系——直到现在使我们能在国外作为德国党的代表那些联系。但是，希望事情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十六、恩格斯给史密特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我在维也纳的“Deutsche Worte”上读到了那倒霉的莫里慈·维尔特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的书①的评论，这一个批评对于那书的本身也给我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把它看过了，并且应该说，如果莫里慈的文章对于巴尔特的作品所征引的地方是正确的话，那么，好像巴尔特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仅仅只看得见一个例子是有关哲学对于物质存在条件的从属性的，那例子就是：笛卡儿曾主张动物就是机械。我对于居然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人感觉到可怜。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当我们说到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原因时，并不因此就否认观念的领域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对这物质生活条件发生第二位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这一点，那么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写的那个对象。但是，已经说过，这一切都是出自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慈的文章又是不妥当的朋友，并且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在今天还有着很多这类的朋友，他们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理解当做不要学习历史的借口。正如马克思对于70年代末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我只知道一件事，即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① 这里说的是保尔·巴尔特的“黑格尔及包括马克思和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学派的历史哲学”。——俄文版编辑部

还有，“Volk－Tribüne”上又出现了关于在将来社会里如何分配产品的争论：是按照劳动量来分配呢还是用另外的方式？和有名的唯心主义的关于正义的空话相反，人们已经是非常“唯物地”来对待问题了。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曾考虑到，分配的方式在本质上是以被分配的产品的多少为转移的，而产品的多少，当然又要随着生产和社会机构的进步而发生变更，这也就是说，分配的方式也应该变更。参加“社会主义社会”讨论的人们都看不到任何经常变更和进步的东西，而只看到固定的、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东西，因此也就以为应该有一成不变地建立起来的分配方式。合理的提法只能是：(一）努力去发现将会成为开头的分配方式，和（二）设法去找到进一步发展的一般的方向。但关于这点，我在所有的讨论中却一个字也找不到。

一般地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对于德国的许多年轻的著作者们仅只是简单的空话，无论什么东西他们都不加深究地用这句空话来标记着，也就是说，以为只要贴上了这一个标记，事情就算完结了。其实我们的历史见解首先是研究的向导，而不是黑格尔学派式的构造的杠杆。必须重新开始来研究全部的历史。必须详细地探讨各种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然后才能从它们中间寻找出与它们相适应的关于政治、民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像这样的做法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少见，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肯认真地这样做。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助力，它的领域是无限的大，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做，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空话（其实一切都可以被人弄成空话）对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只有这样的用处：使他们能够匆促地把自己的比较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的历史甚至还只是睡在摇篮里！)造成体系，然后洋洋得意地来夸耀自己的成就。

这里又可能出现一个巴尔特，他甚至会把他们中间已经完全弄成简单的空话的东西都兜揽下来。

但这一切都会改好的。我们现在在德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做出更多的事情。反社会主义的法律给我们最大的帮忙之一，就是使我们解除了随着社会主义的高涨而涌来的德国“学生”的麻烦。我们现在也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改造这些一度曾经非常骄傲自满的德国“学生”。你是真正做了些事情的，你一定知道，参加在党里的青年作者们对于经济，经济的历史，商业、工业、农业、社会形态的发展史等，能够用力研究的人多么稀少。他们中间对于摩烈尔①除了仅仅一个名字以外能够知道更多东西的人究竟有多少！新闻记者式的自满当然可以完成一切，但也就不过如此而已。这些先生们经常不断地表示，以为这一切对于劳动者已经是够好的了。这些先生们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地始终认为自己最好的东西对于劳动者也不会是够好的，他是怎样地认为：如果我们贡献给劳动者的东西有一点不够尽善尽美的话，那就是犯罪！……

① 摩烈尔是农村“马尔克制度”的研究者，恩格斯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而且用心地加以研究过。——译者

十七、恩格斯给布洛赫

——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惟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创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的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这里存在着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以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要不是这样，那么，把理论应用到随便一个历史时代里，都会要比解决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首先是在非常确定了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在这里面，经济的条件是最后决定的东西。但政

治条件之类，乃至于在人类头脑中作祟的传统，也起着某种作用，虽然并不是决定的。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结局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如果不愿流于迂腐，就不能这样主张：说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国中，恰恰布兰登堡就是预定了要成这样的强国，在它里面体现了北部和南部在经济上、语言上以及宗教改革后在宗教上的不同，而这一切又仅只是决定于经济的必然性，其他的因素则没有什么影响。(这里首先是指那种情形:即布兰登堡是因着普鲁士领地的关系而牵进波兰的事务中，从而又牵进国际政治关系中，而这对于奥地利的王权的形成又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不愿闹出笑话，就不能把以前和现在的每一个德意志小国的存在，都给予经济的解释，也不能把高德意志语的口音转变（Lautverschiebung，这口音转变把德国在地理上的，由苏台德到陶纳斯的山脉所形成的障壁扩大成贯透全德国的真正的分裂）的起源说成是经济的。

其次，历史又是这样被创造着的，即最后的成果常常是从很多的个别意志的冲突中产生出来，而每一个意志之所以形成起来，又有赖于整套的特殊的生活情况；因此就有着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有着力的平行四边形的无限的丛聚，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成果——即历史的事件，而这历史的成果又可以看做是一种整个说来没有**意识地**和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力的产物。因为每一个人所希望的事情，都会从另外的人的方面受到障碍，而最后出现的事情，都不会是人们曾经希望过的。就这样，从来的历史都是采取自然的历史过程的方式发展下来，并且在本质上也是服从于这样的运动规律的。但是根据这种情形，根据个别的意志——这意志表现着一个人的身体体质和他的外部的，最后是经济的（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或者是全体社会的）环境在他身上所促成的愿望

——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东西，而只能汇合成某种平均的东西，汇合在一个总的结果里，根据这一点，绝不应该就下结论，说个别的意志是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对于总的结果都起着作用，而且同样也就被包含在结果里面。

我还希望你更进一步地从原著里去研究这学说，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作品。实际上这样做还更容易得多。马克思几乎没有写过任何一种不使这个理论发生一种作用的东西。特别像《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就是应用这理论的一个非常辉煌的例子。同样在《资本论》里也有很多启示。我还可以请你参看我的著作："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里面我尽我所知道的来给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详细的说明。

青年们之所以常常会对经济方面给予过分的重视，这在马克思和我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因为要反对我们的论敌而强调被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原则，这时就不容易找到时间、地点和机会，来使其余的许多参与在相互作用中的因素获得它们应有的地位。然而，只要涉及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说明时，也就是涉及实际的应用时，情形就有所不同，而在那里就不会有什么差错。遗憾的是人们始终总是认为：只要把基本的原理抓住，而且还不一定很正确地抓住，就算是对于一种新理论得到充分的了解而且马上就能够运用它了。就这一点来说，我就不能不谴责那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知道许多奇怪的胡说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出来的……

十八、恩格斯给史密特

——1890 年 10 月 27 日于伦敦

我利用最初的闲暇时间来答复你，我认为你接受“Züricher Post”报的工作，是做得很对的。你在那里可以和很多人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果能够经常注意到，苏黎世仅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从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就由于经过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减弱下来，甚至于受到有意识的伪造。但你在实际上对所有的机关都是熟悉的，你就应该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报。那时世界市场就会作为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反映而显示在你的面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情形。它们通过了折光镜，因而在达到人的头脑里时就表现成倒立着的样子。不过前者缺少着能使我们的印象再度倒转回来的神经工具。交易所的人只能通过货币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倒立着的反映来看工业运动和世界市场，因而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是在 40 年代时我就已经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要依据伦敦的交易所公报来构成关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涨和低落等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那些先生们总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说明一切现象，而货币市场的危机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仅仅是些征兆。这在那时是为着要拒绝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过剩作为说明工业危机的发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还更包含着一种

力图曲解真相的目的。在今天，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是永远不存在了，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即货币市场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机，而工业领域的直接的瓦解对它只能起从属的作用，或甚至于不起什么作用。在这里，就需要对于最近20年的许多事情特别从历史上来加以探讨和确定。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实现着劳动分工的地方，个别的劳动过程在相互的关系上就成为独立的东西。生产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当着贸易把生产品和本来意义的生产隔离开来时，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生产的运动在总的方面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但在个别的部分和在这总的从属性的范围之内，贸易的运动还是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即在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着的规律。这贸易的运动有它自己固有的样式，并且它自己又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表现出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由于对黄金的渴望引起的，这种渴望在以前已经把葡萄牙人驱赶到非洲去了(参看谢特柏尔的“贵重金属的生产”)，因为14、15世纪欧洲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贸易的发展是那么强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换手段，而德国——1450年到1550年间最大的产银国家——却不能满足这样大的要求。从1500年到1800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为了要从印度输入。没有人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什么。可是结果，这些纯粹由贸易的利益所引起的发现和征服，对于工业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反作用：单单为了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发展了巨大的工业。

货币市场也是一样。当着货币贸易从商品贸易分离开来时，它就——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生产与商品贸易所规定的限界之内——具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发展，具有着由它本身的特性规定了的特殊的规律和样式。不仅如此，当着货币贸易在自己的更进一步

的发展中扩大成为有价证券的贸易，并且这有价证券又不仅仅表现为国家的证券，而且还把工业和运输企业的股票也包含在内时，当着货币贸易（它在总的方面是受生产支配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生产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权时，——那时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会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了。银行家成了铁道、煤井、矿坑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具有着两重的性质；它的劳动既必须适合于直接的生产的利益，又必须适合于股东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就是银行家。这里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铁道。它们的全部业务都从属于当前的某个吉·古尔得、万得比尔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动，——对于个别的铁道及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异类的活动。就是在这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许多铁道公司在几十年间为着划分他们的区域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斗争，在这斗争里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并不是为着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仅仅是由于持有股票的银行家们力图使交易所的活动容易进行这个惟一的目的。

在我的这几点意见中——关于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这几点意见中，我已经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问题。从劳动分工的观点上来看，这就最容易了解。社会产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职能。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们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他们由此获得了甚至于与他们的授权者互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他们与后者相对地成为独立的东西，于是——这就出现了国家。同样的情形也在商品贸易以及稍迟以后的货币贸易里存在：新的独立的力量在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从属于生产的运动的，但由于它内部存在着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由于一度赋予它而渐渐地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的独立性，使得它对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也发生了反作

用。这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的运动,另一方面是那向着最大可能的独立性进展的、一经产生之后,还能够进行独立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经济的运动在总的方面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据于它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这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运动,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政权同时产生出来的反对势力的运动。就像金融的市场在总的方面、在上面所说的保留条件之下、并且自然是颠倒地、反映着工业市场一样,政府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从来就存在着、斗争着的阶级间的斗争,而这反映也是同样地颠倒着: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追求政治原理上的斗争。它是这样的颠倒,使得我们要经过成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发现事情的真相。

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可能是循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事情就进行得更快;它可能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这样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大民族里,国家权力都会要在一定的期间走向破灭;或者,它会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并推进到另外的方向——这一种情形,归根到底又会归结为前面两种的一种。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形里,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会给予很大的损害,会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费。

除此而外,还有经济资源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这一种情形,这在以往的某些情况下面,有时会使一整个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全部遭到毁灭。这种情形在今天却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间是这样:被打击者最后常常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胜利者得到更多的胜利。

就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当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产生职业的法律家时,于是又展开了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

生产和交换虽然有着它的一般的依赖性，但同时对于后者又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反作用能力。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里，法律不仅仅应该适应于一般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应作为它的表现，并且还必须是一种内部首尾一贯的、不至于因为有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表现。为要完成这一点，就使得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确切性愈更地受到破坏。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为严峻的、尖锐的、没有伪装的一个阶级统治的表现时，那破坏也就愈更厉害。应该说这事的本身就已经和“法律概念”有着矛盾了。1792年到1796年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彻底的法律观念，在《拿破仑法典》里面已经有了许多方面的伪装。而所有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些，还要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每天各式各样地减弱下来。但这并不妨害《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律典籍成为整个大陆上的一切法典编纂的基础。因此，“法律发展”的进程主要地不外就是这样：首先是企图要排除那把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时所发生的矛盾，并建立起一种调和的法律体系；接着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不断地把这体系冲破，于是，又把它卷入新的矛盾里（我在这里暂时只是就民法来说的）。

经济关系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样是一种头脚倒立着的东西：它的出现并不为当事者所意识到，法律家总以为自己是根据着先验的原则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经济的反映——于是一切都头脚倒立着了。而这种颠倒，在它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它之能够反过来对于经济基础给予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能够变更经济基础，这对于我好像都是自明之理。就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是，如像在英国有着绝对的遗嘱自由，而法国对于这自由却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就很难说它们在一切细

节上都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然而两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因为他们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

至于说到那浮悬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种史前的、从历史时代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内容，这内容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是荒谬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史前时代的低度的经济发展，把关于自然的虚伪的表象当做了补充，有时也当做了条件甚至于原因。但是，虽然经济的需要曾是，而且愈来愈更显著地成为前进着的自然认识的主要推动力，但如果有人想给这一切原始的荒谬思想都找到经济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历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承担这个任务的人们，就又是从属于特殊的分工的领域，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自己是在一种独立的领域里工作着。在社会分工的内部他们愈更形成一种独立的集团，那他们的生产物，以至于他们的谬误，对于全社会的发展甚至于经济的就愈更会发生反影响。但不论如何，他们本身仍然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支配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就最容易得到证明。霍布斯是最初的近代唯物主义者（在18世纪的意义上），但又是当时的绝对专制主义者，当时正是绝对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而在英国正是开始与民众进行斗争的时代。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调和的产儿。英国的无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即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于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里，显现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人性质——时而积极地，

时而又消极地。但是,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倒能够奏起第一把提琴来:例如18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的德国对于前两者。但不论在法国或德国,哲学,就像当时一般的文学的繁荣一样,仍然是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结果。我认为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仍然是无可辩驳,不过它要表现在该领域本身所规定了的条件之内:例如在哲学里,就表现为经济影响对于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有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着作用的)。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这决定作用也多半是间接的,当它是作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对哲学发生着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时候。

对于宗教,我在《费尔巴哈论》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都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特(Barth)认为我们是否定了一切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之对于经济运动本身的反作用时,那他仅只是向风车格斗罢了。只要看一看马克思所写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那儿所论到的差不多都是关于政治的斗争和事件所演着的特殊作用(自然,是在它对于经济条件的一般的依存性以内的)。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在关于劳动日的一节里,立法(这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对于劳动日是起着怎样的决定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一节(二十四章)。或者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为着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倘若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力的话?统治权(这是说国家权力)也正是一种经济上的势力。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那本书。①首先必须编好第三卷，②并且我相信，譬如伯恩斯坦，也能够把那件事完全处理好的。

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常常只看见这里是原因，那里又是结果。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只存在于危机时期，不知道整个大的进程是表现在相互作用里——虽然是极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的运动在这里一直都是最强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不知道这里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对于他们，黑格尔是不曾存在过的……

---

① “那本书”是指巴特所著的《黑格尔及包括马克思和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学派的历史哲学》。——译者

②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俄文版编辑部

十九、恩格斯给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只有到今天，我才终于能够感谢你亲切地给我送来的《列辛外传》。我不愿仅仅把收到了书的形式上的签证寄给你，而要同时告诉你一些关于书的本身——关于它的内容的话。就因为这个原因，回信才延迟了。

我首先谈最后部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附录①，在这里你对主要的事情都阐述得很高明，并且能使一切不受成见束缚的人信服。如果说会使我有多少的异议的话，那么就仅只是在于，你把超过了我的分内的过多功绩归到了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想到，有许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有时是由我独立地发现的，其实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视野更广阔的马克思所揭示出来了。一个有荣幸和马克思这样的巨人共同工作到四十年之久的人，他的分内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巨人生存的期间，通常是不会被人认识到的，但是，一旦那巨人死了，这个较小的战友却又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超出他分内的过高评价，而这样的情形，现在好像就应到了我的身上。历史终归是会把一切安排停当的，不过到那时我可能已幸运地离开了人世，而对任何事情都不知道了。

---

① 梅林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在1893年作为他的著作《列辛外传》的附录而出版的。——俄文版编辑部

此外还有一点遗漏，这一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也强调得不够，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同样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最初是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观念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济因素如何对它们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竟忽视了形式的问题，如：这些观念的形成是经过什么途径的？这就使我们的论敌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实，来挑起误解以至于进行曲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思想体系是一种过程，这过程虽然是凭借着所谓思想家的意识来完成的，但所凭借的是虚假的意识。推动着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动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这样它就不会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这就是说，思想家自己所想像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动力。因为它是思维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或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里引导出来，或者是从思想家自己的或者从他的先行者的。思想家仅仅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材料来工作，他毫不踌躇地把这材料当做从思想里产生的东西，而不再进一步去探究比较远一些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源泉，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明的，因为他们以为，既然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思想为媒介的，那么归根到底它的基础也就应该是思想了。

历史方面的学者（这里说的历史方面，是简单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领域，一句话，即属于社会而不是只属于自然的一切领域）——历史方面的学者，在每一科学领域里都保有着一定的材料，这材料是从前一辈的思维里独立地形成起来，并在这些相互继承下来的后辈的头脑里构成一种独立的、特有的发展系列。不用说，外部的事实（不论是属于这一领域或那一领域

的事实）对于这发展是能够作为随伴的原因而起作用的，但这个事实由于一种默契的前提而仍然被看作仅仅是思想过程的成果，于是我们就只好永远停留在那甚至对于最顽固的事实也能够顺利地加以消化的纯粹思维的圈子里。

这一种关于国家组织形式、法律系统、关于思想体系的观念等在各自领域上的独立历史的外观，把所有人们的眼睛都迷乱了。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战胜了御用的天主教，黑格尔战胜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间接地以他的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说”战胜了宪法上的孟德斯鸠，那么，这就是一种限定在神学、哲学、国家学说内部的过程，它在这些思想领域的发展中自己形成一个过站，而且绝不越出思想的领域。而自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永久性和最后完成性的资产阶级幻想出现以后，人们甚至于把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胜利也认为单单是思想的胜利，认为这不是变动中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只是对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存在着的事实条件所最后达到的正确理解。倘若狮心王李查和菲力普·奥古斯丁（法兰西国王）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被卷入在十字军中，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免除那五百年的贫困和愚昧了。

对于事情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对它只能略微提到），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给予它所应该受到的重视。这是一个旧的典故：在开始时常常因为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如像已经说过的，我就是这样做了，而缺点常常是在事后才看出来。因此，我不仅仅要避免为这件事向你提出责难，——相反地，像我这样一个在更早时候就负有同样罪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将来对于这一点提起注意。

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些学者们的荒唐观念：说因为我们不愿

意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体系部门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们**对于历史的一切作用**。这种看法的基础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结果当作僵硬地互相对立的两极来看的非辩证法观念，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绝对忽视。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记了：当一种历史的现象被其他的、归根到底被经济的原因推动到世界上来时，它就能够对于周围环境甚至于它本身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你的那本著作第 475 页里提及的巴特讲到僧侣阶层和宗教的地方。你清算了这个庸俗到难以置信的家伙，使我非常高兴。人们应该委任他去当莱比锡的历史教授！那里就有着老瓦克斯姆，那也是个眼界狭窄，然而却拥抱着大堆琐末事实的，完全另一种类型的家伙。

关于你的书，一般地我只能重复以前它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我不只一次地说过的关于一些章节的意见；它最好的地方是在于叙述了普鲁士国家的形成，我甚至于敢说这是惟一的好的叙述，它在大部分的事情上把一切相互关系直到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来。我觉得遗憾的，只是你没有一直包括了所有的一切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俾斯麦，这使我不由地要希望你再一次来完成这件事，并且连带着把从选举侯腓特烈·威廉到老威廉的一般的图景也叙述出来。你既已经预先作出了一些工作，也就可以期望至少在根本问题上贯彻到底。并且这事还应该在古老的建筑物未曾垮台以前就做出来。忠君爱国的神话的摧毁，即使不是消灭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专制（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德国是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就已经过去的阶段）的绝对必要的前提，但也仍然是为实现这种消灭所需要的最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杠杆之一。

那样做时，你会有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个别机会来把普鲁士的地区的历史当作为德意志的总的不幸的一部分来加以描绘。就

在这个地方，我和你的理解多少有些分歧，也就是和你所理解的关于德国之所以分崩离析的原因以及关于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倘若我能够按照自己的希望在明年冬天为我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再作一次修改的话，我就可以在那里把相应的地方加以发展。我并不是说你所举出的原因是错误的，我只是要把另外的一些原因加上去，并给予多少不同的安排。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本身代表着一种彻头彻尾的不幸——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只有和法国历史的相适应的时期加以对比，才能得到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和我国相反。在那里——由封建国家的零散的成员形成了民族国家，在我国——那时恰恰是处于最深刻的衰落的时期。在那里——全部进展的过程中都贯穿着宝贵的客观逻辑，在我国——愈来愈不可救药的瓦解。在那里——中世纪的外来侵略是由英国的占领者利用了普洛文萨族反对北部法兰西的机会而进行的；和英国的战争表现为所谓的三十年战争，但这个战争在那里由于外国干涉的压力和北部对南部的征服而告终结。接着以后就是中央政权反对以外国占领者作为自己依靠的布律根藩属的斗争，后者的作用相当于布兰登堡—普鲁士的作用，但这斗争是以中央政权的胜利而告终，并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在我国，恰恰就在这时候民族国家终于瓦解了（如果神圣罗马皇帝的疆界内的“德意志君主政权”可以称作民族国家的话），并且在很大的规模上使德意志土地开始零散化。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是极端可耻的对比，但同时也是极有教益的，并且，自从我国的工人把德国再一次推上历史运动的最前的行列以后，我们吞咽过去的耻辱就多少容易些了。

德意志的发展还有着一个十分特殊的突出之点，就是，最后

把全部德国互相瓜分了的两个帝国的组成部分，全都不是纯粹德国的，而是在斯拉夫土地上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殖民地，布兰登堡是萨克森殖民地；他们之所以能在德国本土掌握政权，也只是由于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的支持：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不必说波希米亚），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遭受危险最多的西部边界就没有这类的事情，在北部边界，人们把防御丹麦人侵犯德国的任务交给了丹麦人自己，而在南面，需要防卫的事情是那样稀少，以至于负有守卫边界责任的瑞士人竟能够和德国分离！

可是，我已经拉扯得太多了；让这些漫谈对你提供一个证据，证明你的作品引起了我多么大的兴趣。

二十、恩格斯给丹尼尔逊

——1893 年 10 月 17 日于伦敦

……十分感谢你送来《概论》①的样本；我把其中的 3 份送给别的能够评价它的人。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给人以很显著的印象，甚至于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而这是完全应该的。在我所遇到的俄国人中间，它成了谈话的主题。就在昨天，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还写信给我说："我们俄国人在进行着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争论"。在柏林的"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②上，一个叫皮·斯徒鲁威的发表了关于你的书的很长的论文；有一点我应该和他同意——我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俄国，是克里木战争所造成的历史条件和 1861 年土地关系更变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最后是全欧洲一般的政治停顿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斯徒鲁威有一点是完全不对的，就是，他为着要反对他所谓的你对于将来的悲观主义看法，竟把俄国现代的状况拿来和美国的状况相比较。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危险的后果，在俄国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地容易被克服。在这里他完全忘记了，美国的产生本来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做基础，

① 指他（尼古拉）的《社会改革后的我国国民经济概论》1893 年彼得堡出版。——俄文版编辑部

② 第三卷第一期，1893 年 10 月 1 日（恩格斯注）。

它们整个地避免了欧洲的封建主义而建立起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在俄国，我们却有着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基地，有着先行于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虽然说它在今天已是沦为废墟了，但它仍然起着基地的作用，物质的作用，在它的上面，活动着和作用着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真实的社会革命）。在美国，货币经济一百年以前早就完全创立起来了，而在俄国，自然经济还是一般的通例，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因此很显然，俄国的变革一定会带有非常强烈和非常尖锐的性质，并且会随伴着美国所不能比的很大的苦难。

虽然如此，我觉得你对事情的看法，比起事实所能够证明的情形来说，还是太阴暗了一点。不用说，由原始的，农村的共产主义要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就不可能没有社会内部的可怕的激变，不可能不消灭掉整个的阶级，并把他们改变为另外的阶级；而这会带来多么巨大的苦难，引起人类生命和生产力的多大浪费，这是我们在西欧——虽然规模较小——已经看到了的。但要把一个伟大的和天赋很高的民族引向完全的破灭，这还是离得非常远的。你们国家通常所有的迅速的人口增殖可能会陷于停顿，随伴着旧的地主和农民的剥夺而来的森林的任意破坏，可能会引起生产力的巨大的浪费；但是，成万万以上的人口终于会给非常显著的巨大工业形成足够的国内市场，而这就会在你们国家，就像在一切地方一样地，使一切得到补偿。——当然，这就需要西欧的资本主义维持得足够长久才行。

你自己承认，“克里木战争后的俄国社会条件，对于我们从自己的过去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那种生产形式的发展，并不是顺利的”。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俄国，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不可能由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种

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国家里已经体现于生活中并可以引为范例的话。由于这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在任何历史地它可能出现的地方——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以及由此形式所构成的社会两阶级对抗之必然的结果，因此，除非是有某些地方已经实现的范例可以模仿，否则它就不能直接地从原始的土地公社里发展出来。倘若西欧在1860至1870年就成熟到可以发生那样的变革，倘若这变革那时是开始于英、法等国，在那种情形下俄国人就一定会起来证明，他们的在当时还或多或少完整无恙的公社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但是，西方是在停顿着，甚至于还不曾尝试进行那样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则与此相反地发展得愈来愈快。这样，俄国除了以下的道路外不能作别的选择：或者是把公社发展为那种生产形式，这种形式被一些中间的历史阶段把它隔开了，并且就是西欧也还没有能使这种形式实现的成熟的条件，因此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任务；或者是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试问：除了第二条路之外还能有其他吗？

至于说到公社，那么，只有在它的成员中间的财产差别微不足道的时候，它才可能存在。一旦这个差别增强起来，一旦它的某些成员成了另外的比较富有的成员的债务奴隶时，它的继续存在就不可能了。梭伦以前雅典的富农和恶霸是那样顽固那样无情地破坏了雅典的氏族，在你们国家里公社也会被这样的富农和恶霸所破坏。我恐怕这个制度是注定了要走向灭亡的。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开辟新的眼界和新的希望。只要看看它在西欧所做了的和正在做着的事情。像你们那样伟大的民族，会熬得过任何的危机。任何历史的进步也不能加以补偿的那种巨大的灾难是没有的。只是活动的方式有所改变罢了。让预定的命运得到完成吧！

二十一、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①]

——1894 年 1 月 25 日于伦敦

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关系（我们把它看做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类在生产他们的生活物资和互相交换生产物（在分工存在着的情形下）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因此它里面就包括着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又决定着生产物的分配，从而，又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支配和奴役的关系，从而又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此外在经济关系的概念里所包含着的，还有经济关系依以活动的地理的基础，还有那在事实上遗留下来的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残余之能保存下来常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力），自然也还有那从外部把这个社会形式包围起来的环境。

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 10 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全部静水力学（托里色利等人），都是由于 16、17 世纪

① 恩格斯这封信里面答复两个问题：一，经济关系是怎样起着因果的作用？它是发展的一种充足原因、根据、诱因和经常条件之类吗？二，种族要素和历史的个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一种作用？——译者

意大利调整山洪的需要而发达起来的。在电学方面，是自从它在技术上的有用性被发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合理的东西。然而可惜，在德国，人们给科学写历史的时候，总是惯于把它形容成天上掉下来的一般。

二，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但种族也正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这里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

（一）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都建立在经济上。但它们在自己之间互相影响着，并且对于经济基础又有着反作用。绝不能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惟一能动的原因，而其他一切都只是被动的结果。应该说，在归根到底总是给自己开辟着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有着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通过了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而发生影响，甚至于就是那德国资产阶级俗物们由于1648到1830年德国的经济穷乏状况所产生的致命的软弱和无能（它在最初，是表现为信仰主义，后来又成为感伤主义和对王侯和贵族们的奴隶般的摇尾乞怜）也未尝没有经济上的影响。它曾经是经济高涨的最大障碍之一，只在后来革命战争的和拿破仑的战争把慢性的穷乏变成了急性时，这障碍才开始发生了动摇。因此，像有些人所任意想像着的那种经济状态的自动作用，是没有的，人类是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过这创造是在一种既成的、使它们受制约的环境之内，是在已经存在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之上，在这些关系里，经济关系虽然要从其他政治的和思想体系的关系方面受到不管多么大的影响，但在最后它总是决定的东西，并且形成为贯穿全部发展的、惟有依赖它才能使人获得理解的红线。

（二）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直到现在都还不是在总的意志指导之下按照一个总计划去创造，即使是在一定的范围有限

的所与的社会里，也是如此。他们的努力互相交错着，因此所有这样的社会都被**必然性**支配着，这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就是**偶然性**。在这里，通过偶然性而把自己贯彻着的必然性，归根到底又是经济的东西。这里就可以涉及所谓的大人物的问题了。一个这样的伟人，恰恰就是他在这一定的时间和所与的国土里出现，这事自然是纯粹的偶然。但假如我们撇开了他，那就需要有代替的人，而这代替的人就会被找到，不管是否顺利，他迟早总会被找到。拿破仑，恰恰是这个科西加人，他成了军事的独裁者，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法兰西共和国需要他，这是偶然；但如果缺少了一个拿破仑时，一定会有人来顶替他的角色，那也是可以证明的，即只要有需要的话，这样的人就随时可以找到：不论是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见解，那么，从里梯、米格纳特、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的全部英国历史家里面就可以看出已经有人向这方面努力，而这同一见解之被摩尔根所发现，更证明这见解的成熟时间已到，因此它就**一定要**被发现。

历史上一切其他偶然的东西和外表上偶然的东西，全都是这样的。我们当前所研究的领域离开经济愈远，并愈更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时，那我们就愈更会看出在它的发展中呈现着偶然性，而这发展所循的曲线也就愈更是锯齿形的。如果你在这曲线里描画出它的中心轴线，你就会看出：所观察的时期愈更长久，所处理的领域愈更广大，那么，这条轴线就愈更会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着，愈更和它平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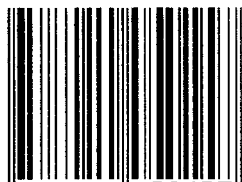
正确认识的最大障碍，就是在德国的文献中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事情的困难，不仅只在于要打破那些在学校里铸成了的历史发展的观念，更困难的是在于要汇集为这目的所必要

的材料。人们只要看看例如老居里希（G.V.Guelich）①的书，他在他的枯燥的材料堆里竟存放着那样多的值得用来解释无数量的政治事实的题材！

此外，我还相信，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所给予着的那优秀的范例，由于它已经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对于你提的问题就给予了很完满的回答。我还要说，在《反杜林论》第一章第九至第十一节、第二章第二至第四节以及第三章或引论里，又在《费尔巴哈论》的最后一节里已经把大部分的要点都接触到了。

我请你不要对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加以斤斤计较，而要经常注意到总的联系；我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把一切都给你讲得那么明确，像准备公开发表时所应该做的那样……

① 恩格斯指的是居里希的多卷著作《我们这时代最重要的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的叙述》，1830年至1845年在耶拿出版。——俄文版编辑部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艾思奇全书　第4卷　1949-1952
作者=艾思奇著
页数=882
SS号=11796299
DX号=
出版日期=2006.10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订正本〕（1949）
　例言
　一、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二、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四、国家与政治
　五、社会的思想意识
学社会发展史的方法——在华北军区直属队的报告（1949）
　一、为什么要学社会发展史
　二、学社会发展史的基本方法
　三、学社会发展史应着重了解的问题
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1949.7）
学习社会发展史应明确掌握的五个基本观点（1949.8）
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1949.9）
再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1949.10）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49.11）
学习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1949.11）
反驳唯心论——对天津干部的讲演（1949.12）
斯大林怎样援助了中国人民（1949.12）
关于几个哲学问题（1950.1）
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1950.3）
前进一步（1950.10）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1950.2、11）
　第一讲　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一、劳动创造人

二、劳动创造人类世界
三、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第二讲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二、五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三、阶级斗争问题
第三讲　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一、什么叫做革命
二、关于资本主义
三、社会主义革命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讲　政治与国家
一、什么是政治
二、什么是国家
三、两种国家
四、关于政体问题
第五讲　社会思想意识
一、社会思想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二、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
三、社会思想意识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四、关于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
附录一：第一讲问题解答
一、学习方法
二、从猿到人
三、宗教迷信问题
附录二：关于理论学习总结
一、对总结的一般估计
二、学习理论课的主要成绩
三、几点经验

四、目前存在的几个思想问题
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1950.4、11）
引言——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　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类的世界
第一题　劳动创造人
第二题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第三题　劳动群众创造历史
第二章　五种生产方式——阶级斗争
第一题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第二题　五种生产方式（上）
第三题　五种生产方式（下）
第四题　阶级斗争
第三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题　什么叫做革命
第二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第三题　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章　政治和国家
第一题　什么是政治
第二题　什么是国家（上）
第三题　什么是国家（下）
第四题　什么是政体
第五章　社会思想意识
第一题　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思想意识
第二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上）
第三题　社会思想意识对于社会物质生活的作用（下）
第四题　关于思想改造的问题
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

展史》讲座（序）
学习苏联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1950.11）
论思想改造问题（1951.1）
一、“ 存在决定意识 ” 和 “ 思想改造 ” 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二、如何具体解决思想改造的问题
三、关于思想改造的某些方式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1951.3）
一、真理的问题是对于革命成败攸关的重要问题
二、实践之作为真理标准的原理
三、接近客观真理的辩证法道路
四、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关于《实践论》和学习方法的一些问题——在一个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1951.6）
为什么要批判和克服 “ 功臣 ” 思想——关于 “ 为什么必须克服 ‘ 功臣 ’ 思想 ” 问题的讨论总结（1951.6）
《实践论》与关于哲学史的研究（1951.9）
一、《实践论》解决了什么问题
二、对于过去哲学学说如何估计
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与旧唯物论的认识论
四、知行难易的问题与《实践论》
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51.9）
关于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在安徽宿县第四届文教行政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2.1）
《大众哲学》（修改本）（1950—1953）
第一章　绪论
一、哲学并不神秘——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二、果树林里找桃树——哲学是什么
第二章　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

三、两军对战——哲学的两大类别
四、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二元论、机械唯物论
六、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辩证唯物论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七、用照相作比喻——反映论
八、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
九、原来是一家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一〇、由胡桃说起——认识和实践
一一、是朋友还是豺狼——真理论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一二、天晓得——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三、无风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的规律
一四、不是变戏法——事物自己运动发展的规律
一五、追论雷峰塔的倒塌——质和量互相转变的规律
一六、岳飞是怎样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
一七、没有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
一八、七十二变——现象和本质
一九、“谈虎色变”——形式和内容
二〇、规规矩矩——规律与因果
二一、“在劫者难逃”——偶然、必然与自由
二二、“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附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1938、1951译）
一、马克思给安能科夫——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

尔
二、马克思给魏德迈耶——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三、马克思给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四、马克思给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五、马克思给恩格斯——1866年7月7日
六、马克思给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
七、马克思给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于伦敦
八、马克思给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九、马克思给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
十、马克思给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十一、马克思给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十二、恩格斯给库诺——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十三、恩格斯给倍倍尔——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十四、恩格斯给左尔格——1874年9月12至17日于伦敦
十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布拉克等人的通告——1879年9月17至18日于伦敦
十六、恩格斯给史密特——1890年8月5日于伦敦
十七、恩格斯给布洛赫——1890年9月21至22日于伦敦
十八、恩格斯给史密特——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十九、恩格斯给梅林——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二十、恩格斯给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二十一、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
封底